

FARA DABHOIWALA

WHAT IS FREE SPEECH?

The History of a
Dangerous Idea



‘A work of great profundity and brilliance’ **WILLIAM DALRYMPLE**



关于作者

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 (Fara Dabhoiwala) 出生于英国，在欧洲接受教育，拥有印度血统。他现任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高级研究学者，此前曾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其前作《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 (*The Origins of Sex: A History of the First Sexual Revolution*) 曾被《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和《星期日泰晤士报》 (*The Sunday Times*) 评为年度最佳图书，并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

Fara Dabhoiwala 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

何为言论自由？

一个危险思想的历史



译者 严几道

目录

绪论

- 1 言论的力量
- 2 宽容言论
- 3 发明言论自由
- 4 自由的形态
- 5 启蒙的实验
- 6 第一修正案的偶然例外论
- 7 正当与非正当的表达
- 8 帝国纠葛
- 9 殖民与后殖民时代的不自由
- 10 思想的市场

后记：从过去走向未来

Notes 注释

Acknowledgements 致谢

Index 索引

*For Harriet and Kate,
my favourite speakers*

*And for Jo,
again and always*

绪论

言论自由的历史究竟为何？我们又为何应当予以关注？

在此之前，我从未深思过这些问题。直到几年前，我的一部著作被译成中文，并受邀前往中国大陆就此发表演讲。那是一本关于性观念史的书，我也早已习惯了全球读者对其作出的各色反馈。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尽管我的出版合同明确禁止任何改动，但译本还是遭到了审查——在收到校样时，我发现内容多处缺失。事实证明，一位编辑因认为某些内容“不合适”而将其删除了。在我提出抗议后，总编介入了此事。最终，我收到邮件告知，出版社已将我的申诉提交给南京“新闻出版局的官员”，由他们作最终裁定。那些政府审查官同意恢复少数删减，但坚持保留其余部分的删改。

在中国，审查制度是难以忽视的存在。每一家报纸、广播电台和出版社都归国家所有，并肩负着推进意识形态使命的预期；数以百万计的隐形监管者全天候对所有在线行为进行清理。在旅途中，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正见证着某种历史性的新奇现象。互联网本被视为史上最具解放性的表达技术，但在其面前，中国共产党似乎动用了过往所有管控舆论的手段，并研发出了一些全新的工具——而且它正取得胜利。

这种局面本不该发生。数十年来，西方政界人士一直宣称，更大的经济自由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同样走向自由化。21世纪初，他们同样信万维网的普及将加速这一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言论自由理应与自由贸易并肩前行。2000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戏谑道，中国或许正试图驯服互联网，但这绝不会成功——“祝他们好运！这就像是想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 [注 1]

然而对于我的所见所闻，我并非全然感到意外。我的中国之行发生在2015年，当时希拉里·克林顿被广泛认为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的有力竞争者。而在此十年前，她回忆录的畅销中文版曾被出版社秘密审查，大量涉及政治敏感话题的段落被重写或删除。克林顿在发现后表示，这些行为令人愤慨，但也是“愈发徒劳”的 [注 2]——在网络空间时代，中国公民肯定会拥有越来越强的能力去自行获取真相。

我之所以关注到这个故事，是因为巧合的是，那家曾对她的书动手脚、声名卓著的中国出版社，如今也在出版我的书。在我旅程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有幸与该社的一位资深编辑共进晚餐。交谈中得知，他竟然就是克林顿著作的译者，也就是多年前亲手删减她文字的那个人。我被迷住了，急切地想从他那里挖掘信息。我想知道，身为一名审查者是怎样的体验？一个人如何

判断允许与不允许之间的界限——哪些词汇和话题是禁区，哪些不是？当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准则随之调整时，会发生什么？新闻出版局的官员是如何与他沟通的？（结果发现，主要是通过电话。）随着我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他露出了带有屈尊意味的微笑。他纠正我说：我们其实并不使用“审查”这个词；当我们处理文本时，我们更愿意称之为“裁剪”。这里剪一小块，那里切一刀，再缝补一下，瞧——现在它穿起来合适多了。

这让我突然意识到，18世纪欧洲的官方审查官们[注3]往往也是这样看待自己工作的：将其视为一种与作者之间有益的编辑协作，旨在改进而非削减文本。甚至“审查员”（Censor）这个词本身，无论是在其最初的罗马语境下，还是在后中世纪欧洲的复兴时期，都仅仅是描述一种具有公共精神的官员，其职责是监督社群的道德水准。不仅如此，在数个世纪里，在“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成为显学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认为言语、写作和印刷理应受到公共规制，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在前现代的法庭上，普通男女经常因对方言语或文字不逊而相互起诉；他们的政府同样为了更高的公共利益而例行管控此类事务。在那时，没有人将表达自由视为一项基本的个人权利。那么，这一切为何改变——又究竟是在何时改变的？言论自由的历史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令人沮丧的是，当我回到牛津并试图寻找相关主题的书藉时，我发现尽管关于各个时代、各个地点审查制度的著作汗牛充栋，但作为现代概念的“言论自由史”却几乎无人问津——除了那些执迷于《第一修正案》的美国学者。此外，当代对这一术语的使用似乎同样含混不清：它主要像是一个标语，人们挥舞着它来博取关注，或是以此抨击对手。

2016年夏天，当我移居美国开始新工作时，这些思绪仍萦绕在脑海。不久后的一天，我醒来发现新家园的公民最终并没有选举希拉里·克林顿为下一任总统。相反，他们选择了一位极其危险且丧失理智的煽动者——此人似乎主要通过社交媒体上向数千万人传播令人愤慨且充满仇恨的谎言，便将自己弹射到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职位上。他入主白宫令问题更趋恶化。似乎没有人能阻止这一切——因为这一切都与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权捆绑在一起。当然，世界上到处都是危险的、撒谎的煽动者，但美国人谈论“言论自由”的方式，乃至那种近乎偏执的推崇，与英国、欧洲，或是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我所了解的任何地方都截然不同。为什么会这样？这些文化差异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我开始思考，溯源言论自由的历史，将如何帮助我理解它在现代世界的轮廓？

如今我已成为美国公民，我开始理解同胞们是如何看待言论自由的。但我骨子里仍是一个英格兰人，身上流淌着印度裔的血脉，并在冷战时期的欧

洲长大。因此，我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各国文化对待表达自由的方式是多么迥异；意识到当前的美国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是多么独特；也意识到这在多大程度上与其说是一个理性问题，不如说本质上是一个信仰问题。《第一修正案》的含义是一套复杂的法律教义，但它同时也像是一种世俗宗教，拥有其不断演变的教义和圣徒传记。

如果仅将言论自由史作为一个国家问题来研究，上述这些现象都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例如，鉴于有关美国言论自由思想演变的著作已如此丰富，我本不敢预设能发现任何新意。但令我惊讶的是，我几乎立刻就有了新发现——部分原因在于我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要洞察差异，就必须将不同文化进行对比，探索它们的历史轨迹如何重合或分叉。采用跨国视角的另一个必要原因在于：言论与出版自由历来是国际性概念，在国界之间不断被借用和重塑。每当人们在过去援引这些自由时，总是在将自己的处境与他处、他时的情形进行对比。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如此。言论自由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概念 [注 4]，需要一部全球史来为其正名。

这并不意味着要撰写一部涵盖所有时代、所有地域的表达自由通史——那将是一本索然无味的巨著。而且，这样的书也无法付诸笔端，因为言论自由从来不是一段单一的历史。尽管我们普遍渴望将言论自由史视为智识进步的历程，尽管历代思想家对其进行了精深阐述，但它始终是一个被工具化的咒语（weaponized mantra），而非一个完全自洽的概念。这正是一直以来我们无法就其确切定义达成共识的原因。言论自由并非一种“自然状态”，而审查制度也并非如相关论著通常暗示的那样是“反自然”的。同样，言论自由也并非如人们通常假定的那样，仅仅关乎哪些内容可以被自由表达。其轮廓从来不单由内容决定。最后，表达自由也并非仅仅是减少限制后的自然产物。恰恰相反，它本身是一个高度人工构建的概念。其理论与实践始终拥有各自独特的形态。

本书将追踪这种不断变化的形态。这不仅需要记录特定词汇和思想禁忌的演变，还始终涉及对权力分配不均的揭示：谁拥有话语权，谁被剥夺了声音；谁的声音被放大，原因又何在。此外，它还关乎过去五百多年来，传媒格局的变迁如何影响了这些失衡状态——从以口头传播为主的社会，到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再到我们当下的全球媒介革命。这些才是本书将要追寻的、关于言论自由史更深层且更具启发性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聚焦于这一套难以捉摸却又极具魅力的理想在发明与传播过程中，最具意义的主题与篇章。法律及其执行是衡量各文化如何定义和实践表达自由的关键指标，也是观察这些社会内部权力分配的晴雨表。

因此，司法演进在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这并非一本法律史专著，而是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政治学及其历史演变——尤其是作为一种理想的演变。正如后文所述，言论自由的理论总是落后于其实践：贪欲、技术变革和政治权宜之计，总是跑在立法者和哲学家前面。

言论自由之所以是一项危险的思想，原因有二。其一，它具有动摇正统、为反叛者和破除偶像者赋权、以及号召人们采取行动的潜能。这正是我们倾向于赞美它的原因。但另一个原因则更令人不安：纵观历史，这一引起共鸣的理想也始终被权势者、怀有恶意者和自私自利者操弄——或为个人私利，或为封杀异议，或为煽动不和，亦或是为了颠覆真相。

表达自由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服饰、行为到电影、音乐、漫画及各种艺术。但其现代史与印刷媒介有着尤为紧密的联系。在 18 和 19 世纪，当言论自由爆发式地成为一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时，印刷机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传播技术。正因如此，关于表达的法律和讨论总是特别聚焦于“出版自由”（liberty of printing）。本书的最后一章将探讨这种对出版业的优先关照，如何影响了人们对言论本身、以及对后来出现的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体的态度。在此之前，我们将主要关注口头、书写及印刷的文字。

我的论证还特别关注英语世界——将其置于比较研究的框架中，并剖析其独特性。这不仅是因为一些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模式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还因为在当代全球范围内，美国媒体公司已主导了在线传播的市场。无论我们对此持何种态度，理解英语世界何时、为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演变出独特的言论观，并将其与其他文化的历史轨迹进行对比，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大有裨益。

最后，本书采用了多尺度的考察方法：时而拉近镜头，详细分析关键人物和思想；时而拉远视野，概览更广泛的主题与问题。开头前三章将带我们跨越言论自由出现之前的世界，直至 18 世纪初现代概念的发明。随后的四章中，我们将探讨不同类型的言说者如何在迥异的全球背景下操弄这一理想，并产生了各异的效果：涉及加勒比海和北美的白人至上主义奴隶制社会；北欧那些虽然贫穷、处于智识边缘但却颁布了世界首部言论自由法的王国；法国与美国——两国交织在一起的早期言论自由史产生了直到现在才被察觉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及在欧洲和美洲为不同事业而奋斗的男女、奴隶主与废奴主义者、保守派与激进派。本书的最后一章探讨了 20 世纪美国观点与法律变迁的重大历史，同样采取了比较研究的视角——特别是强调了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批判对美国观念持续存在却被低估的影响。

以这种方式考察该课题，主要目的是为了表明：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言论自由在理论或实践上都从未是一个稳定的概念，而始终受到不断变化的当地优先级（local priorities）的影响。正如同言论自由在当下没有单一的含义，在过去亦然；我们无法使用固定的比较范畴来分析其演变。另一方面，出版与言论自由并非一套完全漂浮不定的思想：它也形成了强大的智识脉络，并一直延续至今。因此，书中某些章节深入探讨了这一重塑与挪用

（appropriation）的过程如何在关键转折点发生。例如，英语世界实践之所以具有独特性，原因之一是两部关键的英国文本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一部是18世纪名为《加图来信》（*Cato's Letters*）的匿名散文集，它实质上发明了政治言论自由的现代理想；另一部是19世纪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著《论自由》（*On Liberty*），它以各种原创性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想。在这两个案例中，他们的论点在当时及后世读者看来都具有令人信服的权威性——然而，事实上这些论点都隐秘地充斥着个人偏见和智识缺陷，讲述着一个令人不安的、截然不同的故事。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出版与言论自由的现代概念构思出来之前，几千年来人们对表达权力的思考方式截然不同，而这些假设中的许多至今仍部分影响着我们的观点。言论自由的理想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演变。古代的观念将其视为传达上帝的声音，或是勇敢地向统治者进谏。文艺复兴时期存在一种学术版本，它支撑了“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学术交流；此外还有一种以良知自由为核心的新教版本。但最具影响力的理想是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是最后一种被完全理论化的言论自由，尽管各地都公认它是最显要的，但在欧洲各文化中却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这种类型的表达——即广义上的政治言论——仍然是当今世界我们思考言论自由的核心，因此也将是本书关注的核心。

无论差异如何，言论自由的所有现代模式最初都是西方的产物。1700年以前，非欧洲文化已拥有成熟的口头、书面和印刷传播文化；其中一些文化长期以来宽容、甚至鼓励宗教表达自由、坦诚的谏言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开辩论。然而，本书所追踪的特定概念与实践——尤其是将言论与出版自由视为政治权利的观念——是在欧洲发明的，并从那里向外输出。因此，这些概念如何在全球不同的环境下被强加和解读，本质上也是一个关于帝国实践及其当代遗产的故事。对于那些一边宣称拥有言论自由，一边又奴役其他肤色的族群、剥夺他们平等发声的机会、或声称要“开化”他们的欧洲定居者而言，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当时的世人又是如何理解这一矛盾的？对于土著居民、奴隶和反殖民活动家来说，言论自由又象征着什么？这段历史产生了哪些持续至今的后殖民效应？这些普遍性问题贯穿全书，并将在倒数第二和第三章

中得到详尽审视，这两章追踪了印度言论自由从殖民初期到当代后殖民状态的历史。由于我选择聚焦于那些最早且最有力地采纳言论与出版自由思想的地区，我的分析范围略去了远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后来的发展：我希望研究这些地区的历史学家能在必要时对我的假设进行扩展和修正。

在探讨这些议题时，我主要的智识启发源于近几十年来研究当代言论自由与审查问题的哲学家、法律家、文学评论家、女性主义学者及其他思想家的杰作 [注 5]，包括凯瑟琳·麦金农 (Catharine A. MacKinnon)、弗雷德里克·肖尔 (Frederick Schauer)、杰里米·沃尔德伦 (Jeremy Waldron)、罗纳德·德沃金 (Ronald Dworkin)、罗伯特·波斯特 (Robert Post)、斯坦利·费什 (Stanley Fish) 和雷·兰顿 (Rae Langton) 等。这些作者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观点交锋，我与他们亦有分歧；有时他们的著作聚焦于色情出版物等话题，而本书对此仅略有涉及。但我的一部分目标，仅仅是将他们的普遍洞见应用于历史研究。

传统的、常识性的言论自由观认为，表达自由越多越好，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皆是如此——因为与行动相比，言论是无害的，且自由辩论能促进真理。同样，我们倾向于假定：审查制度限制了个人自由；它通常由政府强加；它针对的是不受欢迎的思想；简而言之，它是一种非自然的、令人厌恶的行径。相比之下，我提到的多数现代理论家则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事实上，过去许多睿智的观察家也是如此。例如，他们将言论视为一种“行动”方式，而非将两者严格区分（正如伏尔泰曾向朋友解释的那样：“我写作是为了行动”）[注 6]。他们还往往敏锐地察觉到，权威与支配地位有着多种表现形式，而非仅仅由国家行使。他们探讨了社会中的权势者如何压制无权者的声音，以及关于表达自由的规范与法律如何同样体现了这一点。“言论自由”规则的制定与解读，是一个永远处于变动中且被政治化的过程：自由从未被平等分配。审查也并非仅由政府执行：关于表达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无处不在。当我们反对这些限制时，我们将其贴上“审查”的标签，但事实上它们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限制不仅根植于普通的社会规范和权力差异中，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传播行为本身始终依赖于规则和限制，唯其如此才能被理解——即使你只是在洗澡时自言自语，你也遵循着其中的某些规则。自由需要约束。

这些便是我所汲取的智识进路。我希望我的分析能转而说服广大读者，以及法律家、哲学家和其他研究现代言论自由的学生，让他们相信：言论自由史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应对当下的难题。因为，读者，我的终极目的不是告诉你关于言论自由该“想什么” (what to think)，而是教你“如何思考” (how to think) ——将其视为一个既是全球性又是地方性的议题。

我想解释我们是如何陷入当前困境的，以此表明历史让我们的当代假设变得复杂，并暗示历史也为未来提出了新的问题与可能性。

言论的力量

在历史的大部分进程中，我们今日所理解的“言论自由”并非一个可理解的概念，更遑论作为一种理想。诚如后文所将探讨的，人们有时确实渴望在常规束缚之外“畅所欲言”——例如在预警即将来临的险境时——但这是一种例外模式，且遵循着由来已久的修辞准则。绝大多数前现代社会所强调的是心直口快带来的危险，而非益处。

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深知言语蕴含着力量。在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中，言语都被用于通过咒语、诅咒、誓言、誓约、祷告、祝福和禁咒来召唤超自然力量。同样，在每一种文化中，恶毒的语言都可能煽动政治不和社会动荡，导致家庭破裂并毁损声誉。当然即使在文盲占据多数的社会，谈话也一直被理解为一种特定形式的“行动”。古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的道德准则将“善思、善言、善行”彼此区分，认为它们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样，16世纪的欧洲人也深知——正如莎士比亚所言——“言语不过是过眼烟云”[注1]：它们是狡黠且不可靠的。然而，每个人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核心事实是：言论可能具有极其强大的效力，必须谨慎使用。

所有古代文明都曾传授这一教义。一条亚述箴言警告道：“言语如鸟，[注2]一旦释放，无人能将其捕捉。”最早的印度法典也告诫说：“万物皆奠基于言论；[注3]窃取言论者，即犯下窃取万物之罪。”在基督诞生两千年前，一位埃及统治者得到的教导是：“要成为言语的匠人，[注4]因为舌头是人的利剑，而言语比任何战斗都更有威力。”

这些原则后来被犹太人和基督徒继承，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在他们自己的近东及欧洲文化中延续下来。中世纪基督教的核心是“圣餐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仪式，通过诵读神奇的词句，将葡萄酒和面包变为基督的真体与真血。《圣经》中亦充满了对言论力量的警告。《箴言》云：“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注5]使徒雅各也警告道：“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注6]“惟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其他经文段落[注7]将其比作鞭子、杖、剃刀、利剑、长弓、利箭、深坑或烈火——言语是危险且致命的武器。

因此，对言论的公共监管与惩治是每一个前现代基督教社会的核心特征。言语行为可能被视为针对他人、针对整个社群、针对政府、甚至是针对上帝本身的犯罪[注8]。到中世纪时期，这已成为社会共识。1275年的一项英国法律规定，“讲述或发布任何虚假新闻或故事”[注9]以致可能在国王

与其臣民之间造成不和者，构成犯罪，须处以监禁甚至更严厉的惩罚。1378年，所谓的《格洛斯特法令》（*Statute of Gloucester*）同样禁止对王国的任何贵族或显赫官员发表诽谤、“虚假新闻”[注 10]或“可怕的虚假谎言”。普通男女也频繁地利用法律手段防御他人的恶言攻击。在整个中世纪后期，各类法庭受理的诽谤、咒骂[注 11]以及散布假消息的诉讼极为普遍；言语伤害所受到的惩处与肢体暴力一样严格，有时甚至更甚。在中世纪的冰岛[注 12]，诗歌被视为一种极具效力的语言形式，当地专门的法律不仅限制嘲讽性的诗句，甚至也限制不速之客的奉承——如果一名男性未经允许向一名女性撰写情诗，该女性可以据此要求对他施以惩罚。而在每一个社群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亵渎上帝的恶言：异端（heresy）与亵渎（blasphemy）[注 13]是对神权最大的两种伤害，它们在本质上皆属于言论犯罪。

对表达的管控在 16 和 17 世纪进一步收紧。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期间，基督教分裂为诸多对立的教派，这导致人们产生了一种执迷于发现并镇压“异端邪说”的新心态。其结果是，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各类新教徒，都致力于持续监控并纠正其信众的思想与言辞。如果你像威尔特郡的亚历山大·钱皮恩（Alexander Champion）[注 14]在 1612 年的某天那样，在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并臆测天堂和地狱就像眼前的桌子和长凳一样——瞧，你可以直接从一头跨到另一头！——那么仅这一句口误就足以让你因亵渎罪被送上当地的教会法庭。而且众所周知，如果你坚持严重的异端观点，你将被处决：这正是 16 世纪至 17 世纪初数以千计的欧洲男女被处以火刑[注 15]的原因。

世俗政府也日益加强了对民众观点的干预。随着这一时期的君主不断扩张其在战争、税收和宗教事务中的权力，他们也寻求对臣民舆论施加更严密的控制，甚至发明了“煽动罪”[注 16]（*sedition*，其本质是“不忠诚言论”）这一名目模糊却极其实用的新罪名，以便利这种管控。由于言辞上的不满极易传染他人，因此必须将其根除。在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1516）中，在集会之外讨论公共事务被定为死罪。此后不久，在亨利八世推行政治与宗教变革的高潮期，仅仅六年间就有超过一百名[注 17]英国男女因发表所谓的叛国或“煽动性”言论而被处决。（莫尔本人也因类似原因——拒绝宣誓效忠新誓约——于 1535 年走上了断头台。）

那是一段异常残暴的时期。但这种底层原则为 16 和 17 世纪所有的欧洲政府所共有：惩治不忠诚言论乃当务之急。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能了解那一时期大众的政治见解，主要正是因为成千上万的男女因表达这些见解而陷入麻烦。如果你不够明智，在公开场合对君主的人格或政策指指点点，你极可能遭到逮捕、示众、投狱、处以足以倾家荡产的巨额罚金，甚至面临更惨的

下场——1585 年的一项苏格兰法律规定，通过口头或书面对君主及其法律进行“指责或诽谤”[注 18] 构成死罪。1579 年，当清教徒（即激进新教徒）律师约翰·斯塔布斯（John Stubbs）胆敢撰写小册子[注 19] 批评伊丽莎白女王与一位法国王子的联姻谈判时，他和他的印刷商及出版商均被判处在威斯敏斯特的公共市场被剁掉右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禁止“抗命性批评”[注 20] 的法律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涵盖君主和政府整体，还覆盖了任何“地方官或其他公职人员”。

除了宗教异端和政治批评，许多其他形式的表达也充满危险。自古以来，咒语和诅咒便令人畏惧；发表此类恶言也是 17 世纪诸多女巫审判的核心内容。在苏格兰，1551 年、1561 年、1567 年、1609 年、1645 年和 1649 年的法令均规定，诅咒与咒骂[注 21] 可处以罚款、公开羞辱甚至死刑。类似的立法在整个 17 世纪也出现在英格兰及其海外殖民地（包括爱尔兰——那里的诅咒习俗根深蒂固，在天主教神职人员中尤甚，以至于直到 20 世纪仍是日常生活的核心特征）。普通社群也会定期惩戒那些因言语放荡、口无遮拦而被标榜为“泼妇”或“诉讼滋事者”[注 22] 的男女：到 1600 年，英格兰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理应都安装了为此目的设计的“浸水椅”（cucking-stool）。在苏格兰，他们则使用“锁口铁笼”（branks）[注 23]——一种锁在违规者头上的铁笼和口嚼。恶言绝不被允许破坏社区的和谐。

个人之间同样不能容忍恶言。从 16 世纪后期起，人际间的诽谤与诋毁诉讼比中世纪更加普遍，充斥着各大法庭。所有人都认同，侮辱性或抗命性的言论会严重损害一个人在社群中的地位，且属于破坏治安的行为。1640 年 1 月，当索尔兹伯里的一名裁缝因一份逾期已久的账单与客户发生争执，并厚颜无耻地断言“他本人和对方一样高贵”[注 24] 时，他很快便因此对簿公堂，被判支付赔偿金。不仅君主和统治者的荣誉与声望需要通过公共监管来抵御侮辱性言辞，所有“体面公民”[注 25] 亦是如此——每年，数以千计的男女诉诸法律正是为了维护这一点。

当然在实践中，前现代对言论的规制与对其他行为的规制一样，始终是零散不全的。前现代的社群和政府并不具备无限的监视或执行权力。他们的世界里充斥着喧嚣、放荡、抗命、异端及其他危险的谈论，其中许多未受惩罚或未被察觉。法律的确切界限是流动的、多变的且经常引发争议。其触达范围不可避免地某些群体限制更多：比起贵族，商店女工和仆役的言辞显然受到更多约束且更容易受罚。尽管如此，那仍然是一个大众对言语、行动与自由的想法迥异于现代的世界。与其说他们珍视表达自由，不如说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如何限制它[注 26]。

在这一观念背后，是人类由来已久对言语威力和放纵言论之危险的认知。如《旧约》所云：“鞭打在肉体上留下痕迹，而舌头的打击则能折断骨头。”[注 27] 直到 18 世纪，[脚注 1] 毁谤他人或他物可能比任何肢体行为造成的危害更大，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识。正如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忧郁的解剖》（1621）中所言：“一句刻薄的嘲讽、一段诽谤或诋毁，其刺痛程度远超任何损失、危险、肉体痛苦或任何形式的伤害。”[注 28] 诗人兼牧师约翰·多恩（John Donne）也对此深表赞同：“轻蔑造成的割伤往往比利剑更深。”[注 29]

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面对面交往的文化中，个人声誉即是一切，因此言语暴力与肢体暴力通常被混为一谈或并提。一份 17 世纪早期的法律论著解释道，除了财产安全，法律的双重目标是保护个人免受身体伤害，并使“他们的美名免受羞辱与声名狼藉之苦”[注 30]——诽谤等同于人身攻击。对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而言，不准许任何人通过“行为、言语、表情或手势”来“宣布对他人的仇恨或蔑视”[注 31]，同样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基于此类理由，一些早期的法典允许一个人直接杀死另一人，不仅是为了回应肢体侵犯，也是为了回应严重的侮辱。例如，在中世纪的冰岛，“如果一个男人称另一个男人像女人，或说他曾被鸡奸或性侵……[被辱者]有权杀人。”[注 32]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言语侵略与肉体侵略之间的这种关联在私人决斗（duel）的惯例中得到了体现。[注 33] 这种口头、书面及印刷文字的仪式化交锋，是其“个人荣誉如何受损与捍卫”之观念的核心；其基本论点——即一个人的名誉与其生命同样宝贵——也是核心；同样核心的还有修辞博弈与肢体博弈之间的紧密交织。

人们同样认为，个人之间失序的言论会瓦解社群：这不仅是一个私人问题，更是一个公共问题。许多法律都体现了这一点。1551 年一项常被援引的英国法令规定，在教堂或墓地争吵属于刑事犯罪。[注 34] 诽谤案件[注 35] 有时由公诉人代表社群提起，而非由受害者本人提起。在 17 世纪 50 年代，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的清教政府甚至严厉到禁止不仅包括公开的侮辱和谩骂，还包括所有“挑衅性的言语或手势”：任何引起冒犯的语言[注 36] 都可能被起诉。正如记录所显示的，[注 37] 执行此类法律的官员认为，邻里间的不和与针对国家本身的煽动性言论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远在大洋彼岸的欧洲殖民地也基于同样的逻辑运作。例如，1682 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开国法律不仅禁止“冒犯上帝的行为，如宣誓、咒骂、谎言、亵渎谈论[以及]淫词秽语”[注 38]，还规定“所有诽谤和恶意的举

报者、背后诽谤者、诋毁者和虚假新闻的传播者，无论针对的是地方官还是私人，都应作为……本省和平与和谐的敌人受到严惩”，任何“因他人宗教信仰和实践不同而对其进行辱骂或嘲讽”的人亦然。[注 39]

16 和 17 世纪的许多大众道德家曾详细阐述过支撑这一世界观的原则。他们强调的首要基本事实是：言语是一种**生理行为**——而且在人体所有部位中，舌头是最难控制的。清教徒爱德华·雷纳（Edward Reyner）解释道，舌头比“手或身体任何其他器官更容易出现错误、过失和衰败”[注 40]，因此需要时刻监视与约束。正如其他许多评论者一样，他指出上帝创造唇齿作为物理屏障，是“为了将舌头关在里面，将其封闭在口中，宛如置身修道院（cloister）一般……以教导其谦逊，使其处于约束之下，并使其慎于言”——然而这仍不足够。它常如“脱缰的野马”、“装满污秽之鸟的笼子”或“恶魔的战车”一般，挣脱束缚并造成浩劫。

因此，控制舌头是一场艰巨且终生的斗争。理想情况下，一个人的言谈应始终保持谦虚、虔诚、真实且节制——学会何时保持沉默是所有行为准则的核心。但在现实中，恶魔的诱惑与人类天性的固有堕落，意味着舌头长久地处于失控状态。结果，恶言无处不在：“宣誓、亵渎、咒骂、谩骂、背后诽谤、诋毁、斥责、争吵、争辩、嘲弄、讥讽、谄媚、谎言、伪善、虚妄与闲谈，凡此种种，充斥于各处。”[注 41]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前现代人认为恶言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它不仅伤害个人，还毒害整个社群。恶言[注 42]就像一种感染：它同时玷污了言说者与听者。言语还能诱发超自然力量：咒语唤出恶魔，誓言召唤上帝，而亵渎则直接攻击上帝。历史记载中充斥着因“犯罪的舌头”而遭受神罚、死状惨烈男女老少——那邪恶的器官在他们口中膨胀致其窒息，或被咬断，或被蠕虫啃噬殆尽；抑或他们全身染上麻风，被大地吞噬，被烈火焚烧，或被熊活活吃掉。

这种对恶言**生理属性**的关注，解释了为何对其惩罚往往集中在那些放任言语逃逸到世界上的“缺陷肢体”上。正如斯塔布斯及其同伙因书写和出版不忠言论而被断手，未能听从真理反而恶语中伤的行为，也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剪掉双耳、将其钉在颈手枷上，或者“在脸上灼烧字迹，或以痛苦的方式塞住双颌使其无法言语……或烧穿其舌头，甚或割掉舌头”[注 43]，正如一位英国法官在 1577 年所提倡的那样。

在今天，我们往往不再相信人性本堕落，也不相信咒语能召唤恶魔。肉体残疾在我们看来是残酷且令人厌恶的刑罚。然而，很难否认前现代关于“言语效力”的一个更基本的事实：**言语即行动**[注 44]；言语确实会产生后果。它们所能造成的伤害至少与肢体打击不相上下。任何抚养过青少年、

经历过痛苦分手或曾是语言暴力受害者的人都深知这一点——言语会留下深长且持久的伤痕。这不仅关乎对个人的伤害，也关乎我们整个社会。过去所有的文化以及当代的大多数文化都承认一个事实：有害言论与谎言的重复会毒害公共舆论——它会固化性别与种族歧视，助长宗教迫害，播撒社会与政治分裂的种子，削弱合法政治与科学权威的公信力，或者为暴力铺平道路。换句话说，现代人对“言语”与“行动”的区分，以及对它们所谓不同效力的判定，仅仅是一种“权宜性的神话”（convenient myth）。正如我们在本书进程中所将看到的，这种区分使言论自由的意识形态成为可能，但它本质上也是一个不稳定的虚构（unstable fiction）。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言论自由的历史，最好从一开始就认清这一存疑的事实。

等级与权威

我们当前言论自由观念的另一个基石是：每个人的声音都值得被平等倾听。但在过去的政治与社会世界中，人们倾向于持有截然相反的假设。每个人都认为人类社会天然具有等级性，且上位者的言论比下位者的言论拥有更大的权威。早期的印度法律与伦理准则在向所有人灌输言语纪律和礼仪之重要性的同时，也严厉地区分了不同种姓的言论权利。处于最高等级的婆罗门（Brahmin），其言论效力远超低等种姓；而后者则“绝不应对[婆罗门]说任何令人不悦的话，或对其使用粗暴的词语”[注 45]。一名低种姓男子若对高种姓者出言不逊，将被处以“一根十指长的红热铁钉……钉入其口中”；若发表“极度辱骂性的言辞……则应割掉其舌头”；如果他胆敢与高种姓者争论法律或伦理问题，“国王应向其口中和耳中灌入热油”。

在已知最早的关于言辞的英国法律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思维方式。公元 695 年，当肯特的撒克逊国王威特雷德（Wihtræd of Kent）制定其法典时[注 46]，他宣布自己的话语是“不容置疑的”：即无需经过任何宣誓或形式化程序便应被采纳。主教的话语亦是如此。但在他们之下，存在着严密的地位等级：一个人的地位越低，他就越需要大费周章来证明自己。而对于任何女性、儿童或奴隶的声音，法律完全没有做出任何保障。1215 年，英国伟大的权利宪章《大宪章》（Magna Carta）同样规定，在任何涉及刑事死亡的案件中，女性的证词在法律上均不予采纳，除非死者是她自己的丈夫。

类似的原则在 16 和 17 世纪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每一项个人传播行为，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都根据地位进行了精准的校准。在与他人交谈时，你总会考虑对方的相对等级，并据此调整你的措辞。约克郡绅士威廉·温特沃斯（William Wentworth）在 1604 年告诫其子托马斯（Thomas）：“若下等

之人写信给你，[注 47] 且‘若有必要回信’，那么‘要么通过口头传达，要么命你的仆人代写回信’”——亲自回信给下属被视为自贬身价。与此类似，威廉·珀金斯（William Perkins）在其畅销的伊丽莎白时代谈话指南中提醒读者：“我们的长辈和尊者……必须[始终]获准并拥有先行发言的自由”[注 48]；“年轻男女只有在被询问时方可发言”；而“仆人和儿童”绝不应顶撞。这些都是相当普遍的原则。在 16 和 17 世纪的墨西哥，阿兹特克（Aztec）青少年接受的关于“良言”的教导在本质上也是如出一辙的[注 49]。

在这些交错纵横的地位等级中，性别的等级最为古老且最为显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的言论比女性更具权威，也更被允许。在近东和欧洲男性数世纪以来制定的所有宗教、社会和法律准则中，女性应当缄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同样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是：女性作为弱者，更容易发表危险且放纵、不受约束的言论。《圣经》本身就规定，妇女在“教堂中要闭口不言：因为不准她们说话”[注 50]，亦不准她们“讲道，也不准她们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在这一世界观中，言辞节制是女性美德的标志[注 51]；女性的滔滔不绝或言论“自由”意味着不端，且许多话题对于女性交谈而言是“不当”的。在欧洲文学几乎最早的文本——荷马的《奥德赛》中，英雄之子便曾严厉告诫其悲恸万分的母亲珀涅罗珀（Penelope），当时她正于男人集会中公开直言：“母亲，回到你的内室去吧，忙你自己的活计，织机和捻锤，并吩咐你的侍女们各司其职；言说将是男人的事务。”[注 52] 珀涅罗珀听从了，正如荷马在下一节所描述的：“她将儿子所言的明智道理铭记于心。”女性的言说总是比男性更不自由；女性的直言不讳更被视为“违背自然”且扰乱秩序。在现代世界从遥远的过去继承而来的诸多性别歧视假设中[注 53]，这无疑是扎根最深且遗毒最久的一种。

当然在实践中，据我们所知，所有这些言论等级制度也一直在受到挑战和颠覆。当女性代表自己写作时，她们完全有能力指出，那些关于她们行为的刻板印象不过是男性的诽谤与幻想——这至少早在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的《妇女城》（1405 年）中就已成为欧洲女性主义论辩的核心主题[注 54]。在文学虚构作品中[注 55]，男女言论规范之间的诸多紧张关系是喜剧表现和思想沉思的丰富素材。在现实生活中，女王、女性贵族和其他权势女性也以跨越性别界限的方式进行公开演说。1648 年内战期间，人脉广泛的马里兰州富裕定居者玛格丽特·布伦特（Margaret Brent），以一位已故总督的遗嘱执行人和另一位总督的法律代表身份，向新殖民地的议会发表讲话，“要求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表决权——以及发言

权” [注 56]；在遭到拒绝后，她“对本届议会的所有议程表示抗议，除非她获准出席并拥有表决权”。

地位较低的女性同样表达了强烈的政治观点 [注 57]。她们还不断在公共场合提高嗓门互相谩骂——或为此类诽谤对簿公堂。女性言论的界限 [注 58] 不断受到女性自身以及男性的测试与重划。无怪乎女性群体珍视交谈，正如博学的巴苏莎·梅金 (Bathusa Makin) 在 1673 年所总结的：“有人指责女性，将其视作一种耻辱，称她们‘舌头太长’：但是……舌头是女性自卫的唯一武器，她们需要熟练地使用它。” [注 59] 简而言之，之所以必须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来监管言论，是因为即使在一个普遍蔑视言论自由的世界里，那些所谓的“下等人”也总是在出言不逊、越位发声 [注 60]。

同样的紧张关系也是前现代政治的基础。在这个世界里，理论上的权威始终自上而下。只有极少数拥有财产的男性参与国家治理，而获准讨论皇室政策的更是仅限于君主身边的几位核心顾问。因此，那些胆敢诽谤统治者的人便是“公共社会的敌人” [注 61]。正如英国政府官员托马斯·史密斯爵士 (Sir Thomas Smith) 在 1583 年那段令人难忘的描述中所言，广大民众“在我们的共和政体中既无发言权也无权威” [注 62]。“这些人不被考虑在内，”他解释道，“他们唯有被统治，而非统治他人。”一个世纪后，当记者亨利·卡尔 (Henry Carr) 因出版未经授权的周报而被定罪时，王室法官坚称，“任何人在未经国王许可的情况下，都不得向公众披露任何涉及公共事务的信息……无论其是否怀有恶意，皆属违法” [注 63]。然而在实践中，众所周知，前现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确实在不断讨论政治事务，而且往往带有批判性。

在前现代世界，谣言的大众传播一次又一次地引发暴乱、起义和社会动乱。对于当时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而言，这印证了关于平民愚昧的古老刻板印象，并加固了那种认为政治应秘密进行的等级制原则：甚至连议会辩论也理应是严格保密的。正如博学的学者兼朝臣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所言，“国家事务……绝非平民百姓适合谈论的主题或课题” [注 64]（即便平民喜欢自认为“如今已无平民，人人皆为政治家”）。霍布斯在内战烽火中撰写的《利维坦》(1651) 中解释道，任何主权者的核心权力 [注 65] 之一，以及避免内战的关键，在于判定“哪些观点和学说是背离和平的，哪些是有助于和平的”，并据此对公共言论和印刷书籍进行规制。

因此，“自由”言论主要被视为一种负面事物，它破坏了社会、政治、宗教及宇宙秩序。女王委员会 (Queen's Council) 于 1587 年下令，应对恶言者处以公开惩戒，“以儆效尤，并约束那种言论自由 (liberty of speech)” [注 66]。几年后，面对难以取缔的、被视作“真理火星”而广

为流传的“恶意小册子”[注 67]，培根忧心忡忡地表示，“它们带有一种言论自由的表象与姿态”。17 世纪初的一位法国大使也认同，“内战的常见前兆”[注 68]便是“漫画、诋毁性的诽谤文”以及“信口开河（free speaking）”。甚至连以允许“适度言论自由”自诩的国王詹姆斯一世，也在 17 世纪 20 年代反复发布公告，反对其臣民中——不仅是平民，而是“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每一个人”——出现的“那种无礼言论的过度放纵”。

与之相对的观念，即蕴含在“民意即天意”（*vox populi, vox Dei*）这一谚语中的思想，有时会被宗教论辩家、控诉文学作者和政治理论家援引。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辩称：“将民众的声音比作上帝的声音并非毫无根据，[注 69] 因为公众舆论在预示未来方面异常精准。”但他同样警告诽谤和公众误判的危险，并承认“普遍观点”将大众视为反复无常且易受误导的群体。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所有前现代政府都投入了巨大精力来限制和管控政治信息与舆论，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口头、书面还是其他。这一时期的印刷机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特许证制度下运行；其产出在出版前理应经过审查。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一切描述为“审查制度”（*censorship*）。但这其实是一种相当“时代错乱”的解读方式。因为在前现代世界，即使人们在信口雌黄时，通常也不假定自己拥有一种表达自由的权利。相反，他们很大程度上接受并赞同言论规制的原则，并热衷于参与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比我们更坚决地相信绝对真理与谬误的存在。然而，他们最终的关切点并非打击虚假，而是维持社会和谐。我们倾向于赞美表达自由能一成不变地促进真理，而他们则认为言论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对他们而言，言论并非一项简单的权利，而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言语或文字是否被允许，始终取决于其确切的境遇：说话者是谁，听众是谁，言辞的基调与意图为何，以及承载媒介是什么。言辞本身永远只是答案的一部分；最终的判定是语境性的。

例如，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撒谎永远是错误的，但许多严谨的宗教和政治理论家也辩称，人们有时有必要进行伪装和欺骗。这种认为应使用言语来掩盖真理的观念，在受迫害的宗教团体中尤为发达，如中世纪的瓦勒度派

（*Waldensians*）、英国的罗拉德派（*Lollards*）、西班牙隐匿犹太身份的归化者（*conversos*），以及宗教改革后转入地下的天主教与新教少数派。但这一观点也经常得到马基雅维利、蒙田（*Montaigne*）、培根和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等顶尖政治评论家的认可，理由是伪装是统治者和朝臣必不可少的工具。正如蒙田在 1580 年观察到的：“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真理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能让别人接受什么。”[注 70]

更广泛而言，前现代社会还存在一项根深蒂固的原则：坦率直言有时是错误的，甚至构成犯罪。珀金斯在《舌体治理指南》中专门设有一章，讨论必须隐瞒真理的多种场合。人们绝不应泄露任何具有伤害性、危险性或属于机密的信息，且必须始终对“邻里的软弱与罪过”保持缄默 [注 71]——

“若任何真理有损上帝之荣耀，或有损邻里之福祉”，则必须予以隐瞒。任何人都不应僭越去谈论“未知之事、与己无关之事、以及超出个人能力范畴之事”。这种世界观优先考量的是**社会织理 (social fabric)**，而非个人权利。言语如同其他行动一样，理应被用于强化仁爱与礼义，而非摧毁它们。守口如瓶与运用语言同样至关重要。1622 年，伊丽莎白·乔斯林

(Elizabeth Jocelin) 将这种传统情操总结为：“宁可保持沉默，也莫要恶语中伤他人，即便其罪有应得。” [注 72] 在法律层面，引发动荡的言论即便属实也同样要受惩罚。对于在教会法庭被告发的人而言，言论属实并非充分的辩护理由 [注 73]；在面对“煽动罪”指控时亦然。相反，真实性通常被视为从重处罚的因素——毕竟，比起虚假的指控，真实的指控往往更容易导致治安失序。

另一方面，前现代世界的人们也敏锐地聚焦于虚假信息的危险。这正是为何他们将对言论与印刷的规制视为一种至关重要的保障，用以抵御伪造、谎言和歪曲陈述——即一位 17 世纪观察家所称的“那种巨大且无节制的撒谎之自由”。 [注 74] 对表达的监管 [注 75] 旨在保护个人免受恶意攻击和诽谤造成的伤害；这不仅是一场维护公民社会凝聚力的伦理斗争，更关乎捍卫真理并反击谎言。

事实上，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英格兰，受到最严厉监管和镇压的文本并非那些阐述理性的宗教或政治论辩的作品，而是那些充斥着下流诽谤和荒诞阴谋论的作品。那些遭到查禁的地下小册子有的将伊丽莎白女王描绘成一个产下诸多私生子的淫妇；有的“揭露”她的宠臣是奸夫或杀人犯；有的“曝光”高级神职人员是隐秘的鸡奸者；或者不断煽动公众对隐秘阴谋和起义的恐慌。此类荒谬的谣言与诽谤 [注 76] 同样主导了口头“煽动性言辞”的世界。这些故事因极其迎合大众心理而广为流传，蔓延之势如燎原之火，极难扑灭。它们不仅毒害人心，更会诱发动员。众所周知，暴动和起义总是由大众造谣煽动并伴随其始终的。

例如，1628 年 7 月初，在查理一世继位仅几年后，关于国王死讯的传闻开始在英格兰与威尔士的边界地带流传。当这一流言传至拉内利镇

(Llanelli) 时，引发了大规模恐慌。镇上的一百多名居民显然陷入了“西班牙军队已在海岸登陆”的幻觉，他们穿过乡间向四处报警，一路上“发出极其惊恐的哭喊”。 [注 77] 随着他们的行进，更多人加入其中，故事也被

进一步添油加醋，称国王是被白金汉公爵谋杀的，而公爵已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当人群涌入斯旺西（Swansea）时，地方当局立即将国王死讯告知该郡的首要显贵，并在集市广场公开宣布了这一消息，现场“全城百姓哀声一片，他们纷纷表示担忧‘教皇党人’（papists）会武装起义，在睡梦中将他们杀害”。到那一周结束时，这则消息已传远至康沃尔（Cornwall），大半个西南海岸似乎都处于防范入侵和叛乱的警备状态。

这仅仅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政治谣言如何产生巨大破坏力的孤例——在那场永无止境的前现代“虚假新闻”冲击中，这不过是其中的一周。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是一名连环杀手、[注 78] 他杀害了竞争对手并先后毒死了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故事，实际上是由英国王室国外敌对势力的秘密宣传网络推波助澜的。这一流言为杀害白金汉公爵所谓的共犯约翰·兰姆博士（Dr John Lamb）铺平了道路，并导致白金汉公爵本人在几周后的 1628 年 8 月惨遭公众暗杀。它还直接影响了 17 世纪 20 年代的议会政治，加剧了公众对查理一世的不信任，并造成了 17 世纪 40 年代内战中的惨烈分裂。简而言之，这是一个造成了巨大后果并不断扩散的诽谤性谎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史学家揭示了大量关于从中世纪到 18 世纪欧洲大众政治意识 [注 79] 的信息。显而易见，在前现代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始终在谈论新闻与政治，他们对此持有强烈的观点，且这一事实对政治运作至关重要。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赞颂这些发现，正如他们为这一时期手稿、印刷新闻及评论的增长鼓掌一样——将其视为大众政治舆论充满活力以及公共领域扩张的标志。我们在这些发展中看到了自身民主文化的起源。

然而，我们往往忽略的一点是：大众政治话语中压倒性的流通物并非理性的辩论，而是充满仇恨的谎言与阴谋论、煽动性的错误信息、疯狂的谣言和彻头彻尾的伪作。政治家们自己也经常相信并助长此类虚假信息，将其作为平息或争取公众舆论尝试的一部分：他们积极炮制伪作，散布谣言，并煽动人们对阴谋与掩盖真相的妄想。普通人转而常常信任这一泛滥的谎言，因为它们看起来煞有介事——这些故事通常在少数既定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润色，掺入一些当下的恐惧，并佐证了既有的偏见。结果，人们以为自己得以窥见政治隐秘的真相，而实际上却吞下了一锅毒害人心的宣传与虚假信息的乱炖。

因此，当我们赞美公共领域的成长、前现代审查制度的失败或公众舆论的兴起时，我们往往是在描述一个深受误导、信息严重失实的公众 [注 80] 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正如近期的研究所表明的，例如，正是由于对立阴谋论的不断加深，导致了 17 世纪 40 年代整个不列颠群岛政治的最终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屠杀，在这场浩劫中数十万人失去了生命——这恰恰是言论规制意识形态一直以来所警告并意图防止的那种灾难性混乱。

从这场言论与印刷规制的大崩溃中，最终产生关于表达自由的新实践与新思想，我们稍后便会看到。政治言论自由理想首先在英语世界发展起来，是因为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英国政治中那些早熟的特质。然而，这在转而变得可能，是因为到1700年时，欧洲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宗教言论自由理论。在宗教改革后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中，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努力使原本敌对的教派能够在不诉诸暴力的前提下共存，这一理论便是这些努力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看到的，这一学说的兴起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社会与智识发展，它动摇了一些古老的言论规制传统原则。

宽容言论

在 1500 年以前，纵观整个基督教欧洲，“宗教多元性”（religious plurality）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概念。尽管大众的宗教实践从未达成大一统，但偏离教会正统的行为均被视为谬误或异端——即决不被允许传播的危险虚假信息。16 世纪中叶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将基督教世界粉碎为愈发众多的混战教派，但这并未立即改变上述基本观念，而仅仅是使其成倍增加——每一个宗教团体都继续假定自己掌握着唯一的真理，并谴责异端思想。这导致了一个多世纪的剧烈流血冲突，这不仅发生在天主教徒与改革者之间，也发生在众多涌现出的不同新教团体之间。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持续宗教冲突的困境也催生了一些新的思想 [注 1]——这些思想主要在新教徒中萌发，认为允许不同的宗教理念在单一社会内被自由表达，或许具有潜在的益处。

多元性与真理

这一发展建立在更为古老的古典传统及犹太-基督教传统之上，即对坦诚直言真理的尊崇。在《旧约》和《新约》中，上帝有时通过先知、殉道者和圣徒发声，而这些人反过来也能与上帝直接沟通，这一点显而易见。对于这些人而言，不顾境遇如何而大胆直言，是美德与神圣启示的象征。自教会建立之初，无论地位高低的基督徒，只要动念向权势者传递可能不受欢迎的信息 [注 2]，便会援引这一模式。在 16 世纪的苏格兰，一些地方会众甚至规定，为了防止针对教区长老的隐秘“诽谤与诋毁” [注 3] 滋生腐化，每年应设立两个特殊场合，届时“人人皆有言论之自由”，以公开批评其领导者。

这种源远流长的关于先知预言、苦谏（jeremiad）与责备的宗教观念，与世俗思想产生了重叠。后者最早于公元前 5 世纪起源于雅典，将言论自由视为独立的标志——即自由公民或德性哲学家在关乎公共利益的事物上表达心声的自由。这种在宗教或公民事务中直言不讳的形式（希腊语称为 *parrhesia* [注 4]；拉丁语称为 *licentia* 或 *libertas*），演变成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广为人知的修辞体裁。然而，这与我们现代的“言论自由”概念截然不同，它主要被应用于“如何更好地向尊长进谏”这一问题。1523 年，正是这种关于坦诚进谏的人文主义理想，激励了时任英国下议院议长的

托马斯·莫尔请求国王给予“仁慈的特许与宽宥”[注5]，使每位议员都能“自由且大胆地表达其建议”，而无需恐惧“您的雷霆震怒”。这便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议会“言论与辩论自由”的起源。直到17世纪末，这种自由一直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临时性的特权，仅授予选定的顾问，以便其进行坦率且秘密的审议，从而向君主提供诚实的建议。有时，这种观念会延伸至关于进谏确切界限的争论或对审查制度的抱怨，特别是当不受欢迎的警告被公开表达或付诸印刷时。但其言论自由的总体构想仍属于等级、义务、顺从和体统的话语体系——与现代普遍的个人权利观念相去甚远。

然而，在宗教改革的余波中，一些狂热的基督徒发展出了关于宗教表达自由的新思想。这始于新教改革者抨击天主教会针对“异端”书籍的法令及其他噤声企图；改革者将这些企图描绘成对“上帝神圣真理”[注6]的压制，因为真理威胁到了教皇党人“昭然若揭的偶像崇拜和显而易见的邪恶行径”。诚然，就其自身而言，大多数新教团体同样热衷于强制一致性以防止谬误传播：例如在1554年，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策动处决了其竞争对手改革者米格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理由是后者出版了异端思想。然而，部分由于对类似事件的反应，少数改革派思想家开始对宗教审查制度进行更激进的批判。“杀死一个人并非保卫教义，而是杀人，”[注7]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Sebastian Castellio）辩称。他本人曾先后逃离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和加尔文治下日内瓦的不宽容环境：他认为说服与辩论才是应对异端的正当手段。德国大众灵性主义者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注8]则更进一步，认为最终唯有上帝能裁决宗教信仰的真伪；人类既然无法假定这种确定性，就应当互不干涉、和平共处。

面对宗教分裂，16世纪的少数政府也尝试推行宽容政策。为了确保和平、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一些政府允许私下的“良知自由”；另一些则允许人数众多的少数派进行公开礼拜。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注9]，四大教派（天主教、路德宗、加尔文宗和一神论派）被赋予平等的自由，其原则是“信仰乃上帝之恩赐”[注10]，不可强加。在宗教多元、族群混居的波兰-立陶宛共和国，1573年的《华沙联盟》（Warsaw Confederation）在法国发生针对新教徒的惨绝人寰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后不久起草。该法案责成各宗派团体和平协作，理由是“我国基督教事务中存在巨大分歧，为防止民众因此产生如我们在他国清晰察觉到的煽动叛乱之举”。[注11]

这些发展更多是出于审慎务实的考量，而非基于原则。[注12]然而，在新建的荷兰共和国——这一在经历了以新教为主的起义、反抗西班牙天主教宗主权后，尝试了各种程度的务实宽容的国家——博学的修辞学家迪尔

克·沃尔克茨祖恩·库恩赫特 (Dirck Volkertszoon Coornhert) 在 1582 年甚至提出, 应对宗教题材的“论文与书籍的撰写、出版、印刷、销售、拥有和阅读”给予完全的自由。[注 13] 他写道: “自由历来主要体现在一个人获准自由表达其心声这一事实上,” 而真理绝非地位或权威的附庸。谎言与谬误理应受到驳斥, 但绝不能诉诸武力, 唯有通过“口头或书面……[并借由]神圣且全能的真理本身”予以回击。相比之下, 镇压与审查或许能“暂时压制谎言与异端”, 但最终“不仅无益, 反而有害”, 因为它们只会让被禁的思想显得更具吸引力和生命力, 并削弱公众对权威的信任。

在卡斯特利奥与库恩赫特的断言中, 隐含着两个关于良知与人性的新颖假设, 这两个假设从 16 世纪后期起在新教神学辩论中逐渐占据上风。两者都助力于为精神层面的表达自由提供更明确的论证。第一, 一个人的内心信念绝不能通过武力改变, 而只能通过说服; 第二, 个人能够 (且确实应当) 寻找属于自己的通往宗教真理之路, 并可能通过不同的路径抵达。在今天, 这些观点似乎无可辩驳。然而在 1700 年以前, 它们直接否定了传统的基督教教义——数世纪以来, 传统教义一直强调人心与良知的软弱、圣经、法律与导师引导的必要性, 以及宗教分歧的危险。

17 世纪中叶, 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实推动力, 将讨论的中心转向了英语世界。1641 年英国内战期间, 英格兰政府的印刷管控系统宣告瓦解, 该系统原本仅允许有限数量的印刷机运作, 并要求所有争议性文本在出版前必须经过核准。在战争的混乱中, 大量新的宗教教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伦敦的印刷机流出了海量的大众宗教讨论。这种新颖的自由 [注 14] 以及屡次试图对其进行遏制的努力, 锻造了表达自由与良知自由之间的新关联。这两者的价值并不对等: 对于倡导者而言, 良知自由的最终目的从未是“多样性”, 而是“真理”。正如清教徒国会议员弗朗西斯·劳斯 (Francis Rous) 所解释的: “我并非为观点的多样性而争论; 我知道真理只有一个。但若无此种自由, 真理便不能如此轻易地彰显。” [注 15] 当时的希望是, 通过“确立真理的自由贸易, 并赋予尝试万事万物的自由”, 谬误将被破除, “误入歧途的兄弟”将重回正途, 基督徒将达成统一。才华横溢的清教徒政治家小亨利·范恩爵士 (Sir Henry Vane the Younger) 也赞同, “真理只有一个, [注 16] 且在公正公开的辩论中繁荣得最为繁茂”: 尽管人类具有堕落的本性, 但“当良善与光芒显现时, 人们不能不看见它, 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其折服”。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 基督的福音仅允许对宗教错误使用“温和的劝诫 [注 17] 与友好的告诫”。由于他们强调“内心之光”作为精神指引的首要性, 并持有关于“发现”宗教真理的千禧年主义信仰, 他们经常辩称, 任何

人都不应因真诚地遵循其良知而受到惩罚，即便良知引导其陷入谬误。范恩极力主张，虔诚的偶像崇拜者 [注 18] 的罪愆比单纯的顺从者更轻，因为他们至少拥有一种真实的探求精神。极具影响力的伦敦商人兼辩论家亨利·罗宾逊 (Henry Robinson) 也持类似观点。每个人都拥有绝对的权利去“教导或出版他们个人认为正确、实则错误的教义”，[注 19] 且在任何宗教争端中，每一方都理应享有平等的“言论、写作、印刷或任何其他方式的自由”。他承认，确立此类自由固然会使社会陷入不同宗教见解交织的巨大“混乱”中，但这总比好过虚伪地强迫人们在表象上顺从他们并不真正相信的事物。此外，他于 1643 年结合自身在海外与天主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共同生活的经历思索道：若非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又怎能说服他人改变信仰并承认错误呢？

罗宾逊与 17 世纪中叶许多其他倡导宗教表达自由的人士交情笃厚，其中包括罗杰·威廉姆斯 (Roger Williams)、威廉·沃尔温 (William Walwyn) 和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大约就在此时，三十出头、博学多才的诗人兼教师弥尔顿经历了一段灾难性且短促的婚姻，对方是他几乎不了解的少女玛丽·鲍威尔 (Mary Powell)。两人共同生活数周后，她便永久回到了父母家中。弥尔顿这位典型的学者，针对这一个人创伤的回应是出版了一系列博学的神学论著，阐述为何在婚姻破裂时应允许丈夫休妻 [注 20] (因为错始终在她)。当这些著作在议会遭到谴责，被视为危险且未经授权宗教投机典型时，弥尔顿的愤怒转而投向了整个出版前印刷管控体制。

由此产生的弥尔顿于 1644 年撰写的批判宗教审查制度的小册子——《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是英语世界中第一部详尽探讨该主题的论著。他运用“直言”(*parrhesia*) 的修辞向议会陈辞，提出出版前特许审查制度本身就是“教皇党人”的发明，旨在让民众处于蒙昧之中。与先前的作者一样，弥尔顿宣称这种限制不仅有害，而且多余，因为在公开辩论中真理总能取胜：“让真理与虚伪交锋吧；谁曾见过真理在自由而公开的相遇中落过下风？” [注 21]

但他更进一步暗示，几乎所有门类的知识——而非仅仅是显见的宗教著作——在精神上都是有益的。他论证了允许谬误甚至不道德思想传播的好处。这是因为真理“可能拥有不止一种形态”，[注 22] 且“信念与知识在锻炼中繁荣……凡是对学习有强烈渴望之处，必然会有大量的争论、大量的写作和众多的见解：因为正直之人的见解不过是正在形成中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对善的认知与对恶的认知是如此纠缠交织”，[注 23] 以至于接触坏书和不道德的观点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唯有通过积极地接触并摒弃邪恶，

一个人才能够锻造出真正的德行与理解。因此，“根据良知自由地去了解、去言说、去辩论的自由”是所有自由中最伟大的。

尽管弥尔顿对这些观点的综合极具启发性且才华横溢，但其基本思想很难说是原创的。那句“没有任何一本书坏到让你无法从中获益”[注 24] 的名言可以追溯到罗马作家普林尼（Pliny），且早已是人文主义者反复操练的陈词滥调。但在弥尔顿这里，援引此话是为了服务于一种深层的精神学说。对于弥尔顿和那些倡导“自由辩论”[注 25] 的清教徒而言，只有“在经文上具有可能性”的观点才值得在“自由且合法的辩论”中发表。这种检验所依赖的与其说是理性，不如说是神圣的启示。正如他心目中的英雄亨利·范恩所言，单纯的“肉体智慧”[注 26] 或“自然理性……无法知晓该追随哪种见解”——“自然理解的一切挣扎”都永远无法测透上帝的旨意。相反，“我们内在的光芒必须成为我们的向导，引导我们进入所有对经文或其他真理的理解中，而这些正是我们理应知晓的”。这并非赋予每个人的能力，且显然与“权利”无关。你必须等待圣灵进入你的内心并开启你的心智。

宗教与世俗言论

这些激动人心的理想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少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影响仅局限于激进的新教徒和教派圈子。尽管从 17 世纪 40 年代到 1660 年君主制与国教复辟期间，英格兰普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良知自由，但弥尔顿关于表达自由的观点在当时仍显极端；据记载，在他有生之年，根本无人对其观点给予哪怕一丝一毫的关注。审查制度依然被广泛接受，且政府定期通过新法律来加强监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出版《论出版自由》后的数年里，弥尔顿本人竟然担任了政府的印刷品审查官（licenser）[注 27]。

这一切在 17 世纪末开始发生变化。1685 年，在强制推行宗教一致性的尝试失败数十年后，公开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继位，并由此成为坚定的新教国教之首，这引发了一场新颖的宪政危机。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新国王及其政治对手都竭力争取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少数派——长老会派

（Presbyterians）、公理会派（Congregationalists）及其他新教教派的支持。1688 年，詹姆斯的新教徒女婿、荷兰人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发动入侵并将其罢黜，这便是后来广传的“光荣革命”。几个月后，英国议会极不情愿地将一定程度的“非国教信仰”（nonconformity）合法化，旨在通过争取这些宗教异见者的支持来巩固新政权。

不久之后，出版前特许审查制度亦被废除。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伦敦出版商公会（Stationers' Company）印刷垄断权的日益不满，但从更广泛的

意义上讲，它反映了在新的宽容环境下，各方对于如何管控宗教教义的公共讨论缺乏共识。1695年，当《许可法》面临延期审查时，国会议员们无法达成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于是该法便干脆随之失效。[注 28] 在此时，关于宗教表达自由的智识论辩虽然日益凸显，但仍极具争议。许多正统基督徒继续将对异端思想的宽容视为对国教的威胁 [注 29]。同样，更大的出版自由也常被谴责为助长了“反宗教”情绪 [注 30]。此外在实践中，宽容带来的直接后果并非更大的和谐，而是日益公开的宗教冲突。

然而，宗教多元地位的官方确立，确实缓慢而坚定地将其原则升格为社会主流的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英国语境下，这些原则变成了对现状的解释，而非对现状的激进挑战。随着弥尔顿晚年的成名及身后名望的建立，其作品《论出版自由》被 17 世纪后期几位宗教与政治自由思想家重新发现并推广 [注 31]，逐渐成为了经典文献。约翰·洛克 (John Locke) 的著作 [注 32] 也获得了类似的权威地位。他在 1689 年阐述了后来在欧洲最具影响力的良知与表达自由辩解书——其影响力并非源于观点的原创性，而是因为他能够流畅地将早期宽容倡导者所发展的各种新教论证逻辑重新整合，从而面向大众普及。

洛克的《论宽容》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及其三部续篇首先重申了一个前提：真理 (对他而言，Truth 同样是一个首字母大写的女性实体) 总能在公开讨论中胜出；相反，出版前审查只会助长谎言的延续。他写道：“她 (真理) 并非由法律教授，亦无需武力来使其进入人心……若真理不能凭借自身的光芒进入人的理解力，那么任何借来的外力只会使其削弱。” [注 33] 另一方面，尽管洛克继续恪守“真理只有一个，通往天堂之路只有一条”的假设，但他同时也采纳了这样一种立场：真理最终是不可知的，唯有上帝可见。这便是宗教自由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信念绝不能被武力改变，且在任何情况下信仰本身都是无害的——法律与政府应当处理的只是外部行为，而非内心思想。因此，洛克主张对所有“思辨性见解” [注 34] 给予完全自由，即便是“虚假而荒谬”的见解亦然，因为“法律的职责不在于规定见解的真实性，而在于保障共和政体的安全与稳定”。事实上，他像 16 世纪的一些宽容论者一样反转了传统智慧，认为“造成基督教世界因宗教问题而产生的动荡和战争的，并非见解的多样性 (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拒绝宽容那些持有不同见解的人 (这本是可以给予的)”——见解的多样性本身是必然、有益且无害的。

宗教宽容的理论与实践在不同的欧洲文化中存在显著差异。在英格兰及其北美殖民地，表达自由的理想从一开始就与宗教层面的自由思想

(freethinking) 紧密结合，正如对许多法国启蒙运动作家而言也是如此。

但在其他地区——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地区——宗教一致性在 1700 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是国家认同的核心 [注 35]；因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言论自由并不必然包含宗教宽容，也不一定源于宗教宽容。此外，即便在精神层面最为宽许的文化中，宗教言论自由也始终受到两个显而易见的限制。

其一，是关于“谁的言论应被允许”的问题。正统观点依然认为，女性在宗教辩论中没有立足之地，更遑论教导男性。然而，基督教历史中也包含着大量女性预言（female prophesy）的事迹。在宗教改革期间及之后，新教的一些激进流派进一步推动了女性的直言不讳。在 17 世纪的英国、荷兰和新英格兰地区，女性在诸如浸信会（Baptists）和贵格会（Quakers）等分离主义教派中表现突出；这些教派的教义强调两性在精神上的平等以及内心良知的终极权威。许多此类会众允许女性参与辩论 [注 36]、投票和预言——有时甚至允许她们讲道。然而，这在当时仍只是边缘性且广受诟病的现象。1763 年，在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听到一名女性在贵格会集会上讲道后，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将这一现象比作狗用后腿走路：“做得并不好；但你会惊讶于它居然能做这件事。” [注 37]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种针对女性讲道及公开辩论精神事务的深层偏见，成为了大西洋两岸早期女权运动 [注 38] 的主要抨击目标之一。

宗教言论自由的另一个强大限制在于“基调与内容” [注 39]。宗教自由的倡导者无一例外地强调，这种自由绝不能延伸至侮辱。威廉·沃尔温（William Walwyn）辩称，“针对人或观点的侮辱性语言” [注 40] 都应受到惩罚，因为“尽管理性与辩论对于探求真理是可行且必要的，但辱骂、谩骂、刻薄的讥讽和指责，往往会导致公民和平（civil peace）的动荡”。他们也不允许发表可能伤害“公共利益”或“公民社会” [注 41] 的言论——这种禁令通常也延伸至天主教或无神论等精神教义，因为这些教义被认为具有危险的政治影响。库恩赫特严格排除了任何“诽谤性” [注 42] 或“煽动性”的内容：他关心的仅仅是“教会的改良”。劳斯、弥尔顿和范恩等清教徒作家的首要目标，同样是促进上帝子民的精神启示。对于他们而言，良知自由显然排除了任何违背“社会之显性利益” [注 43] 或“公共和平”的事物——例如“教皇党人的教义”、“公开的迷信”、在“信仰或习俗上绝对邪恶或不敬”的表达，或任何“有害且诽谤性”的东西。此类毒害性的思想应当被禁止和惩处。洛克持有同样的观点：表达自由绝不能延伸至“违背人类社会或保护公民社会所必需的道德准则的见解”。 [注 44] 对他而言，这意味着从淫乱到天主教再到无神论的一切：甚至倡导宗教不宽容本身也是不容置疑的禁忌（beyond the pale）。简而言之，没有任何一位宗教自由

理论家会允许他们认为可能引发社会混乱的言论；他们所有人都会惩处那些被视为危险的见解 [注 45]。

因此，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其海外殖民地，那些最具自觉宽容意识的宗教社群，最终都一再地审查、禁止并驱逐那些宗教热忱表达得过于离经叛道的人。在 17 世纪 50 年代，英国清教政权自豪地颁布了欧洲最宽容的政策之一，重新接纳了犹太人（他们在 13 世纪曾遭到残酷迫害并被驱逐），并允许所有新教徒按其意愿进行礼拜。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贵格会那些极具攻击性、不合常规的行为深恶痛绝。贵格会是当时发展最快的新教派，其显著特征之一在于他们在言语和传播上持有激进的、受精神启示的态度——他们打断讲道、谴责宣誓、辱骂其他基督徒为愚夫白痴、拒绝使用头衔或脱帽以向社会上位者致敬、对每一个人都直呼“你”（thee/thou）而非更显尊敬的称谓（you），甚至在公共场合赤身裸体，以此作为“精神赤裸”的隐喻。1656 年 10 月的一天，贵格会领袖詹姆斯·内勒（James Nayler）[注 46] 以这种厚颜无耻的方式骑驴进入布里斯托尔，似乎在模仿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他因此立即遭到逮捕，许多愤慨的国会议员力图将其即刻处死。在对此事进行了数周激烈的辩论后，他们才放弃了处决方案——转而决定用烧红的火钳刺穿他的舌头，在他的额头上烙下字母“B”（代表亵渎者 Blasphemer），并对其施以公开示众、游街鞭笞，随后投入监狱从事苦役。他不久后便去世了。在马萨诸塞州，对贵格会式无政府状态 [注 47] 的恐惧同样导致了对其传教者的公开鞭笞、残体、放逐和处决。

根据主流正统观念来限制宗教言论自由的原则，已被证明具有惊人的生命力，即便在那些表面上最致力于宗教宽容的社会中亦是如此。纵观西方世界，针对无神论和亵渎罪 [注 48] 的起诉在整个 18、19 及 20 世纪始终存在。事实上，美国的几部州宪法 [注 49] 至今仍（至少在字面上）禁止无神论者担任公职。迟至 20 世纪 90 年代，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不信教的数学教授 [注 50] 仍不得不花费数年时间诉诸法律，才获准担任公证人；而在新泽西州，直到 2016 年，一名司机才被允许保留其“8THEIST”（无神论者）字样的个性化车牌 [注 51]——此前该车牌被认为“冒犯了高尚品味与体统”。与此同时，在 2023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宗教言论自由 [注 52] 允许公共商业机构歧视某些类型的客户——例如，如果一名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企业主反对同性婚姻。显而易见，宗教言论与行动自由应延伸至何种程度的问题，远未达成定论。

这并非一个新问题。从良知与表达自由的理想首次产生影响的那一刻起，它们就被以各种新奇的方式所采纳、操纵和延伸。在 17 和 18 世纪，甚至关于性放纵 [注 53] 的论点也常常源自宗教宽容的思想——尽管像洛克这样的

作者一再试图紧急阻止这种（在他们看来）对其思想的危险误用。无论宗教宽容理论家如何坚定地试图区分“可被许可的精神讨论”与“不可被许可的社会及政治争议”，神圣主题与世俗主题之间的界限最终都是不稳定的——这一界限更多地取决于界定何为“合法”的权力，而非其他任何因素。事实上，1700年后不久，宗教自由的修辞便被巧妙地“劫持”，用以推进一个激进且重大的新论点：政治言论自由权。

发明言论自由 [注 1]

步入华盛顿特区美国国会大厦那宏伟的大理石大厅，你便置身于世界上最伟大的权力中心。每一天，这座建筑里的立法者们所做出的决定，都影响着美国境内乃至全球数以百万计、有时甚至是数十亿人的生活。其建筑风格旨在传达这项任务的尊严，并向美国的立法者们强调：他们是一个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大厦内随处可见的雕像、铭文以及其他印记，无不在提醒人们，这个先驱国家拥有引以为傲的民主传统——它诞生于两百五十年前的一场自由革命。

在大厦的参议院部分，墙壁纪念着共和国早期的重要事件；而在众议院一翼，装饰风格则推崇立法史上的里程碑。在其中央走廊的顶点，描绘着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一幅标题为“1789 年第一届联邦国会”的壁画旁，绘有牧师与印刷工的侧写，用以象征《第一修正案》。在这些图像下方，是一段解释性的语录：“若无思想之自由，则无智慧可言；若无言论之自由，则无公共自由可言。”

这是一段振奋人心且极为贴切的陈述——这些辞句源自《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观念的最核心源头。它们出自谁的手笔？铭文解释道：“本杰明·富兰克林，1722 年。”在任何互联网搜索引擎中输入这段引文，一页又一页的搜索结果都会由衷地表示赞同：16 岁的富兰克林在他 1722 年 7 月发表的一篇报纸专栏中创造了这个句子。那是何等的一位早熟天才！这是人们最喜爱的“国父语录”之一，你甚至可以在网上买到它的浮雕版。

但事实上，少年时期的富兰克林并没有想出这些话，他实际上是在引用他人的言论。稍加深入挖掘，即使是互联网也会很快揭示这一点。学者们始终知道这篇文字的作者是谁，富兰克林的当代人也同样知晓。然而，关于这段文字如何以及为何被创作出来的真实故事，此前从未被完整讲述过。它不仅揭示了政治言论自由最初是如何被构想为一种真理机制、一种谎言的解药以及一切自由的基石，而且还揭示了一个讽刺的事实：这一强大而新颖的理论本身，竟然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mendacious fiction）。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一个我们至今仍承受其后果的悖论。

《加图来信》

在1720年至1723年间，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和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这两位雄心勃勃的伦敦记者，发表了一系列匿名报纸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以“加图来信”之名著称于世。[注2] 该报的编辑为他们冠以这一名号，旨在将其理想与著名的清廉罗马元老院议员——小加图（Cato the Younger）联系起来，后者曾领导反对尤利乌斯·恺撒暴政的抗争。

特伦查德和戈登的专栏一经推出便引起轰动。这部包含约140篇文章、被不断引用和重印的作品集，成为了18世纪英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其整体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派生性。它主要推销了一些关于个人自由、宗教自由、政府界限及知识本质的易于理解的教条（nostrums），这些内容汲取自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查尔斯·达文纳特（Charles Davenant）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近代重磅作家的论述，以及马基雅维利等更早期的共和主义思想英雄。然而，其核心却是一套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新颖论点。在“加图”之前，从未有人提出过一种本质上属于世俗理想的言论自由，并将其视为一项大众政治权利，更遑论将其尊为一切自由的基石。以下是他在1721年2月4日发表于《伦敦周报》

（*London Journal*）上关于该主题的首篇专栏那振奋人心的开篇（加图总共撰写了四篇专论该概念的文章，并在多处间接提及）：

若无思想之自由，则无智慧可言；若无言论之自由，则无公共自由可言。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只要它不损害或支配他人的权利：这是它应当承受的唯一制约，也是它应当知晓的唯一界限。

这一神圣特权对自由政府而言至关重要，以至于财产的安全与言论的自由总是相伴而行；在那些一个人无法掌握自己舌头的悲惨国家，他也几乎无法掌握属于自己的任何其他东西。凡欲推翻国家自由者，必先从压制言论之自由开始；这种自由对公共叛国者而言是极为可怕的。

人们通常很难如此精确地标定一场重大智识变革的日期。但在本案例中，历史已充分证明：将政治言论自由视为一项个人权利的观点，最早是在英语世界中被广泛讨论的[注3]，而《加图来信》既是其最早的范式，也是最著名的典范。在该领域的顶尖美国历史学家看来，这一“大胆且成熟的言论自由理论”[注4] 犹如“正统苍穹中闪烁的一颗流星”，突然“迸发在舞台之上”。由于其独创性、广度及流行程度，在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英美观念形成过程中，“没有任何一部18世纪的著作比其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尽管后世有无数作家探讨过这一话题，但无论持赞成还是反对意见，他们无一

不追随在加图的辙迹之后。在 1859 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出版之前，它或许是关于该主题最重要的英文文献。

[注 5]

但两名名不见经传的记者，究竟是如何突然发明出一种全新的政治与公共辩论思维方式的？基于种种原因，这依然是一个尚未被发掘的谜题。尽管《加图来信》的文本已被深入研究，但此前对其作者的情况知之甚少；学者们对其作品的分析 [注 6] 总是聚焦于其与 18 世纪政治趋势的整体关系，而非其关于言论的具体主张。与此同时，出版史学家往往只是记录了特伦查德和戈登关于表达自由的新论点，却未曾对其奇特性进行深究。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令人困惑的不仅在于加图的言论理论如此具有开创性，且作者的动机如此晦暗不明，更在于它恰恰忽略了当时几乎所有评论家都重点强调的问题。它对言论自由的假定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却不符合他们那个时代的常态。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想特伦查德和戈登所诞生的那个前现代世界。那个世界对言论及其规制持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但到 1720 年时，这些古老的假定正受到新的宗教、政治及技术发展的冲击。前一章记录了这些变革中的第一项——宗教自由的兴起。那么，在这一时期，还有哪些变化使得特伦查德和戈登对“政治言论自由”的发明成为了可能？

出版自由

当时存在两项重大变革。其一，是 17 世纪后期的英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平民主义国家政治，它围绕着世界上首批持久存在的政党组织起来：即保守的“托利党”（Tories，主张君权神授和强制性的宗教统一，即所谓的“高教会派”立场）和较为进步的“辉格党”（Whigs，主张限制王权并宽容新教教派）。这一转型极大地提升了英国议会作为公共辩论首要舞台的地位。因此，1688 年革命后，新的英国《权利法案》将议员传统享有的“言论与辩论自由”提升为一项宪法权利。此前，这仅是由君主授予的一种特权，且君主们在惩戒那些言辞令其不悦的议员时从未有过顾虑。然而，即便这种关于“议会辩论权”的新观念 [注 7]，仍是建立在古老的修辞理想之上，即统治者理应在代表机构开会期间获得其选定顾问的诚实谏言——这绝非基于每个公民都有权向公众发声的理念。

事实上，就普通大众而言，这种新的政治结构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随着两大敌对政党不断诉诸民意，选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加之 1690 年代引入了政府债券和上市股票等新型公共财政形式（其走势对

舆论极度敏感），广大民众的评断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然而，另一方面，尤其是考虑到投票权仍局限于极少数拥有财产的男性，政党政治的兴起本身反而加剧了那种古老的猜忌，即认为大众的判断是非理性的且易受煽动——尤其是易受政敌谎言和虚假信息的误导。民众表现得像是一个理性的“公众”，还是一个受误导的“暴民”？[注 8] 这成为了一个永恒且关键的问题。

第二项重大的变化加剧了这一问题，即出版前许可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疏忽”而导致的崩溃。1695 年废除该制度的后果，不仅引发了宗教论战的激增（议会曾试图通过 1698 年颁布的一部新《亵渎法》来遏制其危险倾向），还导致了日报和周报等印刷新闻的大爆发，以及政治党徒对其的热衷利用。此前，这种出版自由[注 9] 和对民意的诉求仅在政治崩解时期（尤其是 17 世纪 40 年代）才曾出现，当时政治言论自由的胚胎式思想偶尔会见诸印刷。而现在，这种现象成为了常态，且规模远超以往。英国的政治话语[注 10] 迅速演变为世界上最不受约束且节奏最快的话语体系。

这一切使得“出版自由”（liberty of the press）成为了一个时髦的新短语。大体而言，18 世纪初的英国人逐渐接受了这些新局势将长期存在的事实。他们沉溺于充满论战色彩的报纸和小册子，并常为英国出版物较之他国更为“自由”而感到自豪。出版自由的拥护者们逐渐将许可制度的终结重新诠释为 1688 年革命的必然结果——即从专制绝对主义向卓越的议会君主制演进的一环。例如，1706 年，激进记者约翰·塔钦（John Tutchin）便利用这种爱国主义论点，为其针对时政政府持之以恒的揭丑攻击（muck-raking）正名。他在其创办的《观察家报》（*Observer*）中向读者解释道，表达自由体现了英国式的“自由”优于法国式的“奴役”（vassalage）：

在这里，我们敢于言说并书写真理，这是我们自由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在那里，他们不敢言说或书写内心所想……无论在身体还是心灵上，我们都不是奴隶。我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们自由地思考，我们的笔端与舌尖都不受束缚，然而我们又处于法律的约束之下；任何一方都不拥有无边界的自由。[注 11]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此类论点不仅往往带有自利色彩，而且正如塔钦曾经的同事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 1720 年观察到的那样，报纸的大爆发制造了一波“虚假新闻”[注 12] 的浪潮——“伪造、诽谤和荒谬之事”伪装成事实。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指出，这使得政治谎言的艺术达到了如此高度，以至于单纯平铺直叙的现实再无胜算：“谣言插翅而飞，真理却在后蹒跚而行……恰如一个人想到了绝妙的辞令回敬对方，可此时话锋早已转开，或者众人已经散去。”[注 13] [注 14] [脚注 1] 18

世纪初，没有任何一位探讨出版自由的评论家能够忽视“因滥用出版自由而在每日的新闻与丑闻传播中所产生的祸害”，[注 15] 以及随之而来的谎言与歪曲。

此外，尽管出版前的预审制度已被废除，但政府仍保留了多种管控出版的手段。托利党与辉格党都经常重申那些严禁“散布虚假新闻，以及印刷、出版反宗教和煽动性报章与诽谤文 (libels)”的法律，[注 16] 正如 1702 年的一份皇家文告所述。在这两个松散的党派（他们与普通大众一样，都将天主教妖魔化）之外，隐现着一股反革命的阴影威胁——“詹姆斯党” (Jacobites)。这些人通过断断续续的阴谋，以及 1715 年和 1745 年的大规模叛乱，秘密致力于让被罢黜的詹姆斯二世及其后裔重登王位。在这种狂热不安的语境下，几乎任何政治批评 [注 17] 都可能被视为“煽动”，即便所言属实；作家和印刷商经常受到骚扰、逮捕、审判和监禁（甚至被处决，如 1693 年和 1719 年詹姆斯党小册子的出版商所遭遇的那样）。直到 1710 年代后期，政府仍间歇性地做出严肃努力，试图重新引入某种形式的预审制度；1737 年，一部新的《戏剧许可法》通过赋予政府审查剧本和关闭剧院的绝对权力，永久地封锁了来自舞台的政治批判。在约翰·洛克的一生中 (1632 - 1704)，他与他人共同捍卫的那个伟大论点——即真理将从自由辩论中浮现——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学术界和宗教宽容领域，且即便在这些领域，该观点仍充满争议。

当时也尚未出现任何实质性的关于政治言论自由的法律或哲学学说。政治理论著作忽视了这一概念，甚至连激进派作家对定义其原则也鲜有兴趣。他们至多像塔钦和笛福那样，在“出版自由” [注 18]（因允许人们讨论公共事务而有益）与出版的“放纵” (licence/licentiousness，因传播有害思想、诋毁或谎言而应受惩处) 之间做模糊的区分。尽管这种区分被无休止地讨论，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主观判断。在 17 世纪 40 年代，所谓“平等派” (Leveller) 运动 [注 19] 领袖的一些著作曾显露出一种基于原则的政治出版自由理论。17 世纪后期一些对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的转述 [注 20] 亦是如此。然而，这些零星言论 [注 21] 都未能构成一套完整的政治言论自由学说，特别是与当时关于宗教表达自由那套被详尽辩论并发展起来的理论相比。

在 1720 年以前，在少数曾涉足政治领域（而非仅仅关注宗教）的言论自由理论家当中，自然神论律师马修·廷德尔 (Matthew Tindal) 走得最远。1698 年，他将表达自由描述为不仅是一项精神权利，更是一项“公民权利”和“自然权利”，[注 22] 是政治与宗教自由的共同保障——尽管这只是他在一篇主要探讨良知自由的文章中随笔提及。当时的绝大多数观察家 [注 23]

都会将此视为误导性的诡辩。在他们看来，国民议会才是“人民权利”的正当守护者，也是“言论自由与权力”唯一合法的论坛。不受约束的出版带来的并非“自由”，而是失控的侮辱、歪曲以及大众“受蒙蔽”且“无知”的批评所导致的混乱。任何私人的“自然权利”都不能凌驾于共同体的权利之上，即：维护和平、秩序与礼义。

1704年，当塔钦（Tutchin）被判定犯有煽动性诽谤罪时，首席大法官约翰·霍尔特爵士（Sir John Holt）驳斥了他那“捍卫人民权利与自由的冠冕堂皇之辞”[注24]。霍尔特指示陪审团，尽管《观察家报》并未指名道姓地诽谤任何特定的部长，但其攻击行为仍不被允许：因为，如果作家和印刷商不能因“使民众对政府产生恶感”而受惩处，那么“没有任何政府能够生存……这历来被视为一种犯罪”。这成为了一条著名且极具争议的法律格言。它建立在霍尔特此前的一系列裁决之上，这些裁决确认：应由法官而非陪审团来判定文字是否构成诽谤；且撰写此类文字一律视为犯罪，即便这些文字从未出版、并非出于恶意、甚至所述属实。

其结果是，“出版自由”依然不过是一个空洞且愤世嫉俗的口号：政客们在野时热爱鼓吹它，一旦掌权则必将其践踏。正如当今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认为18世纪初期见证了出版自由的兴起，这种观点与事实南辕北辙”。[注25]甚至连这种想法在当时都是不可想象的：人们本质上缺乏相应的智识工具，“没有任何语言可以为出版自由正名”。

新闻业的影响

正因如此，特伦查德和戈登关于言论自由的宣言才显得如此非同寻常。他们的主张在各方面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其论述的广度、本质上的世俗化构想，以及对大众评断无条件的推崇。这种胆略是其新闻写作的典型特征，也解释了为何在经济与政治危机中创刊的《加图来信》[注26]能立时引起轰动。它使其首发阵地《伦敦周刊》（*London Journal*）一跃成为英国读者量最大的报纸。甚至在文章连载期间，就有十几种《来信》合集出版；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被不断重印、翻写、引用和翻译。

他们的成功部分源于其时髦的新颖体裁。报纸专栏能立即触达数以千计的读者，随时间推移扩大受众群体，并由其他报刊无限次转载——同时在结集出书后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在所有这些方面，特伦查德和戈登的思想触达了大众受众，并如极少数书籍或小册子那样保持了数十年的时效性。

此外，加图的前提假设也受益于当时英国出版界所享有的更大的现实自由。特伦查德和戈登无需再费力论证反对出版前许可制度，而是采纳了塔钦

(Tutchin)的修辞，将自己树立为1688年革命以来确立的新自由的旗手。他们巧妙地将自己塑造为既有自由的捍卫者，而非派系煽动者——警示人们这些自由正受到权势滔天的统治者的腐败与暴政的威胁，而不仅仅是来自詹姆斯党。正如宗教自由倡导者长期以来的做法一样，他们构建了一个神话般的、自我标榜且爱国主义的言论自由史 [注 27]：在这一叙事中，政治表达自由曾在罗马共和国繁荣一时，如今又在现代世界最自由的国家——英格兰获得新生。

他们还采用了一种清新且具新闻感的写作风格 [注 28]：简练、机智且极具引用价值。为了符合“礼貌”(politeness)这一修辞规范，文中极少明确点名政客：论证大多通过寓言，以及看似中立、永恒或历史性的命题来传递。这一切旨在暗示加图超脱于派系斗争，正从更高的立足点冷峻地审视全局。

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极度成功的策略。甚至在《来信》连载期间，戈登仍坚称它们从未影射当下时事，而仅提供关于“公共德性与腐败的普遍推论”。[注 29] 他半开玩笑地坚称，这些文章绝非针对政府大臣的批评：因为既然它们“仅瞄准有罪之人，那么对于清白的事务管理者而言，断不可能产生任何冒犯”。[注 30] 到18世纪40年代，各种政治色彩的观察家都已认定加图的格言是普遍针对“一切恶政” [注 31]，而非特定党派。

然而，在最初阶段，这些文章实际上是具有高度针对性的时政介入。作为一份公开的派系报纸的主栏目，它们不仅残酷地谴责了托利党、詹姆斯党和高教会原则，还抨击了当时辉格党政府的诸多大臣与政策，尤其是其对1720年灾难性的“南海公司”股市崩盘的处理。尽管特伦查德和戈登自称鄙视“宗派或阴谋” [注 32]，但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所属的激进辉格党分支推销宣传。

其首批读者立即察觉到了这一点。高教会派成员、托利党人和詹姆斯党人抨击《加图来信》是“对叛国或亵渎行为的每周辩护” [注 33]，称其作者“竭力散布错误且不公的原则，毒害民众的道德与忠诚”。政府支持者则担心，加图对“行政当局无止境的诋毁” [注 34] 以及“对虚假新闻的酝酿”，只会助长托利党和詹姆斯党在“软弱无知之辈”中的宣传，这些人“缺乏主见，极易被流行的”简单口号和“政治丑闻”所误导。即便是反对派辉格党政治家罗伯特·莫尔斯沃思(Robert Molesworth)——其政治原则与《加图来信》高度契合，以至于他常被推测为作者——也私下承认，信中包含了“时而愚蠢、时而虚假的断言与结论，且频繁夹杂着极其刻薄的个人攻击与映射”。 [注 35]

这些时政影射如今已不再显而易见，因为为了逃避诽谤罪的起诉，它们被巧妙地包裹在寓言、暗示和反讽之中。一位批评家注意到，即便加图“正以最令人厌恶的底色描绘国王与内阁时”[注 36]，“他依然会用其惯常的反讽语气说道：我们国王最温和的统治，以及廉洁内阁的德政。”尤其是戈登，他极喜爱“擦边球”式的冒险，在进行“历史”分析的同时，一边眨眼示意其真实意图，一边又对其予以否认。1721 年，他厚颜无耻地将一本关于政治腐败的畅销小册子献给当时的政府首脑桑德兰公爵（Duke of Sunderland），称颂其“清廉的心灵与洁净的双手”[注 37]：读者自然明白应作截然相反的推论。桑德兰的继任者、以中饱私囊著称的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注 38] 在加图声名鼎顶峰之时，戈登甚至匿名发表了一篇关于“诋毁行政当局”艺术的精彩文章。

[注 39] 他解释道，除了大量使用“极具深意的斜体字”外，人们还可以采用“寓言模式”（利用“歧义或双关”）；“历史模式”；“反讽模式”（在“过去一两年内”非常普遍）；“虚构模式”（对捏造的危​​险散布恐慌，例如“镇压出版自由”）；以及“异域模式”、“范畴模式”、“假设模式”或厚颜无耻的“谎言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在陈述了腐败的黑暗及其应受的惩罚后”，立即匆忙地申明“我们现任的大臣绝无上述任何罪行”。

显要政客们被这种无礼的批评彻底激怒了。“从未有过这样一位作家，”一位观察家感叹道，“竟如此侮辱政府，并以如此轻蔑的态度对待其上​​级……他用最难听的词汇辱骂内阁，将其描绘成除了腐化、耗尽并奴役这个国家外，别无他求的存在。”[注 40] 尽管加图的语言充满了各种规避手段，但其本质确实往往具有煽动性。[注 41] 《来信》赞颂刺杀尤利乌斯·恺撒是正义之举；谴责神职人员为“卑微的昆虫”；威胁要对桑德兰、沃尔波尔及其他国会议员诉诸大众报复；并将股市投机获利者攻击为理应被消灭的“害虫”。他们敦促道：“吊死他们，把英格兰所有的绞刑架都挂满。”他们渴望看到“一千名股票经纪人被高高挂起”，通过“排出我们体内一些掺假且腐败的血液”来净化这个国家。

在短短几个月内，一个旨在打击“煽动性诽谤”的议会委员会便传唤了《伦敦周刊》的印刷商以及“加图来信的公认作者戈登先生”[注 42]。为了躲避逮捕[注 43]，戈登潜入暗处隐居，但《来信》依然照常刊出。随后，在他的策动下，《周刊》刊发了一篇极具爆炸性的揭露文章[注 44]，直指议会对“南海公司”事件的处理不当。作为回应，政府在一夜之间逮捕了该报的印刷商、出版商、印刷工、零售商及走街串巷的报童，捣毁了其印刷机，没收了一万份报纸，并将编辑本杰明·诺顿·笛福（Benjamin Norton Defoe）投进监狱。不久，诺顿·笛福在压力下屈服，成为了政府的线人。

他的父亲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自己的报纸上愤怒地评论道，“年轻的笛福不过是个幌子和工具”，是那两位一直在叫嚣着要“鲜血、绞刑架和首级示众”的“文坛斗士”的替罪羊。然而，特伦查德和戈登并未退缩 [注 45]，继续笔耕不辍。几天后，一名沮丧的政府线人注意到，这些突击搜查不仅没有打击加图的声望，反而使他更像是一名大无畏的真理述说者，而非散布“恶意且诽谤性丑闻” [注 46] 的有毒煽动者：

近来普通民众普遍在惊叹：“噢！这是一份绝妙的报纸！这份报纸里全都是真理！写这报纸的人对宫廷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因此，无论它谴责什么人或什么事（即便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会得到那群轻浮大众的投票支持；上周六的报纸如今已不仅是本地 [即伯明翰]，也是考文垂、华威等地的通用谈资。在每一间小酒馆里，人们手里都拿着《伦敦周刊》，带着某种喜悦向彼此展示其中包含的那些最为大胆的抨击。

新颖论据

还原其最初的历史语境，可以使我们发现，尽管修辞上极具普世性，但《加图来信》在意图与接受层面都具有极强的派系偏向。特伦查德和戈登关于言论自由的论证亦是如此，其初衷主要是为他们自身的实践正名。正因如此，加图仅从“政府审查”的角度来定义言论自由，对诽谤和虚假信息的危险性则挥手带过；同时，为了创立一个受保护表达的特殊范畴，他极力将“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区分开来。这甚至解释了其写作的时机——加图最后两篇关于“诽谤”（libels）的文章，本质上是在主张任何反政府言论都不应被噤声，这正是对他们在 1722 年遭遇暂时性“封杀”（de-platforming）的直接回应，当时（如后文所述）他们的专栏突然被《伦敦周刊》撤下。他们所构建的出版与言论自由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披着中立、普世外衣的自利愿景。当然，动机不纯未必会导致论证无效——但在本案例中，事实的确如此。特伦查德和戈登的理论存在深刻的缺陷。

更深层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为何”要阐述这一理论，而在于他们“如何”做到的。既然当时人人都认同诽谤与虚假信息极其危险，且报纸正在使情况恶化；既然出版的“自由”与“放纵”之间的界限在理论上如此模糊，那么，他们是如何为这一新颖且激进的论点寻求正当性的——即：言论与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绝不应受到政府的削减？

尽管特伦查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辩论家，但他和戈登本质上是天才的普及者，而非原创性思想家。初看之下，他们的言论自由论证似乎完全是首创，

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简单地采纳了现有的关于“宗教表达自由”的论据，并将其扭转以适应“政治言论”。

特伦查德和戈登对这些宗教论证了如指掌：他们此前的著作主要都是为宽容政策辩护 [注 47]，在《加图来信》中，这依然是一个显著的主题。两人都出身于非国教背景 [注 48]，并推崇备至地引用了弥尔顿、洛克（特伦查德可能与其有私人交情）以及廷德尔（两人与之交好）。在他们的第一份报纸——畅销的《独立辉格党人》（*Independent Whig*, 1720 - 21）中，他们反对神职人员“大胆而危险的谎言” [注 49]，转而拥护“良知自由” [注 50]、“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戈登后来写道，如果能够允许“宗教见解的自由” [注 51]，所有的宗教冲突都将平息：“全世界将呈现出一种多么令人惊喜、辉煌灿烂的变化，仿佛一次新的创世，自由之美与真理之力将俘获每一个理性的旁观者，并击溃他们的死敌。”

到 1720 年，这种关于宗教真理与辩论的思维方式已成为辉格党的常规逻辑。此外，当时关于政治与宗教的讨论本就在多方面紧密交织。自宗教改革以来，宗教自由一直是核心政治议题，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言论也充斥着关于宗教的论争。尽管如此，洛克等人现有的宗教言论自由辩护逻辑，恰恰建立在将其与政治言论严格区分的基础之上。他们辩称，前者是无害且受神启的思辨，必然引导属灵的选民愈发接近真理，且最终唯有上帝能对其定夺；而后者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言论——受自私的世俗动机驱动，并可能在世间产生危险后果。

在《加图来信》中，特伦查德和戈登首开先河，干脆无视了这种对精神表达与世俗表达的审慎区分，以及其背后神圣认知与人类认知的对立。他们声称，在公民社会中，当“所有观点都得到平等包容，所有党派都被平等准许表达心声时，真理终将显现” [注 52]。正如在宗教事务中一样，政治领域的真理也是不可阻挡且不受谬误侵害的：

认为任何真理会因被彻底搜寻或检验而受损，或者认为真理的发现会在任何方面损害正当宗教、平等的政府或社会福祉，这都是毫无理性的：真理相较于谬误拥有如此多的优势，以至于她只需显露真身，便能赢来钦慕与尊重；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她冲破暴政与欺诈的枷锁，穿透迷信与无知的迷雾熠熠生辉。

通过劫持弥尔顿那种关于神圣启示的千禧年式话语，并将其延伸至社会与政府领域，他们创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言论理论。

同样，他们重构了弥尔顿那套关于自私祭司禁锢民众心灵的激进新教阴谋论，将其平移至政治领域，并以“统治者”取代了祭司。他们的论点演变为：纵观历史，统治者无一不在策划对臣民进行洗脑和奴役。相比之下，自

由的人民在其政治判断中始终是公正、团结且无误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对言论的任何限制都是暴政萌芽的迹象；唯有完全的言论自由才能让真理突破重围，让人民获得自由。

尽管特伦查德和戈登顺带提到了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 [注 53]，但他们主要是从集体意义上的“人民”而非个人权利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的——从而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根据他们自己的定义，自由仅意味着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说话或行动的权利。他们的断言是，在政治如在宗教中一样，真理始终是唯一的：只要允许适当的讨论自由，真理就会被揭示。随之而来的结论是，人民除非受到欺骗，否则其判断永远是统一的。虽然他们承认一个人的言论自由绝不应损害他人，承认诽谤是“极度卑劣之事” [注 54]，承认有必要惩处个人诽谤，因为“这类文字伤害特定个人，却无益于公众”，且出版自由不应延伸至“出版的放纵”，更遑论“任由[人们]不受控地诋毁上级或彼此”，但这些关于言论自由界限与危险的零星告诫从未得到深入阐述。相反，他们在不承认矛盾的情况下，主要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论证。

这是一种刻意误导的策略。在现实中，特伦查德和戈登像每一个清醒的观察者一样，完全意识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话语极易腐败。在他们的其他几篇匿名著作中，他们也曾警告要警惕“词语的滥用” [注 55]，并防止危险思想的“毒素”使“大众陷入痴狂”。他们反复告诫说，误导普通民众中那些“无知的多数”、“暴民”、“盲目的怪兽”和“多头怪兽”是轻而易举的事。

然而，加图对言论自由的颂歌却仅以赞美之词谈论“人民”及其无误的智慧——这汲取了关于“民意即神谕”的长久平民主义辩论传统，但赋予了其更锐利的理论锋芒。“对公共措施的歪曲极易被推翻，” [注 56] 文章轻松地宣布，“只需通过如实呈现公共措施即可。”人民对党派私利不感兴趣：“他们没有私利，只有普遍利益……除非统治者理应被恨，否则他们从不仇恨统治者……人民在未受误导或腐蚀时，通常会对事物做出健全的判断。” [注 57] 唯有统治者的“外部诱导” [注 58] 和“欺诈”才会使他们误入歧途。简而言之，特伦查德和戈登对政治分裂与公众误判这一棘手、古老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假装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 [注 59]

与此相反，他们的论战话语主要将言论自由构想为政府压迫的解毒剂。廷德尔曾在 1698 年论证道，暴君总是试图管控出版，并视“谈论政治为犯罪，书写政治更是重罪”。 [注 60] 《加图来信》以此为核心主题，其基础建立在特伦查德和戈登此前反对腐败与独裁的著作，以及他们对统治者始终只是“人民受托人”的愿景之上。 [注 61] “诚实的行政官”欢迎审查，

“唯有邪恶的统治者才畏惧风评”：言论自由仅为腐败者与有罪者所惧，因为其目的正是制约权势者作恶。廷德尔曾认为，若无自由的交流，“任何其他自由都无法得到保障” [注 62]——“只要保障出版自由，极有可能便保障了所有其他自由”。特伦查德和戈登采纳了这一观念并将其无限放大。戈登首篇专论的标题即为《论言论自由：其与公共自由之不可分割》，他在文中将言论自由描述为“自由的伟大堡垒”。[注 63]

加图的底线在于：即便是出版恶意的诽谤，也是“一种产生于更大利益之中的弊害……与其损害出版自由，不如让许多诽谤者漏网”。[注 64] 这是一个刻意挑衅的声明。自古典时代以来，评论家一直将“诽谤”视为一种严重的毒害，它既毒化私人关系也毒化政治话语，因此应受到严惩。弥尔顿曾反复强调这一点，此后的所有讨论亦然。1712 年的《旁观者》

(*Spectator*) 警告道，诽谤一个人无异于对其暗杀：“这种残酷的行为往往会导致真理与人性的彻底毁灭。” [注 65][注 66] 特伦查德和戈登对这一现象的长篇关注（他们为此撰写了三篇完整的文章）反映了其在当时表达自由辩论中的核心地位。然而，他们的基本回应再一次表现为对该问题的断然撇清。由于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总是赋予弱者力量，并假定“人民的判断……极少出错” [注 67]，因此结论必然是：即便是诽谤，最终也是有益的。“唯有有罪之人畏惧或受损于此”，因为它们“极少或从未困扰正直之人，亦不曾助长任何重大的谬误”。即便确实造成了伤害，“一个正直的人偶尔被中伤”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在加图的传播世界中，诽谤者的力量总是弱于其攻击目标，而表达自由永远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

事实上，特伦查德和戈登论证的整体倾向是：言论自由绝不能受到任何限制。那种承认某些思想可能因过于错误或危险而不能任其传播的观点已不复存在。他们顺带承认，有害的文字有时确实可能“煽动大众产生或许毫无根据的不满，破坏并阻碍最佳的措施，并时而引发暴动与叛乱”。[注 68] 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值得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退回到那个命题：言论自由的收益远超其危险。他们呼应弥尔顿，断言邪恶与放纵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与美德与自由不可分割。作为高明的辩论家，他们认为任何限制都等同于对言论自由的毁灭：“难道因为人的双手可能且有时确实会进行偷窃和谋杀，就要把手砍掉吗？或者因为舌头可能会撒谎、诅咒或散布煽动性言论，就要把舌头拔掉吗？”不——如果人们被允许自由地思考和言说：

他们可能会进行错误的、反宗教的或煽动性的推论，且有时确实会这么做；并可能借此偶尔腐蚀或误导无知且鲁莽之人；如果准许他们写下心中所想，其祸害可能传播得更广。但如果他们不被准许通过任何或所有这些方式

相互交流见解或进步，世界将很快充斥着野蛮、迷信、不公、暴政以及最愚昧的无知。

这是“全有或全无”的抉择。言论自由始终导向更大的启蒙；对其限制则始终预示着野蛮。

金钱与操纵

特伦查德和戈登理论的修辞力量，源于其反复断言一些虽存疑却能引发共鸣的“定论”：政客永远需要被监视；人民总是正确的；言论自由必然促进知识；真理必能无误地击败谎言。这是天才的新闻写作。不久之后，这些论调便获得了“绝对智慧”的地位；而在当代，它们已成为主流命题。

然而，在这些似是而非的主张首次被阐述时，曾遭到广泛的抨击，原因在于它们既回避了诽谤和政治虚假信息的严峻问题，又存在诸多内在矛盾。在18世纪20年代初期，马修·廷德尔——这位在出版自由论证上一贯更为审慎的先行者——对特伦查德和戈登那种漫不经心地否定“受误导的大众之危害”的态度尤为愤慨。廷德尔在两份长篇手稿和一系列小册子中[注69]，剖析了“记者加图”的谎言及其“无穷的荒谬”。他敦促道，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如果人民在真理和自由事务上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为何他们在各地都成为了这两者的敌人？”[注70]对于廷德尔而言，历史与现状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事实上，“普通民众在面对每一个意外事件时，往往动用恐惧而非理性；他们相信一切荒谬之事，放大每一种不快的心绪，并能立即采取甚至毁灭自身福祉的措施”。假装他们总能洞察真理简直是疯了。至于自由，直到最近才由开明的统治者采取了一些“反对迫害、祭司权术

(priestcraft)以及一切公民与教会暴政”的步骤；即便如此，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其他地方，“人性中取之不尽的愚蠢基金”普遍仍对公民自由和精神自由持有敌意。

无论如何，正如廷德尔酸楚地指出，加图是如此天真且反复无常（时而歌颂大众判断无误，时而又承认其变幻莫测），以至于“他要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么就是最卑鄙的伪君子”。[注71]虽然加图自诩要“从软弱的眼前驱散浓厚且具欺骗性的迷雾”，但他实质上不过是一个狡黠的阴谋论者，散布着关于人民所谓权利的、不负责任且危险的谎言，奉承民众拥有“伟大的洞察力、敏锐度和正确的判断力”，并不断暗示政府正密谋“彻底奴役我们”。尽管他们无休止地援引“自由”，但《加图来信》的真实效果显然是“欺骗或误导那些不假思索的人”。

因此，极其讽刺的是，廷德尔——这位政治言论自由的首位严肃阐述者，却将建立在其原则之上的《加图来信》斥为“极具犯罪性”[注 72]——称其为“对国家有害的诽谤”，绝不能“长期容许其逍遥法外”。廷德尔本人的观点是，言说、书写和印刷是强大的工具，既能为善也能作恶，这取决于它们如何被利用。正如他早在 1698 年就曾告诫过的那样，自由的出版是“我们一切自由的支柱”[注 73]，但若被滥用，则可能成为“摧毁所有自由的引擎”。事实上他辩称，印刷术的出现主要是服务于压迫而非解放普通民众。他对历史的解读是，“欧洲大多数国家在印刷术发明之前，都相当好地维持了自由”[注 74]：恰恰是统治者掌握了这一强大的新型教化工具，才首次导致其臣民“逐渐被欺骗并掠夺了自由”。

廷德尔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除了寥寥几处提及诽谤法的缺陷外，《加图来信》完全忽略了媒体实际运作中那些令人头疼的现实。加图的言论自由模式从未提及报纸所承受的税收与骚扰、读者间惨烈的竞争、政府对邮政网络的垄断、政治谎言的有毒传播、媒体的党派化问题、从虚构中筛查真理的难度，以及金钱与权力不断侵蚀自由、诚实的公共传播之可能性的种种方式。

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一个多世纪前的 16 世纪 90 年代，弗朗西斯·培根[注 75]在其手稿论著中就已经指出了其中的许多问题，他批评了诽谤的力量，以及雇佣贫困且野心勃勃的文人散布党派谎言的行为。传统上，欧洲统治者主要通过垄断信息传播和压制批评，来试图应对此类问题并控制公众舆论。但在 1695 年之后的英格兰，这变得愈发困难：1722 年的一份备忘录抱怨道，每当大臣们采取镇压行动，“报纸的销量就会翻倍”。[注 76] 尽管新闻广受欢迎，但在商业上却风险巨大：1719 年至 1723 年间在首都创办的 70 多份新报纸中，绝大多数很快便夭折了。因此，政客们迅速开发出一种新战术：秘密收买作家和出版商为其效力。他们不再对抗迅速增长的商业新闻与评论市场，而是利用它。1712 年的《旁观者》指出，政治上的“虚假与丑闻”[注 77]已变得无处不在，因为“各方都对此负有同等责任……每一个卑劣的文人都有大人物撑腰，并以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传播大人物的利益”。简而言之，为谋利而传播虚假信息和政治宣传，是世界上首个“自由”出版界的固有属性，而非偶然现象。[注 78]

到 1720 年，这种勾结体制已经相当成熟。沃尔波尔[注 79]在其数十年的任期内（1721 - 42 年）进一步扩大了这一体系，每年秘密向作家、印刷商和出版商输送数千英镑。事实上，廷德尔众多匿名评论[注 80]中最深层的讽刺在于，他攻击《加图来信》时，其身份正是内阁的受薪宣传员。政治新闻业的腐败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其他批评者推测[注 81]加图本人也

是为了钱而写作，而非出于原则。正如丹尼尔·笛福在1721年夏天敏锐地评论道，当时正流传着政府即将对《伦敦周刊》采取行动的传闻，专栏作家常被指控为：

怀着恶意、叛国之心或煽动性地写作等等。然而，或许那位不幸失足的文人脑子里根本没有煽动、叛国或恶意，起诉书本该只说他是“贪婪、觊觎且贪婪”地写作，因为此人根本没有宏大图谋，仅仅是为了赚一文钱，或许只是为了给自己买口面包。[注 82]

1723年春天，戈登本人在为另一份报纸撰写的匿名专栏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所有“平庸的雇佣文人”[注 83]都是腐败的。无论是“宫廷的雇佣兵”还是“大众的食客”，他们都为钱写作，且能瞬间改变论调。事实上他注意到，许多政府的批评者最近都“达成了妥协或开出了条件；并相应地将他们针对某些人最激烈的讽刺，转变为对同一批人肉麻的赞歌”。[注 84]

然而，《加图来信》忽略了这一切。他们的政治传播理论援引了一个简单的、中立的“思想市场”，在其中真理总能胜出——只要邪恶的统治者不压制言论自由。这是特伦查德和戈登最后的、也是最深层的欺骗。因为事实上，他们不仅对政治写作的腐败内幕了如指掌，而且自身就深陷其中。

私人恩怨与政治博弈

他们的出版商也是如此。1720年秋，当托马斯·戈登向《伦敦周刊》寄去后来成为《加图来信》的首篇匿名专栏时，该报的新老板是一位名叫埃利泽·多布雷（Elizée Dobrée）的年轻资本家，他是来自海峡群岛的一个胡格诺商人家族的年轻成员。[注 85]与戈登一样，他当时也只有二十多岁且未婚。他的这份报纸创办仅一年有余[注 86]，起初专门报道国外而非国内新闻，且一贯坚定支持政府。报纸的大部分工作由其年轻编辑本杰明·诺顿·笛福（丹尼尔·笛福的私生子）完成。在媒体创业这一时尚的新领域投入点钱，起初或许只是一种消遣，但就在特伦查德和戈登开始为他的报纸撰稿时，多布雷的前景破灭了。他所仰仗的一位近亲（“我唯一指望能给我带来重大转机，且对他深具影响力的人”）[注 87]在南海公司危机中倾家荡产。突然之间，多布雷手中只剩下这份报纸，于是，在“极度痛苦的驱使下”，他准许了特伦查德和戈登对始作俑者发起愤怒的攻击，并为《周刊》日益增长的知名度感到欣慰。

短短几个月内，随着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的激增，多布雷感到经济稳固，足以成婚。[注 88]此后不久，他便开始着手将这份意外之财变现：他是个商人，而非意识形态家。沃尔波尔政府在未能通过逮捕和恐吓手段压制“加

图”专栏后，转而背着《伦敦周刊》的作者和编辑，直接收买了多布雷。最终，加图那些不服管教的批评并非被暴力扼杀，而是被金钱封口。

这桩交易的谈判耗费了一些时日。[注 89] 但在 1722 年 9 月，正值《加图来信》名声鼎盛之时，多布雷秘密倒戈，突然停载这些文章，并将《周刊》卖给了政府。一夜之间，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批评渠道变成了内阁的传声筒，并配上了一个全新的主栏目，旨在揭露加图过去言论的荒谬，并将读者的愤怒转向詹姆斯党的威胁。在加图直接论述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四篇文章中，多布雷只发表了前两篇。他们对突然被“封杀”的恼怒催生了后两篇文章[注 90]——即对“通常被称为诽谤之作”的辩护。这些文章于几周后发表在他们匆忙创办的新报纸《不列颠周刊》（*British Journal*）上。他们大声谴责政府“放肆、独断且暴力的”[注 91] 审查制度，并继续发表《加图来信》[注 92]，直到 1723 年夏天。届时，特伦查德或许已身患重病；他于当年 12 月去世。

然而，他们表面上的反抗其实是一场骗局：与此同时，戈登也已开始秘密为内阁效力。他年轻、贫穷且野心勃勃：他唯一的本钱就是写作才华，而这向来是可以出售的。[注 93] 1710 年代初，当他身无分文地来到伦敦时，起初是为托利党领袖、天才宣传家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担任底层间谍，随后才倒戈转向，尽其所能地靠笔杆子讨生活。正如他最早的一位批评者所言，他是一个毫无原则、唯利是图的文人（hack）[注 94]，始终生活在一种“依附状态”中——特伦查德只是他最新的赞助人。早在 1721 年夏天，当政府向《伦敦周刊》施加重压、且对戈登发出逮捕令时，他便已收到“权势人物不断递来的橄榄枝”[注 95]，与政府大臣进行秘密会晤，并获得“多次许诺”，以秘密津贴换取他放弃《加图来信》并倒戈。作为回应，他委婉地表达了对行政当局的尊崇，声称自己“打算退出政坛”，并对被任命为“某个体面的职位”表现出兴趣，称“[您]会发现我始终诚实且心怀感激”。特伦查德本人家境优渥且以清廉著称，他曾私下感叹，如果他的年轻朋友卖身投靠，他并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我能帮这个可怜的家伙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我愿意去做……随他怎么做吧。”

1722 年 5 月初，戈登毅然采取了行动：他暂时将《加图来信》留给特伦查德独力支撑，自己则开始在行政当局秘密“学徒”。在此之前，《来信》的大部分内容均出自他手[注 96]；而现在，他转而投身于政府的政治宣传[注 97]。为了创办《圣詹姆斯周刊》（*St James' s Journal*）——一份旨在反击《伦敦周刊》等反对派报纸的新内阁刊物，戈登秘密提供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创刊社论，猛烈攻击了加图曾热烈拥护的那些原则。他以同样的雄辩才华，转而为官方的政治与出版观发声。他宣称，议会才是人民权威的真实

机关；若认为普通公民有“能力和机会彻底了解自身及国家的利益”，那纯属危险的荒唐之谈 [注 98]。私人个体更不应僭越去批评公共事务——尤其是那些无知的“大众”，那群“混乱的流民。在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中（其中对他本人的提及看起来像是写给雇主的一份隐晦的忏悔），戈登警告说，新闻工作者通过诋毁权威、吹嘘人民所谓的“神圣主权和权威”来迎合大众，虽然易如反掌，却后患无穷。正是通过这种手段，即便正直、善良的公民也会被转化为愤怒且受蒙蔽的平民主义者：

当我观察到一个正派的商人，本身并无任何天然的恶意，却吸食着追逐名望的毒素，对行政当局满腔愤恨（仅仅因为新闻记者告诉他政府非常腐败）时，我深感悲哀——悲哀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西德尼、费默，以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些更杰出的现代思想家，竟然曾在人性中出现过。

次年，在一次詹姆斯党阴谋败露后，他发表了一份更加公开的声明。在他署名为“加图关于当前时局的一封信” [注 99] 的匿名小册子中，他歌颂沃尔波尔“英明且警觉的内阁”挫败了阴谋者，并对其每一项举措表示支持。他甚至为无限期维持常备军进行了辩护——而这种专制的幻象正是特伦查德及后来的加图数十年来慷慨激昂地反对的目标。戈登现在宣布，为了避免沦为詹姆斯党的奴隶，这种对自由的限制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他忏悔道，回首往事，他与特伦查德此前错误地假定了“民意”（the Sense of the People），并错误地抨击了桑德兰、沃尔波尔、对南海危机的处理以及其他所谓的内阁暴政迹象。事实上，政府始终表现得如同“这片土地的守护神”，而《加图来信》以及“我的[其他]许多著作”，却在无意中落入了詹姆斯党的圈套，让他们得以利用“出版物毒害人民的思想”。戈登总结道：“我们陷入错误太久了”；唯一体面的做法是承认错误，“并为这些祸害做出补偿”。

此后不久，特伦查德与戈登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他们终结《加图来信》，以此换取戈登在行政当局的秘密职位。莫尔斯沃思在给熟人的信中酸楚地写道，他前几天见到了戈登：“他已经达到了目的：既然诚实只能在派上用场时才被保留，谁还会继续坚守它呢？” [注 100] 特伦查德对这一权钱交易（quid pro quo）完全知情且共谋：事实上，《加图来信》的政治走向从一开始就受到他个人私利和对仕途擢升（preferment）之追求的影响 [注 101]。最终，正如戈登私下记述的那样，他的合伙人在临终前最关心的竟是“沃尔波尔先生是否信守对我的承诺，并在去世前一天反复催促我给他写信……他非常惦记着看我能在世上安顿并飞黄腾达……我希望沃尔波尔先生能信守承诺” [注 102]。

沃尔波尔做到了。在随后的岁月里，戈登擢升为首相最信任的秘密审查官 [注 103]，监管其他宣传员的工作，并在领取内阁俸禄的近二十年间变得脑满肠肥。在同时代人看来，发生的一切显而易见：既然政论作家本质上是“唯利是图之辈，仅随饥饿、便利或野心的指引而追随党派” [注 104]，那么即便这位 18 世纪初最直言不讳的言论自由倡导者，也能被收买而倒戈并噤声。

现代学者 [注 105] 往往倾向于忽视或否定这一观点。政治理论家和《第一修正案》的历史学家们对 18 世纪媒体与政治的腐败交易视而不见，将加图的主张视为连贯、公正且真诚的。与此同时，思想史学家则抗辩称，戈登即便在接受沃尔波尔的庇护后仍坚守了原则；他们注意到他依然著作颇丰，并错误地假设他像特伦查德一样早已经经济独立。

然而真正关键的事实是：1723 年以后，戈登的文字再未批评过政府，更遑论去煽动大众。1728 年，当他重新审视“论言论自由”这一命题时，他采纳了统治者的传统视角：诚实的谏言优于谄媚，允许民众发发牢骚比严令禁止更安全——但若由民众“喧闹地……发布彼此的不满与冤屈，并相互煽动” [注 106]，则是不可容忍的。他 1723 年后的出版与政治观 [注 107] 本质上与“加图”时期背道而驰。他认为，政府与议会才是权威的真正来源；民众极易受误导；大多数政治作家都是贪婪、党同伐异的败类，他们针对权威源源不断的“诽谤”是廉价、不负责任且危险的。因为“放纵不羁的语言会自然且迅速地导致放纵不羁的行为……而前者往往是为了引出后者”。历史证明，放纵的言论是无法容忍的：“无边际的自由与无边际的权力同样危险。”

真理与后果

尽管现代第一套政治言论自由理论是一套自利且充斥着刻意编造、显著矛盾和蓄意遗漏的产物，但对于无数当代及后世的《加图来信》仰慕者而言，这显然并非不言而喻。他们满怀热忱地将其解读为政治智慧的缩影。然而，我的论点是：这一文本并非基于诚意而撰写，由此产生的遗漏与矛盾构建了一个存在深度缺陷的言论自由模式。它不仅没有去解决困扰政治传播的诸多难题，反而刻意隐瞒了它们。与之所草率挪用的“宗教言论自由”概念不同，后者是经过全欧洲数十年艰苦辩论才构建而成的，而政治言论自由理论则是由两名赶稿的文人（hacks） [注 108] 仓促拼凑而成的。尽管频繁的再版使该文本得以经典化，但它从未是一部严谨的政治哲学著作，而仅仅是一系列文笔优美的论战专栏。正是这种可读性推动了它的巨大成功，但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仔细审视之下，特伦查德和戈登的言论自由理论会如此漏洞百出。

这种局限性即便在今天也至关重要，因为它拥有非凡的影响力。从一开始，无论是追求权力的政客还是捍卫自身行业的政治作家，都本能地喜爱其中蕴含的平民主义和反政府信息。在英格兰，加图的言论自由修辞在18世纪30年代被《手艺人报》（*Craftsman*）——沃尔波尔在新闻界的主要对手——热切地接纳并加以发挥 [注 109]。正如接下来的章节将要探讨的，这种影响在北美尤为深远：加图在那里惊人的普及程度，与18世纪20年代起第一批殖民地报纸的兴起紧密相连。其中许多报纸都热切地援引加图的论文（当时最前卫的出版自由辩护词），来为其自身实践正名。通过反复的引用与例证，特伦查德和戈登的词句与理想成为了殖民地政治和法律思想的常识。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初，反抗各州在起草其权利宣言时，其中包含的言论自由条款即使不是自觉地模仿《加图来信》，也带有其无可辩驳的意识形态印记。

其中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弗吉尼亚州宣言称：“出版自由是自由的伟大堡垒之一，除专制政府外，绝不能受到限制。”这种情绪，以及“自由的堡垒” [注 110] 这一被包括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内的无数作家（他在权利法案最初草案中也使用了此语）所采纳的短语，直接源自加图关于言论自由的第一封信。1789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注 111] 正式将特伦查德和戈登的模板载入了这一后来成为世界上最有力的言论自由法律之中，即那条禁令：“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放眼全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该修正案修辞上的绝对主义及其反政府的焦点，其实是完全反常的。尽管自18世纪后期以来，言论和出版自由已被同样显著地载入全球数百部宪法中，但除美国之外，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曾以此种方式构想言论自由。相反，它们无一例外地在“自由言说的权利”与“负责任言说的义务”之间寻求平衡。正如同样诞生于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所述：“自由交流思想与意见乃是人类最为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位公民皆可自由地言说、书写和印刷，但应对法律所界定的滥用此类自由的行为负责。”

这种替代性路径本身也有明显的弊端。但它确实凸显了特伦查德和戈登极力回避的那些令人不安的真理：言论可能造成伤害，而我们——即“人民”——往往并不达成共识。它的表述强调了言论自由绝非绝对，且可能与其他基本价值发生冲突。它采取了一种整体性的权利观，而非预设“政府”的行为与其他一切权力领域之间存在某种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区别。

这种差异至关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由于第一修正案措辞方式的特殊性，美国的大多数言论事实上并不受其保护。根据美国法律，任何私营实体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审查、解雇或惩罚他人，即便同样的表达形式在面对“政

府”时是不受抑制的。没有任何其他文化在对待“私权力与公权力对个人表达的影响”时，持有如此严重不对称的态度。

时至今日，这已不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这些反常现象正影响着我们所有人。互联网的兴起以及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在全球的绝对主导地位，使得世界范围内关于在线表达自由的规范，主要建立在美国式信念之上——即对第一修正案之崇高性的笃信、对政府审查之首要危害的警惕，以及对“思想市场”具有揭示真理之属性的寄托。在这种观点下，针对谎言、虚假信息 and 仇恨言论的唯一正确回应永远是：更多的言论。更糟糕的是，尽管社交媒体公司的一切行为主要受其对利润和市场份额的贪婪驱动，但它们自身的言论理论 [注 112] 和可接受的表达准则，却一贯地——且是蓄意地——忽视了这一最根本的动机。

这就是为什么理解政治言论自由权是如何及为何被发明的，会有所助益。这样做不仅能阐明其首个实质性理论存在何种深刻缺陷，以及其偏见如何延续到它所启发的、具有特殊性的美国法律中（正如我们将在本书后文探讨的那样）；它还开辟了重新思考我们当前困局的路径。

《加图来信》的故事表明：言论自由往往并非虚假信息和谎言的解毒剂，反而常常会将其放大。表达自由与其他原则之间的张力未必是危险的，也未必如加图及其现代追随者（epigones）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滑向暴政和思想警察的指标。政府绝非言论唯一、甚至不是最有力的仲裁者。一个利润驱动的媒体市场并非真理的最佳决定因素。在滑坡上不断寻求平衡、就如何调和不可兼得的价值观做出艰难的集体决定并不断修正这些判断，这并不是坏事。我们可能会为之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感到遗憾，正如我们可能不认同其结果一样——但这是任何存在分歧却又民主的社会中，生活中必然面临的境况。

自由的形态 [注 1]

无论作为学者还是公民，我们都习惯于识别审查制度。我们深知它以不同的形态呈现：历史学家惯于梳理它在不同时空下的轮廓。但在涉及言论与出版自由时，我们通常并不这样思考。相反，我们预设自由仅仅是移除审查制度的人为限制后所剩下的东西。自由随审查的退却而增长：表达自由被视为审查制度天然且理想的对立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言论自由并非直接产生于约束的减轻。它本身是一个被设计、被发明的概念。自由同样拥有一种“形态”。它在某些方向上的流动比在其他方向更顺畅；它往往会向现有的权力形式集聚。这不仅在其实践中如此，在其理论中亦然。

从其在《加图来信》中的最早雏形开始，言论自由作为一种政治权利，其名义上中立的新意识形态实际上带有深刻的偏见。这不仅体现在它对言论、真理、诽谤和媒体的定义上，更关乎谁的声音算数，谁的声音被忽视——尤其体现在它对男女差异的构想，以及对种族和奴隶制的处置上。这些偏见是原始文本固有的，且当这一意识形态被引入美洲的奴隶制社会时，这些偏见被进一步强化。

正如该时期的每一份文本一样，加图对“公众”的建构带有强烈的性别色彩。这从根本上影响了言论自由的定义。同样地，与 17 和 18 世纪的许多政治小册子一样，《加图来信》不断谴责“奴役”（enslavement）——即自由的对立面；“奴隶制”恰恰是言论和出版自由所旨在预防的东西。然而与此同时，该文本却纵容黑人遭受真实的奴役。其创作者特伦查德、戈登和多布雷，个人均与美洲的奴隶所有权有关。无论是在其最初的表述中，还是在 18 世纪后期的大多数阐述中，言论自由都是一种种族化的意识形态——正如 17 和 18 世纪英语世界中那些最自觉、最受赞誉的出版自由倡导者（早期报纸）同时也是奴隶制 [注 2] 和白人至上主义的重要工具。

在实践中，言论自由也可能呈现出其他形态。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理想，既可以被强者占用，也可以被弱者挪用。奴隶和女性一样，拥有自身的自由观念，且绝不可能被完全噤声。然而，无论是在最初的构想中，还是在跨越大西洋的移植过程中，言论自由这一新概念始终被种族化的不自由现实所笼罩。

《加图来信》是一部“男性的文本”——由男性撰写，论述男性，并面向男性受众。在其数不胜数地引用的古今案例以及长达 35 万字的自由哲学中，女性主体与女性声音显著缺位。对于一部 18 世纪的政治小册子而言，这固然并非罕见，但它却深刻地塑造了特伦查德和戈登的言论自由理论。

两人的文本中隐含着一种僵化的两性差异观。女性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加图的核心主题——“公共自由”[注 4]——被假定为纯粹男性的事务。书中的诸多隐喻、明喻和拟人化手法同样几乎清一色地指向男性。特伦查德仅有一次以“一个女人”[注 3]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加图随后回以长篇复函，内容旨在批判买卖婚姻，并将妻子描绘成挥霍无度、仅对家务琐事感兴趣的形象。该论文的论点是：婚姻通过为男性提供家庭幸福，使他们能够专注于推进公共自由与福祉。这是女性与公共事务之间唯一的联系。

这种“公共领域”与“家庭领域”的观念切割，也构成了加图言论自由模式的特征。言论自由之所以是“公共自由”的基石，是因为它允许私人公民（根据定义即男性）去批评“政府的行政”。其范畴在于“公开地”审查“公共大臣”对“公共事务”与“公共程序”的执行。反之，言论自由的领地并不延伸至私人事务，即：那些“伤害特定个人却无益于公众的文字”[注 5]；关于“私人与个人缺点”或“私人过错”的言论；针对“私人个体”或涉及“纯粹私人”事务的诽谤。特伦查德和戈登肯定地表示，所有这一切并非自由，而是“放纵”（licentiousness），理应受到惩处。甚至“统治者的私人恶习或弱点”也在禁区之列，除非这些行为影响了其公共履职。

这是一套深受性别偏见影响的理论。加图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不参与公共事务：她们的言论完全是家事的、琐碎的且低等的。1721 年，戈登在为其已故合伙人撰写的悼词中，精准地复刻了这种等级制度。他歌颂特伦查德的言说与写作清晰、理性且富有雄辩力，随后笔锋一转进行对比：至于女性，“他（特伦查德）以极大的体面和尊重对待她们；他熟稔她们那些闲言碎语（chit-chat），并能说出大堆令人愉悦的俏皮话”。[注 6]换言之，男性的论说（discourse）是“强健、优美且有益的”，关乎公共福利；而女性的交谈则是由甜美、空洞的废话组成的。

然而，如果仅仅得出“特伦查德和戈登的言论自由模式反映了当时文化固有的性别偏见”这一结论（尽管这确实显著），就会忽略一个至关重要的补充点。即便女性在理论上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她们的声音也始终是其中的一部分。在 1700 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男性与女性的言论[注 7]同样活跃于流言、抗议以及大众政治舆论的其他表达形式之中。女性通过印刷媒

介向公众发声这一想法在更早的时代或许充满争议，但到 18 世纪 20 年代初，即特伦查德和戈登提出其主张时，英语世界的公共话语早已不再是男性的专属领地。法国亦然，自上个世纪以来，女性作者和由女性主持的智识沙龙便已根深蒂固。在英法两国，女性作家在出版界已日益普遍，而她们的一大主题正是男性对其性别的非法禁锢。

在这些才华横溢的声音中，最杰出的当属诗人萨拉·法奇（Sarah Fyge）。1686 年，年仅十四五岁的她便撰写并出版了首部代表作——长篇抨击性别刻板印象的《女性辩护者》（*The Female Advocate*）。她的后期诗作在志同道合的作家圈内流传多年，后于 1703 年结集出版。其中包括《竞争》（*The Emulation*），该诗精妙地将女性终身遭受的社会从属地位（以及她们对无休止的“男性说教”[mansplaining] 的隐忍），与她们在机智和学识上显著超越男性的能力进行了对比：

……从生命初曙直至坟墓，
可怜的女性在任何境遇下皆为奴隶。
奶妈、情妇、父母与追求者，
她必须施予爱，无人能逃脱那份痛苦；
随后是最后的、致命的奴役，
带着侮辱性暴政的丈夫……
但在这个蒙受天恩的时代，自由已如此普及，
以至于每个男人都在阐释上苍的旨意；
难道我们女性如今要温顺地坐视不理，
不在哲学领域中进行我们的远征，
亦不在和谐的诗歌中修饰我们的思想？
我们将在学识界捍卫我们的权利，
智慧之帝国，如今将迎来女性的统治…… [注 8]

同集中的《自由》（*The Liberty*）一诗，开篇描述了阻止女性自由表达的性别惯例，随即誓言要甩掉这种正如所有女性内心暗暗渴望摆脱的“镣铐”与“枷锁”：

我的性别禁止我打破沉默，
我失去了幽默，因女性不得发声。……
倘若动笔，我的笔触也必须受雇于
那些关乎实用家务的崇高主题，
抄写陈旧的烹饪食谱：……
但我大胆的笔锋，将进行更无畏的突击，
并如我自身一般，攫取不受约束的自由；

不再被锁死在我性别的精密秩序中，
亦不再用禁锢来困扰我渴望的心灵：
我将为罪孽而羞赧，而非为那些所谓的羞耻，
守护我的美德，蔑视脆弱的名声。
这份勇气证明了我的英勇：这确实更为糟糕——
去恪守那些我们私下诅咒的规则：
我要向所有拘泥形式的圣徒呼吁，
让他们看看忍受这些禁锢是何等不情之愿。

“妻子与仆人别无二致，/ 区别仅在于名分，” [注 9] 另一位备受推崇的诗人玛丽·查德利夫人 (Mary, Lady Chudleigh) 约在此时写道——因为没有任何丈夫允许妻子自由言说：

当她吐露“服从”一词，……
哪怕只是顾盼、欢笑或言谈，
亦将破坏婚约。
如同哑者，她必须仅靠手势示意，
绝不攫取任何自由，……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必须完全符合她那傲慢领主的意志，
他既握有权力，便也垄断了智慧。

除了担任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女性也是记者、讽刺作家、哲学家和散文家：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最杰出的政治作家中就包括德拉里维尔·曼利 (Delarivier Manley)、苏珊娜·森特利夫 (Susanna Centlivre) 和玛丽·阿斯特尔 (Mary Astell)。此外，作为印刷商、出版商、书商以及书籍报纸的零售商，女性在政治话语的生产与传播中处于核心地位 [注 10]。若无她们的努力，根本不会有人读到《加图来信》。更重要的是，女性与男性一样，是政治新闻的热衷探讨者且极具见地。正如特伦查德最亲密的知识同僚之一在 1716 年所抱怨的那样，“女士们……过于关注政治了” [注 11]。贯穿整个 18 世纪，女性的作者身份 [注 12]、读者群体以及对政治的兴趣只会不断增长。因此，特伦查德和戈登在提出其性别化的言论与公共领域模式时，尽管自称是在描述现实，实际上却是在编造一个一厢情愿的男性虚构故事。

他们将公共话语视为一个独立的、男性化领域的观念，在当时也显得相当新颖。尽管在 18 世纪社会中，“私人”与“公共” [注 13] 是日益受人瞩目的概念，但认为两者本质上截然不同的假设远未占据主导地位。更为传统的思维方式强调，个人事务与社群事务是紧密交织的，正直的公共行为取

决于美德的家庭生活。这与 18 世纪早期最流行的精英话语模式——“礼雅”（politeness）相一致；在这种模式中，女性的社交与谈话被描绘成对男性有益的补充，而非独立且低等的领域。

特伦查德和戈登是在自觉地否定这种关于社会与两性关系的普遍观点吗？一个显著的证据表明事实的确如此。在两人开始合作写作时，英语世界最受欢迎的散文家及合作作者是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这两位在其大获成功的期刊《闲谈者》（*Tatler*, 1709 - 11）和《旁观者》（*Spectator*, 1711 - 14）中，比任何人都更有效地普及了礼雅理想和女性的高雅情致。在其他方面，他们的影响力也必然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对于年轻、雄心勃勃却身无分文的戈登而言。艾迪生和斯蒂尔既是成功的富豪政客，又是畅销书作家；而艾迪生那部大热的戏剧《加图，一出悲剧》（*Cato, a Tragedy*, 1712）很可能启发了特伦查德和戈登专栏的名称。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 1721 年夏天，当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秘密会见戈登，试图通过奉承这位年轻的文坛后起之秀来使其倒戈时，戈登的回应是何等激烈。这位官员援引了刚去世不久的艾迪生这一泰斗级的范例，称他“因致力于改良私人与家庭礼俗而理应获颁金像奖”。[注 14] 对此，戈登轻蔑地回敬道：

艾迪生先生关于夫妻关系等平庸小事的文章写得固然不错，但若要造福世界，他起步的方向就错了。因为任何想要改良人类的人，都必须从公共领域和政府运作方式入手，其中包含了一切美德或恶习、幸福或苦难；只要政府是糟糕的，私人礼俗必然也是糟糕的。

这是对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权威，以及他们背后关于性别与世俗事务之假设的一次令人侧目的、充满自信的否定。

在 17 世纪后期和 18 世纪初期，公共与私人的区分以及男女语言的差异，是广受讨论的主题。《旁观者》在提倡两性间礼雅谈话的同时，也强调“男人和女人应当在各自妥当的领域内忙碌，且仅限于从事适合其各自性别的事务”。[注 15] 然而，它在谴责女性参与党派政治为“不淑”的同时，也反复承认女性对政治及其他非家庭事务的强烈参与。

相比之下，《加图来信》则蓄意无视了这一现实。通过这种方式，其新颖且具影响力的自由理论及政治言论自由理论，助长了“政治是纯粹男性领地”的假设。到 1800 年，区分生活的私人与公共领域，并预设这两者分别对应于本质上的女性与男性区域，已成为常识。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得到了强化，但它始终被女性对世俗事务的兴趣与参与的现实所反驳 [注 16]，且那种试图划清私人与公共界限的努力也从未真正奏效。认为存在一个独立的公

共领域、女性在其中全然缺席、言论自由因此必然仅是男性的关怀——这种观念始终只是一种自利的论点，伪装成对所谓自然事态的中立描述。但这正是父权制运作的方式：持续地、隐形地自我强化。言论自由的历史正是这一叙事的一部分。

自由与奴役

加图宣称，言论自由的核心宗旨在于防止暴政与奴役。每当压迫者成功遏制自由表达时，人民便会陷入“被奴役”的状态 [注 17]，其“心灵……退化为卑躬屈膝与盲目屈从等种种卑劣的奴性状态”。事实上，如何维系自由并规避奴役，正是特伦查德和戈登整套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纵观其全篇，一如当时其他的文学与哲学作品，“奴隶制”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概念，被视为英格兰式自由的对立面。毕竟加图论证道，全球大多数民族（包括“整个亚洲和……整个非洲”）[注 18] 都生活在“被奴役的国家”，受制于暴君的反复无常：“我们是人，而他们是奴隶。”

特伦查德和戈登对这一话语的使用，与他们自身社会奴役人类的现实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这种话语又如何影响了其言论自由哲学——这一后来在美国奴隶制社会大受欢迎的理论？长期以来，学术界曾就约翰·洛克的自由理论提出过类似质疑，因为洛克同样使用了关于奴隶制的修辞 [注 19]，且深受北美殖民地及革命时期美国人的追捧。然而，此前从未有人针对《加图来信》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创作者提出过此类问题。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与写作同样牵涉到北大西洋世界对黑人的奴役。言论自由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种族化的理想。

到 1710 年代，英国的读者与作家 [注 20] 已对殖民地奴隶制习以为常。特伦查德和戈登在新闻界的主要竞争对手丹尼尔·笛福便是其中一员，他不仅为此投入资金，还代表奴隶贩子撰写宣传文稿。他在 1711 年针对近期非洲黑奴价格上涨抱怨道，“以适中的价格为种植园提供充足的黑奴供应” [注 21]，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贸易中最有利可图、最有益且绝对必要的部门”。《加图来信》在 1720 年代至 1750 年代间的声名鹊起，恰逢英国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持续扩张期 [注 22]。伦敦的报纸公开歌颂 [注 23] “黑奴贸易”，推销待售的“黑色”与“黑人”个体，并刊登广告悬赏抓捕那些成功逃脱的本地奴隶。1721 年 9 月 16 日，《伦敦周刊》的头版刊载了加图那段令人心潮澎湃的宣言——“人天然是平等的” [注 24]；而在下一版，该报则为读者更新了一条喜讯：数百名“优等奴隶”已在非洲海岸被装上英国船只，正运往美洲途中。

戈登解释说，生活在自由之中的民族，如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拥有先天的优越性，是“人类的另一物种”[注 25]。相比之下，奴隶不过是“绵羊”：因为“那些被当作牲畜对待的人，极易堕落成牲畜”。他从未将暴君统治下的臣民，与罗马或其他像他自己这样“自由”社会中的奴隶进行区分。在一种等级制度森严的文化中，“奴隶”一词既可以指代作为资产的人类，也可以指代暴政的受害者，或者仅仅指代道德卑下之人。因此，从“英格兰优越论”滑向对受压迫的“奴性”[注 26]民族的蔑视，进而预设某些民族或个体天生就该被奴役，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特伦查德和戈登心目中的英雄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便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卑微软弱的亚洲人和非洲人，由于不珍惜自由或无力自我管理，被亚里士多德及其他智者称为天生的奴隶，并被视为与禽兽无异。”[注 27]

因此，《加图来信》的文本一方面反复论证：不自由的政府是一种奴役，甚至会腐蚀暴君自身（“奴隶的君主亦是奴隶；他只不过是其中最魁梧、最邪恶的一个”）[注 28]；另一方面，它又漫不经心地纵容奴隶贸易，甚至将其描绘成英格兰自由的支柱。特伦查德在某篇歌颂政治自由的文字中，赞美了勤劳的“美洲英格兰种植园主，[他们]除了维持自身及十倍于此数量的黑奴生计外”[注 29]，还为祖国创造了如此繁荣：“此乃自由之福祉。”另一篇文字则赞美了“在适宜气候下建立并各司其职的殖民地……特别是我们自己在西印度群岛的诸多殖民地”[注 30]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那里的居民通过进口供“自身及奴隶”使用的商品来平衡出口贸易。这些段落大量借用了他与洛克的老盟友、布里斯托商人及西印度贸易商约翰·卡里（John Cary）的论点。卡里在其著名的《英格兰状况论》（1695 年）中，曾将奴隶贸易热忱地誉为[注 31]“本王国最优质的贸易”，并鉴于非洲奴隶的廉价以及加勒比和北美种植园奴隶劳动的生产力，敦促扩大贸易规模。

加图的创作者们与奴隶制产业之间亦存在私人纽带。特伦查德曾担任爱尔兰的殖民行政官，并投资过从事奴隶贩卖的南海公司[注 32]。他那起草了许多《加图来信》的庄园，最终落入了一位百万富翁之手[注 33]，而此人的财富正源自牙买加的奴隶种植园。在成为作家之前，戈登也几乎移民到了加勒比地区：1713 年，他当时的赞助人、首席大臣罗伯特·哈利（奴隶贸易的狂热推动者）曾提议派遣他作为间谍前往东印度或西印度群岛[注 34]。

1719 年，戈登那部开启其文学生涯的畅销讽刺剧《为阿尔贝罗尼牧师谦卑辩护》（*A Modest Apology for Parson Alberoni*），成为了最早在牙买加（重）印的书籍之一[注 35]。他的三个子女也都被卷入了帝国版图。1740 年，他的幼子比尔搭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前往印度[注 36]。十年后，他的另外两个孩子移民到了牙买加——那是英国利润最丰厚的殖民地，也是

其非人贸易中富庶而残酷的震中。最小的女儿帕蒂 [注 37] 嫁给了一位糖业种植园主，并据其丈夫所述，由此成为了数百名“黑奴、骡子、马匹、牲畜”及其他动产的女主人。她的哥哥汤姆 [注 38] 是一名大律师兼治安法官，同样最终成为了拥有大量奴隶的权势富豪，他甚至将其中最值钱的一个奴隶命名为“加图”。1760 年，他支持了对“塔基起义”（Tacky's Revolt）的血腥镇压，那是大英帝国历史上遭遇的最大规模奴隶暴动。他的一生 [注 39] 都在捍卫其他奴隶主的利益及奴隶制原则，并随后担任了皇家港首席大法官、牙买加总检察长 [注 40]、议员及统治委员会成员。

牙买加是 18 世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印刷中心之一：汤姆·戈登积累了 2000 卷的藏书。尽管幸存的证据过于稀少，无法确切得知《加图来信》在加勒比地区的流程度，但它们极有可能像在美洲大陆一样，被当地报纸竞相转载或以书籍形式进口 [注 41]。可以肯定的是，当这些具有种族歧视意味的思想被移植到大西洋彼岸时，它们获得了额外的力量。在早期的美洲，言论自由的意识形态支撑着白人至上主义。

对于 18 世纪的白人男性殖民者而言，言论自由既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理想 [注 42]，也是他们相较于他人之优越地位的持续性现实标志。他们的法律与政治是通过口头仪式完成的——如宣誓、作证、发表演说或正式辩论政策——而地位较低的人被自动排除在这些仪式之外。这意味着正如在英国本土一样，女性、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教友会信徒被排除在外，所有的有色人种亦然。混血儿、印第安人和自由黑人的言辞在地位上始终低于白人，而对黑人群体进行大规模的噤声，正是奴隶制本身的核心所在。

事实上，关于言论的种族化预设成了 18 世纪对“人类”定义的核心。奴隶制的批评者们曾以日益强硬的力度论证：非洲人的雄辩才能 [注 43] 证明了他们拥有平等的法理人格。但其他白人则主张相反的观点——即黑人的表达本质上是低等的。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便是这一立场的拥护者。休谟在 1753 年力图证明所有“黑人”都“天然劣于白人” [注 44]，他屏除了一个看似相反的西印度案例：“在牙买加确实有人谈论某个黑人，说他颇具才学；但那很可能只是因为他具备一些微末的造诣而受到赞赏，就像鹦鹉能清晰地说出几个词一样。”在休谟看来，任何黑人的声音都不可能超越禽兽的聒噪。

休谟的主张 [注 45]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这使他成为了 18 至 19 世纪白人至上主义者最推崇的权威。尽管休谟不屑于提及他的姓名，但他蔑视的对象正是牙买加的一位自由黑人——弗朗西斯·威廉姆斯（Francis Williams）。威廉姆斯曾在英格兰受过教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拉丁语诗人，且其本人也拥有奴隶。18 世纪 20 年代初，威廉姆斯正生活在伦敦，无疑对

《加图来信》非常熟悉——1721 年秋，托马斯·戈登甚至在其中一封信中称他为一位“才华横溢的绅士……一名黑人”[注 46]，并提到他因肤色原因被皇家学会拒之门外。一代人之后，威廉姆斯与戈登之子汤姆（Tom）共同成为了牙买加首府西班牙镇（Spanish Town）的社会名流。

同时代人对小戈登的描述常强调其雄辩才干[注 47]：他“以言辞之战闻名”，“是最能言善辩的演说家”，“舌尖流淌着雄辩”。据远至波士顿的报道，他在判处他人死刑时能发表“极具感染力”的演说。作为托马斯·戈登那位骄傲且自信的继承人[注 48]，以及一名领先的殖民地律师和政治家，小戈登与他在英国本土及北美的同行一样，理所当然地认为言论自由是自由的基石[注 49]。

威廉姆斯同样精通法律，自信且善于辞令。然而，同样在白人身上令人赞赏的品质，在黑人身上却显得不合时宜。由于西印度群岛的白人致力于将“奴役与自由”的界限与“深色与浅色”身体的差异等同起来，因此令他们深感恼火的是（正如一位主要的种植园主所抱怨的），威廉姆斯“没有保持沉默的谦卑”[注 50]，反而公开坚称肤色与智力无关（他写道：“美德与理解力[注 51]没有颜色；在正直的心灵和艺术中，不存在颜色”）。尽管由于肤色原因被禁止从事法律工作或担任公职，他却为自由黑人儿童开办了一所学校，教导他们阅读、写作、拉丁语和数学。牙买加白人曾多次试图压制他的声音，但从未完全成功。1730 年，当该岛政府通过一项降低其法律权利的法案时（理由是他是一名危险且傲慢的黑人），威廉姆斯成功向英国本土的帝国当局请愿[注 52]，推翻了该法案。他深知，言辞如何被接受以及具有何种力量，始终取决于受众，而非仅仅取决于作者。

正因为殖民者本质上将言论自由等同于白人至上，他们才不遗余力地使被奴役者噤声。1748 年，牙买加被奴役者可能正当地抱怨其所受虐待的想法，令该岛的白人定居者感到如此厌恶，以至于催生了一份讽刺性的“黑奴请愿书”[注 53]。这份请愿书的形式与内容凸显了以下观念所带来的威胁性：即黑人可以为了自身利益而书写和发声。事实上，奴隶通常根本不被允许阅读或写作。伦敦推事约翰·菲尔丁爵士（Sir John Fielding）在“塔基起义”后警告说，教导奴隶识字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接触此类“自由的甘甜”[注 54]会直接导致“那些近期引起并威胁西印度群岛居民及种植园主的暴动、祸害与危险”。相反，被奴役者身上被烙上了压迫者的语言——通过烙印在他们身体上的所有权标记，以及对他们人格的强行更名。他们的言论受到持续监控；他们经常通过肉体上的失声（muting）而遭受惩罚。1750 年代中期，作为一名刚抵达弗吉尼亚种植园的非洲青年，奥劳达·埃奎亚诺

（Olaudah Equiano）被一名黑人家奴的形象吓坏了：那人行动时戴着一副

铁嚼子 (iron muzzle), “这副嚼子紧紧锁住了她的嘴, 使她几乎无法说话, 也无法进食或饮水” [注 55]。一些奴隶主从伦敦订购此类器材, 另一些人则即兴发明各种侮辱性的酷刑。在牙买加汤姆和帕蒂·戈登生活的年代, 监工托马斯·西斯尔伍德 (Thomas Thistlewood) 有时会强迫一名奴隶在另一名奴隶嘴里“排便” [注 56], 然后“在他满嘴污物时立即塞进塞口物, 并强迫他佩戴四五个小时”。

然而, 即便在如此极端暴力且不自由的境况下, 被奴役男女的言论依然无处不在、无法遏制且具有潜在的越界性。口头言辞既是表达, 也是行动: 其言说过程正是自由与奴役之边界被不断强化或挑战的最普遍方式。就此意义而言, 即便是不自由者的言论也始终是自由的: 尽管言论自由在理论构建上带有排他性条文, 但自由言说的实践却极难约束。黑人的言论点燃了持续不断的黑人反抗运动。单是在牙买加, 我们就已知在 1673、1676、1678、1685 - 7、1690、1745、1760、1766、1776、1791 - 2、1808、1815、1819、1823 - 4 以及 1831 - 2 年发生过涉及数百乃至数千名奴隶的大规模密谋 [注 57]; 此外, 在 1728 - 39 年和 1795 - 6 年间, 殖民定居者还与不同的“马龙人” (Maroons) 群体爆发了全面战争, 这些逃亡奴隶及其后裔控制着该岛山区内部的半自治据点。正如英国人所意识到的, 黑人社会同样极为看重誓言、演说和祈祷, 认为这些既是人际间的纽带, 也是与全能灵性世界的联结。一句阿肯族谚语 [注 58] 警告说, 被禁止说话无异于被谋杀: 不义地使他人噤声是一项严重的罪行。如果说大英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口头造物——既依靠口头言辞, 也依靠书写和印刷文字来维持——那么对于非洲奴隶及其后裔在跨大西洋的炼狱中所创造的灵性、法律和政治文化而言, 情况更是如此。出于上述所有原因, 奴隶主对“奴隶谈话”深感着迷且充满焦虑 [注 59]。他们永远无法完全控制它, 却又畏惧其联合与激励的力量——因为众所周知, 誓言与耳语孕育着不服从、阴谋和起义。

尽管殖民社会存在深刻的权力失衡 [注 60], 但这种将表达自由种族化的持续努力, 却始终遭到非白人群体反抗行为的削弱。正如女性参与公众辩论揭穿了“言论自由是男性专属领地”这一厌女论调一样, 奴隶社会的底层民众也通过主张自己的言说与书写自由, 挑战了殖民者试图将其声音视为本质低等的企图。早在 1780 年代动笔抨击奴隶贸易之前, 埃奎亚诺 (Equiano) 的言辞 [注 61] 就曾多次令他的白人压迫者感到挫败: 他们“回答说英语讲得太好了。我反驳道, 我也这么认为。”被奴役的男女始终利用语言来破坏奴役规则、主张自身身份, 并获得比预期更多的能动性 [注 62]。叛乱奴隶集结言论的力量, 甚至在面对死亡时, 也毅然发声反抗白人至上主义 [注 63]。弗朗西斯·威廉姆斯拒绝保持沉默。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 一位名叫

布朗（Brown）的年轻自由黑人，曾利用他的写作才华，为逃亡奴隶伪造通行证 [注 64]。1730 年代初，两名白人契约佣工（“一个名叫约翰·多恩或邓……另一个名叫查尔斯”）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协助牙买加的反叛游击队。

所有这些都并未构成一套清晰阐述的言论自由替代方案。至少在 18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之前 [注 65]，我们更容易看到有色人种及其盟友如何重新挪用“自由”这一普遍概念，而较难发现与之对应的关于言论或出版的理论化建构。然而，这些颠覆性言辞行动的影响依然是深远的。它们通过无数（大多未被记录的）方式，持续动摇着白人试图巩固言论、自由与种族之等级制度的努力 [注 66]。

出版与权力

言辞的力量并非固有的。它取决于其作者、受众——以及媒介。口头表达可以具有威力，手写文件亦然。但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大众传播技术一直拥有最广的覆盖面。要理解任何时代的言论自由形态，我们也需要关注这一事实：哪些声音被放大，如何放大，以及为何放大？媒体的影响力从来不是均匀分布的。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特伦查德和戈登高深的言论自由理论刻意对金钱对作家和出版商的普遍影响保持沉默——正如它对媒体更广泛的作用保持沉默一样，它将所有传播方式（无论是口头、书写还是印刷）本质上视作平等。然而，他们自身的行动却展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他们的出版商多布雷（Dobré）亦然，他先是政治批评的促进者，继而成为镇压者——他与该专栏在美国交织延续的历史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加图来信》在美洲惊人的普及 [注 67] 始于其被第一批殖民地报纸奉为经典。1719 年时，北美只有一份报纸；到 1733 年，已增至十几份甚至更多。在殖民地背景下，大都市作家拥有额外的声望，且对印刷评论的敏感度往往比母国更敏锐，加图关于言论自由的论文为政治新闻业本身提供了一种权威、现成的辩护。对于任何想要吸引关注并彰显独立性的 18 世纪早期殖民地印刷商或作家来说，这些文章是首选的、最大胆的、也是最现成的宣言。

这就是为什么本杰明·富兰克林 [注 68] 及其兄长詹姆斯在 18 世纪 20 年代初，当他们的《新英格兰信使报》（*New-England Courant*）与马萨诸塞议会发生冲突时，反复转载这些信件的原因。安德鲁·布拉德福德

（Andrew Bradford）[注 69] 亦是如此，他创办的费城首份报纸《美洲周刊水星报》（*American Weekly Mercury*）采取了类似的平民主义路线。十年

后的 1733 年，纽约一群反对新任强权总督威廉·科斯比（William Cosby）的商人与律师派系，决定创办一份报纸来煽动民众对总督的仇恨，并反击由布拉德福德之父威廉（William）印刷的政府控制刊物《纽约公报》（*New-York Gazette*）。这一反科斯比小集团雇佣了老布拉德福德的前学徒、印刷商约翰·彼得·泽格尔（John Peter Zenger），创办了美国第一个明显的党派媒体频道——《纽约周报》（*New-York Weekly Journal*）[注 70]。

随后爆发的《公报》与《周报》之间的报业战争，在“泽格尔案”审判中达到高潮，并成为了美国出版自由意识形态的奠基时刻 [注 71]。该案中反复陈述的关于政治言论的论点并非原创 [注 72]：它们重演了由加图在 1721 年开启、并已在 18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被伦敦主要的反对派报纸《手艺人报》（*Craftsman*）循环使用的英国式辩论。不同之处在于，在美洲，特伦查德和戈登的论断获得了比在英国大得多的影响力 [注 73]——甚至《公报》也防御性地承认了它们的权威。1735 年，陪审团裁定泽格尔“煽动性诽谤”罪名不成立，其遵循的是加图理想的新逻辑（即真理永远不构成诽谤，且陪审团有权对此做出判断），而非既定的法律条文。通过持续的评论、引用和再版，特伦查德和戈登的思想获得了一套独立的生命力，成为美国政治与法律思想主流的一部分。几十年后，它们影响了大多数反抗殖民地在 1776 年至 1784 年间的权利宣言中所包含的言论与出版条款，并由此塑造了第一修正案本身的特殊形态。

在北美普及加图思想功劳最大的人当属律师詹姆斯·亚历山大（James Alexander），他是《纽约周刊》（*New-York Weekly Journal*）的创始人兼主笔。特伦查德和戈登是他主要的智识灵感来源。他创办报纸时发表了一篇关于出版自由的长篇论文，据称出自加图本人之手；他在文中点名向戈登致敬，并为“各殖民地与种植园”转述了其英雄们的论点 [注 74]。他宣称：“真理终将战胜谎言”，并指出只有暴君和叛徒才会试图限制印刷，因为“古往今来，没有任何民族在失去自由言论、书写或发布其情感的自由后，不同时丧失其普遍自由并沦为奴隶。自由与奴役！前者何其迷人！后者何其可憎且令人厌恶！”连续数周，亚历山大不断转载特伦查德和戈登关于言论与诽谤的专栏 [注 75]，并附上自己的评论。当总督科斯比逮捕泽格尔时，亚历山大立即重载了加图对言论自由的辩护 [注 76]——他的主要同谋者、权势律师老刘易斯·莫里斯之子小刘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 Jr）在州议会上慷慨激昂地宣读了这一篇章。亚历山大在私下谈及对总督的攻击时写道：“这是一种奴役状态，因此不构成诽谤。” [注 77] 尽管泽格尔的无罪释放从技术上并未改变法律，但它确实增强了殖民地的出版自由 [注 78]；

亚历山大在 1736 年发表的关于此案的小册子，成为了 18 世纪早期美国最著名的捍卫自由意志主义言论自由理想的作品。

“每一个宁愿选择自由而非奴隶生活的人，都会祝福并尊敬你们，”

[注 79] 泽格爾的律師在向陪審團申訴時如是說。當他發言時，房間里很可能出現了黑人的面孔，因為被奴役者占到紐約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不斷呼吁“自由”並譴責“奴役”的同時，《紐約周刊》一如大多數美國報紙，定期刊登奴隸買賣廣告。與其他殖民地印刷商一樣，澤格爾有時在這些交易中擔任中間人。也和他们一樣，澤格爾很可能擁有並買賣過奴隸 [注 81]，並利用奴隸來生產和分發報紙。當總督下令公開焚毀 [注 82] 該報時，執行任務的正是一名不自由的“黑人”。詹姆斯·亞歷山大是一名蘇格蘭移民，他擁有紐約黑人奴隸，並資助其子成為一名狂熱的非洲奴隸運輸商和貿易商；而老劉易斯·莫里斯出身於加勒比種植園主世家，同樣是《加圖來信》的“忠實讀者” [注 83]，他曾是所有北方殖民地中最大的奴隸主。即便像美國歷史學家習慣做的那樣，將這種奴隸制與自由的並置稱為“悖論”，也是在粉飾真相。對早期美國白人而言，將他人置於束縛之中與他們的言論或行動自由觀從未產生矛盾：前者支撐了後者。作為紐約最富有的人之一，亞歷山大輕蔑地談論他周圍辛勤勞作的奴隸，稱之為“被寵壞的奴隸之傲慢”。老莫里斯曾警告其子，“黑人”是慣偷，且“既愚蠢又自大”：他們既不配照顧自己，也不配為自己發聲。

在西印度群島生活的每一天，托馬斯·戈登的子女們也都在證明，他們所理解的言論自由是一種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我們只能推測戈登本人會在多大程度上贊同對其作品的這種詮釋。他和特倫查德都從未跨越大西洋。但埃利澤·多布雷（Elizée Dobrée）去了 [注 84]。

1722 年秋，他曾覺得世界就在腳下。就在秘密將《倫敦周刊》所有權轉讓給政府幾天後，多布雷和新婚妻子伊麗莎驕傲地為長女瑪麗舉行了洗禮。多布雷（他在英語中自稱 Elisha）享受著這種接近權力中心的新身份，並利用利潤在倫敦城（City）開設了一家商人銀行——這是他“自幼”接受訓練的家族職業。然而，儘管他法語流利、字跡優美且精通會計，卻並不擅長經商。不久他便破產了。他和妻子被迫搬進廉價公寓，孩子也越來越多。為了東山再起，他曾嘗試推行一個重鑄根西島貨幣的異想天開的計劃，但無濟於事。在他最小的孩子滿兩歲之前，他再也受不了了。他拋下家人，啟程前往美洲。

他在那里可能有一些私人關係，因為他的大家族 [注 85] 從事買賣被俘非洲人的生意。埃奎亞諾在其著名的自傳中提到了他們：他最初被帶往英格蘭時乘坐的就是他們家族擁有的船隻；他的奴役者也認識他們。無論如何，

多布雷前往了大陆奴隶制之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 [注 86]，试图在那里建立贸易业务。但事与愿违 [注 87]。不久，他被迫向南逃往新成立的乔治亚殖民地，那是英国定居点艰苦的边疆。但在抵达萨凡纳（Savannah）几天内，债主便追上了他，他再次被宣告破产。

“我……来到这些美洲地区本希望能改善我的命运，”他后来写道，“但一切终成徒劳。”尽管多布雷构思了无数异想天开的赚钱计划——种植异域作物、出口木材、造船、畜牧、晒盐——但其余生基本上都在靠笔杆子度过。他为他人代写信件和请愿书、翻译文件、核算账目。商人们、律师们和当地行政官在办公室里雇用他担任抄写员和簿记员，或按件计酬。他反复考虑为乔治亚托管人（Trustees）编写一份手写的时事通讯，即每周一次的“事件日志”，并哀求他们雇用他担任职员、会计或其他类似的“笔耕者”——因为他“体力虚弱，当不了锯木工，也干不了任何重体力活”。最终，随着他的致富梦碎，以及再也见不到家人的希望化为泡影，写作技能成了他仅剩的依仗。

无论他如何看待特伦查德和戈登关于言论自由能防止“奴役”的观点，他肯定反思过：他作为书记员的权力和他在“写作上的自由”如何提升了他的地位，不仅使他超越了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更使其凌驾于周围那些被束缚的深肤色族裔之上。查尔斯顿当时有一半的人口是黑人，然而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与其它殖民地一样，禁止“任何黑人或奴隶”在没有主人书面“通行证”（ticket）的情况下移动，并授权“任何白人”可以“殴打、致残、攻击……[甚至]杀死”任何无法出示证件的被奴役者。伪造此类通行证，甚至教导奴隶写字，皆属违法。正如在西印度群岛一样，被奴役者被剥夺了识字权，但他们的生命却可能取决于信件的产生——或伪造。

尽管乔治亚建立之初并未实行奴隶制，以鼓励欧洲贫苦定居者的勤劳，但那里的白人殖民者几乎立即开始抱怨这侵犯了他们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特权”和“天然自由”，使他们比任何“可怜的非裔人”都更像“大奴隶”。经过一场喧嚣的运动，奴隶制于 1750 年合法化。然而，从该殖民地建立伊始，被奴役的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便已在乔治亚随处可见：有的正逃往西班牙属佛罗里达寻找自由；有的是从南卡罗来纳州雇来的；或者是被那些标榜“获取黑人自由”的定居者非法引入的。多布雷个人便依赖于这些强迫劳动。他与奴隶贩子做生意。他在美洲边疆最亲密的同伴之一弗朗西斯·摩尔（Francis Moore），曾在皇家非洲公司工作多年，在黄金海岸购买被奴役者。多布雷与殖民地“最著名的自由持有农”们讨论过为乔治亚白人起草一份要求“拥有黑人”的请愿书。他亲自致信伦敦的托管人，敦促他们批准此事。他批评萨凡纳的总督们对待白人“更像奴隶而非基督徒自由

民”。他是一个软弱、卑躬屈膝、无休止自怜的人，他的妻子伊丽莎拒绝与他团聚，并斥其“古怪”、软弱且不顾将来。但是，正如大多数美洲殖民者的情况一样，种族化的“不自由”支撑起了他自身的自由感和自我价值感。

多布雷晚年生活的另一个讽刺转折是：就在他成功动用媒体的金钱力量对付他人——先是攻击政府，继而卖掉自己的记者——仅十年后，他亲身体验到了媒体的负面影响。他对此并不喜欢。1734年7月，萨凡纳的法警在该地区首份报纸《南卡罗来纳公报》上刊登了多布雷破产的广告。此后数月，多布雷对“在全美传播的《卡罗来纳公报》广告”所造成的“及仍将造成的巨大损害”愤愤不平。他气急败坏地喊道，自己已经毁了：“如此登报毁坏他人的信用和名声，是一种谋杀名誉的野蛮行径，而名誉的丧失是一个人在世上所能遭受的最大损失之一。”

他对新闻纸的覆盖力所言非虚 [注 99]：即便在伦敦，人们也读到了他最新的耻辱。但在美洲边疆度过的那些孤独的早年月份里，当他翻开每周出版的《公报》（*Gazette*）时，他除了能看到断断续续关于自己破产的公示，还会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提醒——提醒他那由他亲手推向世界的、全新的言论自由理想，以及这种关于自由与奴役的观念在美洲正呈现出鲜明的种族化形态。就在他抵达查尔斯顿之际，《公报》重新创刊，其首篇便摘要刊登了加图关于言论自由的第一封信 [注 100]。由于《纽约周刊》在南方亦有流通，因此在整个 1734 年间，多布雷极有可能也关注了该报对加图观点异乎寻常的捍卫。即便没有，就在他抱怨自己出现在《公报》专栏中 [注 101] 几天后，他也一定能从中读到关于泽格尔及其报纸的遭遇。在同期报纸的另一页上，赫然印着关于一场奴隶起义的报道、一份大型奴隶种植园的广告，以及另一则悬赏寻回逃亡黑奴的启事，那人名叫“加图”——在英属殖民地，这正是奴隶最常被赐予的名字。次年，当《公报》再版伦敦版加图关于言论自由的首篇论文，歌颂其为公共自由的基石及“每个人的权利，只要他不以此伤害或控制他人的权利”时，下一页便刊登了往常那类载满“精选黑奴”的船货广告，以及寻找名为“芙洛拉”、“桑丘”和“桑普森”的非洲“逃奴”的启事——在白人眼中，这些男女的言论是如此不自由，以至于连他们自己的名字都被剥夺了。

我能找到的多布雷最后的踪迹是：1750 年初，他为一位名叫艾菲·克劳福德（Affy Crawford）的纽约酒馆老板娘代笔、见证并证明了遗嘱 [注 102]。这暗示他可能也认识她刚去世不久的丈夫休。十年前，休作为一名纽约警官，曾积极参与了该市殖民历史上最血腥的种族事件 [注 103]。1741 年春天，在经历了连续几周的一系列火灾后，曼哈顿的殖民者担心奴隶们正谋划起义。在随后的调查中，除了几名嫌疑白人外，超过两百名被奴役及自

由黑人男女被卷入其中。大批人受审；三十名黑人被处以绞刑或火刑；另有八十四人被卖往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陷入生不如死的境地。受审者中包括四名取名为“加图”的男子。其中三人被处决；一人靠谎言骗取了赦免。

为了告诫读者警惕黑人的“诡计多端、难以理解的黑话”[注 104]以及根深蒂固的欺诈性，该市的首席检察官印发了近二十名被迫作证的奴隶那带着镣铐的口供。其中一名叫索尼（或称桑迪）的少年最初拒绝提供任何信息，即便在白人陪审员“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说”[注 105]之后。他们告诉他，如果他说出真相，总督会赦免他……保住他的性命——对此他回答道：“上次[即更早的一次起义]之后，黑人说出了他们知道的一切，然后白人就把他们吊死了。”那是 1712 年的事，当时桑迪尚未出生：他一定是由于长辈的教导才记住了这一教训。黑人们深知，在白人的正义[注 106]面前，无论是真话、谎言还是沉默，都不一定能拯救他们。此时多布雷正身处纽约，在海关、财政部、海军部、秘书处等各个政府部门担任缮写员。因此，他几乎肯定经历了这一事件，目睹了处决现场，并认识那些暴力维护“白人自由”的参与者。

事实上，在近二十年间横跨东海岸寻找工作的历程中——从纽约一直到英国领土最南端的前哨弗雷德里卡——多布雷像“变色龙齐利格”一般与各色卓越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乔治亚的创始人詹姆斯·奥格尔索普（曾多年雇用他担任私人缮写员）；费城卓越的知识分子、宾夕法尼亚秘书理查德·彼得斯；以及卫理公会的创立者约翰·卫斯理（多布雷的虔诚曾给其留下深刻印象）。但迄今为止，他最长久的交集，或许也是他一生中最持久的一份工作，正是为詹姆斯·亚历山大效力——此人既是加图哲学在美洲最重要的倡导者、《纽约周刊》关于言论自由与政治权利之煽动性诉求的幕后策划者，同时也是一名富有且心安理得的奴隶制度践行者。

当他们初次相识时，亚历山大作为纽约最顶尖的律师之一，正协助主导 1741 至 1742 年间的奴隶审判[注 107]与处决。在此后的至少八九年间，他与多布雷[注 108]保持着断断续续的会面，代为向其身在英格兰的妻子寄钱，并支付优渥的酬劳让他为自己及同僚抄写数千页敏感的法律文件。此时，新泽西已成为亚历山大法律与政治生活的核心：他的好友老刘易斯·莫里斯——过去十年反科斯比运动的另一位领袖——现已担任该殖民地的总督。亚历山大无疑非常赏识多布雷作为缮写员的技艺；在那些年代幸存下来的殖民地档案中，定然仍散布着无数出自他手、字迹清晰且华丽的匿名文献——包括抄写的信件、商业账目和法律纪要。然而，很难想象这是他长期资助此人的唯一原因。亚历山大必然同样看重多布雷曾作为《伦敦周刊》所有者的身份——他是《加图来信》背后那位隐姓埋名的第三位创造者。正是那些理

想曾给予亚历山大深刻的启发，而亚历山大本人亦不遗余力地在那些享有自由、皮肤白皙、阅读报纸且拥有奴隶的美国同胞中普及这些思想。

自由与言论

1739 年秋，南卡罗来纳州的一群非洲奴隶发动了北美大陆英属殖民者从未见过的最无畏的自由抗争。随着英西战争的爆发，多达百名的奴隶逃离种植园，夺取了武器弹药，试图向南穿过乔治亚州逃往佛罗里达以寻求自由。在被搜捕并处决之前，他们杀死了约 25 名白人定居者，并令数千人陷入恐慌。1741 年纽约人对奴隶密谋如此惶恐不安，原因之一便是由于他们知晓几个月前在查尔斯顿附近的斯托诺（Stono）所发生的一切 [注 109]。

关于这一事件，我们所知的大部分信息都源自一份写于乔治亚州萨凡纳、长达七页的详尽文件，起草时间就在起义发生后不久。若无此文本，起义军领袖杰米（Jemmy）的名字将湮没于历史，那些不可磨灭的画面也将无从知晓：他们的队伍在黎明时分行进，“旗帜招展，鼓声雷动”，新成员在途中奔跑加入，所有人齐声“高喊着自由”——自由！自由！其他的当代记录 [注 110] 揭示了白人报复行动的残酷：数十名起义者被枪杀、绞死或活活处以铁笼刑（即缚于柱上活活饿死）；一些种植园主“砍下他们的头颅，悬挂在经过的每一个里程碑上”。

然而，多布雷起草的这份特定叙述却是为了游说英格兰的公众舆论：它被专门寄往伦敦，以便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中强调，虽然起义者被“当场击毙”，但这实际上“归功于卡罗来纳种植园主们的尊荣……[他们]没有折磨任何一个黑人，只是让他们从容就义”。文中顺带提及，这些“黑奴”是从非洲“运来”的，且可能同为基督徒；但真正重要的是殖民者所展现出的“人道精神”。即便在为了镇压反抗奴役的同类而大开杀戒时，白人的优越感依然熠熠生辉。这份文件正是出自埃利泽·多布雷之手 [注 111]。

被奴役的起义者本身没有报纸，没有笔，也没有纸。他们的言论早已消散在后世的尘烟中——除了他们在短暂的自由时刻里共同吟唱的那个令人振奋的单词：“自由！”他们生活在一个崇尚言论、书写和出版自由的社会，但这种自由主要被视为自由、白人、男性、拥有财产的公民身份的标志。作为其首个且最具影响力的模式，《加图来信》自觉地给予某些类型的言说者和某些形式的言论以特权，而非其他。尽管它使用的是普世主义的语言，但这种自由在性别和种族上的形态早已隐含在特伦查德和戈登的文本及其创造者的生活中。当这些理想跨越大西洋移植时，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变得更加种族化。早期报纸的制造者和消费者赞美它们推进了无拘无束的言论，现代

历史学家亦然；但它们同时也是奴隶制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强力工具。除了为奴隶贸易提供便利、并在专栏中不断强化非白人低人一等的观念外，报纸的另一项用途是刊登广告以协助重新抓捕逃奴——这一功能并非由殖民地印刷商首创，而是早已由17世纪的英国报纸所开拓 [注112]。报纸从来不是中立或普世的民意管道。同样，诸如言论自由等抽象价值观在跨越时空时所呈现的形态，也始终是政治化的。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是建立在对他人的噤声之上的。

然而，这也意味着此类术语的含义从未尘埃落定。它们可以被挪用、被延展，或者被忽略。主张言论自由理想需要持久的教化工作，因为那些挑战其预设的人——仆人、女性、非白人、奴隶——一直在行使能动性，秘密或公开地拿起自己的声音和笔杆子进行反抗。查尔斯顿的奴隶主约书亚·伊登（Joshua Eden）对其黑奴利马斯（Limus）的出逃感到义愤填膺，因为利马斯带着他那“傲慢无礼的口条……竟胆敢告诉我：他将获得自由，他将不服侍任何人，他也绝不会被任何人征服或统治” [注113]。

“奴役抹杀一切天赋，”《加图来信》曾轻蔑地断言，“在戴着镣铐的手中，无论是笔还是画笔都毫无用处。” [注114] 这是属于自由民的修辞，但并非事实。不自由者永远无法被永久噤声，而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在斯托诺起义幸存奴隶流传下来的口头传统中，起义领袖是一名称做“加图”的奴隶——他识字且会书写。早在起义爆发前，他便利用这种能力为“奴隶伪造通行证，并竭尽所能将他们送往自由之地”。 [注115]

弗朗西斯·威廉姆斯最得意的门生布朗也曾这样做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1729年初夏，在纽约拥有首份报纸几年后，詹姆斯·亚历山大在其专栏刊登了一则广告。当时他三十岁出头，已是一位权势显赫的政客，是七个子女及继子女的父亲，拥有宏伟的宅邸、辽阔的地产以及许多其他的人类个体。令他深感恼火的是，其中一人——一名与他同龄、被他形容为“聪明狡黠之辈” [注116]、名叫雅夫（Yaff） [注117] 的美国黑人，竟然胆敢逃跑。这名黑人是他近期才购得的。亚历山大悬赏重金缉捕他。他的这名家奴大约在6月9日左右潜逃，广告连续刊登了数周，直至7月底——这或许意味着雅夫成功保持了自由身。

雅夫识字：他很可能为自己伪造了通行证以便脱身。他穿着仆役制服——或许曾是亚历山大的管家。无人知晓他是否有机会翻阅过亚历山大那堪称纽约之冠的藏书，或者是否曾随手翻开过其中珍藏的《加图来信》。但这并不重要。他理解言辞的力量，也理解书写的力量。他在一生中已被转卖过两次。他深知自由的真谛，深知白人掌控着自由的形态——而他拒绝让白人如愿。

启蒙的实验

世界上首部明确维护表达自由的法律并非诞生于英国、荷兰、法国或美国，而是诞生于遥远的北欧。1766年12月，瑞典国王批准了一项具有革命意义的法令——《关于书写与出版自由》（*Relating to Freedom of Writing and of the Press*）。该法令在开篇便响亮地肯定了“合法的书写与出版自由为公众带来的巨大裨益”[注1]：

在各种有益学科中进行不受限制的相互启蒙，不仅能促进科学与实用技艺的发展与传播，还为每一位忠诚的臣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增进对贤明有序之政府体系的了解与鉴赏；同时，当滥权与违法行为通过出版物向公众披露时，这种自由亦应被视为改良道德和促进守法意识的最佳手段之一。

不久之后，丹麦-挪威的新王储也起而效之。瑞典当时是敌对国，因此在18世纪70年代，无论是这位王储还是丹麦其他关于出版自由的讨论，即便曾受其影响，也从未提及瑞典的先例[注2]。1770年9月的一份丹麦公告宣布：“我们已决定在我们的王国及领土内普遍准许无限的出版自由”[注3]。因为：

我们深信，当那些热忱于共同利益及同胞真实福祉的正直爱国者，因法令、成见或对他人的尊崇，而被恐吓并阻碍其根据其洞察力、良知和信念去自由书写、抨击弊政及揭露偏见时，这对于公正地寻求真理，以及发现陈腐的错误与偏见，都同样有害。

这种北欧国家对自由表达的突然拥抱尤其令人瞩目，因为这些文化此前对批判性言论一直维持着高度压制。与英国、荷兰共和国和北美不同，北欧诸国印刷所寥寥，审查制度严苛，实行威权统治，且几乎不存在任何政治新闻业。此前在瑞典法律中[注4]，仅仅写下对宪法的任何批评（即便是在私人信件中且从未示人）即构成犯罪。而在丹麦和挪威的法典下[注5]，任何人若撰写或张贴“针对任何享有声望之士的匿名诽谤信或侮辱性文件”，将面临终身监禁并加处苦役，甚至会被处死。

那么，这两个看似最不可能的国家，是如何成为实现表达自由法治化的先驱的？这对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的叙事又是如何嵌入全球言论自由史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考察，到18世纪中叶，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不再仅仅将表达自由和出版自由视为政治与宗教理想，而是将其视作增进知识、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工具。

斯堪的纳维亚言论自由法的创制者们共有几种基本预设。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讨论自由能促进真理与学术。这早已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学术准则。自中世纪以来，欧洲的大学与亚洲、非洲的同行一样，都通过举行阶段性的口头辩论 [注 6] 来研究争议性课题。在这种受到严格控制的场域中——使用拉丁语、在大学围墙内、在正统教授的指导下且仅依靠理性论证——处理并破除危险思想，其目的在于使师生对谬误产生“免疫力”，并促进正确的理解。统治者通常还会赋予大学和科学院特殊的职责，负责对神学、哲学和科学文本进行审查与出版。

“哲学思考之自由” (*libertas philosophandi*) 这一学术理想，还延伸到了通过印刷与书写进行的国际知识交流。15 世纪，欧洲的人文学者为其跨国学术共同体创造了“文人共和国” (*republic of letters*) [注 7] 一词。到 1700 年，这已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并因其对表达自由的平权承诺而备受推崇。例如，伟大的法国哲学家皮埃尔·贝尔 (Pierre Bayle) 在 1697 年对其进行了如下描述。贝尔本人对审查制度深有体会——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流亡中度过，因其祖国迫害像他这样的新教徒而被迫背井离乡。他动情地写道，文坛共和国绝非现实世界那般。在现实中，各地统治者掌控着言论的禁忌，而相比之下，文坛共和国：

是一个极其自由的国家 [注 8]。唯一被承认的主权是真理与理性：在它们的支持下，可以清白地向任何人宣战……针对谬误与无知，每个人都有拿起武器的权利，且行使此权利无需征得统治者的许可。

换言之，早期的学术言论自由理论家将其定义为一个超越政府控制的独立领域。贝尔敦促道，严肃的学术辩论应免受监管，因为它是无害的。“向公众指出书中存在的错误”从不会伤及任何人。这与发布有害的“诽谤”或“讽刺”截然不同：即便学者从事此类行为也应受罚，“因为讽刺剥夺了一个人的名誉，这无异于一种公民人格上的谋杀”。正统的学术研究或真诚的宗教思辨是一回事，诽谤或煽动则是另一回事。

即便是在 17 世纪对“哲学思考之自由”论述最激进的理论家巴鲁赫·斯宾诺莎 (Baruch Spinoza)，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解释说，哲学思辨的自由“对于科学与自由艺术的进步绝对必要” [注 9]，但任何人的言行都不应违反“当局的法律”，也不应宣扬煽动性学说：“对国家的忠诚至高无上。”这也是一个世纪后极具影响力的普鲁士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所持的观点。他论证道，理性的公众辩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都是自由的，唯有它能带来启蒙” [注 10]——然而，这种智识自由与

“较低程度的公民自由”是完全相容的。康德在向他那博学但专制的君主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投诚时，将推理自由与政治煽动区分开来。他认为，“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即便是学者“也必须表现出被动性，以便政府能够引导他们……在这里，绝不允许争辩，而必须服从”。

然而，以这种方式为学术言论自由辩护始终面临着一个长期的困境：即无害的学术研究与危险的颠覆活动之间的界限，本质上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贝尔、斯宾诺莎和康德都将捍卫学术思辨自由作为其抨击宗教迷信、“教权诡计” (priestcraft) 和不宽容立场的一部分——然而对于全欧洲的天主教徒和正统新教徒而言，此类批判无论多么博学或表达得多么得体，都具有极大的威胁性。贝尔的作品被广泛列为禁书。斯宾诺莎因传授“可憎的异端邪说”被阿姆斯特丹犹太社群驱逐；他的著作在全欧洲遭到禁止，只能秘密印刷。

早期最杰出的学术自由理论家本身就是极具争议的作家，这并非偶然；宗教言论自由与学术言论自由的论据极其相似亦非巧合。由于宗教问题既是学术研究的核心，又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性，博学领域的言论自由绝非一个超然于政治之外的领地。相反，试图将其归类为超然领地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声明。正如所有关于言论自由的定义一样，这些定义本质上都是作者在主张其自身的观点应免受约束。

即便是在欧洲宗教最宽容的国家（如英格兰和荷兰共和国），激进的学术与宗教思辨也并非毫无风险。那些看似鼓励无神论、政治不满、抗命不从或性放荡的著作仍可能被禁止 [注 11]，其作者和出版商会受到惩罚，职业生涯亦会毁于一旦。在其他地区，更严苛的审查制度依然存在——尽管为了规避地方管控，一些长期的惯例也在延续，例如在甲地印刷书籍运往乙地销售、对外国语文本采用不同标准，以及仅以手稿形式传阅最具争议的材料。在任何地方，印刷品的面世都是作者、印刷商、审查员、神职人员与世俗政府之间不断博弈的过程——这不仅关乎特定的文本，更关乎如何最有效地引导印刷机的力量走向积极而非破坏性的终局。

随着宗教和/或学术言论自由的原则在不同程度上被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所接受，这种观念也日益渗透到他们对更广泛公共讨论的态度中。即便是在宗教裁判所的核心地带，希望阅读特定禁书的博学读者也可以获得官方许可 [注 12]；到 18 世纪中叶，意大利各邦的世俗权力机构 [注 13] 也在不断以比传统神职人员更宽容的条款来定义出版自由。学术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大众化 [注 14]。贝尔最畅销的作品均非以拉丁语而是以法语出版，随后被译成英语。由他在 1684 年创办的流行刊物《文人共和国新闻》 (*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等新型学术期刊，让即便是非专业人士也能

通过英语、德语、荷兰语、意大利语或法语，及时了解最新的科学动态、书评和辩论。

正如法国启蒙思想的丰碑——《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编纂者们在 1753 年所言：“我们认为，文人共和国的民主必须延伸到每一个主题，甚至应允许和容忍最恶劣的批评，只要这些批评不涉及人身攻击。”

[注 15] 公开的公共辩论将消除谬误并为生活每一个领域（道德、农业、宗教、贸易、教育、政府）带来启蒙——这一简单的命题对于进步的基督徒极具吸引力。他们相信，正是类似的理性、自由探究的精神已经减少了宗教迷信，并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科学意义上的认知。这种进步的强大引擎正是印刷机，因此，将其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 [注 16]，便成为了人类进步的根本前提。

传播启蒙

这种“出版自由”在实践中究竟呈现何种面貌？尽管 18 世纪后期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并未专门论述这一问题，但他关于人性、社会发展及人民“公意”（*general will*）的思想，深刻塑造了相关的国际讨论。以法国流行作家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为例，他在多部虽被列为禁书却极为畅销的作品中借鉴了这些思想，构思了一个启蒙后的未来。

梅西耶告诫读者，在当下，真理正受到专制、独裁与迷信的扼杀 [注 17]。审查制度保护腐败的统治者免于遭受民众的愤怒，而无畏的“哲学校作家”凭借揭露非正义的敏锐能力，本可以让这些统治者无所遁形。然而，启蒙思想正随处将“欧洲从沉睡中唤醒” [注 18]——不久之后，社会、法律与政治都将受“理性的纯净之光” [注 19] 所引导。在梅西耶设想的乌托邦年份 2440 年 [注 20]，18 世纪的哲学家们已被奉为先知，正是他们的著作激励了人民推翻压迫，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理性社会。

25 世纪的公民已经销毁了大部分来自过去的文献，因为那些书籍充斥着危险的谬误——“没有什么比坏书更令思想误入歧途的了” [注 21]。但他们同时歌颂出版自由，将其视为“衡量人民自由的真实尺度” [注 22]。因为他们的政府是公正的，所以不惧任何批评；又因为人民是理性的，所以“极少有荒诞的作品被出版” [注 23]。事实上，由于客观的“公众舆论” [注 24] 是评判恶行与美德的最佳裁判，它会自动排斥任何可能包含“与健全道德不符的危险原则”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之声是唯一的裁判；且人们仅对该声音予以尊崇”。任何“坏书”的作者都被要求戴上“面

具以隐藏其羞耻，直到他通过撰写一些更理性且有益于社会的文字来洗刷污名”。与此同时，每天会有两位德高望重的公民造访他两次，用理性说服他认识自己的错误。所有这些参与者均为男性：在完美的未来，女性只能是妻子和家务管理者，绝非作家或公民。

这种充满热情的愿景预设了：解放印刷机将创建一个启蒙后的公众群体，他们在理解真理和拒绝谬误上高度统一。正如卢梭所断言的，在一个构建合理的社会中，“共同利益是如此显而易见，只需常识便能洞察”[注 25]——公意是“永恒、不腐且纯粹的”。

然而在现实中，传播启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工程。对于大多数保守派思想家、统治者和神职人员而言，质疑一切既有权威并基于自由公共辩论重构社会的想法依然令人厌恶。即便是在自觉具备启蒙精神的思想家之间，其态度也大相径庭（这种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启蒙运动”在本质上从未是一个单一的工程，而是由许多思想流派和模式组成的）。尽管卢梭本人一直在与审查制度[注 26]和焚书行为作斗争，但他仍支持政府监管思想传播的权利、作家遵守现有法律的义务以及人民接受正确教育的必要性。公意并不等同于多数人的意见；过多的分歧和公共辩论也并非好事，如果它们会导致分裂或谬误的话。他论证道，表达自由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取决于其后果。像他自己撰写的那些推进共同利益的负责任书籍理应受到保护，但诽谤、辱骂，以及任何淫秽、颠覆性或具有“危险性”的作品则不在此列。

出版物与公众

在这些纷繁的辩论中，到 18 世纪中叶，关于印刷、自由与政治的关系已演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英国与美国的反对派作家（以及许多法国作家）将重点放在出版物监督统治者的功能上——到 1800 年，一些英国评论家已将其称为传统的神职、贵族、平民三大“等级”之外的新型“第四等级”[注 27]。相比之下，英语世界的保守派[注 28]则更倾向于抱怨庸俗新闻与廉价印刷品正在贬低政治并破坏社会秩序。然而，他们也无一例外地歌颂免受政府控制的“出版自由”，并将其视为宪政的核心特征。正如深具影响力的牛津大学教授、法官兼议员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在他 1769 年那部影响巨大的阐释中所言，出版自由的本质仅仅在于不存在“事前的约束”[注 29]——即不存在出版前的审查制度。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许多出版自由的倡导者都受到了此类态度的启发。但他们的观念也深受天主教欧洲、拉丁美洲以及德意志和东欧世界主导思想的影响。在这些地区，出版自由并非一项基本权利，而

是政府的一种工具。它应当被用于教育民众和推动国家现代化，但绝不允许破坏社会或政治的稳定。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某些政治或宗教议题若缺乏妥当引导，讨论起来便过于危险；唯有受过教育的阶层才配被赋予更大的自由；而统治者应当保留对公共辩论边界的终极控制权。在这种观点下，出版自由与某种形式的事前约束是完全相容的。

例如，每当意大利知识分子赞美“出版自由”[注 30] 或“思考与书写的自由”时，他们脑海中从未想过要废除审查，而仅仅是想将其从神职人员手中转交给开明的世俗力量。哲学家卡洛·安东尼奥·皮拉蒂（Carlo Antonio Pilati）的畅销论著《论改革意大利，或改革意大利最恶劣习俗与最有害法律之路径》（1767 年）便体现了这一立场。他解释道：“书籍可以造福，亦可为害甚巨。”[注 31] 让“好书”广泛流通并禁止包含“无法容忍之错误”的书籍出版的最佳方式，是由公正、开明的国家审查员审阅所有文稿。到 18 世纪中叶，在欧洲各地，担任官方审查员[注 32] 的男性（同样，始终是男性）本身通常就是同情启蒙事业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与作者进行协作和协商来修改文本，并认为自己的角色主要是建设性的，而非惩罚性的。

这种出版自由观同样吸引了那些既渴望国家现代化、又不愿放弃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注 33]——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德裔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以及她曾经的情人、亲英派波兰-立陶宛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在这些疆域内，随着统治者的更迭、观念的转变或对政治局势的回应，审查政策频繁波动。然而，其法律规章的措辞常将其描述为出版“自由”，当代观察家亦然。伏尔泰在 1768 年写道，文墨之自由（The liberty of the pen）“在英格兰正如在波兰一样确立”[注 34]，仿佛两国的局势具有本质上的可比性。

此类政权最著名的范例当属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注 35]。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1740 - 1786 年），他将自己塑造成欧陆最开明的哲人王子——他与顶级知识分子通信，庇护有争议的作家，并鼓励学术辩论。1775 年，一位苏格兰访客注意到：“1775 年我初抵柏林时[注 36]，最令我惊讶的莫过于许多人谈论政府措施与国王行径时的那种自由……同样的自由也出现在书店里，各类文学作品都在公开售卖。”但这始终只是建立在统治者条款之上的自由。伟大的剧作家、哲学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 1769 年离开普鲁士前往更为自由的大都市汉堡后不久，便向朋友抱怨道：“别跟我提你们柏林的思考和表达自由”[注 37]：

它仅仅包含了随心所欲嘲讽宗教的自由……但只要有人在柏林站出来，为那些希望发声抗议剥削与专制的臣民权利辩护——一如在法国和丹麦已经

发生的那样：届时你很快就会体验到，哪一个民族才是当今欧洲受奴役最深的。

由于德意志分裂为无数个拥有各自法律与审查体系的小公国，与德语、法语和英语世界相比，其统一的公共辩论领域的形成较为缓慢 [注 38]。直到 18 世纪 70 年代，德意志关于出版自由的讨论仍主要局限于学者之间，并受其领袖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 (Christian Wolff) 观点的主导 [注 39]。

沃尔夫 (Wolff) 自视为无畏理性主义的伟大捍卫者。他认为，行使理性是通往确定真理的唯一可靠路径。1723 年，他因赞美非基督徒的道德能力而令哈雷大学 (Halle University) 中更为正统的同事大为震惊，随后被剥夺了教授职位，并在死亡威胁下被逐出普鲁士。直到 1740 年腓特烈大帝继位后，他才被准许回归。尽管有此遭遇，他关于言论与出版自由的观点依然相当传统。他反复强调，“哲学思考之自由” (*Libertas philosophandi*) 是一个受限的领域，应当避开政治问题；此外，学者享有的自由不应延伸至普通大众。政府审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普通民众尚不够理性，无法托付其自行做出判断。

大多数后来的德意志理论家 [注 40] 均对此表示赞同。即便是在 1787 年将出版自由捍卫为一种“人权” [注 41] 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巴尔特 (Karl Friedrich Bahrdt)，也将界限划定在揭露“非公开且不应公开的事物”上。他强调，统治者与部长的秘密运作“必须绝对排除在出版自由的领域之外。因为如果作家开始涉足此类事务并在公众面前议论，这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并损害君主在国外的威望”。康德的言论自由观（“它绝不能超越对现有宪制的尊重与忠诚之界限”）[注 42] 正是产生于这一智识传统。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少数年轻的德意志思想家——如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 [注 43]——曾一度倾心于一种更为民粹、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观。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言论自由永远不能凌驾于对国家的服从之上。

这是因为德意志的出版自由理论家不仅是绝对君主的臣民，通常还是他们的雇员。作为由开明学者兼行政官员组成的微小精英阶层的一员，他们协助管理着阅读公众有限、规模相对较小且保守的国家；他们的辩论背景及其自身的社会与政治地位，与 18 世纪后期大多数法语或英语作家截然不同。后者更容易接触到规模宏大且易受影响的受众，并且经常为了攻击时政、提升公众形象、嘲弄智识对手或从出版物销售中获利而捍卫出版自由。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与禁忌，但 18 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都共有着一种可以被称为“启蒙下渗论” (trickle-down theory) [注 44]

的普遍信念。也就是说，如果开明的统治者与知识分子指明道路，其他人就会跟进，整个社会也将逐渐改良。亚当·斯密（Adam Smith）观察到，唯有缺乏教育才会产生“在文明社会中似乎经常使所有下层民众理解力变得迟钝的极度无知与愚蠢”[注 45]，“他们受到的教育越多，就越不容易陷入狂热与迷信的错觉”。年轻的普鲁士律师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迪茨（Heinrich Friedrich Dietz）在其 1781 年的《宽容与出版自由辩护录》中对此表示赞同：“学会读写使我们超越了乌合之众（rabble）”[注 46]，“因此，受过教育的心灵有重大责任将自己的洞察与知识传达给他人，并借此寻求增加国家中明智与幸福者的人数，减少庞大的暴民群体（mob）。”

医嘱

1766 至 1770 年间的北欧言论自由法，是国际上日益高涨的将印刷机视为社会进步引擎之思潮的直接产物。制定这些法律的政治家均为作家和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曾在德国大学接受教育，或受到其在别国（尤其是英国）生活与工作经历的启发。

丹麦-挪威当时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在理论上，其统治者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 VII）可以单方面决定一切。但在实践中，他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刚登基不久且对治理国家几乎毫无兴趣的年轻人。真正推动 1770 年那道革命性出版法令出台的，是国王那位精力充沛的新任德国私人医生、事实上的首席大臣——同时也是英国出身的王后卡洛琳·玛蒂尔达（Caroline Matilda）的秘密情人——约翰·弗里德里希·施特伦泽[注 47]。

法令实施时，国王二十一岁，王后十九岁，而施特伦泽本人也只有三十三岁。但他当时已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公共知识分子，拥有为了启蒙事业而对抗审查制度的经验。他的父亲亚当（Adam）是一位卓越的新教牧师、作家兼大学教授。施特伦泽在致力于智识与宗教宽容的环境中长大；到成年早期，他在私下里已将基督教蔑视为一团荒谬的欺诈。青少年时期，他在哈雷大学（Halle）学习医学，那里是沃尔夫领导下的德国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思想中心——他也听过沃尔夫的讲座。1757 年毕业后，他在紧邻汉堡的丹麦第二大城市阿尔托纳（Altona）担任公职医生。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施特伦泽在维持繁忙且创新的医疗实践之余，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地的知识生活中。他博览数种语言的群书，定期为学术和文学杂志撰稿，与该地区领先（且往往持有异端见解）的作家和学者结为好友。他与他们并肩作战，对抗汉堡和阿尔托纳两地不同审查体制下的波折，甚至

创办了两份属于自己的期刊——《实用与娱乐月刊》及《促进科学、艺术、品味与道德阿尔托纳月刊》。两份刊物都旨在打击迷信、传播启蒙，但很快都被当地审查官勒令停刊。1764年，施特伦泽请求丹麦首席大臣伯恩斯托夫伯爵（Count Bernstorff）评判他的努力究竟是“对公众有害还是有益”[注48]，并请求在没有此类监管的情况下获准出版——因为他论证道，“一种被构想为纠偏、并被用来剥夺我本该拥有的身为作家的自由之审查制度，不仅会侮辱我的名誉，还会阻碍事物本身”——即阻碍公共利益。

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出版与审查的结合，正如猎犬与其主人用以惩戒的棍棒一样自然。”这是一个痛苦的插曲，但并未阻止他继续发表关于“启蒙的全能教育力量”的见解。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施特伦泽翻译了伏尔泰的作品，经营贵族人脉，并最终引起了哥本哈根宫廷的注意——他那同样思想自由的祖父曾是前任国王的医生。1768年，那位日益精神不稳定的、同样崇拜伏尔泰的少年君主路过阿尔托纳，聘请施特伦泽为御医，随同其对德国、荷兰、英国和法国进行了漫长的访问。在伦敦，这位年轻医生见到了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等英国作家；在巴黎，他会晤了达朗贝尔（d’Alembert）和爱尔维修（Helvetius）等杰出的哲学家；在牛津和剑桥，他被授予名誉学位。到1769年抵达哥本哈根时[注49]，他已形成了高度成熟的出版自由观，并且（令伯恩斯托夫恼火的是）与国王及权力中枢的关系日益亲密。

一旦掌握权力，施特伦泽便着手解放出版。1770年秋，他劝说克里斯蒂安七世罢免了伯恩斯托夫，废除了枢密院，实质上将一切权力集于自身。他颁布的首项政令便是9月14日的公告，宣布即刻起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审查制度，取而代之以“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以此为契机，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旨在根据启蒙原则彻底改造丹麦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接下来的十六个月里，施特伦泽以惊人的效率发布了1800多项法令[注50]——包括限制农奴制、废除酷刑、约束丹麦殖民地对被奴役者的虐待、禁止学校体罚、增强宗教宽容、取消等级特权、重组法院与政府、使刑法理性化，并制定了数百项关于教育、财政、社会、军事、医疗、经济和农业的改革。

因此，丹麦-挪威1770年的出版令被视作一场更宏大的政府启蒙计划的基石。其措辞也阐明了像施特伦泽这样典型的18世纪中叶欧洲知识分子看待出版自由的直接方式：审查阻碍进步；解放印刷机即是解放人类精神，使其在各个战线上齐头并进。施特伦泽从未学会丹麦语，因此他可能并不知道近几十年间当地思想家如廷斯·谢尔德鲁普·斯尼多夫（Jens Schelderup Sneedorff）和P. F. 苏姆（P. F. Suhm）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注51]。但无论如何，他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有多复杂。整项立法指令仅由一个手写句子

组成，占据不到半页纸的篇幅；而此前几天，国王本人在与施特伦泽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草拟的、启发了该指令的皇家备忘录则更为简短：“第3. 向各办公厅下达另一项命令：给予出版社不受限制的许可，准其在无需任何审查的情况下印制书籍。”[注52] 当一名长期苦于审查制度的进步作家和科学人士赫然发现自己置身于绝对权力的巅峰时，这便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亲英派改革者

瑞典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其于1766年通过的开创性表达自由法律，是一部篇幅更长、内容更为复杂的文本：它并非出自某人的草率命令，而是一部议会法案。该法案的通过，是当地政界与知识界关于出版自由长达数十年[注53]的提案、咨询与辩论的顶点。

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瑞典（直到1809年之前，其疆域一直包括今天的芬兰），1719至1720年的宪制革命已将所有权力交给了议会（Riksdag）。该议会由国家四个“等级”的代表组成：贵族、神职人员、市民和农民。议会按规定每三年集会一次；在休会期间，国家由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治理。君主仅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当某位国王拒绝签署委员会的指令时，他们干脆制作了一个带有其签名的“橡皮图章”[注54]来代替。协助委员会工作的是各大政府部门的常设行政委员会。其中，办公厅委员会（Kanslikollegium）全面负责审查事务[注55]。对宗教文献的日常审核由国教中受信任的牧师执行；学术著作由大学教授审核；世俗文本则由斯德哥尔摩的一个专门政府部门负责，由首席审查官领导。无论是以手稿还是印刷品形式，书面批评宪法或政府均被禁止。正如1752年一份官方的《关于虚假与错误观念之备忘录》所解释的那样，“无知胜过错误观念”[注56]，且“认为各等级代表（议会）可能犯错的想法，是违背国家基本法的”。

尽管存在这种威权体系，我们仍可将瑞典出版自由思想的起源追溯至18世纪初。早期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卡尔·吉伦博格伯爵（Count Carl Gyllenborg）[注57]，他出身名门，才华横溢，成年后的性格塑造期是在瑞典驻英使馆担任秘书、常驻代表及公使中度过的。在1703年至1717年的近十五年间，他居住在伦敦，沉浸于那里活跃的印刷新闻文化、党派政治阴谋和讨论自由之中；他曾匿名发表政治小册子，并培养了终身的亲英倾向。他不仅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娶了一位英国女性，还极为推崇英国戏剧，亲自翻译并创作剧本，还与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等顶尖作家、知识分子及政治论战家交好。

1722 年回到斯德哥尔摩后，吉伦博格在办公厅委员会主持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注 58]。博学者伊曼纽尔·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在前一个十年也曾在伦敦生活过几年，他最近获准印刷了一本关于瑞典经济危机的小册子。现在，他希望获准在首都新创办的半官方周报《斯德哥尔摩邮报》

（*Stockholmske Post-Tidener*）上刊登广告，征求读者对该议题的反馈。委员会认定这是不被允许的。正如前任首席审查官所解释的那样，由“私人个体在涉及如此普遍重要性的事务上发表见解”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代理首席审查官约翰·罗森阿德勒（Johan Rosenadler）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在关乎“从乞丐到富人”每个人的事务上，允许公众发表意见将有助于下一届议会制定政策。吉伦博格对此表示赞同，称这正是英国的做法，其实质论点与几个月前特伦查德和戈登在《加图来信》中阐述的观点如出一辙：“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不应阻止任何人对关乎所有人的事务进行公开讨论，尤其是真理由此得以显现，且每个人都能对问题的本质有更清晰的认知。”

吉伦博格最终将他在英国学到的许多手段与策略引入了瑞典政治。在成为一个政治派系的领袖后，他逐渐将其塑造成一个有组织的政党，拥有自己的代理人、党鞭、纪律机制和宣传手段。在 1738 年选举期间，他管理着一个受雇作家团队，大批量炮制秘密的手稿小册子，嘲讽其政敌是昏昏欲睡的“睡帽派”（Night-Caps）。从此，这些人便被称为“帽党”（Caps）；而他自己的政党自称为“帽林党”（Hats，即礼帽派），并逐渐巩固了权力。在 1739 年议会接近尾声时，吉伦博格年幼的侄子海宁（Henning）显然传达了其叔父长期持有的观点，适时向议友们提议：

每一位公民在不受约束或监管的情况下，皆可将其思想提交给公众自由裁量；这能驱散一个国家的野蛮黑暗，鼓励文化作家之间的竞争，真理通过他们日益显现，并有助于一个自由的民族认清自身，认清其优势与弱点。

[注 59]

当然，他也承认，任何滥用权力攻击政府、宗教或公序良俗的出版物仍将受到惩罚；但或许，现在是时候减轻甚至废除事前审查了。

这也是这一时期另一位瑞典著名知识分子安德斯·巴赫曼松（Anders Bachmanson）[注 60]的观点，他后来成为了“帽党”（Caps）的领袖之一。他在 18 世纪 20 年代初也曾居住在伦敦，并深受那段经历的影响。1724 年回到斯德哥尔摩后，他申请印制一篇关于英国最新社会与经济理论的论文——其中包括关于出版自由益处的章节，但未获批准。多年来，他与审查官罗森阿德勒及办公厅委员会就该论文的出版进行了无果的争论。最终，这部作品于 1730 年付梓，但删去了令人反感的部分——尽管巴赫曼松忍不住在正文中打出广告，称关于“自由”的章节是“违背作者意愿”而被压制的 [注

61]。几年后，他在汉堡印制了一本书，但在出版前再次遭到压制，他在书中用了更多篇幅论证出版自由。与此同时，作为1727年议会的成员，巴赫曼松也在议会中公开反对审查制度。

巴赫曼松的思想源自何处？他那部写于1734年、现仅存手稿的被禁著作[注62]中，包含了一个漫长的末章，清楚地展示了他的思想渊源。该章原本旨在向斯堪的纳维亚读者介绍有关该主题最重要的外国文献。这些文献全部来自英国。其中最早的一篇，想必是他住在伦敦期间，在该文刚面世后不久读到的。或许这篇文献也构成了他1724年起草的那篇现已佚失的出版自由章节的基础。它正是刊登在1721年2月4日《伦敦周刊》上的“加图关于言论自由的第一封信”。

到18世纪中叶，吉伦博格已经去世，而他所属的“帽林党”（Hats）转而将维持审查制度视为维护权力的有用工具。1750年，政府禁止[注63]一切关于过去或当前政策的公开讨论，并惩处了乌普萨拉大学教授约翰·伊赫雷（Johan Ihre），因为他允许发表包含政治批评的拉丁语学术论文。

“帽林党”的主要理论家、科学家兼主教约翰·布罗瓦柳斯（Johan Browallius）声称，他所属政党的所有对手都是叛徒，是外国阴谋的工具。他的同僚尼尔斯·瓦勒留斯（Nils Wallerius）是正统宗教的另一位坚定捍卫者，他建议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大卫·休谟（David Hume）及其他各种异端作者的作品只需为瑞典进口一本供他研究和反驳即可——此类书籍“否则不应被带入国内，也不得出售”[注64]。

然而，这种对政治和宗教正统观念的强硬捍卫，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放宽审查制度的日益增长的压力所激发的。1749年，丹麦-挪威博学者路德维希·霍尔堡（Ludvig Holberg）报告称，瑞典现在有许多人主张“让作家像在英国和荷兰那样自由写作”[注65]，尽管多数人仍持反对意见。曾留学海外的政府官员克里斯蒂安·柯尼希（Christian König）[注66]在1746至1747年间辩称，应允许学者公开讨论并批评现行及拟议的法律与政策。1755年，“帽林党”自身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措，创办了一份政治周报[注67]《诚实的瑞典人》（*En Ärlig Svensk*），以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涉及了许多此前严禁讨论的政治话题。议会议员们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印刷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不同等级的代表在发生争执时开始公布他们的会议记录和论点，从而在含蓄中诉诸广大公众的评判。

《诚实的瑞典人》那位匿名的主编并非旁人，正是时任首席审查官本人——尼克拉斯·冯·厄尔赖希[注68]。他曾任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其审查立场日益宽容，尤其是在对待宗教文本方面。由于他只有在批准作品后才能领取审查费，这或许影响了他的决定；此外，他也逐渐对“帽林党”

(Hats)感到心灰意冷。他的报纸现在宣称：“自由的民族拥有言论自由的自由与权利” [注 69]。1756 年，他准许巴赫曼松（此时已受封贵族并更名为诺登克兰茨 [注 70]）印制了一本匿名小册子——《行使理性、笔墨与出版的自由》。尽管该书随即被政府查禁，但在 1760 年，作为新一届议会的主要成员，诺登克兰茨利用议会权威高于办公厅委员会（Kanslikollegium）的地位，将作品重新提交给另一名审查员，并最终使其得以出版。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一部近 700 页的巨著，主张对瑞典整个政治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他并未提议废除审查制度，而仅是主张放宽政治讨论的自由——一如英国，他在书中反复援引英国的先例与作者。当国务委员会下令禁止该书发行时，诺登克兰茨成功要求将文本分发给该书名义上的呈送对象——议会的全部 1000 名成员进行审阅。此举确保了论点广为人知，并最终证明，这不仅是“帽林党”统治终结的开端，也是现行出版监管机制走向瓦解的序幕。

科学与公民自由

这并非唯一的激励因素。就在几个月前，厄尔赖希卷入了另一场关于言论自由小册子的争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并非政客，而是一位崭露头角的芬兰年轻学者——彼得·福斯科尔（Peter Forsskål）[注 71]。他的职业生涯集中体现了北欧言论自由辩论与国际学术趋势之间的紧密联系。福斯科尔起初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神学，打算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牧师。但随后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并受教于伟大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林奈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属荨麻（*Forsskaolea*），以致敬其如尖刺般凌厉的性格。1753 年，福斯科尔移居哥廷根，继续师从著名的东方学家、哲学家约翰·大卫·米夏埃利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在那里生活的三年点燃了他对言论自由的浓厚兴趣。

这种兴趣部分源于他的学术工作。他撰写并辩护了一篇名为《对现代哲学原则的质疑》的拉丁语论文，批判了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占据主导地位的本体论，认为其陈旧且不够理性。他热爱学术辩论中的针锋相对，并以冒犯像瓦勒留斯（Wallerius）这样国内权势显赫的正统思想家为乐。但在哥廷根期间，福斯科尔也开始将言论自由视为一个具有更广泛公众重要性的议题——即真正自由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之一。

这部分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身处的一所大学，其智识面貌既是德意志的，也是英格兰的。该校由大不列颠国王兼汉诺威统治者乔治二世于 1737 年创办，旨在成为其德意志领土内的一座进步学术中心。福斯科尔发现，与瑞典

的智识气候相比，这里的氛围更令人感到解放，他的教授们也鼓励这种看法。米夏埃利斯后来回忆道，他曾与福斯科尔多次讨论自由的含义，并向学生解释说：“瑞典的自由与我们所称的自由大相径庭。在那里（即瑞典），没有人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更不用说将其付诸印刷——那就是我们所称的奴役。”[注 72]“要是瑞典也能拥有英格兰和德意志所享有的思考与书写自由该多好，”[注 73]福斯科尔回到乌普萨拉后感叹道。尽管他从未访问过不列颠群岛，但他对瑞典社会的愿景是基于他对英国出版自由与公民自由的感知而塑造的。

另一位无疑加强了这一观点的熟人是才华横溢的荷兰年轻出版商埃利·吕扎克（Elie Luzac）。他在福斯科尔抵达哥廷根仅几个月后，便作为大学新任印刷商和书商来到此地。米夏埃利斯是协助招聘他的人选之一，甚至还帮他[注 74]物色了书店的最佳地段，吕扎克在那里出版并销售来自全欧洲的最新著作。在此前的十年里，吕扎克以莱顿为基地，确立了自己在国际“文坛共和国”中的核心地位[注 75]，成为著名的多语种学术著作与期刊的编辑和印刷商。他本人亦是一位作家和知识分子，对政治、时事以及最新学术动态持有浓厚的兴趣。就在迁往哥廷根之前，他的一本匿名小册子被阿姆斯特丹的地方官公开焚毁，因为他在书中辩称（并赞许地引用了洛克及许多其他英国辉格党理论家）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自然权利。尽管 18 世纪的大多数印刷商对出版自由持有坚定立场，但很少有人像吕扎克那样深刻或公开地参与到这一问题的探讨中。

1748 年，吕扎克出版了启蒙运动中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匿名的《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注 76]。该书作者是吕扎克的朋友、法国医生朱利安·奥弗莱·德·拉·美特里（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此前，拉·美特里曾因探讨同一主题（即人类灵魂的物质性）的著作在巴黎被禁而逃往莱顿。他的新作因其显而易见的无神论倾向引发了更大的轰动。荷兰当局下令没收并销毁该书的所有副本。吕扎克因该书的来源问题多次接受审讯，并被处以巨额罚款。尽管如此（且他个人并不赞同书中的观点），吕扎克仍拒绝透露作者身份，并协助其逃往普鲁士——在那里，腓特烈大帝将拉·美特里收入其“金牌知识分队”。此后，吕扎克又秘密出版了《人是机器》的后续版本，并就该主题撰写了一本畅销小册子《人不仅是机器》。同时，他也投身于有关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激烈海内外辩论。次年，他再次以法语撰写并匿名出版了《论表达自由》（1749 年），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吕扎克的论著本质上是一部新教伦理哲学作品，将思想自由与良心自由相联系。正如他所援引的同胞、胡格诺派教徒贝尔（Bayle）一样，他的主

要目标是推崇通过理性论证来学术性地追求真理，并谴责基于宗教的不宽容对这种博学讨论的压制。他认为，若没有充分的宗教和道德辩论自由，就不可能发现真理；而在政治领域，统治者若行事公正，便无惧批评。吕扎克效仿弥尔顿（Milton）论证道，即便是有害的思想，也只有在被心术不正的人利用时才会产生恶果：问题在于道德败坏的人，而非思想本身。他还预设思想是无法压制的，且公众最终总能辨别真理与谬误（即便偶尔会被误导）。与此同时，作为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终身哲学信徒，吕扎克强调他的模式仅涉及出于善意的理性论证。这并不适用于其他可以被合法审查的言论或书写形式，如：虚构文学、诽谤与讽刺，“充斥着猥亵和伤人字句的书籍”[注 77]，混杂着侮辱与淫秽内容的著作——或者，他带着促狭地补充道，还有神职人员对政治事务那些无知且有害的言论。

当腓特烈大帝试图劝说吕扎克迁居柏林时，他婉言谢绝，并在私下笔记中写道，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即便普鲁士贵族也“不习惯听到自由的言论”[注 78]。相反，他将《论表达自由》题献给英国人，认为英国是世界上唯一享有“完美”表达自由的国家。他关于政治言论自由的论点对特伦查德和戈登（即《加图来信》作者）有着不言而喻的借鉴，而这些作品在荷兰已广为人知[注 79]。事实上，吕扎克非常推崇他们的著作，在哥廷根期间，他最宏大的项目之一便是委托并出版了一套宏伟的四卷本德语译本[注 80]。福斯科尔对此必然知情——该译本的第一部分出版时，福斯科尔正准备自己的论文，而那篇论文同样是由吕扎克出版的。

因此，当福斯科尔几个月后回到瑞典时，他满脑子都是关于出版自由的新思想。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乌普萨拉大学教授约翰·伊赫雷（Johan Ihre）家中担任私人教师；此前伊赫雷因准许学生在学术论文中表达异见而受罚。几年后，福斯科尔深信凭借米夏埃利斯和林奈的引荐，自己很快将代表丹麦王室踏上海外科学考察之旅，于是他决定也要在祖国尝试推进公民自由事业[注 81]。为此，1759 年 5 月，他在乌普萨拉大学哲学系辩护了一篇由其撰写的论文，题为《论公民自由》（*De libertate civili*）。异乎寻常的是，该论文是用瑞典语写的；而不出所料的是，鉴于其内容，他被拒绝准予印刷。当办公厅委员会维持原判，驳回他关于“在自由之地……却失去最珍贵的自由部分：被准许谈论和书写国家的弊端与裨益，这令人无法忍受”的抗议时，福斯科尔决定孤注一掷。

在未告知办公厅委员会（Kanslikollegium）的情况下，他将文稿提交给了审查官厄尔赖希（Oelreich），接受了厄尔赖希对文本的修改，并将其作为公共小册子付诸印刷。他的出版商是拉尔斯·萨尔维乌斯（Lars Salvius）——这位激进的书商兼政治小册子作家在十年前曾计划对伊赫雷

(Ihre) 学生的政治论文采取类似的行动。尽管厄尔赖希删减了福斯科尔关于言论自由最激进的声明（例如“当真理被准许受到对等的挑战与辩护时，它总是胜方”），但他们所有人大概都预见到了后果。在出版当天，福斯科尔匆忙收齐了全部五百册印刷件，并通过邮寄和手递的方式分发给他的朋友们。数小时内，办公厅委员会便传唤了福斯科尔和萨尔维乌斯，对他们严词斥责，解除了厄尔赖希的职务，并下令收缴并销毁所有《关于公民自由的思考》（*Thoughts on Civil Liberties*）。然而，最终仅有七十九册被没收，该文本很快便广为人知。福斯科尔依然毫不畏缩，他直接致信国王，为其著作中关于出版自由的核心命题辩护。他论证道，在任何国家，总会有心怀不满的人，而：

要避免不满情绪产生有害后果，唯有两种途径：一种需要墨水，另一种则需要鲜血。若允许心怀不满者自由发声，他们便能被反驳、被告知真相，并转化为开明的公众。那些在辩论中落败的人，也会随之失去他们的不满情绪以及叛乱的倾向。

相反，审查制度只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几个月后，福斯科尔离开瑞典，前往阿拉伯半岛进行科学考察 [注 82]；1763 年，他病逝于彼地，年仅三十一岁。即便是在数千英里外采集植物标本期间，他仍密切关注着祖国出版自由的进展。1761 年秋，在他从亚历山大港寄给林奈（Linnaeus）的最后一批信件中，他急切地问道：“瑞典的议会（Riksdag）[注 84] 近况如何？书写的自由又进展得怎样了？” [注 83]

为表达立法

到 1760 年，放宽瑞典出版政策的压力已经相当显著，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印刷商和审查官，政界与学界也已提出了详尽的论证。当年秋天，仍由“帽林党”（Hats）控制的议会（Riksdag）在厄尔赖希（Oelreich）的协助下，适时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旨在放宽审查制度并允许更广泛的公共讨论——尽管其最终报告指出，鉴于“平庸民众中最底层群体”的无知，仍需保持适当的管控。虽然当时未采取实际行动，但政治审查已日趋松动，使得“帽党”（Caps）的变革诉求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宣传。在随后的选举中，由于正值持续的经济危机，帽党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帽林党。因此，1765 年召开的新一届议会中，满是怀揣改革宪法、将表达自由载入法律的热望而来到斯德哥尔摩的议员——在下层神职人员和农民阶层中那些被称为“年轻帽党”的激进成员里，这种情绪尤为高涨。

尽管瑞典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受到启蒙运动普遍原则的启发，但其关注点始终较少涉及抽象的自由与正义观念，而更多聚焦于一个压倒性的问题[注 85]：如何让他们那个落后的农民社会摆脱贫困。从斯威登堡

（Swedenborg）到福斯科尔（Forsskål），每一位主张出版自由的瑞典或芬兰知识分子，都同时投身于开发自然知识或促进经济繁荣的项目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如何从法律上定义“书写与出版自由”的问题首次得到了探讨。在长达一年半的会议与辩论中，议会议员们有系统地推敲出了他们的集体答案。事实证明，这一答案与哥本哈根、费城和巴黎的立法者们随后采取的简单方案大相径庭。

最详尽的讨论发生在一个委员会中，其最活跃的成员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芬兰副牧师、业余科学家兼小册子作家——安德斯·屈德纽斯（Anders Chydenius）。他深受诺登克兰茨（Nordencrantz）近期著作的影响（他也受到另一位帽党领袖约翰·阿尔肯霍尔茨的影响，后者自 18 世纪 30 年代初游历英、荷以来便推崇那里的出版自由；此外他还受到出版商萨尔维乌斯，以及可能还有他在乌普萨拉大学的同窗福斯科尔的影响）。该小组研究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出版自由的资料。到 1765 年底，委员会一致同意“解开迄今为止束缚天生自由的瑞典天才的枷锁”[注 86]，因为社会的启蒙需要“自由地使用笔墨与印刷”，且因为这种自由的“根本益处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已得到了充分验证”。但直到 1766 年 12 月 2 日，议会才最终通过法律版本并由国王颁布，其细节的敲定耗时数月之久[注 87]。

其中一个引发激烈分歧的点在于，议会自身的议事过程是否可以公开。这呼应了英语世界自 17 世纪以来便存在的辩论。“帽林党”（Hats）长期坚持认为，“将此处的言论交由公众在酒馆、客栈、街头巷尾及其他场所裁量”[注 88]，将是引发混乱的根源。正如一位贵族在 1761 年所言：“公众由大量意志薄弱之辈组成，他们并不具备足以审视国家事务的辨别力。”[注 89] 另一位议员则正确地指出，即便是英格兰[注 90]，议会辩论也依然保持保密，不允许公开发表，以便议员们能不受约束地发言。议会言论自由的概念历来依赖于秘密性——以及对出版自由的限制。然而，在 1766 年的瑞典，持有此类观点的人（其中包括大多数属于帽党的贵族）在表决中落败了。受诺登克兰茨论点的感召，多数议员持有相反立场，即“公众是一位开明的法官、一位公正的法官，绝不会基于……松散的理由做出决定”[注 91]。

至于真正废除审查制度的想法则更具争议性。在长达十二个月的时间里，甚至没有人提出过这种可能性[注 92]。随后，在 1766 年 4 月一次参会人数寥寥的委员会会议上，屈德纽斯（Chydenius）突然抛出了这一议题。他辩

称，出版自由是国民自由的主要基石，“真理只要被准许自由地照耀人心，便能产生说服力”[注 93]，且审查制度“因其无用、不必要且有害，此后应完全废止”。在他与厄尔赖希（Oelreich）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后，到场者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投票建议废除审查制。这一结果并未尘埃落定，反而导致了委员会的分裂。随后，委员会起草了两份独立的提案供议会更大规模的“大代表团”（Grand Deputation）审议：一份主张废除审查[注 94]，另一份则主张改革其程序。当 1766 年秋季进行最终投票时，尽管遭到了贵族等级的反对，前一份提案仍勉强通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屈德纽斯本人在此期间已因发表了一本批评议会经济政策的畅销小册子而被驱逐出议会。

然而，即便 1766 年表达自由法律获得通过，也并不意味着瑞典审查制度的真正终结。正如该法令最终文本所明确的那样，其出版自由原则本质上仅适用于经济和政治辩论领域。这正是大多数瑞典言论自由理论家此前所倡导的——即便是福斯科尔（Forsskål）那本激进小册子最初未经删减的文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无限”的书写自由仍意味着“任何无可争议的猥亵、包含对上帝的亵渎、侮辱私人个体以及煽动显而易见之恶行的作品，都将受到严惩”。1766 年的法案[注 95]以类似的方式，对所有“以任何方式涉及”基督教教义的文本维持了出版前审查。政府将继续禁止进口和销售“有害的……被禁及腐蚀性的书籍”。法律的开篇段落规定，除了“基督教信仰”这一宽泛范畴外，出版自由亦不涵盖许多其他不可触碰的领域：整个“基督教道德及其原则”；宪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君主、皇室成员、政府官员、外国首脑、议会议员，乃至“任何正直公民”的名誉。撰写或印刷任何违反这些红线的文字，仍将面临巨额罚款、“严厉的肉刑”，甚至死刑。

废除事前审查制度是一项在后期才达成的、极具争议的决定，但与之相对的是，前述所有限制条款却都是基于全场一致的共识。委员会在 1765 年开始工作之初，达成首个决定便是同意将所有这些主题排除在书写与出版自由之外。在英语世界中，有关政治言论自由的思想常与宗教自由的论据相重合；相比之下，瑞典法律则拒不承认此类关联，即便其部分倡导者在私下里确实认同这种联系。屈德纽斯本人热烈支持开明专制原则，并且正如他之前的柯尼希（König）、诺登克兰茨和福斯科尔一样，他也推崇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富庶国家的范例。他解释道，中国关于“书写自由”[注 96]的构想，主要旨在维护其全能皇帝的绝对权力。甚至在屈德纽斯及其同僚转向审查制度这一议题之前，他们关于言论自由的愿景便已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本土化的形态。

斯堪的纳维亚开创性言论自由法律的直接影响，是印刷辩论的戏剧性大爆发。自 1767 年起在瑞典，以及 1770 年后在丹麦，数百本小册子和数十种新期刊相继问世。仿佛是为了表达启蒙世界的认可，伏尔泰本人公开颂扬了瑞典，以及后来的丹麦所确立的“通过笔墨与人类交流的自由” [注 97]：“人类若没有阐释思想的自由，便毫无自由可言” [注 98]。

然而，在短短几个月内，两国便匆忙出台了进一步的法律，以遏制对新自由的“滥用”。1767 年 3 月，瑞典颁布的一项法令将煽动性言论定为犯罪，即那些“通过散布怀疑和传播伪造的谎言，在王国民众间制造怨言、争议和有害不和”的言论 [注 99]。在丹麦，1771 年间的印刷讨论变得日益针对施特伦泽 (Struensee) [注 100]，将其描绘成一个篡权、贪婪的外国人，甚至攻击他与王后通奸——王后在 7 月诞下一女，公众普遍推测其生父为施特伦泽。作为回应，施特伦泽颁布了一道针对“放纵”的新法令，下令“不得滥用出版自由” [注 101]。该法令规定，所有出版物必须标明印刷商或作者姓名，撰写任何违反“现行法律”的内容仍属非法——且侮辱、诽谤和“煽动性著作”仍将根据现行法律受到惩罚。这并没能保住他的性命。几周后的 1772 年 1 月，他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废黜，并很快被处决。此后，出版自由逐渐受到限制，并在次年被正式废除。

瑞典最初的出版自由时代也于 1772 年告终。当时，国王古斯塔夫三世 (Gustav III) 从议会 (Riksdag) 手中夺取权力，重新确立了君主专制。这位自诩为开明改革者的君主曾向伏尔泰夸口称，在他的新法律下，“瑞典的出版自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广泛，甚至超过了英国” [注 102]——而事实却是，他正在稳步削减这一自由 [注 103]。

即便如此，追求更广泛出版自由的理想在两国依然延续。甚至在丹麦知识界中，一些施特伦泽最激烈的批评者也继续为其辩护。1774 年，即首份美国权利宣言发表前两年，深具影响力的作家 P. F. 苏姆 (P. F. Suhm) 在他政治小说《尤弗隆》 (*Euphron*) 的副本中私下传阅了一份宪法宣言。该宣言宣称，每个人都应享有“随其所愿思考、言说和书写的自由” [注 104]，仅受针对“滥用此项自由”的法律约束，并保障了无限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请愿权。此时的问题已不再是出版自由是否可行或是否合意，而仅在于它应采取何种形式。

相比之下，在地球上的许多其他地区，出版自由的理想仍显得无关紧要或鲜为人知。在东亚 [注 105]，尽管印刷术在欧洲发明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已被广泛应用，但其使用仍受制于政府监管。在欧洲贫困地区，以及印度、非

洲、大洋洲、奥斯曼帝国和美洲大部分地区 [注 106]，印刷机在此时依然罕见。除了偶尔一两次短暂的实验外，巴西 [注 107] 直到 1808 年都没有一台投入使用的印刷机。那一年，葡萄牙王室为躲避拿破仑入侵而逃往这片巨大的跨大西洋殖民地，并随行带去了一台皇家印刷机。（巴西的反对派则相应地迁往伦敦，并开始从那里利用印刷品发声。）

尽管如此，北欧开创性言论自由法律的更广泛意义在于其国际影响。这段历史说明，到 18 世纪中叶，至少在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和北美阶层中，出版自由已成为一个深刻的跨国概念。其意识形态在关于启蒙与社会进步的跨境学术及公共辩论中占据核心地位。此后，其法律实践也始终在国际语境下被构想 [注 108]——人们总是通过对比本国或本地的自由形态与其他地区的轮廓，来界定出版自由的边界。

在荷兰 [注 109]，该国原本并无真正的本土政治表达自由辩论传统，直到 1762 至 1763 年间受英国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引发的出版自由辩论案例的启发，以及 1760 年代后期一项旨在引入事前审查制度的短暂提议，才促使荷兰语世界首次出现将出版自由捍卫为个人权利的严肃论证（埃利·吕扎克再次成为核心发声者，这一次他使用的是荷兰语）。1770 年，有关斯堪的纳维亚改革 [注 110] 的新闻迅速被法国、德国、英格兰、苏格兰及加勒比地区的报纸转载。几年后，尽管具体的表述不尽相同，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在将出版自由载入法律时采取了相似的方法。他们汲取了同一套跨国思想体系；并且，他们也同样不断援引其他国家的法律与自由先例。

除了揭示言论自由辩论的国际化特质外，斯堪的纳维亚法令的显著意义还在于，它们是首批将传播自由构想为全体公民之基本个人权利的法律宣言 [注 111]。事实证明，这同样是一项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进展。尽管丹麦政府在 1772 至 1773 年间曾严肃考虑重新引入事前审查，但最终并未实行。相反，从此时起，无论限制多么严苛，斯堪的纳维亚法律始终被表述为维护“出版自由”与“表达自由”这些崇高理想的措施。

这些法律不再预设言论与印刷应受监管，而是从相反的推论出发：除非被特别排除，否则一切表达皆为许可。在 19 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这一原则逐渐成为全球通行的准则。时至今日 [注 112]，即便世界各地深具压迫性的政治政权，也会在口头上对其表示尊崇。而在 1766 年，这一观念还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

第一修正案的偶然例外论

将言论自由视作一项个人权利，本质上只有两种处理路径。第一种可称之为“均衡”路径（‘balancing’ approach），即每个人都有权自由表达，但须遵循特定限制。这一理念最早在 1700 年前后成型，将其界定为有价值的出版或言论“自由”（liberty）与有害的“放纵”（licentiousness，即过度的自由）之间的区别。在这种模式下，言论自由权始终受到正当边界意识的制约。1949 年制定的德国宪法中关于自由表达的保障条款，其第一款称：“人人有权以言语、文字及图画自由表达并传播其意见……不设审查制度。”但第二款紧接着明确规定：“这些权利应受一般法律规定、保护青少年的法律条例以及个人名誉权的限制。”此外，另一条文警告称，该权利亦不适用于“任何滥用表达自由，特别是出版自由”以破坏民主制度的人。正如所有权利一样，言论自由亦伴随着责任。

另一种思维方式可称之为“绝对主义”路径（‘absolutist’ approach）或自由意志主义路径。正如小说家萨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在 2015 年所言：“当你限制言论自由的那一刻，它就不再是言论自由了。”[注 1] 这种模式最强有力的体现便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没有“如果”，没有“但是”，亦未提及任何边界。

均衡路径与绝对主义路径之间的对比，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层面的。前者将表达限制视为正常且必要的，而后者则将其视为可疑且危险的——是审查制度潜滋暗长的征兆，或是令人不齿的智识软弱的表现。用鲁西迪的话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一旦有人说：‘是的，我相信言论自由，但是……’，我便不再听下去了。”[注 2] “我是个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人们常以此自傲——站在自由一边并反对审查，确实会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当然在实践中，自由意志主义理论通常也承认言论自由存在极限。他们并不会为在拥挤的剧院里虚假高喊“着火了！”、作伪证或传播儿童色情作品的行为辩护。因此，即便你认为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区别本质上只是辞令性的（即没有实质差异的区别），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路径预先声明言论自由必须始终与其他考量因素相权衡；另一种路径则坚持表达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并在事后再处理具体细节。两者最终都会将言论自由与其他考量因素进行权衡，只是出发点不同。

但事实上，其中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辞令上的差异还会产生两个重要的实践后果。首先，唯有在绝对主义模式下，“言论自由”权才可能在法律上被延伸至：破坏工会、允许企业无限量的资金充斥选举、让儿童接触包含极端暴力和杀戮的互动视频游戏，或允许销售虐待动物的电影——这仅是近期美国对其深远适用范围的部分司法解释。即便美国国会和总统专门立法禁止此类行为，这些法律也可能被最高法院以限制“言论”为由宣布无效。甚至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近期也开始抱怨这种对言论自由的法律“武器化”行为，而第一修正案[注 3]的自由意志主义措辞正为这种倾向提供了便利。

第二个耐人寻味的区别在于：源自第一修正案的美国模式仅适用于政府管控（“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在任何非政府性质的大学、就业场所、媒体或公共空间，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均不适用。其结果是，完全相同的言论或行为（如贴车尾贴、在国歌仪式中下跪或表达政治观点），在一种语境下可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表达，但在其他语境下则完全不受保护——你可能因此受到惩处、被列入黑名单或丢掉工作。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因此，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呈现出一种矛盾性：它既比任何其他文化中的相关权利都更具扩张性，又在范围上更为狭隘——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它根本不适用。

美国人之所以遵循“绝对主义”模式而非“均衡”模式，实属历史偶然。这两种思维方式均起源于 1700 年前后，并体现在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保障政治表达自由的法律中。事实上，如何精准地界定言论自由权，很快便成为全球范围内辩论最激烈的法律与政治问题之一。在 1750 年至 1850 年间，随着成文宪法[注 4]风靡全球，出版自由成为所有宪法权利中最常被列举的一项——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宗教自由或人民主权本身。（言论和书写自由也经常被列入，尽管频率略低。）出版自由在这些宪章中的显著地位并非巧合。到 18 世纪后期，印刷品已被广泛视为政治传播和透明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时印刷机对于宪法本身的传播也至关重要。此类文件或许是在言语辩论和笔墨间起草的，但正是印刷术使它们在地方、国家以及国际层面得以传播并获得效力。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1750 年后有数百部保障自由表达的法律获得通过。但唯独在一个国家——美国——它们遵循了绝对主义模式：首先体现于 1776 年至 1784 年间造反殖民地宣布的革命宪法中，随后体现于 1789 年第一届联邦国会通过、并于 1791 年经各州批准后实施的国家《权利法案》中。总的来看，这些文本是那个时代流传最广、最具影响力的法律文件：它们的许多条款被世界各地竞相效仿。然而，它们处理表达自由的方式却未被采纳。时

至今日，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其他地方 [注 5] 的言论自由法均拒绝了绝对主义的美国模板，转而选择了均衡路径。

原因何在？在汗牛充栋的关于美国言论自由学说起源的研究中，这一显著事实几乎从未被提及。相反，研究早期美国观念的学者们一直过度关注两个相关但更具局部性的问题：其一，第一修正案为何采取现有的措辞方式；其二，早期美国人对“言论或出版自由”的确切理解是什么。这些问题被反复探讨，参考资料仅局限于 1789 年制宪会议的稀疏记录、当时的国内报纸、小册子和往来书信，以及围绕 1798 年带有党派色彩的《煽动叛乱法》[注 6] 所引发的争议。该法由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推行，将“针对政府的任何虚假、诽谤及恶意的书写”定为联邦犯罪，并引发了关于第一修正案适用范围的全国性辩论——直到亚当斯在 1800 年竞选连任失败，该法律在其任期结束时废止，这在表面上印证了其反对者更为倾向自由意志主义的态度。

此后，大多数言论自由史研究都直接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正如我们将在第十章中看到的，直到 1919 年，最高法院 [注 7] 才开始将第一修正案应用于言论和出版问题；而直到 1925 年起，最高法院才裁定该文本不仅管辖联邦法律，也管辖地方法律（利用内战后基于第十四修正案的“纳入学说”）。极少有学者研究中间这段时期 [注 8]；即便有人研究，也往往聚焦于国家层面的法院和争议，而非地方性的案例。

然而，这种对国家层面辩论与法律的过度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美国早期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一方面，它完全忽视了外国（即非英国）因素对美国思想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它也使我国无视了 1789 年前后州法的重要意义。相反，如果我们采取一种更全面的视角，关注国际、联邦及地方立法之间的相互关联，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便会显现。届时我们将清晰地发现，即便是美国，均衡路径（balancing approach）在早期也曾被广泛采纳——这不仅体现在关于言论自由确切边界的讨论中，更体现在基本法的层面。在 1789 年 6 月时，情况尚未如此。在起草之时，第一修正案那种绝对主义式的措辞（absolutist phrasing）似乎是界定该原则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但是，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甚至在该修正案被正式批准之前，情况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美国人开始倾向于采用另一种替代方式，来描述这一宪法权利本身。

为什么美洲的白人定居者在起草革命宪法时，总是无一例外地以绝对主义的措辞来描述言论自由？以下是他们最早的权利宣言 [注 9] 的表述方式：

1776 年 6 月，弗吉尼亚州：

“出版自由是自由最伟大的堡垒之一，除专制政府外，绝不受限。”

1776 年 8 月，宾夕法尼亚州：

“人民享有言论、书写及发表其见解的权利；因此，出版自由不应受到限制。”此外还规定：“印刷机应对每一个致力于审查立法机构之程序或政府任何部门的人保持自由。”

1776 年 9 月，特拉华州：

“出版自由应当得到神圣不可侵犯的维护。”

这些表述成为了革命时期美洲的三大标准言论自由模板，并迅速通过报纸广泛传播。在 18 世纪 70 年代后期发布此类宣言的其他殖民地，均只是简单地照搬了其中一种模式。

采用此类措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当时，对于北美说英语的定居者而言，“出版自由”具有非常明确的特定含义——即无需政府事先批准即可印刷任何内容的权利。在 18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北欧进行相关实验之前，这种形式的出版自由一直是英美与荷兰独有的现象。即便在北美，这也可算是一项相对较新的创新。迟至 1722 年，美洲大陆除波士顿、新伦敦、纽约和费城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印刷机，且经营者常受到当地总督和议会的骚扰与责难。但在 1735 年曾格案（Zenger trial）之后的几十年里，美洲的印刷业 [注 10] 已扩展为一种更为普及、独立且有力的政治工具，在集结民众反对英国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着日益关键的作用。结果到了 18 世纪 60 年代后期，殖民地总督们即便面对最具煽动性、诽谤性或虚假性的著作，也显得相当无力进行起诉。

除了缺乏政府管控之外，到 18 世纪 70 年代，“自由”的具体内涵究竟为何？1774 年末，针对英国政府近期废除魁北克和马萨诸塞州地方律法与自由权的行为，造反殖民地的大陆会议公开阐述了为何“出版自由”对他们而言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重要性除促进真理、科学、道德及通用艺术的进步外，还在于传播有关政府行政的开明见解，在国民间迅速交流思想，并由此促进国民间的团结；借此，压迫民众的官吏将因羞愧或畏惧，而转而采取更为光荣和公正的事务处理方式。[注 11]

换言之，他们最关注的是印刷品的政治功能：它使公民得以组织起来；它传播了“开明”的政府理念；它将政府官员置于问责之下。

然而，一个自 1695 年以来便在英语世界引发争论的更深层问题是：这种自由究竟应当延伸至何处？对于人身攻击、散布谣言或诽谤公职人员的行为该如何处理？政府官员是否有权要求被礼貌对待，或者至少应获得保障以抵御颠覆性的谎言？此外，国家利益以及叛国、煽动和内乱的危险又该如何考量？

关于这些问题，存在着两种思想流派。一种是由《加图来信》（*Cato's Letters*）开创的、本质上属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 [注 12]。该学说认为，若缺乏出版监督，公众人物就会滥用权力。如果辱骂性的攻击传达了真理，那么这种攻击就是被允许的；谎言无法伤害任何真正诚实的人；而普通民众才是评判这一切的最佳法官——任何受侵害的人都可以起诉诽谤，并应由陪审团（而非英国法律实际规定的主审法官）来裁定案件的是非曲直。到 18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这种观点在英国政治改革者中已司空见惯。那些反对英国政府对美殖民地政策的人经常辩称，内阁正利用诽谤法使他们噤声，从而摧毁出版自由。

在美洲本土，爱国者反抗者也推崇 [注 13] 同样的意识形态。随着反对王室暴政的战争爆发，有关出版自由的《加图来信》引发了一阵重印热潮。1774 年 5 月，当一个弗吉尼亚代表委员会被授权起草首份殖民地“权利宣言”时 [注 14]，他们只是浓缩了加图广为人知的论点，并沿用了其著名的格言——“言论自由是自由的伟大堡垒”。该委员会最活跃的成员、种植园主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带去参加会议的一张纸上，有人草草写道：“出版自由作为自由的伟大堡垒，除专制政府外，绝不受限。”几天后，当这一表述被提交给由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帕特里克·亨利

（Patrick Henry）组成的全体州代表大会时，他们仅对其语法进行了微调：他们唯一的实质性辩论围绕着另一个条款展开，因为该条款的措辞（很快被修改）曾有暗示弗吉尼亚数十万被奴役者亦可主张此类“固有权利”的风险。

另一种关于言论自由界限的传统观点则更关注“放纵”（licentiousness）带来的危险。其在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表述出自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他在权威著作《英律评论》（1765 - 70）中总结了保守的法律正统观念：散布关于任何“显贵人物”的“虚假消息” [注 15] 均属于破坏公共和平的犯罪；所有的“诽谤罪”（libels）亦然——即具有“不道德或非法倾向”的书写或图画，尤其是对“任何人，特别是地方官”的“恶意诽谤”，因为这可能激怒对方，“或使其暴露于公众的仇恨、蔑视与嘲笑之中”。此类指控属实与否完全“无关紧要……因为应当受到刑事惩罚的是挑衅行为，而非虚假性……法律唯一的考

量因素，是所有诽谤罪所具有的产生敌意和扰乱公共和平的倾向”。布莱克斯通总结道，在惩治此类滥用行为时：

出版自由在得到正确理解的情况下，绝未受到侵犯或违背。出版自由对于自由国家的本质确实至关重要：但这体现为不对出版物实施事前限制

（previous restraints），而非在出版后免于对其犯罪内容的追责。每一位自由人都有无可置疑的权利，将他喜欢的任何见解呈现在公众面前：禁止这种做法，即是摧毁出版自由；但如果他发表了不当、有害或非法的内容，他必须承担因自身鲁莽而产生的后果……对任何危险或攻击性的著作进行惩处（正如现行法律所做的那样），只要这些著作在出版后经由公正中立的审判被裁定为具有有害倾向，这对于维护和平与良好秩序、政府与宗教——即公民自由仅有的稳固基石——而言是必要的……此举亦未对思想或探究自由施加任何限制：私人见解的自由依然存在；而传播或公开那些具有破坏社会目标之倾向的错误见解，则是社会应当纠正的罪行。

简而言之，布莱克斯通论证道：“惩戒放纵，即是维护出版自由。”

尽管言论自由的自由意志主义理论与均衡理论之间存在巨大反差，但由于后者在辞令上也推崇不可侵犯的“出版自由”，这使得两种路径之间的分歧在美洲革命时期的宪法语言中变得模糊难辨。事实上，18世纪80年代初期颁布的两份新州宪法宣言 [注 16] 均借用了布莱克斯通那广为流传的措辞。1780年3月的马萨诸塞州会议宣布：“出版自由对于国家的自由至关重要；因此，在本联邦内不应受到限制。”次年，新罕布什尔州的代表们将此句与流行的“神圣不可侵犯地予以维护”条款（由特拉华州于1776年首创）相结合，最终表述为：“出版自由对于维护国家的自由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应当神圣不可侵犯地予以维护。”即便我们可以推断起草者信奉的是权衡性的、布莱克斯通式的立场，他们的宪法语言仍保持了绝对主义风格——因为保守派同样坚持出版自由是神圣的，且惩治“放纵”并不构成对其侵犯。

这些文件的撰写者也从未设想过表达自由应当延伸至他们的政敌 [注 17]。如果他们曾有此念头，就必须更深入地钻研并界定其确切界限。而在当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美洲自由之敌”都应被噤声：言论自由并不属于那些散布“关于目前为恢复和确立我们的权利而采取的措施之错误见解”的人。1775年，一位著名的保皇派政治家抱怨道：“我们看到言论自由被压制，出版的自由与保密性被摧毁，真理之声被扼杀”；不久之后，仿佛是为了印证这一说法，一群武装的爱国者捣毁了他的出版商的印刷机。做出这种行为的人正是自身政治言论自由的坚定信徒。他们的领袖是亚历山大·麦杜格尔（Alexander McDougall），就在几年前，他本人还因批评纽

约殖民地议会而受审并被定罪——那一事件曾被他和支持者塑造成自曾格案以来最著名的出版自由“轰动案件”（cause célèbre）。

1774年末，康涅狄格州宣布所有针对“联合殖民地”的“书写或言说”[注18]为非法。几周后，大陆会议警告称，“这些殖民地中某些心怀善意但不明真相的民众”正被“无耻的美洲人”所“蒙蔽并陷入关于美洲事业的错误舆论中”[注19]。很快，每个殖民地都通过了将保皇派政治观点定为犯罪的立法[注20]。1776年底，一位《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解释道：“出版自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民众的一项重要特权”[注21]：

保持信息渠道畅通以造福大众，确实是极度合理的；没有人比我更神圣地看重这项权利。但当这项特权被明显滥用，且出版物变成播种最危险的分歧、散布虚假警报并破坏政府根基的引擎时，该政府难道不应当基于自我保护的朴素原则，利用其权威使这种对其和平的公然侵犯者噤声，并从怀中剔除那只企图反噬其命的毒蛇吗？

这种党派立场同样延伸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争端中。1777年1月，革命领袖约翰·亚当·特罗特伦（John Adam Treutlen）在负责起草佐治亚州新宪法的委员会任职，其中包括那句令人振奋的指令：“出版自由及陪审团审判，应永受神圣保护”。仅仅六个月后，作为该州首任州长，他便查禁了当地其他爱国者的言论，指责他们“通过书信、请愿或其他方式，每日在居民中煽动敌意……非法企图毒化本州良民的思想以反对政府”[注22]。其他几个州的新宪法[注23]也明确规定，良心与礼拜自由不得延伸至扰乱“国家的良好秩序、和平或安全”（马里兰州，1776年）、“叛国或煽动性的演说”（北卡罗来纳州，1776年），或“对本州政府发表亵渎或煽动性的言论”（南卡罗来纳州，1778年）。

由于美国早期宪法的绝对主义语言与1798年《煽动叛乱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纠结于——并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早期美国人是否认为“煽动性诽谤罪”[注24]应当构成犯罪。但这是一个伪命题（red herring）。不仅在这一特定点上从未达成伟大的共识，而且也不可能达成：人们对表达自由的定义不可避免地具有语境性，并由政治环境决定。从其诞生之初，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就始终具有一种不稳定且政治化的含义。

国家权利

这便是第一修正案诞生的智识与政治背景。但在起草之初，即1787年5月，当各方代表在费城集会拟定国家宪法时，几乎没有人设想这份文件应包

含任何权利宣言——尤其是该宪法最勤勉的起草者、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这一想法仅在会议接近尾声时被简短提出。8月20日，最年轻的代表、时年二十四岁的南卡罗来纳州人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提议制定一份国家层面的权利清单[注 25]，其中包括“出版自由应当神圣不可侵犯地予以维护”。该提议未经辩论便交由一个委员会处理，随后便石沉大海。接着，在9月12日，宪法正文已获一致通过并付诸印刷，当制宪会议正讨论最后的修订时，弗吉尼亚州代表团中年纪最长的乔治·梅森（George Mason）突然发言。他告诉与会者，“他希望该方案能以一份权利法案作为序言”[注 26]，且补充说，这很容易实现：“借助各州的宣言，数小时内即可拟定出一份法案”。（众所周知，他在1776年春天亲自起草了美洲第一份此类宣言。）但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州的代表团支持这一想法，甚至连他自己的州也不例外。两天后，在倒数第二次会议上，平克尼做了最后一次尝试，要求“加入一项宣言，即‘出版自由应当神圣不可侵犯地予以遵守’”[注 27]，但该提议以微弱劣势被投票否决。康涅狄格州的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解释了当时的普遍想法：“这没有必要——国会的权力并未延伸至出版领域。”

平克尼本人很快也转向了这一观点[注 28][脚注 1]。然而，梅森为了抗议宪法瑕疵，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他在印好的宪法副本上愤怒地写道：“没有权利宣言”[注 29]，“由于联邦政府的法律高于各州的法律和宪法，各州独立的权利宣言并无保障”。他特别担心缺乏“任何旨在维护出版自由的宣言”。几乎就在同时，他的论点见诸报端，宪法缺失《权利法案》成为了日益高涨的反联邦主义运动针对拟议宪法形式的核心反对理由。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数个州的制宪会议[注 30]推迟了批准进程，或仅在“必须修订文本以增加一份国家公民权利宪章”的条件下才同意批准。

弗吉尼亚州便是其中之一。1788年6月，在梅森与该州深具魅力的前任州长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领导下，一股强大的反联邦主义游说力量赢得了州制宪会议的同意，即：“在其他基本权利中，良心自由与出版自由不得被美国的任何权威所取消、削减、限制或修改”[注 31]。他们还促使会议主张立即通过一份国家级的“宣言或权利法案，以维护并保障人民基本且不可剥夺的权利免受侵犯”，并为此推荐了一份由反联邦主义领袖近期汇编的模范文本。在出版自由问题上，该提案合并了宾夕法尼亚州同样著名的声明，从而更新了弗吉尼亚州现有的1776年宣言。这一混合后的结果（可能由梅森本人亲自撰写）如下：

人民享有言论、书写及发表其见解的权利；出版自由是自由最伟大的堡垒之一，不应受到侵犯。[注 32]

詹姆斯·麦迪逊也是这些激烈辩论中的核心人物：在整个弗吉尼亚批准会议期间，他始终领导着对梅森提案的反对立场，正如他前一年在费城联邦制宪会议上所做的一样。他一向认同禁止州政府“管控出版”是“至关重要”的[注33]，正如同他们不应侵犯宗教自由、陪审团审判和其他基本原则一样。但与其他联邦主义者一样，他认为没有必要制定一份国家层面的权利宣言，甚至在宪法获得批准后仍继续反对这一想法。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1788年为其立场辩护时问道：“为何要宣布不应去做那些本就无权去做的事情呢？”[注34]“例如，既然没有赋予任何可以施加限制的权力，为何还要说出版自由不应受到限制？”他认为这简直是“荒谬”。汉密尔顿进一步辩称，无论如何，此类宣言都只是毫无意义的废话：

宣布“出版自由应当神圣不可侵犯地予以维护”有什么意义？什么是出版自由？谁能给它下一个不会为规避留出极大余地的定义？我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并由此推断，无论在宪法中加入多么优美的相关宣言，它的安全必须完全取决于公众舆论，取决于民众和政府的普遍精神。

尽管麦迪逊也认同宪法规则始终只不过是“阻挡权力侵蚀精神的纸面屏障”[注35]，但反联邦主义情绪的持续高涨最终说服了他做出妥协。为了在首届众议院中赢得席位，他在竞选时承诺，国家宪法“应当予以修正，[以纳入]所有基本权利，特别是最广泛意义上的良心权、出版自由、陪审团审判、免受通用搜查令侵害的安全保障等”[注36]。当第一届美国国会于1789年春天在纽约召开时，他如约成为了该提案的主要倡导者。他的《权利法案》草案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弗吉尼亚反联邦主义者最先进的表述；在他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条款中，与他在其他条款中的做法一样，他做出的唯一实质性改动是明确禁止联邦政府限制该权利：

人民的言论、书写或发表见解的权利不得被剥夺或削减；出版自由作为自由的伟大堡垒之一，应当神圣不可侵犯。

最终，经过辩论和委员会的一些细微修改，并将数个条款合并为一个条目后，这一禁令作为国会通过的第三条修正案的一部分赫然问世：

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确立国教，或禁止其自由行使；或削减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请愿以要求伸冤的权利。

1791年，由于第一条和第二条修正案未能获得足够数量的州批准，该条目顺次成为了第一修正案。

立法者在最初的提案草案与1789年9月25日最终通过的文本之间如何修改[注37]了修正案的措辞，虽已被详尽研究，但无需令我们驻足。他们所做的最显著变动在于：尽管1788年反联邦主义者最初将言论和出版

自由表述为人民的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但 1789 年采用的最终措辞仅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削减这些权利。它不再是对个人自由的肯定性保证，而变成了强加于联邦政府的一种消极禁令（negative prohibition）。

这一变动背后的政治逻辑直击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关于美国愿景冲突的核心。对于像麦迪逊这样的联邦主义者而言，新联邦政府（尤其是国会）的权力是解决各州分歧的关键方案。但对反联邦主义者来说，联邦政府目前所假定的权力，与此前不列颠帝国政府滥用的权力危险地相似。这便是为何第一修正案最终呈现出如此奇特的形态——它并非一份关于公民权利的声明，更谈不上是防御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侵害个人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屏障，而仅仅是针对联邦政府过度扩张的防御措施。该措辞的要旨以及文本的目的，仅在于限制新成立的全国性国会的权力。

这里存在着深刻的反讽。正如本书后文所示，现代对第一修正案的解读已逐渐将这一原始含义彻底颠倒：时至今日，它恰恰被解读为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且其国家属性被认为高于任何州或地方政府对表达的限制。但在 1789 年，该条款绝非具有这种法律或政治意涵。

除此之外，措辞上的所有其他改动本质上都是装饰性的。尽管其在最后一刻强调了对国会的限制，但最终结果仍保留了过去十三年间美国每一份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宣言中的自由意志主义精髓。在 1789 年夏天，界定这一特定理想似乎根本没有其他可行的表述方式。尽管美国人对实践中言论自由的确切范围持有迥异的观点，但英语世界中每一个试图将其描述为一项“权利”的人，都受困于同一种绝对主义的修辞框架之中。然而，这一切即将发生改变。

跨大西洋的发展

18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宪法创新与辩论，在半个地球之外的法国引起了最为浓厚的兴趣。法国是这个新国家最重要的盟友，其自身也刚刚开始经历革命性的剧变。在法国，没有人比年轻的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更渴望借鉴美国的范例。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华盛顿将军的“养子”，也是富兰克林、亚当斯、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朋友，更是路易十六宫廷中举足轻重的改革者之一。他为长子取名“乔治·华盛顿”，热切地研读美国最新的政治论著和动态，并与杰斐逊（自 1784 年起任美国驻巴黎公使）以及他本国的同胞们进行无休止的讨论。拉法耶特是法国“亲美派”（*américains*）中最著名的人物——这一群体由受美国范例启发的作

家和立法者组成。他在巴黎的豪宅成了美法政治家核心的会晤场所。在书房的主墙上，他安装了一份刻有金字的美国《独立宣言》副本以自勉，旁边则挂着另一个空框——他宣称，那是在“等待法国权利宣言的到来”[注 38]。

在 18 世纪，消息经由船只横跨大西洋需要数周时间。1787 年底，拉法耶特终于从华盛顿处收到 [注 39] 了同年 9 月在费城达成的联邦宪法副本。杰斐逊也收到了副本，这位弗吉尼亚州的前州长兼代表一直就宪法的批准事宜与麦迪逊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并立即督促他们增加一份“权利法案，以清晰且不借助于诡辩的方式规定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及其他不可剥夺的权利。

拉法耶特在回复华盛顿之前也咨询了杰斐逊。“我以难以言喻的热忱和专注研读了这份新拟议的宪法，”他在回信中告诉将军，并补充道，经思考后，“我只担心两件事——第一是缺乏权利宣言。”但他接着写道，这并非无法逾越的问题，这无疑是在转达其“亲爱的朋友”杰斐逊公使的论点，因为“只要民众愿意，在接受宪法之前即可制定一份权利法案”。不久，他、杰斐逊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开始定期会面，辩论此类文本的细节；这位英美自由与民主的伟大捍卫者当时正造访巴黎，为法国的新革命助威。大西洋两岸都弥漫着立宪的气息。拉法耶特告知华盛顿，在此处的法国：“我衷心渴望一部宪法和一份权利法案，并希望它能尽可能平稳且在双方满意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到 1788 年春天 [注 40]，他们都寄希望于法国国民议会能尽快召开并起草一份权利宣言。在路易十六于 8 月颁布法令确定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将于次年召开后，拉法耶特的圈子便开始讨论这样一份章程应采取何种形式。杰斐逊在 12 月写给美国通信者的信中提到，在巴黎，“目前全世界都忙于构思，人人都在制定自己的权利法案计划”[注 41]。几周后，他向大西洋彼岸寄送了一些此类草案样本 [注 42]，以协助麦迪逊的工作。或许出于类似的原因，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以英文和法文同时发表了自己的计划 [注 43]。当三级会议最终于 5 月召开时，拉法耶特在杰斐逊的帮助下提交了首份详细提案。1789 年 7 月 11 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他向新成立的国民议会呈递了这份文本。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其他作者提出的三十多种替代模型也得到了审议，直到 8 月下旬，最终文本《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注 44] 达成一致。

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几乎所有此类提案中的核心诉求。所有人都对美国那种“绝对主义”的处理方式了然于胸。部分代表在撰写自己的条款时也对此有所示意。美国的各州宪法 [注 45] 被不断地翻译、讨论并视作灵感的源泉：

即便是弗吉尼亚 1788 年批准会议所制定的权利法案模板（其措辞后来成为第一修正案的蓝本），也于 1789 年 1 月被领先的“亲美派”以法文出版。

然而，在法国，这些自由的内涵有着显著的不同。首先，这是一个**创造**权利而非**保存**权利的问题。到 18 世纪 80 年代，法国的作者和读者们已开发出多种规避和蔑视出版审查的方法，远未到被封口的地步。但他们之所以必须采取此类遁词手段，恰恰是因为英美语境下的出版自由在法国尚不存在。就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王室还更新了 [注 46] 所有的管控措施，包括事前审查以及对印刷业的警察监视。此外，法国人当时也并不向往北美人在 18 世纪 80 年代已视作理所当然的那种宗教自由程度：结果，他们关于表达自由的辩论最初被宗教争端以及国教角色的问题所主导。宣言最终在这一战线上达成的妥协是独立的第 10 条 [注 47]（该条款在出版自由本身被讨论前即获通过），规定：“任何人不应因其意见（甚至包括宗教意见）而受到干扰，只要其表达未扰乱法律所确立的公共秩序。”

政治背景也存在关键差异。在美国革命中，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定居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一希望效忠英国，另有 20% 是被奴役者。此外，该领土上还有数十万原住民。尽管爱国者阵营实际上可能代表了不足一半的真实人口，但他们成功地将这场反叛描绘成一场针对外部暴政的统一斗争，而非内战。随后，他们驱逐了保皇派，抛弃了君主制，并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共和政府。

相比之下，1789 年的法国人致力于修补其古老的政治体制，而非摧毁它。对于行政暴政风险，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重申国家的终极主权。因此，宣言的最终文本从未提及君主制：国民议会的代表们大胆地将自己设想为最高主权者，其角色是在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其结果是，不仅在表达问题上，而且在宣言的整个文本中，**法律的力量**始终被援引为对个人自由的必要约束 [注 48]。

更重要的是，即便（或者恰恰是因为）代表们分裂为保守派与更自由的阵营，他们仍在寻求共识。相较于革命时期的美国人，他们的权利宣言草案更加看重公民社会的和谐、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社会契约”的重要性、作为“公意”体现的法律，以及自由不受约束的“自然状态”与自由必然受限的“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对他们而言，个人权利并非是为了对抗法律和政府而受到保护的自由，而是应当由法律和政府来定义的自由 [注 49]。

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寻求效仿的是英国而非大西洋彼岸的 [注 50] 宪制安排。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向其同僚代表们解释道，“美国人”刻意用简单的术语来构思其权利宣言，以此吸引“那些唯自由是从的人民”。但正如他敏锐指出的那样，这与其说是“一份人权宣言，倒不如说是一份针对暴君的宣战书”：它回避了关于自然权利与公民社会之间确切关

系的所有难题。7月9日，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让-约瑟夫·穆尼耶（Jean-Joseph Mounier）在开启权利宣言辩论时，自豪地提醒议会：“我们不应忘记，法国人并非一支近期才从森林深处走出来组建公民协会的新兴民族……”——其不屑的言外之意是，这与美洲的定居者完全不同。许多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在这种背景下，且考虑到在一个对出版自由的构思始终比英语世界对“出版自由”的崇拜更为细腻的智识传统中，言论自由权[注51]的表达方式截然不同。在法国，在渴望获得的基本权利清单中不加修饰地写下“出版自由”（la liberté de la presse）并非难事。1788年初，米拉波本人曾为荷兰革命派起草过一份权利宣言，其中便照搬了美国各州“出版自由应当神圣不可侵犯地予以维护”的公式。但当涉及到为自己的国家制定宪法原则时，他和其他法语作家[注52]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均衡路径。杰斐逊向约翰·亚当斯解释道，他们的权利宣言将确定的是“可以给予出版业的自由程度”。他在1789年1月向麦迪逊推荐的一份典型草案文本[注54]开篇便写道：“任何人不得因其意见或思想交流而受到骚扰，除非他违反了社会秩序或他人的名誉，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受法律制裁。”6月，在凡尔赛与代表们商讨如何推进工作时，杰斐逊为其“权利宪章”[注55]提出了类似的构想：“印刷商应因印刷和发布伤害起诉方的虚假事实而承担法律责任：但此外他们不应受到任何限制。”最终，拉法耶特删去[注56]了一项专门惩处“诽谤”的条款，但保留了表达自由绝不应侵犯他人权利这一基本原则。

被审议的数十份其他提案[注57]以及议会随后的辩论，同样理所当然地认为，以任何方式进行的表达自由是一项天然但有限的权利，并主要聚焦于如何表达其正当边界。这种自由是应止步于“他人的权利”、“对他人的伤害”、“对该自由的滥用”、“诽谤或煽动”、“法律禁止的主题”，还是交由未来的宪法文本来裁定？孔多塞最初认为，规定“出版应当自由，且除针对攻击私人或公职人员私人行为的诽谤外，不得制定任何刑法”[注58]便已足够；随后他又增加了针对“号召武力破坏社会和平及阻碍法律执行”的禁令。“出版自由是公共自由最伟大的堡垒”是穆尼耶那份颇具代表性的提案，且“法律必须维护它”，正如他在草案中费力解释的那样，“通过将其与适当手段相协调，以确保惩处那些可能滥用该自由来传播煽动性演说或针对个人的诽谤的人”。

当代表们讨论宣言中的言论自由条款时，他们已经通过了第4条。该条表达了最高原则，即“自由即有权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且这些限度应由法律决定。这一理解为他们的审议提供了基本框架。最终，在8月24日，

由著名的“亲美派”罗什富科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提出的条款定下了第 11 条的措辞 [注 59]：

自由传达思想与意见乃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一个公民皆可自由地言论、写作与著版，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的行为承担责任。

三天后，宣言全文由国民议会通过。国王虽厌恶其政治主张，但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下，最终于 1789 年 10 月 5 日予以批准；它最终在 1791 年成为了法国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序言。然而，甚至在它生效之前，其处理表达自由的方式便已对美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1789 年 8 月中旬，杰斐逊在巴黎收到了麦迪逊从纽约寄来的信件 [注 60]（发信于 6 月初），信中附有麦迪逊刚提交给国会的宪法修正案文本——其中包括杰斐逊长期敦促他支持的《权利法案》，以及其中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条款。就在法国议会定稿其宣言数小时后，杰斐逊在巴黎坐下来给他的朋友复信。他写道：“他们的权利宣言已经完成了” [注 61]，接着又写道：“关于你盛情寄给我的权利宣言，我必须说两句。就其目前内容而言，我很喜欢；但我本倾向于走得更远。”以下是他如何敦促麦迪逊扩充关于自由表达权的条款：

人民发言、写作或以其他方式发表任何内容的权利不得被剥夺或削减，除非其发表的内容属于损害他人生命、自由、财产或名誉的虚假事实，或影响联邦与他国之和平的虚假事实。

换言之，他拒绝了绝对主义路径，转而支持均衡路径：言论自由不应延伸至伤害他人或危及国家安全的谎言。当这封信送达麦迪逊手中时，国会已经定稿了后来成为“第一修正案”的文本。但如果按照杰斐逊的意愿，其形态将完全不同。

他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并非新论。1776 年春天，在费城参加大陆会议的杰斐逊与威廉斯堡的同事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后者正忙于起草弗吉尼亚的革命权利宣言。在他寄给他们的提议中 [注 62]，他敦促加入这样一个条款：

“印刷机应享有自由[印刷其所好]，除非因造成私人损害而引发民事诉讼。”制宪会议采纳了他的几项建议，唯独没有采纳这一条。

在美国最早的制宪者中，杰斐逊在支持出版自由的“均衡表述” [注 63] 方面基本上是孤身一人。在后来的另一个场合，他曾提议：“印刷机除需对虚假言论承担责任外，不应受其他限制。”麦迪逊在 1788 年指出，这是一种“创新，理应予以充分考虑”：这也促使麦迪逊再次反思他长期以来的忧虑，即政府权力或许实际上并非出版自由面临的主要威胁。尽管如此，几个月后，麦迪逊无视了这些顾虑，他在第一修正案的草案中仍退回到了传统的

绝对主义措辞。但在 1789 年秋天，当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文本传抵美国海岸时，这一切都改变了：这种关于如何表述言论自由权的可替代模型，对美国的思想产生了即刻且深刻的影响。

法国影响

我们可以通过费城发生的事件详细追踪这一影响。费城是新生美国最大且政治成熟度最高的城市。1789 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三件大事在此交汇：第一是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对国会提出的国家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的批准；第二是为了修订宾夕法尼亚州自身 1776 年宪法和权利宣言而召集的特别州制宪会议；第三则是法国《人权宣言》传抵美国本土。

数月来，法国大革命的进展以及该宣言的起草过程一直是美洲东海岸各地的头版新闻。毕竟，这是一件与美国人息息相关的大事。正如一位波士顿作家所夸耀的那样：“法国发表的第一份权利宣言，几乎逐字逐句地抄袭了美国宪法的部分内容” [注 64]——“来自美国自由祭坛的火花……已将其火焰传到了法国”。许多美国报纸刊载了巴黎提案和辩论的译文。到 11 月中旬，宣言的最终文本已由东海岸南北各地的期刊以英文印行 [注 65]。

此后不久，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者批准了新的联邦《权利法案》。正如几乎所有其他州一样 [注 66]，这一过程并未耗费他们太多时间。1789 年 11 月 27 日这一天，州议会在没有太多辩论的情况下，一次性批准了最终成为前十条修正案的内容 [注 67]。该议会的代表们自月初起开始开会，并在此后不久休会。但在宾夕法尼亚，几乎没人在意他们，该州一些杰出的政治家甚至在那个秋天都没有谋求议会席位。相反，他们关注的是另一个立法机构：旨在修订本州宪法的特别会议 [注 68]。该会议的六十余名代表于两天前（11 月 25 日）开始在同一座建筑——费城州议会大厦（State House）内集会。他们很快接管了主会议厅，那是曾起草《独立宣言》和国家宪法的神圣空间。他们整个冬天都在努力工作，除了周日外几乎每天集会，一直持续到 1790 年 2 月底。届时，他们公布了达成的草案文本，并休会至 8 月中旬以听取公众反应。9 月初，经过数周的正式讨论和修订，宾夕法尼亚州的新宪法和权利宣言正式通过。

本次制宪会议辩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修订该州著名的 1776 年言论自由权表述。权利宣言中没有任何其他要素引发过如此程度的讨论。修订后的条款经历了半打不同的草案以及更多的修正提案。其演变过程也得到了广泛宣传。会议的所有会议均向公众开放；报纸报道了会议进程，其会议记录也同步出版。尽管这些长达数月、高强度的辩论记录几乎被完全忽视

了 [注 69]，但它们却是我们拥有的关于早期美国任何言论自由法起草过程最完整的存世证据。而且，它们确定地证明了另一件据我所知尚未被察觉的事实：甚至在第一修正案被批准之前，美国人就已经开始拒绝其传统的、绝对主义的表述，转而支持法国《人权宣言》中所阐述的那种新型的、均衡的路径。

那份外国文本在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清晰如昨。在制宪会议召开前的几周里，费城众多的报纸大多在讨论该州即将进行的宪法修订之余，刊登了该宣言。其中几家报纸还转载了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在 8 月 22 日发表的感人演说 [注 70]，他赞美出版自由是自由的本质，但同时断言出版自由不应逾越“为和平与安宁之故而应确立的法律”，并明确推荐了英国宪制下对出版业的处理方式。

修订州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条款的必要性已在讨论之中。就在《人权宣言》传抵美洲前夕，宾夕法尼亚州德高望重的资深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便公开抱怨出版自由遭到“滥用”，并督促州立法者制定“一项明确的法律” [注 71] 以界定其“范围与限度”：

据说这一权利建立在州宪法确立出版自由的条款之上。这是一种每个宾夕法尼亚人都愿为之奋斗牺牲的自由：尽管我相信，我们中很少有人对其性质和范畴有着清晰的认知……如果出版自由仅仅被理解为讨论公共举措之妥当性与政治观点的自由，那么无论给多少自由我都乐见其成。但如果这意味着相互羞辱、中伤和诽谤的自由，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我们的立法者愿意以此修订法律，我自愿放弃我那份权利；并且，我也非常乐意用我“滥用他人”的自由，来换取“不被他人滥用”的特权。

立法者应当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的修订？法国的宣言似乎提供了答案。在《宣言》文本抵达费城的 48 小时内，《联邦公报》（*Federal Gazette*）的一位通讯员便宣称：“我承认出版自由应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注 72]，但显然“即便出版自由也需要有边界”，否则它就会退化为“放纵”。紧接着他写道：

就在我执笔之时，我刚刚收到了法国国民议会颁布的《权利宣言》副本，并惊喜地发现我与其中表达的情感高度一致……第 4 条开头便写道，“自由即有权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而在第 11 条中，“自由传达思想与意见乃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一个公民皆可自由地言论、写作与著版，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一切难道不正是理性和常识的自发昭示吗？……我希望即将召开的制宪会议能够确保每一位正直的印刷商享有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的最完美的自由，并为那些除了作恶倾向和破坏能力外别无长处的人划定边界。

事实也正如其所愿。宾夕法尼亚州 1776 年的宣言包含两个独立的言论自由条款。第一条是：“人民享有言论、书写及发表其见解的权利；因此，出版自由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条则是：“印刷机应对每一个致力于审查立法机构之程序或政府任何部门的人保持自由”。到 1789 年，所有人都同意将这两种主旨合并为一个条款。关于利用出版物审查政府程序的第二条内容仍无争议，其文本未经修改便重新出现在新宪法中。

然而，第一条条款（其措辞在 1776 年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并被许多其他州竞相效仿）现在在大多数代表眼中明显逊色于法国那种将权利与责任相平衡的方法。制宪会议的起草委员会顺理成章地采纳了《宣言》中的原话。1789 年 12 月 23 日，委员会提出了以下公式：

印刷机应对每一个致力于审查立法机构之程序或政府任何分支的人保持自由，且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此项权利。**自由传达思想与意见乃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一个公民皆可自由地言论、写作与著版，但应对滥用此项自由的行为承担责任。**

这一文本否定了当时所有州宪法中存在的绝对主义言论自由模式，也否定了仅在数周前刚由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批准的国家《权利法案》。在进入辩论阶段时，部分代表实际上曾提议，本州的条款应直接与新修订的第一修正案措辞保持一致，仅规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削减言论或出版自由”。但这一动议很快被否决。相反，成员们一致同意遵循均衡路径来处理言论自由，并在未经进一步辩论的情况下接受了起草委员会的模板文本。随后，他们走得更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推敲一个补充性的结尾句，以明确表达自由权的确切范畴。

这些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言论和出版自由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延伸至针对个人的批判性或侮辱性“诽谤”。起初，代表们分为三种主要立场。**最自由的立场**认为，言论自由权证明发表任何属实的内容都是正当的。**中间观点**认为，这种自由应仅限于关于在职官员或竞选者的事实——即不涉及私营公民的行为。**最保守的立场**则认为，只有发表关于公职人员“公共行为”的事实才是正当的——言论自由不应延伸至对其私人生活的审视。除了这些关于合法言论范围的分歧外，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何定义“真理”[注 73]，以及由谁来定义——是法官（如英国法律条文所规定），还是仅由陪审团（如自曾格案以来在美国流行的观点），或是两者的某种明智结合。

2 月底，在对有关这些事项的多种不同提案进行辩论后，制宪会议就其言论自由条款新结尾句的表述达成了一致：

在诽谤起诉案中，其真实性或目的可作为一般争执点的证据提交；其性质和倾向，即属于适合公众获知的信息，还是仅属于私人嘲讽或恶意，应由陪审团在法庭的指导下裁定，一如其他案件。

换言之，“公众获知的信息”（public information）是一种合法的言论自由辩护理由，且不仅限于针对公职人员的情况；在诽谤审判中，陪审团应遵循法官的指示，不仅要考虑出版内容的真实性，还要考虑其意图、“性质”和“倾向”。

尽管这一表述是一系列势均力敌的投票结果，但它最终并非定论。当制宪会议在 8 月重新开会时，成员们投入了新的精力来精炼该条款的确切措辞。他们再次拒绝将言论自由仅局限于对“处于公职身份的个人”的批评。但最终达成的折中方案确实明确了出版自由的主要目的是监督“处于公职身份的人”，并揭露“供公众获知”的事实。自 1790 年起，宾夕法尼亚州的新宪法据此将言论自由权定义如下：

印刷机应对每一个致力于审查立法机构之程序或政府任何分支的人保持自由，且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此项权利。自由传达思想与意见乃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一个公民皆可就任何主题自由地言论、写作与著版，但应对滥用此项自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针对出版物进行的起诉中，凡涉及调查官员或处于公职身份者的官方行为，或所发表之事宜对于公众获知属必要或正当者，其真实性可作为证据提交；且在所有诽谤案的起诉中，陪审团有权在法庭的指导下，一如其他案件，裁定法律及事实。

美国人的态度

宾夕法尼亚州 1790 年言论自由条款那臃肿而笨拙的措辞，与从 1776 年一直到第一修正案为止，那些早期美国宣言中所特有的优雅、绝对的表述方式大相径庭。然而，这种新的冗长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是在美国制宪史上，立法者首次不再仅仅停留在赞美出版自由，而是开始着手处理一个现实且具体的难题：即如何区分正当的“言论自由”与非正当的滥用。通过采纳法国宣言的模式，他们得以在条文中明确规定——这是此前任何美国法律都未曾做到的——出版自由应当促进真理，但应避免伤害。正如其领袖之一、法学教授兼最高法院大法官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此后不久公开总结的美国教义那样：“自由政府下的公民有权就公职人员、公共团体和公共举措自由地思考、言说、写作、印刷和发表，但必须保持体面并符合事实。”

[注 74]

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的重新起草，是当地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以及围绕联邦权力与州权之争的长久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注 75]但这些分歧并未波及该州的权利宣言，因为各方普遍认为其确有改进的必要。不仅如此，这些政治分歧也未影响到人们采纳法国言论自由模式的普遍热情。费城的联邦派和反联邦派报纸都一致对法国的范例进行了赞许性的宣传，而制宪会议对言论自由条款的表决也并未遵循明显的党派界限。最终，其终稿以 62 票对 2 票的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事实证明，这标志着一场剧变的开端。早在 1780 年，马萨诸塞州的数个镇民大会就曾抱怨州宪法中关于出版自由的条文过于绝对，该州约四分之一的选民拒绝了拟议的文本。丹斯特布尔（Dunstable）的公民观察到：

“由于对此缺乏约束 [注 76]，它可能会被用来通过印刷异端邪说等手段亵渎上帝，同样也会伤害私人名誉。”伯威克（Berwick）、韦尔（Ware）和雅茅斯（Yarmouth）的自由民也认同，出版自由不应适用于“延伸至对私人名誉的滥用或伤害”的情形。切尔西（Chelsea）的集会投票决定增加一项规定，即“其自由并不等同于豁免任何印刷商对虚假、诽谤和辱骂性出版物承担责任。”波士顿公民则希望明确规定，言论和印刷自由仅适用于“公职人员及其公共行为和公共举措”。1786 年，佛蒙特州的立法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实际修订了该州的言论自由条款，明确规定其仅适用于“关于政府事务的见解” [注 77]，而不涉及其他事务。

宾夕法尼亚州是第一个更进一步，并将其旧有的言论自由措辞替换为更现代、更具限制性表述的州。其他领地很快也纷纷效仿。1791 年，特拉华州的立法者们 [注 78] 一致摒弃了其著名的“出版自由应当神圣不可侵犯地予以维护”的宣言，取而代之的是仿照宾夕法尼亚州起草的文本。肯塔基

（1792 年）、田纳西（1796 年）、俄亥俄（1802 年）等新成立的州，以及短命的西佛罗里达共和国（1810 年）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在 1790 年至 1959 年间，每一个加入联邦的领地 [注 79] 都明确规定，其公民宪法赋予的表达自由权并不延伸至对其权力的滥用。最初的十三个殖民地中的大多数最终也效仿了这一做法（仅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除外）。这些州的言论自由条款最简练的形式仅仅是抄录了法国《人权宣言》的核心短语。“每一个公民皆可就任何主题自由地言论、写作与发表其见解，但应对滥用此项自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一表述，完整地成为了亚拉巴马州（1819 年）的基本法，经过微调后，也同样成为了华盛顿州（1889 年）、爱达荷州（1889 年）、亚利桑那州（1910 年）和阿拉斯加州（1956 年）的基本法。

其他州，从 1817 年的密西西比州开始，虽然通过主张“不得通过任何法律以削减或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向第一修正案表示了致意，但却将该条

款与关于起诉诽谤和对“滥用”负责的规定并列。换言之，正如布莱克斯通一样，他们推崇针对“放纵”的法律，并坚持认为这些法律并不侵犯出版自由。1863年内战期间建立的西弗吉尼亚州，在其最初的宪法中开头便写道：“不得通过任何削减言论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但随后补充道：

……但立法机关可以规定，对出版和贩卖淫秽书籍、报纸和图片，以及诽谤和人格污蔑行为进行限制和惩罚；并规定受害方可通过民事诉讼，就此类诽谤或污蔑获得适当的赔偿。在武装入侵或组织性叛乱持续期间，通过公开言论、写作、印刷，或通过发表、流传此类文字或印刷品，企图为武装入侵本州或其内部组织性叛乱辩护并予以支持的行为，法律可将其定为轻罪，并据此予以惩处。

到20世纪中叶，几乎每一部州宪法都将言论自由定义为一项受限的权利（qualified right），而非采取第一修正案那种自由意志主义的术语。事实上，它们至今依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注意到这一点，或者关心本章所揭示的这段隐秘历史？原因有几点。

首先，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总是被写得仿佛它起源于英美权利话语，然后在1776年后分支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传统，专注于第一修正案的创建与解读。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1789年之后，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美国的言论自由理想都深受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所表达的另一种路径的影响。

甚至这种影响可能更为深远。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之间，第一修正案被公认的正统含义仅仅是：联邦政府无权监管言论或出版，但各州有权监管。1798年针对国家《煽动叛乱法》的简短争议仅强化了这一推论。杰斐逊此后解释道：“虽然我们否认国会有权管控出版自由，[注80]但我们一直主张各州拥有且排他性地拥有这样做的权利”——他接着说，由于“那股正在混淆美国境内所有善恶、真伪的铺天盖地的诽谤洪流”，这种行动无疑是迫切需要的。

由于大多数现代学术研究[注81]极力推崇第一修正案及其1919年之后的司法解释，往往倾向于将早期的美国言论自由法律与实践斥为误入歧途或无关紧要。然而，州级法律与宣言的历史却凸显了一个事实：从1789年到20世纪中叶，美国人的态度主要源自欧洲模式，而非第一修正案。直到1950年，夏威夷才成为第一个[注82]（且迄今为止唯一的）直接仿效联邦宪法拟定本州言论自由条款的州。六年之后，阿拉斯加州仍坚持采用源自《人权宣言》的传统表述。

如果詹姆斯·麦迪逊[注83]在18世纪80年代如愿以偿，或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1789年，在早先未能赋予联邦政府对所有地方性法律的普

遍否决权之后，他曾试图促使国会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禁止任何州削减出版自由、宗教自由和陪审团审判权——因为他认为，“比起美国政府，我认为这些权力更有可能被州政府所滥用。”如果该项提议获得通过，或许就能阻止各州像后来那样偏离他在《权利法案》中所确立的绝对主义言论自由模式。

然而在现实中，第一修正案作为世界上唯一以无条件术语表述的言论自由法，其独特的全球地位和特殊力量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反讽。正如我们所见，这种表述方式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抄袭了 1776 年以来先行制定的各州权利宣言。然而，就在 1789 年第一修正案通过后的几个月内，受法国范例的影响，州立法者们自身便已开始转向一种“受限式”的定义路径。及至 1919 年，当最高法院终于开始系统性地适用第一修正案时，他们实际上赋予了一件“陈旧的文本残片”以新的生命——该文本对言论自由的描述方式，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被时代所更替。1925 年，当大法官们裁定该文本此后应成为国家的最高法律（不仅在联邦层面，而且在每一级政府层面）时，几乎每一个地方宪法早已转而采用均衡式的定义了。

如果在 1789 年，法国国民议会提早几周召开，或者美国国会推迟几周开幕，亦或是跨大西洋的邮政速度再快一些，第一修正案本身的措辞很可能也会大不相同。这未必会改变其创建者主要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初衷（即“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但很可能会影响到其界定人民底层出版自由权时所使用的含蓄的绝对主义语言。在可供选择的情况下，1789 年后的多数美国立法者更倾向于用“受限的”而非“自由意志主义的”术语来定义言论自由。就现状而言，现代美国言论自由法学是建立在一个特殊文本之上的——即便在该文本于 1791 年正式载入法律之前 [脚注 2]，其创始人们就已经开始摒弃它那种修辞上的绝对主义路径了。

法律与自由

不难理解，为何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州级政治家更倾向于以均衡而非绝对的术语来定义言论自由。毕竟，从 18 世纪 80 年代起，这些立法者的关切点更接近于法国国民议会，而非美国《权利法案》的缔造者。州级立法者同样主要致力于确立自身作为地方主权者和公民的自由，而非防御政府暴政。这正是 1789 年法国范例吸引宾夕法尼亚州立法者，并在此后被广泛效仿的原因之一。

毫无疑问，这也是因为这种均衡路径避开了第一修正案的两个明显盲点。首先，州宪法并不像第一修正案那样仅保障公民针对（vis-à-vis）政府的表达自由，而是提供了更普遍的保障 [注 84]——这意味着，这些条款甚至

可以适用于技术上属于私人财产的公共空间。其次，与第一修正案那种不设预前提、自由意志主义的语言不同，州宪法明确了真理的重要性，规定应根据“良好的动机”和“正当的目的”来审判出版物，并明确警告不得滥用言论自由。直到 20 世纪后期，这种观点一直支撑着一种美国法理学，即比后来最高法院日益扩张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第一修正案解释更密切地关注伤害、事实和集体损伤问题。无论好坏，言论自由法理学的形态都受到宪法权利定义条款的影响。

当然定义的具体影响从未被预先确定：它取决于掌权者赋予宪法词汇的含义。大多数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汉密尔顿在 1788 年轻蔑地指出：“宣布政府应当自由、税收不应过重等，与宣布出版自由不应受到限制 [注 85] 一样具有意义”——宣言本身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口号。在法律层面，言论自由从未适用于奴隶；对于自由的黑人男女亦然；甚至在内战后的许多州，它也不适用于那些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白人。路易斯安那州 1812 年宪法维护出版自由和公民“就任何主题”发表言论的权利，唯独保留了对“滥用此项自由”的惩处。其法规阐明了这点的真实含义：教奴隶读书或写字即是犯罪。此外，“自由的有色人种绝不应侮辱或罢工白人，也不得假定自己与白人平等；相反，他们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向白人让步，且除非带有敬意，否则绝不得向白人说话或回话，违者处以监禁。” [注 86] 任何胆敢书写、印刷、出版、阅读，甚至仅仅私下谈论“任何具有在州内自由有色人口中产生不满情绪，或在奴隶中引发抗命倾向的事物”的人，都将被处以苦役监禁或死刑。

然而最终宪法公式的意义不仅在于作为法律的基础，更在于作为大众心态的塑造者。麦迪逊在 1788 年写给杰斐逊的信中提到，《权利法案》始终面临着被忽视或违背的危险，但其首要价值在于“以那种庄严方式宣布的政治真理，会逐渐获得基本准则的属性……并融入民族情感之中。” [注 87] 有时，这种情感会违背或超前于法律专家和法官对文本的解释。正如我们在后续章节中所探讨的，认为第一修正案不仅保障公民权利免受联邦政府侵害，也免受地方和州法律侵害的观念，早在其被接受为法庭正统学说之前，就已由 19 世纪和 20 世纪接连涌现的社会活动家群体普及开来。但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在美国，第一修正案现代学说的日益全能逐渐排挤了其他的法律与民间假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其简洁（乃至笨拙）的表述方式支撑起了一种日益趋向自由意志主义的个人表达心态。这曾仅仅是一种国家现象；但近来互联网的兴起已使其演变成一个全球性问题。

在法律层面，像 Facebook、YouTube、X 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公司这类私营实体并不受第一修正案条款的约束。然而，作为美国企业，它们在全球范

国内的自身政策却在本能地复制对其原则的大众化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它们能够欣然审查“淫秽内容”（传统上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却对自身放大危险的科学和医疗虚假信息的行为关注寥寥。这也是为什么它们特别不愿对任何形式的“政治”言论进行干预，无论其是否涉及虚假或伤害。毕竟，最高法院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政治观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且认为“在第一修正案下，不存在所谓的错误思想”[注 88]。

正如我们将在第 10 章看到的，这同样有助于解释为何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对仇恨言论的处理如此松懈且反复无常——因为再次强调，与其他国家不同，在美国，发表暴力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或类似的观点，在推定上被视为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换言之，解释此类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互联网巨头巨大的贪婪，也不在于大规模评判此类事务的内在难度，而在于其决策者直觉上是以一种特定的、自由意志主义的、现代美国式的方式来构想“言论自由”的。

现在请试想：如果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宪法曾明确警告不得滥用言论，维护事实的至高无上性，并将自由表达视为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平衡，情况会如何？这便是其“例外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意外这一事实之所以至关重要的最终原因。与《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并无二致，第一修正案在其血脉断绝很久之后才被赋予了生命。但现在，我们只能与其共存。

正当与非正当的表达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过程中，关于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新理想逐渐传遍全球。在不同的地域，这些理想呈现出迥异的形态。然而无论在何处，人们对这些新颖意识形态的热忱都遭遇了重重挑战，其中既有积重难返的老问题，也有接踵而至的新困局。出版自由究竟涵盖哪些范畴？应当如何定义并处理辱骂性及危险性的言论？哪些声音拥有发声的权利，而谁又理应听到这些声音？“公众”一词包含了哪些群体？言论在何时才算真正自由？而这种自由又是为了什么？从细节上看，历史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我们当下的认知有所不同；但就轮廓而言，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在总体上仍与前人如出一辙。无论法律如何对其进行定义，言论自由的形态绝不仅仅关乎言论本身的内容，它始终还关乎说话者、听众以及特定的语境。

放纵与自由

在 1800 年前后的数十年间，凡是讨论出版自由并将其载入法律的地方——横跨南北美洲、欧洲，以及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部分地区——“表达自由应成为常态”这一新原则都极大地推动了政治讨论，刺激了报纸的创办，并增强了印刷品的力量。该原则在广受宣传的美、法两国宪法中的成文法化，助推其成为了全球性的政治理想 [注 1]。到 1790 年，即便在圣彼得堡，也有可能引用美国各州宪法来论证“出版自由是自由最伟大的堡垒”，接受过德国教育的文官亚历山大·拉舍夫 (Alexander Radishchev) [注 2] 在其畅销书《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正是这样做的。（尽管好景不长——短短几周内，根据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命令，他因这种“煽动性诽谤”被捕、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其著作也被禁毁，所有副本均被搜缴并销毁。）

同样，在印刷术引入巴西仅十余年后，该国 1824 年宪法便效仿法国《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尽管“滥用”行为将受到惩罚，但“所有人均可通过言词和著作交流其思想，并可在不受审查的情况下通过出版物发表”。到那时，在成文宪法这类新体裁中加入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已司空见惯：类似的表述此前已出现在荷兰巴达维亚共和国（1798 年和 1801 年）、新独立的委内瑞拉（1811 年）、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1812 年）、挪威（1814 年）以及荷兰（1815 年）的立国文件中。

另一方面，尽管这些变革的推动者们满怀乐观，但环境的改变无法、也确实没有解决那些古老的问题，即虚假信息、中伤和滥用。正是这些问题曾催生了如今正日益瓦解的言论管控体制。事实上，转向更宽容的言论自由文化远未减轻这些问题，反而往往使其恶化。信息越多，虚假信息也越多；自由越多，滥用也越多。

到 18 世纪末，这一认知甚至导致一些出版自由最早、最杰出的捍卫者也修正了他们的观点。18 世纪 80 年代的荷兰共和国在一场针对英国的灾难性战争期间，一场名为“爱国者”（Patriots）的激进政治运动开始鼓吹人民主权和宪法改革。受美国革命启发，并呼应了《加图来信》（*Cato's Letters*）所创造的英美反对派修辞，他们的煽动性宣言（1781 年某夜匿名散发全国，随即被禁，后多次重印并被译为法、德、英等国文字）将出版自由描述为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国家自由的唯一支柱”[注 3]：

如果我们不能自由地向同胞进言，不能及时警告他们，那么人民的压迫者将横行无忌。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行为经不起审查的人总是力图反对书写和出版的自由，并且希望任何东西未经许可都不得印刷或出售。

“爱国者”运动的兴起引发了大量措辞愈发激烈的政治出版物，不仅攻击奥兰治亲王威廉五世（William V），还引发了地方“爱国者”当局与“奥兰治派”当局之间针锋相对的审查尝试。1782 年，一位爱国者宣传员出版了埃利·卢扎克（Elie Luzac）[注 4] 于 1749 年匿名发表的关于出版自由论著的荷文译本，并顺势解释称其中的论据证明了其党派当前行动的正当性。这定会让卢扎克本人勃然大怒。他是一位坚定的奥兰治派成员，也是爱国者论战中经常攻击的目标；他对他眼中的对手那种危险的煽动行为，以及他们散布诽谤和煽动性言论的毒害深感震惊。“报纸撰稿人，”[注 5] 他在众多反对爱国者的抨击文之一中抱怨道，“他们将报道新闻的自由变成了狂妄的傲慢，发表那些在他们愤怒且病态的大脑中浮现的一切。他们是大自然的耻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他们理应被视为地球上的渣滓。”他主张，惩罚那些“除了羞辱同胞……以及煽动民众、教唆谋杀、纵火和抢劫外别无他图”[注 6] 的著作，是完全正当的。

在法国，梅西耶（Mercier）也有着类似的感悟。到 1798 年，他已将法国大革命的种种挫败直接归咎于“无限的出版自由”这一教条[注 7]，认为正是它释放了如毒液般泛滥的诽谤性、煽动性民粹印刷物。他声称，任何受过教育的作者或真理追求者都从未支持过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他们始终保持着一一种体面；从未使自己的语言、观点或人格野蛮化。”相反，这种新理想是那些“诱导并欺骗民众”之人的发明，“每一个煽动暴民的文人都可以尽其所能地推销谎言与厚颜无耻，且确信定能获得拥护。”梅西耶推翻

了早期乐观的立场，转而宣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公众舆论”，更遑论“公意”的智慧：“民众中识字者不足百分之一，能辨别真伪者不足千分之一……我总是在‘无限的出版自由’这些词的组合中看到错误、危险和陷阱。”

正如瑞典和丹麦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将言论自由视为基本权利的知识分子运动，主要是一种修辞上的转变。它改变了辩论的基础以及自由与约束之间预设的平衡，但并未改变一个基本事实：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出版自由始终受到事前或事后监管的制约。其形态与解释从未尘埃落定，恰恰相反，它始终处于不断的争议之中。在法国国民议会将言论与出版自由载入 1789 年《人权宣言》后不久，布列塔尼的一位主教 [注 8] 便在一封教区牧函中抨击了这一思想：“通过对自由的一种可悲滥用，[他们] 竟希望允许所有公民随心所欲地思考和写作。”为此，国民议会下令对他提起诉讼，指控其诋毁国家荣誉。

不久之后，事态进一步升级。1790 年 7 月，所有“煽动性”著作均被定为非法；一年后，辱骂公职人员，或旨在“贬损”或煽动对任何法律及权威之反抗的言论与文字亦被取缔。1792 年君主制垮台后，接连通过的法案 [注 9] 对任何提议重建君主制，以及“藐视国民公会与共和政府”、“诽谤爱国主义”、“散布虚假新闻”或“误导公众舆论”的人处以死刑。1793 年至 1794 年间，巴黎入狱的 8,000 人中有多达半数是因为发表被禁言论；在被该市革命法庭处决的 2,747 名男女中，超过三分之一死于发表“煽动性”或“反革命”言论。在荷兰共和国 [注 10]，爱国者派于 1795 年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夺取了政权，并随即对成百上千（甚至可能数以千计）因类似形式“煽动”罪受指控的人施以严惩——即便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起草宪法条款，以保护每个公民“通过言语、文字或出版手段表达其思想与情感”的权利。

此类惩罚的支持者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些举措与出版自由完全兼容，并坚持认为“没有任何法律敢于限制这种自由” [注 11]。在这些人中，竟然包括了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1792 年，潘恩在 18 世纪最著名的出版自由审判案之一中，被英格兰法院判定犯有政治诽谤罪和煽动罪。然而，仅仅几个月后，他却敦促法国政府将针对其政治人物的中伤行为定为犯罪：

如果任由每个人沉溺于私人的恶念或野心，随意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进行谴责，那么所有的信任都将被削弱，所有的权威都将被摧毁……诽谤是一种背叛，应当像对待任何其他种类的背叛行为一样予以惩处 [注 12]。

几年后，针对美国媒体那令人无法容忍的“放纵”，他也持同样的观点[注 13]。

当法国宪法于 1795 年修订时，它在同一条文中既宣称“出版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注 14]，又规定“当情形有必要时”可对其进行缩减。法国政府在继续赞美出版自由的同时，不仅查封报纸并惩处编辑，还不断加强监视和事前审查（pre-publication censorship）。此外，他们还投入巨大精力对公民进行“正确”教育，并出版“有益”的爱国著作。1814 年，自由派法国作家兼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在就职时发表意见称：“今日我们可以毫无风险地尝试无限自由”[注 15]，然而，“如果道德与理性被扭曲，如果激情放纵而无节制……放纵就必须受到约束。”随后，他在全法国重新引入了事前审查制度。直到 1881 年，这一制度才被最终废除。在这一时期，欧洲、美洲及殖民地领土上的大多数政府都采取了类似的路径[注 16]。除了通过国民教育计划培养“思想端正”的公民外，几乎所有地方都在定期商议或实施重新引入事前审查的举措——尽管与此同时，他们也颁布了确立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法律。

英语世界的态度

英语世界的情况稍显不同[注 17]。1695 年，英国在缺乏周密计划的情况下废止了《许可法》，在此之后，政府对印刷品进行各种形式的管控依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1698 年的一项法律专门针对亵渎性及教理存议的出版物。直到 18 世纪 10 年代，保守派作者仍在敦促重新引入事前许可制度，议会中也反复出现相关的法案。英国从未通过任何明确保障任何形式出版自由的成文法令。1723 年 1 月，在大西洋彼岸，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裁定，《新英格兰快报》（*New-England Courant*）那麻烦不断的印刷商詹姆斯·富兰克林此后“被本法院严禁印刷或出版该报，或任何具有类似性质的小册子或报纸，除非先经本省秘书监督”[注 18]——他们指出，这种审查在过去“一直是惯例”。1737 年，为了压制政治批评，英国政府对所有舞台剧实施了严格的事前审查。

尽管如此，对大多数本国人和外国人而言，显而易见的是，英国人拥有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媒体。18 世纪 20 年代后期旅居伦敦的经历改变了伏尔泰。对他而言，在英国“每个人都拥有发表关于公共事务之见解的自由”[注 19]，这集中体现了该国智识上的优越性。然而，并非所有外国的出版自由拥护者都如此推崇。尤斯图斯·范·埃芬（Justus van Effen）[注 20]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荷兰随笔作家，他与伏尔泰大约同时在伦敦生活了十多年，

并翻译过笛福、斯威夫特、曼德维尔、艾迪生和斯蒂尔的作品。他被这座首都政治媒体的野蛮行径所震惊。他在 1733 年辩称，英国人倾向于将印刷自由视为一种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利，这并未促进真理，反而摧毁了名誉，加剧了党派分裂，并煽动了危险的民众激情。这种做法削弱而非增强了个人自由。二十年后，《加图来信》的德语译者约翰·戈特弗里德·格柳斯（Johann Gottfried Gellius）[注 21] 向他的读者解释道，英国人有一种喷泄狂野的概括性论调和未经证实的夸大其词的倾向。他观察到，在那些人们并不如此迷恋“自由”的国家，人们的态度往往更加理性和细腻。

后来的美洲访客常有同感。在 18 世纪 80 年代，博学的自由派学者瓦伦丁·德·福隆达（Valentín de Foronda）曾是西班牙最早倡导宗教和政治言论自由的人士之一。但几年后抵达美国时，他对他所发现的一切感到惊愕：

此地所享有的出版自由并非自由，而是一种无限制的放纵，一种疯狂。没有人受到尊重：法国、英国、西班牙及其政府被无休止地侮辱和嘲弄。连他们自己的总统杰斐逊先生也遭到不断的抨击、践踏和诋毁 [注 22]。

然而，除了那种独特的英美前提——即出版自由意味着不存在“事前约束” [注 23]——之外，整个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英语世界言论自由辩论和实践遵循着与其他地方相同的模式：什么算作“言论自由”，什么不算，纯粹是一个权宜的政治问题。正如尼克拉斯·冯·奥雷希（Niclas von Oelreich）[注 24] 在 1766 年向他的瑞典同事指出的那样，英国缺乏事前审查并未给其作家和印刷商提供更大的法律安全感，恰恰相反。许多博识的英国观察家也同意他的观点。笛福 [注 25] 在 1704 年抱怨道，法律未对哪些内容可以安全出版提供明确界定，这使得作者只能任由怀有敌意的诉讼摆布。一个世纪后，伟大的法律改革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持同样观点。他在向一位批评事前审查的法国人士解释道：“你们想要的自由，我们确实拥有” [注 26]：但这只是一种任意的自由，受制于充满敌意的法官和陪审团的反复无常，且无论结果如何，都要面临巨额的诉讼费用。这就是为什么诉讼的可能性对作家和出版商而言如此令人生畏：即使他们在法庭上胜诉，也极易倾家荡产。英国和爱尔兰政府还保留了许多其他形式的印刷品控制手段：他们对报纸征税，通过邮政局控制其发行，贿赂或威吓记者，并对批评政府的作者和出版商进行司法骚扰。在整个不列颠群岛 [注 27] 和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界定出版自由并扩张或制约其边界的斗争——包括论战、文学、法律和政治层面的斗争——始终未曾停歇。

截至 18 世纪 60 年代，[注 28] 关于出版自由应包含批评与嘲讽政府官员及政策之权利的论点已稳步占据上风。在那十年间，针对英国民粹派政治家兼作家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引起轰动的政府起诉，以及他及

其支持者为此发表的一系列精辟的出版自由辩论，对随后所有英语世界关于出版自由的讨论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从 18 世纪 70 年代起，议会记录 [注 29] 被允许自由印刷。1792 年，一项新的《诽谤法案》[注 30] 最终赋予了英国陪审团（而非法官）判定一份文本是否构成诽谤的权利，而这自 1735 年曾格案（Zenger trial）以来已成为美国的通行做法。

然而，在 18 世纪下半叶，内阁对作家和印刷商的骚扰以及对“煽动性诽谤”的起诉在亲政府的法官、议员和公民的助长下依然在持续。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的忧虑战争年代，英国政府因恐惧改革派和革命思想的传播，通过了一系列针对政治异见的严酷新法令，[注 31] 旨在镇压工人阶级、进步辩论社团及组织，以及对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诉求。1792 年的《诽谤法案》是在一项针对“邪恶且煽动性著作”的新皇家公告发布几周后引入的，并被用于发起前所未有的大量针对激进派作家、印刷商和组织者的起诉。在全国范围内，保皇派政治团体紧盯“不忠”且“放纵”的作家与报纸（当然，他们同时也宣称捍卫“真正、纯正的出版自由”）。

三年后，针对“每日印刷、出版和散发的排山倒海般的煽动性小册子与演说”，《叛逆与煽动行为法》规定，凡言论、书写或印刷“任何旨在煽动或挑起民众对君主制、法律或宪法之仇恨的词句”均属犯罪。即便是此前拥有繁荣市场的国王讽刺漫画，现在也被定为非法。从 1799 年起，根据《煽动性社团法》，所有印刷机、印刷机制造商及字模铸造商都必须向当局登记，且印刷商有义务在其生产的任何物件上标注姓名和地址。1819 年英国军队对赤手空拳的政治抗议者进行所谓的“彼得卢屠杀”后，进一步的法律收紧了对公众集会、“亵渎与煽动性诽谤”以及报纸的限制。“出版自由正遭到毁灭”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反对派辞令，到 19 世纪初，它已成为英国进步派写作和图像创作的核心主题。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抱怨道，当没有明确的规则，且“一切都交由他人的意见和品味来决定”——如政府律师、保守派牧师和自发的政治团体时，“还能说任何人拥有写作的自由吗？”

在美国，[注 32] 其报纸密切关注着大西洋彼岸的这些动向。1798 年的《煽动叛乱法》是执政的联邦党及总统约翰·亚当斯在国际危机与战争时期压制国内异见的一次类似的党派尝试。该法律于 1801 年亚当斯任期结束时失效，它将任何蓄意毁谤、针对“美国政府、国会或总统”的“虚假、丑闻和恶意著作”定为犯罪。由此引发的争议，以及反对者关于该法令与第一修正案互不兼容的论点，并没能阻止美国在 19 世纪乃至 20 世纪后期通过其他类似的法律，将“不忠”、“煽动”或其他不可接受的政治言论定为犯罪。

数十年来，对奴隶制的批判通常被归入“不可接受的言论”之列。事实上从美国建国伊始，关于言论自由的国家辩论就与围绕奴隶制的争议紧密交织。到世纪之交，美国约有近百万被奴役的黑人，而自由黑人仅约十万人（总人口约为五百万人）。1787 年制定的新联邦宪法确认并保护了奴隶制；此外，1793 年通过并于 1850 年进一步强化的法令，要求北方各州政府和公民必须逮捕并遣返全美境内任何逃脱奴役的人。在这些“逃奴法”的掩护下，不仅是逃亡者，连自由黑人也经常遭到绑架，被运往南方并卖为奴隶。（秉持类似的精神，在美利坚革命期间及之后，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根据州立法机构、县法院和地方官员的授权，将数百名已生活在自由中多年的黑人男女逮捕，重新奴役并售入 [注 33] 新的枷锁之中。）在南方，奴隶主可能被禁止释放自己的奴隶，甚至连发表废奴言论在法律上也是可惩处的。事实上，此类思想在北方辩论得越显著，在南方受到的压制就越严厉。到 1854 年，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明确禁止传播任何会导致“奴隶产生不满情绪” [注 34]，或导致“自由黑人对社会状况及被剥夺政治特权感到不满”的文本。

这场关于奴隶制究竟是“不可言说的禁忌”还是“合法的公共话语主题”的国家斗争，也在联邦政治的最顶层上演。18 世纪 90 年代后期，居住在费城（当时美国国会的所在地）的多组前奴隶和自由黑人反复向国会递交请愿书。他们是普通人——海员、劳工、码头工人、锯木工、服务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会写字。但他们是庞大且自信的费城自由黑人群体的一部分，组织于费城“自由非洲学会”（1787 年成立）及其附属的学校和教会。他们拥有充满活力且极具号召力的领袖，如传教士和被释奴隶阿布萨洛姆·琼斯（Absalom Jones）和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他们还与白人废奴主义活动家（特别是贵格会教徒）保持着密切联系，后者在游说地方和联邦政府反对奴隶制方面经验丰富，并在 18 世纪 90 年代持续以此为业。这些团体在 1797 年 1 月和 1799 年 12 月提交的两份自由黑人请愿书 [注 35]，正是建立在多年跨种族规划与行动主义的基础之上。

他们的诉求既大胆，又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进行了审慎的权衡。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地声称不要求“立即实现全体解放”，但其最终诉求是“采取适当措施，在适当时机解放其全体同胞”。与此同时，他们揭露了以《逃奴法》之名行不义之实的行为，要求获得法律保护以抵御奴隶捕手的抓捕，并谴责违反 1794 年《奴隶贸易法》（该法禁止美国船只参与国际奴隶贸易）的行为。从根本上说，他们辩称，奴役黑人本身就是一种“违宪的束缚……即使不构成对宪法宣称的基本原则的直接侵犯，也是一种政府职能的缺失”。因

此，他们请求国会“竭尽所能解除沉重的负担，并为被压迫者走向自由铺平道路”。早在 1793 年，他们就曾草拟过一份流产的请愿书，要求“逐步解放”据他们计算在全美境内被禁锢的所有 70 万名黑人。

这些请愿得到了众议院几位北方议员的支持，并可能产生了一定的立法影响。1800 年，《奴隶贸易法》被进一步收紧；次年，一项由奴隶主支持、旨在进一步削弱自由黑人地位的法案以微弱劣势被否决。然而，国会对黑人诉求的讨论也促使南北双方大多数立法者的观点更趋强硬。

这种多数派观点认为，即便只是改良奴隶制，也是一件“非常不妥且违宪”、“极具伤害性”且过于“危险和令人不快”的事情，甚至不应由国会讨论——这不仅是因为这样做必然会产生“非常严重，甚至是可怕的影响”（即鼓动黑人的希望与动荡），还因为无论如何，废奴都是一个不可能且不被欢迎的前景。1797 年，众议院甚至拒绝接收第一份请愿书，因为大多数议员一致认为黑人的地位纯属各州自行处理的事务。1800 年，在提交第二份请愿书时，众议院几乎全票通过决议：虽然应当调查滥用《逃奴法》和《奴隶贸易法》的行为，但请愿书中关于要求国会采取行动反对奴隶制的更广泛诉求是违宪的，具有“制造不安和猜忌的倾向，因此不应得到本院的任何鼓励或赞许”。

在众议院中，只有一位议员反对这种正式的拒绝，即无畏的乔治·撒切尔（George Thatcher）。他富有预见性地向同事们宣布，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癌症，终有一天会摧毁政治体制”。他以此讥讽他的同事们：“如果先生们认为关于这一主题的辩论会引发如此大的罪恶，那么你们当初为何要引入这种罪恶的实践（指奴隶制）呢？”

1800 年时，他的声音形单影只。他的马萨诸塞州同僚哈里森·格雷·奥蒂斯（Harrison Gray Otis）虽然本身并非奴隶主，却赞同多数人的看法，认为废奴言论是违宪的，且对公共安全构成深重危险。数十年后的 1835 年，当针对该主题的鼓动和递交给国会的请愿书变得更加频繁，且废奴主义者不断援引其言论自由权时，奥蒂斯继续向推崇他的波士顿听众宣讲，为何废奴观点是“最危险的”[注 36]，且在公共话语中“绝不应被接纳”，即便在北方也是如此：

“思想权、言论权和出版自由是一回事——而联合起来在其他州传播不满情绪、毒害家庭安全与舒适的甜美泉源，则是另一回事。”

他的这种情绪得到了其他白人政治家和作家的广泛认同，也得到了在北方各地袭击废奴团体的暴力暴民的支持。特拉华州的一家反废奴报纸在社论中写道：“有人告诉我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良心自由等等[注 37]。这听起来都很冠冕堂皇，我们也绝不想在最轻微的程度上的削减这些宝贵而神圣

的权利。但‘道德叛国罪’或‘协助及煽动国内叛乱’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联邦政府对此表示赞同。1835 年，美国邮政局长和总统支持南北两地的邮政官员拦截并封杀通过邮件寄送的废奴报纸，尽管他们在法律上有义务寄送这些邮件。次年，基于同样的理由，众议院通过了后来被称为“禁言规则”[注 38] 的法案，拒绝审议“任何以任何方式、在任何程度上涉及奴隶制或废奴主题的请愿书、陈情书、决议、提案或文件”。众议员们一致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最终平息关于这一主题的骚动，以恢复公众心理的宁静，是极其重要且令人向往的”。显然，第一修正案对请愿、言论和出版的保护，并不适用于对他奴隶制的批判。

说话者与听众

自从言论自由原则首次在法律上确立以来，关于言论自由的冲突通常被描述为关于其“主题”的冲突——即对于人们应该或不应该被允许说“什么”而产生的歧见。法律、法官和言论自由的捍卫者们倾向于以此为框架：言论自由允许他们讲述关于性、宗教或政治的“真相”。或者，他们的对手辩称，这并非关乎言论自由，而是关乎保护民众免受淫秽、亵渎或其他各类“有毒思想”的侵害——这些思想包括废除奴隶制、宣传共产主义、批判性种族理论、性别与 LGBTQ+ 平等、种族主义或反犹太教条、色情内容、对上帝的中伤、关于选举的谎言、医疗虚假信息，等等。

聚焦于“内容”也是比较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言论限制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1766 年的瑞典人被禁止公开辩论基督教教义、倡导宗教宽容或质疑宪法。在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独立运动领袖安东尼奥·纳里尼奥（Antonio Nariño）因秘密翻译和印刷《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而于 1793 年入狱——然而，他本人对出版自由的解读却是：自由既不能延伸至“仅限于我们神圣宗教事务的真理（这些是不允许讨论的）”[注 39]，也不能延伸至“理应让我们保持沉默与尊重的政府决策”。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做这些事时更为自由——但也仅止于一个不同的限度。例如，1797 年，托马斯·潘恩的《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被伦敦法院判定为亵渎神明。检察官托马斯·埃斯金（Thomas Erskine）告诉陪审团，出版自由是一件伟大且珍贵、理应永远捍卫的事物，“但这种自由与任何其他自由一样，必须受到限制才能被享有；且与人类的每项优势一样，它可能会因其‘滥用’而遭到破坏”[注 40]。而正是这位埃斯金，在几年前潘恩因“煽动性诽谤”受审时曾竭力为其辩护，他在那篇感人至深并被多次再版

的辩护词中引用了休谟、伯克、洛克和弥尔顿的话，将出版自由描述为不可侵犯的“大不列颠人民最宝贵的特权”[注 41]。

简而言之，言论自由所涵盖的范畴始终是权宜且多变的，主要通过界定道德、伦理或政治上“不可接受”的表达类别，从反面（in the negative）进行界定。例如，即便在我们这个拥有无限量、全球化在线色情内容的时代，“淫秽”在各地的定义仍迥然不同，但没有任何地方在法律上保护它。（也就是说，描绘性行为可能是被允许的——但如果法律将其定性为“淫秽”，例如涉及儿童的色情内容，则绝不被允许。）我们构想言论自由的基本模式——即将其视为“禁止内容”的反面——在本质上与 1750 年时并无二致。

然而，由于在大多数西方文化中，法律对“淫秽”、“褻渎”和“煽动”的定义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收缩，因此审查制度和言论自由的历史往往被讲述成一个“非理性的禁忌逐渐被现代更理性的态度所取代”的故事。同样，当今人们习惯于根据所谓言论的“自由”或“审查”程度来对实体（国家、组织、大学校园）进行排名。在这样做时，他们将“表达的宽容度”奉为最高价值，认为其本质上比真理、公平或伤害等问题更重要。所有这些关于言论自由的学术和大众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关注“内容”——即哪些词汇和思想受到了监管，哪些没有。

但言论自由的冲突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仅仅关乎言辞的内容。它们同样关乎“谁”应该被允许说话，“谁”被允许倾听，以及“谁”的声音能被最响亮地听到——换言之，关乎定义由谁来塑造公共话语。如今，拥有“政治发声权”的核心定义是能够自由且平等地参与政府运作过程，尤其是通过投票。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美国，第一修正案中关于“不得剥夺言论自由”的禁令，已演变为赋予那些暗箱操作且往往匿名的实体花费无限量金钱来影响政治过程的合法性；然而，这一禁令却从未被应用于反对“选区划分不公”（gerrymandering）或其他形式的选民压制。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政治言论自由是指讨论公共事务的权利。在 18 和 19 世纪，尽管投票权通常仍局限于极少数拥有财产的自由白人男性，但政治言论自由的新理想，结合印刷品的普及，依然提升了更广泛公众的意见地位及其自由讨论的权利。在任何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代议制政府体系中，这都使得一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无论选举权的范围如何，究竟谁才被包含在“人民”之列？哪些人的声音应当参与塑造公共政策，而哪些人的不应当？

这绝不仅仅关乎谁应当被允许进行“公共演讲”，同样也关乎谁被纳入了“听众”范畴——并因此关乎公共话语的“基调”。自古典时代以来，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未受教育的民众极易受到煽动。在 18 世纪之前，这是将他们排除在政治辩论之外、并限制争议性文本流传的主要原因。但从 18 世

纪中叶起，在一个修辞日益平等化、大众政治传播兴起且出版自由的时代，这种做法已不再可行，尤其是在那些所谓的进步共和国和君主国。取而代之的是，各地言论自由的理论与实践开始依赖于一种不稳定且充满争议的划分方式：将传播分为两类，其分类标准取决于对作者意图及其假设听众的主观判断。一方面是合法的、“理性的”言论与出版；另一方面则是对暴民激情的非理性的、危险的诉求，而后者是不被允许安全存在的。

因此在 1792 年，英格兰总检察长解释称，他之所以未起诉潘恩《人权论》的第一部分，是因为他相信其读者群“将局限于明辨是非的读者”[注 42]，这些人足够聪明，能够洞察书中的谬误。但当第二卷出版时，他被迫采取行动——并非因为内容有所不同，而是因为他声称，该书现在正被“推入”和“强加”到“那部分公众手中，他们的思想被认为并不熟悉此类主题，因此无法在阅读过程中纠正错误”。他认为这是一种向“无知者、轻信者、绝望者”发出的蓄意煽动——“对于那些头脑或许未得到充分开发、未养成阅读习惯的人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1797 年，埃斯金基于类似的理由抨击了潘恩的宗教论点。他解释说：“一本学术著作 [注 43]，无论其多么错误，只要是针对学术界讨论如此深奥复杂的主题，”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潘恩的文本却是“令人震惊且具侮辱性的谩骂”，就像“最厚颜无耻的淫秽内容，显然意在腐蚀纯真，并摧毁和毒害年青一代的道德”。这种蓄意散布毒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理性的、合法辩论的范畴。

种族与理性

每当正当言论自由的问题与种族或性别偏见相交织时，情况就会变得尤为焦灼。1791 年 3 月，在海地革命及横跨加勒比地区（包括多米尼克岛）的奴隶起义初期，当地的一名白人记者托马斯·安克特尔（Thomas Anketell）[注 44] 在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当地动乱的惊恐社论。当总督以诽谤罪起诉他时，安克特尔的支持者们谴责这是对“英国自由人权利”的攻击，并提醒世人，“出版自由被人类中最开明的人士视为自由政府本质之核心”。

安克特尔本人随即调转矛头，将责任推给了一份与之竞争的法语周刊——《自由之友与放纵之敌》（*L' Ami de la Liberté et l' Ennemi de la Licence*）的编辑。他冷嘲热讽地称其为“一个既无品格也无原则的混血儿”。他在自己的报纸《加勒比登记报》（*Charibbean Register*）上警告读者，正是那份报刊在煽动当地的有色人种：“它不仅被自由的有色人种贪婪地阅读，连黑奴也是它的订户。”多米尼克议会也一致认为，黑人与棕色

人种的言论与印刷品才是真正的威胁：无论是“数名心怀不轨的自由有色人种的榜样”，还是《自由之友》每周散布的毒素，“都在鼓励奴隶并发布有利于他们的观点，这对奴隶主的生命和财产构成了巨大的危险”。这被认为不再属于出版自由的范畴，而是一种必须以武力镇压的单纯的“邪恶”。

同样地，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美国关于奴隶制的辩论，不仅是围绕公共政治话语内容的斗争，更是关于谁应被允许参与其中的斗争。一个白人政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关注非白人（无论其是自由身还是受奴役者）？1797年，首批向美国立法机构递交请愿书的四名黑人谨慎地声明放弃“在贵会议事堂中行使代表权的特权”[注45]，并仅称呼议员们为“同胞”。在当时，乔治·撒切尔夫人的举动极不寻常，他将自由黑人称为“深色肤色的公民”[注46]，并断言“每个人生而平等自由，每个人在权利受损时都拥有平等的请愿权”。但到了1799年，第二份自由黑人请愿书也将其签署者称为“一类公民”[注47]，并提到“我们以及美国其他公民”[注54]，且辩称受奴役的黑人与“宪法下的他们（议员们）或其他人一样，是平等的代表与关注对象”。

这些都是极具争议的陈述，因为事实上，一名非白人是否“能”成为公民本身就远未定论，即便在拥有全美最大自由黑人社群的费城也是如此。宾夕法尼亚州1790年宪法仅以泛泛的术语提到公民与自由人，但到19世纪初，当地的自由黑人正公开且暴力地被剥夺其公民自由。“黑人拥有无可争辩的投票权，”[注48]1831年一名当地人告诉来访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但他们从未真正参与选举，因为“多数人对黑人持有极其强烈的偏见，而地方法官无法保护他们行使法定特权”。当该州宪法于1838年修订时，它刻意将公民身份限制为“白人自由人”。

自18世纪70年代革命战争以来，黑人男女及其盟友就一直在公开抗议此类种族歧视[注49]，尤其是在马萨诸塞州这样拥有大量识字自由黑人群体和丰富报业文化的地方。然而，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各地自由黑人原本就脆弱的权利被进一步削弱。1790年的《归化法》规定，只有“自由的白人”才能成为美国公民；两年后，国会仅允许“白人男性公民”加入州民兵。

1820年，一名弗吉尼亚州国会议员解释道：“我们国家的自由黑人[注50]或许可以成为‘居民’（denizens），但据推测，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公民’。”所谓“居民”，是指被“准予享有一部分公民权利和特权，但非全部权利”的人。基于此类理据，南方和西方各州严厉限制自由黑人的自由；在北方各州，他们的地位同样变动不居，且几乎从未与白人居民平等。在全美范围内，绝大多数自由黑人男性不被视为公民，也不享有宪法权利，

更不用说投票权了。最终，在 1857 年，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中）确认：任何“非洲种族”的人都不可能成为公民。

这一时期的国会辩论反映了同一种倾向：即无视黑人声音对政府关注的要求，并将其污名化为本质上非理性的、危险的且不配参与公共话语的人群。1797 年，几名议员嘲笑了撒切尔关于“平等请愿权”的主张。詹姆斯·麦迪逊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他们是奴隶，宪法就没给他们在这里被听取的希望” [注 51]，且查明他们是自由身还是奴隶并非国会的职责。

三年后，面对费城七十多名自由黑人的请愿，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讥讽地称他们为“黑人绅士” [注 52]——他在吐露这个词时充满了蔑视，以至于记录他演说的速记员特意加了斜体。他接着说道：“他们现在告诉众议院这些人处于奴役之中。我感谢上帝，他们确实如此！……那些新奇的法国‘自由与平等’哲学已经渗透进来，并在南方各州的这些‘绅士’中表现得过于明显了。”

他提醒同僚，国会哪怕仅仅讨论奴隶制都是危险的，因为这会鼓动黑人的骚乱：

“因为这些人中许多人识字，他们会获悉我现在所说的话……他们现在会看到，这个论题已经在立法机关中被挑起，关于解放的主题也已经得到了讨论。” [注 53]

另一位南方国会议员对黑人请愿者自称为“我们以及美国其他公民”感到愤慨。他询问他的废奴主义同僚：“尽管你们满怀博爱之心，难道你们真的‘希望看到那些人坐在你们身边，在国家议事厅里商议政事吗？他推测你们并不想’。”

哈里森·格雷·奥蒂斯总结了当时白人普遍存在的、充满不安的复杂态度：一方面，鄙视黑人智力低下且本质上不配享有公民身份；另一方面，又对“那些人” [注 55] 竟然变得识字并表达政治诉求的前景感到警觉。奥蒂斯认为，1799 年的请愿者不过是资深白人活动家的傀儡：黑人自己绝不可能组织出这样的行动。尽管如此，不给他们申辩的机会依然至关重要。因为那将“很快给美国带来祸端……这会教会他们集会、辩论等手段，如果得到鼓励，这些行为很快就会从联邦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

19 世纪 30 年代的北方反废奴主义者以类似的措辞为其行为辩护，尽管他们通常也会口头上贬低奴隶制本身的“邪恶”。在众议院通过“禁言规则”后不久，为了稳妥起见，它还颁布法令称：无论诉求为何，“奴隶并不享有宪法保障给美国‘人民’的请愿权” [注 56]。

1835 年 9 月，纽约州的领袖人物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达成决议：“虽然我们将维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受侵犯 [注 57]，但那些‘就其本质而言会

激化公众情绪’的讨论则是另一回事。”他们认为废奴主义者正在从事“违宪且煽动性的活动”；他们是“公共和平的扰乱者”，其动机要么源于“错觉”，要么源于“险恶用心”，其论点并不受言论自由权的保护。纽约州州务卿、未来的州长约翰·亚当斯·迪克斯（John Adams Dix）指出：“诚然，有人曾说，只要理性可以自由地与错误搏斗，就无需畏惧讨论 [注 58]。但是……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情况，就目前通过在南方流通废奴出版物而进行的讨论而言，在实践中难道不是不安全的吗？”

迪克斯解释道，问题并不在于“向奴隶主进言、说服其释放奴隶的论点（这些论点是无害且可能有益的）”，而在于“这些论点及其随附的陈述会传到奴隶手中”。正因为存在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此类文本便不能作为言论自由而获得辩护。

首先是因为其基调：“其出版物中所包含的大量内容具有极强的煽动性……若传达给奴隶，这便是一种激励，且在某些情况下，在奴隶自己眼中，无疑是起义和流血冲突的正当理由。”其次，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被奴役者无论如何都不受“理性”支配，而是受暴烈的“激情”支配。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进行理性辩论：

在自由人的社会中，不受约束的讨论是防止错误和滥权所必不可少的保障。但谁看不出，在面对一个处于特殊处境、未受启蒙的人群时，讨论的效果可能是唤醒他们对自己处境的认知，却无法启迪他们理解产生这种处境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已永远剥夺了他们自行救济的能力，这种救济是与整体社会的安全相冲突的。

这种试图将反奴隶制声音排除在言论自由范畴之外的尝试在南方大获成功，但在北方最终引起了反弹。多年来，北方的废奴主义者遭到辱骂、攻击、起诉、监禁，有时甚至遭到暗杀。然而，从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他们的观点——即反奴隶制见解是政治意见的正当表达，而南方的批评者才是言论自由的敌人——开始在北方被广泛接受，甚至得到了那些并不十分关心其废奴目标的人的认可。

转而，这激发了一个新观念：第一修正案中提到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实际上是**国民权利**（national rights），属于全体公民。1844 年，国会投票废除了“禁言规则”。1856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C·弗里蒙特（John C. Frémont）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自由人、自由劳动力、自由土地，以及弗里蒙特”为纲领竞选总统。

“奴隶制无法容忍言论自由，” [注 59] 伟大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 1860 年敦促道。当时，波士顿的废奴主义集会正遭到暴民的暴力袭击。他强调，言论自由亦包含了“听取

的权利”：将“言说与听取的权利”结合在一起，才是所有宪法权利中最“神圣”的一项。他在 1863 年观察到 [注 60]，如果联邦政府当初能像支持奴隶主的宪法权利那样，毫不迟疑地维护第一修正案，南北战争就绝不会爆发。

战争结束后，许多政治家和公民 [注 61] 似乎也据此将 1868 年的《第十四修正案》——美国种族平等新宪法保障的基石——解读为确立了这种对第一修正案的广义且国民化的解释。而这早在最高法院开始就此课题发表意见之前，就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的一部分。

性别与地位

通过界定公共话语的方式来使某些声音或听众（而非仅仅是某些观点）丧失合法性，始终是言论政治的固有特征——言论自由的兴起并未改变这一点。但是，正如废奴主义的案例所表明的，这种做法现在变得更具风险，且极易产生反噬。告知民众其声音在公共辩论中不深受欢迎，如今可能更容易激发起他们的反抗，并要求获得发声的权利。

这正是 19 世纪女权运动的动力源泉，而该运动部分是由废奴运动演变而来的。“男性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女性” [注 62] 是一个古老的修辞比喻。但在 1800 年前后的数十年间，普遍性权利语言的广泛采用，结合废奴情绪的兴起，使得一些激进思想家能够真正将废奴事业与女权事业结合起来。正如开创性的美国女性主义者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在 1843 年所问：难道不显而易见吗？白人男性在剥夺这两个群体的平等权利时，对“女性所抱有的偏见与对奴隶的偏见” [注 63] 完全出同一种非理性的源头。

第一位公开支持这两项事业（尽管并未明确建立其内在联系）的言论自由理论家 [注 64]，很可能是 18 世纪那位无畏的巴黎剧作家、小册子作者及单身母亲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在整个 18 世纪 80 年代，她一直在为反对奴役黑人而奔走；不久之后，她又投身于争取女性政治权利的事业。1791 年 9 月 14 日，路易十六批准了法国新的革命宪法及两年前的国民议会起草的《人权宣言》。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该宣言包含了两条界定宗教、智识和政治言论自由的核心条款：

第十条：任何人的意见，甚至其宗教观点，只要其表达不扰乱法律所确立的公共秩序，均不应受到干扰。[注 65]

第十一条：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交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均可自由地言说、书写和印刷，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该自由的行为负责。

就在同一天，为了抗议该文件天生的沙文主义倾向，德·古热发表了自己的反击之作——《女性与女性公民权利宣言》，其措辞巧妙地改写了原宣言的 17 个条款。在此过程中，它首先断言女性拥有平等的公共及政治言论权：

第十条：任何人的意见，无论其多么根本，均不应受到干扰；女性有权登上断头台，她们也必须同样有权登上讲坛，只要其表达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

但它还走得更远。与当时大多数其他女性主义者一样，德·古热将男性对女性的诱骗与抛弃，以及社会对私生子和未婚母亲的偏见，视为父权制度的根源性不公。因此，她对第十一条的改写显式地将压制女性言论与女性的性压迫联系在一起——并将言论自由权与推翻性的双重标准联系在一起：

第十一条：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交流是女性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为这种自由确保了父亲对子女的合法性。因此，每位女性公民均可自由地宣布：

“我是你孩子的母亲”，而不必受野蛮偏见的强迫去隐瞒真相；除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她应对滥用该自由的行为负责。

这种早期女性主义将言论自由作为公民权新概念的精彩介入，在其所处时代很大程度上并未引起注意。但几十年后，在北美，同样的问题以一种更具持续性和影响力的方式出现了：女性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公共话语权？为什么她们应当被排除在宗教和政治辩论之外？在 19 世纪 30 和 40 年代，由于美国废奴运动正深陷于关于言论自由和奴隶制的国家斗争，该运动也因这些问题而产生了激烈的失和。正如在父权制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限制女性言论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殿后防御”行为。因为，自从 18 世纪后期有组织的废奴运动开始以来，大西洋两岸的女性在领导这些运动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并肩作战，进行演说、写作、请愿和煽动。然而，在 19 世纪初期，由于她们的公共知名度日益增加，引发了沙文主义者的强烈反弹。

废奴运动的反对者惯常抨击女性的参与是不正当的，其理由是政治乃男性的事务。1838 年，国会涌现出海量的请愿书，反对接纳德克萨斯加入联邦。德克萨斯的白人及西语裔殖民者曾因墨西哥废除奴隶制而脱离该国，并建立了一个蓄奴的叛乱政权。请愿书的签署者中包括数万名女性。“这些请愿书中有许多是由女性签署的，”[注 66]一位权势显赫的马里兰州国会议员对此嗤之以鼻，并拒绝受理。他表示：“当这种由女性签署的、涉及政治事务的请愿书递交到众议院时，他总是感到遗憾”——女性应当坚守在家务职责这一“妥当的领域”，而“非冲入政治生活激烈的斗争中”。

然而，就在几年前的 1830 至 1831 年间，女性首次向国会发起大规模请愿 [注 67]，抗议政府针对原住民的新型种族灭绝政策（即“印第安人迁移”），当时并未招致此类针对性别的谴责。事实上，签署废奴请愿书的许多人正是当年同一批女性。但这一次，社会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这种反差是因为废奴请愿似乎预示着更大规模且更具威胁性的变革。当时，主流政策是“殖民化”（colonization）——即通过渐进、自愿的解放并将黑人遣返非洲，来减少奴隶保有量。而越来越多的反奴隶制活动家转而鼓吹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废除所有奴隶制。这场“废奴主义”运动最初是按性别界限组织起来的，男女分别拥有独立的会议、社团和大会。但到 19 世纪 30 年代末，当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里姆克姐妹（Grimké sisters）和马萨诸塞州的教师阿比·凯利（Abby Kelley）等著名女性活动家 [注 68] 开始吸引大量男女混合的听众，并加入地方男性的会议时，她们的行为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在一些协会中，人们采取措施剥夺女性的表决权，并阻止她们当选委员会成员；而在其他协会中，她们则被赋予了平等的权利。

1829 年，康涅狄格州的学校教师、支持殖民化政策的活动家凯瑟琳·比彻（Catharine Beecher）曾是全美女性抗议印第安人迁移的主要发起人，她曾主张：“女性请愿者即便在我国最高统治者面前，其声音也是合法且理应被听取的。” [注 69] 但到了 1837 年，她却公开谴责废奴主义者要求采取对等行动的呼吁，认为这在本质上不符合女性身份。她责备安杰丽卡·格里姆克（Angelica Grimké）道：“在我国，” [注 70] “向国会递交涉及立法者职权范围的请愿书，似乎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超出了女性的职责范畴。男人才是向其任命的统治者提出诉求的妥当人选。”

与上述观点相反，对女性主义废奴者而言，奴隶与女性所受待遇之间的相似性变得愈发耐人寻味。安杰丽卡·格里姆克在回复比彻时写道：“对他奴隶权利的调查，使我对自身的权利有了更好的理解” [注 71]，因此，“我只承认‘人权’，而非单纯的男人权利”：凡是男人所做的事，包括投票、请愿和治理，女性都拥有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几个月后，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国会中明确地将奴隶的政治言论权与女性的言论权联系在一起。在“禁言规则”的限制下，议长拒绝让他在众议院议场辩论“宪法并未排除奴隶行使请愿权” [注 72]，也拒绝将他的言论载入正式记录。亚当斯并未退缩，他辩称不仅奴隶属于“美国人民” [注 73]，女性亦然，她们理应拥有政治发声权：“难道女性在涉及公共福利的主题上不应拥有任何见解或行动吗？”如果有人辩称女性无权请愿是“因为她们没有投票权”，他挑衅性地回应道：“难道她们没有投票权这一点就是如此理所当然吗？如

果并非如此，谁能断言这种论调……不是在一种不公之上又叠加强加了另一种不公？”

1839 年，事态达到了顶点。当时，全国反奴隶制协会（Anti-Slavery Association）的大会以微弱优势投票决定赋予女性平等的议事权，并在次年任命阿比·凯利为事务委员会成员。这导致了运动的分裂：传统派代表愤而退场，另行成立了“美国与海外反奴隶制学会”。次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反奴隶制大会（World Anti-Slavery Convention）上，几位美方女性代表的出席引发了类似的危机，因为该大会的英国筹委会原以为只有“绅士”会出席。

令人愤慨的是，筹委会将女性代表安置在“被栅栏和帘幕隔开” [注 74] 的区域，禁止她们参与关于其自身地位的正式讨论，并最终在绝对多数将她们排除在大会之外。那天晚上，两位被拒之门外的代表——路克雷蒂娅·莫特（Lucretia Mott）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决定“在回到美国后举办一次女权大会” [注 75]。她们最终于 1848 年在纽约塞内卡福尔斯召开了这次会议。这成为了有组织的女权运动的奠基时刻，该运动随后为女性赢得了投票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从一开始，这场运动的领袖就并未将其斗争首要视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而是争取那项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就共同体关心的事务向公众自由发声。斯坦顿及其同事后来回忆道，“在倡导黑人种族自由的过程中” [注 76]，她们也被“迫使必须为自己辩护，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

手段与目的

从言论自由作为一项法律和大众原则存在的最初一个半世纪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这些结论又与我们当下的困境有何关联？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因为言论自由构成的底层模式自确立以来始终未变。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始终主要被构想为一种“公共”表达，并主要根据“什么”是不被允许讨论的内容来界定。同样重要但较少被察觉的，是始终存在着对“公众”的定义：即谁能倾听，谁能言说，以及基于何种条件。无论具体的公共场域为何——是街道、立法机构、舞台、新闻媒体、电视频道还是社交媒体——这些条件始终适用。

这种简单的模式使我们能够对比表达自由在不同文化中的含义（无论是在 18、19 世纪还是在当代），同时也指出了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重大变化。总的来说，尤其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对“不可接受内容”的限制已被稳步侵蚀。如今，我们界定公众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18 世纪的观察者们即使在运用政治平等的修辞时，仍维系着一种天然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关于审查、出版、淫秽及相关事项的法律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仍保留了某些等级制原则 [注 77]。相比之下，21 世纪的言论自由理论倾向于预设所有公共发声者和听众在地位上享有天生的平等，而不再考虑他们是否属于天主教徒、黑人、工人阶级或女性（当然，实践中则是另一回事）。

因此，自 18 世纪以来，言论自由的领域得到了显著扩张，尤其是在法律保护方面。然而，任何援引独特政治领域或“公共”活动的言论自由意识形态，仍必然会以性别化或其他规范性的方式行事。例如，20 世纪最受赞誉的法律和文化发展之一，是对性文本和图像审查制度的逐渐崩塌。到 20 世纪 70 年代，色情内容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和自由。这在绝大多数理论中被视为表达自由的胜利，但也由于其涉及的是一个特定的“低价值”非政治言论领域。因此，即使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允许了更大的宽容度，它仍反复重申“淫秽内容”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色情图像不同于作为言论自由所谓“核心”的政治话语。

当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和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等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 [注 78] 开始论证，关于“性”的言论实际上始终是政治性的，且色情内容是一种具有深远厌女效应的公共语言和行动形式时，她们在主流自由主义哲学家那里遭到了冷遇——她们的主张往往被斥为“危险的混淆” [注 79] 和“对言论自由的攻击” [注 80]，而非一系列可供辩论的命题。

因此，除了被认可的言论自由领域随时间发生的显著变化外，我们也很难不注意到一系列根本性的连续性。新的内容禁忌和关于言论的冲突在不同文化领域层出不穷。尽管存在“发声平等”原则，但女性、跨性别者、有色人种、穷人、残障人士和其他相对弱势群体的言论仍惯常被边缘化。这并非我们的言论自由理想所产生的问题——但任何无视这一点的言论自由理论都将是极其匮乏的。谁能说话、谁被倾听、谁制定言论规则，这些始终关乎权力和权威，正如它们始终关乎对伤害和危险的判断一样。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到媒体的形态和优先级所产生并延续的巨大的言论不平等（我们将于第 10 章讨论），无论这种媒体是 18、19 世纪的报纸，20 世纪的广播，还是 21 世纪的社交媒体平台。

言论自由的经典范式预设了社会是由平等的、自主的个体组成的，他们的信念由其理性构建的抽象观念组成——在一种普遍、中立的“思想市场”中自由地选择和抛弃，在这个市场中，所有的命题总是能得到公正和平等的

倾听，人们自然而然地辨别并拥抱真理。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我们实际生活的现实了。

从更根本的层面来看，如果仅将言论自由理解为对“言论内容”或多或少的宽容，或是公共领域“准入门槛”的扩张，往往会导致一种还原论式的关注——即仅盯着言论自由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这种逻辑最终隐含着一种诉求，即我们应当追求某种人人皆享有“完美表达自由”的理想化理论状态。而这恰恰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全力应对从历史中继承而来的言论自由模型所固有的矛盾与复杂性。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曾令 18 和 19 世纪观察者深思的核心问题：**言论自由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们的回答多种多样：其目的是促进真理、传播启蒙、讨论政治问题、追求公正，等等。每一个目的都要求一套不同的言论规则与条件——例如，为了真理而禁止诽谤，为了文明而规避淫秽，或者为了事实而排除谎言。缺乏这些条件，讨论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在我们的时代亦是如此。恰当的规则是表达自由的构成要素：规则赋予自由以意义，并将其导向预定的目标。

这就是言论自由冲突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约束。** 如果目的是确立真理，则需要一套条件；如果是为了公正，则是另一套；如果是为了政治合法性，则又是另一套；如果是为了艺术创作或娱乐，则更不相同，以此类推。甚至在我们产生分歧之前，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一个内在不稳定、充满矛盾的理想。更简单地说，如果你不把表达自由视为一种“手段”，而仅仅将其视为“目的本身”，那么结果就是你为了言论而推崇言论，将其奉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使其重要性超越了真理、公正、公平、民主或任何其他价值。这不仅在逻辑上存在问题，还隐含着任何约束都是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实践效果，恰恰会加剧大多数早期言论自由理论家所极力避免的严重问题：一个充斥着仇恨与诽谤的公共领域、谎言的毒害，以及煽动者的政治。

在更深层次上，内容与发声权这些永恒的言论自由问题，也无法通过简单地断言“人人皆有权说一切”来解决。言论的目的是交流——但所有的交流若要具备可理解性，都需要共同的规则。其中一些是基础性的（你能读懂这段话是因为我们都懂英语），但大多数是语境性的（你与令人生畏的新上司互动的方式，显然不同于你对待孩子的方式）。因此，任何言论的意义都严密地取决于其**语境**：谁在说，其意图为何，听众是谁。同样的措辞，其意义可能因这些因素而迥异——是美国总统在全球广播中发表的言论，还是学者在学术文章中进行的审视，抑或是醉酒青年在空旷酒吧里的胡言乱语？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对一个承载着沉重历史负担的词（如“nigger”）[注 81]，也很难通过硬性且快速的立法来规范其使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言论自由冲突（无论是在现实中、网络上还是其他地方）都可以被理解为“交流误导”——也就是说，说话者的意图、听众的性质以及言说语境之间发生了错位。这也从更广泛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则不能仅仅基于“内容”。在幽默和其他形式的艺术表达中尤其如此，因为这些是所有交流中最复杂、微妙且依赖语境的形式。什么是好笑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高雅的——这些都是评判喜剧言论边界的相关标准。它们都有不同的答案（且作为一个集体，我们总是会对此产生分歧），而且它们都极度依赖于语境。

在每一种情况下，基调很重要。意图很重要。听众很重要。媒介很重要。时间与地点很重要。场合很重要。历史背景很重要。一切都很重要。关于大屠杀（Holocaust）可以开玩笑吗？当然可以。没有任何主题是禁区。但真正困难的问题并不在此：它作为一个笑话是否成立，以及我们是否认为它是可接受的，取决于**谁在讲，为什么讲，在哪里，在何时，以及对着谁讲**。强奸犯讲的强奸笑话，与幸存者讲的强奸笑话，是完全不同的言语行为。1830 年代卡茨基尔山的犹太喜剧演员 [注 82] 拿吝啬的犹太人开玩笑是一回事；而 21 世纪一个非犹太裔捣乱者将讽刺贪婪的犹太银行家的视频上传到 YouTube 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此人声称这“只是喜剧”，且其他人（无论是否意识到其中的反犹主义）觉得它很好笑。

区分可接受言论与不可接受言论是正确的。在非正式场合，我们所有人时时刻刻都在这样做。然而，我们的言论自由原则由于过分聚焦于内容，其实并不足以帮助我们清晰地阐明其中的原因，甚至不足以承认那个基本真理：**即一切言论的意义都取决于其语境**。真正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应该允许人们说那个吗？”，更不是“你支持言论自由吗？”。相反，问题应该是——“自由”应当意味着什么？言论自由是为了什么？以及，我们谈论的是谁的言论，在何处，又是对着谁说的？从这些命题出发，或许不会让我们更容易达成一致，但它肯定能产生一种更诚实、更具建设性的对话。

帝国纠葛

现代关于言论与出版自由的理念出现于 18 世纪的欧洲及其帝国版图内，它是几项相互关联的发展之产物：印刷术的普及及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启蒙运动对于跨境交流世界各领域知识的热忱；以及一种日益坚定的信念——即通过报纸、小册子和其他形式的印刷品进行公共讨论，政府的运作效率亦能得到提升。

这一进程同时也伴随着欧洲帝国主义的新高峰。在具有种族化公民身份、自由与权力等级的殖民语境下，出版自由应当呈现何种形态？定居者（settlers）与底层民众（subalterns）是如何理解并利用言论自由概念的？这些问题随后将在全球各地相继出现。但在英语世界，这些问题显得最为迫切，因为那里有着早熟且坚定的出版自由理想，以及独特且发达的印刷领域。据估计，到 1828 年，全球近一半的报纸是以英文印刷的。[注 1]

正如我们所见，在美洲的英语定居者殖民地，早在言论自由与政治革命建立联系之前，它便是种族霸权的标志，而自由出版则是奴役的工具。然而，即使在这些环境下，言论自由也绝不可能完全局限于统治阶级的言论与论点。妇女、仆役、外籍人士、异教徒、深肤色者和被奴役者——各类“下等民众”——不断地主张并挪用言论、倾听和被倾听的权利。

言论自由在印度呈现出了更为迥异的形态。在 18 世纪下半叶，印度出人意料地成为了英国最新、最大且最珍贵的殖民地。当时，印刷文本在当地基本不为人知，更遑论出版自由的理念。当地的欧洲人口极少，在庞大、富庶且高度文明的本土文化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始于 1757 年，一家拥有私人雇佣军的英国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突然成功地将其势力范围从少数沿海据点向外扩张，并在几十年内获得了对孟加拉及其他重要领土的统治权。由此开启了英国对南亚次大陆长达近两百年的征服与占领。

追踪言论自由理想与实践在这一语境下的演变过程，有助于阐明欧洲帝国主义鼎盛时期殖民统治的特征以及本土社会的响应。同样重要的是，殖民经验深刻地渗透到了西方关于言论自由的观念之中。这种“反向影响”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人生与思想中体现得最为清晰。密尔是英美个人自由与表达自由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他是一位伟大的进步哲学家，其著作至今仍是英语世界个人权利理论的基石。然而，他恰好也是一名忠实、终身供职于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他在著作中提出的关于言

论自由的观点——包括被视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元典的《论自由》（*On Liberty*, 1859）——通常被视为中立、普世且具有启发性的论证。但事实上，这些主张带有深刻的帝国主义色彩，且在智识上存在缺陷。

为帝国辩护

若要理解殖民地印度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如何演变的，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帝国统治是如何获得合法性辩解的 [注 2]。从 1800 年左右开始，英国人通过一种“历史必然性”的意识形态为其海外行为进行辩白。这种意识形态包含几个要素：古老的清教徒关于“天命”（God's providence）的观念；近代对“个人良知”的尊崇（使得主观意图而非客观结果成为终极伦理标准）；以及一种全新的信念，即人类社会要经历从“原始”到“文明”的发展阶段，而衡量标准则是其农业体系、政府形式以及对女性的待遇。

其结果是，国家的命运被认为是由神圣天命和不可改变的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与这些不可阻挡的力量相比，动机良好的行动者几乎无需为不幸承担太多责任。更有甚者，由于历史的弧线被假定始终向“进步”弯曲，即便毁坏性或不道德的行为也可以被开脱，因为它们很可能最终被“历史所证明”。在帝国主义的伦理学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终极审判总是被推迟到未来。

这种普遍的观点变得极其深入人心。即便是在 19 和 20 世纪一些最严厉的西方殖民主义批评者，也认同这种假设，即人类历史沿着单一路径不可阻挡地前进，而个体仅仅是在执行预定的程序。卡尔·马克思在 1853 年告诉《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读者，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一部赤裸裸的敲诈、偷窃和谋杀的“毁灭性”编年史。他指出，尽管英国帝国主义者满口高尚的伪善之辞，但其首要动机显然是贪婪。然而，这种“将……人民拖入血泊与泥泞，历经痛苦与堕落” [注 3] 的过程也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因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消灭亚洲社会，并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他总结道：“无论英国犯下了多少罪行 [注 4]，在引发那场革命时，它都是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正如历史学家普里娅·萨蒂亚（Priya Satia）嘲讽地观察到的那样，在西方人眼中，被征服的印度人所遭受的苦难对他们总是有益的：“仅仅是为了——一场更伟大的时代产痛而经历的阵痛而已” [注 5]。

然而，极其讽刺的是，这种态度本身起源于英国人深重的罪恶感。在 18 世纪后期，面对日益增多的关于帝国腐败、流血和失政的证据，以及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惨痛丧失的现实，英国人对其海外事业的影响陷入了良知危

机。亚当·斯密在 1776 年观察到，欧洲帝国的起源是可耻的：那纯粹是对被残酷剥削、屠杀和奴役的“无辜土著”所施加的“愚蠢与不义” [注 6]。在欧洲各地，其他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对帝国主义持高度批评态度 [注 7]。到 18 世纪后期，英国在美洲的财富和权力依赖于对数百万被绑架和奴役的非洲人的残酷剥削，这已成为一个尤其无法回避且令人不安的事实。

人们对英国在印度行为的担忧也日益与日俱增。从 1600 年成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东印度公司 [注 8] 与其他欧洲贸易公司一样，在当地建立小型沿海据点，与实力雄厚的本土统治者谈判结盟，并从该地区巨大的财富中获利。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落及其联盟的瓦解，该公司及其由印度士兵组成的规模不大的军队（即“西帕依”，sepoys）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随后，从 1750 年代中期开始，这家贸易企业利用孟加拉地区的权力斗争，仓促地演变为对广大领土的军事征服、掠夺和征税。其结果不仅导致被掠夺的印度财富大规模且持续地流向不列颠群岛，并使公司官员个人极度暴富，还在英国国内引发了巨大的公众焦虑，人们对这种伴随非计划性帝国扩张而来的私人腐败和管理失当感到不安。

“我们杀戮、废黜、掠夺、篡位，” [注 9] 一位前国会议员在 1772 年惊恐地写信给心腹——数百万孟加拉人最近死于一场由东印度公司的贪婪所引发的饥荒。此时，公司正挣扎于巨额债务中，不得不由英格兰银行和政府出面救助。到了 1780 年代，尽管议会多次尝试修整，但一个腐败的私人公司对印度的显著误治已演变成重大的政治丑闻。当首任孟加拉总督、公司官员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于 1785 年回到英国时，他遭到弹劾并受审。与此同时，接连不断的议案和调查稳步削弱了东印度公司的权力，要求政府全面接管公司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这最终于 1858 年成为现实。

正是为了克服这场巨大的信任危机，英国人在 1800 年后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即他们在全球的帝国事业实际上是由高尚的道德目的所驱动的 [注 10]。为了赎还过去奴役和误治的罪孽，英国从此将在各地努力根除奴隶制，并将“低等民族”从精神和肉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传播自由、基督教和自由贸易，用英国文明取代腐败的当地习俗。这种深受种族化、等级化影响的愿景不仅被保守派思想家接受，也被大多数进步派人士认可：事实上，其许多原则最初是由反对奴隶贸易的活动家们提出的。在各派英国观察家眼中，“自由”是白人仁慈地赐予的东西；黑人和棕色人种只能逐渐变得能够完全配得上它。

就印度而言，这一观点早期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是 19 世纪初最激进的民主改革家之一——不倦的苏格兰功利主义者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他那部宏篇巨著、多卷本的《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1817) 耗时十二年写就，并在出版后立即获得成功，成为畅销书。在这本书中，他在从未涉足印度、也未学习过任何当地语言的情况下断言：这个次大陆显然是一个停滞、愚昧的地方，时间在那里停滞了数个世纪。他称印度人是“粗野且未受教化的” [注 11]、“无知的”、“野蛮的”、“非理性的”、“迷信的”、“未开化的”、“无精打采且懒惰的”，且表现出令人不快的贪婪和肉体上的肮脏。

他认为，他们表现出“欺诈和背信弃义的普遍倾向” [注 12]，以及“习惯性地藐视……他们的女性” [注 13]（这对密尔这样的思想家来说是典型的“野蛮证明”）。其主导宗教中“许多阴郁和恶毒的原则” [注 14] 培养了“那种复仇的心态、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以及经常隐藏在印度教徒微笑外表下的积极残忍”。他们的文化从未有过太多成就，即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也是如此。相反的断言仅仅是寓言和误解：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在通往文明的进程中迈出了最初的几步” [注 15]。密尔宣称，欧洲民族在所有时代都展现出“卓越的性格” [注 16]、“男子气概和勇气”。相比之下，印度人在大多数方面始终“极其低劣”：他们是“一个柔弱的民族”，天生“奴性且怯懦”。

密尔承认，印度过去在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历史确实是一场充斥着愚蠢与贪婪的悲剧；但现在，展望未来，英国人拥有一个伟大的机会，可以用现代规范和法律取代其原始文化。他后来宣称，对少数仅存的独立印度统治者采取的最佳政策就是“向这些国家开战并征服他们” [注 17]，这在他看来轻而易举，因为英国人在“文明程度上远超当地人”：唯有欧洲统治才能为落后民族带来进步。密尔的这部著作成了英国派驻印度官员的首选指南。他本人及其三个成年的儿子后来也都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的资深官员。

那些真正前往印度的英国行政官员往往更懂得欣赏当地文化，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带有类似的家长式作风（paternalist views）。乔治·坎贝尔

（George Campbell）是东印度公司一名医官之子，十几岁就加入了孟加拉民政服务机构。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成为了印度最卓越的行政官之一，官至孟加拉副总督；他不停地推行新改革，始终关注本土民众的“幸福与福祉” [注 18]。他毕生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放眼世界，无论何处，“白人”文明都优于他们所统治的所有各类“黑人”和“有色人种”。

但他同时也真诚地相信，后者是可以被改良、“提升” [注 19] 并“同化至白人标准” [注 20] 的。1853 年，他热忱地向英国公众报告称，印度人似乎完全有能力接受“殖民化、皈依以及引入欧洲道德、习俗和艺术”所

带来的“益处”[注 21]。显然，他们只是还停留在较早的发展阶段，就像古代的欧洲人一样。而现在，引领他们前进是英国的神圣天命：

无论我们在历史上回溯，还是在地理上东行，我们旅行的方向大体一致；绝大多数现今看似东方特有的风俗习惯，在西方的早期岁月中都能找到平行参照。既然如此，东方为何不能同样具备进步的能力？既然起点水平相似，为何不能像西方那样被提升？……我相信我们能够且应当这样做……上天已经赋予我们一项不可懈怠的任务。

这种观点的核心在于一项教条：英国的帝国统治并非为了私利，更非为了盈利；相反，它是上帝赐予的沉重责任，旨在保护和辅导低等民族——正如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后来著名的措辞：“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密尔在 1810 年辩称：

“英国在印度的政府是为了当地人的利益，而非为了英国。印度从来都只是一个负担；恐怕除了作为负担，它无法呈现为任何其他形态。但这种在印度的英国政府，尽管存在种种恶习，对印度斯坦的人民而言仍是无法言喻的莫大恩赐。”[注 22]

到 19 世纪初，大多数英国人都开始相信这一神话，全然不顾其国家从印度攫取的财富正在巨额增长，这无疑是国家级自我欺骗的惊人壮举。与马克思一样，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也被英国人在该问题上表现出的深重“两面派和虚伪”[注 23]所震撼。他在 1843 年写道，“英国人在印度所做的一切，其他欧洲国家也都会做，”然而，“我无法释怀的是，他们总是试图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出于某种原则，或是为了当地人的利益。”

1857 年，由英国雇佣的印度兵（sepoys）发起的反抗英国统治的大规模起义，以及 19 世纪中叶帝国境内爆发的其他本土叛乱，迫使人们对这种乐观的叙事逻辑进行了一些反思——尽管反思程度有限。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可怕的暴力？这是英国误治的证据吗？在 19 世纪后期，大多数英国人选择了一个最方便的答案[注 24]：历史似乎不仅证明了某些社会优于其他社会，还证明了“本土”文化本质上是原始、暴力且抵制进步的。历史的长征已经与他们擦肩而过。这不仅证明了他们的从属地位是合理的，更使其在历史上具有了必然性。

这种观点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更明确的种族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崛起的支撑。1910 年，时任内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提议对“退化”的英国人进行大规模绝育和监禁，以增强英国“种族”，他长期以来一直坚信“雅利安血统注定会取得胜利”[注 25]。本着类似的思路，他在 1937 年告诉一个帝国委员会：

“我不承认……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黑人遭受了巨大的不公。我不承认由于一个更强大、更高级、或者用世俗智慧的话说更老练的种族到来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就对这些人构成了不公。”

1943年，当他担任首相期间，数百万孟加拉人死于一场由英国粮食政策引发的饥荒，他在解释为何拒绝提供援助时，援引了“印度人像兔子一样繁殖”的论调。

认为原住民社会不可救药地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假设，赋予了帝国主义一个不同但更深层的伦理辩护：殖民统治的道德基础现在变成了“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佳手段”。1857年之后，英国人不再试图违背原住民的本性去“开化”他们，而是从“直接统治”转向了“间接统治”的形式，保留而非取代其殖民臣民那些看似隔代遗传的宗教、习俗和仇恨。在使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从属于自己的同时，英国人还越来越多地将原住民群体细分为不同的种姓、部落、宗教和种族。这些群体中每一个[注 26]被认为恒久不变的“本土”传统，现在都被编纂成一套独立的习惯法和权力体系，并据此进行统治。

与此同时，由于英国人既受益于原住民的不团结，又假定这种不团结具有永恒的特性，其帝国政策往往加剧了社会冲突。通过将流动性的社群关系重组为固定的种姓、部落和宗教身份，并赋予这些宗派标签日益显著的法律和领土意义，他们以灾难性的新方式将这些身份政治化了。当暴力随后爆发时，它被归咎于古老的仇恨，而非殖民干预。随着“民族同质性”成为欧洲民族国家观念的核心，它也为殖民地“少数群体”的指定与流离失所、以及领土的大规模分割提供了辩护：例如，1921年的爱尔兰分治和1947年的印巴分治便由此而来。由此产生的任何流血冲突，其道德责任再次不在于仁慈的殖民监护者，而在于那些头脑发热、无法遏制敌对情绪的土著。

印刷术进入印度

在这些特殊的环境下，英国人及其殖民臣民是如何构思言论与出版自由的？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印刷术本身是作为一种殖民进口物出现的。在前殖民时代的印度，这是一个高度识字的社会，阅读与书写受到高度重视并广泛传播[注 27]。其贸易、治术、法律体系和宗教都维系着精致的抄写员文化(scribal cultures)。同样，其充满活力的政治辩论公共领域，不仅通过持续的口头讨论进行，还通过私人信件、密函、公共简报和书面告示的不断流通来运作。

印刷术在上述任何活动中均未参与。东印度公司[注 28]及其他欧洲定居者的交流系统亦是如此，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于文书、信使和手写文件。尽

管印刷书籍是从海外进口的，但直到 17 世纪末，印度全境只有一台印刷机，那是属于果阿（Goa）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团的机器。这台机器于 1556 年运抵，直到 1674 年一直被用于印制宗教文本。此后，我们仅知在 1670 年代的孟买、1710 年代起特兰奎巴（Tranquebar）的丹麦传教士、以及 1750 和 1760 年代的法属本地治里和英属马德拉斯曾有过零星的印刷实验 [注 29]。直到 1778 年，即东印度公司接管孟加拉政务数年后，该公司才在该省获得了一台印刷机。正是在这一节点，印刷话语以一种持续的方式进入了印度的公共领域——紧随其后的便是关于出版自由的最初冲突。

这种欧洲技术在加尔各答北部的公司胡格利（Hooghly）基地的引入，是首任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发起的运动的一部分，旨在向英国公众展示其庞大的新殖民领地的重要性和文化丰富性。他的另一大雄心是掌握当地的法律和习俗，以便更好地统治当地人。为此，他鼓励部下研究印度的语言和文本。在他的资助下，一位年轻才俊、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语言学家纳撒尼尔·布拉西·哈尔赫德（Nathaniel Brassey Halhed）[注 30] 于 1778 年夏天撰写了在胡格利印刷的第一部文本。此前，他已为黑斯廷斯编写了一部由婆罗门法律家委员会汇编的印度教法律摘要，并送往伦敦出版。现在，另一位通晓多国语言的公司官员查尔斯·威尔金斯

（Charles Wilkins）组建了一台印刷机，教会了一名当地铁匠铸造当地文字的活字，并印制了数百页哈尔赫德的《孟加拉语语法》（*Grammar of the Bengal Language*）。

此书的目的在于向英国人说明，孟加拉语这种方言不仅值得研究，而且是实现其霸权的核心工具。哈尔赫德力主，英国人掌握孟加拉语将提供“一种在政府与其臣民之间、在负责统治的欧洲本土人与负责服从的印度居民之间通用的交往媒介” [注 31]。孟加拉的新统治者应当将“其语言加入到他们的掠夺成果中……以便在发号施令的同时说服人心”。在此过程中，英国人还能指导“现代孟加拉人这一文盲且粗心的种族” [注 32] 正确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因为“他们的字母形式、拼写模式和选词用字都同样充满了错误且荒谬”。哈尔赫德时年仅 27 岁，在孟加拉待了不足 6 年；但带着典型的帝国式狂妄，他毫不怀疑自己对当地口语的理解已经远超原住民本身。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的，从一开始，“对印度的征服就是对知识的征服” [注 33]，而对语言的驾驭正是权力话语的一部分。

更广泛地说，哈尔赫德信心十足地预言，印刷术的引入必将在多方面促进印度社会的进步。让原住民接触到印刷术这一伟大的“进步引擎”，将使：

“大不列颠得以为这一她已将其从亚洲式奴役中拯救出来的人民，引入欧洲文学的所有更为实在的优势：通过赋予商业新的活力与效率来促进财富流通，并通过简化社交手段来推动公民社会的进步。” [注 34]

哈尔赫德 (Halhed) 将印刷术构想为仁慈统治者传播启蒙的高尚工具。然而，就在他撰写这段文字的同时，这种愿景正受到几英里外下游另一项竞争性业务的挑战，其理念截然不同。就在几个月前，一位名叫詹姆斯·希基 (James Hicky) [注 35]、因负债被关押在加尔各答监狱的穷困潦倒且脾气火爆的爱尔兰冒险家，为自己制造了该地区第一台印刷机。他开始用这台机器生产廉价的传单、广告、日历、历书和其他零星印刷品。

希基是一个典型的帝国创业者 [注 36]，他那四处漂泊的生活轨迹和机遇深受英国不断扩张的全球版图所塑造。他 1730 年代出生于爱尔兰，起初在都柏林跟随一名律师接受培训，随后在伦敦当过印刷学徒，曾在英国战舰上服役，做过大律师的文员，最后在奴隶船上担任外科医生助理，在多次前往美洲的跨大西洋航行中协助诊治和镇压非洲俘虏。为了寻求更大的财富，他决定去东印度碰碰运气。1773 年抵达加尔各答后，他曾执业行医并试图投身贸易，但最终破产。开设印刷店仅仅是他最新的风险投资。

希基在他的监狱棚屋里为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印制了数千份表格。但在 1778 年获释并在加尔各答集市开设印刷所后，他争取利润更丰厚的政府合同的企图却因威尔金斯 (Wilkins) 新设立的印刷机而受阻，后者垄断了这些合同。于是，希基采取了此前英国印刷商进入美洲新殖民市场时所使用的策略：为了招揽生意，他创办了一份报纸。他自豪地标榜自己为东印度公司“最早且前任的印刷商” [注 37]，并获得了总督黑斯廷斯的许可，“每周印刷一份报纸，以供定居点消遣” [注 38]。1780 年 1 月，《希基孟加拉公报，或加尔各答综合广告报》 (*Hicky's Bengal Gazette: or Calcutta General Advertiser*) 创刊，成为全亚洲第一份印刷报纸。它立即引起了轰动。几周之内，报纸的专栏就填满了付费广告、新闻和评论。希基不得不随之在他家门口挂上一个特制的信箱，“以便更迅速、方便地接收所有有用且有趣的资讯、诗歌等” [注 39]。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坚守最初构想的简单计划。他宣布自己的“主要意图” [注 40] 仅仅是取代那些在城里杂乱无章地兜售和张贴手写广告的本土信使。相反，他的报纸将提供一个定期的印刷平台，流通那些“有用或有趣，并倾向于促进勤勉个体之贸易事务”的信息。他的创刊计划书详细列出了报纸将承载的 22 类有用信息，从出生、结婚和死亡，到商品的即时价格。为了强调其毫无争议、纯粹商业性的意图，他承诺绝不刊登任何“可能对任何个体传达丝毫冒犯”的内容；报纸创刊后，他拒绝了政治投稿，

因为他“决心不成为任何党派的煽动性奴隶”。在其运营的前11个月里[注41]，在独占市场的局面下，《希基孟加拉公报》极少发表评论文章，也从未提及出版自由或相关话题。

然而，这份报纸的成功证明了在孟加拉数千名欧洲殖民者中存在一个利润丰厚的新闻纸市场，这很快吸引了财力更雄厚的竞争对手[注42]。不久，一对人脉广泛的英国创业者开始挖掘希基的客户，他们获得了自己的印刷机并创办了《印度公报，或加尔各答公共广告报》（*India Gazette; or, Calcutta Public Advertiser*），这份报纸得到了公司高级官员的推广和资助。其制作工艺更为考究，很快便成了孟加拉政府的非正式刊物，抢走了希基的订户和广告商。就在希基终于掘到真金之际，这一对其财富的沉重打击，使他从一个平淡的商业新闻简报所有者，转变为一名激进的政治斗士[注43]。

尽管其竞争对手的动机似乎主要是商业性质的，但希基（Hicky）却将《印度公报》（*India Gazette*）的出现解读为一场恶毒的阴谋。在该报创刊后，他自己的报纸控诉一名权势显赫的地方官员通过腐败手段阴谋毁灭他。在孟加拉委员会谴责这种公开诽谤并禁止《公报》通过邮政系统分发后，希基将其专栏转变为对东印度公司及其政府、官员、军队、司法机构和教会“暴政”与腐败的持续严厉抨击[注44]。他以愈发恶毒的言辞对公司领导层进行人身攻击，引用《加图来信》（*Cato's Letters*）中的摘录为自己辩护，并将自己塑造为一名遭受不公压迫、捍卫英国权利与出版自由的斗士。

这种局面持续了六个月后，黑斯廷斯及另一位地方权贵指控他犯有刑事诽谤罪。希基被逮捕并关入监狱，随后被判处额外一年的监禁。在整个过程中，他在狱中坚持继续印刷报纸——痛斥被他称为“大莫卧儿”（the Great Mogul）的黑斯廷斯是一名贪婪且懦弱的独裁者，其军队已濒临哗变，他甚至为本土统治者反抗黑斯廷斯的起义进行辩护。最终，在经历了几次进一步的诽谤定罪后，希基的印刷机被没收以抵偿债务。

1782年3月底，最后一期《公报》[注45]出版，其内容是对黑斯廷斯暴政、压迫和迫害的最后谴责，以及一份招揽新广告商的绝望呼吁。几天后，他的头号对手《印度公报》宣布公开拍卖他的印刷机[注46]和字模。而他的另一位竞争对手——公司印刷商威尔金斯（Wilkins），则以极低廉的价格将这些资产收入囊中。

《希基孟加拉公报》(*Hicky's Bengal Gazette*)的兴衰是一场国际性事件。从始至终,该报都纠缠在由英国、欧洲和美洲印刷品构成的全球网络之中。当希基在伦敦担任印刷学徒时,他的师傅威廉·费登(William Faden)曾于1760年创办了一份成功的日报——《公共分类账:或每日商业与情报登记报》(*Public Ledger: Or, Daily Register of Commerce and Intelligence*)。希基自己的项目便效仿了该报以及其他英美范例。他尤其受到西印度群岛报纸成功经验的启发[注47]——那是他在多次押运装满染病及垂死非洲奴隶的船只抵达当地时注意到的。(在加尔各答担任印刷商期间,他也刊登过买卖当地奴隶的广告[注48],并充当奴隶交易与抓捕逃奴的中间人。)他的《孟加拉公报》所使用的座右铭——“向所有党派开放,但不受任何人影响”[注49]——正是采用了费登《公共分类账》所创造的著名口号,正如许多美洲报纸此前所做的那样。该公报部分依赖于转载海外报刊的文章;很快,它也被吸纳进同样的全球新闻流通渠道中[注50]:其专栏不仅被英国媒体引用和转载,也出现在法国、德国和北美的报刊上。

这种国际语境解释了希基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将其报纸转化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反对媒介和言论自由意识形态的载体。到1780年,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的统治,以及其官员显而易见的腐败和私相授受,在英国国内和当地定居者中都是热门的政治课题。(事实上,就在《希基孟加拉公报》被关停之际,下议院正准备投票召回黑斯廷斯,以及主持希基审判的法官、黑斯廷斯的终身挚友兼亲信伊莱贾·英佩爵士[Sir Elijah Impey],以面临腐败指控。)因此,一旦希基向政治批评开放专栏,匿名通讯员们宣泄抱怨的稿件便如洪流般涌入。黑斯廷斯在孟加拉委员会中的死对头菲利普·弗朗西斯(Philip Francis)——一位才华横溢的辩论家和老练的舆论操盘手——便是对希基的新政治立场感到欣喜并试图加以利用的人之一,即便他在1781年间返回英国游说弹劾黑斯廷斯和英佩之后,仍未停止这种操纵。希基及其盟友所采用的关于腐败、暴政和自由的修辞并非地方性产物或新发明,而是国际通用且根深蒂固的。他们将自己比作英国激进分子、爱尔兰爱国者和美洲殖民者——使用着一种到1780年时已在战火纷飞的英语帝国全境(从英国到北美,从加勒比海到印度)引起共鸣的关于权利与不公的语言[注51]。

1780年11月后在《希基孟加拉公报》上突然出现的诸多关于出版自由的援引和案例[注52],正是这种广为人知的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像无数其他激进分子一样,希基将自己及其支持者塑造为“加图”(Cato)。他引用了伦敦印刷商亨利·桑普森·伍德福尔(Henry Sampson Woodfall)的著名案例——伍德福尔曾因在其报纸上发表一系列匿名抨击时任内阁的专栏文章(署名“朱尼厄斯”[Junius]),于1770年被宣判煽动诽谤罪名不成

立。他还诉诸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这位近期最伟大的英国政治自由与出版自由捍卫者的榜样及其保护，辩称自己的处境在本质上与之完全相同。

菲利普·弗朗西斯（Philip Francis）是另一位精于此类修辞的大师。十年前，当他在英国开启政治生涯之初，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朱尼厄斯信札”（*Junius letters*）的匿名作者，也是威尔克斯在伦敦媒体界最强有力的辩护者。1780年11月的加尔各答，就在希基开始控诉压迫时，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极有可能出自弗朗西斯本人之手。信中将希基比作那两位早期的自由捍卫者，肯定了这位印刷商对自己作为“反抗暴政的勇敢殉道者”的自我定位，并以出版自由之名，敦促他继续抨击黑斯廷斯和东印度公司：

“希基先生的情况[注53]与威尔克斯先生完全相同。——前者捍卫出版自由，后者捍卫臣民自由。朱尼厄斯曾就威尔克斯遭受的压迫发表过如下公正且优雅的评价：皇室愤慨的光芒与其说是为了摧毁，‘不如说是为了照亮那个受迫害的对象’……

本文作者希望，定居点民众的慷慨能证实朱尼厄斯这一立场在希基案中的适用性。我敢断言，希基绝不会因卑躬屈膝地屈服于独裁且非法的压迫，而令‘英格兰人’的名号蒙羞，或放弃其生而享有的权利。”

针对此类辩论，希基的反对者不仅动用了法律和政治权力，还提出了他们关于出版自由的反向论点。一方面，他们将希基的作品贬斥为纯粹的放纵（*licentiousness*）。首席大法官英佩向他在英国的朋友们解释称，希基制造的是“一份充斥着最下流谩骂的周报”[注54]以及“最具煽动性的诽谤”。另一方面，他们蔑视这位自诩为“出版自由”捍卫者的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虚伪、压迫他人的恶霸。当希基叫嚣着攻击他的控诉人、法官和陪审团时，英佩在法庭上宣称：“这就是其吹嘘的出版自由，它是真正奴役制的产物。希基先生竟然在威胁那些起诉他的人！”[注55]《印度公报》

（*India Gazette*）也对此表示赞同：“出版自由往往沦为制造公共压迫和私人侵害的毁灭性工具。”[注56]希基的批评者极力主张，仅仅搬出这个词本身，并不能证明其事业的正当性。

到1782年，这种争论对于全球英语世界的印刷品受众来说同样并不陌生——无论是在孟加拉、北美、西印度群岛还是英国本土。但在围绕《希基孟加拉公报》的争议中，我们也可以隐约窥见某种新现象：一种针对殖民地言论自由之危险性的特定担忧。1781年春天，一位高级军官写信给黑斯廷斯：“我真的很惊讶，你竟有耐心容忍希基这种无赖每个周六发布成堆的谩骂。”[注57]此前数周，这位军官的军事指挥能力、对战利品的贪婪以及与印度女性的通奸关系一直遭受公众嘲笑。他写道：“像那份公报那样的东西，在

‘这样一个地方’是不被允许存在的。”所谓“这样一个地方”——即指几千名欧洲人正摇摇欲坠地统治着数百万潜在敌对土著的地方。

基于此类理由，正如在南非开普殖民地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定居人口较少的英属领地一样，驻印度的三个英国领地（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的地方官员基本上都将对出版自由的诉求斥为不符合殖民地实际情况。他们对印刷商 [注 58] 和报纸的监管远比英国本土严格。在 1790 年代，由于正值战争期间且对法国大革命教义在全球传播深感恐慌，印度正式引入了报纸的“预审制度” [注 59] (pre-publication censorship)，其中包括全面禁止讨论“政府或其任何官员的行为”，或任何“可能趋于影响英国权力对土著国家之影响力和信誉”的内容。殖民地领土始终是例外空间 [注 60]，那里适用不同的标准。

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印度的印刷术仍是一种压倒性的欧洲媒介 [注 61]，主要用于传教和商业活动、政府文书，以及在定居者人口中流通信息。英文报纸中偶尔出现的孟加拉语、波斯语和古吉拉特语广告 [注 62] 证明，印度精英阶层也在其读者之列；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机也定期生产这些语言的文本——事实上，直到 1835 年，波斯语一直是英属印度的官方行政语言。印刷的实际操作也高度依赖于印度雇员 [注 63]。然而，在 1780 年至 1817 年间，印度出版的 30 多种期刊中，每一份都由白人拥有和编辑 [注 64]，并以英文撰写。因此，这些报纸定期卷入的关于出版自由的争论，也仅聚焦于英国定居者的权利及其遭受东印度公司对待的问题——从未涉及印度本土的自由、声音或受众。尽管如此，正如 1811 年 3 月伦敦下议院的一场辩论 [注 65] 所揭示的那样，冰面之下，印度出版自由的形态早已被一种焦虑所深刻决定，即担心印刷术会对本土人口产生何种影响。

那年春天的每一位议会发言者都承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专制的。少数议员对此表示谴责并抨击了东印度公司，但大多数人则归咎于印度人自身，认为他们是一个完全不适合自由的落后民族，只能通过独裁方式进行治理。这意味着，允许他们接触印刷术将是非常危险的。正如一位国会议员所言：

“专制政体并非由英国在此建立，而是本就存在于此，且已存在了许多个世纪。引入出版自由可能会导致极其致命的后果，在现状下，它将动摇整个印度社会的架构。”

约翰·安斯特拉瑟爵士 (Sir John Anstruther) 试图让他的同事们相信，单在加尔各答，“至少有 10 万名能够阅读英文的土著”（这显然是巨大的夸张：现实中可能只有几百人）。他警告称，若以印刷形式讨论英国统治的弱点和不公，必将煽动他们屠杀英国人，因为这将“证明，通过土著人明智的联合，消灭整个孟加拉的欧洲人口是多么轻而易举且安全”。牛津郡

的一位议员甚至更狂妄地断言，最近推翻海地白人统治的血腥奴隶起义就是由扩大出版自由的企图引发的：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在印度发生。

东印度公司的一位权势显赫的辩护者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质问道：“还有什么比在整个印度斯坦传播各类观点更危险的事吗？”他认为在那里不应印制任何可能“激发愤怒和敌意”或“引起骚乱”的内容。首相本人总结道：“克制出版自由不仅是基于政府的原则，更是源于土著人自身的性情。他们正处于那种（自由）可能对他们造成极大伤害的状态；尽管如果他们不那么无知，（自由）本可以产生最大的益处。”

不久之后，原住民接触印刷术的问题便再也无法被轻易搁置。1813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权力因一份议会法案而大幅削减。该法案规定，本国承担着全新的国民“义务”，即“促进土著居民的利益和幸福……以及向他们引入有用的知识，并在宗教和道德上予以提升”[注 66]。总督黑斯廷斯勋爵（Lord Hastings，与沃伦·黑斯廷斯无亲缘关系）训诫其下属，向无知的土著“赐予智力的扩张”[注 67]和“人权意识”是他们“如神般的慷慨”。他认为，促进讨论和出版的自由将帮助他们提升至英国人的智力水平。1818年，在英国在对法长期全球战争以及对马拉塔帝国（最后一个抵抗英国的本土政权）的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后，他正式结束了孟加拉的预审制度[注 68]。

就在同一年（1818年），首批孟加拉语报纸创刊，印度人自营的印刷所开始在英国领地内激增。在英国统治的最初几十年里，印度人始终维系着[注 69]自身长期存在且精致复杂的网络，用于口头与手稿形式的交流、教学及政治辩论。1824年，一位新抵达的定居者观察到，即便完全不懂英语，印度人对欧洲政治的最新进展也了解得惊人地透彻，这“意味着除了我们所提供的渠道外，还存在着其他交流手段，而关于这些手段，我目前能获得的信息微乎其微”。很快，他们也开始利用门槛降低后的印刷术——通常是为了批判和挑战英国的霸权。

大量的印刷书籍[注 70]、小册子和报纸开始在本地产并进口。到19世纪20年代，加尔各答已成为印度语系及英语印刷业的繁荣中心[注 71]。在该年代末，这座城市的报刊数量及发行量已超过了除伦敦以外的大英帝国任何其他城市。除了孟加拉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报刊外，几份英文报刊现在也由印度人拥有和编辑。创办于1817年的该市印度学院（Hindu College）正按照西方课程体系用英语教育孟加拉儿童，内容涵盖了潘恩的《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和密尔的《印度史》。1828年，该学院的优秀学生卡西普拉萨德·戈什（Kasiprasad Ghosh）[注 72]——后来成为著名的英文诗人——撰写了一篇批判密尔的文章，发表在《加尔各答

公报》(*Calcutta Gazette*)上,随后又被伦敦研究印度事务的领先期刊《亚洲杂志》(*Asiatic Journal*)转载。

接下来的十年里,孟买总督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英国人对印度人接触印刷术这一问题的修正后政治考量。在他的领地内,印度本土人自19世纪10年代起[注73]也一直在为争取出版自由而奔走。他指出,“我们在印度处于一种非常奇特的地位,”[注74]作为“一小撮外来者……(对)广大人民建立起专制统治”:

“这种霸权只能通过武力或民意(*opinion*)来维持。印度土著要么必须因感受到我们的力量而被压制,要么必须因为坚信我们比他们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统治者都更睿智、更公正、更人道,且更渴望改善他们的处境,从而心甘情愿地屈服。”

显然,后者是唯一现实的选择。但这也引出了一个日益令殖民者焦虑的问题:印度人享有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权,究竟应该延伸到什么程度?

印度人与印刷术

反复权衡这一问题的官员之一是资深的英国行政官蒙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作为19世纪20年代的孟买总督,他是“本土教育”的热衷支持者,并视其为巩固英国霸权的辅助手段。1819年任职之初,他效仿孟加拉总督的做法,废除了预审制度。当然,他在1821年的会议记录中写道,建立“不受控制的出版业”是绝无可能的:若建立一个“印度人……可以随意抨击异族统治之耻辱”的媒介,“将完全不符合我们在印度的现状”[注75]。但在“政府的完全控制下”引入印刷术,并防范“出版任何具有危险倾向的内容”,则是另一回事:

“我将印刷视作一项极其伟大的恩赐,除非有最清晰且最无可争辩的理由,否则不应剥夺。而在印度的情况中,我并未看到此类理由。在漫长的世纪更迭中,出版业确有可能、甚至极有概率会导致本土人摆脱我们的枷锁;但它首先会摧毁本土人的迷信与偏见,消除因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之间完全且显著的隔阂所带来的紧迫危险。后一种效果是必然的,而前一种则是未知的。”

换言之,在英国控制下传播印刷术,必然会使土著向其白人领主靠拢。至于它是否会起到反作用,那仅仅是一个非常遥远且理论上的担忧。

埃尔芬斯通的模型假定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们的观点是统一的。但就在他撰写此文时,次大陆另一端的事件证明他错了。在英属印度的首府,新创办的《加尔各答期刊》(*Calcutta Journal*)编辑詹姆斯·西尔克·巴金

汉 (James Silk Buckingham) [注 76] 反复陷入与当局的摩擦中。在许多方面，他的轨迹都呼应了他的前辈詹姆斯·希基。巴金汉同样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帝国冒险家；在遍历地中海、大西洋、中东和印度多年后，他最终落脚于加尔各答。与希基一样，他的报纸起初是一份基本不涉及政治的商业新闻简报，由一位赏识其文笔并任命其为编辑的当地英国商人创办。作为印度第一份日报，它理应为他们两人赚大钱——事实也的确如此。

然而，随后《加尔各答期刊》[注 77] 开始发表批评东印度公司统治方方面面的信件和专栏。它还投身于出版自由事业，引导公众关注英国本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相关讨论，并论证这些讨论与印度的相关性。它赞颂英国改革者的斗争，批评英国政府通过的针对煽动、诽谤和亵渎神灵的严厉新法律，并谴责其对理查德·卡莱尔 (Richard Carlile) 和威廉·科贝特

(William Cobbett) 等激进派报纸及记者的迫害。作为回应，当地政府撤销了《加尔各答期刊》的免邮权，并起诉了巴金汉（此举受到其竞争对手报纸的推波助澜，那些报纸由公司效忠者和亲信经营）。最终，总督将他驱逐出印度，并重新引入了对所有印刷机和出版物的严格许可制，以防止公众讨论任何政府或“任何形式的政治事件与交易”。

这种反应并无新意。自从印刷术引入以来，印度当局一直以这种方式处理“麻烦的印刷品”[注 78]。即便是在所谓 1818 年的“进步”法规下，报纸仍被禁止评论印度的治理、地方行政官的行为或任何可能“影响英国在印度的权力或声誉”的内容 [注 79]（同时也禁止发表任何“针对个人的评论，以免激起社会不和”）。

然而在幕后，加尔各答和伦敦的官员们在执行这些规则的尺度上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分歧。最终，巴金汉被驱逐，是因为开明的总督黑斯廷斯勋爵在 1823 年短暂离任，接替他的是约翰·亚当 (John Adam) ——此人不仅是行政当局的首席审查官，更是《加尔各答期刊》的宿敌。更深层的困难在于，与希基时代相比，现在的两件事已经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变化。

首先，英国与印度的出版自由事业已变得紧密相连。1820 年，伦敦托利党政府的领导人不安地注意到，针对印度报业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反弹回国内：因此，这不能被视为一个纯粹的印度问题”[注 80]。英国国内的辉格党及其激进派反对者接过了巴金汉的诉求，并将其与自身反抗审查制度的斗争联系起来。在 18 世纪 80 年代，希基的《孟加拉公报》也曾采用出版自由的跨国修辞，但当时印度之外并无人关注其磨难。相比之下，四十年后，巴金汉遭受的待遇成了英国国内一个显著且长期的议题——这根“大棒”既被用来打击保守党政府、抨击东印度公司的独裁，也被用来批判殖民政策。巴金汉本人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自我宣传者，他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持续诉讼和

宣传运动，将个人遭遇与出版自由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返回伦敦后的几个月内，凭借众多支持者的捐款，他创办了一份新的月刊《东方先驱报与殖民评论》（*Oriental Herald and Colonial Review*, 1824-9），以此反击东印度公司的非正式喉舌《亚洲杂志》（*Asiatic Journal*），并作为一个论坛，将自己所受的不公对待以及整个帝国的出版自由理想置于公众视野之下。通过孜孜不倦的抗争、出版和公开演讲，他成为了英国关于印度殖民政策最杰出的声音之一。1832年，他当选为新改革后的英国议会议员。利用下议院议员的权力，他很快促成建立了一个下议院特别委员会[注81]，调查《加尔各答期刊》被查禁一事，并要求就其声称遭受的巨额资本损失对他进行赔偿。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出版自由现在得到了印度人自身的支持。1818年抵达加尔各答后不久，巴金汉便与一位年长博学的印度人罗姆·摩罕·罗伊（Rammohun Roy）[注82]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罗伊是一位富有的婆罗门地主，他发起运动反对印度教中“迷信”和“偶像崇拜”的各个方面，同时对正统基督教也持批判态度。这位魅力非凡、精通多种语言的罗伊与英国高级官员合作多年，自学了流利的英语、法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辅之以原有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和印地语知识。他协助创办了印度学院（Hindu College）和一所自己的英语学校，与英国及欧洲的知识分子通信，并在身边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印度人和英国人。在他生命末期的19世纪30年代初访问英法期间，他被两国国王在内的所有人奉为伟大的进步名人。他也是早期最著名的印度出版自由倡导者。

作为一名作家[注83]，罗伊最早的作品遵循印度传统以手稿形式创作。但他很快便成为了欧洲印刷新技术的积极采用者，也是西方思想自由观念的热烈信徒（正如一位早期英国熟人所言，他在“所有场合”都引用洛克和培根的话[注84]）。他最早的印制作品（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出现于1804年。在巴金汉见到他时，罗伊已是一位熟练操纵西方及印度民意的跨国大师。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印度各种英文报纸并与之互动，对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动态了如指掌。他以英文、孟加拉文和梵文出版宗教小册子，随后将其送往伦敦重新印发并宣传。最终，他的思想也开始被法国、德国和北美的顶尖知识分子出版并讨论。

当巴金汉创办《加尔各答期刊》时，罗伊成为了该报的常邀撰稿人[注85]。罗伊本人也为印度读者创办了两份周报，分别是孟加拉语的《月光报》（*Sambad Kaumudi*, 1821-36）和波斯语的《镜报》（*Mirat-ul-Akhbar*, 1822-3），此外还创办了一份不定期出版的英文版《婆罗门杂志》

（*Brahmanical Magazine*, 1821-3）。这些出版物转载欧洲报刊和印度手稿简报的新闻与评论，宣传罗伊的宗教改革和社会进步主张，向政府发出呼

吁，并一再赞美出版自由——视其为向英国官员通报本土疾苦、传播知识与启蒙的手段。《月光报》的创刊号便以一篇论“本土出版业自由”的文章开篇；随后的期数则盛赞《加尔各答期刊》及其编辑。相应地，巴金汉作为

“印度本土出版业完全自由所预期的益处”的伟大传道者，在他的刊物上热忱地推广其友人的出版物，并刊登其内容的英文翻译及摘要。当罗伊的基督教印刷商拒绝印制他那些颇具争议的小册子时，巴金汉协助他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 [注 87]。巴金汉解释道：“如果像人们一贯断言的那样，‘土著的无知’是阻碍其政治、民事和宗教幸福的最大障碍，那么，任何加速消除这一障碍的行为都必须被视为一种恩惠。” [注 88] 本土出版业将成为“传播光明与文明的强力引擎” [注 89]。

1823 年，罗伊在《镜报》上批评了驱逐巴金汉的行为，随后关闭了自己的报纸以抗议新的出版法 [注 90]。他与包括其友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 [注 91]（加尔各答最富有的商人，曾投资多份印度语和英语报纸）在内的其他著名孟加拉精英一起，发起了争取本土出版自由的公开运动。他们辩称，无论巴金汉犯下何种罪行，“因归咎于一人的过错而惩罚数百万人” [注 92] 是荒谬的。他们首先向加尔各答最高法院请愿，随后向帝国的最高权威——身在伦敦的国王乔治四世、枢密院及其内阁请愿。尽管他们未能阻止许可制的重新引入（该制度一直延续到 1835 年），但他们的论点 [注 93]（亦通过印刷品公开宣传）因对本土权利的自信主张而开辟了新天地。与此同时，其他印度人绕过了他们所抨击的被“锁链束缚”和“被奴役” [注 94] 的印度媒体，直接利用伦敦的报纸来宣传“印度人民的情绪”。

为了论证其主张，罗伊及其同胞呼应了英国进步派的希望，即出版自由能增强本土忠诚度。他们辩称，让人民处于无知状态是专制的、危险的且“非英国式的”——确切地说是“亚洲式的” [注 95]。相反，置于“良好政府统治下并体验到公正开明对待”的人民，“随着他们变得开明，且广大民众被教导去感知其统治下福祉的价值，必将对其愈发依恋” [注 96]。他们宣称这正是事实：“随着印度本土人体验到公正开明的对待，他们正日益依恋英国的统治” [注 97]。他们不将英国人视为“征服者”，而视其为将他们从莫卧儿暴政中拯救出来的“解放者”。印刷术的传播，尤其是本土报纸的出现，“已经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思想并改善了他们的处境” [注 98]。他们称印度民众现在的忠诚是不可动摇的，并对“英属印度政府持有无限的信心” [注 99]。

他们还提出了两个更具原创性的论点。第一，断言本土出版自由自英国统治初期起就是不容置疑的——它是“他们最珍贵的权利，自英国权力建立以来一直被自由地准许给他们” [注 100]。这并非事实，但它巧妙地利用了

“古老自由”被“突然”且非法地“侵犯”这一修辞手法 [注 101]。他们的第二个相关断言是，迄今为止，印度人一直被“保证拥有与英格兰所享有的同样的民事和宗教自由” [注 102]。这也是一个在辩论上非常精明的论断。实际上，印度的英国官员始终以不同于欧洲印刷品的眼光来看待本土出版物，尽管到 1823 年他们已开始意识到，要在法律上区分两者是困难的 [注 103]。通过主张所有“加尔各答居民” [注 104] 都理应享有“每个不列颠人在英格兰都有权享有的同样的民事和宗教特权”，孟加拉人默默地抹除了这种种族差异，并提出了一个更简单、更直接的命题：**身在印度的印度人，拥有与身在英国的不列颠人完全相同的言论自由权。**

罗伊、泰戈尔及其联名请愿者在自称为英国统治的忠实臣民时，态度是完全真诚的。他们每个人都通过与英国人的合作而步入繁荣，并且都推崇欧洲的文化、技术和政治原则。尽管到 19 世纪 20 年代，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主张自由贸易、不受限制的欧洲定居点以及其他反对东印度公司政策的殖民者站在一起，但更广泛地看，他们正是 1813 年以来英国对印政策意图塑造的那种忠诚、西化且知识分子化的先锋。他们甚至承认，为了“维护英格兰与这个国家之间现存的联盟” [注 105]，印度的出版自由或许不应延伸至企图“煽动印度本土人对英吉利民族产生仇恨”的行为。

另一方面，他们对英国统治的依恋始终只是对政治现实的一种谨慎妥协。罗伊年轻时曾对“在印度建立英国权力深恶痛绝” [注 106]；而现在，尽管他与同胞因这种统治的强加而不断遭受种族主义的屈辱，他仍试图利用这一权力为自己和人民谋求利益。正如一位罗伊的英国崇拜者所注意到的，罗伊“非常依恋我们和我们的政权……因为他认为我们这个优等种族与他那些‘堕落且低等’的同胞接触，是他们提升知识和活力的唯一途径和机会” [注 107]——然而，他也“极度不认可”英国政府在印度进行的许多行径。

这正是出版自由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原因。为了唤起对本土疾苦以及英国“在管理庞大帝国事务中不可避免的失误” [注 108] 的关注，罗伊主张“不受约束的出版自由是唯一可以采用的有效手段”。他声称，印度人从未滥用过这种自由，将来也绝不会；无论如何，现行的反诽谤和反煽动法已足以提供保障。当《镜报》（*Mirat*）谴责 [注 109] 英国在爱尔兰的政策，或提议限制孟加拉英国地方官的权力，或点名批评其中一人行事“鲁莽且受情绪支配”时，在罗伊看来，这并非滥用媒体，而是在履行其核心宗旨。

在《加图来信》（*Cato's Letters*）编纂出政治言论自由新模式的一个世纪后，罗伊的论点呼应了其广为人知的基本准则：出版自由的核心目的在于“对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公开评论” [注 110]；“政府只有因其自身的行为才会陷入被仇恨和蔑视的境地”；唯有当权谋私者才惧怕“自由的

出版”；压制出版是专制行为，其结果将是失控的暴政。但他也深刻地阐述了一个额外的、具有鲜明殖民色彩的警告——在某处他明确将印度人比作“奴隶” [注 111]。

罗伊指出，在莫卧儿统治下，印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如果已经剥夺了他们所有身份和权威的英国人，现在还要辩称“殖民地……永远不能安全地被赋予出版自由，因此不能允许孟加拉土著”拥有它，那么“换句话说，这就是在告诉他们，他们被判处了永久的压迫和堕落，只要英国权力存在，他们就没有任何被提升的希望”。他警告说，这种态度将摧毁对英国统治的忠诚。

英国原则与殖民臣民

出版自由是否真的能与殖民统治兼容，甚至对其有益？印度人是否应当拥有与英国人相同的言论自由权？到 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针对这些问题已形成了两极分化的观点。一端是以罗伊 [注 112]、巴金汉 [注 113]、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律改革家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 以及英印两地的其他进步思想家为代表的立场。他们主张，出版自由应当是一项普遍权利，因为它总能促进社会启蒙并带来更好的政府；且没有任何根本理由说明这项权利不应同样延伸至印度人。

1823 年，一位拥有长期留印经验、出身贵族的边沁主义军官在引用罗伊以及亚里士多德、弥尔顿、洛克、培根、伯克、休谟和孟德斯鸠的观点时指出：“这项事业是高尚的，且对（他们的）切身利益至关重要” [注 114]。他声称，次大陆的本土统治者从未实行过审查制度：直到最近，“印度人民拥有与呼吸或生存同等的书写自由。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它” [注 115]。相比之下，现在这 1 亿人——“我们的同胞臣民，他们每年向我们缴纳约 2,000 万英镑的贡金” [注 116]——却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自然表达权，并与在印欧洲人一起遭受“精神专制” [注 117] 的奴役。他警告说，这反过来必然会助长治理失当、本土怨恨、迷信和反叛。莱斯特·斯坦霍普 (Leicester Stanhope) 敦促道：“不要把印度当成殖民地 [注 118]，给她的思想挂上锁链并窒息她的理智。”相反，“应以宗主国臣民理应享有的公正和人道来对待她，她便会同样地依恋你们。”几个月后，这位不知疲倦的作者前往希腊，支持当地反抗奥斯曼统治的独立运动。在当地短暂的逗留期间，他对比建立自由出版业如此痴迷，以至于获得了“活字上校” (the Typographical Colonel) [注 119] 的绰号。

斯坦霍普关于前殖民时代印度自由的顺带主张，似乎是当时唯一试图将欧洲的言论与出版自由理想直接与预存的本土学说相联系的尝试，尽管缺乏非常坚实的根据。诚然，莫卧儿印度丰富的口头和书写传统中确实包含直言不讳和不敬神权的实践。其他作家有时也会唤起这样一种观点：尽管前殖民时代的统治者具有专制色彩，但他们比英国人更鼓励讨论的开放性 [注 120]。斯坦霍普还考虑到了印度长达数世纪、充满活力且精致的个人与集体请愿文化 [注 121]，这种文化在殖民时代仍在延续——有时甚至介入了英国本土政治。当罗伊及其同事向伦敦的帝国当局申诉时，他们正是在遵循印度精英阶层长期以来的传统。尽管如此，自 18 世纪后期在印度发展起来的出版自由这一特定理想，是一种自觉的“西方进口品”，即便采用其修辞的反殖民思想家也是如此理解的。虽然在其他观点上，罗伊和其他印度作家颂扬了前殖民社会的种种美德，但他们从未对任何更早期的、本土的自由言论传统提出过同等直接的主张。

这种观点很快被辩论的另一方驳回 [注 122]。他们坚称印度人没有自由表达的历史，且无论是在爱尔兰还是印度，殖民统治都与出版自由互不相容。东印度公司的支持者反复申明其公开理由：土著人头脑过于简单，尚未准备好被赋予如此强大的权利。1821 年，当罗伊创办《月光报》时，《加尔各答月刊》（*Calcutta Monthly Journal*）警告称：“政治讨论并不适合未受教育人群的偏见或能力” [注 123]。《亚洲杂志》（*Asiatic Journal*）在次年解释道，英国在印度的权威“不依赖于物质武力，而取决于智力上的优越性” [注 124]，这就是为何本土报纸是一个危险的命题。印度本土人与“治下的异族统治者”之间没有共同利益，也没有足够的“理解力来区分诚实公开的意见表达，与潜伏在阴郁抗议下的、拙劣伪装的叛国行为”。罗伊本人被贬低为不过是一个“妄自尊大的‘黑人’” [注 125]。在此背景下，允许欧洲出版自由尚且是愚蠢的，更不用说赞成他为印度人创办新报刊了——这些报刊似乎主要是“为了煽动他们偶然的不满，让他们看清统治者的缺陷，并鼓励和传达其抗议，而非诉求” [注 126]。这种行为就像是“允许一个手持燃着火柴的人靠近一桶火药” [注 127]。

在私人通信中，英国官员的言辞更为露骨。马德拉斯总督托马斯·门罗爵士（Sir Thomas Munro）在 1822 年警告称，鉴于“我们在该国的特殊处境” [注 128]，对出版业的控制将决定“我们在印度的统治是屹立还是倾覆”。他认为，允许土著自由印刷非但不会“在人民中传播有用的知识并倾向于更好的治理”，反而会“产生抗命、起义和无政府状态”。“因为出版自由的首要职责是什么？是使国家摆脱异族枷锁……如果我们让出版业对土著和欧洲人同样真正自由，必然会导致这一结果。”它将“在人民中传播自

由原则，激励他们驱逐统治他们的陌生人，并建立民族政府”。门罗指出，土著人已经在传播反抗号召，并试图在公司的雇佣兵（sepoys）中煽动哗变：出版自由将允许他们公开欧洲人剥削其国家的所有手段，并不可避免地激励他们“推翻政府并恢复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对印刷品保持“绝对控制”则是“自然”的举措。这将允许印刷术的益处土著中缓慢而逐渐地扩散，同时实现英国政策的主要目标——尽可能长久地延续其霸权。

其他颇具影响力的官员在 1823 年新任总督启程前往次大陆前，曾秘密建议他：英国统治的最终基础“必须是武力”[注 129]，尽管“尽可能掩饰这一点”是审慎之举。出版自由和政治辩论是像英国人这样的自由民族的权利和特权，“但在任何意义上，印度政府都不能被称为自由、代议制或民众政府；人民在建立它时没有发言权，对它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控制权”[注 130]——也不应该有。因为印度“可以说不存在公众舆论”，只有英国的公众舆论才能讨论其治理。埃尔芬斯通在孟买的继任者解释说，由于土著的心智在智力上仍如此不成熟，出版自由只能在遥远的未来授予这些“被征服的人民”[注 131]：“这将是最后赐予他们的恩惠之一，即当我们……逐渐将他们培育成熟，使其社会状态适合接受它时”。过早地赐予只会“加速我们自身的毁灭”。

因此，令人担忧的是，“黑人”印度人和“半混血儿”[注 132]现在正从印刷品中汲取欧洲关于“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以及“关于自身重要性的观念”[注 133]。最危险的是近期在本地语言中扩散的土著印刷品，这可能会煽动政治讨论，甚至是传播“人权和其他民主学说”[注 134]。这对英国权威将是灾难性的，“那个庞大的帝国可能会永远从我们手中丧失”。从这个角度来看，罗伊和其他印度人的报纸不是教育和忠诚沟通的渠道，而是危险的抗命载体。英国官员相互警告称，为印度人提供出版自由不但不会巩固土著的忠诚，反而会适得其反，并“降低欧洲性格在土著心目中的评价”[注 135]。因此，在 1822 年和 1823 年的幕后，政府镇压的目标不仅是巴金汉的《加尔各答期刊》，正如亚当（Adam）后来公开承认的那样，还有“监管不力且放纵的本土出版业所带来的罪恶”[注 136]——以及印度人可能表现得像英国人一样，并利用印刷术作为遏制误治手段的这种念头。

本土性格

1823 年 5 月 20 日，就在这场危机延宕之际，一位名叫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年轻人进入了东印度公司位于伦敦的总部任职。那天是他 17 岁的生日。作为学习撰写官方公文职责的一部分，他阅读了当时正在流通的各

种关于印度出版自由的内部备忘录。这些文件在他青少年时期的心灵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记：近三十年后，他仍能瞬间回想起其中的核心焦虑——“如果允许出版业享有完全的许可，它将把我们彻底赶出印度” [注 137]。

成年后的密尔本人如何看待印度人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权，这是一个具有双重重要性的问题。首先，他视自己为印度问题的顶级专家，并成为了英国对印统治的领军行政官（尽管与他父亲一样，他从未真正踏足过那个国家）。数十年来，他一直身处伦敦东印度公司最高决策层。在 1857 年印度起义后的余波中，他是该公司最坚定的公共宣传者。次年，在议会清算该公司后，英国政府邀请他在新成立的印度委员会 [注 138] 中出任席位，该委员会此后在伦敦统治这片领土。密尔在此时的一本匿名小册子中写道，英国对印度的“启蒙式”治理 [注 139]，“不仅是人类史上意图最纯洁的，也是行动最仁慈的治理之一”。他确信“历史的裁决”将证明这一点。

另一方面，就在密尔投身于这一职业生涯的同一时期，他也成为了英语世界最重要的个人自由理论家。他在参与印度事务的高峰期撰写了《论自由》（*On Liberty*, 1859）一书，彻底革新了西方关于表达自由的思想。关于密尔作为殖民行政官与作为自由主义哲学家身份之间的普遍联系，近来已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 [注 140]。在此，我将聚焦于他的言论自由理论，这至今仍是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论述——尤其因为它一直被解读为关于普世适用之个人权利的声明。然而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密尔关于表达自由的论证深深染上了他的殖民态度。他的例子典型地体现了：在整个 19 世纪，即便最创新的西方言论自由理想，也持续受到帝国主义推定的深刻影响。这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这些论述在后殖民世界产生了哪些持久影响？而我们至今仍对这些理论的依赖又意味着什么？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之所以在青少年时期就进入东印度公司服役，是因为他是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那位才华横溢、早慧的长子。他的父亲为他争取到了这份工作；约翰接受培训是为了协助并在适当时机接班（当詹姆斯于 1836 年去世时，他最终确实接任了父亲的职位）。

1818 年初，詹姆斯·密尔在经历了十二年含辛茹苦的孕育后，出版了《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此书彻底改变了他家族的命运：凭借此书的影响力，东印度公司任命他为总部的高级行政官员。他从一名生计不稳、贫困潦倒的雇佣文人和思辨哲学家，摇身一变成为薪酬丰厚且权力巨大的帝国代理人 [注 141]，并沉浸在这一新获得的显赫地位中。到 1827 年，他作为官方公文首席起草人的影响力已如此显著，以至于一位即将启程前往印度的候任总督向他打趣道：“我要去的是英属印度，但我成不了

总督。你才是那个总督。” [注 142] 极有可能在 1823 年，正是詹姆斯·密尔亲自起草了公司关于在印度允许出版自由之危险性的政策声明。

詹姆斯也是对他儿子智识面貌具有支配性影响的人。约翰自幼便接受父亲极度严苛的家庭教育，三岁起就开始学习古希腊语。在随后的十一年人生里，年幼的约翰每天都与那位专横且易怒的父亲同桌研习——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古典文学、历史、法语、哲学、数学和科学；与此同时，詹姆斯则在查阅资料并撰写关于印度的巨著。约翰在父亲创作期间阅读了手稿；四五岁时，他曾试图效仿父亲，动笔撰写属于自己的印度史。1817 年初，年仅十岁的约翰大声朗读了完稿的每一行文字，协助父亲进行最后的校对工作。《英属印度史》是一部伟大的杰作，也是他自身教育的基石之一 [注 143]——这是他从小便深信不疑且终生未曾动摇的信条。

因此，约翰从幼年起就继承了父亲的假设：世界上所有民族都可以根据单一且统一的文明指标来衡量；而根据这一尺度，所有非欧洲社会仍处于其“幼年期” [注 144]——其文化是“野蛮”和“开化不足”的，其居民像儿童一样缺乏理性且心智发育不全，拥有“蒙昧且扭曲的智力”。事实上，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对詹姆斯·密尔思想来源的早期思想家（如其导师边沁，以及亚当·斯密、亚当·福格森和詹姆斯·米勒等苏格兰理论家）论点的粗暴简化，因为上述思想家从未暗示社会发展的阶段是均质演进的，或与智力差异相关。几十年来，众多评论家抨击了 [注 145] 詹姆斯·密尔关于印度的著作。在其他课题上，如女性权利，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公开否定其父的观点而闻名 [注 146]，有时甚至援引他自己在印度政治方面的知识来佐证。但在论及印度本身的特性时，他从未真正改变过心意。1853 年，他在动笔撰写自传时，自豪地开篇描述自己为“《英属印度史》作者詹姆斯·密尔的长子” [注 147]——随后颂扬该书是“史上最具教益的历史著作之一”，并称其父亲是“提升印度”最伟大的力量，是印度事务中“所有健全治国方略的创始人”。

这种智识遗产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成熟的哲学核心中，制造了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悖论。一方面，他终身致力于反对群体思维和基于群体的偏见。青少年时期，他曾公开为海地这个“独立的黑人共同体” [注 148] 辩护以抵御白人的侵略；在生命末期的 19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他公开反对托马斯·卡莱尔和约翰·罗斯金等其他英国知识分子表现出的露骨种族偏见，并领导了一场公共运动，代表数百名遭到该殖民地白人总督杀害、伤害和剥夺财产的牙买加黑人争取权利。

然而另一方面，尽管密尔一贯谴责种族主义并赞美智识多样性，但他与大多数同时代的英国人一样，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非欧洲文化都是原始且智

力落后的。对他而言，这与肤色并无关联——他同样将受殖民的爱尔兰人列入此类低等民族之列。尽管密尔拒绝种族和生物本质主义，但他信奉“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概念，这导致他与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他反复提及的“印度许多地区人民那种消极且奴性的性格”[注 149]，或者他认为“印度教徒是比法裔加拿大人更无知、更消极的民族”，以及他将“像我们一样的英格兰人”所具有的积极公民权与所谓的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消极性进行对比中，窥见这些观点。

此外，在他的思维中，这种观点的结合并非悖论。相反，这恰恰解释了为何必须对印度实行专制统治。那里的英国定居者属于“更强大的种族”[注 150]，但也倾向于“压迫和不公”，且“天生倾向于轻视土著”。如果任其自流，他们会践踏“土著的利益和权利”，因为印度人本身具有内在的“消极性格”。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印度土著需要保护以对抗英格兰人，而提供这种保护是英国驻印政府的首要职责之一”。因此，英帝国的统治是必要的、仁慈的、公正且有益于臣民的——即便英格兰殖民者往往是种族主义恶霸。对密尔而言，肤色偏见问题从未与殖民统治系统[注 151]本身挂钩。

密尔关于印度智力、公众舆论和新闻出版的观点，本质上与东印度公司如出一辙——事实上，数十年来他一直代表公司在私人和公开声明中重申这些观点。他于 1852 年向英国议会报告称，现今在印度确实可以找到“聪慧的土著”[注 153]。但是，尽管法律并不禁止印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担任高官，他们仍不值得“信任”——“事实上存在一种排斥，而且必须如此，直到土著的性格得到极大改善”。他们仍然是“最难被理解、更难被治理的人民”[注 154]，“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我本人一向支持强有力的专制，”[注 155] 他在 1837 年给一位通信者的信中如此解释。）

基于这种本土落后性，在密尔看来，印度不存在所谓的公共舆论：

“印度公众[注 156]无法为其自身的治理提供任何协助。他们尚未成熟到能通过代议制政府来实现这一点；他们甚至不具备向本国（英国）人民进行有效呼吁的条件；他们甚至无法让自己的境况、利益和疾苦为人所知……因此，良好治理的伟大保障——公共讨论——在印度并不存在，不像在本国及其他附属国（即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国白人定居殖民地）那样存在。”

反讽的是，这对密尔而言意味着：那些**确实**发出了声音的、聪慧且善于表达的印度人的意见，应当被斥为本质上可疑、自私且“不满”的。这涵盖了整个印度期刊界。他辩称，尽管在英国，报纸是公共辩论的关键手段，但

这并不适用于印度本土媒体——后者是“纯粹代表个人利益的机关” [注 157]，是“富有个人和代表阶级利益的团体的传声筒”，而非“印度人民”的声音。印度人民没有声音；他们不构成公众；他们没有手段让自己的观点为人所知。对密尔来说，那些挺身而出的印度人只是无关紧要的例外，恰恰证明了这一不可更改的规律。

因此，他在 1857 年大起义余波中撰写的一本小册子中辩称，本土对英国行为的批评无一例外都是“某些印度不满分子”的作品，“其目的通常与良好治理背道而驰” [注 158]，而非印度民意的真实表达。他曾在别处解释道，在先进文明中，政治辩论和批评是遏制误治的至关重要的制约手段，但在印度情况则恰恰相反。如果允许本土人讨论英国的统治，甚至让他们读到英国国内的内部分歧，那只会鼓动那些“印度不满分子” [注 159]，并传达出完全错误的信号：

“即便委员会内部存在分歧，依然能够采取坚决行动；或者一个允许自己被‘捋胡须’（即遭到嘲弄）、允许其行为被当面责骂的政府，依然能够保持真正的威慑力——这是一个需要比‘东方人’高得多的文明程度才能理解或信服的真理。”

自由与人性

密尔关于印度辩论自由的观点，与其对他所属的“更高文明”应当享有的权利设定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后不久，他出版了《论自由》（*On Liberty*），该书至今仍是关于表达自由最广为人知、且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著作。尽管该书探讨的是广义的个人自由，但其中“思想与讨论的自由”是其核心主题。

要理解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这一点上的论证具有何种革命性，只需将其与他父亲的观点进行对比。詹姆斯·密尔一生都痴迷于出版自由。正如 19 世纪初每一位英国政治激进派人士一样，他谴责英国一直以来对煽动性、诽谤性和宗教异端印刷品的限制，而这些限制自 1790 年代以来又被进一步收紧。正如 1800 年前后全球各地的进步思想家一样，他向往着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出版自由拥有充分的空间；美德与公共精神将如何繁茂生长——幸福与和平将如何涌流！” [注 160] 数十年来，詹姆斯·密尔广泛阅读有关出版自由的著作；在 19 世纪 10 年代和 20 年代，他发表了关于此主题的权威论文。这构成了他整个政治哲学的核心——但带有一个重要且耐人寻味的限制：在他心中（正如后来在他儿子的心中一样），这一问题与殖民政府的问题完全隔离。（一个议会委员会曾向老密尔提问，既然他多次阐述支

持民主、代表机构和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论点，那么代议制政府在印度是否同样可行。他的回答是：“完全不可能。”[注 161])

詹姆斯·密尔对出版自由的痴迷，是当时针对英国尚未改革且不成文的宪法所发起的更广泛抗议浪潮的一部分，这股浪潮最终在 1832 年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改革法案》中达到顶峰。他还从跨国的角度分析出版自由，追踪其近期在法国、荷兰、德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和美国的演变。然而，尽管有这些紧跟时政的定位，他的基本理论[注 162]仍建立在一个世纪前《加图来信》首次提出并此后被不断循环使用的自由意志主义陈词滥调之上。

因此，对詹姆斯·密尔而言，印刷自由——“我们自由的最佳堡垒”[注 163]——的核心目的依然在于追究统治者的责任、批评“政府机构及官员”[注 164]以及公示误治行为。他抱怨称，在现实中，英国法律几乎不保障这种自由，它仅因政府的容忍而存在。但在理想状态下，媒体应完全自由地对所有政治和宗教事务发表意见，从而使“公众不可能在任何重要主题上被欺骗”[注 165]。在他最透彻的分析中，密尔仅能构想出两种合理的限制：第一，出版自由不应延伸至任何武力反对**特定**政府行为的“直接煽动”[注 166]——例如，印发一份可能“激发暴民干扰法庭审理、阻碍法律、警察或政府官员执行公务”的传单是错误的。第二，正如在他之前的托马斯·杰斐逊一样，他也主张惩处“虚假事实”[注 167]——即针对公职人员公务行为所进行的恶意或毫无根据的指控。

密尔对这一主题的整体框架，较之于《加图来信》的原始模板也并无太大改动。最重要的是，它严厉地将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公职人员与私人个体区分开来。事实上，密尔所主张的“出版自由”仅涉及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边沁亦是如此）[注 168]。它并不延伸至任何其他形式的批评——尤其不能损害任何人的名誉。对“私人个体”[注 169]名誉的侮辱不属于言论自由，而是对其“民事权利”[注 170]的侵犯；对公职人员私人行为或品格的诽谤同样如此。所有这些类型的损害都需要法律“保护个人权利不受出版物的侵犯”[注 171]。

同样地，密尔与大多数 18 世纪的前辈一样，从未真正将出版自由本身视为一种**个人权利**。相反，它被视为一种造福“人民”[注 172]集体的工具，是他们在与谋私利的统治者斗争时的辅助手段。其最终目的是普遍的“人类进步”[注 173]——“真正的重点是在人民心中建立正确的观点”[注 174]。出版业越自由，全体民众就越能得到启蒙。

密尔模型的核心是弥尔顿和加图最早普及、并在此后被继任者不断重复的教条：即真理是唯一的，真理在公开辩论中总能获胜，且在智识上是不可

抗拒的。他假定，在每一个主题上，人们都可以通过理性得出统一的“正确观点” [注 175]。一旦这些观点确立，大多数人自然总会“拥护真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讨论自由是人民确保正确观点盛行的唯一保障” [注 176]，因为“除了允许错误，没有任何可能获得真理的手段” [注 177]。此外，“这是一个为古往今来之经验所证实的结论：当真理与谬误在对等的地位上交锋时，真理必将胜利。”

詹姆斯·密尔关于出版自由的观点，既揭示了到 19 世纪初此类陈词滥调在进步圈子中已变得多么根深蒂固，也揭示了其底层观念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几乎毫无变化。他的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将这种正统观念视为理所当然——在 18 岁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威斯敏斯特评论》 [注 178] 上发表了一篇近 40 页的关于该主题的文章，大量引用他父亲的著作，重申其主要宗旨，并以类似的基调抨击英国出版法的“丑恶”。但在 19 世纪 50 年代，经过三十年的进一步思考 [注 179]，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全新的表达自由思考方式，这至今仍构成了我们处理该问题之方法的基础。

他在《论自由》中欣然宣布，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为“将‘出版自由’ [注 180] 作为防范腐败或专制政府的保障之一”而进行论证了，因为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如此频繁且凯旋式”的证明。诚然，英国法律依然带有压制性，但在如今的实践中，“除了在某些暂时的恐慌时期，当对起义的恐惧导致大臣和法官失去风度时，这些法律几乎没有被实际执行于政治讨论的危险”

（他在脚注中轻描淡写地撇开了一个不便直说的事实：这种恐慌性的政府镇压实际上刚刚发生过）。

与之相对，小密尔在更宏大的维度上构思表达自由权。这不仅是一个出版自由的问题，而是关乎人类所有的“思想与讨论” [注 181]。它不仅适用于“公共”事务的辩论，还涵盖了所有学科。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将其定义为每一个个体按其所愿思考与言说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广义上的“人民”的权利。将言论自由视为个人权利的修辞并不新鲜，它曾是早期宗教与学术言论自由理念的核心，《加图来信》也曾采用过这种表述。但在加图以及后来关于政治言论自由的讨论中，个人权利的语言始终与那种“出版自由如何让‘人民’作为一个集体来查明自明之理”的压倒性焦点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中，并从属于后者。詹姆斯·密尔的论述便是这种尴尬平衡行为的典型。而他的儿子是第一位摒弃这种平衡、并仅从个人权利角度构思言论自由的现代英语世界理论家。

这反过来又是因为他对表达自由目的的构想不再优先考虑政治自由，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个体的“智识发展” [注 182]。在约翰·斯图亚

特·密尔的重新定义中，言论自由不仅是通往真理、智慧或自由的必经之路——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善，是每个人过上充实生活的权利的一部分。此外，他辩称，构成这种表达自由主要威胁的并非政府的限制，而是社会规范的窒息效应——即对非正统思想的“社会不宽容”以及“多数人的暴政”。他坚称，人们可能因公众舆论的压力而在智识上被迫趋同，这种“社会暴政比许多种政治压迫更为可怕”。简言之，表达自由是“人类智识福祉（其所有其他福祉皆赖于此）的关键必要条件” [注 183]。

这种对言论自由范围与功能的全面重新构想，引导密尔在实践层面得出了一个同样深远的结论——任何观点都不应被沉默，即便它显而易见是错误的。理由有数点：因为真理从未是确定的，更遑论自明；因为观点的持续碰撞是保持思维敏锐、检验并推进真理的最佳方式；而且因为即便某事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它不被充分、频繁且无畏地讨论，它将作为一种僵死的教条而非鲜活的真理被持有” [注 184]。在密尔的夸张修辞中，这种结果将导致一种不假思索的、“类猿的”消极性以及“智识奴役”的恐怖。对他而言，甚至真理本身最终也不如为了表达自由而进行的持续实践重要：即“使普通人能够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智识高度” [注 185]，并造就“一个智识活跃的民族”。事实上，他亦谨慎地规定，他所构思的表达自由并非一种“独立于功利主义之外的自然权利或抽象权利” [注 186]，而仅仅是通往“智识自我发展”这一高尚目标的手段；他的主要焦点并非政治自由，而是“旨在反抗社会专制的道德、社会和智识自由，无论这种专制是由政府还是由公众舆论所行使” [注 187]。

尽管对言论自由的条款和目的进行了如此激进的重新思考，密尔仍无法逃避那困扰了此前所有理论家、且至今仍使我们备受煎熬的双重困境——真理的问题与伤害的问题。他也未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其结果便是一个深度自相矛盾的论点：在整个《论自由》中，密尔被迫不断用低声的警告与妥协，来修正他那些响亮的自由意志主义标题。

此前，从加图到詹姆斯·密尔，世俗言论自由的英语理论家们无不宣称真理总能战胜谬误，且对人类心智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断然拒绝了这一前提：“真理总能战胜迫害这种格言，不过是人们口耳相传、终成陈词滥调的悦耳谎言之一，所有的经验都对其予以反驳” [注 188]。尽管如此，尽管他多番主张允许谬误观点和意见多样性的益处，他依然理所当然地认为，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在进步并得以确立，而这正是进步的标志——“随着人类的完善，不再被争论或质疑的学说数量将不断增加……这种意见界限的逐渐缩小，在两种意义上都是必要的：它既是必然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注 189]。这种达成的共识“在观点正确的情况下

是有益的，而在观点错误时则是危险且有害的”。因此，在密尔的文本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未竟的紧张感：一方面是他对被接受但却虚假的“教条”的恐惧，另一方面是他对“真实的”、公认真理的拥护；一方面是他认为错误观点有助于磨砺真理，另一方面则是他担心错误观点的传播可能损害真理。

密尔对表达自由范围和目的的重构，还导致他以激进的态度摒弃了言论所造成的伤害。这与所有现存的言论自由理论（无论是宗教、学术还是政治理论）相比，都是一次更为巨大的背离。此前的理论至少在口头上都会承认诽谤和虚假言论带来的真实危险。

从表面上看，密尔关于允许谬误观点的必然益处以及真理与错误之间近亲性的辞令，与弥尔顿并无二致。但弥尔顿与所有宗教言论自由理论家一样，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他所讨论的仅限于宗教见解，即最终只有上帝才能评判的事项，而并非诽谤或其他具有现实影响的言论。加图及其众多追随者虽然更进一步，但仍将其言论自由的主张局限于关于“公共”事务的真实言论，且至少在名义上总是贬抑诽谤和其他言论“伤害”。相比之下，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摒弃了所有这些传统的防护栏：“诽谤”（libel）一词甚至从未在他的文本中出现。相反，他宣称，所有言论始终都应被允许，包括“传播那些我们认为虚假且有害的学说”[注 190]，以及“对人类福祉构成危险的言论”。他的隐含之意是，此类言论从未真正造成伤害：或者至少，更大的伤害总是源于平庸从众的暴政和对言论的寒蝉效应，而非源于表达本身。

为了维持这一令人生疑的论点，他被迫提出了另一项虽有问题却影响极其深远的主张：即在言论与“行动”（action）之间存在着严厉的区别。早期的理论区分了自由言论与有害言论：即“自由”与“放纵”的对立。现在，密尔转而断言所有言论都应是自由的——因为言论绝非一种行为，而只有行为才会造成伤害。对他而言，这是一条难以拿捏的界线，因为他自己最根本的原则是：尽管每个人都应拥有对其自身生理和道德福祉的自由，但这并不延伸至“涉及他人”[注 191]、或会“对他人产生恶果”或“对他人的伤害”的行为。而且，正如他在随口提及中所承认的那样，言论恰恰不是“关涉自身的行为”[注 192]：它是一种“社会行为”。

密尔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模糊化处理——采取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形式。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将“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注 193]强行挂钩，视两者本质上为同一事物，并要求“在所有实践或思辨、科学、道德或神学的主题上，享有意见和情感的绝对自由”。对于那种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即思想完全是内在的，而表达则会影响他人——他挥手置之，继续写道：

“表达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看似属于不同的原则，因为它属于个人行为中涉及他人的那一部分；但由于它几乎与思想自由本身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且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相同的理由，因此在实践中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仅此而已。这是一个显著虚弱的断言，却被用来作为如此深远之论证的基石，且极易被驳倒：我们的思想确实不影响他人，但我们对思想的表达却常常产生影响。

在书的末尾，密尔在应对同一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暗示在某些情况下，言论确实会跨越界限转化为行动：“即便意见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失去其豁免权，即当表达这些意见的环境足以使其表达构成对某种有害行为的积极煽动时。”[注 194] 他给出的唯一例子与他父亲在近四十年前提出的例子惊人地相似：

“一种认为谷物商是穷人饥饿之源的意见……当它面对聚集在谷物商屋前的激愤暴民口头发表，或以海报形式在同一暴民中传阅时，可以正当地受到惩罚。”

但请注意，密尔对这一原则的措辞依然暗示言论本身并不构成行动，而只是“煽动”行动（这种令人生疑的区别在我们的现代理论中依然存在，即认为言论不是一种行动，但可以构成对行动的“唆使”）。在同一段落中，密尔还含糊地重复了他的一贯警告：个人自由绝不能延伸至成为“对他人的滋扰”或“对他人的伤害”。然而，由于这类限制会破坏他整个哲学方案的激进性，他从未屈尊考虑过如何将这些限制与“在所有主题上享有意见和情感的绝对自由”相调和，更不用说这些限制应如何应用于那些古老的难题——如恶意的谎言、阴谋论、个人诽谤以及其他形式对他人造成的表达性伤害。

殖民化与文明

密尔是如何发展出这套前所未有的激进观点的？不难看出，这源于他将英国视为“非思想自由之地”的个人经历[注 195]。尽管到 19 世纪 50 年代他已积累了巨大的声望、权力和名气，但他的一生中，因在宗教信仰、节育、两性关系、女性权利、政治改革等敏感话题上的异端立场，始终面临着嘲讽、敌意和社会排斥，甚至来自其家族内部。但他始终坚定不移。“如果不承认作为思想家的首要职责是追随智识走向任何结论，那么谁也成不了伟大的思想家，”[注 196] 他在《论自由》中自豪地写道。在他看来，他人因表达异端见解而在精神上受威慑、在社会上受迫害或在法律上受惩处，既是不正义的，也无益于社会进步。

然而，他的论证同时也植根于一种深层的殖民主义假定：即唯有欧洲人处于历史的先锋地位，处于活跃的进步之中，而其他文化则保持静止、堕落并停滞于过去。许多其他极具影响力的欧洲思想家也持有类似观点。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及自由理论家黑格尔（G. W. F. Hegel）在 19 世纪 20 年代曾教导他的学生：“世界历史自东向西旅行，[注 197] 因为欧洲是历史的绝对终点，正如同亚洲是起点。”（至于非洲，“它是一个非历史的大陆，没有自身的运动或发展”。）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另一位人类心智与社会阶段性发展理论的大师、密尔的友人及同僚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注 198] 及其弟子，普及了一个新的社会政治概念——“西方”（the West），将其作为西欧、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共有文明的统一称谓。

尽管密尔本人并未采用这个特定的新词，但他同样理所当然地认为，文明在“现代欧洲，尤其是大不列颠……比在任何其他地点或时代”[注 199] 都更为先进且进步神速——尤其是与“东方”相比。他解释说，尽管其他地区可能曾拥有过“宏伟的宫殿和绚丽的庙宇”，[注 200] 但这些地方“严格来说没有历史，因为习俗的专制是彻底的。整个东方皆是如此”。相比之下，欧洲人已经超越了“野蛮状态”。他们通过三个历史阶段摆脱了类似的“精神专制”：宗教改革时期、启蒙运动时期，以及最近的“歌德与费希特时期德国的智识发酵”（即 1800 年前后）。其结果是，他们成为了更“发达的人类”，[注 201] 拥有更强的“个性和原创性”，并穿行于“多元的路径”之中。他相信，一个社会的成员在智识和社会层面越多样化，这个社会就必然越先进。他在《论自由》中借用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话作为扉页题词：“人类发展在其最丰富多样性中的绝对和本质的重要性。”[注 202]

但密尔警告称，这种进化并非不可逆转。事实上，他撰写此书恰恰是因为在他看来，欧洲的进步已经失速。在现代社会中，“公众舆论现在统治着世界……也就是说，集体平庸正在统治世界”。[注 203] 人们不再独立思考，而是“通过报纸”吸纳观点，这导致了智识的衰弱，以及一种新的“习俗专制”和精神趋同。他宣布：“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警示性的例子。”中国曾是非欧洲国家中最先进的，且拥有伟大的过去；然而现在“他们已经变得停滞——并已保持这种状态数千年；如果他们以后还要有进一步的改良，那必须依靠外国人”。正因如此，在欧洲，“现代的公众舆论体制……正断然地朝着使所有人变得整齐划一的‘中国理想’演进”。换句话说，由于对现代媒体那种羊群般的沉溺，欧洲人正在丧失智识的个性，而这正是他们作为社会前进动力的源泉。创作于步入晚年时的悲观情绪中，[注 204] 当密

尔思考自身的死亡时，《论自由》成了他反对这种令人衰弱的“东方化退化”危险的战斗号角。

密尔关于中国被“外国人”“改良”的暗示虽然简短，却极具说服力。正如他的读者所知，这一进程始于东印度公司违反中国法律与意愿，向中国大规模走私利润丰厚且具有社会破坏性的鸦片。从1839年起，这种由密尔的雇主发起的国家级大规模贩毒活动，反过来引发了英国陆海军对该国的入侵、对香港及其他领土的占领、数年的血腥战争，以及欧洲列强强加给这个战败国的一系列惩罚性贸易条款。当伦敦和加尔各答的读者初次研读《论自由》时，成千上万的英法联军正洗劫并摧毁北京的圆明园。不久后，负责这场杀戮战役的英国高级专员便被晋升为印度总督。

因此，从根本上说，密尔关于表达自由的论证充斥着帝国主义对历史和“进步”[注205]的推定，以及一种在他看来极其明确的界限——即“文明的”欧洲人与“野蛮的”他者之间的对立。非欧洲文化与民族在智识上是低等的。他们不能被视为“能力成熟的人类”[注206]（对这些人而言，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而只能被视为羽翼未丰的儿童，需要严厉的成年人式治理。我们不免会推测这一比喻对密尔在心理上的感召力，毕竟他本人的童年便是在极其严酷的管教下度过的，且他一生从未亲生育儿。但无论如何，他在智识上对这一比喻的应用是冷酷无情的。在引言的一个段落中，他解释说非欧洲人类在智识上如此不成熟，以至于他的个人自由理论自然不适用于他们——而且，这些民族进步的唯一机会在于接受欧洲人的专制统治。尽管文中从未明确提及印度，但这显然是他脑海中最典型的案例：

“我们可以不考虑那些社会本身可被视为处于‘未成年状态’（nonage）的落后社会阶段。自发进步道路上的早期障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上几乎没有选择余地：一个充满改良精神的统治者，有权使用任何能达成目标的手段，而这些目标或许通过其他途径是无法实现的。在对待‘野蛮人’时，专制是一种合法的政府模式，只要其目的是为了他们的改良，且手段因实际上实现了该目的而证明其正当性。作为一项原则，自由并不适用于人类尚未达到能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而获得改良的阶段。在那之前，除了绝对服从某位‘阿克巴’（Akbar）或‘查理曼’（Charlemagne）——如果他们有幸能找到这样一位的话——他们别无选择。”[注207]

这是他那关于“表达自由是个人自由之必要本质”的激进论题中最大的例外。密尔在《论自由》的开篇便宣布，他只关注先进民族——即“人类中较文明的部分现已进入的进步阶段”[注208]。他从未明确界定谁属于这一范畴，但他举的例子和后来的著作清楚地表明：首要是英国人，其次是其他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和法国人）、美国人，或许还包括世界各地其他的欧

洲定居者殖民地。这类人“很久以前”就已达到了需要并能从讨论自由中获益的阶段；而“东方”诸国显然没有。“印度（例如）不适合自我治理。”[注 209]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共同体有权强迫另一个共同体变得文明，”[注 210] 密尔在总结其适用于西方国家的自由理论时曾如此辩称。但当涉及到欧洲对“落后”人民的帝国统治时，这恰恰是他本人反复敦促的行为——并将其置于其言论自由理论的核心地位。他在印度的英国读者迅速欢呼密尔的论点，认为它证明了所有对自由的**限制**皆具正当性，正如他们所言：“一个英明的外国专制政体在统治亚洲人时，理应满足于此。”[注 211]

下一章将探讨这种帝国视角对殖民语境下言论规制产生的奇特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后殖民时代的今天所留下的有害遗产。尽管密尔的自由理论并非帝国实践的唯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来源，但这种智识上的联系构成了我们重新审视《论自由》的一个主要理由——我们不应再惯性地将其奉为一种特别鼓舞人心的现代言论自由教义。

你可能会抗辩说，该文本的殖民主义视角与其核心论证是可以剥离的。只要我们一致认同并不存在所谓的“落后社会状态”，且其准则适用于所有文化，那么后者的价值无疑是可以挽救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19 世纪的印度人在征引密尔的论点时正是这样做的。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密尔之所以假定言论自由在“落后”的个体和社会中行不通（即在这些环境下言论无法产生进步效应的原因），正关联到他那更为宏大的论证中所反复揭示却又试图掩盖的各类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表达——即人们以不理智、伤害性的方式进行表达，在危险境况下煽动“有害行为”，等等。换句话说，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他的整套表达理论本身就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之上。

密尔对言论自由史的伟大贡献，在于他首次尝试将其完全理论化为一种**个人权利**——其目的在于促进个人特质的发展与智识的成熟。但令人惊觉的是，由此产生的学说实际上存在着多么严重的缺陷，因为它从未成功克服一个基本问题：即表达并非一种私人且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而是一种卓越的社会性、关涉他人的行为。言论并非如密尔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与行动相分离。充其量，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行动，理应获得一定程度的特殊宽容——尽管这并非密尔的论点。此外，从最根本上说，思想与表达也并非本质上相同之物。这一极其惊人的断言，被密尔尽可能隐秘地塞给他的读者，它集中体现了仅从个人权利角度构思言论自由所面临的困境——尽管这种构思本能地契合了我们现代这种以个人主义和权利为导向的感性认知。这是一个我们至今仍在努力应对的难题。

殖民与后殖民时代的不自由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全球各地的帝国统治者都在敏锐地监视其本土民众，寻找动荡的蛛丝马迹。在印度以及其他殖民领土上，尽管英国人不断自诩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表达自由捍卫者，但这种监管依然通过两种主要方式塑造了言论自由的形态。首先，殖民地对出版和言论自由的界定始终笼罩在“不忠”或“煽动性”表达的阴影之下，并不断受到本土视角的质疑。其次，本土民众被推定为缺乏理性且易于冲动，这导致了针对诽谤和宗教侮辱的特殊法律的诞生。尽管这些有害的殖民强加手段经常遭到反殖民活动家的谴责，但它们最终都在适当的时候被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些新国家所继承，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与此同时，对于我们现在所称的“仇恨言论”的处理方式，在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则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人性与人类进步

1869 年底，一位才华横溢、作风强悍的英国律师兼记者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注 1] 抵达加尔各答。年届四十的他被派往英属印度的首府，接替他的剑桥导师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出任总督核心执政委员会的“法律成员”。在此任上，他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起草了一系列新法律，旨在使次大陆的民事和刑事司法制度化。与许多忠诚的帝国主义者一样，斯蒂芬视自己为开明的改革者。他的祖父曾是反奴隶制运动的领袖，其父则是伦敦殖民地部权力巨大的常务次官，并将大英帝国视为神意（divine providence）的工具。斯蒂芬本人在宗教上立场进步，是边沁的崇拜者，且在不久前还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合作者及自诩的门徒 [注 2]。在 1859 年评述《论自由》时，他曾热情地宣布自己总体赞同其中的论点。然而自那以后，他对这位前辈观点的批判态度日益增长。在印度的两年生活，使其脑海中形成了一套对密尔影响深远的自由与表达理论 [注 3] 的彻底否定。就在密尔去世前几个月，斯蒂芬回到英国发表了其反驳之作——《自由、平等、博爱》（*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1873）。他告诉读者，基于“我的印度经验” [注 4]，他对于言论自由、个人自由与殖民统治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斯蒂芬的论证沉重地纠结于宗教政治，并未特别致力于提出一套自己的表达理论。但它确实成功指出了密尔论证中的几处困境。最显而易见的一点

是其宏大得过头的适用范围。斯蒂芬解释道：“如果密尔先生仅限于提出这样一种主张，即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国家，以完全不受法律限制的方式公开讨论道德和神学领域的重大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注 5] 我会同意他的观点”——他完全赞同英格兰人之间应享有智识自由（注意他那意味深长的限制语：“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斯蒂芬看来，密尔方法论的问题在于，“为了确立这一有限的实践结论”，并在他那种“标志性的尖锐与简练”的驱使下，最终提出了一套漏洞百出的、针对所有言论和行动的全盘自由理论。

斯蒂芬并未过多纠缠于密尔关于“言论及其他表达形式更接近思想而非行动”的断言，只是将其作为荒谬之谈予以驳回。言论当然总会影响他人。他指出：“发表关于道德、政治和宗教的见解，其行为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人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注 6] 且“一个在思辨中犯错的作者，可能会误导成千上万他从未谋面的人。”针对密尔认为自由具有内在价值的“非理性”[注 7] 观点，以及为了差异而“崇拜”意见分歧的态度，斯蒂芬反驳称，人们始终需要考量任何言论或行为“所针对的目标”，以及对其施加限制的比例原则。

最重要的是，这位年轻人瞄准了在他看来密尔对人性以及所谓“西方智力优越性”的错误认知。一方面，尽管密尔注意到就现状而言“少数人是睿智的，而多数人是愚钝的”，[注 8] 但他依然假定更大的表达自由会自动提升每个人的心智能力。另一方面，密尔断言，这种情形仅在当下的“文明”国家才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众在智识上有能力从这种自由中获益——这与印度、中国及其他非西方社会中那些被认为心智尚未成熟的居民形成了对比。斯蒂芬反驳称，这两项核心断言均已被证实是错误的。

就人性而言，在任何社会中，“英明的少数派都是愚钝的多数派合法的决策者”[注 9]——且在斯蒂芬看来，这符合多数派自身的利益，因为后者从未被理性论证所动摇。无论言论自由有何其他优点，它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他辩称，在这一点上，不同文化之间根本没有区别。针对密尔关于现代西方国家居民“已达到能通过自由平等讨论而获得改良阶段”[注 10] 的断言，斯蒂芬反驳道：不，他们没有——而且永远不会。那种认为民众普遍能理性行事并追求自身最大利益、更遑论基于理性的公共审议而行事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少数派之所以让步，并非因为他们被说服并承认自己错了，而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属于少数。”

在斯蒂芬看来，本质的区别不在于西方与非西方文化，而在于任何时代和地点，在“人类中极少数”[注 11] 真正受理性及内在信念引导的人，与“绝大多数”可以被贿赂或诱骗去相信任何事物的人之间。诚然，人们可以区分出程度不一的“粗野”或“文明”[注 12] 民族，但这仅仅是一个相对

的、不断变化的指标。无论如何，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一者使用武力，而另一者使用说服”，[注 13] 而仅仅在于他们所能支配的权力程度。

简而言之，斯蒂芬认为，在所有情况下，人类进步的主要引擎是**强制**（coercion）而非自由。纵观历史，所有重大的政治、宗教和社会进步“都是通过武力实现的，且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人数极少的少数派将武力施加于愚昧、知之甚少且大部分时候漠不关心的多数派的行为之上”。[注 14] 正如他自豪地述评道，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包括对 1857 年起义的血腥镇压——便是这一点的最高范例。英国的政策是“完全违背许多人的意愿而强加给人民的”，[注 15] 并且是在刻意摧毁本土宗教的权威与习俗。在此过程中，英国人对待印度人的方式，正如同罗马人当年对待犹太人一样，拥有同等的权利——通过暴力铲除他们“可怕的”虚假宗教以及“（其）民族独立的最后残余”。毕竟，镇压印度人自身的意见与反抗，正是为了引导他们“走向……我们所理解的文明方向”。

帝国的束缚

19 世纪大多数关于言论自由的白人理论家都支持剥夺非欧洲人的发声权。尽管他们的前提和论证在其他方面完全对立，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与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都一致认为，受殖民民族没有表达自由权——尤其不具备批评英国统治的权利。同样的态度也渗透在基层的英国行政官员阶层中。正如殖民司法的一位批评者、马德拉斯律师约翰·布鲁斯·诺顿（John Bruce Norton）在 1853 年所言，其同事们的核心观点依然是“臣民不过是‘黑鬼’（niggers）”[注 16]，可以被任意对待，因为“没有报刊能为疾苦发声；没有公众关心他们，即便有人控诉，他们也由于‘温顺的印度教徒’天性坚忍，且不无讨好那只打击自己的手的倾向而作罢”。（1857 年大起义后 [注 17]，诺顿开始拥护印度出版自由，并批评密尔在为东印度公司辩护时所使用的“诡辩”；其子厄德利·诺顿在 19 世纪 80 年代成为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重要早期成员，这是大英帝国中出现的第一个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

然而，随着印刷技术在次大陆日益广泛的普及，印度人自身也开始愈发关注出版自由问题。从 19 世纪 20 年代仅出版几十种刊物，到 1900 年，印度每年发行的著作数量已激增至 5000 余种。在 1820 年代，或许只有一万名孟加拉人能直接接触到任何语言的印刷品 [注 18]；而到了 1850 年代，仅孟加拉一地，这一数字便爆炸式增长至约六百万人。许多印度人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来自英国的最新出版物。正如一位英国商人在 1853 年观察到的，“孟

买的市民” [注 19] 阅读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及其他关于印度的最新英文著作的时间“几乎与我们同步；他们阅读这些著作时的兴趣远比我们浓厚；他们讨论这些著作时展现出的能力……以及拥有的优势，是我们无法企及的”。

在这些本土视角看来 [注 20]，尽管印刷业大规模扩张，但印度人与英国人不同，仍未获准拥有能够塑造并公开表达集体意见的自由出版权，这仍然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极度不公。因此，在《论自由》于 1859 年问世后，许多印度知识分子热切地采纳了其言论自由理论，并策略性地选择了 [注 21] 忽视密尔将印度人及其他“落后”民族排除在其论证之外的做法。“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近代英国哲学中最显赫的名字，” [注 22] 加尔各答律师阿舒托什·穆克吉 (Ashutosh Mookerjee) 在 1873 年提醒他的同胞，并为了增加说服力将其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 (*Areopagitica*) 相类比，他称“所有那些汲取了密尔本人为自由平等讨论所做的慷慨陈词之真谛的人”，定会加入他的行列，共同拒绝斯蒂芬对该理论那些推论不当的批评。穆克吉对密尔的解读，既包含了对其基本原则的赞同（“所有人……都能从自由讨论中或多或少地获益”），又对其文明架构进行了精明的重构——将印度人列入“已达到能够通过自由平等讨论而获得改良阶段的民族”，并将《论自由》诠释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欧洲历史的反抗”。正如《加图信札》曾通过忽视灵性言论与政治言论的关键区别而“劫持”了宗教言论理论一样，印度读者也为了自身目的而挪用了密尔的学说，悄然重新定位了其原始的参照语境。正如言论自由论辩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这是一种逻辑上令人生疑但在政治上有效的策略。

然而，此类智识辩论不过是次要的插曲。在实践中，印度出版自由的轮廓直到 1900 年次大陆最终独立前，始终由英国殖民统治的两项最基本假设所塑造。其一是：尽管出版自由是启蒙的必备工具，但决不允许印度人利用它来破坏英国的霸权。其结果便是一系列既维持政府对所有印刷材料的控制，又同时否认存在审查制度的法律与实践——《大英百科全书》 [注 23] 曾向其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保证：“在英国殖民地，出版物如同在英格兰本土一样自由。”

事实上，即便是 1820 年代的条例在 1835 年的印度被废止 [注 24] 之后，也只有获得政府许可的报纸和印刷厂才被允许运营。从 1850 年代起，新建立的印度文官体系还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监视网络 [注 25]——对该国出版的每一部作品进行追踪、阅读并提交机密报告，且特别关注对英国统治的含蓄批评。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1857 年的大起义本身就是一场“现代宣传战” [注 26]，本土出版物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反抗军也例行破坏英国人的印

刷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场宣传战持续进行。1870年，1860年版《印度刑法典》的一项修正案，对任何企图通过言语、文字或图像“煽动对政府不忠情绪”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注27]。随着印度民族主义情绪在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激增，并汇入日益显赫的组织和出版物中，警方对批评声音的镇压以及针对“不忠”出版物的国家法律也变得愈发尖锐。在1878年至1880年那场不得人心的第二次英阿战争期间，一项《土著报刊法》

(*Vernacular Press Act*)专门针对当时蓬勃发展的印度语报纸系统——这些报纸被认为“由大量愚昧无知的”本土人[注28]阅读并传播。该法案对任何“可能煽动对政府不满的内容”实施预先审查和警方的即时压制。1898年的刑法典修正案随后进一步扩大了“对政府不满”[注29]的定义，将“不忠及一切敌对情绪”纳入其中。

在1905年灾难性的孟加拉分治之后（英国行政官员此举意在“拆散并借此削弱反对我们统治的坚实团体”）[注30]，局势彻底白热化。随着民族主义骚乱的升级，新法律授权地方法官在某些煽动案件中取消陪审团审判，并没收涉嫌传播不满情绪的印刷机，无论这些情绪是“通过公开的煽动性文字，还是通过暗示和含蓄的激励来灌输对英国统治的敌意”[注31]。全印度的作者和出版商因表达所谓的反英情绪而遭到骚扰、定罪和入狱。当然，在这一轮猛攻之中，印度总督于1907年圆滑地告知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

“干扰媒体的正当功能，绝非我们的初衷，且完全违背我们总体政策的精神。”[注32]“但当公共安全受到威胁时，[我们有]权利干预……这里不存在出版自由的问题。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煽动不满。”他的部下则将事情说得更直白。一位地区专员敦促道：“我们必须采取绝对最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媒体中的煽动言论，[注33]而无需考虑任何不适用于这个国家的西方理论或情感。”难怪当印度民族主义者在1920年代着手起草他们首部拟议的宪法时，务必将“意见的自由表达”[注34]纳入所有印度人的基本权利。

这种模式[注35]——即针对“煽动”和“不满”的法律在政治危机时刻被强化并用作对付反殖民活动家的武器——在英国统治的剩余时间里一直延续。事实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同样的思维定式支撑着1947年后独立印度针对内部异见的法律与实践——时至今日依然如故。英国人的另一项基本假设也是如此：即认为印度土著在心理构成上与欧洲人迥异。因为他们的感情极易受到伤害，特别是受到宗教侮辱，因此他们需要针对攻击性言论获得更强的保护。基于这一理由，印度的表达自由也必须受到严格限制。

这一构想的始作俑者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作为总督委员会的第一任法律成员，他在1837年将此构想纳入其提议的印度统一刑法典草案中，旨在以此取代繁

杂的各地方律法与司法管辖权。除了对政治言论和出版的限制外，麦考莱的法典在两个主要方面对印度表达自由的界定远比英国本土、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更为狭隘。其一是不再区分口头言论与书面文字：在印度，旨在“损害他人名誉”[注 36]的口头言辞被定为犯罪，即便不构成诽谤的言语侮辱亦然（而在英国，只有诽谤性的公共书面文字才可受罚）。其二是广泛禁止故意“伤害任何人的宗教情感”，即便只是通过单一的词汇或手势。

这些定义并非与英国法律完全背道而驰。例如，关于诽谤的条款将“真实性”视为绝对的抗辩理由，麦考莱认为这改良了英国法律教条（尽管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 1838 年评述麦考莱的文本时[注 37]对此并不以为然）。同样，当时的英国法律中“亵渎罪”依然是一项罪名，尽管这是一种范围窄得多且极少被起诉的宗教侮辱。最后，法典中反复描述诽谤和宗教冒犯所造成的“痛苦”（pain），是将其作为英国功利主义法学中的标准术语来使用，而非出于任何字面意义或特指印度的语境。

然而，其总体效果依然是将印度人描绘成完全不同于欧洲人的群体。尤其在处理印度的宗教感性问题时，文中充斥着对本土人口“怪异迷信”[注 38]、“荒唐至极的仪式”以及宗教“狂热”的屈尊俯就。它将印度人口描述为一群极度敏感、极易动荡的印度教和穆斯林狂热分子，认为他们暴露在彼此的蔑视中会感受到“真实的……且……剧烈的……痛苦”——对于统治他们的那一小撮冷静、理性的英国基督徒而言，这种情况“充满了危险”。麦考莱解释称，在“这个国家的特殊情况下”[注 39]，言论法必须制定得尽可能宽泛，以“防止由见解引发的痛苦”。“宗教讨论”[注 40]是可以接受的，但侮辱则不然：“伤害……他人的宗教情感”[注 41]必须作为犯罪予以惩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会像这里一样，仅因伤及心理情感的侵害行为，便引发如此残酷的痛苦和如此致命的怨恨”。

正如麦考莱所明确指出的，这些限制的首要目的是防止可能破坏英国统治的本土动乱：“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像这里一样，如此忧虑民众间的宗教亢奋。”[注 42]但事实上，他并非首位对此感到担忧的人：英国对触犯印度宗教感性的焦虑可追溯至几十年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焦虑最初源于东印度公司对欧洲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反对。数十年来，公司一直试图将传教活动排除在其领地之外，担心福音派对当地宗教的蔑视会激怒本土民众。1813 年后，尽管议会鼓励传教，公司仍试图尽可能严密地控制。这正是为何在 1818 年和 1823 年，总督的出版条例仅禁止“具有如下倾向的讨论：即使本土民众对任何企图干涉其宗教见解或习俗的行为产生警觉或怀疑”。[注 43]他们的关注点在于防止英国狂热分子挑起事端，而非本土人之间的冲突。这在 1833 年政府取消对欧洲人移民印度的限制后，依然是

一个重要的动机——这也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早期代表公司撰写的公文[注 44] 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印度人本身对他们需要某种针对“激怒和侮辱性言辞”之特殊保护的說法嗤之以鼻 [注 45]。拉姆·莫汉·罗伊及其加尔各答同胞在 1823 年指出，二十五年来，英国传教士一直竭尽全力诋毁当地宗教，用所有本土语言进行布道并发表攻击性言论。然而：

“根本没有出现任何恐慌，因为（印度人）拥有以同样手段捍卫其宗教的力量……他们中许多人已经行使了出版自由来反击英国传教士的著作，并认为不需要其他的保护。” [注 46]

罗伊敦促道，在对待宗教宽容和表达的态度上，印度人与开明的欧洲人并无二致：他们同样坚信“真正的宗教不需要依靠武力或法律惩罚来获得保护”。这一论点机敏地将英国人自己最珍视的关于宗教宽容和出版自由的论据回掷给了英国人。而且，这一观点也植根于现实经验：毕竟，印度教徒、穆斯林以及持有中间信仰或其他信仰的人们在印度各地并肩生活了数个世纪。正如莱斯特·斯坦霍普（Leicester Stanhope）所观察到的，宗教自由原则在印度的传统远比在英格兰本身更为悠久 [注 47]。

此外，不仅是像罗伊这样亲英的改革者是印刷术的早期采用者，许多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保守派印度教徒也拥抱了这一技术。针对罗伊的本土语报纸所宣传的在他们看来极其厌恶的异端宗教观点，他们的回应并非诉诸暴力或声称遭受了不可忍受的侮辱，而是创办了自己的周刊 [注 48]。曾在印度生活近十年的斯坦霍普极力主张：“断言宗教话题的讨论会激起印度本土人的宗教愤恨，是对其历史 [注 49] 及其现状的忽视。”“他们是一个宽容的民族，极其爱好讨论，尤其是在宗教课题上。”

然而，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这些事实日益被英国人关于印度心态本质上低下且不理智的偏见所掩盖——詹姆斯·密尔的《英属印度史》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在英国决策者中的极度流行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年轻的汤姆·麦考莱 [注 50] 便是英国国内深受该著作及类似关于印度文化堕落描述影响的人之一。麦考莱出生于 1800 年，是一位智力超群的神童，在东印度公司显赫人物的环绕下长大——其中许多人是狂热的福音派信徒，将印度的基督教化和对其堕落异教习俗的镇压视为英国神圣的国家使命。1831 年，当他开始参与有关印度的高层决策时，麦考莱曾试图会见来访的拉姆·莫汉·罗伊，称其似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注 51]。但随着他对这个国家了解得越多，且在行政体系中的职位升得越高，他就越蔑视其落后文化和虚假宗教。1833 年春天，这位年轻的议员兼政府大臣在起草关于印度治理的开创性新法律时抱怨道，统治遥远殖民地的黑人和棕色人种令

人精疲力竭；与此同时，其他人（包括他的父亲、著名的废奴主义者扎卡里·麦考莱）正在推动废除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法案。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被莫卧儿人和循道宗信徒、拉姆·莫汉·罗伊和反奴隶制机构协会搅得生活不宁” [注 52]：

“这一半球的黑鬼（Niggers），
那一半球的婆罗门，
用那句‘难道我不是人，不是兄弟吗？’
搅扰我的晚餐与安眠。”

几周后，他在议会的一次重要演说中展示了他对印度及其政府的构想。那是一个拥有惊人财富、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也是英国贸易巨大的未来市场。然而，那也是一个“分解的社会” [注 53]，一个政治上“不洁”、无法解读的地方，欧洲关于自由和历史进步的规则在此并不适用——“政治科学与历史之光已然撤去：我们在黑暗中进行：我们看不清前路何方”。因此，英国人必须极其谨慎。他们的“开明与家长式专制”正开始改良这个国家，正如罗马人曾给受其奴役的民族带来文明一样——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印度人（“在生理上与他们不同，在道德上也与他们不同”）无法被托付欧洲式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代”他们可以，甚至会“要求欧洲制度”。但就目前而言，尽管“本土的高级阶层”在智力上有所提高，“欧洲种族的优越性”依然显而易见——他们是“一个在智力修养上远超（印度人）的民族”。

次年，在詹姆斯·密尔的支持下，麦考莱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印度最高委员会成员。他欣然接受了这项挑战，称其为“为一个被征服的种族立法，而我们宪法的恩泽目前尚无法安全地延伸至他们身上” [注 54]；同时，他也觊觎那份丰厚的薪水，这足以让他终身无忧。然而，在次大陆生活的四年并未改变他的观点，即本质上优越的欧洲“健全且有益的知识” [注 55] 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印度学术中充斥着的“错误”与“虚假” [注 56] 之间，存在着“绝对无法估量”的鸿沟。尽管他从未费心亲自学习过当地语言，但他仍在 1835 年建议印度政府：“一个好的欧洲图书馆中随处可见的一个书架，其价值就抵得上印度和阿拉伯的全部本土文学” [注 57]——“在任何学科领域，都没有任何著作配得上与我们的著作相提并论。”大约在同一时期，当他敦促同事们 [注 58] 推进印度的“出版自由”时，他完全忽视了本土的阅读、写作与印刷活动，将此类自由构思为仅适用于那几百名白人定居者。他后来写道，“孟加拉人” [注 59] 的心智是“软弱到无助的地步”。这种对印度人及其本质上异质的思想观念的嘲讽态度，渗透进了他随后着手起草的法律典籍之中。

1837年完成法典草案后，麦考莱离开印度，此后未再返回。多年间，历届政府对他留下的文本或束之高阁，或零星修补。随后，在1857年大起义的余波中，陷入恐慌的英国政府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管了次大陆。为了竭力树立自身作为“公正统治者”以及“依循公平法律治理”的自我形象，这部《刑法典》[注60]终于在1860年正式颁布。当麦考莱的提案最初在当地律师和法官中传阅时，其禁止言论“伤害任何人宗教情感”的条款曾招致严厉批评[注61]。但最终[注62]，这一条款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作为新法典的第298条），关于口头诽谤（第499条）以及“对政府不满”（第124A条）的核心法条亦是如此。

19世纪30年代后期，资深的马德拉斯法官约翰·福莱尔·托马斯（John Fryer Thomas）曾发出预警，称将任何“对他人的宗教情感或偏见具有冒犯性的……姿势或声音”[注63]简单地定为犯罪，将是一种“危险且易被广泛滥用的标新立异”：一旦颁布，“刑事检控将永无止境”。这不仅是对诚实、自然地表达见解的不当限制，而且注定会被那些已经“动辄求助于法庭作为互斗手段”的宗教团体夺取并作为新武器。将宗教冒犯刑事化不仅不能平息教派仇恨，反而会使事态恶化：“如果刑事法庭随时向各个教派的狂热分子开放，即便在每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亦是如此，其结果必将是助长偏执，并使教派间的宗教敌意保持在最高点。”事实也正是如此。

英国人喜欢将他们的法律和法官想象成超脱于纷争之上的理性、中立裁决者，在他们那些易激动且不理智的印度臣民中维持和平——以秩序取代冲突。但在现实中，这部刑法典的颁布及其管辖权本身所制造的宗教冲突[注64]远比它解决的多。由于新法律预设并奖励了宗教情感化的表达，印度人日益内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的宗教情感是脆弱且易受伤害的——并且他们可以挪用国家权力来惩罚那些造成此类伤害的人。

尤其是，伴随着19世纪后期其他将印度人划分为固定宗教类别并使其相互角力的英国政策，刑法典中针对宗教侮辱的新法律进一步加剧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分裂。在1830年代，这种对立尚未凸显。托马斯法官当时并未察觉到此类敌意，只注意到各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普遍侮辱：逊尼派穆斯林煽动反对什叶派；崇拜湿婆的印度教徒辱骂崇拜毗湿奴的人；而毗湿奴派自身又分裂为互相对立的南传派（Tenkalai）与北传派

（Vadakalai）。然而，麦考莱以其标志性的迟钝，仅构想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到19世纪末，这似乎已演变成该法律实际运用的主要方式。正如麦考莱的继任者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所抱怨的那

样（尽管这发生在他本人也返回英国之后）：这确实是一部糟糕透顶的法令，完全缺乏正当性，极易被滥用，“且一旦该国的政权落入印度教徒或穆斯林手中，便可能导致可怕的残酷行为与迫害”[注 65]。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条款不仅没有削减，反而不断扩张。从 1898 年起，法律不仅将侮辱任何个人的宗教情感定为犯罪，还将企图“在不同阶层的人群之间煽动敌意或仇恨情绪”的行为刑事化[注 66]（第 153A 条）。1927 年，在发生了一系列印度教徒公开谴责先知穆罕默德并引发关于法律确切适用范围的新争议后，一项追加的新条款以统括性的方式，将任何故意“侮辱印度任何阶层公民的宗教或宗教信仰”的企图定为犯罪（第 295A 条）。自此，不仅是个人，整个宗教群体都将受到法律保护，使其免受任何形式的冒犯。

促成后一项法律颁布的那场有组织的穆斯林压力运动，集中体现了到此时为止，围绕惩罚“侮辱”[注 67]的法律程序和权力的斗争，已如何成为不同教派和宗教信仰徒集体认同的强大源泉。但与这种日益增长的将宗教冒犯法“武器化”的趋势，以及英国人那套认为进一步扩张法律是维持殖民统治之最佳路径的笨拙倾向相对立的，是印度本土领导人所留下的证据，他们对宗教言论、侮辱和法学持有不同的、更具降温色彩的见解。

1898 年，英国人在刑法典中加入了第 153A 条。当时的法律成员在立法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解释称，“教派敌意”[注 68]不仅威胁到受影响群体的福祉，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任何偶发事件都可能引发爆炸”，甚至是“对欧洲人社区的全面攻击”——对英国人而言，自身的安全始终是首要考量。同样，他们也在强化第 124A 条（“不满”）和第 505 条（散布可能导致骚乱的谣言——此后即便内容属实，若可能激起教派敌意亦将受罚），因为“在英格兰可以被容忍的语言，在印度则是无法安全容忍的。因为在印度，言论往往会转化为行动，而非像无害的废气一样散去”。他断言，印度人具有危险的暴力倾向，且口头表达的不忠“甚至比书面的煽动更危险，因为它更直接地作用于那些愚昧的、并因此是危险的阶层”。面对“超过 2.5 亿大多愚昧且轻信的亚洲人”，[注 69]以及“不断喷涌出对英属印度政府的诽谤和辱骂的土著媒体”，他的所有英国同僚都同意这些是必要的防护措施。

此外，其他英国委员辩称，如果像英格兰法律那样仅限于惩罚直接煽动骚乱的行为，或者去考虑作者或演说者的意图，在殖民环境下将是完全不足的：必须关注的是“言论或著作的倾向，以及贬损性的陈词（即对英国统治的批评）对一群愚昧且易激动的民众心智所产生的累积效应”。[注 70]针对公众对这些新条款的大规模批评，一些英国官员照例抗辩称出版自由将完

全不受影响（“我们只是想要一个不违反国家法律的自由媒体”），[注 71] 而另一些人则抱怨称，关于“臣民自由或讨论自由的哲学论述”[注 72] 完全不适应印度的残酷现实。孟加拉副总督直截了当地总结道，印度人对英国统治的批评逐年增加，且现在有太多的“半知识分子”[注 73] 土著——因此法律必须收紧。“像我们在印度的这种政府，绝不能容许一个愚昧且轻信的东方人群体的心智，逐渐被针对政府及其一切措施的持续诽谤所毒害和腐蚀。”

然而，到此时，立法委员会（Legislative Council）已加入了少量忠诚且经过精挑细选的印度籍成员。1898 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坚定地谴责了这些提案，认为其侵犯了言论自由，且在对本土民众的推断中带有侮辱性。在委员会最终讨论的整整八个小时里，他们进行了一场原则性的殿后阻击战：对新法投下反对票、援引此前提交的书面异议、并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最终以失败告终的修正案。来自那格浦尔的甘加达尔·拉奥·齐特纳维斯

（Gangadhar Rao Chitnavis）指出，煽动条款的措辞荒谬地模糊；“不忠”（disaffection）[注 74] 一词既无定义也无法衡量。他强调，这些改动完全没有必要——“受过教育的印度群体”驳斥了英国人的断言，即他们的同胞仅因阅读报刊内容就会被激发出暴力倾向。至于第 153A 条，他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和平共处，而这项新法律注定会危及这种现状。任何“过度热衷的警察官员，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注 75] 都可能滥用此法，且“唯恐天下不乱者将非常乐意利用该法律作为对抗敌手的武器，社会仇恨可能因此被永久化和强化，而非被平息”。

南印度著名大律师、记者及印度国民大会党成员帕纳帕卡姆·阿南达查卢（Panapakkam Anandacharlu）警告称，政府拒绝将提案翻译成土著语言是令人羞耻的行为。然而，尽管当时只有讲英语的人口得到了通知，印度公众舆论的所有机构均毫无保留地反对这项新煽动法。他认为，政府辩称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不能代表大众是荒谬的：“除此之外还有谁够格？又凭什么凭证？”[注 76] 他指出，这项法律是基于“错误且毫无根据的”[注 77] 原则推动的，其通过将标志着对“这片土地上全体人民”的蔑视。律师比尚巴·纳特（Bishambar Nath）也表示赞同，认为这些匆忙通过的提案是对言论和出版自由“令人厌恶的”[注 78] 攻击，它们将危及“所有对公共措施公开、诚实的批评”，并通过将宗教分歧刑事化而导致无休止的麻烦。孟买穆斯林律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拉姆希姆图拉·穆罕默德·萨亚尼

（Ramhimitulla Mohamed Sayani）指出，由英国政府官员主导的立法委员会只是殖民统治的橡皮图章，但土著语媒体的一致反对已清晰地表明了“普通

本土公众”[注 79]的想法：这些新法律构思拙劣，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在扼杀普通政治与宗教言论方面极度危险。

三十年后的 1927 年，在关于拟议的新第 295A 条的辩论中，当时新成立的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中的少数印度成员也基于类似的理由进行了谴责。他们警告称，将侮辱“宗教信仰”[注 80]的行为刑事化并不能威慑“粗鄙攻击”，只会“增加狂热，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新的罪名”。惩罚仅仅表达“侮辱性”观点的行为，而非针对任何个人诽谤或实际破坏秩序的行为，将是完全毫无根据的举措。《印度教徒报》（*The Hindu*）编辑之一、马德拉斯律师兼民族主义记者 A·兰加斯瓦米·艾扬格（A. Rangaswami Iyengar）抱怨道，“这个国家许多伟大的爱国者”[注 81]已经根据第 124A 条和第 153A 条的不公正条款被投入监狱。印度人“合法批评、言论和写作自由的权利”已经受到“极其严重的限制”，而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他的盟友一致认为，这是“最危险的”[注 82]、匆促且“恐慌性的立法”，会助长“不宽容和偏执”。几位发言者观察到，印度人之间的宗教冲突并非生而有之，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异族”[注 83]英国统治者不明智的法律和治理不善造成的；这项最新的灾难性措施“只会导致散布在印度各地的各种宗派信徒、古鲁、伪古鲁以及伪化身的追随者发起进一步的骚乱”。然而，尽管在具体措辞上达成了一些妥协，反对的声音再次未能阻止这项立法的通过。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印度民族主义者对英国司法的虚伪性——尤其是针对“不满”和“煽动”的法律——进行了愈发激烈的谴责。1922 年，曾在伦敦受训的律师莫汉达斯·K·甘地（Mohandas K. Gandhi）在法庭上自豪地对后一项指控表示认罪，因为“宣扬对现行政府体制的不满已几乎成为我的一种激情”[注 84]。他在其创办的《青年印度》（*Young India*）报上反复表达对第 124A 条及其相关法令的蔑视：

“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对现今建立的政府真正心怀爱戴的印度人。称其为‘依法’建立的政府是对‘法律’一词的强奸。它是建立在赤裸裸的武力之上的，这把利剑随时准备根据独裁统治者的意志挥向我们，而人民在这些统治者的任命上毫无发言权。”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 1947 年，长达一个世纪的压制政治批评、将宗教冒犯刑事化的英国言论法，不仅创制了一套独特的法律体系，还让底层偏见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其结果是，独立的黎明几乎没有给印度的出版和言论自由理论或实践带来任何改变：殖民遗产已深深植根于民族观念之中。1946 至 1948 年间，伴随着英国仓促撤军和次大陆血腥分治而来的恐怖群众

暴力，似乎印证了印度人确实格外“易激惹”，且在他们之间无法安全地允许“伤害性”宗教语言的存在。

甘地一生习惯于在公共祈祷会上宣读《古兰经》片段，这既源于印度长期的跨宗教灵性传统，也是他为实现当下教派和谐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在分治期间，这一做法日益激怒了反对穆斯林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1948年1月，这成了他们刺杀他的借口。甘地的凶手在法庭上自豪地解释称，甘地认为通过强迫印度教徒听《古兰经》，他“可以安全地践踏宽容的印度教徒的情感[注85]。为了打破这种信念，我决心向甘地证明，当尊严受到侮辱时，印度教徒同样可以变得不宽容。”

在这样的气候下，印度新宪法维持了帝国的现状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制宪之初，宪法最伟大的设计师、年轻时曾留学美国的B·R·安贝德卡博士（Dr B. R. Ambedkar）曾提出一个基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简明表述：“不得制定任何削减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法律，除非出于公共秩序和道德的考虑。”[注86]但很快各方达成共识：宪法不应削弱现行的刑法典。因此，在宪法中那段掷地有声的关于“言论和表达自由”基本权利[注87]的保证之后，紧接着便是漫长的限定性说明——即该权利不影响任何现行或未来有关“诽谤、口头侮辱、蔑视法庭，或任何冒犯正当风俗或道德、或破坏国家安全、或具有推翻国家倾向的事项”的法律。

《刑法典》第124A、153A、295A、298和505条在印度至今仍然有效，并增加了进一步的法律[注88]。尽管法条原文保持不变，但其阐释形态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印度独立后的前四十年里，法院和政府曾做出严肃努力，利用这一司法遗产来维护国家的世俗特质，并保障少数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免受诽谤和诋毁。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注89]，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越来越多地操弄这一法律框架来迫害和噤声其批评者与反对者——一方面利用它打击任何被视为对印度教感性或政府官员的“诽谤”，另一方面则忽视（甚至鼓励）针对穆斯林及其他所谓“不忠”公民的恶毒仇恨言论和暴力。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自独立以来，关于言论、煽动和宗教冒犯的帝国法律与思维模式同样以各种往往带有杀戮色彩的方式，愈发深刻且具破坏性地盘踞下来，导致了无数司法及法外迫害、暴力和杀戮案件。

言论、身份与伤害

这是由《印度刑法典》中关于“易激惹的土著”及其“无法容忍情感伤害”的偏见所引发的第一重悲剧：它创制了一套危害深远的言论法律与预设，并自此盘踞于整个次大陆。这种模式还进一步向外传播[注90]。例如，荷

属东印度群岛的统治者便深受英国对印政策的影响。1914年，为了镇压其殖民地内部的民族主义骚动，荷兰人将《印度刑法典》中的第124A条和第153A条引入其法律体系。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将该法典的各个版本（包括针对宗教伤害的条款）强加于其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其他领地——包括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海峡殖民地（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桑给巴尔、东非（今肯尼亚）、唐噶尼喀（今坦桑尼亚）、乌干达和索马里兰。在其中一些地区，这一框架后来被废弃；但在其他地区（如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它生根发芽，至今仍是后殖民实践的一部分。

第二重悲剧在于，当时并非没有其他可用的范式，即那些不将殖民臣民视为本性异类的范式。1870年，伦敦殖民地部委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左翼年轻大律师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为英国所有帝国领地制定一套模范刑事法典[注91]。他在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从印度回国后的协助下完成了该文本。该文本对言论和出版自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基本建立在现行的英国本土法律基础之上。除了侮辱女王本人外，唯一被禁止的表达形式是发表“诽谤”（libel）——即故意诋毁他人名誉，或鼓励非法推翻政府、教唆犯罪的文字或图像。任何内容若属实且为公共利益而发表，或是出于善意撰写，亦或是“仅通过手势、口头言语或其他声音”表达，均不构成犯罪；法典中也没有任何针对宗教侮辱或类似行为的规定。

斯蒂芬本人曾在1878年试图推动一套针对英格兰的刑法典[注92]通过议会，但未能成功。该版本保留了较宽泛的“煽动罪”定义，包括旨在产生“不满或不忠”或“不同阶层间的恶意与敌对情绪”的口头言论和文字。它还惩罚发表书面的“亵渎性诽谤”。但在其他方面，它同样允许“对任何宗教课题表达任何观点”，并在个人诽谤问题上采取了与赖特一致的方法。1879年产生的这一法典的修订版[注93]随后被许多英国殖民地采用，包括非洲部分地区、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正如研究这些不同文本的学者所证实的，对某一套法律的采纳无一例外是个人偏见、偶然环境、政治更迭及其他不可预知因素的产物——因此，即便每部法典的实质和影响迥异，哪一部法典最终塑造了特定殖民臣民及其后殖民后裔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随机性[注94]。

将受损的宗教情感刑事化，即“印度模式”，其弊端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它起源于19世纪早期英国对非理性“土著”感性与对抗性的错误偏见。其次，它允许主观的个人情绪劫持国家权力并驱动刑事起诉。它赋予了宗教神话和信仰一种特殊的、不可触碰的地位。正如我们所见，基于上述所有理由，它极易被滥用：它诱导人们展示“受创的情感”，极易被用来对付政治

和宗教对手，且往往会加剧而非平息教派对抗。法律不仅仅是维持秩序的中立机制或现有社会规范的产物：它们也在参与塑造这些规范，其制定与执行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预设。

然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完全否定对针对特定“阶层”（classes）之侮辱行为进行法律监管的效用也是错误的。毕竟，历史已经昭示，针对种族、族群、宗教或其他群体的仇恨言论若任其肆意传播，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对这一事实的深刻认知，正是16及17世纪早期欧洲宗教宽容理论家[注95]如此关注维护言论“文明性”、并对宗教侮辱的危险保持高度敏锐的原因之一。他们深知，一旦容许少数群体被妖魔化和非人化，将会导致何等惨绝人寰的流血冲突。同样，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有大量由不受阻碍的群体仇恨传播所预谋并煽动的恐怖暴力案例：无论是在名义上的基督教国家中由反犹太主义者、伊斯兰恐惧症者或白人至上主义者发起的暴力，还是在印度、缅甸或卢旺达针对穆斯林、罗兴亚人或图西人的暴行。针对少数群体的仇恨言论会诱发针对他们的歧视与暴力。但仅以此为由对其表示谴责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像现代美国法学那样，仅当言论外溢为实际行动时才采取法律介入）。更为根本且在先的伤害在于：蓄意的侮辱性言论损害了这些群体作为社群平等成员的社会声誉与地位——正如个人的名誉会受到诽谤和谎言的伤害一样。争论种族差异、宗教真理或同性婚姻并不属于仇恨言论；而以宣扬集体低劣性的方式蓄意辱骂他人，则是另一回事。

这是西方处理传统上所谓“群体诽谤”的传统方式。它与印度模式不同，因为它并非基于对个人情感的伤害，而是基于法律下的平等对待与保护原则。同样，它针对的不是转瞬即逝的言说，而是根据其传播范围和影响的严重程度，仅针对蓄意侮辱的公开文字与图像。群体诽谤贬低了人们的个人及集体尊严：它将他们攻击为卑贱、不平等的公民，甚至是更低等、乃至非人类的生物。这反过来又损害了公共利益，因为它破坏了民主政治秩序的根基。因此，针对仇恨言论的法律维护了地位平等原则。换言之，这些法律是政治宣言。其主要价值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践性的，因为显而易见，其制定与应用必然涉及许多困难且本质上依赖语境的判断——如不可改变的“身份”与可改变的“信仰”之间的界限，意图与效果的问题，以及“真相”、“诚实信念”、“公平评论”的性质等等。然而，即便其措辞从未严丝合缝，应用也困难且罕见，或者被起诉者自诩为言论自由的殉道者，此类法律的存在依然彰显了政体的集体观点，即：弱势少数群体在公共场合被霸凌和贬低是不可接受的。（至于哪些特定身份需要此类法律保护，同样是因文化而异的政治判断——尽管在当今时代，这无一例外地包括少数种族和族裔身份。在现代

西方民主国家，这些身份被认为是最不可改变的、最可能被贬低的，因此也最需要国家对其平等地位提供保证。)

在英国法律中，正如在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这些原则在 19 及 20 世纪从宗教宽容、个人诽谤和公共秩序的法学中相当偶然地产生。其精确形态随当地政治精英的优先考量而异。通常，正如在斯蒂芬 19 世纪 70 年代的帝国法典中，禁止侮辱“不同阶层”民众的规定与对基督教地位的持续特殊保护并存。在英格兰和美国，法律对亵渎罪的禁令同样仅涵盖对基督教信仰的侮辱；在一些美国南部州 [注 96]，出于类似原因，公立学校和大学曾被禁止教授进化论。另一方面，根据 1871 年的法典，德国 [注 97] 的所有宗教社群都受到保护以免受“公开侮辱”，且在 1933 年纳粹夺权之前，当局曾经常尝试惩治反犹太主义著作。在法国 [注 98]，群体诽谤也通过 1881 年的一项出版法被定为犯罪。

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 [注 99]，全球政治气候为反对群体诽谤的法律（以及取缔反民主政治意识形态表达的法令）提供了新的动力。法西斯主义和有组织的反犹太主义的崛起、人们日益意识到民主极易被煽动仇恨的宣传所破坏、大屠杀带来的深重创伤，以及对种族歧视愈发强烈的厌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间，所有这些元素都强化了一种诉求：必须保卫民主公民社会的结构，使其免受不受遏制的族群诽谤之毒害。纳粹一夺取政权，前德国殖民地西南非洲 [注 100] 的英国与南非行政官便引入了一项法律，禁止鼓动“社区内不同种族间的敌意”；1939 年，该法律被用于惩处反英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曼尼·马里茨 (Manie Maritz)，因其发表了充满恶意且煽动反犹的著作。南美洲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 [注 101]。在英格兰本土，在反犹暴力与论战的高峰期，狂热的反犹分子及纳粹同情者阿诺德·利斯 (Arnold Leese) 于 1936 年与其印刷商一同受审。利斯的著作及其创办的期刊《法西斯》(*The Fascist*) 散布了无数关于犹太人嗜血和统治世界的阴谋论，他被指控犯有反犹诽谤罪，“意在制造恶意……(并)煽动敌对情绪” [注 102]。尽管利斯抗议称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 [注 103]，并坚称“维护言论自由要求将犹太人的祭祀谋杀作为公开讨论的话题”，陪审团最终仍裁定两人犯有“公共妨害罪” [注 104]，理由是其“关于犹太教信仰者的诽谤性言论……危及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和平关系”。

这种起诉是根据英国普通法中关于煽动性诽谤和破坏公共秩序的条款提出的，但这些条款的确切范围从未得到精准界定。即便是在法律体系的最高层，关于起诉反犹言论或其他针对特定群体的辱骂性言论应设定何种门槛，依然存在争议。究竟应该是煽动了实际的动乱、还是具有制造此类动乱的意图，抑或仅仅是言论具有挑起事端的“倾向”？然而，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动

力去澄清这个问题，因为此类起诉只能由政府发起，而不能作为民事诉讼——对于掌权者而言，普通法这种模糊不清的范围反而是一种优势。

因此，从 20 世纪 30 年代直到 60 年代初，历届保守党政府的立场始终是：没有必要制定专门针对群体诽谤的新法律。1963 至 1964 年间的英国内政大臣向议员同僚解释称，那样做“将是对言论自由的侵蚀” [注 105]，是“一种形式的政治审查”。对于现状的捍卫者而言，其底层模型依然是公共政治集会上那种喧闹的辩论。该模型假定，在讨论争议性议题时，言语上的过激和冒犯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重点不应在于惩罚言辞本身，而应在于这些言辞是否导致了“破坏和平”（breach of the peace）的行为。正如 1948 年的一份官方议会报告所总结的那样，“群体诽谤” [注 106] 不能被刑事化，否则将“削减自由且坦诚的——尽管可能是激烈且仓促的——政治讨论与批评”。

然而，在这几十年间，其他人逐渐转向了相反的观点。在利斯被起诉前后，一个由左翼议员组成的联盟试图将“旨在煽动种族或宗教偏见、并可能因此引发破坏和平行为的宣传” [注 107] 定为非法；同时，一个新的自卫组织“反法西斯与反犹太主义犹太人民委员会”提议禁止“旨在使任何种族社群陷入公众仇恨或蔑视的言辞” [注 108]。1946 年，政府首席法律顾问（几年后成为《欧洲人权公约》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奥斯卡·道森爵士（Sir Oscar Dowson）指出，即便没有造成即时的破坏和平行为，仇恨言论在社会层面仍具有破坏性。他注意到，在大众媒体和宣传时代：

“即便没有发生暴力或动乱，也不意味着通过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指控对某一类特定、守法的公民进行持久迫害，不会对国家造成骚乱。此类出版物如果反复出现，（正如广告的情形一样）甚至会对完全理性的人的思想产生某种影响，并由此产生……挑起一个阶层与另一个阶层之间的恶意。” [注 109]

到此时，英国共产党、全国公民自由委员会（成立于 1934 年）以及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都已转而支持针对群体诽谤的立法。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随着从加勒比地区及其他帝国领地移居英国的人数日益增多，他们遭到了种族主义者的敌视，反种族主义活动家随即投身于同样的抗争事业。其中，多位工党政治家的观点深受其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曾亲身参与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深知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与大屠杀惨剧之间的内在联系。1963 年，一位资深议员主张，“鉴于 30 年代初期以来所发生的一切” [注 110]，允许以本质上反民主的目的行使言论自由，或者假装“散布种族仇恨言论”对公共舆论和社会结构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站不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以“破坏和平”作

为判定标准是错误的。工党在 1964 年胜选后，在新政府的标志性法案——1965 年《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s Act*）中，纳入了禁止蓄意公开煽动“基于肤色、种族、族裔或民族血统”之仇恨的条款 [注 111]。正如该法案的一位支持者所言，其目的在于“防止在对待有色族裔移民问题上，本国再次出现类似 1935 年和 1936 年针对犹太人的那种局势” [注 112]。基于类似的理由，战后的西欧各国以及加拿大、新西兰等其他民主国家也颁布了类似的法令，并沿用至今。正如现行的丹麦法律所表述的那样：任何人不得发表“因种族、肤色、国籍或族裔背景、信仰或性取向而威胁、嘲弄或贬低某一群体”的言论 [注 113]。这绝非言论自由权的初衷所在。

诽谤与政治

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曾处于打击群体诽谤、并将其界定为超越言论自由范畴之尝试的前沿。当然，正如纳粹分子自己曾钦佩地观察到的那样，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曾深深植根于美国的生活与法律之中，包括与言论相关的法律。1920 年春天，密西西比州全由白人组成的立法机构甚至走到了这一步：将印刷、出版或流传“支持白人与黑人之间社会平等或通婚的论点或建议”定为犯罪 [注 114]。此时，美国人总体上比起欧洲人也更不倾向于就个人诽谤寻求法律救济 [注 115]。尽管如此，在当时美国的部分地区，诽谤法被解释为涵盖宗教及其他群体以及个人，一些针对“挑起种族或阶层仇恨”的新法令 [注 116] 也被成功制定。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犹太团体、非裔美国人群体及其支持者的积极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成立于 1913 年的“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注 117]。该组织诞生于一场反犹宣传狂潮中——此前，佐治亚州的一位犹太公民利奥·弗兰克（*Leo Frank*）被诬陷谋杀儿童，随后被暴徒私刑处死。该联盟的宗旨是“在必要时通过法律申诉，打击对犹太民族的诽谤”。在 20 世纪 20 年代，它曾为群体诽谤法奔走呼号，并说服了几个大城市制定条例，以对抗亨利·福特（*Henry Ford*）创办的反犹报纸《迪尔伯恩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

与此同时，1917 年 6 月的伊利诺伊州——当时那里刚刚发生了数百名黑人工人被白人暴徒谋杀的惨案——州议会通过了一项由其两名黑人议员之一罗伯特·R·杰克逊（*Robert R. Jackson*）提出的法令，禁止出版诋毁或煽动对“任何种族、肤色、信仰或宗教阶层公民”之蔑视的材料 [注 118]。他们尤其关注如何对抗白人至上主义宣传的毒害，例如 D·W·格里菲斯（*D. W. Griffith*）当时上映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1915），该片歌颂了三K党及其私刑暴徒。因此，在同一天，他们还禁止了制造、销售和展示有关“绞死、私判处死或焚烧任何人”的明信片、电影及其他视觉呈现。正如先驱社会学家和民权活动家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所言，《一个国家的诞生》旨在“蓄意诽谤和诋毁一个种族”[注 119]，这一观点也促使其他地方采取了针对该片的民间及官方措施。几年后，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引发了进一步的行动：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美国对群体诽谤法的实验[注 120]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并驾齐驱。1935年，新泽西州宣布宣扬基于“种族、宗教或崇拜方式”的针对“任何群体”的仇恨为非法；类似的法律在马萨诸塞州（1943年）、西弗吉尼亚州（1943年）、印第安纳州（1947年）、康涅狄格州（1949年）和明尼苏达州（1963年）先后通过，并在纽约、密歇根、俄亥俄、罗德岛等许多其他地方以及国会作为国家法令被提出。其中一些法律至今仍然有效[注 121]，包括马萨诸塞州、西弗吉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州法。

与在其他国家一样，这些努力始终充满争议。在20世纪10年代到50年代之间，关于刑法的妥当运用、第一修正案的范畴以及打击群体仇恨的最佳方式，存在许多交替更迭的观点。反诽谤联盟及其同类组织最终改变了对群体诽谤法明智性的看法，其中几项法律最终被法院推翻。但在1951年最高法院审理此案时，仍有许多法律屹立不倒。前一年在芝加哥，搬入此前全白人社区的黑人家庭正遭受着燃烧弹袭击和暴徒骚乱的恐怖威胁，一名领先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约瑟夫·博哈内斯（Joseph Beauharnais）在一名年轻的黑人店员兼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成员克利福德·麦克法兰（Clifford McFarland）就其一份种族主义传单提出投诉后，根据1917年的州法律被定罪。博哈内斯提出上诉，辩称其表达自由权受到了侵犯。他的律师解释称：“这是一个白人的国家，为了保持现状，我们必须战斗。如果我们不能战斗[注 122]，我们将拥有一个像俄罗斯那样的极权政府。”ACLU的领导层此前已协助新泽西州的纳粹分子推翻了该州的群体诽谤法，并帮助一名反犹的芝加哥牧师在最高法院赢得了最近的一起言论自由官司，现在他们同样支持博哈内斯关于[注 123]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主张。

最高法院有两名大法官支持这一主张。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大法官休·布莱克（Justice Hugo Black）——他本人曾是三K党成员——认为，此次定罪是对第一修正案的直接侵犯，也是对起草该条款的“制宪先贤们”[注 124]的侮辱：任何政府机构都无权“决定美国人可以讨论哪些公共议题……那是个人选择，而非国家的选择”。无论是地方法律还是国家法律，都绝不能“惩罚人们在公共事务中发表言论”，或将“见解定为犯罪予以惩处”。此外，他认为只有个人才能被诽谤，而“庞大的群体”则不然：“群

体诽谤”不过是“扩张性国家审查制度”的一个新造委婉语。引人注目的是，布莱克在阐述这一反对意见时，从未承认博哈内斯著作中充满暴力的基调或语境（尽管他确实将那份传单作为附录印出）。布莱克抱怨道，如果此类言语可以被刑事化，那么支持种族隔离的各州肯定也会同样以“倡导平等和非隔离”为由将人入罪：这仅仅是一场观念之战。在他看来，被告仅仅是在就“广泛的公众利益和重要问题”发表“强烈的看法”并进行“和平请愿”。他形容其语言是“温和的”；且认为“此类公共讨论”几乎或完全没有危险。布莱克并未从中看到诋毁、蔑视或伤害，他只看到了关于某些人“可能认为对任何种族、肤色、信仰或宗教具有过度冒犯性”的主观判断，并警告称“现在批评其中一个群体确实变得非常危险”。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Justice William Douglas）同样认为，政治辩论引发“失当语言”[注 125]和“偏激言辞”是正常的；他坚持第一修正案是绝对的，并表示如果博哈内斯今天受罚，那么“明天一个黑人就会因为慷慨激昂地谴责私刑法而被带上法庭”。

然而，其他七位大法官均持相反观点。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不久前刚主持了纽伦堡纳粹战犯审判。1949年，他曾激烈反对最高法院同僚对一名芝加哥反犹分子的宽容立场，此人曾煽动民众对抗所谓的“嗜血共产主义犹太人全球阴谋”（称其意图谋杀基督徒并摧毁美国）。现在，尽管杰克逊出于程序理由对多数派意见持有异议，但他同意博哈内斯制造了“鲁莽且恶毒的诽谤”[注 126]，并认为尽管联邦政府无权，但各州完全有权制定针对群体诽谤的法律，以便为种族和教义诋毁“设定体面的界限”。他警告称，“滥用表达自由”会伤害少数群体并撕裂社会，正如近代史所证明的那样：针对此类行为的法律虽难以制定且未必奏效，但完全符合宪法。大法官斯坦利·里德（Justice Stanley Reed）同样赞成“州政府拥有通过群体诽谤法以维护公共和平的宪法权力”[注 127]。

在多数派意见书中，其余五位大法官强调，诽谤和“人身攻击”[注 128]不属于“观点”或受保护的政治言论；当群体诽谤影响到社区的“和平与福祉”时，各州有权予以惩处；且“过去三十年的惨痛经验”以及伊利诺伊州长期的白人至上主义暴力史已充分证明，“蓄意传播有关种族和宗教群体的谎言者，会煽动冲突，并极力阻碍多元语言的大都市社区进行自由、有序生活所必需的多方调适”。针对群体诽谤的法律能否对抗“系统性的谎言雪崩”尚无定论，但立法者当然可以进行尝试[注 129][脚注 1]。

尽管这一判决从未被正式推翻，但大多数观察家现在认为它已经过时，因为它与随后确立的许多美国第一修正案法理准则相抵触。现在人们被告之，无论是联邦还是地方政府，绝不可以限制任何“观点”，无论其表达得多么

恶毒。在当今时代，一切都被归为单纯的“见解”。结果是，21 世纪的美国人由于习惯了公共言论中非同寻常的谎言和诽谤，就像他们习惯了校园和街道上同样惊人的枪击大屠杀一样——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接受了一套关于 250 年前起草的宪法条款含义与重要性的、相对较新且独特的预设。

美国如今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连针对“仇恨言论”的地方性法令都被推定为违宪的国家。如果说放弃对群体诽谤采取法律行动是出于实践层面的考虑——即承认此类话语在美国生活中过于普遍且根深蒂固，以至于立法手段难以见效——那尚且另当别论。然而，这种例外论通常被视为一种原则问题而受到赞颂，并被树立为供其他文化效仿的典范。诚然，即便是非美国人也往往倾向于认为，群体诽谤法是一种笨拙的机制：难以执行，不太可能根除种族主义和偏见，且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另一种常见的论调也并非事实，即认为此类法律将有害的辱骂驱逐至地下、使其更加隐秘地流传是一种弊端；恰恰相反，这正是此类法律的核心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阳光和曝光并非消毒剂，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公众关注的养分往往会助长仇恨和偏见的传播与常态化。

此外，认为政府对群体诽谤必须保持“中立”的观点也并非定论——该观点主张，即便是种族主义辱骂本质上也是政治表达的一种形式，遏制它将侵犯言说者的权利 [注 130]。因为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允许此类辱骂，更遑论将其视为“受保护的言论”，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所表达的观点比其造成的伤害更具价值。事实上，这并非中立立场。持此立场的人无一例外地承认，种族主义和仇恨言论当然是有害的，但“我们”必须容忍这一点，因为遏制表达的法律对我们社会的损害会更大。或者，他们反驳称，获得更高价值的并非仇恨观点本身，而仅仅是“这些观点应当被允许表达”这一原则。这种区分充其量也只是虚伪的。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最基本的问题：言论自由的初衷究竟是什么？

正如 1952 年博哈内斯案裁决时一样，理性的人们在“将群体诽谤刑事化是否为一个好主意”以及“执行此类法律的困难”上仍存分歧：这是一个艰巨的社会和法律难题 [注 131]。但是，美国主流法学倾向如今已不再致力于解决这一难题，而是简单地将其斥为无关紧要。这种倾向产生了一个更为严重、且更具问题的文化后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排他性的、放任自流的预设不可避免地主导了美国公民的观念，进而影响了那些美国企业的领导者。事实上，这些企业的决策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国家乃至全球公共话语的基调和内容——包括出版商、广播公司、媒体公司、互联网服务提供商、YouTube、X、Facebook 等等。这些私人企业集团如何处理仇恨言论，最终最有力地决定了此类言论在各地的放大或受限程度。然而，由于美

国法律不再费心考虑此类事务，我们的通信领主们也感到愈发可以自由地忽视、淡化、乃至普遍草率地处理相关问题。毕竟，他们最终关切的是利润和市场份额，而非公众利益。那么，美国人——乃至我们所有人——是如何陷入这种奇特境地的？这将是本书最后一章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

思想的市场

我们现代西方的言论与出版自由理论——尤其是在美国——很大程度上聚焦于限制政府对表达的权力。这部分是因为这些理论最初是作为对此类管控的反击而产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1800年以后的英语世界，自由在本质上是“善”而“审查”始终是“恶”的观念，也产生了一种自身的逻辑惯性。一旦你接受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那具有深远影响的“消极自由”定义（即自由在于国家和社群允许个人按其意愿行事），那么削减对表达的约束便成了一种积极的美德追求，成了文明进步的标志。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关于言论自由的论点之所以呈现出反政府的形态，也出于一些更为平庸的理由。对出版自由最响亮、最创新的诉求，往往来自于唯利是图的记者、哗众取宠的印刷商、牟取暴利的媒体主、野心勃勃的律师以及追逐私利的实体公司——换言之，这些人披着推进公共利益的外衣，利用权利与自由的话语为自身谋取利益。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谈论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自由理想似乎显得有些荒谬。难道极权主义不是个人表达自由的对立面吗？苏联和现代中国等国家最令我们感到震撼的，恰恰是政府审查的无处不在，以及奥威尔式“老大哥”阴魂不散的回响。我们倾向于认为，那些是“没有”表达自由的文化——是证实了我们对于国家监管和强制性思想一致性之危险所持偏见的乌托邦社会。

因此令人好奇的是，这些国家的纲领性文件[注1]事实上也声称珍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在苏联、古巴、中国、朝鲜以及历史上存在过的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权利中都得到了保障。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空洞的辞令。将这些条款纳入其中（正如同样无处不在的宪法对宗教自由的保障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试图抵御外界对这些政府并未真正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指责。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多世纪以来，出版与言论自由似乎已确立为如此强大的全球理想，以至于每个国家都不得不公开对其表示认可。但其内涵远不止于此。

正如这些社会的法律和宪法详述文本所明确揭示的那样，它们对出版与言论自由的定义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共产主义的言论自由路径有着自身悠久的历史，且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历史紧密交织。马克思本人曾是一位造诣深厚的记者，列宁亦然。从19世纪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基于自身作为宣传家和出版人的经验，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出版自由理

论提出了最入木三分的批判。探究这些观点，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如何以及为何形成了自身的观念与实践，同时也凸显了我们自身意识形态中最为严重且持续存在的盲点。

这种反资本主义的挑战对西方的言论自由原则也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它对美国第一修正案法律形态的变迁产生过尤为深远的影响。为了理解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需要首先追溯：在 1700 年之后，曾经作为最重要传播媒介的“言说”（speech），是如何逐渐被视为弱于“印刷”（print）的——这一转变反过来对人们看待新闻界的态度产生了深远后果。

因此，到 19 世纪初，整个西方世界的睿智观察者已愈发清晰地认识到两件事。首先，印刷物的爆发式增长及其日益去监管化的趋势，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媒体景观。但其次，这是一个被深度操纵、唯利是图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决定谁的声音能被听到、谁的声音被湮没的，不仅是政府权力，还有私人资本与资本主义偏见。这些问题在当今这个传播革命和亿万富翁掌控媒体平台的时代显得尤为迫切，并常被视为前所未有，但事实上它们绝非新事。

新媒体的影响

言论自由的历史，本质上也是一部新媒体的历史。古往今来，皆是如此：关于表达自由的观念，始终受到传播领域革命的驱动。弥尔顿（Milton）早期关于出版自由的论辩便产生于这样一个时刻——由于审查制度的瓦解，英格兰在 1640 年代和 1650 年代出版的作品数量，比印刷术发明以来此前一个世纪的总和还要多。1700 年后，特许准入制度（Licensing）的永久废除引发了印刷机、书籍和小册子数量 [注 2] 更加剧烈且持久的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全新的发行形式（巡回图书馆、书友会、咖啡馆、全国邮政网络的扩张）以及廉价传播的新体裁，尤其是新闻纸。这种实践层面的变革解释了为何“出版自由”首先在英语世界成为一个焦点议题。

此外，这场媒体革命促使英国人对“言说”（speech）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正如本书开篇所述，从有记载的历史直到 17 世纪，口头言语一直被视为最卓越的沟通方式：各种类型的“恶言”都会受到常规的监管与惩罚。

在 18 世纪的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印刷传播的新普及及其重要性，似乎对人们如何看待口头言辞的效力产生了重大影响。诚然，到此时印刷术本身已问世数个世纪。但考虑到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传播革命，虽然它在过去几十年里同样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世界，但其发生也是在计算机首先被各

领域专家使用很久之后。同样地，在 18 世纪，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新技术的发明，而是其应用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这使得英语民族对口头言语和印刷文字之相对权力的构想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位移。

其结果是，在整个英格兰及其美洲殖民地，人们不再因言语侮辱而互相起诉 [注 3]。自中世纪以来，这曾是一种极度普遍的诉讼形式；然而在 18 世纪初，它几乎完全消失了。针对“忤逆言论”（insubordinate speech）的情况亦是如此。数百年来，贵族们一直以所谓的“贵族诽谤罪” [注 4]（*scandalum magnatum*，即诋毁贵族）起诉其下属。在 16 和 17 世纪，此类诉讼愈发频繁且屡屡获胜。但在 18 世纪，它们几乎销声匿迹。针对“煽动性言辞” [注 5] 的起诉也出现了类似的锐减，而此类起诉在 1700 年之前曾非常普遍。即便是在 1790 年代的革命恐慌时期，与此前时期相比，极少有人因口头煽动而真正受到惩罚 [注 6]。英国人不再将言语表达视为能够摧毁个人名誉和政府秩序的危险之物，而是开始将其视为相对无害的东西。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是因为印刷权力的日益增长，还与人们对口头言语（spoken word）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18 世纪的观察者不再将言说视为人际关系的威胁，而是将其看作社交生活的一大乐事。这种态度契合了诸多新兴的启蒙预设——例如，上帝本质上是仁慈的，人类天生趋向美德，以及两性间文雅的往来是文明的指标。此外，这种转变也受到新兴的生理学和唯物主义对身体及语言产生方式 [注 7] 理解的推动——人们意识到语言并非源自心灵或灵魂，而是由声带产生的。

在 1700 年之前，英语世界的道德家曾倾注数百页篇幅讨论“舌头的治理” [注 8]，这一主题的书藉曾极其畅销并多次重印，因为舌头被视为身体中最难以管束的部分。但在 18 世纪，这一大众体裁基本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对“交谈艺术” [注 9]（即仁慈、友好且具社交性的言说）的痴迷。1726 年出版的《论舌头的治理》是英语世界最后一篇以此为题的文本。该书作者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与 16、17 世纪的前辈一样，是一位严肃的神学家、高产作家和极具影响力的伦理学家。但他的方法论与前辈截然相反——他认为人性本善，上帝创造语言是为了让人们获得“享受” [注 10]。文中不再提及人性的堕落、舌头的邪恶或约束舌头的困难。巴特勒向读者保证，当使徒雅各提到“勒住舌头”时，他指的并非恶言恶语，而仅仅是过度“多嘴”的缺点。他关注的不再是规避罪恶，而是文雅交谈的准则。

此外，在 1700 年前后，将言说与其它类型的“行动”区别开来 [注 11] 变得愈发普遍。例如，即便在诽谤诉讼中，侮辱性言辞所占的分量也开始轻于其他侵权行为。法官、法律权威乃至此类案件的证人愈发怀疑言辞本身能否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正如特伦查德（Trenchard）和戈登（Gordon）在

1721 年所断言的那样，“散布虚假言论” [注 12] 对“人类社会及世界和平”造成的“伤害”必定总是小于“作恶行径”。

这种区分促成了一种新观念的产生，即书面文字 (written words) 比口头言语更具分量。而在以前并非如此——传统关于言说效力的预设是在一个基本属于口传的世界中形成的。在约 1600 年之前，即便法律界也不区分口头诽谤 (slander) 与书面诽谤 (libel)。在 1644 年的《论出版自由》 (*Areopagitica*) 中，弥尔顿仍理所当然地认为，思想通过“逐家逐户” [注 13] 的口头传播比印刷出版“更危险”。直到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种预设才逐渐逆转。到 17 世纪末，英国律师开始主张，一方面是冒犯性的口头言辞，另一方面是书面作品，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因为后者是公共行为，而前者仅属于私人过错” [注 14]。

我们可以在立法语言中追溯同样的演变。中世纪及近世早期的法令并不太区分口头言语与书面文字。例如，1275 年的一项英国反煽动法案将简单的“讲述或发布任何虚假新闻或故事”定为犯罪。1378 年的《格洛斯特法令》 (*Statute of Gloucester*) 针对诽谤和“虚假新闻”等行为，禁止任何人“言说或讲述”任何谎言。这些法律根本没有提到手稿。16 世纪晚期的同类法令主要关注言说，其次才涉及任何书写或印刷品。到了 17 世纪，法律开始将言说与书写视为基本平等的存在。因此，詹姆斯一世的一些宣言仅提到“笔头或言语”，或煽动性的“言说或书写”，而忽略了印刷；1640 年代和 1650 年代的《叛国法》 [注 15] 则平等地适用于“公开宣称”、布道、书写和印刷。迟至 1686 年，苏格兰的一项皇家公告 [注 16] 再次发布了古老的禁令，禁止各种不忠的公共及私人言论，却完全没有提及书面或印刷的通讯。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份苏格兰的公告，而非英格兰的。正如我们所见，在书写与印刷尚不普及的地区，或是在统治者感到其权威动摇的情况下（如殖民环境），对言论的监管依然至关重要。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多数反叛州都颁布了将保皇派言论 [注 17] 及文字定为犯罪的法律。同样，1792 年，弗吉尼亚州效仿古老的英国法令通过了一项针对“虚假新闻”的法案 [注 18]。此举旨在抑制有关圣多明各（法属奴隶殖民地，即后来的海地）革命爆发的消息在奴隶及自由黑人群体中的口头传播。

18 世纪欧洲国家的法律同样勾勒出一个印刷媒介仍处于边缘地位并受到严密管控的世界，其核心关注点在于监管言语和手稿。例如，在 18 世纪初的俄罗斯 [注 19]，任何未经授权、涉及沙皇个人或政策的言头讨论都可能被视为死罪；1718 年，彼得大帝甚至规定任何人在“锁闭的门后”书写任何东西皆属犯罪。在 18 世纪中叶的瑞典，即便是在私人的手写文稿中，也被

禁止对敏感话题进行未经批准的讨论。这正是为何 1766 年的《瑞典法令》始终关注“写作与出版的自由”，即获得写作以及印刷的许可：因为这两者此前都受到限制，且同等重要。当时印刷术还远未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法国，对口头言语的监管持续时间则长得多。旧制度时期及大革命时期的一系列法律都将言语表达定为犯罪；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见，在 1790 年代，成千上万的男女因发表“煽动性”观点而被监禁或处决。

相比之下，英格兰 18 世纪的法律 [注 20] 将印刷和书写文字视为比口头言语更为严重的问题。甚至连公共布道也逐渐被认为在范畴上迥异于印刷品。这一点在 1710 年亨利·萨谢弗雷尔 (Henry Sacheverell) 的审判 [注 21] 中已显露无疑。这位托利党煽动派牧师、宗教宽容的抨击者、后来的詹姆斯党人，是那个时代名声最响的煽动性布道者。让他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并非其公共布道，而是他对布道词的印刷与出版——前者仅有数百名听众，但其畅销的印刷本受众却高达 25 万人。到世纪末，这种区分已趋于固化。除了极少数针对口头煽动的起诉外，执法活动的重心已压倒性地转向了书面、印刷及出版的文件。1800 年后 [注 22]，英格兰极少有人因言论而受审，陪审团似乎也越来越不可能仅因某人吐露言辞而将其定罪——即便他们赞美拿破仑、诅咒国王，或诅咒“摄政王人头落地”。

法律语言证实了这一转变。在美国，1798 年的《煽动叛乱法》 [注 23] 将“针对政府编写、印刷、发表或出版任何虚假、诽谤及恶意的书面材料”定为犯罪。在 1700 年之前，“发表” (uttering) 和“出版”

(publishing) 通常指代口头言辞。但现在，尽管仍有少数人因言论被起诉，法案本身的条款仅提及书面或印刷文本。总体而言，正如一位法律权威在 1801 年所解释的那样，口头“言语消失在空气中” [注 24]，“但书面文字……可能造成持久的伤害”。同样，在英国 [注 25]，1792 年的反煽动公告完全忽略了言论，仅关注“印刷、出版并被勤勉散布的……文稿”。1795 年的《叛国与煽动行为法》确实涵盖了煽动性的“书写、印刷、布道或其他言谈”，但更为严重的“叛国言词”罪只能通过“印刷或书写”构成。随后在 1817 年和 1819 年颁布的《叛国与煽动法》则根本没有提及言论。

这是一次重大的变革。此前人们一直假定，发表煽动性言论本身就是一种骚乱行为，是对公共和平的破坏。然而自 18 世纪初以来，与其他传播形式——无论是手稿、印刷品、报纸出版、电影、广播还是互联网——相比，言语 (speech) 的效力日益被低估。到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已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且这一预设延续至今：即口头言语只有在引发了另一项独立行动——即“实际的”“破坏和平”行为——时才具有刑事责任。言语本身似乎不再被认为具备严重干扰任何事物的能力。

当然，这一总趋势中也存在许多例外情况。在整个 18 世纪及其后，即便在印刷媒介高度饱和的文化中，口头言语在许多方式和语境下依然强大、具有潜在危险或受到约束。我们可以想到誓言、承诺 [注 26]、口头命令、商人或绅士的承诺、以及“挑衅性言词”（fighting words）等等。从 1737 年直到 1968 年，在英国公开演出的所有剧本都必须预先经过政府审查官的批准：舞台上的公共言论被认为具有极强的效力。1694 年和 1746 年，英格兰还通过了针对亵渎性誓言的新法律。除了法律和政府对言论的监管外，私人和社会的行为规范在塑造人们的言说方式方面显然始终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例外，总体的结果依然是对言语产生了一种截然不同且全新的态度——即承认书写，尤其是印刷，是比口头表达更强有力的传播媒介。这种观点并未在将言词与其他行为对比时贬低言词的价值；相反，它强调不同传播媒介在世界上的影响范围、触及程度和效力各不相同，且表达规则应当考虑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洞见。相比之下，近年来出现的一种观念——即认为所有的“言论”不论其媒介为何，与“行动”相比在本质上都是无害的 [注 27]——则是一种更为笨拙且显而易见的存疑预设。

无论这些思想的确切智识谱系为何，直到 19 世纪，讲英语的人们才开始假定“棍棒和石头能打断我的骨头，但言语永远无法伤害我” [注 28]。这句格言最早记录于 1862 年。时至今日，这已成为我们倾向于采取的态度。我们的现代观念认为，言语（尤其是口头言语）不同于物理行动，且效力远逊于后者。但这恰恰与传统及前现代的观点截然相反——传统的观点认为，“舌之重击，可碎人骨” [注 29]。

印刷、资本与阶级

到 19 世纪，印刷品已成为远比手稿或言说更为强大的媒介，这一事实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讨论中已得到广泛承认。然而，这对该领域的大多数理论产生的影响却微乎其微。一方面，新闻界这种独特的力量隐含在每一种针对其“放纵”的实际限制与控诉中：批评者无一例外地将这一媒介视为某种独特的“恶之引擎”。但另一方面，支持言论自由的积极论点仍继续将谈话、手稿和印刷品混为一谈，有时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却从未以此为忧。

这种观点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热忱地将“报刊——尤其是近来的期刊报章” [注 30] 视为社会中最强大、最进步的力量。在 1840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由衷地赞叹道：

“英格兰真正的政治联盟就是报纸。正是它们告诉每一个人，其他所有人正

在感受什么，以及准备以何种方式行动；可以说，正是通过报纸，人民才了解到了他们自己的愿望。”尽管密尔后来对公众舆论实际上如何扼杀智识原创性感到悲观，但他从未将其发展为对媒介本身的批判；他更倾向于用传统措辞赞美报刊，将其视为“公众舆论……这一最高权力”[注 31]的管道，以及抵御政府暴政的堡垒。

密尔不可能察觉不到这样一个事实：现实中的印刷市场是一个竞争惨烈、唯利是图的角斗场。他在父亲的阴影下长大，而他的父亲正是靠为公众撰稿发家致富的。密尔本人也是一名老练的书评人和东印度公司的匿名宣传员，同时也是一位精明且深谙受众心理的作家（“我越是思考《论自由》这一卷的计划，就越觉得它可能会被广泛阅读并引起轰动，”[注 32]他在 1855 年写给妻子哈丽特的信中激动地预见到了该书的巨大销量）。但由于他和其他 19 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主要在集体与个人权利、政府与人民的对立框架下构建关于表达自由的论述，他们的模型往往忽略了媒体在塑造公共辩论中起到的关键中介作用。其结果是，言论自由理论与商业市场现实之间的脱节日益严重。

这绝非新问题。新闻的商业化早在印刷机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注 33]；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见，特伦查德（Trenchard）和戈登（Gordon）在 1720 年代开创性的言论自由理论，本身就深受当时政治印刷品腐败环境的影响。但自那时起，随着新闻市场[注 34]的持续扩张，其露骨的商业特征也随之增强。1781 年，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拥有 76 种地方及全国性报刊；到 1851 年，仅报纸的数量就增加到了 561 种。尽管创业失败率居高不下（1832 年发起了 250 个新项目，其中大部分很快夭折），但与此同时，出版涉及的成本却呈爆炸式增长。1800 年前后，花费约 1,000 英镑仍有可能创办或接管一家伦敦日报；而到了 1846 年，据称创办《每日新闻》（*Daily News*）这类报纸的成本已高达 10 万英镑。这些数额巨大的资金既反映了日益工业化的印刷技术成本，也反映了从销售和广告中获取的利润之丰厚。在 1780 年代，一份受欢迎的报纸可能希望每年给投资者带来约 1,000 英镑的回报；而 1845 年，《泰晤士报》已能向股东支付近 3 万英镑的红利。

大多数英国报纸还接受当时政府或反对党的补贴——或者干脆为了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而调整政治立场。此外，直到 19 世纪中叶，政府对纸张和广告征收的税收（部分旨在让穷人买不起报纸），是印刷世界被金融及政治力量共同塑造的又一方式。1850 年代废除这些税收的举措，其目的反而是为了通过操纵市场，彻底摧毁激进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廉价地下报纸，因为后者曾在完全不同且更具平等色彩的经济基础上蓬勃发展。在所有这些方式中，

尽管媒体出口日益多样化，但印刷新闻和见解的市场并非透明、中立或人人皆可进入，而是被隐蔽的、逐利的和党派性的关切所主导。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英格兰，也见于西方世界所有不同的出版体制中。因此，到 19 世纪初，深谙此道的观察者们不仅强调印刷品（尤其是定期刊物）日益增长的权力，也开始强调其易于腐化和虚伪的一面。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在 1807 年抱怨道，“报刊的腐败与卑劣” [注 35] 使其成为了真正自由的敌人：富人和权势者控制了一切，而贫穷和受压迫者“完全没有向公众正义呼吁的手段”。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 1829 年写道，在这个新的“机械时代” [注 36] 中，报纸编辑成了新的领主，但他们的动机和目的都是有害的。他小说《衣裳哲学》（*Sartor Resartus*, 1834 - 5）中误入歧途的主角欢呼“记者现在是真正的国王和牧师”；然而，他们产出的后果显然是魔鬼般的。法国伟大作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在他 19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半自传小说中也投射了类似的观点 [注 37]，这些观点源于他作为印刷商、出版商和记者所经历的痛苦往事。他笔下的一个角色解释道：“你看，新闻业是现代社会的宗教。”其本意是，新闻业那些如恶魔般的从业者拥有巨大的权力，却用它来兜售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神话。巴尔扎克传达的寓意是：阻碍真相的不仅是政府的审查，还有市场的激励机制。印刷品只不过是一种商品；其成功取决于资本而非技能；报纸为了金钱惯常性地误导读者。

这种分析被政治激进派、英国“非印花税”（unstamped）报刊的作者和读者进一步深化——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这些报刊引以为傲地逃避了纸张印花税，以及其他旨在镇压工人阶级出版物的企图。这些廉价的通俗报纸，其总发行量足以与合法报刊相抗衡，它们明确地将出版的不自由与唯利是图同劳动阶级的受压迫联系起来。它们不断攻击那些缴纳印花税的竞争对手是腐败的，指责所谓“自由报刊”捍卫者的伪善——这些人实际上不断操纵法律和市场，“以使工人阶级的奴隶地位和退化永恒化” [注 38]。在他们看来，合法报刊只为“资本家、游手好闲者和掠夺者” [注 39] 代言，而这些人是靠榨取真正创造国民财富的工人的血汗发财的。1835 年，《穷人守护者》（*Poor Man's Guardian*）警告称，印刷机是史上发明的最强大的工具，“无论其用于行善还是作恶” [注 40]——但在英格兰、法国和美国，它现在大都掌握在“追逐利润者”手中，而非支持“劳动者权利”的声音。正如该报屡受迫害的出版人亨利·赫瑟林顿（Henry Hetherington）所解释的，激进期刊参与的是一项关于政治正义的双重工程：“加速建立出版自由，并为不久后的工人阶级解放扫清道路” [注 41]。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基于

类似的洞见，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欧洲记者开始重新思考传统的出版自由理论。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在马克思成年生活的前半段，他一直为各种进步报刊忙碌工作——不仅在德国、比利时和法国，还包括英国和美国的刊物。在 1840 年代，他所参与的几乎每一份大陆报纸都遭到了当局的严厉审查、骚扰并最终被关停。他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政治论文 [注 42] 是对审查制度的一次自由奔放的抨击，起因是 1841 年 12 月普鲁士颁布的一项公告。几个月后，在他 24 岁生日那天，他在科隆的《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开始了职业生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同一主题且广受关注的文章；次年，在与审查员进行了持续斗争后，他辞去了主编职务，以抗议他们的行为。在这一时点，即马克思尚未形成系统的政治哲学之前，他的观点还是相当传统的。他的主要论点是，普鲁士的预先审查制度应该像其他国家那样被现代出版法取代，并且自由报刊体现了“人民的声音” [注 43]（或如他在别处所说的“自由人的无畏言论”）——它既是“公众舆论的产物，[同时也]产生公众舆论”。

1844 年，马克思移居巴黎，转向共产主义，并开启了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终身合作；两人开始共同构建一套全新的、唯物史观的历史与政治理论框架，旨在解放世界各地受剥削的劳动人民。1848 年革命在全欧爆发后，两人迅速返回普鲁士创办了一份新报纸以支持革命事业。此时，他们对报刊推动变革的力量已形成了一种更为尖锐、更具战斗性的信念。在 1849 年春该报被镇压、马克思被流放伦敦之前，他们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曾公开主张“革命恐怖主义” [注 44] 与“社会共和革命”。当马克思因该报攻击政府官员而受到起诉时，他在法庭上轻蔑地回击道：“报刊的首要职责……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 [注 45]。

在日益坚信印刷媒介具有革命能动性的同时，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对自由主义的出版自由观念展开了更为彻底的批判。其核心关注点在于资本的有害力量。财富极度不平等的分配系统性地扭曲了媒介的运作，过度放大了某些声音，同时压制了另一些声音；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与追求真理是互不相容的。早在 1842 年关于审查制度的最早论述中，马克思就已对出版自由如何受财务约束影响产生了兴趣。他沉思道：“出版自由的首要自由就在于它不是贸易” [注 46]；然而，“出版物当然也是一种贸易，但这不是作家的职业，而是印刷商和书商的事。”他注意到，在法国，报纸“固然不受智识层面的审查，但却受物质层面的审查，即（获得出版许可所要求的）高额保证金。这在物质上影响了报刊，因为它将报刊从其真实的领域拉向了大宗商业投机的领域” [注 47]。

1846年，恩格斯在为英国宪章运动周刊——利兹《北极星报》（*Northern Star*）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阐明了阶级压迫与错误的自由主义出版自由观之间的因果联系，或者如他所言，“‘金钱自由’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区别”[注48]。他认为，中产阶级在其自由主义理想中表现得颇具进步性——如“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使报刊脱离君主审查制度的枷锁”等等。但问题在于：

“由此，所有以前的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都被**金钱**特权所取代……简而言之，这不外乎是给**不平等**冠以平等之名。因此，出版自由本身就是中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印刷需要**金钱**，而且印出来的产品需要**买主**，而这些买主又必须有钱。”

这并非言论自由，而是一种本质上不自由、不公平且反民主的状态。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卓越创始人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在1862年所解释的那样，其结果是“向**人民的思想**发出呼吁、启发并领导他们的可能性，已成为资本占有者的特权”[注49]——“公众舆论”成了“资本以及……特权富裕资产阶级”的产物。

应对媒介扭曲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并非只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关注这些问题。许多欧洲和美国的顶尖学者也对传统的自由主义出版自由理论采取了类似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在德意志地区，凭借其较少受自由放任主义影响的智识与政治传统，从1850年代起，多位主流作家开始抵制英美和法国自由言论理论家的倾向——即忽视媒介的中介角色、预设自由市场在生活各领域的优越性，以及仅将表达自由理论化为一种抽象的个人权利。相反，这些德意志学者优先考虑公共利益，聚焦于塑造公众舆论的物质条件，并努力解决表达自由与传播市场扭曲结构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位思想家便是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卡尔·克尼斯（Karl Kries）。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包括一部1857年出版的开创性专著《作为传播手段的电报，兼论一般新闻媒介》。在书中，他阐述了其所身处的“传播手段世界历史性革命”[注50]所带来的深远社会与智识影响，并将他那个时代的媒介景观与此前的历史时期进行了对比。克尼斯主张，传播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而现代技术（出版、铁路、电报）以指数级的方式辅助并扩张了这种需求。然而，关键在于必须对这些技术进行规制，使其造福于整个社会，而非仅仅服务于富人和高文化水平阶层；同时，记者应当严肃对待其作为公共信息与舆论塑造者的“沉重道德责任”。

与克尼斯一样，记者、政治家兼教授阿尔伯特·谢夫勒（Albert Schäffle）[注 51] 也是社会主义的尖锐批评者。然而，他也认同媒介景观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业压力决定的，而这些压力本质上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显而易见，现代民主社会需要一个运作良好的公共领域，而报纸是迄今为止“影响公众舆论最强有力的手段”。但与此同时，当代的报界显然腐败且堕落，受制于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最重要的是，报纸由大公司、银行和股东所有，以及通过广告追求利润的行为，只创造了一种受操纵的、人造的公共话语。（他还指出，这同时也剥削并贬低了记者本人，将他们变成了其资本家雇主手中纯粹的可丢弃的、无产阶级化的奴隶。）为了改善这些问题——且在不重新引入政府对报界的控制或限制表达自由的前提下——谢夫勒提出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方案：将报纸交由公有公司管理；建立对任何个人或组织开放的合作经营印刷厂；与负责报纸内容的作家和记者共享利润；以及将广告业务从新闻版面中分离出来。在 1910 年代和 1920 年代，他的门生卡尔·比歇尔（Karl Bücher）以及杰出的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提出了类似的分析和建议，旨在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即在资本主义媒介制度下，“报纸只有在在不阻碍出版商利润动机 [注 52] 的前提下，才会关注‘公共利益’”。

所有这些理论家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正在与两种关于大众媒介与表达自由关系的更为简单的观点作斗争。克尼斯在 1857 年解释道，一派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他们在北美尤为占据主导地位，其唯一的指导原则是个人自由和最小化政府干预。这导致他们天真地预设，“对私人利益的无拘无束的追求，会自动、必然且始终导致共同利益的实现” [注 53]。而另一极端则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痴迷于实现“所有个人的生活平等”，因此主张“国家权力必须命令一切，自由私营企业没有生存空间”。克尼斯指出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忽视了个人的表达自由，这固然正确；但在其他方面，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纠正商业市场扭曲的建议与他本人的主张不谋而合。

与马克思一样，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将出版自由视为大众煽动和工人阶级解放不可或缺的工具。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领袖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 1891 年一份极具影响力的宣言中写道：面对资本主义权力和反社会主义法律，劳动阶级的出版自由是一项绝对的必要条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论断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性阐释。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 [注 54] 如此重要，以至于任何阻碍这一斗争的人，哪怕是无意为之，“都必须像对待公认的无产阶级敌人一样予以反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也继续致力于解决如何将“思想的市场”从资本主义贪婪的扭曲中拯救出来的问题。考茨基所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注 55] 不仅创办了数十种地方性

和全国性报刊，还多次审议将部分商业大众媒体国有化或“社会化”的计划，旨在为知识交流创造一个更少腐败、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最终，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革命夺取政权后，采取了最激进的步骤来重构公共领域以及出版自由的含义。

他们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以“列宁”为笔名[注 56]）曾是一名高产的地下出版物记者，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一关键问题。世纪之交流亡期间，受考茨基及其党派宣言的启发，列宁发表了自己的小册子《怎么办？》（1902年）。书中探讨了在政治和出版自由完全缺失的情况下，如何在俄国组织起类似的社会民主主义群众工人运动。尽管一切行动都必须秘密进行，但列宁对针对专制制度的工人起义即将来临持乐观态度，并认为比起西欧，“革命报刊”更是组织起义的关键。

十多年后，当革命最终到来时，俄国的境况已发生剧变。1917年秋，在沙皇审查制度被废除后，布尔什维克报刊在首都彼得格勒（原圣彼得堡）与其政治对手展开了激烈斗争。对列宁而言，终结虚伪的资产阶级报刊的霸权、彻底重塑媒介景观，始终是一项核心政治目标。他在9月底写道，当时体制下的出版自由仅意味着“富人通过每天数百万份的发行量，有系统、不间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注 57]。

1917年10月27日，在布尔什维克发动暴力政变后的数小时内，列宁在已经关闭多家对手报纸的情况下，就此主题发布了一道耐人寻味的法令。该法令开头提到，他们针对“反革命报刊”[注 58]的行动招致了伪善的指责，仿佛“新的社会主义政权侵犯出版自由，违背了其纲领的基本原则”。但列宁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真正的出版自由从未存在过：

“这种自由主义外衣下掩盖的，实际上是占有了绝大部分报刊的有产阶级的自由，他们得以不受阻碍地毒害群众的思想、遮蔽群众的意识。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报刊是资产阶级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特别是在工农新政权刚刚确立的关键时刻，不可能将这种武器完全留在敌人手中，因为在这种时刻，它的危险性不亚于炸弹和机枪。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采取临时性的非常措施，以遏制那一股股污泥浊水和诽谤的洪流——那些黄色和绿色的报刊（指通俗报纸）极其乐于用这些东西淹没人民近期的胜利。”

因此，一切书面形式的“抗命”、“煽动”以及“对事实的诽谤性歪曲”现在都受到严格禁止。

列宁承诺，一旦新政权获得巩固，报刊“将在法律责任范围内被赋予完全的自由”[注 59]：未来的出版法将是史无前例“最广泛、最先进的”。然而，在短短几天内，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便明确表示：他们对资产阶级报纸的镇压及其工厂的接管，实际上不仅是消灭“未遂反

革命”的紧急行动，更是建立新出版体制的“必要过渡性措施，旨在确保公众舆论不再由拥有新闻纸和印刷机的资本家专制地伪造”[注 60]。这一过程不容倒退：

“恢复所谓的‘出版自由’，即把印刷机和新闻纸归还给资本家——这些人民意识的投毒者，将是对资本意志不可接受的投降，是交出工农革命最重要的据点之一。”

他们关于真正出版自由的替代性愿景很快便付诸实践。同年 11 月 4 日，他们决定没收所有私人印刷机和纸张储备，并将其转为公共用途：“以便各政党和团体能够根据其真实的思想力量，即与其支持者人数成比例地使用印刷技术手段”。他们试图以此创造一个公平、平等的环境，来取代受资本操纵的思想市场[注 61]。

三天后[注 62]，本着同样的精神，他们通过将所有广告的生产和销售收归国有，打击了资本主义权力和媒体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翌年初，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革命新闻法庭”[注 63]宣告成立，旨在惩治“通过利用报刊犯下的反对人民的罪行和不当行为”，例如发布“关于公共事务的虚假或歪曲信息”。与此同时，为了维持众多面临失业风险的印刷工人的生计并教育群众，他们成立了国家出版社，其职责是大量生产教科书、免费的“经典著作普及本”[注 64]以及“根据现行法令已成为人民财产的伟大文学作品”。1918 年 7 月，新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将这种对言论自由的新颖定义载入了基本法：

“为了确保劳动群众拥有表达自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废除出版业对资本的一切依赖，并将报纸、小册子、书籍等一切出版技术和物质手段移交给劳动人民和最贫苦的农民，并保证其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注 65]

这种对思想市场的激进重构引发了巨大的反对声浪，不仅来自直接的目标对象，还来自最初与布尔什维克共同分享权力的其他革命团体（如孟什维克、左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包括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一批重要领导层，其中包括新上任的新闻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德尔比舍夫

（Nikolai Ivanovich Derbyshev）。在 1917 年 11 月至 12 月间，随着国家陷入内战，这些异见声音[注 66]谴责了关于出版和广告的法令，试图将其废除，呼吁恢复出版自由，并最终辞职以示抗议。

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德高望重的社会主义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的呼应。高尔基长期支持布尔什维克，他的报纸《新生活报》曾是少数获准继续流通的报纸之一，直到 1918 年夏天也遭到了镇压。此前，他曾批判资本主义报纸无非是“一群毒蛇，用恶毒的嘶鸣毒害和恐吓普通公民，

教导他所谓的‘言论自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歪曲事实的自由、诽谤的自由”[注 67]。但在布尔什维克政变后，高尔基一再抨击托洛茨基和列宁对言论自由采取了专横、粗暴且“可耻的态度”[注 68]，称这将“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伤害”。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本人也在 1918 年警告称，布尔什维克对出版自由的重新定义并非社会主义举措，而仅仅是一小撮无法通过民主手段赢得权力的极端分子进行的独裁式权力篡夺[注 69]。

这确实是一场夺权，但同时也是一种原则性的尝试，旨在解决社会主义者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应对的核心问题：媒介所有制、利润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正因如此，早在 1917 年 11 月 4 日，即政变发生仅两周后，当布尔什维克的出版政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遭到激烈抨击时，多位发言人仍对其表示坚定的支持。瓦尔拉姆·阿瓦涅索夫（Varlam Avanesov）解释道，我们当然“捍卫出版自由”[注 70]：

“但这一概念必须与旧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脱钩。如果新政府有力量废除土地私有制，从而侵犯地主的权利，那么苏维埃政权再去维护那些陈旧的出版自由观念就太荒谬了。首先，必须使报纸从资本主义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像我们将土地从地主手中解放出来一样；然后，我们才能颁布新的社会主义法律和规范，确立一种为全体劳动人民而非仅仅为资本服务的自由。”

托洛茨基也赞同道，“回到资本主义的办事方式”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应该允许那些有钱人充斥媒体、散布谎言，而全然不顾他们是否拥有民众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两种观点：“要么给资产阶级出版物以自由，要么没收纸张和印刷机并将其转交给工人和农民”。列宁充满信心地总结道：

“我们正全速向社会主义迈进，因此‘我们当然正在引入新事物’。”从今以后，出版自由将不再简单地意味着“收买大量新闻纸和雇佣大批文人

（scribblers）的自由”。我们必须“防止唯独资本家享有出版自由，并用他们廉价的报纸淹没农村。我们必须摆脱‘依赖资本的报刊可以是自由的’这种观念。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

极权主义的真理

读者，你已知晓这段历史的结局。它并非如列宁所承诺的那样，带来了史上“最广泛、最进步”的言论自由，而是演变为共产党及其同类政权——苏联、其东欧附庸国、全球众多的后殖民社会主义实验，以及当今尤以中国大陆为代表——的深层不自由与极权专制。中国大陆拥有世所罕见的、最为

复杂的审查体制。在这些地方，持不同政见的政治言论被视为严重的犯罪；甚至在公共场合举起一张白纸都可能导致被捕入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5 条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71]享有言论、出版自由”。但随后的条款明确了这些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公民负有首要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尊重社会公德”并维护“祖国的荣誉和利益”。最重要的是，如第 51 条所详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由共产党决定个人可以或不可以表达何种观点。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国家拥有或控制着所有出版机构，编辑们会仔细筛查产出的每一项内容。互联网用户在很大程度上与非中国网站隔绝，而他们自己的流量受到严密监控和审查[72]——这既通过自动化手段（屏蔽数以千计的敏感词汇和短语，例如“1989 年天安门广场”），也通过数百万计的隐形人工审查大军来完成，他们时刻监控并删除网络言论。正如纸媒和网络编辑进行的预先审查一样，这些事后清理人员听命于受党中央宣传部最终领导的全国性审查机构网络。

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马克思主义者起初精准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媒体系统的明显缺陷：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出版自由意味着创造一个摆脱金钱腐蚀作用的思想市场。然而，在推翻了资本主义并彻底重构了出版经济学之后，他们最终却在为愈发严酷的审查制度辩护——其主要理由是，即便在社会主义专政下，资产阶级学说仍会卷土重来，腐蚀并误导人民。1921 年，当另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敦促列宁重新建立出版自由时，列宁回答说这一概念本质上是“反无产阶级”的[73]。他解释道：“‘出版自由’的口号在中世纪末期成为伟大的世界性口号，并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这种含义在俄国之外依然存在：“在全世界，只要有资本家的地方，出版自由就意味着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收买报纸、收买作家、贿赂、购买并伪造‘公众舆论’的自由。”因此，如果俄国重新确立这一自由，“出版自由将成为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它没有死，它还活着。它就在附近潜伏并注视着”，等待着扑向并摧毁革命。“我们不想自杀，因此，我们不会这样做。”

一个世纪后，这种对大众判断力的偏执猜忌继续驱动着中国共产党的媒体政策——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在放松审查后崩溃的惨痛教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猜忌。2013 年 4 月，在最近一轮针对表达自由的镇压之初，一份名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秘密文件从党中央下发至全国各地官员，旨在打击“西方反华势力和境内‘异见分子’……正积极尝试渗透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并挑战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注 74]。该文件警示的首要意识形态危险之一便是西方的出版自由观。文件强调，必须拒绝这一观念并坚

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出版自由”，否则进一步的颠覆性思想将会潜入：

“宣扬西方媒体观的终极目标，是兜售抽象的、绝对的出版自由原则，反对党对媒体的领导，并以此作为渗透我们意识形态的突破口……面对这些威胁，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或放松警惕。”

身处此类社会的公民是如何构想言论自由的？在苏联成立的最初几十年里，即便是异见者通常也是从阶级角度出发的。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Kronstadt uprising）反抗水兵的主要诉求之一是“给予工人和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政党以言论和出版自由”[注 75]——这种自由被设想为一种集体权利，而非个人权利。大约在同一时期，首位被永久开除出党的著名布尔什维克加夫里尔·米亚斯尼科夫（Gavril Myasnikov）[注 76]也以特定社会群体的名义主张表达自由（最初他提议涵盖“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后来则主张仅给予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1936年，斯大林的新宪法在维持保障人民获得印刷机、纸张和其他材料的基础上，增加了所有公民拥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但前提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并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制度”[注 77]。少数勇敢的俄国人利用这一承诺批评政府，但更多的人写信抱怨该条款带有“资产阶级”的普遍性个人权利观念，而非阶级权利——一种广受欢迎的建议是，只有农民和工人阶级才配享有言论自由。

到了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这种社团主义（corporate）的理解已不再占据绝对主导，但苏联传统的权利观仍倾向于将其视为由国家赋予并提供物质保障的能力，而非个人固有之物。人权不能被构想为“天赋的”[注 78]或独立于国家之外：它们嵌入在社会制度中[注 79]，并与对集体的义务并行不悖。其双重目的是“个性的和谐发展以及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因此，这一时期即便反对审查制度、主张更大表达自由的共产主义异见者，通常也使用与西方权利观念截然不同的措辞。当异见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在 1968 年考察苏联思想自由面临的三大威胁时，他将国家对艺术和政治表达的镇压，与“大众文化的刻意麻醉”[注 80]以及“懦弱、利己和庸俗意识形态”的影响并列。他的核心建议是将“不负责任且非理性的审查制度”（即当时条款从未公开或以法律形式固定的制度）替换为一套全新的“新闻与信息专项法”。该法律将“清晰且令人信服地定义什么可以印刷、什么不可以，并将责任落实到接受公众监督的胜任者身上”；促进社会进步；并“为思想自由提供物质资源”。萨哈罗夫等人还利用地下出版物来挑战苏联民权的传统逻辑。他们不再要求国家为自由表达提供物质资源，而是将生产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利用打字机和复

写纸制作并秘密散布“萨米亚特”（*samizdat*，即地下出版物）文本。在主张言论自由是一项个人权利的同时，他们也将其践行为一种集体的社会实践——但这一实践发生在一个脱离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域之中。

更为普遍的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严肃作家们无论对审查制度的限制感到多么恼火，往往都共同致力于将文学视为一种道德与民族力量——同时对西方的出版自由观念深表不屑。1984年，才华横溢的东德异见小说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曾对记者表示：“东德的文学具有特殊的功能，远超西方国家。”[注 81] 她认为，“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不存在意识形态审查或市场审查的。”写作在任何地方无疑都是一种系统性约束下的产物：“出版自由”不过是压迫西方作家的“经济审查”的一种委婉说法。东欧剧变后，作家约翰·埃彭贝克（John Erpenbeck）指出，他在东德体制下经历过各种形式的国家镇压，但西方体制更糟：“没有任何形式的审查制度，能像残酷的市场审查那样，对人格和文学整体产生如此毁灭性、破坏性的影响。”[注 82] 他的许多同胞亦有同感：市场审查不仅摧毁了文学品质，而且更“强大”、更具侵入性（其特征是极度的干涉与无能）、“远为贬低人格”，且极具对“人类尊严”的破坏性。

20 世纪和 21 世纪极权主义审查体制的理论与实践，一方面与前现代世界对言论和出版的管控之间存在明显的平行关系。两者都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表达；两者都具有威权色彩但又根植于大众态度；两者都与我们现代西方的自由表达模式格格不入。然而，两者也都对我们关于言论自由的预设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真理该怎么办？如何保护并推进真理？极权主义的答案显而易见令人反感——即由党决定什么是真理，向人民宣传这一口径并压制挑战。但这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日益碎片化的西方媒体市场中，其激励机制压倒性地导向利润、短期注意力及党派利益。我们当中有谁真的相信鲁珀特·默多克、埃隆·马斯克、马克·扎克伯格，或者拥有你家乡报纸的对冲基金，对真理追求的重视程度会超过他们自身的财务和政治利益？然而，正是这些人，最终对我们西方的媒体景观和信息摄入行使着最大的影响力。

记者和媒体应作为中立真理讲述者的观点，作为一种修辞主张由来已久，但在实践中，这却是一个更为晚近且脆弱的产物。直到 20 世纪，世界各地的报纸和广播机构才开始将其对公众的责任形式化，并使新闻培训、事实核查、编辑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其他旨在加强真实、客观报道的规约制度化。即便在那时，这种抱负与媒体对广告商的依赖、所有者及雇员的社会政治偏见以及竞争压力之间也始终存在张力。如今，即便其惯例尚存，那种前互联网时代关于中立、客观权威的理想鼎盛期也已然逝去。

数字革命以及随后谷歌、脸书等企业巨头的崛起，通过分流广告商并迫使新闻出版业或多或少地免费提供产品，摧毁了维系那个时代的商业模式。更糟糕的是，通过将所有新闻视为可互换的“信息”（而不论其来源），并助长大量廉价材料与“传统”机构争夺注意力和权威，它摧毁了后者作为时事权威解释者和真理专业裁断者的地位。在一个新闻及其解释权已被民主化为网络“大乱斗”的世界里，在一个主要的守门人都不屑于监管谎言和虚假信息的世界里，如何辨别并达成事实共识，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

与以往时代一样，当今的一些新闻业仍在产出追求真理、高质量的世界信息。并非所有主流新闻媒体都主要为了利润而运行。大多数国家都有公共财政资助的广播电视机构，正如大多数国家也拥有监管大众媒体私有权的法律，哪怕只是为了防止垄断。一些重要的媒体组织，如《卫报》，归非营利信托基金所有，其宗旨是维护其编辑独立，免受商业或政治干预。《金融时报》现在掌握在一家日本公司手中，而该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员工合作社。即便是在权贵私人拥有媒体渠道的情况下，其动机也并不总是纯粹追求金钱利益或政治影响力。一些个人和家族也将他们对地方或全国性新闻频道的管护，至少在在一定程度上视为一种公共服务。例如，目前《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亿万富翁所有者，确实会以一种往好里说是尴尬、往坏里说是唯利是图的方式干预报纸的报道。但他们最初对这些报刊的收购，以及持续愿意承受巨额亏损来支持它们的意愿，也反映了对这些机构之于公众价值的认可。

然而，这一切仅涵盖了市场中一个昂贵、小众且不断萎缩的角落；更多被冠以印刷、广播及网络“新闻”之名的内容，实则是低价值的垃圾和彻头彻尾的虚假信息。“媒体才是真正的手，”[注 83] 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 2016 年大选后透露，“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用‘狗屎’淹没整个空间（flood the zone with shit）。”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制胜策略，并且在此前及此后都引发了大量的效仿。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那些对所有参与者均等适用、全盘肯定“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宣告，究竟该如何保护真理——更遑论推进真理？抑或，它们在现实中反而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当下的西方言论自由理论将核心聚焦于个人权利，却相对忽视了公共利益以及媒介景观的现实，这使得它们在应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

即便是在美国，情况也并非始终如一。现代第一修正案教义的历史常被讲述为一个具有英雄色彩的、典型的“美式进步”故事。据此说法，从1919年起，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开始审视言论自由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辩论并提炼思想，逐步演进出对第一修正案真义愈发完善的定义——即核心在于保障个人表达权，而无论其观点内容为何。

然而，这种排斥集体权利、言论内容考量及公共利益预设的现代解释，实际上是相当晚近的发展产物。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法理学和公众舆论曾朝着相反的方向演进，关注特定言论的危害、群体权利以及媒体格局的不平等。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这些议题上的态度仍与西方其他文化大体相当（包括我们此前所见的对仇恨言论的禁止）；此后，两者的轨迹才发生了强烈的分歧。这种奇特轨迹的核心原因之一——确切地说，是最高法院在1910年代后期开始重新思考第一修正案的主因——正是美国及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他左翼团体的言论自由思想与激进运动。换言之，第一修正案的现代史是一个国际性的故事，而非仅仅是美国的叙事。其最初的创新并非由法官凭空创造，更多是由左翼律师和活动家迫使法官做出的回应。若没有布尔什维克革命石破天惊的影响，美国言论自由教义的形态很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1917年4月，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包括沙皇俄国。六个月后，随着革命爆发，俄国内战开启。当布尔什维克单方面与德国媾和时，美国及其他协约国入侵苏俄，以支持反共力量。这些接踵而至的发展令许多美国人深感不安。1917年8月，美国社会党（American Socialist Party）费城委员会向数千名新征召入伍的士兵寄发了一份传单，敦促那些“在良知上反对战争”的人拒绝服役[注84]。该传单的论据援引了宪法措辞及第一修正案关于宗教表达自由的条款，但其修辞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传单质问道：“你们是否任由狡诈的政客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报刊错误且虚假地塑造你们的思想？”“你们是否被腐败的资本主义报纸所误导？”几天之内，该党直言不讳的地方秘书、女权主义者且刚参加过国会竞选的伊丽莎白·贝尔（Elizabeth Baer）博士被捕受审，同时被捕的还有她的四名高级党内同僚；她与负责寄发传单的查尔斯·申克（Charles Schenck）被裁定有罪，并被判处数月监禁。一年后，纽约的一群年轻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犹太裔移民无政府主义者（其中包括莫莉·施泰默和杰克·艾布拉姆斯）因印发谴责入侵俄国的传单，被判处15至20年监禁。

在1917至1918年间，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因发表类似观点而遭到逮捕和严惩，其中包括社会党极具魅力的领袖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他被判处十年监禁。（与数百名同仁一样，德布斯在1920年总统大选期间仍

在狱中服刑，但即便如此，他仍获得了近一百万张选票，与其 1912 年竞选时的得票数相当。）这些被告均是依据 1917 年春通过的《间谍法》及其 1918 年的修正案被定罪的，前者禁止发布“虚假报告”[注 85]及阻碍征兵，后者则更广泛地将针对美国政府形式或战争目标的“任何不忠、亵渎、粗俗或辱骂性言论”定为犯罪。其中少数被告成功将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当这些案件在 1918 年底至 1919 年间审理时，欧洲战事虽已结束，但针对外裔社会主义者及其他激进移民所构成的威胁，大规模的集体恐慌（即第一次“红色恐慌”）才刚刚拉开序幕。这些上诉案件包括贝尔案、申克案、莫莉·施泰默及其同僚案、德布斯案、密苏里州的雅各布·弗罗韦克案（他因在当地德语报纸上批评战争而受审），以及南达科他州的一群德裔美国社会主义农民案——他们因私下向州长请愿反对征兵及其他战时措施，并威胁要反对其连任而获罪。

所有被告都辩称其言论受第一修正案保护。对于美国社会主义者而言，这绝非新颖之举。相反，言论与出版自由对劳工运动至关重要，这一命题对他们而言，正如对欧洲同仁一样，是核心政治主张。他们还从美国活动家、律师和公职人员援引第一修正案保护争议性言论的民间传统中汲取灵感[注 86]。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注意到的，这一宪法论证最早由 19 世纪的废奴主义者和黑人民权运动者开创。在 19 世纪下半叶，这一论点也被各种自由意志主义激进派所采纳，包括妇女权利、自由恋爱、节育、宗教自由思想及其他话题的倡导者——这些话题的公开讨论常被视为“猥亵”，并根据 1873 年联邦《康斯托克法》等法律遭到压制。1878 年成立的“国家辩护协会”便是致力于支持此类法律与智识主张的组织之一。另一个活跃且人脉广泛的团体是“言论自由联盟”（1902 - 1919），其关注范围延伸至保护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以及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这些领土自 1898 年起被美国强行占领）的反殖民言论。该联盟秘书西奥多·施罗德（Theodore Schroeder）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为各种观点的“宪法言论自由”辩护。除了下级法院的无数案例外，该联盟还在 1904 年和 1912 年依据第一修正案资助了向最高法院的上诉。其领导人之一、纽约律师吉尔伯特·罗（Gilbert Roe）与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交情深厚，并在 1916 年协助其确立为最高法院首位犹太裔大法官。

劳工组织者是这场民间言论自由运动的先锋。从 1906 年起，在言论自由联盟的支持下，新成立的激进社会主义工会——“世界产业工人”（IWW）在全美范围内进行了数百场广受关注的法律与肢体抗争，旨在捍卫支持罢工及传播反资本主义观点的权利。这些被 IWW 称为“言论自由之战”[注 87]的行动带有明显的宣传目的，并一直持续到战争年代，且蓄意援引第一修正案。

虽然该工会的部分成员对宪法抱有与对资本主义报刊同样的蔑视——视其为统治阶级的纯粹工具，认为它对现代工人的保护并不比最初对“黑奴”的保护更多（奴隶制曾受宪法确认和维护）；但许多其他成员则持相反观点，声称第一修正案的本义保障了他们的权利，尽管雇主阶级及其法官正试图掩盖这一点。在街头、法庭、报纸及其他出版物上，他们坚称“维护宪法法律的是我们”，而无视宪法的则是他们的对手。作为 IWW 创始人之一的德布斯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注 88]，不断援引其所谓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发言权。

后来被主流律师和法官采纳的关于“言论自由宪法权利”的核心论点，最初正是由美国劳工运动成员及其他主要由左翼活动家组成的群体在法庭上提出的。这些思想本身并非首创，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得以在法律系统的最高层级中普及开来。1903 年，著名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代表“言论自由联盟”和一名无政府主义被告向最高法院慷慨陈词，主张第一修正案是“绝对且完整的”[注 89]：“自由意见的根本基础要求自由表达信念，以使真理大白于天下。一切进步均取决于此种自由。”1919 年 1 月，德布斯的律师告知最高法院，第一修正案是“本案的命题核心”[注 90]——“许多国家响应尤金·V·德布斯理想主义的成千上万民众，将直白地把‘德布斯案’称为一场‘言论自由之战’。”

此时，尽管政府官员和法官大体上维持着“第一修正案不能使现行法律无效”的立场，但相反的论点已拥有悠久的历史，并在公共和法律话语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12 年，在“世界产业工人”（IWW）和“言论自由联盟”于圣地亚哥发起一场艰苦且暴力的言论自由抗争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要求一名当地商人就该工会关于“宪法权利被剥夺”[注 91]的主张进行公开调查。调查报告谴责了 IWW “邪恶且鲁莽”的目标与手段，并断定他们大规模藐视当地禁止公共演讲的法令理应受到“法律框架内最严厉的惩罚”。但报告也将最严厉的谴责留给了警察和私刑者，因为他们侵犯了活动家“神圣不可侵犯”且“宪制性的言论自由权”。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法官们也频繁处理涉及第一修正案的主张，且并非总是持排斥态度。此外，他们还涉及了一个相关论点（最高法院最终于 1925 年采纳）：第一修正案的效力范围应延伸至州和地方层面，而非仅限于联邦法律。其依据是内战后 1868 年通过的《第十四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地方政府剥夺国民权利（即“任何州均不得制定或实施剥夺合众国公民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这些议题曾在 1877 年、1882 年、1892 年、1904 年、1907 年、1913 年、1915 年被明确提交至最高法院[注 92]，并在其他时间被隐晦提及。

1907 年，最高法院以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为首的多数派仍固守传统立场——维持了对科罗拉多州民主党政治

家兼报人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terson）的定罪。帕特森曾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该州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并主张以事实真相作为辩护。霍姆斯裁定这完全属于州事务，第一修正案并不适用。他进一步解释道，即便适用，根据可追溯至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的既定英美法律，“出版自由”[注 93]并不涵盖对其滥用的权利。第一修正案仅旨在禁止“对出版物的预先审查”，而非禁止对“被视为有损公众福利”的言论进行事后惩罚——且这种惩罚“既可针对虚假言论，亦可针对真实言论”。然而此时，他的两位同事已开始质疑这种传统观念。任职时间最长的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John Marshall Harlan）发表了一份响亮的异议意见书，认为第一修正案高于所有关于公共利益的州法律和判决：

“公共福利不能凌驾于宪法特权之上。如果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在其本质上属于国民公民权的属性（我认为确是如此），那么自《第十四修正案》通过以来，无论是国会还是任何州，都不能通过立法行为或司法行动对其进行损害或剥夺。依我之见，下级法院的行为侵犯了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

哈伦于 1911 年去世。不到十年后，在“红色恐慌”的余波中，面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言论自由运动以及全国范围内关于《间谍法》的激烈争议，最高法院被迫再次审视这些酝酿已久、针锋相对的观点。法院并未实质性地改变主意。所有基于第一修正案理由的上诉均被驳回。在贝尔案与申克案的合议庭判决中，霍姆斯代表全体大法官承认，他在帕特森案中的裁定过于严苛。他现在认为，第一修正案不仅禁止“预先审查”[注 94]，也排除了一些事后追责。然而，其精确界限始终取决于语境：言论是一种行为，“每种行为的性质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对言论自由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保护一个人在剧院中虚报火警并引起恐慌。”因此，关键在于：特定语境下的特定措辞是否“造成了紧迫且现实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从而将引发国会有权防止的实质性危害”？这一判断始终关乎“邻近性与程度”。在本案中，霍姆斯认为“在和平时期”，被告出版此类内容本属于其“宪法权利”范畴；但在《间谍法》所指的战争特殊环境下则不然。伊丽莎白·贝尔与查尔斯·申克依法被监禁[注 95]。雅各布·佛罗韦克与尤金·德布斯均获刑十年。莫莉·施泰默获刑十五年，杰克·艾布拉姆斯及其两名同僚各获刑二十年；几年后，政府将此四人驱逐出境至苏俄。

在第一修正案的传统“英雄传记”中，1919 年被视为那个伟大的创世时刻。教科书、大众通史以及严肃的法学学者一致认为，这一年开启了“言论自由世纪”[注 96]：这些裁决是“最高法院首次对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出版与言论自由进行的司法解释。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是一种颇具疑点

的过度简化。但是，即便我们像第一修正案律师通常所做的那样，将视野局限于最高法院本身的判决，并试图从中构建出当代美国言论自由意识形态的智识谱系，将1919年作为起点依然值得商榷——尽管其中涉及的人物确实构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叙事。

在一战结束时在任的大法官中，思想上最具冒险精神的是年逾古稀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他是一位如饥似渴的读者，总是热衷于紧跟政治、经济、文学以及法律领域的最新思想。作为19世纪60年代哈佛法学院的年轻毕业生，他曾在伦敦结识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并研读过其著作[注97]。如今，在他近八十岁高龄时，面对接踵而至的《间谍法》案件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被告提出的言论自由抗辩，他重新阅读了《论自由》（*On Liberty*）。同时，他还阅读了当时哈佛大学一位早慧的年轻英国社会主义法律学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向他推荐的近著《英国自由的衰落》，以及拉斯基自己的著作《现代国家中的权威》（1919）——该书与密尔一样，主张绝对的思想自由是“进步的唯一保障”[注98]。从1918年起，通过与拉斯基、哈佛法学院同事扎卡里亚·查菲（Zechariah Chafee）和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纽约天才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以及他那位进步派的新同僚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大法官等人的交流与通信，霍姆斯逐渐从他早期的观点演变出[注99]一种对第一修正案效力范围的新构想。

他最初在1918年阐述了这一构想，当时最高法院的其他成员似乎倾向于维持对向州长请愿的南达科他州社会主义农民的定罪。最终该案并未发布判决，因为在最后时刻，政府因技术细节问题撤回了起诉。这似乎是因为霍姆斯起草了一份异议意见书（且布兰代斯提议加入），主张第一修正案应当保护“那些尽管与我们立场相左、却无法想象会产生危害的观点与言论”[注100]。基于类似的理由，虽然霍姆斯本人撰写了维持贝尔、申克、佛罗韦克和德布斯定罪的全体一致判决书（布兰代斯在另一宗针对社会主义反战演说者的案件中也持同样立场[注101]），但几个月后，两人对施泰默、阿布拉姆斯及其同僚所受的严厉惩罚表示了异议。他们主张，“唯有存在立即发生之邪恶的现实危险，或存在促成该邪恶的意图”[注102]，才足以构成限制言论的正当理由，且“没人会认为，一个无名之辈偷偷摸摸印发的一份愚蠢传单，除了传单本身之外，会对战争进程构成任何立即的危险”。相反，宪法似乎支持“思想的自由贸易——即真理的最佳检验标准，是在市场的竞争中思想获得自身认可的能力；而真理是唯一的基础”，人们唯有基于此基础方能安全前行。

在霍姆斯于 1932 年退休之前，两人还共同撰写了其他几篇著名的言论自由意见书。1925 年，最高法院维持了对纽约共产主义记者本杰明·吉特洛（Benjamin Gitlow）的定罪，他因发表一份革命性的、反资本主义的宣言于 1919 年被捕并被关押在辛辛监狱——尽管法院注意到，“没有证据表明该宣言的出版与流传产生了任何后果”[注 103]。虽然该判决的多数派最终接受了长期以来进步派的主张，即基于《第十四修正案》，第一修正案不仅适用于联邦法律和行为，也适用于州和地方层面，但法院仍坚持传统观点，即言论自由不延伸至“危害公众福利的言论”，例如“煽动”革命。因此，吉特洛被送回监狱。霍姆斯在异议意见中回应道：“每一种思想都是一种煽动”；在本案中，既然涉及的是极少数人的可怜观点，就不存在“现实危险”，因而没有理由镇压。两年后，布兰代斯在另一宗针对共产主义组织者的案件中写道，“由言论引发的任何危险都不能被视为紧迫且现实的”[注 104]：

“除非所预见的邪恶极度迫近，以至于在充分讨论的机会出现之前就可能降临。如果尚有时间通过讨论来揭露谎言和谬误，通过教育过程来规避邪恶，那么应当运用的补救手段是更多的言论（more speech），而非强制性的沉默。”

人们很容易被这些华丽的格言所吸引。然而，就美国言论自由法理学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重要的进展仅在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者的激进鼓动和论辩所带来的压力，连同广泛自由派对迫害反战言论的抵触情绪，最终迫使最高法院不得不面对并部分接受一种更具平民主义（populist）色彩的第一修正案效力观。相比之下，霍姆斯和布兰代斯新创立的“现实危险”教义其实算不上什么分水岭。其主要的智识贡献仅仅是将那些流行的假设引入了最高法院的法理体系中。他们以极具引用价值的形式，呼应了弥尔顿、加图、密尔及早期理论家们的反复吟咏，重申了“自由且充分的讨论终将导向真理”的预设，并引入了相关的“思想市场”[注 105]比喻。（这一短语对霍姆斯最初关于“市场的竞争”的表述进行了精炼改进，似乎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但作为一套实质性的言论自由教义，它在当时并不算成功：直到 50 年代后期，它才短暂地成为权威观点。在霍姆斯和布兰代斯有生之年，这一教义主要体现在异议意见中，并未动摇法院的多数派；当时的多数派法官与英欧法官一样，仍倾向于以更具布莱克斯通（Blackstonian）色彩的术语——即“自由对抗放纵”——来构想出版与言论自由。

此外，这一教义也并未支撑起最高法院多数派自 60 年代起开始采纳并延续至今的、更具自由意志主义色彩且“内容中立”的言论自由教义。这是

因为两者的基本原则截然不同。尽管霍姆斯和布兰代斯的模式抨击了布莱克斯通式禁止具有“不良倾向”言论的做法，认为其过于模糊，但他们自己的理论本质上只是该做法的一个更尖锐的版本——即一种在自由与放纵之间寻求平衡的行为，只不过划线的位置不同。他们不再寻找遥远的倾向，而是寻找即刻的、可识别的危险——并乐观地假定，除此之外的所有反社会及误导性言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被“市场”确立真理的特性所击败。保持不变的预设是：言论是一种行为，能够造成严重伤害；且言论的致害性应根据其内容和语境进行判断。正因如此，他们维持了许多针对显然具有危险性的反资本主义言论的定罪，但反对那些对本质上无害的等效言论（如“一份愚蠢的传单”、一个赤诚的和平主义者、一个微小且无权的政治团体）的惩处。霍姆斯在 1925 年致拉斯基的信中颇具启发地写道，他在吉特洛案中的异议仅仅是维护了“一个蠢材垂涎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利”[注 106]。对他及其同事而言，伤害仍是衡量言论的中心准则。

集体权利的得失

霍姆斯与布兰代斯那英雄史诗般的修辞，以及学术界对其惯常的聚焦，掩盖了 20 世纪早中期美国言论自由辩论中其他至关重要的维度。由于此二人仅仅是沿袭了传统的英语国家出版自由模式——即将其视为免于政府约束的自由——其判决便预设了真理会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中自动浮现，且言论自由是一项个人权利。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当时许多美国人（无论是学者、政治家还是普通公民）对资本主义媒体格局本身显著的不平等，以及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关系的深切担忧。

这涉及到两个相互交织的故事[注 107]。第一个故事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红色恐慌”之后，美国社会主义者传统的言论自由理想如何逐渐被一种激进色彩淡得多的观念所取代——即仅将表达自由视为一种私人且个人的权利。此前，这些理想正如其欧洲同仁一样，始终将出版与言论自由视为集体性煽动（collective agitation）的工具，即罢工、纠察、抵制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卡尔·考茨基在 1891 年的宣言中曾强调，出版自由对于集体的反资本主义行动至关重要：它用于组织劳工、与工人阶级沟通，并辅助罢工和抵制活动。这正是“世界产业工人”（IWW）在战前言论斗争中所追求的策略。那是一场旨在赢得政治权力，而非仅仅影响最高法院态度的战斗。事实上，美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司法机构反劳工、反民主的偏见深感怀疑，且这种怀疑不无道理。从 1890 年代后期开始，最高法院经常以侵犯所谓宪

法规定的“私有合同权”为由，废除国家和地方对银行、保险公司及其他行业的监管，并废除民主通过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安全工作条件及限制童工的法律。地方法院同样普遍站在反劳工势力一边。因此，社会主义者援引第一修正案主要是一种附带性的论辩和司法策略——其更大的目标始终是赢得选票、改变法律，并摄取国家权力来推行遏制资本主义剥削、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事实上，大多数左翼分子从不认为个人权利应该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正如一位杰出的进步派法学家解释的那样，现行经济和法律体系的问题恰恰在于“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夸大私有权利”[注 108]：实际上，“个人在自由信念和观点上的利益，必须始终与社会利益相平衡”[注 109]。

这种集体主义视角与“言论自由联盟”及其 19 世纪废奴主义、自由思想和无政府主义先辈们更具个人主义色彩的原则之间，始终存在张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种张力达到了顶点，迫使该联盟最著名的继任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目标和战术上发生了显著转向。

ACLU 成立于 1920 年，最初本质上是劳工运动的一个宣传分支，正如其创始人之一、律师沃尔特·内莱斯（Walter Nelles）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所言，其宗旨是“在产业斗争中为表达自由事业服务”[注 110]。他解释道：“我们坦率地说是劳工的党徒”——但为了赢得公众对罢工和产业行动的支持，吸引“不属于劳工运动的自由派”以及“坚持表达自由一般原则的人”也至关重要。面对 1920 年代政府和法院持续的反工会行动（包括最高法院对罢工和抵制的一系列进一步限制），ACLU 早期的言论自由文献将美国描述为一个“阶级政府——一个由商界掌握并为商界服务的政府”[注 111]，其帮凶是“反动的……联邦和州最高法院”以及“被宣传麻痹、被必然屈从于财产利益的媒体所蒙蔽”的美国民众。耐人寻味的是，ACLU 当时在法律性的言论自由“权利”一词上加了引号，并强调这对于实现劳工的天赋权利和“向新社会秩序进军”而言，仅具次要地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通过主张“表达一切观点，无论其多么激进”[注 112]来吸引更广泛选民支持的策略，演变成了一个难题。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其全国领导层已不再认为宣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注 113]是明智之举。1921 年，该组织曾将三 K 党（Ku Klux Klan）[注 114]列为其最为暴力且危险的反劳工死敌之一。然而，仅仅几年后，它便开始支持三 K 党在公共场合组织和游行的法律行动。到 1933 年，ACLU 已转向为反犹主义者[注 115]的广播权以及美国纳粹分子举行公开集会的权利辩护。次年，该组织发布了一本名为《我们应为美国纳粹分子的言论自由辩护吗？》的小册子，对此提出了响亮的肯定回答：“难道不清楚

吗？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实践战术，而不仅仅作为一种抽象原则，要求捍卫所有受攻击者的权利，以获取任何一人的权利。”[注 116]

曾担任世界产业工人（IWW）组织者的 ACLU 长期负责人罗杰·鲍德温（Roger Baldwin）曾向《今日苏俄》的读者保证，这些只是暂时的战术联盟：“如果我时而协助反动派获得言论自由，如果我走出阶级斗争去反对审查制度，那仅仅是因为这些自由有助于为工人阶级的自由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氛围。”[注 117] 但在现实中，这已不再属实。该联盟的主要宗旨正演变为一种截然不同且更为直接的事物：即对所有言论的司法保护。一名成员在来信中赞赏地写道：“捍卫纳粹分子的权利，是对那些指责 ACLU 纯粹是‘红色分子’的人最好的回击。”[注 118]——观点中立（Viewpoint neutrality）日益成为该组织的指导准则，而诉讼则是其主要武器。尽管该联盟强调其对纳粹、反犹主义者、三 K 党成员等观点的厌恶，但它从未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积极捍卫此类言说者的权利时，它不可避免地在常态化并放大这些信息——为其注入公众关注的养分，并赋予其比原本更强的合法性光环。时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ACLU 的理论坚称“言说权”与“言论内容”之间存在界限。然而，其行动却向世人宣告：即便最仇恨、最虚假或毒性最强的观点也值得公共传播，这些思想是理应被听见的。

ACLU 在原则上的转变[注 119]部分反映了其在法律诉讼中日益取得的成功，这促使其领导层修正了最初对法院不屑一顾的态度。但这也源于政治环境的变迁。1932 年一项重大联邦劳工法的通过，以及数月后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当选，开启了这位雄心勃勃的进步派总统与保守派最高法院之间就其社会经济政策展开的长期斗争。1937 年，当罗斯福威胁要通过增加大法官人数来阻止法院阻挠其“新政”立法时，劳工领袖和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支持他。但在法院最终做出让步、放弃其“契约自由”教义并发布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亲劳工言论裁决（允许纠察和其他形式的劳工煽动）之后，ACLU 却日益与保守派和亲商团体结盟。因为在这些新的法律环境下，反而是雇主和财阀们开始精明地向“言论自由”集结，并拥护最高法院的独立权力，以维护自身利益。1939 年，一个商业游说团体自豪地指出，通过巧妙的公共关系，他们已成功地“在公众意识中将自由企业与言论自由挂钩”。随着公司法人日益主张其同样拥有第一修正案权利，且这些权利正受到政府监管和亲工会规则的侵犯，ACLU 坚定地站在了资本的一方。

这种非同寻常的阵线重组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内部引发了巨大争议，并激怒了许多劳工组织者。鲍德温（Baldwin）及 ACLU 领导层似乎仅将其视为一种必要的妥协：扩大全社会的言论自由领域，必然也会使工会受益。1940 年左右，当最高法院发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裁定大规

模纠察受第一修正案保护时，这一策略看起来确实可行。但从长远来看，它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尽管 ACLU 从未偏离其新确立的“内容中立”立场，且直到今天仍继续支持企业界基于第一修正案提出的反监管、反工会诉求，但最高法院在 1940 年后迅速放弃了对罢工、纠察和组建工会权利的保护。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ACLU 创立之初旨在捍卫的这些劳工鼓动形式，已不再与第一修正案挂钩；而各州政府和雇主在法院的支持下，日益加强了对这些活动的限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失衡变得愈发触目惊心。如今，美国法律再次严厉限制工人纠察、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能力；与此同时，最高法院近期近半数的言论自由判决，竟是在支持企业和贸易组织基于第一修正案挑战监管约束。每当金钱开口说话，美国的法院便俯首倾听。正如数据所示，“资本对第一修正案的接管”[注 120]现已尘埃落定。

通过以传统术语重新构想言论自由——即仅将其视为免受政府控制的个人自由问题——ACLU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领导层回归到了一种简单且一致的诉求。这使他们能够占据道德高地，自诩为每一位美国公民宪法权利的捍卫者。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不得不背弃其最初更为激进的构想，即言论自由的目的是何在，以及这一权利的应用将如何改善并变革社会；他们同时也抛弃了这样一种洞见：即那个被大肆吹捧的“思想市场”，在现实中（正如一位劳工领袖在 1940 年所抱怨的）不过是一个“垄断市场”[注 121]——它自动保障言论真正平等的能力，并不比资本主义制度创造财富公平分配的能力更强。

出版自由的困局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至关重要但常被低估的故事：20 世纪美国的评论家和决策者们如何认知并试图纠正媒介市场显而易见的弊端，以及该市场与真理产出之间那令人怀疑的关系。

回溯至 19 世纪 30 年代，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曾将美国的报业图景[注 122]与法国报业进行对比，并对前者推崇备至。这并非因为美国报业更自由（他无论如何也不认为出版自由是毫无争议的好事），而是因为它的高度去中心化。他说，在美国，不像在欧洲，从事新闻业并无真正的暴利可图。结果便是报纸随处可见，而非像法国那样仅有“少数几个强力机关”。这意味着，虽然定期刊物集体性地对美国公众舆论握有巨大影响力，但它无法被集中组织或操纵。无论这在托克维尔时代是否属于一种合理的解释，半个世纪后它肯定已不再属实。正如 1879 年一位到访的英国政治家所注意到的，

在美国乃至“文明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注 123]，“有钱人统治着新闻界，而新闻界统治着国家”。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一些成功的进步派和倡导性（“扒粪”‘muckraking’）新刊物相继创办，但面向大众市场的美国新闻业变得愈发资本密集化和工业化，并不断整合进数量更少的法人报业和辛迪加中，且严重依赖广告收入。正如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许多观察家所抱怨的那样，这日益将新闻本身变成了一种受操纵的商品，其内容主要由所有者的利益而非公众利益决定。毕竟，社会学先驱爱德华·罗斯（Edward Ross）在 1910 年指出，“期望一位报业巨头为了真理和进步而经营报纸，其合理性程度与劝诫磨坊主为了公共福祉而非私人利益而经营财产别无二致”[注 124]。这反过来侵蚀了民主，因为“报纸所有者制造了孕育观点的感知；如果他控制着一系列重要报纸，他几乎可以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制造公众舆论！”[注 125][注 126][脚注 2]

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来补救这一危险局面？一些早期批评者认为，解决方案可能在于建立由捐赠或订阅资助的非营利性报纸[注 127]。但另一些人则直指传统出版自由理论本身。除了关注作者和出版商表达自我的自由之外，难道不也应该考虑公众获得正确信息的权利吗？在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公众舆论研究中，天才记者兼总统顾问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辩称，鉴于现代新闻生产和消费的复杂性，弥尔顿和密尔（他暗示还包括霍姆斯和布兰代斯近期的最高法院意见）那种简单的言论自由教义纯属“误导”[注 128]——它们“太软弱且不切实际……不足以保护自由的目的。而自由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健康的系统环境，使人类的判断和探究能够在该环境中最为成功地组织人类生活”。由于关键问题在于公众舆论的形成，因此“保护其观点来源是民主的根本问题。其他一切都取决于此”[注 129]。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定义言论或意见自由，而是如何最好地保障公民获取准确的公共信息与知识。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正值经济大萧条、新政时期的政府积极主义以及欧洲独裁政权的崛起，美国政治自由与出版自由之间的确切关系，演变成了一个紧迫且引发广泛讨论的全国性议题——即所谓的“出版自由问题”[注 130]。正如罗斯福（Roosevelt）本人所言，美国人民既拥有维护“新闻自由的权益”，也拥有维护“出版机构自由的权益”[注 131]。1939 年，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在全国广播节目中被问及：“我们拥有自由的出版业吗？”伊克斯给出了否定回答，并列举了近期媒体界肆意偏袒财阀的实例。他辩称，大体而言，美国报纸不过是商业利益集团的“附庸”传声筒，被别有用心地用于操纵公众舆论以牟利，并扭曲政治进

程——“出版自由的缺失，是我们的民主政府和社会秩序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虽然没有人希望引入政府审查，但报业作为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主要私人产业，其执业行为为何能豁免于旨在增进公共利益的规制之外？

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此表示认同[注 132]；新闻从业者，甚至一些颇具实权的出版大亨也持此观点。杂志巨头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 1937 年告诉前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如果不规制出版业，我看除了个人良知外，别无依靠。但如果你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编辑和出版商的个人良知……那为什么不去依赖银行家、制造商和教育家们的个人良知呢？”[注 133] 秉持这种精神，国会和政府于 1933 年至 1942 年间试图颁布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注 134]——取缔欺诈性广告，为媒体公司引入价格、贸易和劳工规制，并针对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电讯服务的垄断行为提起反垄断诉讼。

然而，这些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与 20 世纪初的其他美国商人一样，大多数报纸出版商和广告商已深切认同“宪法保障其免受任何形式公共控制”这一观念。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最高法院对保护言论自由表现出的新兴趣，赋予了他们额外的信心。此前，明尼苏达州曾依据一项禁止“恶意、诽谤和诋毁性”出版物的州法，取缔了一份极具种族主义和反犹倾向的报纸；对此，一个由保守派富豪出版商组成的联盟在 ACLU 的协助下，于 1931 年成功说服了法院的微弱多数，裁定该法令违反了第一修正案[注 135]。此后不久，面对新政派对其商业行为的规制尝试，他们发起了法律和舆论攻势，宣扬一种虽站不住脚却极其简明的观点：宪法豁免了出版业受到的任何规制；他们将每一项拟议中的改革都抨击为“反美”的阴谋，是通往极权主义审查制度的邪恶先兆。

1933 年《全国工业复兴法》通过后，该法要求各行业贸易团体制定涵盖劳工条件、价格规制等方面的行业准则。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ANPA）随即敦促其成员抵制该法，理由是这可能“导致或趋向于审查制度”[注 136]。十年后，该协会的首席法律顾问警告称，针对美联社的反垄断规制将使美国人变得像纳粹德国民众一样不自由：两者都将在“政府控制的出版业”下遭受苦难[注 137]。在那种自利性的、反对规制的陈旧论调中，报纸、业主、广告业及其关联企业均沉溺于这种关于“出版自由”的夸张修辞。他们声称，报业根本不是一个产业，而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注 138]，对所服务的公众负有“神圣职责”。他们坚称，对其自由真正的威胁来自新政派本身，因为后者正在扩大政府“宣传”的范畴，并密谋获取“无限的压制权力”、“审查权”、实现“对民主的背叛”和“独裁”。这虽是充满私心或偏执的胡言乱语，但其不断的重复最终重新定义了大众眼中“出版自由”的真义。

在整个 1940 年代，进步派的论点在政策制定圈内依然保持着影响力。1943 至 1945 年间，针对美联社垄断案的联邦及最高法院多项判决均援引了这样一种观点：出版自由应当涵盖公众获取真实信息和多元观点的集体性公共权利（即罗斯福所指的“新闻自由”），而不仅仅是出版商随心所欲的权利。法官们还达成共识，认为第一修正案允许政府对新闻出版业实施经济规制。这种分析也出现在里程碑式的“新闻自由委员会”（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产出的诸多报告中。该委员会由卢斯资助，由十多位美国顶尖的白人男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 1943 至 1947 年间审议了现代世界中“大众传播主要机构的自由、功能与责任”[注 139]。1948 年，法律哲学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在其极具影响力的《表达自由及其与自我治理的关系》中辩称，纯粹追求私人目标的言论与公民“为公共福利而筹划”[注 140]的言论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第一修正案仅保护后者，而不保护那些私营商业媒体在言论自由幌子下对我们思想和意志所实施的“最公然的奴役”。

然而，尽管这一思想在智识界颇有市场，但关于如何将出版自由定义为一种积极公共权利的权威共识却从未稳固建立。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综合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判决来看，美联社案的裁决[注 141]竟产生了不下七份独立意见书——其中三份异议意见书反对将出版自由扩大解释为包括公众对抗私营公司的权利；其余意见书虽然支持这一观点，但依据各不相同。新闻自由委员会同样从一个命题出发，即传统的“免于政府约束”的出版自由观在现代世界已“过于简单”[注 142]且过时，现在它应当包含“公民权利与公共利益”[注 143]——它既应意味着“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om）”，也应意味着“为了……的自由（freedom for）”。因此，其建议书的初稿曾提议进行“强有力且持续的政府干预”[注 144]，以防止垄断并维持竞争；委员们对采取更强硬行动打击蓄意发布谎言的行为也充满热情。但最终，由于恐惧政府“极权主义”[注 145]，委员们发现无法就任何实质性的实践变革达成一致。在列举了大众媒体如何演变成“与金融和工业系统紧密连锁的大规模企业”，其利益如何与民主公众背道而驰，且其“过失与错误……已成为公共危险”等种种现状后，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却软弱地退回到仅仅规劝出版商对公众采取负责任行动的立场上——并将其视为一种“道德”而非“法律”义务。

因此，在美国，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对资本主义媒介系统问题日益增强的认知，最终产生了一个悖论效应。从长远来看，进步派批评的压力反而强化了公然宣称自由意志主义、反政府的言论自由理论与实践。到 1950 年代，大众媒体本质上的唯利是图和党派特性已开始被广泛接受——即便是在其批

评者看来，这也是出版自由的必然结果，而非障碍。报业所有者聘用的宣传人员日益成功地重申了那个简单且传统的论调：出版自由及第一修正案仅关乎免于国家干预的自主权——且这种在经济及其他方面的自主权越大，出版就越自由。关于公共利益的论辩所剩下的一切，仅仅变成了某种虔诚的希冀：希望记者及其出版商能像其他商人一样，以“社会责任”[注 146]来行使权力。自 1950 年代起，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闻学院和志向高远的媒介大亨们的口头禅。

“在美国，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注 147] 一位新闻学者在 1945 年曾如此解释道：

“已不再主要是从政府手中攫取更多此类自由的战斗。现在的目标是通过遏制少数法人和个人对这一权利日益加剧的垄断，使出版自由对于那些并不拥有——也无法拥有——报纸的普通公民而言变得更加真实。因为作为所有者，这些人正享有当今唯一真正的出版自由。”

然而，仅仅不到十五年后的 1960 年，这场智识上的战斗便已基本宣告失败。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如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美国左翼思想家[注 148]，继续对国家大众媒体的偏见及其造成的思想僵化效应产出了一系列极其犀利的批判。但这些观点已不再能影响传统司法界对言论自由的理解。相反，主流思潮转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美式的自由意志主义实验（libertarian experiment）即将拉开序幕。

自由意志主义革命

1940 年至 1960 年间，美国法院、决策者和知识分子之所以逐渐远离此前对监管媒体的兴趣，并放弃以更平等主义的方式重新定义“出版自由”，并非仅仅出于国内的反对力量。这一转向同样源于国际语境的变化——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爆发的冷战。在截至 1940 年的近一个世纪里，美国对出版自由的态度曾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45 年后，共产主义的挑战继续对美国意识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但其作用方式却走向了反面。

“在世界历史的当前时刻，”[注 149] 杜鲁门总统在 1947 年春季向国会发表讲话（此举被视为冷战的开场白之一），“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一种是美国方式，“其特征就在于……对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受政治压迫的保障”。他警告称，另一种方式则“依靠恐怖和压迫，依靠受控的报纸和广播……以及对个人自由的镇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冷战的核心关切——即支持个人的表达自由，并拒绝任

何带有共产主义社会那种集体主义、“受控”媒体色彩的事物——极大地推动了狭隘的言论自由自由意志主义意识形态，也鼓舞了那些主张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媒体市场的人。对这些人而言（正如一位实业家所言），“企业自由和个人自由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达方式”[注 150]。这意味着人们放弃了对商业媒体系统进行改革的任何希望，转而赞美其脱离公共约束的独立性。从这个视角来看，资本主义报业是最自由的，因而是最优秀的。1941 年，美国总检察长向其同胞保证：“自由的人民对宣传具有坚韧的‘销售抗性’”[注 151]。他自夸道，美国人被“各种高强度的广告宣传”所淹没这一事实并未损害其判断力，反而磨炼了它。只有其他国家那些“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人”才会轻易成为虚假信息的猎物。

起初，这种对无限表达自由的新热忱并未延伸到共产主义学说本身。1940 年，当美国共产党拥有约 7.5 万名成员时，一项新法令将“宣扬……以武力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注 152]、“隶属于”任何鼓励此类行为的团体、甚至与他人“共谋”（即谈论）此类宣扬的行为定为犯罪。这成为了 1945 年至 1958 年间所谓“第二次红色恐慌”的法律基础之一。在此期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因涉嫌“不忠”和“反美活动”（如加入美国共产党）而受到调查、解雇、列入黑名单、监禁或遭受其他迫害。他们中的许多人援引第一修正案进行辩护，但均无济于事。1951 年，最高法院裁定，宪法从未保护“文明社会可能禁止的那些对表达权的滥用”[注 153]，且共产主义者参与的是一场“对国家秩序和安全构成实质性危险的阴谋”。然而，六年之后，随着公众对国内颠覆活动的焦虑开始消退，且法院的四名大法官已被更换，法院改变了主意。在早期的裁决中，多数大法官认为共产主义组织构成了紧迫威胁；而两名持异议者则认为，那不过是一个已被美国选民彻底抛弃、微小且失败的政党在进行无力的“清谈”——既无“公开行为”，也无“紧迫且现实的危险”，更未对社会造成“即刻伤害”。到 1957 年，多数派已转向了这一观点[注 154]。其核心标准依然是社会危害性。

在其他方面，诸如对谎言、淫秽内容、诽谤和仇恨言论的法律处理，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美国的言论自由态度与西方其他国家大体保持一致，均在个人自由与对损害及社会秩序的判定之间寻求平衡。然而，战后几十年也开辟了一个不同言论自由意识形态国际竞争的新赛场。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表达自由究竟应当意味着什么？在占领区时期的德国[注 155]，英国人本能地退回到他们在殖民地长期沿用的原则；在日本，美国的征服者们匆忙将第一修正案的一个版本强加给这个战败国。而在全球舞台上，国际法律条约的起草暴露了美国、西欧、共产主义国家及后殖民国家之间在言论自由构想上的差异。由于多种原因，对种族和宗教仇恨的处理成为一个特别的摩擦点——

—其中包括纳粹占领和犹太人大屠杀那段骇人听闻的近期经历、共产主义和后殖民国家打击法西斯及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承诺，以及一个尴尬的问题（这被其意识形态对手乐于利用）：即美国自身虽然自诩为国际自由与平等的标杆，但在其国内法和实践中却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

1946年至1966年间，在起草涉及种族灭绝、种族歧视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注156]期间，苏联和其他国家一贯敦促禁止“传播基于种族优越或仇恨的思想”——这与美国外交官通常青睐的仅针对“煽动”和“行动”的狭隘关注形成了鲜明对比。1952年6月，乌克兰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辛辣地指出：“密西西比州的一项法律禁止支持种族平等的宣传；或许美国代表团反对禁止种族仇恨宣传，是因为它认同这种观点？”（他还抨击了“美国的垄断媒体，完全由其所有者为了利润和增进自身私利而经营”。）作为回击，美国代表得意地指出了几周前最高法院在**博哈内案**

（*Beauharnais*）中的裁决，该裁决维持了伊利诺伊州对“任何使任何群体因种族或肤色而遭受仇恨和轻蔑的材料”的禁令。他赞同“此类国内立法是非常可取的”。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尽管方法论上存在分歧，美国的国际立场逐渐变得对仇恨言论的监管更加包容。

然而，随后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剧烈转向。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系列判决中，最高法院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对第一修正案的解释。这场革命颠覆了管理美国表达自由的法律原则：正是从这一刻起，美国的言论自由理想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真正变得具有“例外性”（exceptional）。其主要结果之一是终结了对仇恨言论或其他歧视性言论的任何限制。如今，美国的纳粹分子、反犹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及其他群体仇恨的传播者都躲在第一修正案的庇护之下。美国媒体公司也自豪地遵循同样的原则，并将其推向全球，其结果不言而喻。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法律革命始于60年代初，当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正试图援助反种族歧视和黑人民权运动。

在此之前，美国法律与其他国家一样，将诽谤视为一种显而易见的损害。正如最高法院在**博哈内案**（*Beauharnais*）中所指出的，并在随后的十年中继续确认的那样，诽谤从未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尽管其确切定义因地而异，且通常被视为民事侵权而非公共犯罪，但所有美国人如果认为自己的名誉因虚假报道受到损害，都可以自由起诉。1962年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新问题是：南方种族主义法官和陪审团一直成功地利用当地的诽谤法和巨额赔偿判决，来削弱民权活动人士，并压制全国媒体对他们斗争的报道。

1960年，一群著名的民权支持者组成“保卫马丁·路德·金及南方自由斗争委员会”，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募款广告，揭露南方警察和官员的残暴行径。该广告对事件的叙述包含了一些事实错误。为此，阿拉巴马

州首府白人至上主义警察局长 L. B. 沙利文 (L. B. Sullivan) 起诉《时报》及四名马丁·路德·金的合伙人 (均为当地黑人牧师, 其姓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现在广告中), 并赢得了高达 50 万美元的巨额赔偿判决。这一判决得到了该州狂热的白人至上主义最高法院的一致维持。阿拉巴马州的其他种族隔离主义者也随即对该报发起攻击并赢得巨额赔款; 甚至一名在报道其恐怖活动的记者也被控以刑事诽谤罪。截至 1961 年底,《纽约时报》面临总计超过 600 万美元的潜在赔偿判决, 并被迫将其工作人员撤出阿拉巴马州, 以避免进一步的恐吓和潜在的破产危机。次年, 该报及相关牧师将沙利文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他们主张, 阿拉巴马州对诽谤法的武器化不仅对民权斗争, 更对“作为民主根基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具有全国性的破坏影响[注 157]: 若不加以遏制, “种族主义者和隔离主义者将在其压迫武器库中获得一件新武器; 这种曾在纳粹德国近代史上出现过阴森先例的种族压迫和恐怖主义, 将披着诽谤诉讼的外衣, 以一种更为可怕的新形式卷土重来。”

此前, 最高法院一直拒绝受理涉及地方诽谤法的上诉。但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 它发布了一系列推进民权的里程碑式裁决。因此, 法院受理此案, 并最终一致裁定推翻原判, 这并不令人意外; 其裁决声称只是遵循古老的先例, 也同样在情理之中。然而事实上, 在寻求推进民权事业的同时, 法院从根本上改写了美国的言论自由教义。

在 1964 年的判决中, 法院炮制出了一项新原则: 公职人员除非能证明对方存在“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 一个法律术语, 意指完全故意的虚假陈述), 否则不得主张名誉受损。三名大法官甚至主张走得更远, 宣布诽谤公职人员是一项无条件的权利, 哪怕是“蓄意且恶意的虚假”[注 158]; 但即便仅仅是“实际恶意”标准, 也已是一个几乎无法企及的高门槛。法院宣称, “诽谤”只是一个主观的标签——更重要的原则是, “对公共议题的辩论应当是不受阻挠、富有活力且广泛公开的, 它完全可以包括对政府和公职人员激烈的、尖刻的、有时甚至是令人不悦的尖锐攻击”[注 159]。换言之, 谩骂、虚假陈述和诽谤都是公共生活的固有组成部分: 它们属于受保护的言论自由, 绝不能受到刑事或民事制裁。无论是真相的维护、出版商不负责任或疏忽的行为, 还是虚假陈述对受冤公职人员造成的真实伤害, 都不再是相关的考量因素——任何“削弱公共辩论活力并限制其多样性”[注 160]的法律都必定是违宪的。

这仅仅是个开始。在 1964 年至 1974 年间, 法院在提高普通公民诽谤诉讼门槛的同时, 稳步扩大了那些在法律上对诽谤、虚假陈述和谩骂不具备追诉权的“公众人物”范围。这一类别从“公职人员”逐渐膨胀为更为庞大且模糊的“公众人物”范畴, 包括完全不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私人公民 (如歌

手或运动员），甚至是那些因自身意愿或行为之外的原因（如创伤性犯罪的受害者）而具有新闻价值的无名之辈。在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这种不享有保护的“公众人士”[注 161]阶层的边界究竟延伸至何处，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法院这场自由意志主义革命的另一个特征是，它放弃了对其他形式伤害的关注，尤其是那些由通常被称为“仇恨言论”引起的伤害——即对种族、民族或宗教的轻蔑表达，传播针对少数群体的毁灭性谎言，以及鼓励对其进行伤害或歧视。虽然法院从未明确废除其在“博哈内案”中的裁决，但自 1969 年以来，最高法院一再撤销地方政府针对此类仇恨表达的法律和法令。基于第一修正案，法院允许了（仅举几例）：一名俄亥俄州三 K 党领袖公开呼吁对犹太人和“黑鬼”进行“报复性惩罚”[注 162]并将其驱逐出美国；美国纳粹分子[注 163]佩戴全副标识在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聚居的伊利诺伊州村庄举行游行的权利；以及一群明尼苏达人在其社区唯一的黑人家庭前院竖立燃烧十字架的行为。最后一组人员曾因违反当地一项禁止展示万字饰、燃烧十字架及其他“基于种族、肤色、信条、宗教或性别”而煽动“愤怒、惊恐或愤恨”[注 164]的法令而被定罪——但最高法院最终判定该法令因违宪而无效。

通过这些判决，最高法院的多数派实际上背离了美国近一个世纪的法律传统——这一传统先是确立了“博哈内案”裁决，继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进一步扩大了在工作场所、大学校园及其他环境中针对辱骂性言论的保护。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曾于 1991 年主张，“保护社区免受受偏见驱使的对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威胁”[注 165]属于正当的政府利益，足以构成对仇恨言论进行限制的正当理由；然而联邦最高法院拒绝了这一论点，并逐渐将其对第一修正案的解释建立在另一对原则之上。

第一项原则是“内容中立”与“观点中立”的教条。在美国，各类公共机构必须允许所有思想自由且充分地表达，无论这些思想显而易见是多么错误、污秽或具有社会腐蚀性。真理本身并不重要。第二项相关的自负

（conceit）则是：言论及其他表达方式可能产生的、甚至已经产生的长期或短期后果，绝不在考虑之列。你可以花费数年时间公开庆颂屠杀犹太人，宣扬非裔美国人的劣等性，或鼓动迫害你的穆斯林邻居。如果这类行为可被定义为对其他员工的骚扰或歧视，你或许无法在工作场所内这样做；但除此之外，在美国法律下，这些行为不被视为“行动”，而仅仅是“言辞”，因此是自由的。唯有当你直接以暴力威胁特定个人，或蓄意挑唆他人实施某些**即刻**的非法行为时，你的言论才具有刑事可追责性——除此之外的一切皆属于受保护的自由言论。

我们可以将此称为“只能忍受并反唇相讥”教义，因为它还结合了第三项虽然极具吸引力、但在实证上值得怀疑的简单原则。该原则认为，针对有害、不实或其他恶劣言论的唯一可行补救措施，仅仅是——更多与之相对立的言论。其潜台词是：真理必将获胜。（正如布兰代斯在 1927 年所言：

“通过讨论揭露谎言和谬误……应当运用的补救手段是更多的言论，而非强制性的沉默。”[注 166]）

然而，这种信念是否经得起推敲[注 167]——尤其是考虑到我们那个全然不完美的“思想市场”的现实情况？为什么那些心怀恶意的虚假信息散布者应当被视为负责任的、或可被说服的对话者？与此同时，那些附带损害[注 168]又该如何计算——最终由谁来承担毒性谎言和仇恨蔓延的负担？哪些群体最有可能遭受其实际后果的影响？在一个充斥着可疑且不可信信息的、缺乏监管的洪流中，普通公民又该如何引导并判断其真实性？如果这一切最终削弱了民主制度本身又该如何？根据现行的信条，这些问题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民主与言论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言论自由法理学已逐渐背离了任何关于“公共利益”（common good）的构想，转而仅对作为最高理想的抽象“自由辩论”表示顺从。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它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平等民主公民权”的连贯教义（即要求在思想市场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尽管其哲学辩护者们[注 169]有时会这样主张。

事实恰恰相反。关于人民主权、参与式公民权以及保护非主流、异议观点之价值的论调，确实始终在美国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中占据显著地位。这最初是对英国传统的继承——但正如许多外国观察家所注意到的，到 1800 年时，它已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民主的特征。到 19 世纪后期，美国法律学者们[注 170]主要从这些角度为言论自由辩护；1919 年之后的最高法院在开始重新解释适用于政治言论的第一修正案时，也持同样立场。这些理想及其相关的激昂修辞，至今仍活跃在当代美国大众和法律界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中。其结果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文化能像美国一样，对公民表达其广泛定义的政治观点（即便这些观点是仇恨的、虚假的、反民主的甚至是带有种族灭绝倾向的）表现出如此高的容忍度。然而，无论人们将此视为值得庆贺之事还是担忧之源，将其视为教义连贯性的体现还是对真实民主价值的盲目漠视，这都仅仅是第一修正案法理学中的一个分支。

问题的关键在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从未仅从这些民主术语出发进行定义。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特别是自 70 年代加速演变以来，最高法院的实践法理学不断将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延伸至广告商、企业和多金的党派团体，而不仅仅限于个人公民和“新闻界”。这转而基于法院日益采纳的一种过度简化且脱离历史的观点，即：“第一修正案明确命令不得削减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这表明起草《权利法案》的先贤们已经完成了该领域所有需要做的‘权衡’工作。”[注 171]基本上，这种视角预设性地禁止了立法者和法官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施加任何进一步的限制。其最终结果是言论自由与民主之间关系的扭曲。

例如，美国国会曾多次尝试监管金钱在美国政治中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允许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来操纵选举。1971 年和 1974 年，连续两版《联邦选举竞选法》对竞选筹款和支出设定了上限，并成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2002 年的《两党竞选改革法》则试图解决富有个人、工会和企业投入无限额“软钱”以影响选举的问题——特别是这些外部势力针对特定政策和候选人，日益增多且缺乏透明度的攻击性或宣传性广告资助。然而，最高法院却以越来越大胆的姿态，将大部分此类监管规定斥为对言论自由不可容忍的侵犯并予以废除。法院在 1976 年裁定，“政府利益在于使个人和团体影响选举结果的相关能力平等化”[注 172]这一命题，“对于第一修正案而言完全是格格不入的”。自 2010 年代以来，基于类似理由，法院允许企业、工会和党派协会为了政治目的进行不受限制的外部支出，并允许富人对联邦竞选活动进行不受限制的直接投入。（首席大法官在 2014 年裁定：“第一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在于保护个人言论，[注 173]而非某种公共利益的集体构想。”）在第一修正案教义中，正如在美国政治中一样，政治言论与金钱支出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金钱越多，声音越大。

当然，最高法院既非一个同质化的整体，也非一成不变的实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第一修正案法理学的演进轨迹远非线性，也从未达成共识[注 174]。数十年来，法律学者们始终在抱怨，这套法理已变得“因其表面化、内部逻辑的不自洽，以及未能促成司法界对与言论自由相关的重大当代社会问题进行建设性干预而引人侧目”[注 175]。近来，许多学者更是直指法院对表达自由那狭隘且抽象的构想[注 176]，抨击其被用来强化既得利益强者的“消极自由”，并断然拒绝考量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现实、弱势群体的利益，或是民主公民普遍享有的积极权利。

在最高法院近年的判决中，也不难发现那些坚持传统言论自由原则并明确考量公共利益的异议意见。拜伦·怀特（Byron White）大法官在 1992 年的一份协同意见书中指出，此前法理一贯认为，任何人都并不享有发表危险、

淫秽、诽谤或其他“对社会无用或价值微乎其微”言论的第一修正案权利[注 177]。因此，将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延伸至仇恨言论，是对既定先例的一种过度简化且令人警觉的背离。他的同事哈里·布莱克蒙（Harry Blackmun）也表示赞同：“我看不出禁止‘恶徒通过在他人的草坪上焚烧十字架来将少数群体赶出家园’的法律损害了任何第一修正案价值，但我却看到，如果阻止圣保罗市人民专门惩治此类严重损害其社区的基于种族的‘挑衅性言论’（fighting words），将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同样在 2010 年，由九十岁高龄的约翰·保罗·斯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领衔的四位大法官抱怨道，其同事们近来采取的这种激进、“盲目且流于格言式的对第一修正案的处理方式”[注 178]，颠覆了一个世纪以来关于监管政治金钱的共识。这种做法将“以牺牲第一修正案本应服务的个人和集体自我表达为代价，去提升公司权力……[并且]削弱了普通公民、国会和各州采取即便只是有限措施来防止公司主宰选举进程的能力”。2014 年，由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撰写的另一份四人少数派异议意见维持了这一观点，即第一修正案旨在推进“不仅是个人参与言论自由的权利，还有公众对于维护一个‘集体性言论至关重要’的民主秩序的权益”[注 179]。2018 年，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大法官在捍卫法院此前“在工作场所平衡第一修正案权利与其他重要公共利益考量”的方法时辩称，多数派对既定法律最新的极端、反工会重释“步步皆错……它将第一修正案武器化，通过这种方式释放了法官在现在和未来干预经济和监管政策的权力”[注 180]。她总结道：“第一修正案本应服务于更高尚的目标。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削弱而是为了保护民主治理。”[注 185]

此外，虽然美国法律教义已演化出精详的规则来裁决第一修正案界限内的言论行为，但这些界限本身[注 181]（即哪些被视为“言论”予以覆盖，哪些则不然）的落点和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决定的。因此，许多种类的表达行为在法律上仍受到规制，或处于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外，包括某些形式的政治言辞（例如投票站周围的行为，或竞选宣传沟通的披露要求）。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言论自由教义整体上现已建立在与 60 年代以前截然不同的基础之上，并已变得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例外性”。美国观察家倾向于将此颂扬为一种标志，证明他们的言论自由路径在智识上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先进。最高法院本身自 60 年代以来，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同行，自鸣得意地拒绝考虑[注 182]任何外国言论自由法律或意见与其自身研议的相关性。但世界其他地区[注 183]却对此不以为然。尽管现代第一修正案法理学展现出了无可争议的复杂性，但全球范围内甚至包括那些拥有相似法律体系和传统的其他英语国家，都压

倒性地拒绝了它的新原则。相反，这些国家继续将言论自由视为涉及伤害、比例原则、权力关系失衡、民主及公共利益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和公司对抗国家的权利。那么，该如何解释这场“美国革命”呢？

针对这一问题，历史研究方法[注 184]通常聚焦于两类偶发性的短期解释：一是司法席位上不断变化的人格特质与意识形态构成；二是引发特定言论自由案件的国内社会与政治背景。这两者固然是答案的一部分，但这一新轨迹的出现，也得益于美国法理学与世界其他地区司法实践之间一些更深层、更本质的区别。

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 20 世纪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美国法律之特殊结构。在所有司法权凌驾于立法权的政体中，相比于那些将权利界限仅交由立法者划定的制度，司法体系往往倾向于制定更具连贯性的言论自由规则。这是因为，比起政治家因时因势的立法，法理学更追求建立表面上逻辑自洽的原则，偏好简洁性与一致性。自 20 世纪初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基于宪法理由审查言论法律的野心不断膨胀，使其在国际上成为了此类机构中最权势显赫的一员。1925 年，就在最高法院开始将第一修正案解释为适用于各级政府并可撤销州及地方决策的同年，由大法官们推动的新《司法法》从根本上重塑了法院的管辖权并极大地强化了其权力。反过来，正如我们所见，法院日益增长的专断权（omnipotence）鼓励了诉讼当事人寻求司法审查，以此作为否定政治和立法进程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努力的方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废除对表达行为的监管。最后，联邦体系的复杂性以及美国辽阔的版图，进一步促使法院颁布宽泛且简单的规则：其全国性判决必须涵盖地方观念的剧烈差异。

这些结构性特征解释了为何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言论自由裁决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它们也有助于解释为何这些裁决呈现出日益显见的简明化和抽象化倾向。但要完全理解后一种趋势及其自由意志主义转向，我们还需要将焦点带回到其极度怪异的智识基础——即美国宪法《权利法案》那特殊的文本。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会将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则，建立在两百多年前由一群深切怀疑政府权力、痴迷于有产白人个人自由的暴力反叛移民所起草的陈旧文件之上。与任何现代民主宪法相比，美国这部古老的宪章包含的权利少得惊人，因此那些被列出的权利（尤其是排在首位的权利）便被预设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平等、比例原则、隐私权、身体自主权、社会权、公共利益：在文本中，这些都没有获得与言论及出版自由同等的地位——大多数甚至从未被提及。而自由意志主义转向的关键基础，是一个更为特殊的文本奇观：即第一修正案本身的“绝对主义”表述。在 20 世纪试图建立更广

泛、以社区为中心的范畴界定宣告失败后，到了1960年代，这种更简明、反政府的解释在政治上的胜利，日益使自由意志主义论点占据了上风。

促成这一转型的关键人物是1937年被任命并任职至1971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休戈·布莱克（Hugo Black）。早在1940年代，他就开始倡导对宪法文本采取字面解释方法，特别是第一修正案中那“绝对且无限制的语言”。1952年，他针对“博哈内案”关于仇恨言论的裁决提出了异议，因为在他看来，“第一修正案联同第十四修正案，‘绝对地’禁止此类法律，没有任何‘如果’、‘但是’或‘鉴于’”。到1960年，他已对其观点充满信心，认为宪法的宗旨就是“剥夺政府在言论或出版方面的一切行动权力”[注186]——无论其影响多么深远，也无论他的法律界同行认为这种方法具有多么危险的简单化倾向。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本宪法副本[注187]。每当诉讼当事人不同意布莱克对第一修正案的处理方式时，他都会要求对方大声朗读文本。只要对方读到“不得制定法律”（no law）这一短语，布莱克就会说“谢谢”，然后收回小册子——在他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布莱克的观点中[注188]，第一修正案并不保护为了政治抗议而在学校佩戴黑色臂章，不保护穿着印有“去他妈的征兵”字样的夹克出庭，甚至也不保护公开游行、纠察或焚烧国旗。就像之前和之后的每一位自封的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一样，他在言论的适用范畴上有着特殊的见解。尽管如此，在他的任期内及其后，最高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缓慢而坚定地接受了他处理言论问题的普遍方法。

其结果是在当今美国的法庭上，高喊“第一修正案”就如同祭出一张足以压倒[注189]几乎一切其他考量的王牌——只要你能将自己的行为（例如，拒绝为同性恋客户提供服务、散布不可追踪的“幽灵”枪支制作教程、实行一夫多妻制，或是企图破坏选举结果）定义为一种表达形式。这一策略未必总能奏效，但由于缺乏一套同样清晰的对抗性原则来对其施加约束，它已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法律武器。它拥有一种独特的力量，不仅能撤销任何形式的政府审查，同样能瓦解那些旨在防止伤害、推进民主、平等或集体福祉的约束、规则与法律。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法官普遍认为真相、伤害、语境以及公共利益这些因素，对于言论自由的定义和宗旨至关重要。相比之下，如今美国的法科学生主要被教导要蔑视这种方法（即所谓的“个案权衡”[注190]），将其视为第一修正案教条演进过程中一个不完善的早期阶段，并同样将世界其他地区对类似原则的持续应用斥为模糊且过时的做法。美国人转而拥抱的自由意志主义学说，固然构成了一套在哲学上更为简明、且界限更为生硬的规则。然而，拒绝考虑媒体的实际运作方式，拒绝考虑言论的内容，拒绝考虑“言语即行动”这一事实，以及拒绝承认言论的确切含

义与力量始终取决于特定语境这一永恒难题，本质上也就是在忽视表达行为在现实世界中运作的精髓，并回避了关于言论自由真正最棘手的问题。

在线市场

一个世纪前，整个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普遍认为，他们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众媒体革命时代，并试图确定这对于言论自由的意义。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过度的政府控制是有害的；但将一切交由市场力量同样有害，因为市场不可避免地偏袒富有者和既得利益者。共产主义者沉迷于解决后一种困境，这导致他们走向了极端形式的国家监管。而美国人则大体遵循了相反的轨迹：由于将焦点完全锁定在政府权力问题上，他们最终陷入了不受监管的财阀政治（*plutocracy*）之极端泥潭。

然而，正如甚至在当今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杰出法律专家们看来，认为“私人控制言论与媒体的替代方案即是国家控制”[注 191]，这本身就是建立了一个陈腐且具误导性的二元对立。在世界各地，甚至在美国国内，都存在大量其他模式，说明如何在不接受直接“国家控制”的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而规制或运营不同的媒体。《卫报》（*The Guardian*）作为全球阅读量第二大的英文报纸，其在线内容对所有人完全免费开放，因为它是由一个负有公共使命的私人非营利信托基金运营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及其美国对应机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和公共广播电视网（PBS）——并不处于“国家控制”之下；大多数其他先进民主国家的公共广播机构亦是如此；甚至在许多国家，负责监督无线电、电视及其他大众传播渠道的国家机构也未必受国家直接控制。一个基本原则是：监管体系完全可以被设定为独立于现任政府运作，或者与之保持距离。即便我们可以在如何最佳实施该原则上有所争议，或注意到某些实体比其他实体更成功，但这一原则的客观存在是不容否认的。（毕竟，公共话语被政府宣传所主导的国家，与拥有真正多元公共规制媒体的国家，其本质区别在于潜在或实际的专制政体与健康民主政体之间的差异——这关乎其整体政治和公民文化，而非其关于言论自由的教义。）

同样，尽管人们注定会对“公共利益”的确切定义产生分歧，但法律和政府的一个首要目的始终是维护公共利益。纵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为历代言论自由理想带来了难题：从早期理论家预设公共利益如同公共意志一样纯粹是单一的所导致的内在混乱，到后来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这样的影响力思想家开始将言论自由权视作纯粹属于个人的

权利时产生的问题。如近来的自由意志主义理论所偏好的那样，在定义言论自由时完全不考虑公共利益，很难称之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这也颠倒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历史趋势。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地区，强力新媒体的兴起总是伴随着公共利益法律和监管机构的建立。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头所看到的，当印刷术这一新颖技术最初传遍欧洲时，它同样受到了规制。到 1900 年，印刷自由的新理想已在各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国家控制。但即便是在最热烈推进出版自由原则的美国，其条款也是被字面理解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并不会自动延伸至其他媒介。最高法院在 1915 年裁定，这些自由并不适用于电影，因为：

电影放映纯粹是一种商业行为，其起源与经营完全是为了营利，与其他演出无异；不应将其视为国家出版业的一部分，亦不应被视为宪法所保障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意义下的舆论机关。[注 192]

米克尔约翰（Meiklejohn）在 1948 年也解释道，第一修正案同样不延伸至广播领域，因为广播“并不致力于扩大和丰富人类交流，它致力于赚钱”。[注 193] 从诞生之日起，这些新形式的大众传播就被视为商业行为，并以各种方式受到公共规制；电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亦是如此。

因此，在针对印刷媒体构建更广泛、以公共为中心的“第一修正案”解读尝试被放弃后，这种尝试在对待广播电视的态度中却长期存在。1934 年的《通讯法》设立了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旨在“基于公共利益”对广播机构进行许可与规制。[注 194] 从 1949 年起，在各项规则中，FCC 的“公平教义”（fairness doctrine）要求所有电台和电视台必须拨出广播时间关注具有公共重要性的事务，并就此呈现多元的观点。1969 年，FCC 以此为由吊销了一家推行种族隔离主义的密西西比电视台的执照。[注 195] 同年，最高法院一致裁定维持委员会广泛的监管权限（包括公平教义）具有完全的宪法合法性，因为“第一修正案与公共广播相关，但观众和听众的权利才是至高无上的，而非广播者的权利”。[注 196] 这与其当时对报纸和杂志出版商权利与责任的想法截然相反。在这一时期的另一项一致裁决中，法院解释称，无论印刷媒体存在多少缺陷和偏见，“负责任的出版业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出版责任并非宪法所授权的；如同许多其他美德一样，它无法通过立法实现”。[注 197] 法律可以强制要求广播者履行公共问责义务，但不能强制要求印刷出版商。

对于当时和现在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及右翼批评家而言，这种对待广播的方式无异于一种隐蔽的政府审查。无论如何，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随着最高法院在言论自由问题上日益宽容，FCC 的成员构成和规则也稳步向自由意志主义方向靠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利的广播电台和有线电视

商（后者作为一种新媒介，从一开始受到的监管就较松散）对传统原则发起了持续攻击。例如，在 80 年代改变美国政治格局的福音派基督徒“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大规模政治运动，便是始于 1979 年在达拉斯举行的一场反对“公平教义”的“自由集会”；该集会由一位因宣扬反同性恋言论而被电视台解雇的著名电视布道家发起。最终在 1987 年，委员会本身援引了最高法院近期法理学中所有的自由意志主义流行语，并走得更远，裁定在第一修正案下，广播媒介与印刷媒介之间不应存在任何差别——“公平教义”随之被废除，理由是“通过第一修正案是为了保护人民，不是为了防范记者，而是为了防范政府”。[注 198] 反过来，这一发展进一步助长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右翼谈话电台和具有强烈党派色彩的有线频道（如福克斯新闻）的繁荣。

当下一场伟大的通信革命——互联网[注 199]——于 20 世纪 90 年代席卷全球（且始于美国）时，美国决策者处理其与言论及出版自由关系的方式，深受三大核心考量的影响。首先是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长期确立的监管框架，包括针对广播媒体的公共利益准则传统。因此，1996 年 2 月通过的、为互联网确立基础规则的《电信法》包含了一个完整的章节（第五编，亦称《通信规范法》），旨在规制各种形式的淫秽与暴力内容，包括对利用计算机向未成年人传播色情材料的行为设立刑罚。而该法后来最具深远影响的条款——规定互联网公司与在线言论之间关系的条文，则是作为依然有效的 1934 年《通信法》的修正案（即第 230 条款）而颁布的。

第二个因素——也是第 230 条款的直接动因——是一个针对这一新媒介的特殊问题：互联网平台对在线发布的内容应承担何种责任？它们应当像广播公司或报纸编辑一样，被视为他人言论的“出版者”？还是仅被视为如同书店或邮政承运人那样的“发行者”，不对其流转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截至 1995 年中期，不断演进的判例法倾向于认为：如果公司对其在线论坛行使了编辑控制权，就可能被视为“出版者”，并需承担诽谤责任。这一判定虽有其逻辑合理性，却面临着一种风险：它会诱使公司为了规避责任而完全放弃对内容的任何审核。

促成政策出台的最终动力，是当时对自由市场和表达自由的狂热，以及对政府监管的反感。催生了第 230 条款的“互联网自由”原则，不仅包含对言论自由的宽容态度，更反映了一个深刻的新地缘政治时刻：即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在 1989 年著名宣告的“历史终结”[注 200]。这是共产主义学说对美国言论自由意识形态所做的最后一次、也是反向的贡献。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在全球的推进，在历史事实层面似乎证明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

策是社会与经济组织天然卓越的最终形态。这极大地提振了自由意志主义原则。到 20 世纪末，中国成为硕果仅有的共产主义世界强国，但在美国观察家看来，历史潮流的走向已昭然若揭——而这场诞生于美国的最新通信革命，正推波助澜。克林顿总统曾惊叹道：“我们深知互联网如何改变了美国，而我们本就已是一个开放社会，[注 201]想象一下它能给中国带来多大的改变。”在那里，“无论人们是否喜欢，经济创新与政治赋权都必将携手并进”——“自由将通过移动电话和电缆调制解调器广为传播”。

正是这种凯旋主义的自由贸易观，在 1996 年被美国政治家热切地编纂为法律（这背后也少不了相关电信企业争取“去规制化”的强大游说力量）。尽管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最初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并创建的，但第 230 条款的文本却尖锐地寻求“维护当前互联网及其他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所存在的、不受联邦或州监管束缚的、充满活力且具有竞争力的自由市场”。该条款也承认，在线言论能够且应当受到控制，例如当其涉及“淫秽、淫荡、好色、污秽、过度暴力、骚扰或其他令人反感的内容”时。然而，其主导原则是：所有此类“对冒犯性材料的屏蔽与筛选”都应交由私人个体和互联网公司处理。为了鼓励网站清除不良内容，该条款赋予了它们两类法律豁免：它们既不能被视为用户发布内容的“出版者或发言人”；同时，它们也拥有审查任何内容的绝对权利，“无论该材料是否属于受宪法保护的言论”。（毕竟，作为私人主体，第一修正案并不适用于它们。）事实上，1996 年法案中关于计算技术本身的内容并不多。但是，正如其支持者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不断歌颂的那样，第 230 条款的主要豁免条款被证明是“创造了互联网的 26 个字”。与此同时，在《电信法》通过后的几个月内，其第五编（Title V）中所有的限制性规定均被最高法院判定违反第一修正案，因而被予以废除。

言论自由的未来

三十年后的今天，尘埃已经落定。一方面，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将果冻钉在墙上”的壮举，将互联网驯化为国家教化的渠道；世界各地的威权政体也日益效仿。另一方面，赋予美国营利性公司对全球其余地区在线表达的绝对、无监督且法律上不可撼动的权力，已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1996 年时，美国立法者担心的显而易见有害言论主要还是儿童接触色情材料的问题。国会对该问题的处理方式——将一切诉诸私营企业的智慧——很快便在在线色情业的爆发式增长和暴利面前土崩瓦解。如今，儿童暴露于色情内容的问题远比三十年前严重。与此同时，许多其他种类的有害言论也在网上滋生蔓延，尤其是在算法互联网取代了早期去中心化、较少利润驱动的实验形态并

进入当前的法人化阶段之后——这些言论包括政治与科学领域的虚假信息、对个人及社会群体的系统性骚扰、无休止的仇恨言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对惨烈暴力的赞美。

现代互联网的大多数元素，从算法搜索引擎到在线消费者评论，都涉及言论自由与伤害的潜在争议[注 202]。但在当今全球主导在线公共话语的美国巨型平台——如谷歌和 YouTube（隶属于 Alphabet）、Facebook 及其附属社交媒体（隶属于 Meta），以及推特（2022 年由全球首富、自诩为“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的埃隆·马斯克收购并更名为“X”）——身上，这些问题显得尤为迫切。首先是因为其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权力。Facebook 在全球拥有超过 30 亿活跃用户；全球大部分广告目前都出现在该公司及 Alphabet 旗下的网站上。地球上每一个接触到这些平台的人都在与其进行恒常的互动。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媒体渠道能对人类注意力拥有如此惊人的掌控力，或具备如此全球性的触达能力与财力。其次，这些平台以不同的方式深刻塑造着用户对世界的感知。许多人现在主要通过这些在线门户消费和交换新闻与信息。最后，在实践层面（即便法律上并非如此），这些平台都充当了内容的出版者，而非仅仅是中立的传输渠道。它们根据算法针对每位观众的目标导向，有目的地排列网站信息，以此提升某些信息的可见度并压制其他信息。此外，它们都制定了关于准许和禁言的标准，并根据自身意愿随意执行（或不执行），且不受外界监督。

这套体系的深刻失败已被广泛记录。在美国，推特、Facebook 等社交媒体网站与俄罗斯政府影响 2016 年总统大选的成功尝试有深层牵连；随后，它们又成为散布关于新冠肺炎（Covid-19）及疫苗等重大公共议题虚假信息的中心。在 2010 年代后期的缅甸，Facebook 被系统性地用于传播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宣传，导致了针对该穆斯林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暴行。在过去十年的印度，类似的虚假和带有偏见的反穆斯林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大行其道，加剧了日常的仇恨与暴力。第 230 条款的辩护者以及互联网公司自身声称，他们已尽力而为。他们指出，“大规模”的内容审核极其困难，且在不同运营区域，关于可接受言论的标准差异巨大。Facebook 的“政策管理负责人”在 2019 年警告称，法律绝不可能是解决社交媒体言论自由问题的答案，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社交媒体公司的自愿行动，从而使“商业、政府与公众的动机达成一致”[注 203]。

然而，这种态度的根本问题恰恰在于：正如任何 19 世纪或 20 世纪早期的媒介批评家都会告诉你的那样，私营媒体公司的激励机制**绝不会**与公共利益保持一致，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后者。相反，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在线平台的商业模式非常简单：它依赖于吸引用户，尽可能长

久地将他们“钩”在自己的网站上，向其展示广告并借此获利——与此同时，疯狂搜集用户的个人数据，以便更精准地推送能让他们保持“参与度”和成瘾性的广告与内容，同时还通过其他方式（如将其出售给其他公司）将这些私人数据变现。这与推进言论自由、民主、真理、社会凝聚力或其他公共价值毫无关系；企业对这些概念的姿态，往好里说是天真的愿望，往坏里说则只是犬儒式的公关辞令。[注 204/脚注 3] 当然，这些公司提供了人们乐于使用的服务，其效果可能在社会层面产生益处。在世界其他许多缺乏自由表达或独立报道渠道的地方，它们的到来原则上甚至可能改善媒介环境的健康状况，而非（如在大多数民主国家所证明的那样）使其退化——尽管即便在这一点上，它们在海外的记录也显然毁誉参半，且往往是灾难性的。但归根结底，法人企业最关心的仍是为所有者和股东创造利润。而这正是其内容审核实践之所以屡屡遭受惨痛失败的原因。

在线内容审核的问题，只有一部分源于其规模和本质难度。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资金：即雇用人员去从事那项艰巨、令人不悦的工作——无休止地筛选暴力及冒犯性的文本与图像，并对其含义和影响做出判定。虽然其中一部分可以实现自动化，但由于言论的含义极其依赖特定的语境，大部分审核仍需要人类的判断。不足为奇的是，大多数在线社交媒体平台在排除性暗示图像方面，远比在打击仇恨言论方面成功得多。训练软件识别生殖器图片，要比解释具有潜在反犹主义、恐伊斯兰情绪或虚假记载的文字细微差别容易得多。然而，在线企业极度厌恶在这些无利可图的人力劳动上花钱，并竭力向公众隐瞒其审核实践的污秽现实。每一项外部调查都揭示了同样的模式——本质上，这是一种“脏活”[注 205]，被外包给数量严重不足、薪酬微薄且不堪重负的承包商。这些承包商往往雇用于劳动力廉价的地区，且通常由缺乏相关语言能力或不熟悉平台运营地文化的管理人员监督。相比于企业领导者“快速行动、打破陈规”以及将人类注意力货币化以牟利的雄心，打击有害内容被置于极低的优先级，尤其是在遥远的海外市场。此外，一旦需要削减开支，这总是首当其冲被砍掉的业务——在马斯克收购推特（Twitter）后，其全球内容审核及危害政策部门很快便遭到了毁灭性的裁减。

这些企业由美国人领导这一事实使问题变得更加恶化。因为他们总是想当然地奉行其自身文化中当代言论自由教义的陈词滥调（shibboleths）[注 206]：言论并非行动；对付恶劣言论的手段应当是“更多言论”而非“审查”；美国的“内容中立”原则是最佳路径；所有思想都值得在市场中亮相；真理终将胜出；第 230 条款豁免了他们的一切责任；个人“自由”是至高无上的善。这些原则绝不会将对他人在线表达的“编辑干预”视为可取的行为，更遑论将其视为必不可少的责任。

然而，最深层的问题在于，内容审核的核心目标——防止伤害与虚假信息——最终会阻碍企业追求利润的首要任务。2010 年代，当 Facebook 进入缅甸[注 207]时，正值该国互联网使用量爆发式增长之际。它迅速获得了在线通讯的近乎垄断地位，并随即被该国的军事独裁政权及极端民族主义政客所利用，用来散布仇恨并煽动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对此，该公司几乎未采取任何阻止措施。它在该国没有办事处，不懂当地语言，几乎没有任何员工来监督其平台的用途，或筛选其正向数百万缅甸人传播的暴力及种族灭绝宣传。它所关心的唯有扩大市场份额。

在印度，情况亦是如此。Facebook 在那里拥有数亿用户，使用数十种语言进行交流，但它因不愿监管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系统性散布的仇恨与暴力煽动而臭名昭著。这些民族主义者与该国日益趋向威权主义的政府结盟。即便在其自身那不堪重负的内容审核人员发出警报时，Facebook 的当地高管也经常否决他们的意见，以此维持与民族主义政客的友好关系。Twitter

（现更名为 X）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采取了类似手段。“我们刚刚向华尔街承诺了三倍的用户增长，”[注 208]一位前高管在 2023 年私下解释道，“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依靠印度。”无论如何，正如这些企业在其大本营所充分证明的那样，极化与极端的内容实际上对业务大有裨益。它能产生点击量和“参与度”，能自我滋养，并训练算法提供更多、更深的内容；相比于理智且平淡的信息，它能更有效地吸引用户。此外，由于这种商业模式也奖励那些能够吸引大量受众的基层内容创作者，如今许多人通过在网上散布蓄意谎言来获取丰厚收入[注 209]。如果你想赚大钱，防止有害言论只会成为绊脚石。

美国决策者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其互联网企业极其富有、强大且具影响力，也不仅是因为其言论监管问题已被右翼政客政治化（他们抱怨存在党派性的“审查”），更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实践彻底体现了美国普遍的言论自由态度。过去几十年第一修正案法理学中的自由意志主义革命，给美国留下了一套在应对当前时刻时显得极其乏力的教义。当面对由不怀好意者散布并被贪婪的企业算法放大的如潮水般的虚假信息时，严守“内容与观点中立”的教条毫无助益；关于真相总能在开放、不受规制的讨论中浮现的预设也同样无力。明确豁免企业传播和推动毒性思想的任何责任，并剥夺所有“公众人物”针对公然的诽谤性谎言寻求救济的权利，这些绝非推进真理和保护民主的理想条件。当面对通过在线平台在世界范围内精心策划并被公开庆祝的、旷日持久的日常骚扰、暴力和虚假信息时，无论是“言论与行动相分离”的原则，还是“应对仇恨言论的最佳手段

是更多言论”的教条，抑或是“言论绝不应被‘冻结’”的信念，都不再具有说服力。

当置身于一个被巨型企业为了利润而大肆垄断的公共领域时，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企业的自愿行动足以维护公众权利（遑论增进公共利益）的预设，显得同样天真。对于第一修正案日益绝对主义化的反政府解释（正如一位联邦法官在 2023 年裁定的那样：政府即便只是要求私营公司处理网上流传的严重医疗虚假信息也是违法的），甚至让人对立法的可能性都丧失了信心。归根结底，这种日益仅关乎个人与企业权利，而非更广泛的公众、公民社会或良性运作的民主体制利益的言论自由法律路径，亦无法给人以信心。思想市场越是向线上转移，将它的形态与实质完全交由一群逐利的资本家主宰的原则就越显得难以令人满意。然而在目前，美国的言论自由法理学实质上已陷入了作茧自缚的死角[注 210]。

鉴于在线言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遵循当代美国原则的美国公司造成的，具有讽刺意味但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其他文化一贯青睐的另一种表达自由态度，似乎更适合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至少能为此做出尝试。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当美国的法律和态度仍广泛认同这种“平衡式”言论自由路径时，著名的民权活动家、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领导起草了国际《世界人权宣言》，并于 1948 年由新成立的联合国通过。这份简明文件的第 19 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注 211] 该文件的最后两条规定了此项权利及所有其他个人权利的界限：即这些权利不得延伸至任何违反联合国原则或旨在破坏他人权利的行为。更具体地说，每个人都对“社区负有义务”。因此，所有个人权利都受到法律限制，“其目的仅在于保证对他人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民主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祉的正当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界定不仅清晰地陈述了个体自由必须始终在他人权利与民主原则之间进行权衡，还纳入了当时美国言论自由理论的最前沿观点——即假定言论自由不仅意味着传递信息和思想的权利，同样意味着寻求和接受它们的权利。在那个时代，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定义通常被视为涵盖更广泛的“信息自由”——正如一位联合国代表在 1946 年所表达的那样，其核心是“确保真实和诚实之信息的自由流动”。[注 212]

《世界人权宣言》虽然没有立即生效的法律约束力，但它很快激发了另一份文件的诞生。该文件目前覆盖了 46 个国家的近 7 亿人口，即 1950 年的《欧洲人权公约》。欧洲每个国家的法律和法院都受这份基本权利宪章

以及负责执行该宪章的超国家机构——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最高管辖权的约束。从阿尔巴尼亚到英国，从阿塞拜疆到乌克兰，其地理跨度极广（目前仅有俄罗斯因 2022 年入侵乌克兰被开除出局，不再属于这一法律框架）。

《欧洲人权公约》的制订者们[注 213]采纳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方法，一致同意“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且这意味着接受以及传递信息和思想的权利。他们还强调，由于言论自由“带有义务和责任”，因此它可以合法地受到“民主社会所必需”的法律限制。除了国家安全外，这些限制还包括公共安全、防止动乱、“保护健康或道德”、“维护司法权威与公正”以及“保护他人的名誉或权利”。“广播、电视或电影事业”可以受到国家许可制度的约束，且任何发言者的权利必须始终与其对公众承担的责任之间保持平衡。

这种普遍路径不仅在自由与义务之间寻求平衡，还突出了他人的权利、公民与法人企业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家促进民主价值的首要职责。这造就了一个比美国远为复杂的局面——这不仅是因为不同欧洲国家在言论与出版法方面存在诸多细节差异。这种做法不单纯追求发言者权利的最大化，而是审慎关注表达行为的语境、传播范围、意图与效果及其内容，这可能导致判决与惩处在表面上显得不一致或存在分歧。诽谤法越严格，就越容易被滥用，尤其是被财力雄厚的诉讼当事人滥用；而针对蔑视法庭罪的严厉禁令，则可能削弱公众对司法程序及潜在冤假错案的监督。这些都是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言论自由法理学的特征。在法律层面，这种平衡路径可能无法产生现代美国体系所推崇的那种日益清晰和锐利的规则，而更倾向于产生无穷无尽的案例，由法官和法院根据其最佳判断“摸索前进”（muddle through），并考量其社群在特定议题上不断变化的价值观。但为了兼顾多元民主社会中言论的现实目的与影响，这或许是一个合理的代价。

更重要的是，这种平衡观还为解决因数字革命而剧烈放大的言论自由问题，以及追究媒体公司在加剧这些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种更为有说服力的方法。在欧盟，截至 2024 年，《数字服务法案》（DSA）和《数字市场法案》（DMA）已强制要求互联网公司保护其用户并维护公共利益，否则将面临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并被强制改变其经营实践。这些新义务包括：强力打击虚假信息；强制要求平台对分歧性内容的放大机制保持透明；建立标记并快速移除非法或危险材料（包括敌对国家宣传和医疗虚假信息）的新程序；建立供用户对争议性内容审核提出申辩的外部及内部机制；对平台运营中的有害内容及对公共利益构成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年度公开审计；建立防止操纵的稳健体系；允许研究人员获取平台数据；以及禁止针对儿童的

广告，或基于种族、宗教、政治观点及其他特征的定向广告，亦或针对不愿分享个人数据的用户的定向广告。平台的规模和利润越大，其承担的法律责任就越重。

在英国，2023 年通过的野心稍逊的《在线安全法案》同样以巨额罚款和国家媒体监管机构的干预为后盾，要求在线平台对公众承担类似的“谨慎义务”（duty of care），强制它们采取积极措施降低用户（尤其是儿童）面临的风险，要求其内容审核程序完全透明，并限制有害内容（如宣扬进食障碍、自残、仇恨女性或反犹太主义的内容）的传播放大。

正如这些法令的批评者所指出的，它们并非完善的举措。与任何法律一样，其效力将取决于执行力度。但无论结果如何，这些法律都在提醒我们：言论自由具有复杂性，且相比于近来美国那种贫瘠的还原论（reductionism）假说，言论自由在历史上——即便是在美国国内——始终拥有远为悠久且丰富的构想。因为这些举措不仅是对美国公司近期实践的被动反应，它们还进一步发展了过去三个世纪以来作为“非自由意志主义”言论自由教义核心的数项原则。这种观点在发言者、出版商及法人企业的权利与利润之间，与其对用户、受众及社会整体所承担的责任之间寻求平衡。它承认，言论的发布者和公共话语的塑造者应当为其行为及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承担问责，且这种责任应与其拥有的权力相称。它预设了“思想市场”应当服务于公共利益，且真理有时确实需要受到保护，以抵御蓄意的谎言。它体悟到言论的内容至关重要，同时也认识到其含义始终取决于发言者、受众以及特定语境的身份特质。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承认言论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且言论无论是单独还是累积地产生作用，有时都会对个人、群体或更广泛的公众造成伤害。如何判定所有这些因素是困难的；就相关规则达成共识则难上加难；而要始终如一地执行这些规则更是难于登天。但比起对这些问题全然不顾并仅仅寄希望于“最好的结果”，尝试去面对它们或许是更好的选择。这也正是言论自由的历史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我们对于过去三百年来人类如何构想并为何支持“言论自由”的集体认知越丰富，我们就越能更好地守护它的未来。

后记

从过去走向未来

在思考当下的言论自由时，历史究竟有何用处？

人们往往以两种方式之一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种回应来自那些倾向于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划出一条“清晰连贯线索”[注 1]的人。这包括民权律师、那些通过决策塑造现代传播世界的技术与媒体领袖，以及大多数关于审查制度的编年史家。他们的预设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西方社会已经从压制走向了日益扩大的表达自由。在这个故事中，美国式的路径无疑是最受推崇的。其基本叙事认为：现代言论自由的原则早已蕴含在 1789 年起草的《第一修正案》措辞之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最高法院以日益精进的方式对其进行了阐释；且即便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其具体应用变得复杂化，这些理想在我们的时代依然正确。在这种观点下，表达自由始终只是处于“推进”或“撤退”的状态——它要么“受到威胁”，要么“得到捍卫”。

第二种答案[注 2]则是近来由一些记者和社会科学家提出的。其核心观点是：互联网已经终结（甚至粉碎）了历史。他们辩称，我们的言论自由准则和法律是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下创造的，在面对 21 世纪的信息过载、网络水军（trolling）和在线虚假信息时，这些准则已无力应对，必须予以重构。在他们看来，历史已毫无关联。

正如本书所展现的，这两种方法都存在根本性的错误——或者至少是极其匮乏的。我们今天面临的真相与信任危机绝非史无前例。假新闻、谎言、诽谤以及革命性新媒体带来的动荡冲击，在 1700 年左右（即言论自由首次以现代形式被理论化时）同样是显著的问题，并且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其原则演进的过程中始终存在。

与此同时，第一种方法虽然对不断扩大的“自由”深信不疑，却仅捕捉到了故事的一部分，即西方社会对公共审查制度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它忽略了核心的一点：“谁能说话”、“谁的声音能被听到”以及“谁来制定关于言论的规则”，始终更多地关乎**权力**，而非关乎真相、公平或理性的辩论。事实上，“思想市场”自始至终都是唯利是图且具有党派倾向的。人们的观点及其表达方式，并非全然自主和理性选择的产物，也不是由某种人类识别并偏爱真相的内在能力所驱动的。一部分人的自由是以牺牲另一部分人为代价的：正如那句名言，“狼的自由[注 3]意味着羊的死亡”。更重要的是，自由与财富一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某些人拥有的自由比其他人更多，但

几乎没有人觉得自己拥有得足够。因此，自三百年前这一术语被创造以来，“言论自由”始终是一个被长期武器化的口号——强者用来对抗弱者的频率，绝不亚于弱者用来反抗强者的频率。

纵观历史，公共谎言与欺瞒以惊人的便利性、速度及现实破坏力进行“病灶转移”的案例不胜枚举。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同样真切。那位在 2016 年击败希拉里·克林顿的煽动家，在 2020 年的下届美国总统大选中公正地失败了。然而，他一如既往地编造了源源不断的荒唐谬论[注 4]，伪称自己并未败选，并煽动其支持者暴力阻挠权力向其继任者的合法移交。受其言论蛊惑，全美各地的选举官员被其追随者毁掉了生活；美国国会大厦遭到入侵与洗劫；多人致残甚至丧命。

每当其持续性的行为面临法律挑战时，这位煽动家的律师总是援引他及其支持者的第一修正案权利。数千万美国人对其公然谎言的广泛接受，以及其政党出于党派目的而进行的卑劣且犬儒式的放大，严重动摇了大众对公平选举和法治的信任，进而动摇了美国整个政治体系的根基——并最终助推了他及其追随者在 2024 年赢回大选。我们的言论自由教义越是趋向自由意志主义，就越无力应对公共生活中公然撒谎所产生的毒性影响——事实上，这种教义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他所说的许多话显然是虚假的，并对无数个人以及共和国本身造成了巨大伤害，”[注 5] 甚至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在 2023 年也承认了这一点——随后，该组织又不出所料地转而支持并进而放大了这位煽动家关于“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权”这一凌驾一切的主张。）

相反，我希望本书对我们当前世界观演进过程的梳理，也能揭示出这一观念是多么的混乱、脆弱且充满偶然性——它是数以百万计不断变化的抉择与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在每一个阶段，事物本可能走向不同的轨迹。而在不同的地域，情况确实发展迥异。这正是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中，我们最终形成了关于言论自由如此多样的观念。我们当下的预设并非某种通往完美的、天赋命定的进步结果，而仅仅是我们恰好身处其中的现状。在未来，我们可以做出其他的智识与实践抉择。环境在变，毫无疑问，我们也将随之改变。言论自由始终处于流变之中。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正如我试图展示的那样，言论自由的真实历史具有以惊人直接的方式照亮我们当前困境的潜力。因为在三百年的历程中，出版与言论自由的口号之所以无法转化为逻辑连贯、无懈可击的教义，不仅是因为它们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解读。更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言论自由的理想与现实言论的真相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媒介或规模，人类的交流行为在现实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例如，显而易见的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同时成立。一方面，正如我们所见，言论始终是自由的。即便在最压抑的环境下，它依然难以被遏制且具有潜在的颠覆性。阻止人们交流，就像阻止人们思考一样，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言论也从未是自由的。因为所有的交流都需要规则，因而也就存在约束。即便自言自语，也必须遵循语言的基本法则，否则那只是无法理解的噪音。一旦你试图与他人交流，更多的要求便会随之发挥作用。事实上，无论通过口头、书面还是其他任何方式，你所说之话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并非取决于你自身的意图，而是取决于你的对话者对这些话语所抱持的预设。任何话语的终极意义，是在受众的大脑中，而非在发言者的大脑中生成的。

以上所述皆关乎言论的现实。相比之下，“言论自由”在本质上是一套**人造的教义**。它只有通过淡化或否认某些关于交流的基本事实才能运作。其主张越是强硬，它就越是要试图有力地推行这种否认。其首要主张是：言论与行动是相互分离的。这并非事实。言论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大多数时候，它是一种转瞬即逝、微不足道且软弱的行为。但所有的交流都会在世界中产生影响：这正是交流的目的所在。有时，这些影响无论是单独还是累积地发生作用，都会以一种非同小可的方式，对他人或公众整体产生破坏性。过去的人们对此深有体会。那些在权利与责任之间寻求平衡的言论自由教义，正是源于这种认知。直到不久前，美国人也承认这一点——且在不同情境下（如考虑职场骚扰问题时）依然惯常如此[注6]。唯有现代的第一修正案教条，幻想言论与行动在本质上是分离的，并试图通过定义手段将诽谤、虚假及公民伤害等问题排除在视野之外。

言论自由理论被迫淡化的第二个“不便的真相”是：言语的效果始终取决于其**语境**，而不仅仅取决于其内容。谁在说话？对谁说？何时何地以及为何而说？媒介、受众、意图以及预期或实际效果分别是什么？这是一个孤立的声明，还是某种模式的一部分？简而言之，这段话如何嵌入这个世界？没有两个发言者是完全相同的；同样的话语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根据语境的不同，可能产生迥异的含义与后果。这些再次构成了言语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运作的基本事实。然而，对于将言论自由视为一种个人权利的观念来说，这些事实构成了难题，因为它们暗示了：对于看似相似的行为，不同的人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对待。毕竟，法律与权利正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原则之上的：地位平等、待遇平等、一致性以及透明度。这就是为什么将这些具有主观性、依赖语境的判断尽可能地剥离，并转向一种更趋向“绝对主义”的表达路径，

会显得更简单，也似乎更公平。但在此过程中，你只不过是不断扩大你的“言论自由”教义与言论真实运作方式之间的鸿沟。

关于表达行为相关法律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即便撇开语义、语境和一致性这些根本性困难不谈，法律的执行也极其困难。在日常交流中，涵盖语境与内容的表达规则正不断被提炼和执行——无论是在个体间的面对面互动中，还是在更大的群体中。这就是人们在提到“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时所描述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成为我们当前传播世界如此显著的特征，且正如年长者和言论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抱怨的那样，让人觉得如今的“言论自由程度”不如从前，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政治性的：它是此前被边缘化的群体权力和话语权日益增长的结果，也是身份政治兴起的产物。在自由民主国家，人们再也无法不经思考或毫无争议地散布性别歧视笑话、恐同羞辱、种族与民族刻板印象，以及许多其他此前被常态化但如今极具争议的言论。你可以将其视为“言论自由”令人遗憾的减损，也可以将其视为对那种散布仇恨且欠缺考量的言论之自动权利的迟来且正当的抨击。毕竟，那些指出此前的预设缺乏法理基础的人，难道不也仅仅是在行使他们自己的表达自由吗？“取消”究竟是一种言论形式还是一种行动形式？（当然，两者兼而有之。）关于抵制运动[注7]的争议——自19世纪该实践起源以来便一直存在——往往呈现出类似的逻辑。归根结底，此类问题和分歧在底层逻辑上始终是关于实质性议题（如性别歧视、跨性别政策、中东政治等）的争论，只是伪装成了言论权利的冲突。

第二种原因则为“取消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涡轮增压般的动力。全天候新闻和社交媒体世界使得公众审判的过程变得更加快速、可见且残酷。在线言论脱离创作者控制的速度和规模，远超其他任何媒介。社会习俗各异且不断变迁；一旦误判了受众（即便受众误解了你，或者受众转变成了与你实际交流对象完全不同的群体），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抛弃、批评或惩罚你。这种在线审判涉及的人数往往远超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互动，且更有可能演变为恶毒的辱骂——在网络空间中，人们辱骂他人时不仅感到更自由，事实上的约束也更少，特别是当他们可以匿名行事时。更重要的是，尽管在线世界具有无底洞般的瞬时性，但在某些方面，它也是记录个人羞辱最持久的媒介。每一段在线交流，无论多么随意或转瞬即逝，都会被电子化地记录下来。一旦脱离了个人控制，任何发布在互联网上的尴尬表达、故事或细节，都有可能无限期地留在公共领域，供任何人瞬间检索。

社会和语言规范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其制裁手段（无论在线还是线下）也多是而非正式的。若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强制执行此类规范，特别是针对整个国家，则是一个困难得多的命题。毕竟，群体规模越大，就越难就

准确的条款达成一致。法律无法像表达规范那样迅速且自动地更新。而且，无论如何，法律机制在应对言辞、文字和图像时都是笨拙的工具。它们需要耗费资源来对言论进行监管和起诉；其程序冗长；其制裁手段有限且迟钝。

（这不仅仅是整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大学校园[注 8]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局。）正如法律监管的历史充分表明的那样，它确实有效——既能直接产生影响，也能作为抑制某些不受欢迎言论的手段——但它的行使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即为那些试图压制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曝光度和道德权威（使之成为“言论自由”的殉道者）。

这就是为什么在应对表达自由问题时，过度关注“发言者”是一个错误。因为关键问题往往不在于言论本身，而在于对其进行“放大”

（amplification）的责任。因此，除了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之外，人们还需要考虑中间环节——即通过其进行“公共”言论实际提升、传播和消费的、主要是私营性质的媒体（无论是印刷、广播还是在线媒体）——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诚然，“媒体”由许多不同的出版商、频道和其他放大形式组成，其触达范围和权力千差万别，采取广泛不同的标准和实践也完全合理。但是，在考虑到所有这些差异的同时，核心问题依然存在：这些媒体对（无论如何定义的）公共利益负有哪些责任？这些义务又该如何阐明和执行？例如，它们是否声称尊重真相、公民的平等尊严或民主原则？它们是一个新闻、娱乐、个人互动的论坛，还是这些功能的某种组合？它们声称维护哪些规范？为此投入了哪些资源？其透明度和有效性如何？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即使是最奉行自由意志主义、任由用户自由发挥的网站，也必须对其内容进行审核，以确保人们不会发布严重违法的言论。因此，要求审核政策和实践保持透明、与其频道或媒介的范围和触达力相称、并对其运行所在的社会负责，是完全合理的要求。

寄希望于所有这些问题都能自行解决是不理性的，尤其是在涉及巨额资金和其他形式的权力时。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食品、药品、金融服务——人们普遍理解市场需要“护栏”，以保护用户免受欺诈者和谎言者的侵害，并造福公共利益。传播市场亦是如此。与其无休止地就个人言论自由的界限争论不休，或许更有成效的做法是关注如何最好地规制或激励[注 9]不同形式媒体的实践，使其兼顾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这意味着与政府的直接或党派控制保持安全距离，但也意味着不能仅停留于“自我规制”这种遮羞布。这关乎让媒体实体为其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承担责任（正如许多媒体已经做到的那样），并能够在它们明显未能遵守自身标准时，迅速且有效地对其进行追责。虚假广告损害公共利益，庸医假药亦然。我们已经开发出了应对这两者的机制。我们深知虚假信息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在线环境下——

而且我们那快速演变的新媒体版图中还有其他令人担忧的特征。那些贪图关注和利润的公司大规模向公众发布人工智能（AI）工具，已经使这一切变得更加尖锐。一些社会正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而另一些社会则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失败。我们越是允许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退化为关于“言论自由”或“审查”的党派争端，我们就越会失败。

那么，这一切将言论自由置于何地？撇开关于其确切法律定义的纯技术性问题不谈，我们显然不能、也不应该抛弃这一概念。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曾写过一本名为《言论自由并不存在：而且这也是件好事》（*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Speech: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的书。除了标题所概括的断言外，他还主张：尽管“言论自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流行语，但它依然是一个极具威力的修辞工具。出于这个原因，一个人应该始终声称自己支持它——否则，你的政治对手必然会抢占修辞高地，宣称“我们支持言论自由，而你支持审查和意识形态暴政”。[注 10] 到了那个地步，无论你真正想要表达的观点多么严肃、多么有价值，都几乎无法挽回了。

过去三百年的历史如此，今日亦然。你可能是在中国、伊朗、俄罗斯或其他拥有非民主、压制性政权的国家读到这段文字；你也可能是在一个充满争议的环境中，身为同性恋、跨性别者、支持堕胎权或反堕胎者、支持巴勒斯坦或支持以色列的人，或者是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或无神论者。或者你并非其中任何一种——但无论你的个人观点如何，你肯定深知，世界各地的人们总是在试图限制那些不受欢迎的思想的表达。在个人层面，无论你心中的真理为何，“言论自由”都是一个激励人心的理想——它鼓励人们大声疾呼，并为他人也能发出声音而奋斗。纵观历史，它是大多数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弱者与强者手中共同的宝贵武器。

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经常被权势者用来诋毁他人——这种现象延续至今。在美国，民间追踪并揭露在线虚假信息传播（包括俄罗斯、中国及其他敌对外部实体散布的宣传）的努力，如今常被右翼政客以及那些最倾向于放大此类“垃圾信息”的媒体机构攻击并面临法律挑战。他们宣称这些核查是无理的“审查”[注 11]，是对“言论自由”、第一修正案乃至民主本身的威胁。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正是同样这批右翼立法者和活动人士，正在其控制的各州建立一个日益压制性的政府审查体系[注 12]，旨在削减媒体对其行为的批评，将“宗教自由”作为歧视性言论与行为的借口，并在公立学校、大学和其他领域压制关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性别认同、性取向及其他不受欢迎课题的讨论。同样不令人意外的是，他们攫取了“假新闻”和“虚假信息”的辞令，来描述他们所谓的斗争对象。正如我们在全

书中所见，以一种逻辑上不自洽但政治上极其有效的方式，挪用并武器化那些强有力的流行语，这三百年来始终是言论自由史的核心。我们依然生活在那个时刻，而且将永远如此。对于“什么是言论自由？”这一问题，永远不会有单一的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将我们的分歧简化为“你是否支持言论自由？”这种浅薄的询问是毫无助益的。此外，将表达自由提升为一种如惯例般被标榜的重要目的，甚至将其奉为至高理想（如那种流行的立场：“我是绝对主义者！”），也是毫无意义的。这些都只是逃避深入思考言论的真实问题、同时维持自身道德优越感的方式。

如果你读过本书，你就会明白还有更具意义的问题需要追问，即：“在这一特定实例中，援引言论自由是为了什么？”以及“我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些目的？”——我是支持、漠视，还是反对它们？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只应允许那些与自己目的相符或令自己感到无所谓的言论。包容反对意见是一种美德，也是任何民主社会的必需品。此外，即便你对此并不认可，任何繁荣的文化都必然充斥着谎言、谬论和冒犯性语言。在某些语境下，这些内容或许是可以容忍的，甚至是恰当的。但是，去反对那些你认为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言论，并论证这些言论不应被赋予“言论自由”的资格，同样也是完全合理的。再次强调，这并不是说这些言论应当自动受到制裁，但它确实意味着，我们需要看透那套陈腐的第一修正案陈词滥调——即认为即使面对真正具有伤害性的言论，唯一的可能回应也仅仅是以“更多言论”来予以反击。而这当然意味着：拒绝赋予这些表达以“言论自由”的道德与法律权威。

不幸的是，采取这种替代路径（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比仅仅宣称自己是一个“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并以此了事，显得乏味且疲惫得多。因为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回答那两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会迫使一个人在每一个不同的案例中，去直面背后真实的政治利益博弈。它迫使人们去辩论：针对这些特定问题，允许表达的界限究竟应划在何处？进而去考量每一段争议性话语的具体语境与效果。

批评锡安主义，或指责以色列国家实行种族隔离，是否属于反犹主义？散布关于选举的谎言，是否会破坏我们民主制度的结构？放大关于致命传染病的虚假信息，是否正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我们是否想要生活在一个儿童必然会接触到硬核色情内容的社会？嘲讽弱势移民群体最神圣的信仰，是否是在贬低他们？在艺术、讽刺或学术探究的形式下，即使在其他情境中令人反感的内容，是否也应当被允许？问题是无穷无尽的。然而，这些正是我们应该集中讨论的议题，而不是不断地被短路到关于“言论自由权”或“审查”、“洗脑”、“取消文化”之危险的抽象争论中。下次当你听到有人援

引其中一个口号时，试着看透它——他们正试图让你忽略哪一个实质性问题？事实上，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永远无法脱离“社会应当如何组织”这一宏大问题：如果不考虑这些实质性议题，就无法在抽象层面将其理论化。

将言论自由视为个人权利的终极论据在于：它是思想自由的对应物。它允许人们表达个人身份，并促进智识发展。因为这类论点认为，唯有通过相互尝试不同的思想，我们才能弄清该相信什么，批评错误，并无论在个人还是集体层面都向真理迈进。推进真理始终是大多数形式的言论自由所遵循的指导原则，也是其宣称的目标。

然而，一个奇特的现实是：在每一个真正致力于集体追求真理的生活领域，最充分的探究自由总是与清晰的表达规则并行不悖。例如，优秀的调查记者工作便是如此。它不仅取决于聘用最优秀的记者并追踪隐藏的真相，还取决于提供扎实的证据、无休止的事实与来源核查、审慎的编辑监督，以及承认并纠正错误的开放态度。这也是为什么高质量的新闻业如此不被互联网大佬们所看重——他们厌恶“摩擦”，崇尚“颠覆”，并轻视“传统”或“主流”媒体承袭的权威。毕竟，所有这些质量控制机制都会减缓速度、增加成本，并限制你随意断言的自由。但这也正是“求真”必须付出的代价。并非所有新闻业都是平等的，即使它们都伪称在告诉你真相。事实上，作为寻求真理的“第四权力”的“出版界”，始终和“言论自由”一样，是一个被武器化的流行语：任何人都可以披上这层高尚的外衣，哪怕是为了阴暗的目的。

学术研究——无论是在大学内部还是外部产生——是人类生活中将这些原则制度化得最彻底的领域。显然，这是一个深具缺陷的领域：学术生活正如其植根的广泛文化一样，充斥着社会偏见，其过程也无法对手段欺诈与权力滥用免疫。但它依然是我们拥有的、以推进重大问题的真理为首要目标，且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言论模型的最佳范例。

这一模型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第一是完全的思想与探究自由——这一原则源于长期的学术“哲学化自由”传统，其历史我们在第五章已做过考察。在现代大学中，这一概念通常被定义为“学术自由”[注 13/脚注 1]。其法律上的推论是“学术终身制”原则——即保障学术人员的工作稳定性，以使其活动免受政治和其他外部压力的干扰。其本质是学者可以自由地探索任何问题，无论导向何处，也无论多么具有争议或令人不快。但第二项原则是：为了让你的观点被接受，它们必须通过一个受到高度规制的质量控制体系——专家双盲同行评审、实验可重复性验证、发表后评论以及由资深权威进行的其他形式的事实与主张核查。你的论证需要建立在扎实、可验证的证据之上，并符合学科标准。最后，在传播观点时，你必须遵循学术尊重与文明表

达的规范。即使是令人反感的观点和激烈的争论，也必须以非侮辱性的语言表达。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容易或天然的；所有这些协议都必须由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和学者费力地发明、完善并维护。但这正是关键所在。信任与权威必须通过赢得并不断地重新验证而获得。要确立事实并推进真理，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大量的集体规则与共识。换句话说，与我们流行理想中作为“真理产生器”的“思想市场”最接近的近似物，是学术界的探究与辩论自由——但近距离观察这种自由，你会发现它与现实公共领域中那种唯利是图、任人胡为、充斥点击诱饵的贫民窟截然相反。真实的求真市场并不依赖绝对的表达自由，而是依赖于各种形式的规制。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实则不然。它是深入思考“探究自由”之目的，以及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如何才能最好地追求这一目标后的逻辑必然。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手段。言论自由同样可以承载多种不同的诉求。它的历史并未昭示：更充分的表达自由必然会带来更好的结果；言论自由理应被允许凌驾于其他原则之上；甚至也未曾证明：将其仅视为一种个人权利，而非一种公共或集体利益，便是最佳的构想。事实上，这段历史总是将我们引向更困难、更根本的问题：何谓“自由”？我们谈论的又是谁的自由？我们作为社会的共同目标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推进这些目标？当这些目标彼此冲突，或者我们自身无法达成共识时，我们该如何应对？什么样的交流方式能助力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又有哪些会造成阻碍？仅仅抽象地空谈“言论自由”并不能让我们走得太远；建立一套忽视现实世界交流运作机制的法律教义同样无济于事。唯有不断追索这些持续演变的基本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开始领悟言论自由的本质、潜能与应然——并由此达成对自身以及彼此更深邃的理解。

Notes

The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of quotations from older works has been generally modernized.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all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are my own, and quoted italics are those of the original source. In order to save space, I have dispensed with a separate bibliography, shortened titles and not given places of publication except for works published outside London before 1900. Biblical quotations are from the King James translation of 1611. References to US state legislation,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are taken from the original texts collected in the Hein Online database, 'State Constitutions Illustrated'; references to Cato's Letters are to the date and text of their original newspaper publication, followed in square brackets by the standard number (1–138) by which each essay has been identified since the collected edition of 1733.

ABBREVIATIONS

<i>1834 CJ Report</i>	<i>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Calcutta Journal</i> , House of Commons Papers 1834, 601
<i>Applebee's</i>	<i>Applebee's Original Weekly Journal</i>
<i>BJ</i>	<i>British Journal</i>
BL	British Library
<i>CW</i>	<i>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i> , ed. John M. Robson et al., 33 vols (1963–91)
<i>HBG</i>	<i>Hicky's Bengal Gazette; or The Original Calcutta General Advertiser</i>
JA	Jamaica Archives, Spanish Town
KUL	University of Kansas, Spencer Research Library
LBS	Legacies of British Slave-ownership database (www.ucl.ac.uk/lbs)
<i>LEF</i>	<i>Selected Writings of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i> , ed. Julia Stapleton (2017)
<i>LJ</i>	<i>London Journal</i>
NRS	National Records of Scotland, Edinburgh
<i>ODNB</i>	<i>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i> (2004), online edition (www.oxforddnb.com)
<i>PGM</i>	<i>The Papers of George Mason</i> , ed. Robert A. Rutland, 3 vols (1970)
<i>PJM</i>	<i>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Congressional Series</i> , ed. William T. Hutchinson et al., 17 vols (1962–91)
<i>PTJ</i>	<i>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i> , ed. Julian P. Boyd et al. (1950–)
TLA	The London Archives (formerly London Metropolitan Archives)
TNA	The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

INTRODUCTION

1. 'Good luck!': speech by Bill Clinton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8 Mar. 2000. ↪
2. 'increasingly futile': Audra Ang, 'Hillary Clinton Memoir Altered by Chinese Publisher to Delete Sensitive Subjects', Associated Press, 23 Sept. 2003. ↪
3. *official censors*: Robert Darnton, *Censors at Work* (2014), pt 1. ↪

4. *global concept*: o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ee esp. Timothy Garton Ash, *Free Speech* (2016). ↪
5. *brilliant work*: see e.g. Catharine A. MacKinnon, *Only Words* (1993); Stanley Fish,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Speech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1994); Judith Butler, *Excitable Speech* (1997); Robert C. Post (ed.), *Censorship and Silencing* (1998); Frederick Schauer,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st Amendment', *Harvard Law Review* 17 (2004); Rae Langton, *Sexual Solipsism* (2009); Jeremy Waldron, *The Harm in Hate Speech* (2012). ↪
6. '*I write in order to act*': Voltaire to Jacob Vernes, c.15 April 1767, Letter D14117 in *Les 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ed. Theodore Besterman et al., 205 vols (1968–2022), 116: 53. ↪

1. THE POWER OF SPEECH

1. '*words are but wind*':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omedy of Errors*, Act III, scene 1; see also John Spurr, 'A Profan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Oath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001), 55–6. ↪
2. '*A word is a bird*': quoted in Nicholas Ostler, *Empires of the Word* (2005), 84. ↪
3. '*All things are founded*': *Manu's Code of Law*, ed. and trans. Patrick Olivelle (2005), 137. ↪
4. '*Be a craftsman in speech*': quoted in Ostler, *Empires*, 122. ↪
5. '*Death and life*': Proverbs 18:21. ↪
6. '*The tongue is a fire*' etc.: James 3:6, 3:8. ↪
7. *Other scriptural passages*: see Edward Reyner, *Rule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1658 edn), esp. [A4v–A7v], 103–5. ↪
8. *treated as crimes*: Martine Veldhuizen, *Sins of the Tongue in the Medieval West* (2017). ↪
9. '*to tell or publish*': Statute of Westminster, 3 Ed. I c. 34 (1275). ↪
10. '*false news*' etc.: Statute of Gloucester, 2 Rich. II c. 5 (1378). ↪
11. *defamation, 'scolding'*: see e.g. Richard Wunderli, *London Church Courts and Society on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 (1981), 63–80; Marjorie McIntosh, *Controlling Misbehavior in England, 1370–1600* (2009), 58–65; Veldhuizen, *Sins of the Tongue*, ch. 5. ↪
12. *medieval Iceland: Laws of Early Iceland*, trans. Andrew Dennis et al., 2 vols (1980–2006), 2: 195–200. ↪
13. *heresy and blasphemy*: see e.g. Psalms 15:3, 34:13, 39:1, 50:19; 1 Peter 3:10. ↪
14. *Alexander Champion*: Martin Ingram, *Church Courts,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70–1640* (1987), 95. ↪
15. *burnt at the stake*: William Monter, 'Heresy Executions in Reformation Europe, 1520–1565', in Ole Peter Grell and Bob Scribner (eds), *Tolerance and Intolerance in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 (1996). ↪

16. *new crime of 'sedition'*: see e.g. 26 Hen. 8 c. 13 (1534); 1&2 Phil. & Mary c. 3 (1554–5); 1 Eliz. c. 6 (1558); G. R. Elton, *The Tudor Constitution* (1982 edn), 59–80; Simon Walker, 'Rumour, Sedition and Popular Protest in the Reign of Henry IV', *Past and Present* 166 (2000). ↵
17. *more than a hundred*: David Cressy, *Dangerous Talk* (2010), 50. ↵
18. '*reproach, or slander*': *The Acts of the Parliament of Scotland*, ed. Thomas Thomson, 11 vols (1814–75), 3: 375 (1585, c. 1); see also 3: 296 (1584, c. 8) and 4: 65 (1594, c. 15). ↵
19. *John Stubbs dared write a pamphlet: John Stubbs's 'Gaping Gulf'*, ed. Lloyd E. Berry (1968), xxxiv–xxxvii. ↵
20. *laws against insubordinate criticism*: see Wendell Bird, *Press and Speech Under Assault* (2016), 49–51. ↵
21. *cursing and swearing*: Ashley Montagu, *The Anatomy of Swearing* (1967), 129–30, ch. 9; Thomas Waters, 'Irish Cursing and the Art of Magic, 1750–2018', *Past and Present* 247 (2020). ↵
22. '*scolds*' and '*barrators*': on scolds, barrators and cucking-stools, see e.g. Laura Gowing, *Domestic Dangers* (1996), 115, 122; Keith Thomas, *In Pursuit of Civility* (2018), 91. ↵
23. '*branks*': Margo Todd, *The Culture of Protestantism in Early Modern Scotland* (2002), 141–2, 257 n. 116, 259 n. 125, plate 15; and more generally on speech and its regulation, 135, 143, 147, 157–9, 167, 235–51, 258–9, 261, 287–8, 298, 352–5, 360, 375–6, 382–3, 395–6. ↵
24. '*he was as good a man*': *The Life of Edward Earl of Clarendon*, 2 vols (Oxford, 1760), 1: 57; see also G. D. Squibb, *The High Court of Chivalry* (1959), 64. ↵
25. *all reputable citizens*: see e.g. Ian Maclean, 'The Law of Defamation and the Theory of Meaning in Europe, 1500–1630',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Romance Studies* 1 (1992); Donald Spaeth, 'Words and Deed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2014), 5–6. ↵
26. *main preoccupation was to limit it*: see e.g. Arlette Farge, *Subversive Words*, trans. Rosemary Morris (1994); Jane Kamensky, *Governing the Tongue* (1997); Jonathan I.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2001), ch. 5; Debora Shuger, *Censorship and Cultural Sensibility* (2006); Cressy, *Dangerous Talk; Censorship and the Press, 1580–1720*, ed. Geoff Kemp and Jason McElligott, 4 vols (2009). ↵
27. '*The stroke of the whip*': Ecclesiastes 28:17. ↵
28. '*a bitter jest*': Robert Burton,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1621), 198. For other examples, see Proverbs 25:15 ('By long forbearing is a prince persuaded, and a soft tongue breaketh the bone'); Bartlett Jere Whiting, *Early American Proverbs and Proverbial Phrases* (1977), 447 ('A soft Tongue breaks the bone': last recorded 1744); Cressy, *Dangerous Talk*, 5. ↵
29. '*Many times a scorn*': John Donne, *A Sermon of Commemoration* (1627), 11–12. ↵

30. 'their good names': *The Use of the Law*, 1, in *The Lawyers Light* (1629). Cf. Dianne Hall, 'Words as Weapons', *Éire-Ireland* 41 (2006). ↵
31. 'declare hatred' etc.: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1651), ch. 15; see also Teresa M. Bejan, 'Hobbes Against Hate Speech',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32 (2024). ↵
32. 'if a man calls another man': *Laws of Early Iceland*, trans. Andrew Dennis et al., 2 vols (1980–2006), 2: 354; see also 1: 258. ↵
33. *the personal duel*: David Quint, 'Duelling and Civility in Sixteenth Century Italy', *I Tatti Studie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7 (1997); Courtney Erin Thomas, *If I Lose Mine Honour I Lose Myself* (2017), ch. 1. ↵
34. *quarrelling in a church*: 5&6 Edw. VI, c. 4. ↵
35. *Defamation cases*: Spaeth, 'Words and Deeds', 10. ↵
36. *any language that gave offence*: 'An Ordinance Against Challenges, Duels, and All Provocations Thereunto' (June 1654), in C. H. Firth and R. S. Raitt (eds), *Acts and Ordinances of the Interregnum, 1642–1660*, 3 vols (1911), 2: 937–9. ↵
37. *the record makes clear*: Caroline Boswell, 'Provoking Disorder',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53 (2014), esp. 890, 893–4, 904–8. Cf. Steve Hindle, 'The Shaming of Margaret Knowsley', *Continuity and Change* 9 (1994), 406; Spaeth, 'Words and Deeds'. ↵
38. 'offences against God' etc.: Frame of Government of Pennsylvania, 5 May 1682. ↵
39. 'shall abuse or deride': Great Law of Pennsylvania, 7 December 1682; see also Kamensky, *Governing the Tongue*; Kristin A. Olbertson, *The Dreadful Word* (2022). ↵
40. 'subject to more errors' etc.: Reyner, *Rules*, sig. [A7v], 69, 72, 105, 112–13; cf. William Perkins, *A Directi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Cambridge, 1593), 11, 67. ↵
41. 'Swearing, blaspheming': Perkins, *Direction*, sig. A2r. ↵
42. *bad words* etc.: *ibid.*, 26–7, 55, 68–73; Reyner, *Rules*, 22–3, 91ff.; John Ball, *The Power of Godlines* (1657), 327–9. ↵
43. 'burning in the face': TNA, SP 12/118, fol. 72r. ↵
44. *Speech is an action*: cf.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2nd edn, 1975). ↵
45. 'should never say anything' etc.: *Manu's Code*, ed. Olivelle, 182, 216. ↵
46. *set down his law code*: *The Laws of the Earliest English Kings*, ed. and trans. F. L. Attenborough (1922), 26–9. ↵
47. 'If inferior persons' etc.: *Wentworth Papers 1597–1628*, ed. J. P. Cooper (Camden Society, 4th series, vol. 12: 1973), 18; see also 22–3. ↵
48. 'our elders and betters' etc.: Perkins, *Direction*, 64. ↵
49. 'good speech': Aysha Pollnitz, 'Old Words and the New Worl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7 (2017), 146. ↵

50. 'keep silence' etc.: 1 Corinthians 14; 1 Timothy 2. ↪
51. *female virtue*: Gowing, *Domestic Dangers*, 61 and *passim*. ↪
52. 'Mother, go back up' etc.: *Odyssey* 1.325–64. ↪
53. *sexist presumptions*: Mary Beard, 'The Public Voice of Wome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 Mar. 2014. ↪
54. *European feminist argument*: Hannah Dawson, *The Penguin Book of Feminist Writing* (2021). ↪
55. *In fiction*: see e.g. Edith Joyce Benkov, 'Language and Women', in Julian N. Wasserman and Lois Roney (eds), *Sign, Sentence, Discourse* (1989). ↪
56. 'and requested to have vote' etc.: *Proceedings and Act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Maryland: January 1637/8–September 1664*, in *Archives of Maryland*, ed. William Hand Browne, 72 vols (Baltimore, 1883), 1: 215. ↪
57. *strong political opinions*: see e.g. Andy Wood, 'The Queen is "a goggyll eyed hoore"', in Nicholas Tyacke (e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2007). ↪
58. *limits of female speech*: Gowing, *Domestic Dangers*. ↪
59. 'It is objected against women': [Bathusa Makin],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t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1673), 11. ↪
60. *spoke irreverently and out of turn*: Sara Mendelson and Patricia Crawford, *Wom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998), ch. 4. ↪
61. 'enemies of common society': *The Oxford Francis Bacon*, vol. 1: *Early Writings 1584–1596*, ed. Alan Stewart (2012), 343. ↪
62. 'have no voice' etc.: Sir Thomas Smith, *De republica Anglorum* (1583), 33. ↪
63. 'that no person whatsoever': quoted in Philip Hamburg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of Seditious Libel', *Stanford Law Review* 37 (1985), 688. ↪
64. 'matters of state':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ed. James Spedding et al., 14 vols (1861–79), 14: 129. ↪
65. *Among the core powers*: Hobbes, *Leviathan*, ch. 18. ↪
66. 'for the example of others': *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 ed. John Roche Dasent et al., 46 vols (1890–1964), 14: 277. ↪
67. 'malicious pamphlets' etc.: 'An Advertisement Towching Seditious Wrytings' [after 1590], TNA, SP 12/235, fol. 178r; *The Oxford Francis Bacon*, 1: 305–12. ↪
68. 'The ordinary precursors' etc.: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ed. James F. Larkin and Paul L. Hughes, 2 vols (1973–83), vol. 1, nos 208, 218. ↪
69. 'Not without good reason' etc.: Niccolo Machiavelli, *Discourses* (1531), 1.8, 1.58; see also David Coast, 'Speaking for the Peopl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244 (2019). ↪
70. 'truth for us nowadays': Michel de Montaigne, *The Complete Essays*, trans. M. A. Screech (1991), 756; see also Perez Zagorin, *Ways of Lying* (1990); idem,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Lying and Dissimulation', *Social Research* 63 (1996); Dallas G. Denery II, *The Devil Wins* (2015), ch. 3; Penny Roberts, "'Acceptable

- Truths" During the French Religious War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30 (2020). ↪
71. 'the infirmities and sins' etc.: Perkins, *Direction*, 60, 63, 64. ↪
 72. 'Be rather silent': Elizabeth Jocelin, *The Mothers Legacie to Her Unborne Childe* (1624), 53 (published posthumously). ↪
 73. *Truth was not a sufficient defence*: Roger B. Manning, 'The Origins of the Doctrine of Sedition', *Albion* 12 (1980), 100–101; Cressy, *Dangerous Talk*, 30. ↪
 74. 'that great and immoderate': quoted in Shuger, *Censorship*, 13. ↪
 75. *Policing expression*: for this and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in this chapter, see *ibid.*; Mark Kishlansky, 'A Whipper Whipped', *Historical Journal* 56 (2013); *idem*, 'Martyrs' Tale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53 (2014). ↪
 76. *wild rumours and slanders*: see e.g. *The Voices of the People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ed. Jan Dumolyn et al. (2014); Jan Dumolyn and Jelle Haemers, "'A bad chicken was brooding'", *Past and Present* 214 (2012); *idem*, "'A blabbermouth can barely control his tongue'", in Thomas Cohen and Lesley Twomey (eds), *Spoken Word and Social Practice* (2015); Adam Fox, *Oral and Literate Culture in England 1550–1700* (2000), ch. 7; Robert Darnton, *The Revolutionary Temper* (2023). ↪
 77. 'crying most fearfully' etc.: quoted in Fox, *Oral and Literate Culture*, 360. ↪
 78. *Duke of Buckingham was a serial murderer*: Alastair Bellany and Thomas Cogswell, *The Murder of King James I* (2015). ↪
 79. *European popular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see e.g. Farge, *Subversive Words*; Lisa Jane Graham, *If the King Only Knew* (2000); David Zaret, *Origins of Democratic Culture* (2000); Tim Harris (ed.), *The Politics of the Excluded, c.1500–1850* (2001); Karin Bowie, *Public Opinion in Early Modern Scotland, c.1560–1707* (2020); and the literature cited in these works. ↪
 80. *hugely misinformed public*: for a brilliant contemporary illustration of this moment, see Wenceslaus Hollar, *The World is Ruled and Governed by Opinion* (engraving, 1642). ↪

2. TOLERATING WORDS

1. *new ideas*: see e.g. Alexandra Walsham, *Charitable Hatred* (2006); Benjamin J. Kaplan, *Divided by Faith* (2007); Eliana Glaser (ed.), *Religious Tolerance in the Atlantic World* (2014). ↪
2. *unwelcome messages*: see e.g. John Stubbs's 'Gaping Gulf', ed. Lloyd E. Berry (1968). ↪
3. 'backbite and slander' etc.: quoted in Margo Todd, *The Culture of Protestantism in Early Modern Scotland* (2002), 372. ↪
4. *parrhesia* etc.: outstanding treatments of these various earlier modes of free speech include Arnaldo Momigliano, 'Freedom of Speech in Antiquity', in Philip P. Wiener (ed.),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3); Ineke Sluiter and Ralph

- M. Rosen (eds), *Free Speech in Classical Antiquity* (2004); Arlene W. Saxonhouse, *Free Speech and Democracy in Ancient Athens* (2006); Michel Foucault, *Discourse and Truth and Parrēsia*, ed. Paul-Henri Fruchaud, Daniele Lorenzini and Nancy Luxon (2019); Irene van Renswoude, *The Rhetoric of Free Speech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2019). For their later evolution, see esp. David Colclough, *Freedom of Speech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2005); Robert G. Ingram et al. (eds), *Freedom of Speech, 1500–1850* (2020), chs 1–5. ↩
5. 'gracious licence' etc.: G. R. Elton, *The Tudor Constitution* (1982 edn), 270; see generally 265–74, 285–6, 289. ↩
 6. 'God's holy truth' etc.: John Foxe,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570 edn), bk 11, p. 1812 (quoted from the online edition at dhi.ac.uk/foxe/). ↩
 7. 'To kill a man': Sebastian Castellio, *Concerning Heretics*, ed. and trans. Ronald H. Bainton (1935), 271. ↩
 8. Sebastian Franck: Samme Zijlstra, "'Tgeloove is vrij'", in Marijke Gijswijt-Hofstra (ed.), *Een schijn van verdraagzaamheid* (1989), 44–5, 57–8. ↩
 9. Transylvania: E. M. Wilbur, *A History of Unitarianism in Transylvania, England and America* (1952), 38–40, 48. ↩
 10. 'faith is the gift of God': a reference to Ephesians 2:8–9. ↩
 11. 'great dissidence in the affairs': quoted in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1981), 160; see also Janusz Tazbir, *A State Without Stakes*, trans. A. T. Jordan (1973), ch. 6. ↩
 12. *more prudential than principled*: the protections of the Warsaw Confederation mainly applied only to the nobility: for their limite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o other classes, see Tazbir, *State Without Stakes*, chs 7–9. ↩
 13. 'the writing, publishing, printing' etc.: Dirck Volkertszoon Coornhert, *Synod on the Freedom of Conscience*, ed. and trans. Gerrit Voogt (2008), 171, 176–8; see also Session 15, *passim*. ↩
 14. *novel liberty*: a useful survey is Benjamin Woodford, 'Developments and Debates in English Censorship During the Interregnum', *Early Modern Literary Studies* 17 (2014). New press laws were passed in 1643, 1647, 1649 and 1655. ↩
 15. 'I contend not for variety' etc.: [Francis Rous], *The Ancient Bounds, or Liberty of Conscience Tenderly Stated* (1645; written in 1644), [A4v], 31, 64–5; see also Blair Worden, *God's Instruments* (2012), ch. 3. Cf. John 8:31–2: 'Then said Jesus to those Jews which believed on him, If ye continue in my word, then are ye my disciples indeed / And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
 16. 'there is but one truth' etc.: [Henry Vane], *Zeal Examined* (1652), 19–21. ↩
 17. *gentle exhortation*: Henry Robinson, *Liberty of Conscience* (1643), 17. ↩
 18. *Conscientious idolaters*: [Vane], *Zeal Examined*, 20. ↩
 19. 'teach or publish erroneous doctrines' etc.: Robinson, *Liberty of Conscience*, 16–19. ↩

20. *divorce his wife*: on Milton and divorce, see Joe Moshenska, *Making Darkness Light* (2021), 296–9. ↩
21. *'Let her and Falsehood grapple'*: John Milton, *Areopagitica* (1644), 35. ↩
22. *'may have more shapes'* etc.: *ibid.*, 26, 31, 36. ↩
23. *'the knowledge of good'* etc.: *ibid.*, 12, 35. ↩
24. *'there is no book so bad'*: Pliny the Younger, *Letters*, 3.5; see also Erasmus, *Adagia* (Basel, 1533 edn), preface; Cervantes, *Don Quixote*, pt 2, chs 3 and 59; Ann M. Blair, *Too Much to Know* (2010), 13. ↩
25. *'free debate'* etc.: Milton, *A Treatise of Civil Power* (1659), 22–3. ↩
26. *'fleshly wisdom'* etc.: [Vane], *Zeal Examined*, 23–4, 45. ↩
27. *government licenser*: this career seems to have ended when Milton ran into trouble for having licensed a heterodox theological work in Latin. He was onl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he'd once set out in a pamphlet against banning books, he told the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that summoned him. See Leo Miller, 'New Milton Texts and Data from the Aitzema Mission, 1652', *Notes and Queries* 37 (1990), 281; Gordon Campbell and Thomas N. Corns, *John Milton* (2008), 245–8. ↩
28. *it simply lapsed*: see Raymond Astbury, 'The Renewal of the Licensing Act in 1693 and Its Lapse in 1695', *The Library*, 5th series 33 (1978); Michael Treadwell, 'The Stationers and the Printing Acts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John Barnard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vol. 4: 1557–1695 (2002). ↩
29. *tolerance of heterodox ideas as dangerous*: Mark Goldie, 'The Theory of Religious Intolerance in Restoration England', in Ole Peter Grell et al. (eds), *From Persecution to Toleration* (1991). ↩
30. *fuelling irreligion*: see e.g. Lambeth Palace Library, MS 939/10 (1695); Francis Gregory, *A Modest Plea for the Due Regulation of the Press* (1698); G. C. Gibbs,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J. R. Jones (ed.), *Liberty Secured?* (1992), 238–9. ↩
31. *rediscovered and popularized*: see e.g. 'Philopatris' [i.e. Charles Blount], *A Just Vindication of Learning* (1679); Charles Blount, *Reasons Humbly Offered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d Printing* (1693);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 Works of John Milton*, ed. John Toland, 3 vols ('Amsterdam' [i.e. London], 1698); John Milton, *Areopagitica* (1738 edn). ↩
32. *John Locke*: John Coffey, *Persecution and Toleration in Protestant England, 1558–1689* (2000), ch. 3. ↩
33. *'She is not taught by Law'* etc.: [John Locke],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1689), 9, 40. ↩
34. *'speculative opinions'* etc.: *ibid.*, 39, 40, 55. ↩
35. *religious uniformity remained central*: for example, despite Frederick the Great's personal disdain for Christianity ('an old metaphysical fiction, stuffed with contradictions and nonsense, born in the fevered imagination of the Orientals ...

embraced by fanatics, exploited by opportunists, and believed by imbeciles'), and his embrace of Prussia's long history of religious toleration, the Lutheran state church played a vital role in government, and the regime's censorship laws were formulated accordingly: T. C. W. Blanning, *Frederick the Great* (2015), 194 (quoted); idem, *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2023), 202–5, 212, esp. 224–5; Franz Etzin, 'Die Freiheit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unter der Regierung Friedrichs des Großen',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ßischen Geschichte* 33 (1921), 89–129; Henri Brunschwig, *Gesellschaft und Romantik in Preußen im 18. Jahrhundert* (1975), 46. ↵

36. *allowed women to debate*: Keith Thomas, 'Women and the Civil War Sects', *Past and Present* 13 (1958). ↵
37. *'It is not done well': Boswell's Life of Johnson*, ed. G. Birkbeck Hill and L. F. Powell, 4 vols (1971), 1: 463. ↵
38. *early campaigns for women's rights*: see e.g. [Eliza Sharples], *The Isis* (1832); 1848 Seneca Falls Declaration, in Elizabeth Cady Stanton et al., *History of Women Suffrage*, 6 vols (New York: 1881–1922), 1:70–73. ↵
39. *tone and content*: see Teresa M. Bejan, *Mere Civility* (2017). ↵
40. *'Reproachful language' etc.*: *The Writings of William Walwyn*, ed. Jack R. McMichael and Barbara Taft (1989), 241. ↵
41. *'public good' or 'civil society'*: see e.g. [Rous], *Ancient Bounds*, 2; [Locke],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45. ↵
42. *'slandorous' etc.*: Coornhert, *Synod*, 176. ↵
43. *'manifest good of societies' etc.*: [Rous], *Ancient Bounds*, 2; [Vane], *Zeal Examined*, sig. [A3v]; 'Philopatris', *Just Vindication of Learning*, 15–18; Campbell and Corns, *John Milton*, 282–3. ↵
44. *'opinions contrary'*: [Locke],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45. ↵
45. *all of them would punish opinions*: this was equally true of the very few writers who advocated complete liberty of conscience, even for Catholics and heathens: see e.g. *Writings of William Walwyn*, 14, 112–13, 139–41, 239–41; [Robinson], *Liberty of Conscience*, sig. [A4v]; [Roger Williams], *The Bloody Tenent, of Persecution* (1644), 87; John Toland, 'The Life of John Milton', in *Works of John Milton*, ed. Toland, 1: 21; Bejan, *Mere Civility*, 76. ↵
46. *James Nayler: Diary of Thomas Burton*, ed. John Towill Rutt, 4 vols (1828), 1: 24–184; Richard Bauman, *Let Your Words Be Few* (1983); Leo Damrosch, *The Sorrows of the Quaker Jesus* (1996). ↵
47. *fears of Quaker anarchy*: Carla Gardina Pestana, 'The Quaker Executions as Myth and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0 (1993). ↵
48. *prosecutions for atheism and blasphemy*: David Nash, *Blasphemy in the Christian World* (2007). ↵
49. *several US state constitutions*: including Arkansas, Maryland, Mississippi,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Texas and Tennessee. ↵

50. *non-believing professor*: *Silverman v. Campbell, et al.*, South Carolina Supreme Court (1996). ↪
51. '8THEIST': *New York Times*, 16 Aug. 2016. ↪
52. *religious liberty of speech*: *303 Creative LLC v. Elenis*, 600 US 570 (2023). ↪
53. *arguments for sexual promiscuity*: Faramerz Dabhoiwala, *The Origins of Sex* (2012), ch. 2. ↪

3. INVENTING FREE SPEECH

1. *Inventing Free Speech*: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chapter was published as Fara Dabhoiwala, 'Inventing Free Speech', *Past and Present* supplement 16 (2022). ↪
2. '*Cato's Letters*': the only modern edition – *Cato's Letters*, ed. Ronald Hamowy, 2 vols (1995) – simply reprints the 1755 book version. ↪
3. *first widely discussed*: see e.g. Elizabeth Christine Cook, *Literary Influences in Colonial Newspapers* (1912); Clinton Rossiter, *Seedtime of the Republic* (1953); *The English Libertarian Heritage*, ed. David L. Jacobson (1965); Leonard W. Levy,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 (1985);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92); Heather E. Barry, *A 'Dress Rehearsal' for Revolution* (2007). ↪
4. '*daring and well-developed*' etc.: Levy, *Emergence*, 109, 115. ↪
5. *most important English-language text*: Wendell Bird, *The Revolution in Freedoms of Press and Speech* (2020), strongly critiques Levy's overall argument but entirely agrees on this point. ↪
6. *scholarly analyses of their work*: in addition to works cited in the preceding notes to this chapter, see esp. J. M. Bulloch, *Thomas Gordon* (1918); Caroline Robbins, *The Eighteenth-Century Commonwealthman* (1959), 115–25;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1975), 467–77; Jonathan Duke-Evans, 'The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nglish Commonwealthmen, 1695–1725' (University of Oxford DPhil thesis, 1980); Marie P. McMahon, *The Radical Whigs* (1990); Shelley Burt, *Virtue Transformed* (1992), chs 4–6; Annie Mitchell, 'The Character of an Independent Whig'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hD thesis, 2004); Lee Ward, *The Politics of Liberty in England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2004); ODNB; Justin Champion, "'Anglia Libera'", in David Womersley (ed.), *Cultures of Whiggism* (2005); Giovanni Tarantino, *Republicanism, Sinophilia, and Historical Writing* (2012). ↪
7. *free parliamentary debate*: cf. David Colclough, *Freedom of Speech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2005). ↪
8. *rational 'public', or a dangerously misinformed 'mob'*: Mark Knights, *Representation and Misrepresentation in Later Stuart Britain* (2005). ↪
9. *press freedom*: John Barnard et a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7 vols (1999–2019), 4: ch. 25; Jason Peacey, *Print and Public Politics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2013). ↪

10. *English political discourse*: see esp. Laurence Hanson, *Government and the Press 1695–1763* (1936); Karl Tilman Winkler, *Wörterkrieg: Politische Debattenkultur in England, 1689–1750* (1998); Ashley Marshall, *Political Journalism in London, 1695–1720* (2020). I leave aside here the earlier (and continuing) phenomenon of manuscript publication, for which see Harold Love, *Scribal Public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1993); George L. Justice and Nathan Tinker (eds), *Women's Writing and the Circulation of Ideas* (2002); Noah Millstone, *Manuscript Circulation and the Invention of Politics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2016). For the importance of scribal news and comment until the mid eighteenth century, see [Joseph Addison?], *The Thoughts of a Tory Author Concerning the Press* (1712), 5; Henry L. Snyder, 'Newsletters in England, 1689–1715', in Donald H. Bond and W. Reynolds McLeod (eds), *Newsletters to Newspapers* (1977); Alex W. Barber, "'It is Not Easy What to Say of Our Condition, Much Less to Write It'", *Parliamentary History* 32 (2013); Rachael Scarborough King, 'The Manuscript Newsletter and the Rise of the Newspaper, 1665–1715',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79 (2016). ↵
11. 'here we dare speak': *Observer*, 6 Nov. 1706. ↵
12. 'false news' etc.: [Daniel Defoe], *Commentator*, 4 and 8 Jan. 1720. ↵
13. 'Falsehood flies': Jonathan Swift, *Examiner*, 9 Nov. 1710; see also idem, *Gulliver's Travels* (1723), pt 2, ch. 3; David Womersley, 'Swift and Free Speech', in Robert Ingram et al. (eds), *Freedom of Speech, 1500–1850* (2020). Cf. [John Arbuthnot], *Proposals for ... A Treatise of the Art of Political Lying* (1712); Winkler, *Wörterkrieg*, ch. 7. ↵
14. [footnote] 'a Man may be allowed': *Gulliver's Travels*, pt 2, ch. 6. ↵
15. 'the mischiefs that proceed': [Defoe], *Commentator*, 8 Jan. 1720. ↵
16. 'spreading false news': *By the Queen, a Proclamation for Restraining the Spreading False News* (1702); see also Abel Boyer, *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Queen Anne ... Year the Fifth* (1707), 486–9;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Lords* [London 1767–], 21 [=1718–21]: 229–32, 242. ↵
17. *political criticism*: Hanson, *Government and the Press*, ch. 1; John Feather, 'The Book Trade in Politics', *Publishing History* 8 (1980); Philip Hamburg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of Seditious Libel', *Stanford Law Review* 37 (1985); P. B. J. Hyland, 'Liberty and Libel',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1 (1986); Michael Harris, *London Newspapers in the Age of Walpole* (1987), esp. ch. 8; *Censorship and the Press, 1580–1720*, ed. Geoff Kemp and Jason McElligott, 4 vols (2009), vol. 4; Thomas Keymer, *Poetics of the Pillory* (2019). ↵
18. 'liberty of the press' etc.: [Daniel Defoe], *An Essay 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Press* (1704); BL, Add. MS 4295, fols 49–50 [c.1717]. ↵
19. *leaders of the so-called Leveller movement*: [Richard Overton], *A Remonstrance of Many Thousand Citizens* (1646), 13–14, 19;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Supreme Authority* [1649]; [John Lilburne], *Englands New Chains Discovered* [1649], sigs [A3v–A4r], [B2v]; William Walwyn, *Walwyns Just Defence* (1649),

- 25; see also David R. Como, *Radical Parliamentarians and the English Civil War* (2018), 96, 263–4, 281–2, 299–300, 345–7. ↩
20. *paraphrases of Milton's Areopagitica*: 'Philopatris' [i.e. Charles Blount], *A Just Vindication of Learning* (1679), A2v, 2, 8–12 (cf. [Blount], *A Brief Answer to Mr L'Estrange* (1680), 5–7); William Denton, 'An Apology for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6–7, in his *Jus Caesaris* (1681); [Charles Blount], *Reasons Humbly Offered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d Printing* (1693), 8;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 Works of John Milton*, ed. John Toland, 3 vols ('Amsterdam' [i.e. London], 1698), 1: 21–3, 423–42. See also William Lawrence, *Marriage by the Morall Law of God Vindicated* (1680), 164–7. ↩
21. *passing remarks*: cf. Eckhart Hellmuth, "'The Press Ought to be Open to All'", in Gordon Pentland and Michael T. Davis (eds), *England and Scotland, 1688–1815* (2016); Alex W. Barber, *The Restraint of the Press in England 1660–1715* (2022). ↩
22. a 'civil' and 'natural right': [Matthew Tindal],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Parliament* (1698), 7, 24–32 (abridged as *Reasons Against Restraining the Press* (1704)). Cf. *Censorship and the Press*, ed. Kemp and McElligott, 4: 11–12, 29–30; [John Asgill], *An Essay for the Press* (1712), 4; Ernest Sirluck, 'Areopagitica and a Forgotten Licensing Controversy',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1 (1960); Geoffrey Kemp, 'Ideas of Liberty of the Press, 1640–1700'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hD thesis, 2000), 241–51; Stephen Lalor, *Matthew Tindal, Freethinker* (2006), ch. 3; Barber, *Restraint of the Press*, 121–39. ↩
23. *contemporary observers*: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Parliament Shewing the Necessity of Regulating the Press* (Oxford, 1699), 58, 61; *Arguments Relating to a Restraint Upon the Press* (1712), 6, 18–22; J. A. W. Gunn, *Beyond Liberty and Property* (1983), 271–3. ↩
24. 'plausible pretences' etc.: quoted in *Censorship and the Press*, ed. Kemp and McElligott, 4: 103–17; see also Keymer, *Poetics of the Pillory*, 122–5; Bird, *Revolution in Freedoms*, 92–102, 107–12; Mark Knights, *Trust and Distrust* (2021), 266–8, 273–5. ↩
25. 'Nothing could be' etc.: Alex Barber, "'Why don't those lazy priests answer the book?': Matthew Tindal, Censorship,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Religious Debate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History* 333 (2013), 681, 706. Cf. [Addison?], *Thoughts of a Tory Author*, esp. 13; [Francis Atterbury], *English Advice to the Freeholders of England* (1714), 28, 31; *The Craftsman's Doctrine and Practice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1732); Winkler, *Wörterkrieg*, 407–12. ↩
26. *Cato's Letters*: Charles Bechdolt Realey, 'The London Journal and Its Authors, 1720–1723', *Bulletin of University of Kansas* 36 (1935); English Short Title Catalogue (estc.bl.uk); *English Libertarian Heritage*, ed. Jacobson, xxxi, lxiii; for translations, see e.g. *Brieven door een voornaam Lord ... op den naam van Cato* (Delft, 1722); *Brieven over de Vryheid ... van Cato*, 3 vols (Alkmaar and Amsterdam, 1752–4; 2nd edn, Utrecht, 1766); *Cato: oder Briefe von der Freyheit*, trans. Johann Gottfried Gellius, 4 vols (Göttingen, 1756–7); S. R. E. Klein, *Patriots*

Republikanisme (1995), esp. 72–3; catalogue of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

27. *history of free speech*: cf. [Thomas Gordon], *Three Political Letters* (1719). ↵
28. *journalistic style etc.*: Lawrence E. Klein,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1994); Knights, *Representation and Misrepresentation*, 53–7, 151–2, 262–6, ch. 7. ↵
29. ‘*general reasonings*’: *The Fourth Collection of Cato’s Political Letters* ([1721]), iv; see also *The Sixth Collection of Cato’s Political Letters* (1722), [i]. ↵
30. ‘*levelled only at guilty men*’: *A Continuation of the Political Letters in the London Journal, to Jan. 28. 1720–1* ([1721]), ‘Advertisement’. Cf. *Cato’s Letters*, 4 vols (3rd edn, 1733), 1: xix. ↵
31. ‘*against all bad administrations*’: James Ralph,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Sr Robert Walpole* (1743), 505. Cf. Winkler, *Wörterkrieg*, 230–34. ↵
32. ‘*faction or cabal*’: *Cato’s Letters* (3rd edn, 1733), 1: x. Cf.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ed. Harold Williams, 5 vols (1963–5), 2: 380; Winkler, *Wörterkrieg*, 339–48. ↵
33. ‘*defence of treason*’ etc.: Edmund Massey, *The Signs of the Times* (1722), 34; Applebee’s, 3 Feb. 1722; see also *ibid.*, 2 Sept. 1721; *A Collection of ... Mist’s Weekly Journal*, 2 vols (1722), 2: 161–3, 172–91, 210–18, 221–6, 295–301, 320–24. ↵
34. ‘*vilifying the administration*’ etc.: [Daniel Defoe], *The Director*, 2–16 Jan. 1721; *The Censor Censur’d* (1722), 2–3, 13. For rhetorical overlap between Cato and Jacobite arguments, see the *Freeholder’s Journal*, 5 Sept. 1722; Winkler, *Wörterkrieg*, 348–60, 369, 420; Ian Higgins, ‘Remarks on *Cato’s Letters*’, in Womersley (ed.), *Cultures of Whiggism*, 128–32, 139–41. ↵
35. ‘*sometimes silly*’: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Report on Manuscripts in Various Collections*, 8 vols (1901–14), 8: 326. (Molesworth once unsuccessfully attempted to have his own writings inserted in the *London Journal* as those of Cato: KUL, MS G23, fols 30r, 34r–v.) ↵
36. ‘*when he is painting*’ etc.: [Matthew Tindal], *A Defence of our Present Happy Establishment ... From the Falsehood and Malice of Several Late Treasonable Libels, viz. Cato’s Letters* (1722), 26. Cf. [Jonathan Swift], *The Importance of the Guardian* (1713), 24–5. ↵
37. ‘*uncorrupt heart*’: [Thomas Gordon], *The Conspirators* (1721), v. ↵
38. *the same treatment*: [Gordon], *Conspirators*, pt 1, dedication, 29–31; [Gordon], *Three Political Letters*, esp. 34–8; [Thomas Gordon], *Francis, Lord Bacon* (1721); *LJ*, 25 March, 6 May 1721 [22, 28]. ↵
39. ‘*Defaming an Administration*’ etc.: [Thomas Gordon], *The Art of Railing at Great Men* (‘1723’, i.e. November 1722; partially reprinted in *Pasquin*, 23 and 31 May 1723, and in [Thomas Gordon], *The Humourist* [vol. 2], (‘3rd edn’, 1724), 96–

- 105). Walpole's propagandists later repeatedly reused this essay, concealing its authorship: *BJ*, 9 Nov. 1728; *The Free Briton*, 22 July 1731; 28 June 1733. ↪
40. 'Never was there a writer': *The Historical Register ... Volume VI* (1721), 214. ↪
41. *Cato's language was indeed incendiary*: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Caesar, etc., see *LJ*, 12, 19 and 26 Nov., 3, 17, 24 and 31 Dec. 1720; 3, 7, 14 and 21 Jan., 11 and 18 Mar., 2 and 9 Dec. 172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13, 20, 21, 55, 56]. ↪
42. 'Mr Gordon, the reputed author': *Historical Register ... Volume VI*, 215; see generally 203–23. ↪
43. *To escape arrest*: *Daily Journal*, 10, 12, 13, 15 and 17 June; 4 and 31 July 1721; *Evening Post*, 13 and 17 June 1721; *Weekly Journal or British Gazetteer*, 10 June 1721; *Applebee's*, 17 June 1721; TNA, SP 35/27, fols 56–7 (17 June 1721). ↪
44. *explosive exposé* etc.: *LJ*, 12 Aug. 1721; TNA, SP 35/28, fols 10, 12–18, 20–4, 26; 35/30, fol. 113; 35/31, fol. 8; *Applebee's*, 22 July, 19 and 26 Aug. (quoted: 'the young Defoe' etc.) 1721;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 Duke of Portland*, 10 vols (1891–1931), 5: 624; Realey, 'London Journal and Its Authors', 13–20, 33. ↪
45. *Trenchard and Gordon continued*: cf. their boastful advert in *The Post-Boy*, 22 Aug. 1721. ↪
46. 'malicious and scandalous libels' etc.: TNA, SP 35/28, fol. 32. ↪
47. *defences of toleration*: tellingly, their earliest treatment of free speech essentially plagiarized Tindal's arguments about religious liberty of expression – but only for fun: [John Trenchard], *A Short Vindication of the Ld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719); cf. KUL, MS G23, fol. 15r–v; [Thomas Gordon], *A Letter to the Lord Archbishop* (1719). ↪
48. *nonconformist backgrounds*: B. D. Henning (ed.), *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 The House of Commons 1660–1690* (1983), s.v. 'Trenchard, William'; Beinecke Library, Yale, MS Osborn c502, 31; BL, Add MS 70032, fols 49r–50v; KUL, MS G23, fols 15r, 46v, 50r; Duke-Evans,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nglish Commonwealthsmen', ch. 1; Lalor, *Matthew Tindal*, 29. ↪
49. 'bold and dangerous falsehoods': [Thomas Gordon], *The Character of an Independent Whig* (1719), 27. ↪
50. 'liberty of conscience' etc.: *Independent Whig*, 17 Feb., 30 Mar., 8 June, 10 Aug. 1720. ↪
51. 'freedom of [religious] opinion' etc.: *Independent Whig*, vol. 4 (1747), no. XXVI; see also *English Libertarian Heritage*, ed. Jacobson, xxx–xxxii. As was conventional, Trenchard and Gordon's arguments for religious freedom were limited to Protestants: they took for granted that Catholic, Muslim and atheist beliefs were false and dangerous. ↪
52. 'all opinions are equally indulged' etc.: *BJ*, 20 Oct. 1722 [100]. ↪
53. 'the Right of every Man': *LJ*, 4 Feb. 1721; 20 Jan. 1722 [15, 62]. ↪
54. 'base and mean thing' etc.: *LJ*, 10 June 1721 [32]; *BJ*, 20 Oct. 1722 [100]. ↪

55. 'abuse of words' etc.: [Gordon], *Character of an Independent Whig*, 27; [Thomas Gordon], *Considerations Offered upon the Approaching Peace* (1720), 5–6; *Fourth Collection of Cato's Political Letters*, iv; *BJ*, 16 Mar. 1723 [120]; *Pasquin*, 15 Oct. 1723; [Gordon], *Humourist* (1724), 105–11. Cf. Winkler, *Wörterkrieg*, 340–41. ↵
56. 'Misrepresentation of public measures': *LJ*, 4 Feb. 1721 [15]. ↵
57. 'they have no interest' etc.: *LJ*, 8 Apr. 1721 [24]. ↵
58. 'external delusion' etc.: *LJ*, 25 Mar. 1721 [22]. ↵
59. *Trenchard and Gordon's solution*: *LJ*, 4 Feb., 25 Mar., 8 Apr. 1721 [15, 22, 24]; *BJ*, 20 Oct. 1722 [100]; cf. *LJ*, 21 Jan., 4 Mar. 1721 [13, 19]. ↵
60. 'a crime to talk': [Tindal], *Letter*, 24–5. ↵
61. 'trustees of the people' etc.: *LJ*, 4 Feb. 1721 [15]; for the longer history of this central theme, see Knights, *Trust and Distrust*, ch. 9. ↵
62. 'no other liberty': [Tindal], *Letter*, 24, 27; cf. [Tindal], *A Second Defence of the Right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1708), 23; and [Tindal], *Reasons Against Restraining*, 14. ↵
63. 'the great Bulwark of Liberty': *LJ*, 4 Feb. 1721 [15]: the title of the essay was added in *Cato's Letters* (3rd edn, 1733). ↵
64. 'an evil arising': *LJ*, 10 June 1721 [32]. ↵
65. 'libelling' as a serious evil: John Milton, *Areopagitica* (1644), 5–6, 39; Alison A. Chapman, *Courts, Jurisdictions, and Law in John Milton and his Contemporaries* (2020), chs 2–3. ↵
66. 'this cruel practice': *Spectator*, 7 Aug. 1712; cf. 27 Mar. 1711; Pierre Bayle, 'A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Defamatory Libels', in his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 4 vols (1710), 4: x–xxvii of appendix. ↵
67. 'the judgement of the people' etc.: *LJ*, 10 June 1721 [32]; *BJ*, 20 Oct. 1722 [100]. ↵
68. 'foment popular' etc.: *BJ*, 20 Oct. 1722 [100]. ↵
69. *two lengthy manuscripts and a series of pamphlets*: both manuscripts are undated, hitherto unattributed, and in scribal hands (the first with corrections in Tindal's own hand). Their texts overlap, and Tindal also mined them for his many published pamphlets: BL, Add. MS 61705, 'The Criterion: Or Certain Tests to Judge of the Designs of Private Men in Censuring Publick Persons & Measures, With Remarks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ependent Whig' [early 1720]; BL, Add. MS 61707, 'Anti-Cato: Or the Political Letters in the London Journal Examin'd, and Their False Reasonings and Fatal Tendency Expos'd' (evidently prepared for the Commons'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Cato's Letters in June 1721); For Tindal's pamphlets, see [Matthew Tindal], *The Judgment of Dr Prideaux* (1721 [i.e. 1722]), 26 (quoted: 'infinite absurdities'); [Tindal], *Defence of Our Present Happy Establishment*, title-page (quoted: 'Cato the Journalist'); [Tindal?], *Cato's Principles* (1722); [Tindal], *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Disaffection* (1723); [Tindal], *Corah and Moses* (1727). Cf. also [Tindal], *The Defection*

- Consider'd* (1717), 12–14, 21–2; [Tindal], *An Account of a Manuscript* (1718), 23. ↩
70. 'If the people are able' etc.: [Tindal], *Enquiry*, 4–12; [Tindal], *Defence of Our Present Happy Establishment*, 3. ↩
71. 'either he does not know' etc.: [Tindal], 'Anti-Cato', fol. 3r; [Tindal], *Defence of Our Present Happy Establishment*, 4, 15, 29, 31; [Tindal], *Prideaux*, 95; [Tindal], *Enquiry*, esp. 3–6; cf. *Censor Censur'd*; Winkler, *Wörterkrieg*, 340–41. ↩
72. 'highly criminal' etc.: [Tindal], *Defence of Our Present Happy Establishment*, 31; [Tindal], *Enquiry*, 24–7. ↩
73. 'the support of all our liberties' etc.: [Tindal], 'Anti-Cato', fols 39r–48r; [Tindal], *Enquiry*, 23–7; cf. [Tindal], *Letter*, 25–7. The image of the press as a destructive 'engine' was not new: cf.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MS Tanner 25, fol. 362r [1693]. ↩
74. 'most countries' etc.: [Tindal], *Letter*, 27; cf. [Tindal],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Power of the Magistrate* (1697), 184–6. ↩
75. Francis Bacon: *The Oxford Francis Bacon*, vol. 1: *Early Writings 1584–1596*, ed. Alan Stewart (2012), 305–425. ↩
76. 'double the number of papers': TNA, SP 35/30, fol. 134. Cf.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Principles, Characters, Persons, &c of the Political Writers* (1740), 12–14. ↩
77. 'falsehood and scandal' etc.: *Spectator*, 7 Aug. 1712; cf. [Addison?], *Thoughts of a Tory Author*, 5–6; *A Vindication of the Press* (1718), 8–9. ↩
78. *the world's first 'free' press*: *New Cambridg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iterature*, ed. George Watson, 5 vols (1969–77), 2: 1269–1346; J. A. Downie, *Robert Harley and the Press* (1979); Hanson, *Government and the Press*, ch. 4; Winkler, *Wörterkrieg*; Jeremy Black, *The English Pre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87), ch. 6; Harris, *London Newspapers*, chs 6–8; David Lemmings, 'The Dark Side of Enlightenment', in David Lemmings and Claire Walker (eds), *Moral Panics, the Media and the Law* (2009); Marshall, *Political Journalism*. ↩
79. *Walpol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ed. Williams, 3: 207; *The Country Journal: or, the Craftsman*, 31 July 1731; *A Further 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of Secrecy ... Delivered the 30th of June 1742* (1742), 25–9, appendix 13; Hanson, *Government and the Press*, 109–18; Simon Targett, "'The Premier Scribbler Himself'", *Studies in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History* 2 (1994); idem, 'Government and Ideology During the Age of Whig Supremacy', *Historical Journal* 38 (1994), 2; Tone Sundt Urstad, *Sir Robert Walpole's Poets* (1999), ch. 4. ↩
80. *Tindal's many anonymous critiques*: Tindal's manuscript tracts survive among the papers of his patron, Lord Sunderland, and extolled his leadership. An April 1720 letter, apparently accompanying the first manuscript, offered his continued services in return for further financial support: BL, Add. MS 61650, fol. 64. A few weeks after completing the second, noting 'how very generous you have already been', Tindal requested a further £400: BL, Add. MS 61650, fol. 87r.

(In turn, Gordon ridiculed the ‘ill success’ of the ‘ancient’, mercenary, ‘learned *Oxonian*’ at attracting either readers or truly substantial reward: *BJ*, 26 Jan. 1723 [113].) Cf. Lalor, *Matthew Tindal*, 26–7, ch. 5; TNA, SP 35/23, fol. 101r (1720). After Sunderland’s death, Tindal switched effortlessly to praise his successor, Walpole: [Tindal], *Corah and Moses*. ↵

81. *other critics presumed: Applebee’s*, 2 Sept. 1721; *A Letter to the Freeholder* (1722), viii–x. ↵
82. *‘maliciously or traitorously’: Applebee’s*, 15 July 1721. Cf. [Defoe], *Commentator*, 15 Jan. 1720; *Historical View*; [James Ralph], *The Case of Authors by Profession* (1758), esp. 11, 19–20, 29–39. ↵
83. *‘common Hackney writers’ etc.: Pasquin*, 13 May 1723, reprinted in [Gordon], *Humourist* (1724), 111–17. Cf. *LJ*, 6 May 1721 [28]; *The Works of Tacitus* [trans. and ed. Thomas Gordon], 2 vols (1728–31), 1: 35, 49–50. ↵
84. *‘made their peace’: Pasquin*, 27 May 1723. ↵
85. *Channel Islands: Ashworth P. Burke, Family Records* (1897), 223–6. According to a modern genealogical database, Elizée was born on Guernsey in January 1692 and died in 1758 – both dates are plausible, though this source cites no evidence and is incorrect about other biographical details: ancestrylibrary.com/family-tree/person/tree/153233181/person/192282509215. ↵
86. *His paper, barely a year old*: it began as the *Thursday’s Journal* (6 Aug.–24 Dec. 1719), then became the *London Journal; or the Thursday’s Journal* (26 Dec. 1719–7 May 1720), and finally on 14 May 1720 was renamed the *London Journal*, at the same time as it changed publishers, presumably due to Dobrée’s acquisition. ↵
87. *‘the only person’ etc.: E[lizée] D[obrée] to [Charles Delafay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spymaster]* 8 Jan. 1721, TNA, SP 35/30, fol. 16 (in French). His unnamed relative was doubtless the merchant and banker William Dobrée (1674–1760), the first of the family to emigrate to London, who lost money in the South Sea crash and had moved to Botolph Lane in 1721 or 1722: see *Daily Post*, 3 Aug. 1720; *LJ*, 17 Aug. 1723; ‘William Dobree, bankrupt, 1754’, at priaulxlibrary.co.uk. Elizée always wrote to the government from this address, even after he and his wife had set up house in a much humbler location nearby; see Sun Insurance Office Policies, 1722–23, TLA, CLC/B/192/F/001/MS11936/014, 216, 286–87, and /MS11936/015, 120. ↵
88. *Dobrée felt secure enough to marry*: the marriage of Elisha Dobrée and Elizabeth Lowther took place on 14 May 1721, as recorded in All Hallows register of marriages 1692–1732, TLA, P69/ALH5/A/007/MS05087; for his domestic life, see also Dobrée to Richard Peters, 28 Sept. 1741, RG-021-4, box 3, item 355, Pennsylvania State Archives, Harrisburg. ↵
89. *the deal*: Letters from Dobrée to Delafaye, Jan.–May 1721, TNA, SP 35/30, fols 16, 28, 88–9, and TNA, SP 35/31, fols 32, 38, 81, 194, 204; statement of the *Journal’s* finances, 1721, TNA, SP 35/68/2, fol. 103; TNA, SP 43/66, 27–28 June

- 1723; T 1/255, fols 304–5; Realey, 'London Journal and Its Authors', 27–9, 33–4; K. L. Joshi, 'The London Journal, 1719–1738', *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Bombay* 9 (1940), 57–66; Simon Targett, 'A Pro-Government Newspaper During the Whig Ascendancy', *Journal of History & Politics* 7 (1989); Karl Tilman Winkler, *Handwerk und Markt ... in London 1695–1750* (1993), 425–32; Lemmings, 'Dark Side of Enlightenment', 145–8. ↵
90. *the second pair*: BJ, 20 Oct. 1722 [100] (quoted: 'what are usually called libels'); BJ, 27 Oct. 1722 [101]. ↵
91. 'extravagant, arbitrary, and violent': BJ, 29 Sept. 1722 [96]. ↵
92. *they continued publishing Cato's Letters*: BJ, 22 Sept.–13, 20 and 27 Oct. 1722; 27 July 1723 [96, 100, 101, 138]; see also *Cato's Letters* (3rd edn, 1733), 4: 289. Later in 1723, Gordon published several essays under the pseudonym Criton: six of these were included in the 1733 and later editions of *Cato's Letters*. ↵
93. *always been for sale*: for Gordon's early life and career, see esp. BL Add MS 70299, bundle 11 (unfoliated), T[homas G[ordon] to Robert Harley, [?]Jan. 1713]; Add MS 70198, fol. 146, [Thomas Gordon] to Robert Harley, 22 Feb. [1713]; Add MS 70032, fols 49r–50v, J. B. to Thomas Gordon, 11 Feb. 1713 [i.e. 1714]; Add MS 36772, correspondence of George Duckett MP, fols 194v, 198r–199v, 202–203v, 204r–205v, 210r–211v, letters from and about Gordon, 1719; Beinecke Library, Yale, MS Osborn c502 (dated 4 July 1713 but probably written between 1714 and 1719). ↵
94. *unprincipled, mercenary hack*: *The Characters of Two Independent Whigs* (1720), 3–6. ↵
95. 'constant overtures' etc.: KUL, MS G23, fols 9r–10r, 30r–v. ↵
96. *had written most of the Letters*: of the first 76 collected Letters, up to 12 May 1722, Gordon wrote 61 (and co-wrote a further 3 with Trenchard); of the ensuing 62, Gordon wrote only 17 (and co-wrote a further 2): *Cato's Letters* (1733 edn). ↵
97. *switched to government propaganda*: for Gordon's secret juggling between ministerial propaganda and Cato's Letters, continued attacks on the latter by government papers, and contemporary speculation about Cato's 'Great Alteration' and quest 'for a Pension', see *St James's Journal*, 15 Nov., 1 Dec. 1722; 19 Jan., 18 May 1723; *Weekly Journal*, 15 June 1723; [Gordon], *Art of Railing*; *Pasquin*, Nov. 1722–Mar. 1724; *Letter to the Freeholder*, viii–x. ↵
98. 'capacity and opportunity' etc.: *St James's Journal*, 3 May 1722 (my italics), reprinted in [Gordon], *Humourist* (1724), 240–46. ↵
99. 'Cato's Letter' etc.: [Thomas Gordon], *A Short View of the Conspiracy* ([early May] 1723), half-title page, 7–8, 20, 28–9, 47–8, 58. Cf. BJ, 20 Apr., 4 May, 29 June 1723 [125, 127, 134]. In its last months, the column took a steadfastly anti-Jacobite, pro-Walpole line. Cf. McMahon, *Radical Whigs*, 170–74; Winkler, *Wörterkrieg*, 200–202, 360–62, 369–74. ↵
100. 'he has gained his point': KUL, MS G23, fol. 44r. ↵

101. *secret motives and quest for preferment*: even his critics conceded that ‘Mr Trenchard is above all temptation’ – he wrote from conviction, and could not be bought (KUL, MS G23, fol. 44r. Cf. *ibid.*, fols 9r, 34r–v; *Historical View*, 15; *Characters of Two Independent Whigs*, 8–14; *Cato’s Letters* (1724 edn), 1: xxvi–xxviii). Yet nonetheless the politics of Cato’s Letters had from the outset been deeply shaped by his own hidden animosities. Towards the end of his life, his one remaining ambition was to become a member of parliament, as his father had been before him. In 1718 and 1719, he fruitlessly lobbied the Whig leader, Lord Sunderland, to insert him into a safe seat, promising his ‘attachment to the present ministry’. His profound ‘personal resentment’ at being snubbed doubtless explains why, shortly afterwards, Cato’s Letters began to assault Sunderland’s government (KUL, MS G23, fols 19v, 22r–23r; [Tindal], ‘Anti-Cato’, 57r; BL, Add MS 61496, fol. 112r–v (quoted: ‘attachment to the present’); *Characters of Two Independent Whigs*, 12–13; *Cato’s Letters* (1724 edn), 1: xxvi (quoted: ‘personal resentment’); Romney Sedgwick (ed.), *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 The House of Commons 1715–1754* (1970), s.v. ‘Trenchard, John’; he did finally enter parliament after the 1722 general election). The Letters’ other immediate obsession was with punishing the culprits of the South Sea crash. Cato’s uniquely vicious, unrelenting hostility to stock market profiteers and corrupt politicians spurred the column’s growing popularity. Week after week it called for exemplary public justice, even summary lynchings. ‘Let us pursue to disgrace, destruction and even death, those who have brought this ruin upon us, let them be ever so great, or ever so many,’ Trenchard urged his readers in early 1721. What he never mentioned was that he’d personally lost a large sum in the crash, through the shenanigans of his bankers. This episode clearly rankled, and sharpened his animosity towards Sunderland’s ministry. Trenchard’s two covert grievances thus became the targets of Cato’s initial wrath (*LJ* 11 Feb. 1721 [16] (quoted: ‘Let us pursue’); KUL, MS G23, fol. 12r; TNA, C 11/41/13, C 11/309/11, C 11/361/109; PROB 11/596/42; cf. *LJ* 10, 17 Mar., 25 Aug., 1 Sept. 1722 [69, 70, 91, 92]). ↪
102. ‘*about Mr Walpole’s keeping his promise*’: KUL, MS G23, fols 42r, 44r. Cf. *Cato’s Letters* (1724 edn), 1: xlv. In 1733, Gordon disingenuously protested that the Letters had been ended ‘without any sordid Composition, and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 except that he and Trenchard had ‘judged that the Public, after all its terrible Convulsions, was again become calm and safe’: *Cato’s Letters* (3rd edn, 1733), 1: x–xi. ↪
103. *most trusted secret censor*: *Works of Tacitus* [trans. and ed. Gordon], 1: dedication, 33–4; *Historical View*, 16–18; *The Yale Edition of 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ed. W. S. Lewis, 48 vols (1937–83), 13: 12; 15: 311; William Cox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Sir Robert Walpole*, 3 vols (1798), 1: xx–xxi; John Nichols, *Literary Anecdot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6 vols (1812), 1: 709; British Museum, item no. 1902,0822.38; Hanson, *Government and the Press*, 79–82; Winkler, *Wörterkrieg*, 284–8. ↪

104. 'following party': *Bob-Lynn against Franck-Lynn* (1732), 16, 20–21, 27–8; *The Universal Spy*, 6 May 1732; *Fog's Weekly Journal*, 30 Nov., 7 Dec. 1734; *The Works of Alexander Pope*, ed. Joseph Warton, 9 vols (1797), 4: 300; 5: 278–9; *Historical View*, 14–18; [Ralph], *Case*, 37–8. Henry Fielding underwent a very similar trajectory in his dealings with Walpole: Keymer, *Poetics of the Pillory*, 192–201. ↵
105. *Modern scholars*: see e.g. Levy, *Emergence*, 109–18; Robbins, *Eighteenth-Century Commonwealthman*, 115–16; *English Libertarian Heritage*, ed. Jacobson, xxviii–xxx; McMahon, *Radical Whigs*, esp. 84–5; Winkler, *Wörterkrieg*, esp. 371; ODNB; Tarantino, *Republicanism*, esp. xxii, 34–7. ↵
106. 'tumultuously ... to publish': *Works of Tacitus* [trans. and ed. Gordon], 1: 105–6. Cf. *ibid.*, 2: 92–145; *BJ*, 2 Nov., 26 Dec. 1723. ↵
107. *His post-1723 view*: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Adv.MS.23.3.26, fol. 64v; [Thomas Gordon], *An Appeal to the Unprejudiced* (1739); [Gordon?], *Warning to the Whigs* (1744); [Gordon], *Works of Sallust ... with Political Discourses* (1744), xvi–xxi, 1–25, 58–9, 70–72, 83–5, 145–6, 168, 183–91; [Gordon], *An Essay on Government* (1747), ii–iii; [Gordon], *Independent Whig ... vol. IV* (1747), 294–336 (quoted: 'ungrateful and licentious' etc.). Cf. Simon Varey, 'The Craftsman', *Prose Studies* 16 (1993), 66–7; Winkler, *Wörterkrieg*, esp. 289–308, 479–99, 635–43; Eckhart Hellmuth, 'Towards Hume – the Discourse of Liberty of the Press in the Age of Walpol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41 (2018); Marshall, *Political Journalism*, ch. 6. ↵
108. *cobbled together by two hacks*: for their disdain of books and academic scholarship, see *Cato's Letters* (1724 edn), 1: xxxii–xxxvii; *Works of Tacitus* [trans. and ed. Gordon], 1: [A2r]; Nichols, *Literary Anecdotes*, 1: 709. ↵
109. *taken up and developed*: see *The Country Journal: or, the Craftsman*, nos. 268–9, 272, 275, 278, 284, 288, 301, 303, 356, 372, 407–8, 426, 472, 583–4 (1731–37); Simon Robertson Varey, 'The Craftsman 1726–1752'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hD thesis, 1976). ↵
110. 'bulwarks of liberty': from the 1720s onwards, that distinctive phrase had spread into general use; by the 1760s and 1770s, English-speaking authors everywhere treated it as a proverbial axiom: see e.g. *True Briton* 1 (3 June 1723); *A Third Letter* [Dublin, 1725]; *The Country Journal* 51 (24 June 1727); *The Bee* 14 (2 June 1733); *The Nature of the Charitable Corporation* (1732), 9; *The Sufferings of John Coustos* (1746), xxiii; *A Letter to the Citizens of Dublin* (1749), 18–19; *A Letter to the Freeholders* (Boston, 1749), 8–10; *A Series of Letters Relating to the Antigallican* (1758), 84; T. C. Phillips, *An Apology* (1761), v; *North Briton* 1 (5 June 1762), 27 (4 Dec. 1762); John Wilkes, *A Letter to the Worthy Electors* ('London' [i.e. Paris?], 1764), 10; [Wilkes], *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William Lord Mansfield* (1768), 24; *The Speeches of John Wilkes*, 3 vols (1777–8), 1: 82; cf. also *St James' Chronicle* (24 May 1763); *Debates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Ireland*, 2 vols (1766), 1: 679–80; *The True Sentiments of America* (1768), 90; *Vox Senatus* (1771), 72; *Patriotism: A Political Satire* (1767),

xvii; *Another Letter to Mr Almon* (1770), 6; *A Dialogue between a Country Farmer and a Juryman* (1770), title-page; *Letters Concerning the Present State of England* (1772), 14; *A Short Historical Account of Lochwinioch Parish* (Paisley, 1773), 28; *Essays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Moral*, 2 vols (Dublin [1774?]), xiv; *Letter Humbly Submitted* (1774), 45; John Carter, *The Reviewer Reviewed* (Norwich [1781]), 1.

↩

111. *First Amendment*: the Bill of Rights as a whole embodied Cato's conception of fixed, constitutional 'checks and restraints' on government: Gary McDowell, 'The Language of Law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5 (1998). ↩

112. *their own theories of speech*: Mark Zuckerberg, 'Standing for Voice and Free Expression' (speech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17 Oct. 2019); Mike Isaac, Sheera Frenkel and Kate Conger, 'Inside Mark Zuckerberg's Sprint to Remake Meta for the Trump Era', *New York Times*, 10 Jan. 2025. ↩

4. THE SHAPES OF FREEDOM

1. *The Shapes of Freedom*: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chapter was published as Fara Dabhoiwala, 'Liberty, Slavery, and Biography',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62 (2023). ↩
2. *tools of enslavement*: see Simon P. Newman, *Freedom Seekers* (2022); David Waldstreicher, 'Reading the Runaway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6 (1999); Jordan E. Taylor, 'Enquire of the Printer', *Early American Studies* 18 (2020). ↩
3. *wrote a letter as 'A Woman'*: *LJ*, 2 and 23 Dec. 1721 [later, in the collected editions, combined into Cato's Letter 58]. Unbeknown to its readers, this essay was an in-joke, composed on the anniversary of Trenchard's third marriage, with an encomium by Gordon. ↩
4. '*public liberty*' etc.: *LJ*, 4 Feb. 1721 [15]. ↩
5. '*writing that hurts*' etc.: *LJ*, 10 June 1721 [32]. See also *BJ*, 20 Oct. 1722 [100]. ↩
6. '*treated them with great niceness*' etc.: *Cato's Letters*, 4 vols (1724 edn), 1: xxix–xxx. See also Thomas Gordon to William Simpson, 28 Dec. [1723], KUL, MS G23, fol. 42v. ↩
7. *female speech*: see e.g. Jelle Haemers and Chanelle Delameillieure, 'Women and Contentious Speech in Fifteenth-century Braba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32 (2017); Amanda Jane Whiting, *Women and Petitioning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Revolution* (2015). ↩
8. '*From the first dawn*' etc.: S[arah], F[yge], 'The Emulation' and 'The Liberty', in her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1703), 20–21, 108–9. ↩
9. '*Wife and servant*': Lady Chudleigh, 'To the Ladies', in her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1703), 40. ↩
10. *women were central*: see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rinting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London Journal*, Aug. 1721, TNA, SP 35/28, fols 10, 13, 15, 18r–v; Karl

Tilman Winkler, *Handwerk und Markt: Vetriebswesen und Tagesschrifttum in London, 1695–1750* (1993), esp. chs 6–8; Paula McDowell, *The Women of Grub Street* (1998). In 1734–5, similarly, Catherine Zenger took over the printing of the *New-York Weekly Journal*, Cato's great American champion, while her husband, John Peter Zenger, was in jail awaiting trial for seditious libel. ↪

11. 'the ladies ... turn their heads': Robert Molesworth, unpaginated dedicatory epistle to [Mary Monck], *Marinda: Poems and Translations Upon Several Occasions* (1716). ↪
12. *female authorship* etc.: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ed. John Barnard et al., 7 vols (1999–2019), 4: ch. 20; 5: ch. 6; Susan Staves, *A Literary History of Women's Writing in Britain, 1660–1789* (2006); Elaine Chalus, "'Ladies Are Often Very Good at Scaffoldings'", *Parliamentary History* 28 (2009). ↪
13. 'private' and 'public':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Thomas Burger and Frederick Lawrence (1989); Dario Castiglione and Lesley Sharpe (eds), *Shifting the Boundaries* (1995); Michèle Cohen, *Fashioning Masculinity* (1996); Philip Carter, *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2001). For its many gendered ironies and contradictions, see Faramerz Dabhoiwala, *The Origins of Sex* (2012), 181–90. ↪
14. 'deserved a statue' etc.: Gordon to Trenchard, 1 Aug. [1721], KUL, MS G23, fol. 9v. See also *LJ*, 13 May, 22 July 1721 [29, 38]. ↪
15. 'that men and women': *Spectator*, 5 May 1711; see also *Spectator*, 2 June, 7 Dec. 1711, 13 Feb. 1712; Rachel Weil, *Political Passions* (1999). ↪
16. *it was perennially contradicted*: 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1987); Kathryn Gleadle and Sarah Richardson (eds), *Women in British Politics, 1760–1860* (2000); Kathryn Gleadle, "'Opinions Deliver'd in Conversation'", in José Harris (ed.),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2003). ↪
17. 'enslaved' etc.: *LJ*, 4 Feb. 1721 [15]. ↪
18. 'all Asia and ... all Africa' etc.: *LJ*, 14 Oct. 1721 [48]. See also *LJ*, 22 July 1721 [38]. ↪
19. *employed the rhetoric of slavery*: see esp. David Armitage, 'John Locke, Carolina, and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olitical Theory* 32 (2004); James Farr, 'Locke, Natural Law, and New World Slavery', *Political Theory* 36 (2008); Holly Brewer, 'Slavery, Sovereignty, and "Inheritable Bloo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2 (2017); Mark Goldie, 'John Locke and Empire', *Carlyle Lecture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1. ↪
20. *British readers and writers*: see John Richardson, *Slavery and Augustan Literature* (2004), esp. ch. 1;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Moral Capital* (2006); Simon Gikandi, *Slavery and the Culture of Taste* (2011). ↪
21. 'furnishing the plantations' etc.: [Daniel Defoe], *An Essay Upon the Trade to Africa* (1711), 5, 34; see also Tim Keirn, 'Daniel Defoe and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Historical Research* 61 (1988). ↪
22.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William Pettigrew, *Freedom's Debt* (2013). ↪

23. *London's newspapers openly celebrated*: see e.g. *LJ*, 3 June, 2 Sept. 1721; 3 Aug., 7 and 21 Sept. 1723; 22 Feb. 1729; *BJ*, 26 Dec. 1724; 'For Sale', *Runaway Slaves in Britain*, University of Glasgow, runaways.gla.ac.uk/for_sale/. ↵
24. 'men are naturally equal' etc.: *LJ*, 16 Sept. 1721 [45]. ↵
25. 'another species of mankind' etc.: *LJ*, 20 Jan. 1722 [62]. ↵
26. 'slave' could refer: Srividhya Swaminathan and Adam R. Beach (eds), *Invoking Slaver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Imagination* (2013). ↵
27. 'effeminate Asiaticks and Africans': Algernon Sidney, *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 (1698), 6. See also Steven Jablonski, 'Ham's Vicious Race',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37 (1997). ↵
28. 'Prince of Slaves': *LJ*, 14 Oct. 1721 [48]. See also Peter A. Dorsey, *Common Bondage* (2009). ↵
29. 'English planters in America' etc.: *LJ*, 24 Feb. 1722 [67]. ↵
30. 'colonies planted in proper climates' etc.: *BJ*, 24 Nov. 1722 [106]. ↵
31. *enthused about the slave trade*: John Cary, *An Essay on the State of England* (Bristol, 1695), 47, 65–86; Jonathan Duke-Evans, 'The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nglish Commonwealthsmen, 1695–1725' (University of Oxford DPhil thesis, 1980), 22, 26; *ODNB*, s.v. 'Cary, John (1649–1719x22)'. ↵
32. *South Sea Company*: Trenchard v. Wanley, 1721, TNA, C 11/41/13. ↵
33. *in the hands of a millionaire*: 'Philip John Miles', LBS. ↵
34. *spy to the East or West Indies*: T[homas] G[ordon], untitled retrospective account of his dealings with Harley, Beinecke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MS Osborn c502, 59. ↵
35. *one of the first books*: *The Calve's-Head Club; or, A Modest Apology for Parson Alberoni* (Kingston, Jamaica, 1719). ↵
36. *Bill, sailed to India*: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Adv. MS.23.3.26, fol. 63r (1740); journal and pay ledger of the *Halifax*, 1740–1742, BL, IOR/L/MAR/B/651C and /651H; Anthony Farrington, *Catalogue of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Journals and Logs, 1600–1834* (1999), 294. Bill was alive in 1750 but seemingly not by 1767 (will of Thomas Gordon, proved 8 Aug. 1750, TNA, PROB 11/781/344, and will of Thomas Gordon of Jamaica, proved 17 Dec. 1781, TNA, PROB 11/1085/244). ↵
37. *Patty*: with her husband, Edward Bullock, Patty Gordon had two daughters. In 1765, she died giving birth to a son, who did not long survive her. Her husband then married his teenaged mistress, Elizabeth-Saville Trower, and fathered two more children before his own death in 1771; see will of Edward Bullock, proved 12 Dec. 1771, TNA, PROB 11/1084/356 (quoted: 'Negroes, mules'); will of Thomas Gordon of Jamaica, TNA, PROB 11/1085/244; inventory of the estate of Edward Bullock, 3 Feb. 1772, JA, 1B/11/3/52, fols 218b–223; inventory of the estate of Mary Bullock, 30 Apr. 1802, JA, 1B/11/3/95, fols 188v–190; inventory of the estate of Edward Bullock [Jnr], 13 Jan. 1827, JA, 1B/11/3/143, fols 52–3;

inventory of James Jones, 6 Dec. 1838, JA, 1B/11/3/153, fols 195b–197; Accounts Produce Books 1773–1786, returns for Fair Prospect estate, JA, 1B/11/4/7–11; baptism of Elizabeth-Saville Trower, St Catherine’s parish register, 4 Nov. 1751, JA, 1B/11/8/3/1; entries for 1, 24, 27 Sept. 1765; 7 Dec. 1768; 12 Feb. 1769; 15 Dec. 1771; and 24 Apr. 1772, St Catherine’s parish register 1764–1808, JA, 1B/11/8/3/48; St Catherine’s vestry minutes, 1759–1768, JA, 2/2/4; ‘Edward Bullock of Kingston Jamaica, ???–1771’, LBS; ‘Edward Bullock, 1772–1824’, LBS; ‘Fair Prospect estate, St. Thomas-in-the East’, LBS; Trevor Burnard, *Mastery, Tyranny, and Desire* (2004), 88. ↪

38. *Her brother Tom*: Inventories of the estate of Thomas Gordon, 13 May and 24 Aug. 1772, JA, 1B/11/3/51, fols 73–7, 151–52b; Land Patents, JA, 1B/11/1/31, fols 98r–v (original foliation); Declarations of Lands Held, St Catherine’s, JA, 2/2/26, p. 147; ‘Thomas Gordon Esquire [3771]’, LBS; ‘Grace Gordon [3751]’, LBS; *Gazette of Saint Jago de la Vega*, 3 May 1781, 13 Sept. 1781. ↪

39. *He spent his life*: I have reconstructed Tom Gordon’s career and outlook from the following: minutes of the Council, May 1760, JA, 1B/5/3/16; minutes of the Council, June 1765, Dec. 1766, Dec. 1767, JA, 1B/5/3/17; minutes of the Council, JA, 1B/5/3/18, fols 2, 5b, 11b, 65b–66b, JA; journals of the Council, JA, 1B/5/4/10–12; St Catherine’s vestry minutes, 1759–1769, JA, 2/2/4–5; St Catherine’s poll tax and deficiency rolls, JA, 2/2/22; St Catherine’s list of freeholds, JA, 2/2/27, pp. 37, 59; Kingston vestry minutes, 1763–7, JA, 2/6/4, pp. 10, 27b, 31b, 71b, 108b, 145b; Kingston vestry minutes, 1768–70, JA, 2/6/5, pp. 9b, 38, 91b, 130b; Sir Archibald Grant to Thomas Gordon, 19 Dec. 1752, 17 July 1755, 31 May 1756, NRS, GD345/1161/4/65, /1163/3/102–3, /1164/3/38; Gordon to Sir Archibald Grant, 27 June 1752, 12 July 1753, 6 Jan. 1756, NRS, GD345/1162/4/7, /1162/5/28, /1164/3/38; John Gillespie to Sir Archibald Grant, 14 July 1763, NRS, GD345/1169/3/18; miscellaneous letters to Sir Archibald Grant, 1762 and 1766, NRS, GD345/1170/3 and /1171/5/75; census of St Jago de la Vega, 1754, East Sussex Record Office, SAS/RF/20/7, fol. 7r; Gordon to Rose Fuller, 28 Aug. 1755, East Sussex Record Office, SAS/RF 21/23; petition of inhabitants of St Jago de la Vega, TNA, CO 137/37, fol. 185r; Patrick Browne, *The Civil and Natural History of Jamaica* (1756), list of subscribers (unpaginated); *Journals of the Assembly of Jamaica*, 14 vols ([Kingston] Jamaica, 1811–1829), 4: 487, 528, 627–8, 650, 662–3, 672, 695, 700, 703, 714; 5: 247, 250–54, 447–49, 525, 532, 576, 599–603; 6: 112, 114, 116–17, 183; ‘The Letters of Simon Taylor of Jamaica’, ed. Betty Wood, in *Travel, Trade and Power in the Atlantic, 1765–1884*, ed. Betty Wood and Martin Lynn (2002), 49, 85, 106; *A Parcel of Ribbons*, ed. Anne M. Powers (n.p., 2012), 124, 147, 157, 160, 173. ↪

40. *attorney-general of Jamaica*: he probably had known his father’s fellow propagandist for Walpole in the late 1720s and early 1730s, Matthew Concanen, who served as Jamaica’s attorney-general from 1732 to 1743 and then returned to London while Tom was training as a barrister. See *ODNB*, s.v. ‘Concanen, Matthew (1701–1749)’; *Register of Admissions to the Honourable Society of the Middle Temple*, vol. 1, ed. H. A. C. Sturgess (1949), 327; Middle Temple, ‘Minutes

of Parliament, 1703–1747' (1970, typescript deposited at Middle Temple Archive, London), 388–9. ↩

41. *in the Caribbean*: see Roderick Cave, *Printing and the Book Trade in the West Indies* (1987); James Robertson, 'Eighteenth-Century Jamaica's Ambivalent Cosmopolitanism', *History* 99 (2014). That liberty of the press was, in general, a topic as keenly discussed in the West Indies as in Britain and North America, and that 'Cato' became a common reference there, too, is suggested, for example, by the *Barbados Gazette*, 6 Nov. 1731; *Remarks on Zenger's Tryal, Taken out of the Barbados Gazette's* ([Philadelphia], [1737]); *Antigua Gazette*, 12 Apr. 1755; *Dominica Mercury, or Free-Port Gazette*, 3 Sept. 1768; *Barbados Mercury*, 13 Oct. 1770. ↩
42. *potent political ideal*: on race and freedom of speech, see Miles Ogborn, *The Freedom of Speech: Talk and Slavery in the Anglo-Caribbean World* (2019); Jack P. Greene, 'Liberty, Slave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itish Ident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West Indies', *Slavery and Abolition* 21 (2000). ↩
43. *eloquence of Africans*: for an early example, see *A Letter from a Merchant at Jamaica [...] To which is added, A Speech Made by a Black* (1709), 29. ↩
44. '*naturally inferior*' etc.: 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 Eugene F. Miller (1987 edn), 208, 629–30 (a note added in 1753 to an essay first published in 1748). His final, 1777 edition sharpened the anti-Black contrast by leaving out a passing reference to the 'four or five' other human 'species' to whom whites were also inherently superior. Despite professing 'disgust' at how 'domestic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corrupted slave owners, Hume also repeatedly adopted the perspectives of 'our planters' – for example, that 'we [are] obliged to exercise a rigorous military government over the negroes'. See *ibid.*, 383–4, 389–90, 429, 639. For his contempt for Africans and support of slavery, see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 David Fate Norton and Mary J. Norton, 2 vols (2007), paras 2.2.8.14 and 3.2.3.10; *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 ed. J. Y. T. Greig, 2 vols (1932), 2: 113–14; *Further Letters of David Hume*, ed. Felix Waldmann (2014), 65–8. ↩
45. *Hume's assertion*: Richard H. Popkin, 'Hume's Racism', in Richard H. Popkin, *The High Road to Pyrrhonism*, ed. Richard Watson and James E. Force (1980), 251–66; Aaron Garrett and Silvia Sebastiani, 'David Hume on Race', in Naomi Zack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and Race* (2017). ↩
46. '*ingenious gentleman*': *LJ*, 21 Oct. 1721 [49]; see also minutes of ordinary meetings, 25 Oct. 1716, Royal Society Archives, London, JBO/12/86, and minutes of Council, 8 Nov. 1716, Royal Society Archives, CM0/2/268; *Gentleman's Magazine* 41 (1771); Ogborn, *Freedom of Speech*, 58–9; Vincent Carretta, 'Who Was Francis Williams?',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38 (2003); John Gilmore, s.v. 'Williams, Francis (c.1690–1762)', *ODNB*; *idem*,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Neo-Latin Tradition', in Barbara E. Goff (ed.), *Classics and Colonialism* (2005). ↩

47. *his rhetorical skill*: Gillespie to Grant, 14 July 1763, NRS, GD345/1169/3/18 (quoted: 'the ablest speaker'); minutes of the Council, 13 Dec. 1766, JA, 1B/5/3/17; *Gentleman's Magazine* 46 (1776), 37 (quoted: 'famed in wordy war'; 'eloquence [flowed] from his tongue'); 'very moving' is in all of the following: *New-York Gazette*, 11 June 1764; *Providence Gazette*, 16 June 1764; *Boston Evening-Post*, 18 June 1764; *Newport Mercury*, 18 June 1764; *New-London Gazette*, 22 June 1764; *Pennsylvania Gazette*, 28 June 1764. ↩
48. *self-confident heir*: see Thomas Gordon, *A Cordial for Low Spirits*, 3 vols (3rd edn, 1763), 1: v; 'A Manuscript by Lord Adam Gordon', ed. Keith W. Murray, *Genealogist*, new series 14 (1898), 15. ↩
49. *cornerstone of liberty*: see Jack P. Greene, *Negotiated Authorities* (1994), esp. chs 8, 14; idem, *Creating the British Atlantic* (2013), ch. 8. ↩
50. 'had not the modesty': Edward Long, *The History of Jamaica*, 3 vols (1774), 2: 478. ↩
51. 'virtue and understanding': ibid., 2: 480 (in Latin). ↩
52. *successfully petitioned*: 'A Short State of the Case of Francis Williams of the Island of Jamaica', and ancillary documents, 1731, TNA, CO 137/19, fols 29r–35v, 73r–74v, at 29r; *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 Colonial Series*, 6 vols (1910), 3: 344–5. See also Brooke N. Newman, 'Contesting "Black" Liberty and Subjecthood in the Anglophone Caribbean, 1730s–1780s', *Slavery and Abolition* 32 (2011). I am writing a biography of Williams. ↩
53. 'petition of negro slaves': James Robertson, 'A 1748 "Petition of Negro Slaves" and the Local Politics of Slavery in Jamaic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7 (2000). ↩
54. 'sweets of liberty' etc.: John Fielding, *Extracts from Such of the Penal Laws* (1762), 143–4. See also Ogborn, *Freedom of Speech*, 175. ↩
55. 'which locked her mouth': Olaudah Equiano,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and Other Writings*, ed. Vincent Carretta (1995), 63. ↩
56. 'shit' etc.: quoted in Burnard, *Mastery, Tyranny, and Desire*, 260–61. ↩
57. *major plots*: dates compiled from Michael Craton, *Testing the Chains* (1982), and Vincent Brown, *Tacky's Revolt* (2020). ↩
58. *Akan proverb*: Ogborn, *Freedom of Speech*, 41. ↩
59. *slave talk*: Craton, *Testing the Chains*; Ogborn, *Freedom of Speech*; Brown, *Tacky's Revolt*. ↩
60. *imbalances of power*: for the doubled erasure of enslaved female voices in the surviving records, see esp. Saidiya Hartman, 'Venus in Two Acts', *Small Axe* 26 (2008); Marisa J. Fuentes, *Dispossessed Lives* (2016). ↩
61. *Equiano's words*: Equiano, *Interesting Narrative*, 94, 158–9; Vincent Carretta, *Equiano, the African* (2005); John Bugg, 'The Other Interesting Narrative', *PMLA* 121 (2006). ↩

62. *gain more agency*: see e.g. Brown, *Tacky's Revolt*, 211; Philip D. Morgan, *Slave Counterpoint* (1998), esp. 313, 464, 560–80. ↪
63. *spoke out defiantly*: Ogborn, *Freedom of Speech*, 91–108; Brown, *Tacky's Revolt*, 106–7, 111, 145, 155–6, 220, 242. ↪
64. *forge passes for runaway slaves*: 'Confession of Scyrus a negro', 1733, TNA, CO 137/20, fol. 179r–v; [John Lindsay], 'A Few Conjectural Considerations Upon the Creation of the Humane Race', 1788, BL, Add. MS 12439, fol. 196v. ↪
65. [footnote] '*Slavery*' etc.: *Boston Gazette*, 23 Aug. 1773; David Waldstreicher, *The Odyssey of Phillis Wheatley* (2023), 199–200. ↪
66. *destabilized white efforts*: cf. Laurent Dubois, 'An Enslaved Enlightenment', *Social History* 31 (2006); Brown, *Tacky's Revolt*; Ogborn, *Freedom of Speech*, ch. 5. ↪
67. *American popularity of Cato's Letters*: see e.g. Elizabeth Christine Cook, *Literary Influences in Colonial Newspapers, 1704–1750* (1912), esp. 81–3, 89–90, 106, 113, 125–6, 129, 137, 257, 263; Clinton Rossiter, *Seedtime of the Republic* (1953), 141–2, 145–7, 298–300, 357, 492 n. 120; *The English Libertarian Heritage*, ed. David L. Jacobson (1965), xlviii–lx;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92), esp. 35–7, 44–4, 52–3, 57–62, 86, 132–3; Chad Reid, "'Widely Read by American Patriots'", in Mark L. Kamrath and Sharon M. Harris (eds), *Periodical Litera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2005); Heather E. Barry, *A 'Dress Rehearsal' for Revolution* (2007). ↪
68. *Benjamin Franklin: New-England Courant*, 11 Sept. 1721; 9 and 16 July 1722; J. A. Leo Lemay, *The Life of Benjamin Franklin*, 3 vols (2006–9), 1: 85, 111, 150, 155, 158–65, 188, 453. ↪
69. *Andrew Bradford*: e.g. *American Weekly Mercury*, 26 Feb. 1723; 12 Mar., 4 and 25 Apr. 1734; 6 Nov. 1740. ↪
70. *New-York Weekly Journal*: as Cosby himself noted of the 'weekly ... false and scandalous libels printed in Zengers Journal', 'there is nothing more common with writers of seditious libels than for them to tell the world they speak the sentiments of the people': *Documents Relative to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York*, ed. E. B. O'Callaghan, 15 vols (Albany, 1853–87), 6: 4–7. ↪
71. *foundational moment*: James Alexander, *A Brief Narrative of the Case and Trial of John Peter Zenger* [1736], ed. Stanley Nider Katz (1963); *Freedom of the Press from Zenger to Jefferson*, ed. Leonard W. Levy (1966); see also Jill Lepore, *New York Burning* (2005). ↪
72. *not original*: Karl Tilman Winkler, *Wörterkrieg: Politische Debattenkultur in England, 1689–1750* (1998), ch. 11; Simon Robertson Varey, 'The Craftsman, 1726–1752'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hD thesis, 1976); Alison Olson, 'The Zenger Case Revisited', *American Literature* 35 (2000), esp. 231–2. ↪
73. *gained much more sway*: *New-York Gazette*, 4 Feb. 1733/4; *New-York Weekly Journal*, 11 Feb. 1733/4; see also *American Weekly Mercury*, 4 Nov. 1734. ↪
74. '*colonies and plantations*' etc.: *New-York Weekly Journal*, 12–19 Nov. 1733. ↪

75. *republished Trenchard and Gordon's columns: New-York Weekly Journal*, 11 Feb.–4 Mar. 1734; see also *New-York Weekly Journal*, 7–14 Jan., 15 Apr. 1734. ↪
76. *reran Cato's defence of free speech: New-York Weekly Journal*, 11 Nov.–9 Dec. 1734; see also *New-York Weekly Journal*, 30 Dec. 1734, 27 Jan. 1735, 19 Dec. 1737–17 Jan. 1738. ↪
77. 'This is a state of slavery': Alexander, *Brief Narrative*, 143. ↪
78. *bolstered colonial press freedom*: Olson, 'Zenger Case Revisited'; Amy Watson, 'The New York Patriot Movement'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77 (2020). ↪
79. 'Every man who prefers': Alexander, *Brief Narrative*, 99. ↪
80. *Alongside its constant appeals*: see e.g. *New-York Weekly Journal*, 31 Dec. 1733–14 Jan. 1734; 28 Jan., 15 Apr., 22 July, 5–14 Oct. 1734; 27 Jan.–10 Feb., 28 Apr.–26 May 1735. ↪
81. *owned and traded slaves*: see e.g. *South-Carolina Gazette*, 14 June 1740; Isaiah Thomas,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in America*, 2 vols (2nd edn, 1874), 1: xxv, 63, 99, 101, 130, 133, 163, 343–4; 2:48; Lepore, *New York Burning*, 72; Cave, *Printing and the Book Trade in the West Indies*, 31–3; Hennig Cohen, *The South-Carolina Gazette, 1732–1775* (1953), 6; David Waldstreicher, *Runaway America* (2004). ↪
82. *publicly burned: New-York Weekly Journal*, 2 Dec. 1734. ↪
83. *Alexander ... Morris: New-York Weekly Journal*, 13 Feb. 1737/8 (quoted: 'the pampered insolence'); *ODNB*, s.v. 'Alexander, James (1691–1756)', 'Morris, Lewis (1671–1746)'; Eugene R. Sheridan, *Lewis Morris, 1671–1746* (1988), ch. 1 (quoted: 'devoted reader', 'Negroes'); Paul David Nelson, *William Alexander, Lord Stirling* (1987), 11–12. Their great friend and patron Robert Hunter was the governor of Jamaica who oversaw its 1730 Act degrading the rights of Francis Williams and other free Blacks. For the historiography, see esp. 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1975), 3–6; see also Lepore, *New York Burning*, xii, xx. ↪
84. *Dobrée*: I have reconstructed Dobrée's trajectory in England from the following: Tower Ward Land Tax assessments 1722–5, TLA, CLC/525/MS11316/071, p. 52, /074, p. 50, /077, p. 53, /080, p. 49; baptism of Mary, daughter of Elisha Dobrée and Elizabeth, St Olave Hart Street, 16 September 1722, TLA, P69/OLA1/A/003/MS17818; baptism of James, son of Elisha Dobrée and Elizabeth, St Botolph without Aldgate, 25 Jan. 1729, TLA, P69/BOT2/A/008/MS09225/003; baptism of Susannah, daughter of Elisha Dobrée and Elizabeth, 7 June 1732, TLA, P69/MIC1/A/003/MS06988/01; Dobrée to Charles Delafay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with enclosures, 27–28 June 1723, TNA, SP 43/66; commission of bankruptcy against Elisha Dobrée, 30 July 1725, TNA, SP B4/5, 23; petition of Elisha Dobrée, TNA, SP 36/155/1/122A–123; *Whitehall Evening-Post*, 1 Dec. 1724; *London Gazette*, 7 Aug. 1724, 21 Aug. 1724, 30 Nov. 1725;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33 (1726), 431; Dobrée to Benjamin Martyn, 9 July 1735, TNA, CO 5/637, fol. 177 (quoted: 'since my infancy'). ↪

85. *his extended family*: will of Michael Henry Pascal, proved 8 May 1786, TNA, PROB 11/1142/88; 'Bonamy Dobrée', LBS; 'Harry Hankey Dobrée', LBS; Voyage ID 77536, *Slave Voyages* (slavevoyages.org); Equiano, *Interesting Narrative*, 68–9, 91, 105, 255 n. 145, 270 n. 304; Doug Ford, 'A Respectable Trade or Against Human Dignity?', *Heritage Magazine* [Jersey] (2006), 7. Another branch of the family was based in Nantes, the French slaving capital: see Robert Stein,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Nantes Slave Trade, 1783–179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1975). ↪
86. *made for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my account of Dobrée in South Carolina and Georgia is based primarily on the following: Georgia correspondence of the Board of Trade, 1734–46, TNA, CO 5/636–41; correspondence of the Trustees for Georgia 1732–40, TNA, CO 5/666–67; Georgia land grants, instructions, petitions, etc., 1732–52, TNA, CO 5/670–71; journal of the Trustees for Georgia, 1737–45, TNA, CO 5/687; minutes of the Council of the Trustees for Georgia, 1732–6, TNA, CO 5/689; Earl of Egmont papers, Hargrett Library,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MS 746; transcripts of the Earl of Egmont papers, Hargrett Library, MS 1786; *Colonial Records of the State of Georgia, 1732–1784*, ed. Allen D. Candler et al., 39 vols (1904–1989); Royal Commission on Historical Manuscripts, *Manuscripts of the Earl of Egmont: Diary of Viscount Percival afterwards first Earl of Egmont*, 3 vols (1920–1923); [Thomas Stephen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Causes that have Retarded the Progress of the Colony of Georgia* (1743), 59; Francis Moore, *Travels into the Inland Parts of Africa* (1738); Francis Moore, *A Voyage to Georgia Begun in the Year 1735* (1744);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vol. 18: *Journals and Diaries (1735–38)*, ed. W. Reginald Ward and Richard P. Heitzenrater (1988), 361, 408, 448;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vol. 25: *Letters (1721–39)*, ed. Frank Baker (1980), 452–4. ↪
87. *Things did not go well*: Messrs Beale and Cooper to Dobrée, 9 Nov. 1734, TNA, CO 5/636, fol. 57; Patrick Houston to Peter Gordon (1 Mar. 1735), and Gordon to Trustees (7 May 1735), TNA, CO 5/637, fols 11r–v, 18r; minutes of the Council of the Trustees for Georgia, 10 May 1735, TNA, CO 5/689, 176; 'A List of Persons Who Went from Europe to Georgia', Hargrett Library, MS 4132 (printed as *A List of the Early Settlers of Georgia*, ed. E. Melton Coulter and Albert Saye (1949)), entries for Dobrée and his seven servants; *South-Carolina Gazette*, 27 July 1734. ↪
88. *'I ... came into'*: Dobrée to Richard Peters, 28 Sept. 1741, Pennsylvania State Archives. ↪
89. *'journal of events'*: Dobrée to Trustees, 13 Feb. and 28 Mar. 1735, TNA, CO 5/636, fols 201v, 300r. ↪
90. *'penman'* etc.: Dobrée to Benjamin Martyn, 9 July 1735, TNA, CO 5/637, fols 177–8. ↪
91. *'freedom in writing'*: for Dobrée's invocations of scribal freedom, see TNA, CO 5/636, fols 33, 106, 164, 190v, 300, and TNA, CO 5/637, fols 174, 177. ↪

92. *South Carolina's laws*: quoting extracts printed in *South-Carolina Gazette*, 4 May 1734, while Dobrée was in Charleston; and see *The Statutes at Large of South Carolina*, ed. Thomas Cooper and David J. McCord, 10 vols (Columbia, SC, 1836–41), 7: 343–427; Philip D. Morgan, 'Black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arleston',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NS 1 (1984). ↪
93. 'rights', 'privileges' etc.: Andrew C. Lannen, 'Liberty and Slavery in Colonial America: The Case of Georgia, 1732–1770', *Historian* 79 (2017), 39–40, 47. ↪
94. *everywhere in Georgia*: Betty Wood, *Slavery in Colonial Georgia, 1730–1775* (1984); Brown, *Moral Capital*, 78–87; Noeleen McIlvenna, *The Short Life of Free Georgia* (2015); Anthony F. Moffett, 'Runaway Slaves and the Making of Georgia' (University of Florida PhD thesis, 2015), ch. 3. ↪
95. 'liberty of getting Negroes': quoted in Wood, *Slavery in Colonial Georgia*, 18. ↪
96. *business with slavers*: on Dobrée and slavery, see Dobrée to Trustees, 27 Jan., 6 Feb. 1735, [Feb.?] 1737, TNA, CO 5/636, fols 165, 190v, and TNA, CO 5/639, fols 178–9. ↪
97. 'whimsical': *Manuscripts of the Earl of Egmont*, 2: 379; see also Harman Verelst to Dobrée, 19 Apr. 1737, TNA, CO 5/667, fol. 14v. Eliza Dobrée, born Elizabeth Lowther, who single-handedly maintained herself and their three children, may have been the 'Eliz[abe]th Dupre', aged seventy-eight, interred at Union Street Independent burial ground in Southwark on 22 July 1783 (register of burials, 1773–87, TNA, RG 4/4358). ↪
98. 'the great damage' etc.: Dobrée to Trustees, 15 Jan. 1735, TNA, CO 5/636, fol. 106r–v; see also 28 Mar. 1735, TNA, CO 5/636, fol. 300v; *South-Carolina Gazette*, 27 July 1734. ↪
99. *He was right*: Benjamin Martyn to Bailiffs and Recorder of Savannah, 28 Oct. 1734, TNA, CO 5/666, fol. 38v; Cohen, *South-Carolina Gazette*, 10–11; Jeffery A. Smith, 'Impartiality and Revolutionary Ideology',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49 (1983). ↪
100. *précis of Cato*: *South-Carolina Gazette*, 2 Feb. 1734 (approvingly reprinted by James Alexander in *New-York Weekly Journal*, 4 Mar. 1734). ↪
101. *the Gazette's columns*: *South-Carolina Gazette*, 27 July 1734; 18 Jan. 1735 (quoted: 'Negro man, named Cato'); 12 June 1736 (quoted: 'the right of every man' etc.); 14 and 21 Aug. 1736; 16 July 1748. ↪
102. *Affy Crawford*: will and probate of Affy Crawford, 1750, J0038-92, subseries 2, no. 511; will and probate of Hugh Crawford, 1745–49, J0038-92, subseries 2, no. 592, New York State Archives, Albany; *Minutes of the Common Council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675–1776*, 8 vols (1905), 5: 2, 45, 141, 143, 189, 194; *New York Genealogical and Biographical Record* 72, no. 4 (1941): 292–3, and 75, no. 1 (1944): 19. ↪
103. *bloodiest racial episode*: see Lepore, *New York Burning*. ↪
104. 'great deal of craft': [Daniel Horsmanden], *A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in the Detection of the Conspiracy* (1744), iii. ↪

105. *'for a long time argued with'* etc.: *ibid.*, 32. ↪
106. *white justice*: Lepore, *New York Burning*, esp. 163–5, 168, 173–5, 188–9. ↪
107. *slave trials*: *ibid.*, 79–83, 121, 165–6, 200, 212. Lepore's misinterpretation of Alexander's attitudes is corrected in Brendan McConville, 'Of Slavery and Sources',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34 (2006), and proved by James and William Alexander Papers, New Jersey Historical Society, Newark, MG 70, box 3, esp. 71–2 [pencilled pagination]. ↪
108. *he met intermittently with Dobrée*: Lawrence Smyth to Alexander, 10 Mar. 1742,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MS 8; Small Scrapbook,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MS 531, items 75, 76, 80, 82, 83, 96, 98; General Board of Proprietors of the Eastern Division of New Jersey: deed books of exemplified copies (scribed by Dobrée), New Jersey State Archives, Trenton, PEASJ002, vols 1–10; Alexander Papers, New Jersey Historical Society, MG 70, box 3; James Alexander Pap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0024, boxes 3–4; *The Minutes of the Board of Proprietors of the Eastern Division of New Jersey*, 4 vols (1949–85). ↪
109. *what had happened in Stono*: Peter H. Wood, *Black Majority* (1974), ch. 12; John K. Thornton, 'African Dimensions of the Stono Rebell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 (1991); *Stono*, ed. Mark M. Smith (2005); Peter Charles Hoffer, *Cry Liberty* (2010); Lepore, *New York Burning*, 53, 163; Jane Landers, *Black Society in Spanish Florida* (1999), chs 1–2. See also Oglethorpe to Trustees, 28 May 1742, TNA, CO 5/641, fol. 145. ↪
110. *Other contemporary accounts*: *Stono*, ed. Smith, 8; *Boston Weekly News-Letter*, 8 Nov. 1739; *Pennsylvania Gazette*, 8 Nov. 1739. ↪
111. *document penned by Elisha Dobrée*: 'An Account of the Negroe Insurrection in South Carolina', TNA, CO 5/640, fols 392–6, printed in (and previously known to historians only via) *Colonial Records of the State of Georgia*, 22: 232–6. It was enclosed in a letter (also scribed by Dobrée) of 9 Oct. 1739 from James Oglethorpe to Harman Verelst, accountant of Georgia's Trustees. Verelst received it on 13 Mar. 1740; it was printed in the following: the *London Daily Post*, 17 Mar. 1740; *Weekly Miscellany*, 22 Mar. 1740, *London Magazine* 9 (1740), 151–2; *Gentleman's Magazine* 10 (1740), 127–9. ↪
112.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papers*: Newman, *Freedom Seekers* (2022). ↪
113. *'Though he is my property'*: *South-Carolina Gazette*, 7–28 Nov. 1775. See also Waldstreicher, *Runaway America*, esp. ch. 1; Betty Wood, "High Notions of Their Liberty", in Philip Morgan (ed.), *African American Life in the Georgia Lowcountry* (2010). ↪
114. *'Servitude mars all genius'*: *LJ*, 3 Mar. 1721 [68]; see also *LJ*, 31 Mar. 1722 [70]. ↪
115. *'wrote passes for slaves'*: quoted in *Stono*, ed. Smith, 55–6; David Ramsay, *The History of South Carolina*, 2 vols (Charleston, 1809), 1: 110–13, also records 'their black captain, named Cato'. ↪
116. *'a sensible cunning fellow'*: *New-York Gazette*, 7–21 July 1729. ↪

117. *Yaff*: Yaff was born in America around 1694, apparently to a mother enslaved by Richard Ingoldsby, the governor of New York in 1691–2 and 1709–10, who died in 1719. He was subsequently made the butler and valet of a wealthy Philadelphia merchant and slave trader, William Trent, who had recently moved to New Jersey (where he established Trent-town, i.e. Trenton, now the state capital). After Trent's death in December 1724, Yaff was acquired by Alexander, one of Trent's executors, at some point after April 1726. See Lepore, *New York Burning*, 287 n. 39; and the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about Trent and Yaff at the Trent House Association website, williamtrenthouse.org. For countless other similar examples, see Waldstreicher, 'Reading the Runaways'; '*Pretends to Be Free*': *Runaway Slave Advertisements from Colonial and Revolutionary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ed. Graham Russell and Alan Edward Brown, rev. edn (2019); for a Jamaican instance, see *Daily Advertiser* [Kingston, Jamaica], 12–15 Jan. 1791. ↵

5. ENLIGHTENED EXPERIMENTS

1. '*the great advantages*' etc.: printed in Juha Mustonen (ed.), *The World's First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6), 8. ↵
2. *it must have influenced them*: Henrik Horstbøll, Ulrik Langen and Frederik Stjernfelt, *Grov Konfækt: tre vilde år med trykkefrihed 1770–73*, 2 vols (2020), 1: 465. ↵
3. '*We have decided*' etc.: *Kabinetsstyrelsen i Danmark, 1768–1772*, ed. Holger Hansen, 3 vols (1916–23), 1: 46–7; see also 1: 288 (explicitly extending print freedom to newspapers). ↵
4. *Swedish law*: Juha Manninen, 'Anders Chydenius', in Mustonen (ed.), *World's First*, 22. ↵
5. *Danish and Norwegian codes*: *The Danish Laws* (1756), 466–9; Norwegian code of 1687, bk 6, available at hf.uio.no/iakh/tjenester/kunnskap/samlinger/tingbok/lover-reskripter/chr5web/chr5register.html. ↵
6. *staged verbal disputations*: Debora Shuger, 'St. Mary the Virgin and the Birth of the Public Spher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72 (2009). ↵
7. *republic of letters*: see e.g. Françoise Waquet, 'Qu'est ce qu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147 (1989); Hans Bots and Françoise Waquet,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1997). ↵
8. '*is an extremely free state*' etc.: Pierre Bayle,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Rotterdam, 1697), note to 'Catius'. ↵
9. '*absolutely necessary*' etc.: Baruch Spinoza,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1670), ch. 20. I disagree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Spinoza as especially radical on this point that has been advanced by Jonathan I. Israel in his *Radical Enlightenment* (2001), 117, 270 and *passim*, and *Enlightenment Contested* (2006), 155–63. ↵

10. *'must at all times'* etc.: Immanuel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1784), in *What is Enlightenment?*, ed. and trans. James Schmidt (1996), 59, 60, 63. ↪
11. *could still be banned*: the literature on the varieties of censorship is immense.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ch. 5, surveys the main variations, trends and loopholes. ↪
12. *obtain an official permit*: Hannah Marcus, *Forbidden Knowledge* (2020), esp. ch. 5. ↪
13. *Italy's various states*: [Gabriel François Coyer], *Voyages d'Italie et de Hollande*, 2 vols (Paris, 1775), 2: 190–91; Edoardo Tortarolo, *The Invention of Free Press* (2016), ch. 5. ↪
14. *ever more accessible*: see e.g. Hans Erich Bödeker, 'Journals and Public Opinion', in Eckhart Hellmuth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1990);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ch. 7. ↪
15. *'we believe'*: Denis Diderot and Jean le Rond d'Alembert, *Encyclopédie*, vol. 3 (Paris, 1753), xi. ↪
16. *liberation from censorship*: Adrian Johns, *The Nature of the Book* (1998), 374–5, 378–9; Henrik Horstbøll, 'Anybody May Write Anything', in John T. Lauridsen and Margit Mogensen (eds) *Copenhagen: Gateway to Europe* (1996), 35. ↪
17. *truth was being stifled*: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Memoirs of the Year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trans. W. Hooper, 2 vols (1772), 1: epistle dedicatory. ↪
18. *'awakening Europe'*: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12 vols (Amsterdam, 1781–8), 4: 258–9, trans. and quoted in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1996), 229. ↪
19. *'pure lights of reason'*: [Mercier], *Memoirs of the Year*, 1: 2. ↪
20. *utopian year*: *ibid.*, 1: ch. 11 and 2: ch. 2. (Mercier's original text was set in 2440;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changed this to the year 2500.) ↪
21. *'nothing leads the mind'*: *ibid.*, 2: 2. ↪
22. *'the true measure'*: *ibid.*, 1: 60. ↪
23. *'very few absurdities'*: *ibid.*, 1: 62. ↪
24. *'opinion of the public'* etc.: *ibid.*, 1: 58–60; cf. Darnton, *Forbidden Best-Sellers*, ch. 4 and 226–31. ↪
25. *'common good'* etc.: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trans. Maurice Cranston (2006), bk 4, ch. 1. See also [Paul Henry Thiry, Baron d'Holbach], *La Politique naturelle*, 2 vols (1773), 2: 78–88; William Godwin, *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2 vols (1793), esp. bk 6, ch. 6, and bk 8, ch. 8;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From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Jesús Astigarraga (ed.), *The Spanish Enlightenment Revisited* (2015). ↪
26. *struggles with censors*: on Rousseau and censorship, see Raymond Birn, 'Book Censorship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Rousseau's Response',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005); Helena Rosenblatt, 'Rousseau,

- Constant,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Notion of Free Speech', in Elizabeth Powers (ed.), *Freedom of Speech: The History of an Idea* (2011), 140–45; Tortarolo, *Invention*, 87–94. ↪
27. 'fourth estat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ed.com](https://www.oed.com)), s.v. 'estate', 7b: 'the fourth estate'. ↪
28. *Anglophone conservatives*: see Hellmuth (ed.), *Transformation*, ch. 19; see also Chapter 7 of this book. ↪
29. 'previous restraints':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4 vols (Oxford, 1765–69), 4: 151. Cf. *Encyclopédie*, vol. 13 (1765), 320. ↪
30. 'freedom of the press' etc.: Tortarolo, *Invention*, 137–41 (quoting 141). ↪
31. 'Books can do good' etc.: Carlo Antonio Pilati, *On Reforming Italy* (1767), 220–21. ↪
32. *official censors*: Alcesti Tarchetti, 'Paulo Frisi ... il censore censurato', in Gennaro Barbarisi (ed.), *Ideologia e scienza nell'opera di Paolo Frisi* (1987); Ugo Baldini, 'Frisi, Paolo', in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50 (1998); Robert Darnton, *Censors at Work* (2014), pt 1; Ritchie Robertson, *The Enlightenment* (2020), 389–95. ↪
33. *appealed to rulers*: see e.g. K. A. Papmehl,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 (1971); *Der Josephinismus*, ed. Harm Klueting (1995), 130, 215–18; Tortarolo, *Invention*, 141–5. ↪
34. 'is established in England': [Voltaire], *L'A, B, C: Dialogue Curieux* ('London, 1762' [i.e. Geneva, 1768]), 88; see also Karl Friedrich Bahrdt,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its Limits* (Züllichau, 1787), 137–8, in *Early French and German Defenses of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ed. and trans. John Christian Laursen and John van der Zande (2003); Jean-Pierre Lavandier, *Le Livre au temps de Joseph II et de Léopold II* (1995), esp. 37–45. Cf. Richard Butterwick, *Poland's Last King and English Culture* (1998); Nicholas Cronk, 'Voltaire and the Uses of Censorship', in E. Joe Johnson and Byron R. Wells (eds), *An American Voltaire* (2009). ↪
35. *Frederick the Great*: Tortarolo, *Invention*, 144–54. ↪
36. 'Nothing surprised me more': quoted in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2006), 256–7. ↪
37. 'Don't speak' etc.: Lessing to Friedrich Nicolai, 28 Aug. 1769, in Lessing, *Werke und Briefe*, ed. Wilfried Barner et al., 12 vols (1985–2003), 11: letter 501. Cf. *Edict wegen der wiederhergestellten Censur* (Magdeburg, 1749); Ernst Ferdinand Klein, 'On Freedom of Thought and the Press' (1784), trans. John Christian Laursen, in *What is Enlightenment?*, ed. James Schmidt (1996). ↪
38. *slower to develop*: cf. Bödeker, 'Journals and Public Opinion'. ↪
39. *Christian Wolff*: Eckhart Hellmuth, 'Zur Diskussion um Presse-und Meinungsfreiheit', in Günter Birtsch (ed.), *Grund-und Freiheitsrechte im Wandel von Gesellschaft und Geschichte* (1981), 210–11. For similar views elsewhere, see Arlette Farge, *Subversive Words*, trans. Rosemary Morris (1994), 2; Ann

- Thomson, 'Defending the Truth', in Robert G. Ingram et al. (eds), *Freedom of Speech, 1500–1850* (2020). ↪
40. *later German theorists*: more liberal German visions of press freedom were put forward in the 1780s, for example by the publisher Friedrich Nicolai, the philosopher Moses Mendelssohn, the scholar and statesman Wilhelm von Dohm and the journalist Wilhelm Ludwig Wekhrlin: see Eckhart Hellmuth, 'Enlightenment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History* 83 (1998), 429–30, 437; idem, 'Zur Diskussion', 215; Edoardo Tortarolo, 'Censorship and the Conception of the Public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in Dario Castiglione and Lesley Sharpe (eds), *Shifting the Boundaries* (1995), 141–2; *Early French and German Defenses*, ed. and trans. Laursen and van der Zande, 94–8. ↪
 41. 'human right' etc.: Bahrdt, *On Freedom*, 165. Cf. [Mathew Tindal], *Beweis daß das Christenthum so alt als die Welt sey* [trans. Johann Lorenz Schmidt] (Frankfurt and Leipzig, 1741), 8–103 (Schmidt's preface). ↪
 42. 'it must not transcend': Immanuel Kant, 'On the Common Saying: "This May be True in Theory, But it Does not Apply in Practice"', trans. H. B. Nisbet, in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ed. Hans Reiss (1970), 85. Elsewhere, Kant presumes that the ideal is 'a constitution allowing the *greatest possible human freedom*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which ensure *that the freedom of each can coexist with the freedom of all the others*': Reiss, 'Introduction', *ibid.*, 23. See also Peter Niesen, *Kants Theorie der Redefreiheit* (2008). ↪
 43. *Johann Gottlieb Fichte*: [J. G. Fichte], *Zurückforderung der Denkfreiheit* [Danzig, 1793]; Anthony J. La Vopa, 'The Revelatory Moment: Ficht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2 (1989), esp. 149–53; Anthony J. La Vopa, *Fichte* (2001), 92–4 and *passim*; Diethelm Klippel, 'The True Concept of Liberty', in Hellmuth (ed.), *Transformation*. ↪
 44. *trickle-down theory*: Horst Möller, 'Enlightened Societies', in Hellmuth (ed.), *Transformation*, 229–33; Sebastián, 'From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229. Sophia Rosenfeld, 'Writing the History of Censorship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n Daniel Gordon (ed.),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2001), brilliantly situates late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disputes over freedom of expression within a wider universe of intellectual concerns about the abuses and politics of language. ↪
 45. 'the gross ignorance':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2 vols (1776), 2: 373. ↪
 46. 'Learning to read' etc.: Heinrich Friedrich Diez, *Apologie der Duldung u. Preßfreiheit* (n.p., 1781), 42. ↪
 47. *Johann Friedrich Struensee*: for this and the following four paragraphs in this chapter, see [Balthasar] Münter, *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Conversion and Death of Count Struensee* [trans. G. F. A. Wendeborn] (1773); *Luxdorphiana, eller Bidrag til den danske Literairhistorie*, ed. Rasmus Nyerup (Copenhagen, 1791), 4–21; Jens Kragh Höst, *Der dänische Geheimcabinetsminister Graf Johann Friedrich Struensee* 2 vols (1826–7); [Georg] Hille, 'Struensee's literarische

Thätigkeit', *Zeitschrift der Gessellschaft für Schleswig-Holstein-Lauenburgische Geschichte* 16 (1886), 275–99; Stefan Winkle, *Struensee und die Publizistik* (1982); idem, *Johann Friedrich Struensee* (1983); idem, *Die heimlichen Spinozisten in Altona und der Spinozastreit* (1988); Matthias Reiber, *Anatomie eines Bestsellers: Johann August Unzers Wochenschrift "Der Arzt" (1759–1764)* (1999), esp. 135–47, 225–9; Johan Schioldann, "'Struensée's Memoir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King' (1772): Christian VII of Denmark', *History of Psychiatry* 24 (2013); Rita Wöbkemeier, 'Johann Friedrich Struensee (1737–1772) als Arzt und Mediziner', in Irmtraut Sahmland and Hans-Jürgen Schrader (eds), *Medizin- und kulturgeschichtliche Konnexe des Pietismus* (2016); Horstbøll et al., *Grov Konfækt*, ch. 23. ↩

48. 'harmful or beneficial' etc.: quoting a now lost 1760 essay: see Winkle, *Struensee und die Publizistik*, 87 n. 187. ↩
49. in 1769: cf. Lessing's intriguing reference in the letter from Hamburg in August 1769 quoted above, to voices being raised in Denmark against despotism and exploitation. ↩
50. eighteen hundred decrees: see *Kabinetsstyrelsen i Danmark, 1768–1772*, ed. Holger Hansen, 3 vols (1916–23); Winkle, *Johann Friedrich Struensee*, 201–31. ↩
51. *Jens Schelderup Sneedorff and P. F. Suhm*: see Horstbøll et al., *Grov Konfækt*, 1: 466–9. ↩
52. '3. Another order': *Kabinetsstyrelsen*, ed. Hansen, 1: 46; Horstbøll et al., *Grov Konfækt*, 1: 13–15. ↩
53. culmination of decades: cf. Anders Burius, *Ömhet om friheten* (1984), chs 8–9. ↩
54. rubber stamp: Michael Roberts, *The Age of Liberty: Sweden, 1719–1772* (1986), 62. ↩
55. censorship: Burius, *Ömhet om friheten*, chs 2–7, is the most detailed account, though I have relied mainly on English-language summaries: Ann Öhrberg, "'A Threat to Civic Coexistence'", in C. Appel and M. Fink-Jensen (eds), *Religious Reading in the Lutheran North* (2010); Rolf Nygren,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ct of 1766 in Its Historical and Legal Context', in Kristina Örtenhed and Bertil Wennberg (eds), *Press Freedom 250 Years* (2018). ↩
56. 'ignorance is better' etc.: quoted in Roberts, *Age of Liberty*, 69, 105. ↩
57. Count Carl Gyllenborg: *Svenskt biografiskt lexikon*, 'Gyllenborg, Carl'; Jonathan Swift, *To the Count de Gyllenborg* [1719], ed. Hermann J. Real (2013). ↩
58. spirited discussion: Thomas von Vegesack, 'Background', in Peter Forsskål, *Thoughts on Civil Liberty*, ed. David Goldberg et al. (2009), 29–31; Burius, *Ömhet om friheten*, 214–15. ↩
59. 'That every citizen': *Sveriges ridderskaps och adels riksdags-protokoll: från och med år 1719*, 28 vols (Stockholm, 1875–1964), vol. 11, appendix B, no. 20; see also 11: 348–9, 363 (11–12 Apr. 1739). ↩

60. *Anders Bachmanson: Borgarståndets riksdagsprotokoll från frihetstidens början*, ed. Nils Staf, 8 vols (1945–82), 3: 199–201 (11–15 Mar. 1727); Burius, *Ömhet om friheten*, 231–7; Lars Herlitz, 'Det civila samhället och Sveriges underutveckling', *Scandia* 57 (1991), 284, 318 nn. 6–9, 322 n. 64. ↪
61. 'against the will': Andreas Bachmanson, *Arcana oeconomiae et commercii* (Stockholm, 1730), 132, [364]. ↪
62. *suppressed book of 1734*: Riksarkivet, Stockholm, Börstorpsamlingen vol. 62, E 3003 (unpaginated). The other texts were extracts from Eustace Budgell, *A Letter to Cleomenes* (1731), and selections from *The Craftsman*. ↪
63. *government banned*: Marie-Christine Skuncke, 'Press Freedom in the Riksdag 1760–62 and 1765–66', in Örtenhed and Wennberg, *Press Freedom*, 112; 'Johan Ihre', *Svenskt biografiskt lexicon*. ↪
64. 'should otherwise': Henrik Lagerlund, 'The Reception of David Hume's Philosophy in Sweden', in Peter Jones (ed.), *The Reception of David Hume in Europe* (2013), 225. ↪
65. 'to let authors write': Ludvig Holberg, *Epistler, Tom. IV* (Copenhagen, 1749), 338 (= Epistola CCCXCV). ↪
66. *Christian König*: Pentti Virrankoski, *Anders Chydenius: demokraattinen poliitikko valituksien vuosisadalta* (1986), 185; E. P. Hutchinson, 'Swedish Population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opulation Studies* 13 (1959). ↪
67. *weekly newspaper*: Roberts, *Age of Liberty*, 152; Virrankoski, *Anders Chydenius*, 185–6; Burius, *Ömhet om friheten*, 237–9. ↪
68. *Niclas von Oelreich*: Burius, *Ömhet om friheten*. ↪
69. 'Free peoples': quoted in Jonas Nordin, 'From Seemly Subjects to Enlightened Citizens', in Örtenhed and Wennberg (eds), *Press Freedom*, 28. ↪
70. *Nordencrantz*: *Til riksens höglofl. ständer församlade vid riksdagen år 1760* (1759), esp. 618–70; *Oförgripelige gentankar, om frihet i bruk, af förnuft, pennor och tryck* (1761); Lars Magnusson, 'Anders Nordencrantz', in Örtenhed and Wennberg (eds), *Press Freedom*; Skuncke, 'Press Freedom', 113–14; Burius, *Ömhet om Friheten*, 240ff. ↪
71. *Peter Forsskål*: Petrus Forsskål, *Dubia de principiis philosophiae recentioris* (Göttingen, 1756); *Neueste Geschichte der Gelehrsamkeit in Schweden* 4 (1759), 549–76; Forsskål, *Dubia* (revised edn [Copenhagen, 1760]); Archives of the Linnean Society, London: Letter from Forsskål in Alexandria to Linnaeus in Uppsala, 20 Oct. 1761 (L2976); Ere Nokkala, 'Peter Forsskål', in Örtenhed and Wennberg (eds), *Press Freedom*. ↪
72. 'that Swedish liberty': Johann David Michaelis, *Lebensbeschreibung* (Leipzig, 1793), 64–6. ↪
73. 'If only': *Neueste Geschichte*, 553. ↪
74. *he even helped him*: Rietje van Vliet, *Elie Luzac (1721–1796): Boekverkoper van de Verlichting* (2005), 109, 137–76 (Luzac and Michaelis later fell out). ↪

75. *central figure*: for Luzac's pamphlet and career, see Elie Luzac, *Het gedrag der stadhouders-gezinden, verdedigt* (1754); van Vliet, *Luzac*, chs 1, 2, 5. ↪
76. *L'Homme machine*: for this and the following two paragraphs in this chapter, see [Elie Luzac], *Essai sur la liberté de produire ses sentimens* ([Amsterdam?], 1749); Wyger R. E. Velema, *Enlightenment and Conservatism in the Dutch Republic* (1993), esp. ch. 1; *Early French and German Defenses*, ed. and trans. Laursen and van der Zande; van Vliet, *Luzac*, esp. 62–75. ↪
77. 'books full of indecent': [Luzac], *Essai*, 86. ↪
78. 'not accustomed': van Vliet, *Luzac*, 212. ↪
79. *well known in Holland*: *Brieven door een voornaam Lord ... op den naam van Cato* (Delft, 1722); *Brieven over de Vryheid*, 3 vols (Alkmaar and Amsterdam, 1752–5; 2nd edn Utrecht, 1766); S. R. E. Klein, *Patriots Republikenisme* (1995), esp. 72–3. ↪
80. *German translation*: *Cato, oder Briefe von der Freyheit*, trans. Johann Gottfried Gellius, 4 vols (Göttingen, 1756–7); Forsskål, *Dubia* (1756 edn); Rietje van Vliet, '1756–1757: Elie Luzac geeft de republikeinse Cato's Letters uit', *Mededelingen van de Stichting Jacob Campo Weyerman* 26 (2003). ↪
81. *advance the cause*: for this and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in this chapter, see [Peter Forsskål], *Tankar om borgerliga friheten* (Stockholm, 1759); Forsskål, *Civil Liberty*, ed. Goldberg et al.; Jonas Nordin and John Christian Laursen, 'Northern Declarations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81 (2020). ↪
82. *scientific expedition*: L. J. Baack, 'A Naturalist of the Northern Enlightenment',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40 (2013). ↪
83. 'How fares': Forsskål to Linnaeus, 20 Oct. 1761; see also 2 Apr. 1762 (L3065). ↪
84. *Riksdag*: for the 1760 Riksdag, see *Politska Skrifter af Anders Chydenius*, ed E. G. Palmén (1880), xciv–c; Virrankoski, *Anders Chydenius*, 186–9; Skuncke, 'Press Freedom', 114–16 (quoted: 'the lowliest congregation'). ↪
85. *overriding problem*: cf. Carl Wennerlind, 'Atlantis Restore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7 (2023). ↪
86. 'to loosen the bonds' etc.: *Anticipat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Selected Works of Anders Chydenius*, ed. Maren Jonasson et al. (2012), 228, 233. ↪
87. *many more months*: for this and the following four paragraphs in this chapter, see Virrankoski, *Anders Chydenius*, 189–209; *Anticipat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esp. pt 2; Manninen, 'Anders Chydenius'; Skuncke, 'Press Freedom', 117–34. In a prize essay of 1763, published in 1765, Chydenius had already listed 'constraints on reasoning, writing and printing' as one of the causes of mass emigration from Sweden: *Anticipating*, 96–8. ↪
88. 'letting what is said here': *Sveriges Ridderskaps ... Riksdags-Protokoll*, 23: 44 (29 Jan. 1762). ↪
89. 'The public consists of a multitude': quoted in Skuncke, 'Press Freedom', 128. ↪

90. *Even in England*: *ibid.*, 129. ↩
91. *'the public is an enlightened judge'*: quoted *ibid.*, 128. ↩
92. *no one even raised*: *Anticipat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221–5. ↩
93. *'truths exercise a persuasive power'* etc.: quoted *ibid.*, 241; see generally *ibid.*, ch. 7. ↩
94. *abolishing censorship*: *ibid.*, chs 4, 11; Gustav Björkstrand, 'Anders Chydenius', in Örtenhed and Wennberg (eds), *Press Freedom*, 99–100. ↩
95. *Act of 1766*: *Kongl. Maj:ts Nådige Förordning, Angående Skrif-och Tryck-friheten* (Stockholm, 1766); Roberts, *Age of Liberty*, 106–7. ↩
96. *the example of the Chinese*: Anders Chydenius, *Berättelse om Chinesiska Skrif-friheten* (Stockholm, 1766); *Anticipat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224–5, 344; Nokkala, 'Forsskål', 71–2; Skuncke, 'Press Freedom', 118–19. Cf. Jonathan D. Spence, *Treason by the Book* (2001). ↩
97. *'the freedom to speak'*: Voltaire, *L'A, B, C* [1768], in *Les 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65A (2011). ↩
98. *'there is no freedom'*: Voltaire, 'Epître au roi de Danemark' (1771), in *Les 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73 (2004); cf. *Hr. F. A. d. Voltaires Brev til Hans Majestæt Kongen af Danmark* (Copenhagen [1771]). ↩
99. *'through the spread of suspicions'*: quoted in Vegesack, 'Background', 35. ↩
100. *increasingly critical of Struensee*: Horstbøll et al., *Grov Konfækt*. ↩
101. *'press freedom must not be abused'* etc.: *Kabinettsstyrelsen*, ed. Hansen, 1: 176–7. ↩
102. *'press freedom is more extensive'*: *Gustave III par ses lettres*, ed. Gunnar von Proschwitz (1986), 151. ↩
103. *he steadily curtailed it*: Stig Boberg, *Gustav III och Tryckfriheten, 1774-1787* (1951); H. Arnold Barton, 'Gustav III of Sweden and the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972). ↩
104. *'the liberty to think'* etc.: Jens Møller, 'P. F. Suhms regeringsregler 1774', *Historisk Tidsskrift* 12 (1972), and 'P. F. Suhms *Euphron*', *Historisk Tidsskrift* 12 (1973); see also Horstbøll et al., *Grov Konfækt*, ch. 21. The manifesto was, though, a document essentially addressed to the king, and presumed a traditional, monarchical form of rule. The novel and manifesto were also translated into German in 1776. ↩
105. *East Asia*: Lin Yu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1936), 1–73; Richard H. Mitchell, *Censorship in Imperial Japan* (1976), 1–12; Joseph Needham (ed.),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5, pt 1 (1985), 360–83; Tortarolo, *Invention*, xxi–xxv. ↩
106. *Ottoman Empire and much of the Americas*: Christoph K. Neumann, 'Book and Newspaper Printing in Turkish', in Eva Hanebutt-Benz et al. (eds), *Middle Eastern Languages and the Print Revolution* (2002); Orlin Sübev, *Waiting for Mütferrika: Glimpses of Ottoman Print Culture* (2018); Nir Shafir, *The Order and*

- Disorder of Communication* (2024); J. H.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2006), 205, 329. ↵
107. *Brazil*: Valeria Gauz, 'Early Printing in Brazil', *Bulletin du bibliophile* (2013). ↵
108. *international terms*: cf. the essays in Elizabeth Powers (ed.), *Freedom of Speech: The History of an Idea* (2011). ↵
109. *Netherlands*: Joris van Eijenatten, 'Van godsdienstvrijheid naar mensenrecht', *BMGN* (2003). ↵
110. *news of the Scandinavian innovations*: Boberg, *Gustav III och Tryckfriheten*, 39, 60–61; John Christian Laursen, 'Censorship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ca. 1750–1890',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3 (2005), 106–10. ↵
111. *the basic, individual right of all citizens*: Horstbøll et al., *Grov Konfækt*, chs 37–40; Laursen, 'Censorship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
112. *Nowadays*: every single one of the 192 national constitutions currently in forc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es a guarante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https://constituteproject.org/>. ↵

6. THE ACCIDENTAL EXCEPTIONALISM OF THE FIRST AMENDMENT

1. *'the moment you limit free speech'*: Salman Rushdie, remarks after 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 14 Jan. 2015. ↵
2. *'freedom is indivisible'*: *ibid.* ↵
3. *'weaponizing' of free speech*: *Janus v.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 585 US __ (2018), dissents by Sotomayor, and by Kagan joined by Ginsburg, Breyer and Sotomayor; Adam Liptak, 'How Conservatives Weaponized the First Amendment', *New York Times*, 30 June 2018. ↵
4. *written constitutions*: Linda Colley, *The Gun, the Ship, and the Pen* (2021), 127–8. ↵
5. *free-speech laws everywhere else*: as far as I know, the only exception is the post-war constitution of Japan, which states: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as well as speech, press and all other forms of expression are guaranteed. No censorship shall be maintained, nor shall the secrecy of any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e violated.' But this too is essentially an American text, which was hurriedly drafted and imposed by the US occupation force in 1946–7. By contrast, Japan's own first written constitution (1889–1947) had specified that 'Japanese subjects shall, within the limits of law, enjoy the liberty of speech, writing, publication, public meetings and associations' (Article 29). My point extends also to the legal approach of nations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whose constitutions (unwritten or written) contain no explicit guarante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o that of Canada, whose 1960 Bill of Rights includes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without any further qualification, but whose jurisprudence nonetheless takes an avowedly balancing approach. ↵

6. *1798 Sedition Act*: the most detailed accounts are *Freedom of the Press from Zenger to Jefferson*, ed. Leonard W. Levy (1966); idem,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 (1985); Wendell Bird, *Press and Speech Under Assault* (2016); idem, *Criminal Dissent: Prosecutions Under 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 of 1798* (2020); idem, *The Revolution in Freedoms of Speech and Press* (2020). ↪
7. *Supreme Court: Schenck v. United States* (1919); *Gitlow v. New York* (1925). ↪
8. *intervening period*: see esp. Michael T. Gibson, 'The Supreme Court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om 1791 to 1917', *Fordham Law Review* 55 (1986); Mark A.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1991); Michael Kent Curtis, *Free Speech, 'The People's Darling Privilege'* (2000); Geoffrey R. Stone, *Perilous Times* (2004). The outstanding exception is David M. Rabban, *Free Speech in Its Forgotten Years* (1997). ↪
9. *declarations of rights*: Of the thirteen rebellious colonies, Connecticut and Rhode Island only amended their existing charters, rather than drawing up new constitutions. The constitutions of New Hampshire (1776), South Carolina (1776), New Jersey (1776) and New York (1777) initially omitted any declarations of rights; South Carolina added one in 1778, New Hampshire in 1783. My discussion will leave aside the additional, more conventional provisions that some state constitutions (and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of 1787) made for 'freedom of speech' during legislative deliberations. ↪
10. *American printing*: Arthur M. Schlesinger, *Prelude to Independence* (1958); Levy, *Emergence*, chs 2–6; Bird, *Revolution*, ch. 7. ↪
11. *'The importance of this': Dunlap's Pennsylvania Packet*, 4 Nov. 1774. ↪
12. *essentially libertarian*: Eckhart Hellmuth, "'The Palladium of all other English Liberties'", in idem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1990); Mark Knights, *Trust and Distrust* (2021), ch. 9. ↪
13. *Patriot rebels celebrated*: Bird, *Revolution*, chs 7–9 (292–3 for Cato's Letters). ↪
14. *first colonial 'declaration of rights'*: PGM, 1: 271–91. In other states, too, the early constitutional press clauses seem to have been accepted without discussion, even when the exact wording of other rights was keenly debated: *An Essay of a Declaration of Rights* [Philadelphia, 1776]; *The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Calling the Conventions of 1776 and 1790* (Harrisburg, PA, 1825), pt 2; *Proceedings of the Convention of the Province of Maryland ... August, 1776* (Annapolis, MD [1776]). ↪
15. *'spreading false news' etc.*: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4 vols (1765–9), 4: 149–53; see also 3: 123–6. ↪
16. *two new state declarations*: in 1779, the lawyer, pamphleteer and leading Patriot politician John Adams, whose 1798 Sedition Act was later to encapsulate his own Blackstonian view of libels, drafted the Massachusetts constitution. His proposed article on press liberty simply followed that of Pennsylvania's 1776 declaration, but when it was discussed in the convention, this text caused 'a large debate', and was referred to a committee of three delegates. They

subsequently proposed the wording that was eventually (with two small stylistic tweaks) adopted. This removed the first clause Adams had proposed, and replaced it with the new, Blackstonian phrase: *Papers of John Adams*, ed. Robert J. Taylor et al. (1977–), 8: 240, 263–4; *Journal of the Convention for Framing a Constitution ... 1780* (Boston, MA, 1832), 39, 41. The wording of New Hampshire's press clause was agreed by a convention in the summer of 1781 and adopted in 1783; press liberty had not been included in the state's initial, very brief, proposed declaration of rights: *A Declaration of Rights ... for the State of New-Hampshire* (Exeter, NH, 1779); *An Address of the Convention for Framing a New Constitution* (Portsmouth, NH, 1781), 24. See also Hellmuth, "Palladium", 478–86. ↩

17. *political opponents*: John Adam Treutlen to John Hancock, 19 June 1777, quoted in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John Adam Treutlen' ('Enemies of American Freedom'); [Joseph Galloway], *A Candid Examination of the Mutual Claims of Great-Britain, and the Colonies* (New York, 1775), 1 (quoted: 'We see freedom of speech'); Schlesinger, *Prelude*, 222–7, 239–41; Levy, *Emergence*, 75–81, 173–86 (quoting 174: 'wrong sentiments'). ↩
18. 'writing or speaking' etc.: *An Act of Assembly ... for restraining and punishing Persons, who are inimical to the Liberties ...* [New London, CT, 1775]. ↩
19. 'well-meaning, but uninformed people' etc.: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1774–1789*, ed. 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 et al., 34 vols (1904–37), 4: 18–21 (2 Jan. 1776). ↩
20. *criminalizing Loyalist opinions*: Levy, *Emergence*, 176–7; Bird, *Revolution*, 341. ↩
21.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etc.: *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 16 Nov. 1776. ↩
22. 'UNLAWFULLY endeavouring': *By his Honour John-Adam Treutlen* [Savannah, GA, 1777]. ↩
23. *new constitutions*: Levy, *Emergence*, 197–8. ↩
24. 'seditious libel': see e.g. Zechariah Chafee, *Free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1); Leonard W. Levy, *Legacy of Suppression* (1960); idem, *Emergence*; Bird, *Revolution*. More illuminating is the approach of Jud Campbell, 'Natural Right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Yale Law Journal* 127 (2017). ↩
25. *list of rights*: Max Farran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4 vols (1911–37), 2: 334 (quoted: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340–42; cf. *ibid.*, 3: 122 and appendix D. ↩
26. 'He wished' etc.: *ibid.*, 2: 587–8; see also 582–3. ↩
27. 'to insert a declaration' etc.: *ibid.*, 2: 611, 617–18, 620; see also 3: 143–4, 161–2, 290–91. ↩
28. [footnote] 'generally begin': Farrand, *Records*, 3: 256. ↩
29. 'There is no declaration' etc.: *ibid.*, 2: 637, 640; see also 3: 102, 128, 135–6; *PGM*, 3: 991–1003, 1041–4. ↩

30. *several state conventions: The Ratifications of the New Fœderal Constitution, together with the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Several States* (Richmond, VA, 1788); Pauline Maier, *Ratification: The People Debate the Constitution, 1787–88* (2010). ↵
31. ‘among other essential rights’ etc.: *Debates and Other Proceedings of the Convention of Virginia* (2nd edn, Richmond VA, 1805), 466; see also 467–77; *PGM*, 3: 1041–4, 1054–7, 1070–72, 1118–23; J. Gordon Hylton, ‘Virginia and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 1789–1791’, *University of Richmond Law Review* 25 (1991). ↵
32. ‘That the people’: *Debates and Other Proceedings*, 473. ↵
33. ‘essential’ etc.: *PJM*, 8: 351. ↵
34. ‘For why declare’ etc.: *Federalist Papers* no. 84 (first published in the *Independent Journal*, 16 and 26 July 1788); cf. Bird, *Revolution*, chs 9–10. ↵
35. ‘parchment barriers’: *Federalist Papers* no. 48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Packet*, 1 Feb. 1788). Madison used the same image in a letter to Jefferson on 17 Oct. 1788 (*PJM*, 11: 295–300), and when introducing his proposed Bill of Rights to Congress in June 1789 (*Congressional Register*, 4 vols (1789–90), 1: 431). ↵
36. ‘ought to be revised’: *PJM*, 11: 404; see also 295–300, 415–18, 428–9. ↵
37. *How lawmakers altered*: for the drafting and absolutist rhetorical framework of the First Amendment, see Neil H. Cogan, *The Complete Bill of Rights* (2015 edn), ch 2. For hints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 see Helen E. Veit et al., *Creating the Bill of Rights* (1991), 267, 293: in late July, Roger Sherman proposed the formulation that the people’s natural rights included ‘Speaking, writing and publishing their Sentiments *with decency* and freedom’ (my emphasis); while in early September it was reported (perhaps semi-facetiously) that some members of Congress ‘warmly favoured that liberty of Speech and of the press may be stricken out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as they only tend to promote licentiousness’. ↵
38. ‘waiting for the declaration’: Louis Gottschalk, *Lafayette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50), 53–4. ↵
39. *Lafayette finally received*: for this paragraph and the next one in this chapter, see *PTJ*, 12: 149–50, 438–40 (quoting 440: ‘a bill of rights’), 460–61, 558, 568–71, 583; 13: 4–8, 124–9, 440–43 and *passim*; 14: 650; Gottschalk, *Lafayette Between*, 364–5, 367–8, 374; *The Letters of Lafayette to Washington, 1777–1799*, ed. Louis Gottschalk (2nd edn, 1976), quoting letters 201, 203. ↵
40. *spring of 1788*: *PTJ*, 13: 188–90, 455, 458; Gottschalk, *Lafayette Between*, chs 23 and 24. ↵
41. ‘all the world’: *PTJ*, 14: 365. ↵
42. *examples of such drafts*: *ibid.*, 14: 370, 436–9; 15: 127, 231–3. ↵

43. *Condorcet published his own plan*: [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traduite de l'anglois* [trans. Richard Gem?] (1789). ↵
44.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PTJ, 15: 165–8, 230–33, 249–50, 255; *L'An 1 des droits de l'homme*, ed. Antoine de Baecque, Wolfgang Schmale and Michel Vovelle (1988). The most detailed study of its speech and press provisions is Charles Walton, *Policing Public Opin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9), ch. 4. ↵
45. *America's state constitutions: Examen du gouvernement d'Angleterre, comparé aux constitutions des États-Unis* (1789), 241, 267–87; Marcel Gauchet, *La Révolu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1989), 52–4; cf. PTJ, 15: 366. ↵
46. *the crown renewed*: Walton, *Policing*, 87. ↵
47. *Article 10*: essentially following the same model as Virginia's 1786 Sta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 drafted by Jefferson and championed by Madison. ↵
48. *a necessary restraint*: for the sovereignty of the nation and the power of the law, see Dale Van Kley (ed.), *The French Idea of Freedom* (1994). ↵
49. *not liberties to be protected*: for the French approach to rights, see Dan Edelstein, *On the Spirit of Rights* (2019), esp. ch. 7. ↵
50. *British, not transatlantic*: *L'An 1*, ed. de Baecque, Schmale and Vovelle, 60, 127 and *passim*; cf. [Jean-Paul] Rabaut de Saint-Etienne, *Projet du préliminair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oise* (Versailles, 1789), iv; Gauchet, *Révolution*, ch. 2. ↵
51. *right to free speech*: Walton, *Policing*, chs 3–4. ↵
52. *he and other francophone authors*: Mirabeau, *Aux Bataves sur le Stathoudérat* ('London' [i.e. Paris?], 1788), 81; idem, *S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London' [i.e. Paris?], 1788); Wybo Jan Goslinga, *De rechten van den mensch en burger* (1936), 26–36; Walton, *Policing*, 91, 116, 196–7. ↵
53. *'the degree'*: PTJ, 14: 443–4 (my italics); see also 439. ↵
54. *'No man can be molested'*: *ibid.*, 439. ↵
55. *'Charter of Rights'* etc.: *ibid.*, 15: 168. ↵
56. *Lafayette scrapped*: for Lafayette's drafts, see *ibid.*, 230–33; *L'An 1*, ed. de Baecque, Schmale and Vovelle, 65–6. ↵
57. *dozens of other proposals*: *L'An 1*, ed. de Baecque, Schmale and Vovelle, 87 and *passim*; Raymond Birn, 'Religious Toleration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Van Kley (ed.), *French Idea*. ↵
58. *'the press shall be free'* etc.: [Condorcet], *Déclaration ... Traduite*, 42, and idem,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1789), 10; for the chronology of these texts, see Jean-Claude Gaudebout, 'Les deux déclarations des droits de Condorcet en 1789 et la physiocrati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402 (2020). ↵
59. *Article 11*: *L'An 1*, ed. de Baecque, Schmale and Vovelle, 182–6 and *passim*; Gauchet, *Révolution*, 174–8; Walton, *Policing*, 86–91. ↵
60. *letter from Madison*: PTJ, 15: 180–81. ↵

61. *'Their declaration of rights'* etc.: *ibid.*, 364–9. ↩
62. *proposals he sent them*: *ibid.*, 1: 329–86, quoting 344 ('Printing presses shall be free') – the first of at least three different drafts that Jefferson composed. ↩
63. *favouring a balanced articulation*: *ibid.*, 6: 278–317 (quoting 304, 316: 'Printing presses shall be subject'; 'an innovation') (cf. *PJM*, 10: 205–20; 11: 213, 295–300; *Congressional Register*, 1: 431). This was possibly the origin of a Virginia anti-Federalist proposal in spring 1788 for a national Bill of Rights to guarantee that 'printing presses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restraint, other than liableness to legal prosecution, for false facts printed and publish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ed. John P Kaminski et al., 26 vols (1976–2013), 9: 773. Jefferson's suggested wording for the French free-press clause in June 1789 evidently drew on these precedents. After he became president in 1801, he repeatedly lamented that 'the abuses of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here have been carried to a length never before known or borne by any civilized nation', and that American newspapers, instead of being confined to 'true facts', were filled only with lies and errors – 'nothing can now be believed which is seen in a newspaper. Truth itself becomes suspicious by being put into that polluted vehicle' (letters to Marc Auguste Pictet, 5 Feb. 1803, and John Norvell, 11 June 1807). ↩
64. *'the first Declaration'* etc.: *American Herald and the Worcester Recorder*, 1 Oct. 1789. ↩
65. *journals up and down the coast*: e.g. *New-York Daily Gazette* (17 Oct.); *Pennsylvania Packet* (21 Oct.); *Federal Gazette and Philadelphia Evening Post* (22 Oct.); *Independent Gazetteer* [Philadelphia] (22 Oct.); *Pennsylvania Gazette* (28 Oct.); *Newport Herald* (29 Oct.); *United States Chronicle* [Providence, RI] (5 Nov.); *Massachusetts Spy* [Worcester, MA] (5 Nov.); *City Gazette* [Charleston, SC] (10 Nov.); *Freeman's Journal* [Philadelphia] (11 Nov.); *Salem Mercury* (17 Nov.); *Independent Chronicle* [Boston] (19 Nov.); *Carlisle Gazette* (25 Nov.). ↩
66. *virtually every other state*: for the sole exception, see Hylton, 'Virginia and the Ratification'. ↩
67. *first ten amendments*: debate of the two other proposed amendments, and the formal process of approval, took longer: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Jacob Hiltzheimer*, ed. Jacob Cox Parsons (1893), 157; *Minutes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ourteenth General Assembly* (Philadelphia, 1789); *Minute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Fourteenth General Assembly* (Philadelphia, 1790). ↩
68. *the special convention*: unless otherwise noted, my account of its proceedings is based on *Minutes of the Conven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789' [i.e. 1790]); *Minutes of the Grand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nven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790]); *Diary of Jacob Hiltzheimer*, ed. Cox Parsons; 'Pennsylvania Weather Records, 1644–1835',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15 (1891). ↩
69. *almost entirely overlooked*: Levy, *Emergence*, 211–12, and Bird, *Revolution*, 174–6, make brief passing references to them, without noticing their significance. ↩

70. *Robespierre's stirring speech*: e.g. *Pennsylvania Mercury*, 3 Dec. 1789; *Independent Gazetteer*, 7 Dec. 1789; *Freeman's Journal*, 9 Dec. 1789. These articles notably interpolate passages not included in the French transcript, and omit his praise of American press-freedom laws: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ed. J. Mavidal and E. Laurent, 1st series, 82 vols (1867–1990), 29: 631–3; Gauchet, *Revolution*, 176–8. ↵
71. 'an explicit law' etc.: *Federal Gazette and Philadelphia Evening Post*, 12 Sept. 1789. Cf. *Freeman's Journal*, 30 Oct. 1782. ↵
72. 'I confess' etc.: *Federal Gazette and Philadelphia Evening Post*, 24 Oct. 1789. ↵
73. *how to define 'truth'*: informing this debate was the widely publicized recent conviction, without a jury trial, of the printer and publisher of Philadelphia's anti-Federalist *Independent Gazetteer*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Pennsylvania, which turned in part on the meaning of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the state's existing Bill of Rights, and its inapplicability to 'slandorous words' intended to 'delude and defame': *Respublica v. Oswald*, 1 US 319 (1788). ↵
74. 'The citizen':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Wilson*, ed. Kermit L. Hall and Mark David Hall (2007), 1046 (my italics); see also 1136. ↵
75. *long-running political struggles*: Terry Bouton, *Taming Democracy* (2007), esp. ch. 8; Kenneth Owen, *Political Community in Revolutionary Pennsylvania, 1774–1800* (2018), esp. ch. 3; Angus Harwood Brown, 'The Pennsylvania Council of Censors',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64 (2024). ↵
76. 'There being no restraint' etc.: Massachusetts citizens quoted in Clyde Augustus Duniway, *The Development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Massachusetts* (1906), 134–6. ↵
77. 'sentiments, concerning': *The Constitution of Vermont* (1786), 8 (ch. 1, art. 15). ↵
78. *Delaware's legislators*: *Proceedings of the House of Assembly of the Delaware State, 1781–1792, and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792*, ed. Claudia L. Bushman et al. (1988), 784, 908. ↵
79. *every single territory*: leaving aside Vermont, which joined the Union in 1791 but has never amended its 1786 formulation. ↵
80. 'While we deny' etc.: *PTJ*, 44: 379–81. ↵
81. *most modern scholarship*: rare exceptions are Rabban, *Free Speech*; Lyndsay Mills Campbell, 'Truth and Consequences: The Legal and Extralegal Regulation of Expression in Massachusetts and Nova Scotia, 1820–184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chs 5–7. ↵
82. *Hawaii became the first*: *Proceeding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Hawaii 1950* (1960), esp. 301, 420. Between 1921 and 1933, successive editions of the *Model State Constitution*, composed by a national committee of experts and issued by the National Municipal League, recommended the wording 'Every person may freely speak, write and publish on all subjects,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 abuse of that liberty; and in all trials for libel, both civil and criminal, the truth when published with good motives and for justifiable ends, shall be

sufficient defense'. In 1941 this was changed to conform to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There shall be no law passed nor executive action taken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The final edition, issued in 1963, combined this and other clauses into a simple copy of the First Amendment, boasting that the result was 'more traditional in its conformity to basic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than either its predecessor *Models* or most existing state constitutions', which had suffered from 'unclear thinking and bungling workmanship'. ↩

83. *If James Madison: PJM*, 10: 205–220; *Congressional Register*, 1: 423–37 (quoting 435: 'I think there'). ↩
84. *state constitutions do so more generally*: for state constitutions and jurisprudence, see e.g. Margaret A. Blanchard, 'Filling in the Void: Speech and Press in State Courts Prior to *Gitlow*' and appendix, in Bill F. Chamberlin and Charlene J. Brown (eds), *The First Amendment Reconsidered* (1982); G. Alan Tarr, 'State Constitutionalism and "First Amendment" Rights', in Stanley H. Friedelbaum (ed.), *Human Rights in the States* (1988), and *Understanding State Constitutions* (1998), 168–9, 196–7; Charles N. Davis and Paul H. Gates Jr., 'Superseding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The New Federalism, State Constitutional Supremacy and First Amendment Jurisprudence', *Communications and the Law* 17 (1995); Jennifer A. Klear, 'Comparison of the Federal Courts' and the New Jersey Supreme Court's Treatments of Free Speech on Private Property', *Rutgers Law Journal* 33 (2002); 'Exceeding Federal Standards', *Albany Law Review* 77 (2014); Elijah O'Kelley, 'State Constitutions as a Check on ... Social Media Platforms', *Emory Law Journal* 69 (2019). ↩
85. '*It would be quite as significant*': *Federalist Papers* no. 84 (first published in the *Independent Journal*, 16 and 26 July 1788). ↩
86. '*free people of color*' etc.: Meinrad Greiner, *The Louisiana Digest, Embracing the Laws of the Legislature* (New Orleans, 1841), 220, 521. ↩
87. '*the political truths*': *PJM*, 11: 298–99. ↩
88.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S 323 (1974). ↩

7.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EXPRESSIONS

1. *global political ideal*: cf. Linda Colley, *The Gun, the Ship, and the Pen* (2021), esp. chs 3, 5. ↩
2. *Alexander Radishchev*: Douglas Smith, 'Alexander Radishchev's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 in Elizabeth Powers (ed.), *Freedom of Speech: The History of an Idea* (2011). ↩
3. '*the only support*' etc.: [Joan Derk van der Capellen tot den Pol], *Aan het volk van Nederland* (1781), 75–6; cf. *Handboekje voor Nederland* (Amsterdam, 1786), 38–40, 92–3. For the Patriots' reading and publicizing of Cato's Letters and other English texts, and Dutch press ideals and practices in the 1780s, see A. C. Duke and C. A. Tamse (eds), *Too Mighty to be Free* (1987), ch. 6; M. Evers,

‘Angelsaksische inspiratiebronnen voor de patriottische denkbeelden van Joan Derk van der Capellen’, in Th. S. M. van der Zee et al. (eds), *1787: De Nederlandse Revolutie?* (1988); S. R. E. Klein, *Patriots Republikenisme* (1995), 72–3, 91–127; Joris van Eijenatten, ‘Van godsdienstvrijheid naar mensenrecht’, *BMGN* (2003); Janet Polasky, ‘Revolutionaries Between Nations, 1776–1789’, *Past and Present* (2016). ↵

4. *translation of Luzac: Onderzoek over de Vryheid, Van zyne Gevoelens mede te deelen* (Amsterdam, 1782). ↵
5. ‘Newspaper writers’: Wyger R. E. Velema, *Enlightenment and Conservatism in the Dutch Republic* (1993), 165–6; and generally ch. 5. ↵
6. ‘that have no other purpose’: Rietje van Vliet, *Elie Luzac (1721–1796)*, 386; and generally ch. 6. ↵
7. ‘the unlimited liberty’ etc.: M. Mercier, *New Picture of Paris*, 2 vols (1800), 1: xiii; 2: 190–93, 203–5. ↵
8. *a bishop in Brittany*: Charles Walton, *Policing Public Opin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9), 98–100. ↵
9. *successive Acts*: for 1790s French laws, see *ibid.*, ch. 5 (quoting 123–4, 129, 132–5). ↵
10. *Dutch Republic*: Duke and Tamse (eds), *Too Mighty*, 115–22 (quoting 125 n. 62: ‘his thoughts and feelings’); W. R. E. Velema, ‘Politiek, pers en publieke opinie’, in *Grondwetgeving 1795–1806* (1997). ↵
11. ‘no law would dare’: quoted in Walton, *Policing*, 134. ↵
12. ‘If every individual’: quoted *ibid.*, 132–3. ↵
13. ‘intolerable ‘licentiousness’: *American Citizen* [New York], 20 Oct. 1806. ↵
14. ‘no limitation’ etc.: articles 353 and 355 of the 1795 French constitution. ↵
15. ‘Today we can hazard’ etc.: Walton, *Policing*, 232 and ‘Conclusion’. ↵
16. *embraced a similar approach*: see e.g. Duke and Tamse (eds), *Too Mighty*, 122 and n. 82; Clarice Neal,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New Spain’, in Nettie Lee Benson (ed.), *Mexico and the Spanish Cortes, 1810–1822* (1966);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Toleration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Hispanic World Between Enlightenment and Liberalism’, *Past and Present* 211 (2011); *idem*, ‘From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Jesús Astigarraga (ed.), *The Spanish Enlightenment Revisited* (2015); Helena Rosenblatt, ‘Rousseau, Constant,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Notion of Free Speech’, in Powers (ed.), *Freedom of Speech*, 148–9; Corinna Zeltsman, *Ink Under the Fingernails* (2021). ↵
17. *English-speaking world: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Religion* (1711); Geoff Kemp, ‘The “End of Censor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Toleration’, *Parliamentary History* 31 (2012); Eckhart Hellmuth, ‘“The Press Ought to be Open to All”, in Gordon Pentland and Michael T. Davis (eds), *England and*

- Scotland, 1688–1815* (2016), 10–11, 14–19; Wendell Bird, *The Revolution in Freedoms of Speech and Press* (2020), ch. 3. ↪
18. 'strictly forbidden' etc.: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Massachusetts*, 55 vols (1919–90), 4: 72, 208–9. ↪
 19. 'every man has the liberty': Voltaire, *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 (1733), 193 (Letter XX). ↪
 20. van Effen: *De Hollandsche Spectator* 220 (4 Dec. 1733); P. J. Buijnsters, *Justus van Effen 1684–1735: leven en werk* (1992). ↪
 21. Gellius: *Cato, oder Briefe von der Freyheit*, trans. Johann Gottfried Gellius, 4 vols (Göttingen, 1756–7), 1: 65–70. ↪
 22. 'freedom of the press': quoted in Sebastián, 'Toleration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168–9. ↪
 23. *absence of 'prior restraint'*: Bird, *Revolution*, charts the evolving shape of this transatlantic discourse, stress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influential focus on prior restraint of William Blackstone and other conservatives from the 1760s onwards was, in fact, a deliberate distraction from the real disagreements in contemporary press-liberty debates. ↪
 24. *Niclas von Oelreich*: Marie-Christine Skuncke, 'Press Freedom in the Riksdag 1760–62 and 1765–66', in Kristina Örtenhed and Bertil Wennberg (eds), *Press Freedom 250 Years* (2018), 130. ↪
 25. *Defoe*: Daniel Defoe, *Essay 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Press* (1704), 15. ↪
 26. 'The liberty': *The Correspondence of Jeremy Bentham*, ed. T. L. S. Sprigge et al., 13 vols (1968–2024), 8: 429–30 (Bentham to Jean Antoine Gauvain Gallois, Sept. 1814). ↪
 27. *British Isles*: Duke and Tamse (eds), *Too Mighty*, ch. 5; Eckhart Hellmuth, "'The Palladium of all other English Liberties'", in idem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1990); James Kelley, 'Regulating Print', *Eighteenth-Century Ireland* 23 (2008); Thomas Keymer, *Poetics of the Pillory* (2019). ↪
 28. *1760s*: 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1976), esp. chs 8, 11. ↪
 29. *parliamentary proceedings*: Peter D. G. Thomas, 'The Beginning of Parliamentary Reporting in Newspapers, 1768–1774',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59). ↪
 30. *new Libel Act*: Thomas Andrew Green, *Verdict According to Conscience* (1985), ch. 8. ↪
 31. *draconian new statutes*: on British repression, see Eckhart Hellmuth, 'After Fox's Libel Act', in Ulrich Broich et al. (eds), *Reactions to Revolutions* (quoting 143–4); Robert Pigot, *Liberty of the Press* (1790); *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 13 Aug. 1814 (quoted: 'all is left'); *Trials for Treason and Sedition, 1792–1794*, ed. John Barrell and Jon Mee, 8 vols (2006–7); Clive Emsley, 'An Aspect of Pitt's "Terror"', *Social History* (1981), and 'Repression, "Terror", and the Rule of Law in England During the Decad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nglish Historical*

- Review (1985); Philip Harling, 'The Law of Libel and the Limits of Repression, 1790–1832', *Historical Journal* (2001); Vic Gatrell, *Conspiracy on Cato Street* (2022), 125–8 (for visual imagery of the trope) and *passim*. ↵
32.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Michael Kent Curtis, *Free Speech*, 'The People's Darling Privilege' (2000); Geoffrey R. Stone, *Perilous Times* (2004). ↵
33. *re-enslaved and sold*: Michael J. Crawford, *The Having of Negroes is Become a Burden* (2010). ↵
34. 'cause slaves' etc.: quoted in Kent Curtis, *Free Speech*, 125–6. ↵
35. *free Black petitions*: this and the following two paragraphs of this chapter draw on: *Annals of Congress*, 30 Jan. 1797, 2–3 Jan. 1800; George F. Bragg, *History of the Afro-American Group of the Episcopal Church* (1922), chs 3–5; William C. diGiacomantonio, "'For the Gratification of a Volunteering Society'",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5 (1995); Crawford, *Having of Negroes*; Nicholas P. Wood, 'A "class of Citizen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74 (2017). ↵
36. 'most dangerous' etc.: *Columbian Centinel*, 29 Aug. 1835. ↵
37. 'We are told': quoted in Kent Curtis, *Free Speech*, 153; see generally *ibid.*, chs 4–13. ↵
38. 'gag rule' etc.: quoted *ibid.*, 177–8. ↵
39. 'truths confined' etc.: Sebastián, 'Toleration', 178. ↵
40. 'but this freedom': *Christianity Vindicated* (1797), 4. ↵
41. 'dearest privilege': *The Celebrated Speech of the Hon. T. Erskine* (Edinburgh, 1793), 65. Erskine's entirely secular reading of *Areopagitica* incidentally epitomizes how b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ilton's text had come to be regarded, as it still is, as a clarion call for political free speech: cf. Hellmuth, 'After Fox's Libel Act', 152–6. ↵
42. 'would be confined' etc.: *R v. Paine* (1792), in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vol. 22, ed. T.B. Howell and Thomas Jones Howell (1817), cols 381–3. ↵
43. 'An intellectual book' etc.: *Christianity Vindicated*, 6–7, 11. See more generally John Spurr, 'The Manner of English Blasphemy, 1676–2008', in Stewart J. Brown et al. (eds), *Religion,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Britain* (2013). ↵
44. *Thomas Anketell*: the account in this paragraph draws on TNA, CO 71/19, Jan.–Feb. 1791 [unfoliated] and CO 71/20; *Charibbean Register*, 26 Mar. 1791; *L'Ami de la Liberté*, 8 Jan., 22 Feb. 1791; *Dunlap's Daily American Advertiser*, 11 May 1791; John Anketell, *Poems on Several Subjects* (Dublin, 1793), list of subscribers; Janet Polasky, *Revolutions without Borders* (2015), ch. 5; Julius S. Scott, *The Common Wind* (2018), ch. 4. ↵
45. 'the privilege of representation' etc.: *Annals of Congress*, 30 Jan. 1797, col. 2018. ↵
46. 'dark-complexioned citizens' etc.: *Annals of Congress*, 27 Nov. 1797, col. 658; 30 Jan. 1797, col. 2021–2. ↵
47. 'a class of citizens' etc.: Wood, 'A "class of Citizens"', 111; *Annals of Congress*, 2 Jan. 1800, cols 229, 235. ↵

48. 'The Negroes':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 Henry Reeve (1838), 242n. [↪](#)
49. *contesting such racial discrimination*: David Waldstreicher, 'Racism, Black Voices, Emancipation, and Constitution-Making in Massachusetts, 1778', *Journal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2 (2024). [↪](#)
50. 'The free negroes' etc.: quoted in Douglas Bradburn, *The Citizenship Revolution* (2009), 235; and see generally *ibid.*, ch. 7; Robert G. Parkinson, *The Common Cause* (2016), 630–40. [↪](#)
51. 'If they are slaves': *Annals of Congress*, 30 Jan. 1797, col. 2020. [↪](#)
52. 'black gentlemen' etc.: *Annals of Congress*, 2 Jan. 1800, col. 230. This edition was prepared in the 1830s from contemporaneous reports; in at least one of those, the whole of 'black gentlemen' and 'Thank God they are!' was italicized for emphasis: *Philadelphia Gazette*, 16 Jan. 1800. [↪](#)
53. 'Because many of those people': *ibid.*, col. 242. [↪](#)
54. 'us and the rest' etc.: *ibid.*, col. 235. [↪](#)
55. 'those people' etc.: *ibid.*, col. 231. [↪](#)
56. 'slaves do not possess': *Register of Debates in Congress*, 13: col. 1733, 12 Feb. 1837; see also cols 1708–38. [↪](#)
57. 'While we would maintain' etc.: *Albany Argus*, 8 Sept. 1835. [↪](#)
58. 'It has, indeed' etc.: *ibid.* I have elided the final phrase before the question mark at the end of Dix's quoted speech – the original reads '... in the south, the general society of which they may constitute but an inconsiderable part?' [↪](#)
59. 'Slavery cannot tolerate free speech' etc.: speech in Boston, 9 Dec. 1860, in *The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s*, ed. John W. Blassingame et al., 1st series, 5 vols (1979–92), 3: 422–3. [↪](#)
60. *he observed in 1863*: 'The Proclamation and a Negro Army', address in New York, 6 Feb. 1863, *ibid.*, 3: 549–69. [↪](#)
61. *many politicians and citizens*: on the First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see Kent Curtis, *Free Speech*. [↪](#)
62. *women as slaves*: see e.g. Hasana Sharp, 'Slavery and Servitude in Seventeenth-Century Feminism', in Karen Detlefsen and Lisa Shapiro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Women and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2023). [↪](#)
63. 'towards women as towards slaves': [Margaret Fuller], 'The Great Lawsuit', *The Dial*, July 1843, 12. [↪](#)
64. *the first theorist*: though Condorcet in the 1780s and 1790s also advocated in general for both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nd the rights of women. [↪](#)
65. 'X. No one shall be disquieted' etc.: Olympe de Gouges,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 in *Oeuvres*, ed. Benoîte Groult (1986), 104–5. [↪](#)
66. 'Many of these petitions' etc.: *Speech of John Quincy Adams ... on the Freedom of Speech* (Washington, DC, 1838), 15. [↪](#)

67. *the first large-scale women's petitions*: Alisse Portnoy, *Their Right to Speak* (2005), chs 1–2. [↪](#)
68. *female activists*: see e.g. Elizabeth Cady Stanton et al., *History of Women Suffrage*, 6 vols (New York, 1881–1922), 1: 39–40, 52–3; Portnoy, *Their Right to Speak*, ch. 6;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1999), s.v. 'Foster, Abby Kelley'. [↪](#)
69. '*female petitioners*': Portnoy, *Their Right to Speak*, 229. [↪](#)
70. '*In this country*': Catharine E. Beecher, *An Essay on Slavery and Abolitionism, with Reference to the Duty of American Females* (1837), 104–5. Towards the end of her life, Beecher was nonetheless to draft and circulate a women's anti-suffrage petition that was presented to Congress: *Godey's Lady's Book and Magazine* 82: 491 (May 1871), 476–7. [↪](#)
71.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ights*' etc.: A. E. Grimké, *Letters to Catherine E. Beecher* (1838), 114–19. [↪](#)
72. '*slaves were not excluded*': *Speech of John Quincy Adams*, 57–61; *Congressional Globe* (1838), 6: 474. [↪](#)
73.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etc.: *Speech of John Quincy Adams*, 76–7; *Congressional Globe* (1838), 6: 480, 483. [↪](#)
74. '*fenced off*': Stanton et al., *History of Women Suffrage*, 1: 60. [↪](#)
75. '*to hold a women's rights convention*': *ibid.*, 1: 61. [↪](#)
76. '*In advocating liberty*': *ibid.*, 1: 53. [↪](#)
77. *into the 1960s*: see e.g. *Th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Trial*, ed. H. Montgomery Hyde (1990), 62; Christopher Hilliard, *A Matter of Obscenity* (2021). [↪](#)
78. *feminist theorists*: on feminism and pornography, see e.g. Andrea Dworkin, *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 (1981); Catharine A. MacKinnon, *Only Words* (1993). [↪](#)
79. '*dangerous confusion*': Ronald Dworkin, 'Liberty and Pornograph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 Aug. 1991; cf. *ibid.*, 21 Oct. 1993 and 3 Mar. 1994. [↪](#)
80. '*an attack*': Ronald Dworkin, 'Foreword', in Ivan Hare and James Weinstein (eds), *Extreme Speech and Democracy* (2009), vi. For a more nuanced view, see Bernard Williams, 'Drawing Line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2 May 1994. Cf. Hilliard, *Obscenity*, 207–10, 215–16. [↪](#)
81. '*nigger*': see esp. Randall Kennedy, *Nigger: The Strange Career of a Troublesome Word* (2002). [↪](#)
82. *A Jewish comedian*: for instructive cases regarding comedy and antisemitism, see e.g. *M'Bala M'Bala v. Franc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pplication no. 25239/13 (2015); David Baddiel, 'Free Speech and Nazi Dog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0 Apr 2018. [↪](#)

8. IMPERIAL ENTANGLEMENTS

1. *printed in English*: 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2004), 19. ↪
2. *how imperial rule was justified*: see e.g. Catherine Hall, *Macaulay and Son* (2012); Priya Satia, *Time's Monster* (2020). ↪
3. '*dragging ... people through dirt*' etc.: Karl Marx, *New-York Daily Tribune*, 8 Aug. 1853. ↪
4. '*Whatever may have been*': *ibid.*, 25 June 1853. ↪
5. '*merely birthing pain*': Satia, *Time's Monster*, 145. ↪
6. '*folly and injustice*' etc.: Adam Smith,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2 vols (1976), 2: 588. ↪
7. *critical of imperialism*: Sankar Muthu, *Enlightenment Against Empire* (2003); Jennifer Pitts, *A Turn to Empire* (2005), chs 2–4; Uday S. Mehta, 'Edmund Burke on Empire', in Sankar Muthu (ed.), *Empire and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2012). ↪
8. *East India Company*: Nicholas B. Dirks, *The Scandal of Empire* (2006); Philip J. Stern, *The Company State* (2011); William Dalrymple, *The Anarchy: The Relentless Ris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2019). ↪
9. '*We have murdered*': *The Yale Edition of 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ed. W. S. Lewis et al., 48 vols (1937–83), 23: 387. ↪
10. *high moral purpose*: Hall, *Macaulay and Son*, 73–9 and *passim*; Padraic X. Scanlan, *Slave Empire* (2020). ↪
11. '*rude and uninstructed*' etc.: James Mill,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6 vols (2nd edn, 1820), 1: 403, 412–13, 416–18, 419–20, 422; 2: 76, 134, 158. ↪
12. '*a general disposition*': *ibid.*, 2: 188. ↪
13. '*habitual contempt*' etc.: *ibid.*, 1: 386, 388. ↪
14. '*many gloomy and malignant*' etc.: *ibid.*, 1: 403. ↪
15. '*made but a few*': *ibid.*, 2: 135; see also 137. ↪
16. '*superior character*' etc.: *ibid.*, 2: 186–8. Mill conceded only Indians' pre-eminence in 'the more delicate manufactures' of fine textiles, the fabrication of 'trinkets' and 'the art of polishing and setting the precious stones': 2: 187. ↪
17. '*to make war*' etc.: evidence of James Mill, 16 Feb. 1832, in *Minutes of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House of Commons Papers 1831–2, 735–VI: 8. ↪
18. '*happiness and welfare*': ODNB, s.v. 'Campbell, Sir George'. ↪
19. '*elevated*': George Campbell, *White and Black* (1879), 121. ↪
20. '*assimilated*': George Campbell, *India as It May Be* (1853), xii. ↪

21. 'benefits' etc.: Campbell, *India as It May Be*, xii, xxv. Karl Marx's 1853 comments on India for the *New-York Daily Tribune* drew on Campbell's newly published book. ↪
22. 'English government in India' etc.: James Mill, 'Review of *Voyage aux Indes orientales*, by Le P. Paulin De S. Barthélemy, Missionary', *Edinburgh Review* 15 (1810), 371. ↪
23. 'duplicity and hypocrisy' etc.: Pitts, *Turn to Empire*, 223. Tocqueville himself staunchly championed his own nation's brutal colonization of Algeria, and agreed with his friend John Stuart Mill that 'backward' and 'declining' peoples, destined to be subordinated and civilized by 'enlightened' and 'progressing' ones, could not be permitted the same rights as Europeans. Even French colonists themselves in Africa constituted only a society in its 'infancy', not yet mature enough to be permitted freedom of the press or other 'political liberties': see Pitts, *Turn to Empire*, ch. 7; Alexis de Tocqueville, *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 trans. and ed. Jennifer Pitts, esp. 10, 24, 60–61, 111–12, 130, 138, 140, 142, 166. ↪
24. *the most convenient answer*: Karuna Mantena, *Alibis of Empire* (2010). ↪
25. 'the Aryan stock' etc.: quoted in Satia, *Time's Monster*, 134. ↪
26. 'indirect' forms of governance: Mantena, *Alibis*. ↪
27. *reading and writing were highly valued*: C. A.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1996). ↪
28.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see Miles Ogborn, *Indian Ink* (2007). ↪
29. *experiments in printing*: Anant Kakba Priolkar, *The Printing Press in India* (1958).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Madras from 1761 possessed a press captured from the French in Pondicherry, which was used for administrative and missionary work, as well as some commercial printing: Graham Shaw, *Printing in Calcutta to 1800* (1981), ix, 16–17. Margarita Barns, *The Indian Press* (1940), 44, notes that in 1674 the East India Company sent a press to Bombay but in 1753 reported that 'the printing houses were in a very bad condition and unfit for use'. Most likely such machines would have been used mainly to produce forms, receipts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paperwork, rather than communicative public texts. The earliest-surviving Bombay imprint dates from 1772. ↪
30. *Halhed*: Nathaniel Brassey Halhed, *A Code of Gentoo Laws* (1776); ODNB, s.v. 'Halhed, Nathaniel Brassey'. ↪
31. 'a general medium' etc.: Nathaniel Brassey Halhed, *A Grammar of the Bengal Language* (Hoogly, Bengal, 1778), ii. ↪
32. 'the illiterate and careless' etc.: *ibid.*, 23. ↪
33. 'the conquest of India': Bernard S.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1996), 16; and generally ch. 2. ↪

34. 'Great Britain': Halhed, *Grammar*, xxiv–xxv. For the wider context, see Joshua Ehrlich,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2023). ↪
35. *James Hicky*: Andrew Otis, *Hicky's Bengal Gazette* (2018), is an indispensable and detailed account, though I differ from it on several points of interpretation. Also invaluable is P. Thankappan Nair, *A History of the Calcutta Press* (1987). ↪
36. *typical imperial entrepreneur: Memoirs of William Hickey*, ed. Alfred Spencer, 4 vols (1919–25), 2: 175–6; Otis, *Gazette*; *HBG*, 4 and 11 Nov. 1780; Nair, *Calcutta Press*, 34. ↪
37. 'First, and late printer': colophon added to *HBG* from the issue of 8 Apr. 1780 ↪
38. 'to print a newspaper': quoted in Otis, *Gazette*, 268–9 n. 99. ↪
39. 'for the more speedy': *HBG*, 8 Apr. 1780; see also 25 Mar. 1780. ↪
40. 'Chief intention' etc.: *Proposals for Printing a News-Paper, in Bengal, to be published every Saturday, by J. A. Hicky* [Calcutta, 1779?], broadsheet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Library); *HBG*, 22 Apr. 1780. ↪
41. *first eleven months*: Otis, *Gazette*, 290 n. 369. ↪
42. *better-capitalized rivals*: *HBG*, 24 June 1780, 5 May 1781; *India Gazette*, surviving issues of 25 Nov. 1780 (no. 2) onwards; Otis, *Gazette*, 92–7. ↪
43. *embittered political crusader*: see *HBG*, 4 Nov. 1780 onwards. Otis, *Gazette*, 290 n. 369, quantifies the change: there was a tenfold increase in opinion articles, and press freedom became one of their main subjects. For Hicky's violent and resentful temper, see *Memoirs of William Hickey*, ed. Spencer, 2: 173–4, 3: 160–63. ↪
44. *non-stop polemic*: already between July and October 1780, as Hicky anticipated the launch of the rival paper, he had begun to carry more political news. During September he reprinted (presumably from a London paper) a speech made at Westminster by Charles James Fox on 2 February 1780, attacking ministerial corruption and mismanagement. This included passing references to the governance of India, and to John Wilkes's travails in the 1760s: *HBG*, 2, 9, 16 and 23 Sept. 1780. ↪
45. *His last Gazette*: *HBG*, 23 and 30 Mar. 1782 (which specifies that his press and types were seized from prison on Tuesday 26 March). ↪
46. *public auction of his press*: *India Gazette*, 6 Apr. 1782; Otis, *Gazette*, 202. (For Wilkins's work as Company printer during these years, see Ogborn, *Indian Ink*, 226–30.) After Hastings, on the eve of his departure for England, allowed Hicky to be released, around Christmas 1784, Hicky changed his attitude and was ever after his 'warm and zealous defender': *Memoirs of William Hickey*, ed. Spencer, 3: 262. He briefly resurrected his paper, but then returned to his practice as a surgeon and apothecary: Otis, *Gazette*, 314–15 n. 706; Nair, *Calcutta Press*, 33–5. ↪
47. *newspapers in the West Indies: Proposals for Printing a News-Paper, in Bengal*. ↪

48. *advertises for local slaves*: e.g. *HBG* 1 and 8 Apr., 16, 23 and 30 Dec. 1780; 27 Jan., 10, 17 and 24 Feb., 1, 8 and 22 Sept. 1781 ↪
49. *'open to all parties'*: Hicky first used the motto in his issue of *HBG*, 27 May 1780, together with the *Public Ledger*'s subtitle, 'A Daily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Paper' (changing 'Daily' to 'Weekly'). See *Public Ledger*, 7 June 1766; *Hampshire Chronicle*, 24 Apr. 1775, 3; Jordan E. Taylor, 'A Revolution in Motto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018). ↪
50. *worldwide channels*: *HBG*, *passim*; Otis, *Gazette*, 82 and 284–5 nn. 292–4. ↪
51. *resonated across*: Ben Gild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Hicky's Bengal Gazette (1780–2): A Study in Transoceanic Political Cultur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7 (2019); Mark Knights, *Trust and Distrust* (2021), ch. 9. ↪
52. *invocations and examples*: e.g. *HBG*, 18 and 25 Nov., 2 and 23 Dec. 1780; 28 Apr., 16 June, 7 July 1781. ↪
53. *'The case of Mr HICKY'*: *HBG*, 25 Nov. 1780; Otis, *Gazette*, 203–5, 306–7 n. 586. ↪
54. *'a weekly paper'* etc.: quoted in Otis, *Gazette*, 186. ↪
55. *'This is the boasted liberty'*: quoted *ibid.*, 174. ↪
56. *'Freedom of the press'*: *India Gazette*, 2 Dec. 1780. ↪
57. *'I really wonder'* etc.: quoted in Otis, *Gazette*, 131. Cf. Barns, *Indian Press*, 66. ↪
58. *regulated printers*: Kirsten MacKenzie, *Imperial Underworld* (2016), esp. chs 6–7. ↪
59. *censorship of newspapers*: Barns, *Indian Press*, chs 4–5 (quoting p. 75: 'the conduct of government' etc.). ↪
60. *exceptional spaces*: cf. Partha Chatterjee, *The Black Hole of Empire* (2012). ↪
61. *overwhelmingly European medium*: Shaw, *Printing in Calcutta*; but for examples of the early indigenous use of print, see e.g. Barns, *Indian Press*, 44, 111–12; Miles Ogborn, 'The Amusements of Posterity', in Charles W. J. Withers and Miles Ogborn (eds), *Geographies of the Book* (2010). ↪
62. *Bengali, Persian and Gujarati*: Barns, *Indian Press*, 58–9; Shaw, *Printing in Calcutta*, 18, 32–4, 235 and checklist; private communication from Robert Travers. ↪
63. *Indian employees*: Ogborn, *Indian Ink*, ch. 6, esp. 234–44, 264. ↪
64. *owned and edited by white men*: *East India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and Licensed Printing Presses ... for the Years 1814, 1820, and 1830*, House of Commons Papers 1831–2, 37: 1–6 [compiled by James Mill]; Nair, *Calcutta Press*, xi, xiii–xv, chs 5–6 (esp. 215–16); Barns, *Indian Press*, 57–9. ↪
65. *Commons debate*: for the quoted extracts from the Commons debate of March 1811, see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1st series, 19: cols 462–76 (21 Mar. 1811); see also R. G. Thorne (ed.), *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 The House of*

- Commons 1790–1820* (1986), s.v. ‘Dundas [afterwards Saunders Dundas], Robert (1771–1851)’; C. 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2012), 79. ↵
66. ‘Duty of this country’: East India Company Act, 53 Geo. III, c. 155 (1813), paragraph xxxiii. ↵
67. ‘God-like bounty’ etc.: *Asiatic Journal* 5 (1818), 174–5. ↵
68. *ended pre-publication censorship*: for the controversial politics of Hastings’s policy and his public remarks on this subject, which were widely publicized and frequently reprinted, see A. F. Salahuddin Ahmed, *Social Ideas and Social Change in Bengal, 1818–1835* (2nd edn, 1976), 59–67. The same regulations were adopted the following year in Bombay. ↵
69. *Indians had maintained*: on Indian cultures of communication and adoption of print, see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esp. 204, 212–20, 238–43, 266, 298 (quoting 214: ‘implies other means’); Anindita Ghosh, *Power in Print* (2006), explores the indigenous social,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impact of Bengali print into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 ↵
70. *Large numbers of printed books*: just between 1810 and 1820, it was estimated that over 15,000 volumes had been printed and sold in the Bengali language alone, mainly on Indian-owned presses: Ahmed, *Social Ideas*, 90. ↵
71. *thriving centre*: *ibid.*, esp. chs 3–4; Sisir Kumar Das, *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1800–1910* (1991), 23–83, 419–56;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79; *idem*, ‘Empires and Indian Liberals’, in Catherine Hall and Keith McClelland, *Race, Nation and Empire* (2010), 79; James Long, *Hand-Book of Bengal Missions ...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General Educational Efforts in North India* (1848), 472–3. Das records several Indian-owned presses in Calcutta and elsewhere between 1807 and 1818 (*History*, 426, 431, 435); the first Bengali newspaper appears to have been the *Bengal Gazetti* (1818), published by Gangadhar Bhattacharya. ↵
72. *Kasiprasad Ghosh*: *Asiatic Journal* 26 (1828), 317–20; Long, *Hand-Book of Bengal Missions*, esp. 472, appendices B and D; Rosinka Chaudhuri, ‘Orientalist Themes and English Ver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University of Oxford DPhil thesis, 1995). ↵
73. *agitating since the 1810s*: Bayly, ‘Empires and Indian Liberals’, 80–81. ↵
74. ‘We are here in India’ etc.: minute by James Farish (acting governor), 28 Aug. 1838, quoted in B. K. Boman-Behram, *Educational Controversies in India* (Bombay, [1943]), 236–7. ↵
75. ‘a medium through which’ etc.: quoted in Priolkar, *Printing Press in India*, 114–17; see also 109–10, 119–20, 122–5; Barns, *Indian Press*, 134–5. ↵
76. *James Silk Buckingham*: Ralph E. Turner, *James Silk Buckingham* (1934); *ODNB*, s.v. ‘Buckingham, James Silk’. ↵
77. *Calcutta Journal*: for this and the following two paragraphs of this chapter, see BL, MSS Eur F140/61(a): copies of papers relating to the press in India, 1819–22; BL, MSS IOR/P10/55: Bengal government Council minutes and memoranda

- about the press, 1822; 1834 *CJ Report*; Barns, *Indian Press*, chs 6, 8 (quoting 115: 'political events or transactions' – new regulations of 4 Apr. 1823). Similar regulations were adopted in Bombay in 1825 and 1827: Priolkar, *Printing Press in India*, 131–40. ↵
78. *dealing with troublesome print*: Ritika Prasad, 'Imprimatur as Adversary', *Modern Asian Studies* 55 (2021). ↵
79. 'affect the British power' etc.: 1834 *CJ Report*, appendix: 41. ↵
80. 'will rebound hither': quoted in Lynn Zastoupil, *Rammohun Roy and the Making of Victorian Britain* (2010), 101. See also BL, MSS Eur F140/63, for discussions on the subjec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company and new governor-general. ↵
81. *Commons select committee*: 1834 *CJ Report*. ↵
82. *Rammohun Roy*: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materials relating to Roy are drawn from James Silk Buckingham, 'Sketch of the Life, Writings, and Character of Ram Mohan Roy', *Parliamentary Review* 4: 32 (1 Feb. 1833), 113–20; *English Works of Raja Rammohun Roy*, ed. Jogendra Chunder Ghose, 3 vols (1901 edn); *Letters and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Life of Raja Rammohun Roy*, ed. Rama Prasad Chanda and Jatindra Kumar Majumdar (1938); J. K. Majumdar, *Raja Rammohun Roy and Progressive Movements in India* (1941); Bruce Carlisle Robertson, *Raja Rammohun Ray* (1995); Zastoupil, *Rammohun Roy*, esp. ch. 6. ↵
83. *As a writer*: see e.g. Ram Mohun Roy, *A Defence of Hindoo Theism* (Calcutta, 1817); Rammohun Roy, *A Second Defence of the Monotheistical System* (Calcutta, 1817); idem,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ment of the Vedant* (1817); [Roy], *Translation of a Conference* [Calcutta, 1818]; Zastoupil, *Rammohun Roy*, 25–8; ODNB, s.v. 'Roy, Rammohun', for his Sanskrit publications. The opening issue of Roy's *Mirat* announced that the paper would constantly bear in mind 'the saying of the Poet, that "the wounds of the spear may be healed, but a wound inflicted by the tongue is incurable"' (Majumdar, *Raja Rammohun Roy*, 299). Roy was a dedicated student of the Christian Bible, and that sounds remarkably like a paraphrase of the Old Testament verse contrasting the stroke of the whip with the stroke of the tongue (Ecclesiastes 28:17). ↵
84. 'on all occasions': [George Augustus Frederick Munster, Earl of] Fitzclarence, *Journal of a Route across India* (1819), 106. ↵
85. *a frequent contributor*: Buckingham, 'Sketch of the Life', 115. ↵
86. *Roy himself founded two weeklies* etc: Majumdar, *Raja Rammohun Roy*, 283–336; Zastoupil, *Rammohun Roy*, 99–100 (quoted: 'the benefits to be expected'). ↵
87. *his own press*: Buckingham, 'Sketch of the Life', 116 ↵
88. 'If it be true': *Calcutta Journal*, 31 Jan. 1822, quoted in Majumdar, *Raja Rammohun Roy*, 285. ↵
89. 'powerful engine': *Calcutta Journal*, 14 Feb. 1823, quoted in Majumdar, *Raja Rammohun Roy*, 315. ↵
90. *closed down in his paper*: Majumdar, *Raja Rammohun Roy*, 319–23. ↵

91. *Dwarkanath Tagore*: Kissory Chand Mitra, *Memoir of Dwarkanath Tagore* (Calcutta, 1870), 39–48; *ODNB*, s.v. ‘Tagore, Dwarkanath’. ↪
92. ‘to punish millions’: Roy, *English Works*, ed. Ghose, 2: 312. ↪
93. *their arguments*: *ibid.*, 2: 278–319; *Asiatic Journal* 16 (1823), 581–95; ‘Letter of certain natives of India, to Mr Canning’ [Nov. 1824], *Oriental Herald* 7 (1825), 193–4. ↪
94. ‘shackled’ and ‘enslaved’ etc.: Jugunnouth Mugmoodare, ‘Letter of a Native of India’, *Oriental Herald* 7 (1825), 188–92. ↪
95. ‘Asiatic’: Roy, *English Works*, ed. Ghose, 2: 285. ↪
96. ‘people placed under’: *ibid.*, 285–6. ↪
97. ‘the natives of India’ etc.: *ibid.*, 288–9. ↪
98. ‘already served’: *ibid.*, 282. ↪
99. ‘unlimited confidence’: *ibid.*, 279. ↪
100. ‘the most precious’: *ibid.*, 285. ↪
101. ‘suddenly’ and illegally ‘invaded’: *ibid.*, 287, 291–2. ↪
102. ‘assured of the possession’: *ibid.*, 281. ↪
103. *legally difficult*: see e.g. 1834 *CJ Report*, appendix: 54–5, 123–8, 131–9. ↪
104. ‘Inhabitants of Calcutta’ etc.: Roy, *English Works*, ed. Ghose, 2: 285. The practical basis of this claim was the fact that, unlike Indians in the interior territories, all inhabitants of Calcutta wer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English-law Supreme Court that the British had established at Fort William. For other notable examples of Roy’s arguing against discriminatory British-Indian laws and practices, and in favour of the equal treatment of Indians and Europeans, non-Christians and Christians, see *The Correspondence of Raja Rammohan Roy*, vol. 1: 1809–1831, ed. Dilip Kumar Biswas (1992), 1–19, 356–86; Chatterjee, *Black Hole of Empire*, ch. 5. ↪
105. ‘to preserve the union’ etc.: Roy, *English Works*, ed. Ghose, 2: 309. ↪
106. ‘great aversion’: *Asiatic Journal*, new series 12 (1833), 197. For Roy’s views on the spiritual superiority of ancient Hindu revelation and culture over its European equivalents, see Robertson, *Raja Rammohan Ray*. ↪
107. ‘greatly attached to us’ etc.: *The Correspondence of Jeremy Bentham*, ed. T. L. S. Sprigge et al., 13 vols (1968–2024), 13: 59, 472 (James Young to Bentham, 30 Sept. 1828 and 14 Nov. 1830); see generally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11, 101–2. ↪
108. ‘error in managing’ etc.: Roy, *English Works*, 2: 283, 286; see also 299 and ‘Letter of certain natives’. ↪
109. *When the Mirat condemned*: for these examples, see Majumdar, *Raja Rammohun Roy*, 299–300; Chatterjee, *Black Hole of Empire*, 148;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77–8. ↪
110. ‘public remark’ etc.: Roy, *English Works*, ed. Ghose, 2: 298–305. ↪

111. 'slaves' etc.: *ibid.*, 306, 309. An 1826 petition which Roy also promoted likewise complained that under British rule Indians had been reduced to 'a state of political degradation which is absolutely without a parallel in their former history': *Correspondence*, vol. 1, ed. Biswas, 364. ↪
112. *the position of Roy*: though it's notable that in 1831, giving evidence to parliament in Britain, Roy was more circumspect, arguing for 'the importance of the fullest publicity being afforded to judicial proceedings by means of the press', and the vital role of the 'superintendence of public opinion' over public officials, yet demurring that 'I have no reference to the question of a free press, for the discussion of local politics, a point on which I do not mean to touch': Roy, *English Works*, ed. Ghose, 2: 14. By this time, he and Tagore had both helped found new papers in Calcutta: Majumdar, *Raja Rammohun Roy*, 326ff. ↪
113. *Buckingham* etc.: for Buckingham, Bentham and others, see e.g. Buckingham, 'Examination of the Arguments Against a Free Press in India', *Oriental Herald and Colonial Review* 1: 2 (Feb. 1824), 197–224 and 18: 57 (Sept. 1828), 442–61; Zastoupil, *Rammohun Roy*, ch. 9; *Correspondence of Jeremy Bentham*, 12: 58 (Bentham to Sir Francis Burdett, 23 Sept. 1824);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121–2. ↪
114. 'The cause is noble': Leicester Stanhope, *Sketch of the History and Influence of the Press in British India* (1823), foreword. ↪
115. 'the people of India': *ibid.*, 6. ↪
116. 'our fellow-subjects': *ibid.*, foreword. Twenty million pounds was a gigantic sum, equivalent to almost half of the annual budge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t this time. ↪
117. 'mental despotism': *ibid.*, 52. ↪
118. 'Do not treat' etc.: *ibid.*, 183. ↪
119. 'the Typographical Colonel': *ODNB*, s.v. 'Stanhope, Leicester Fitzgerald Charles, fifth earl of Harrington'. ↪
120. *openness of discussion*: see e.g. Seid Gholam Hossein Khan, *The Seir Mutaqherin, or Review of Modern Times*, [trans. Haji Mustapha], 3 vols (Calcutta, 1789–90), 1: 22–3 of Translator's Preface; 2: 406–7, 545–6, 550–51, 566–9, 596–8, and 21, 25 of second pagination;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80–81; Robert Travers, 'Indian Petitioning and Colonial State-Form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engal', *Modern Asian Studies* 53 (2019), 113–16. ↪
121. *collective petitioning*: Stanhope, *Sketch*, 5; *Petitioning and Political Cultures in South Asia*, special issue of *Modern Asian Studies* 53 (2019). ↪
122. *other side of the debate*: see e.g. Stanhope, *Sketch*, 70–71; Ahmed, *Social Ideas*, 72. When, a few months after Buckingham's deportation, the *Calcutta Journal* dared to start publishing extracts from Stanhope's pamphlet, the government of Bengal shut the paper down for good: *ibid.*, 73. ↪
123. 'Political discussion': quoted in Majumdar, *Raja Rammohun Roy*, 283–4. ↪

124. 'depends not' etc.: *Asiatic Journal* 14 (1822), 138*. ↩
125. 'a presumptuous "Black Man"': *Correspondence of Jeremy Bentham*, 13: 58 (James Young to Bentham, 30 Sept. 1828); for another example, see Sophia Dobson Collet,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Raja Rammohun Roy*, ed. Dilip Kumar Biswas and Prabhat Chandra Ganguli (1962), 326. ↩
126. 'for the purpose of fomenting': *Asiatic Journal* 14 (1822), 139. ↩
127. 'like permitting the approach': Stanhope, *Sketch*, 73, quoting a speech by Charles Grant, the influential former chairma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Board of Directors. ↩
128. 'our peculiar situation' etc.: BL, MSS Eur F140/61(b): copy of a minute by Sir Thomas Munro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on the liberty of the Indian press, April 1822. ↩
129. 'must be force' etc.: BL, MSS Eur F140/60(a): memorandum by B. H. Jones for Lord Amherst on the 'Political State of India', Nov. 1822, 208–9 (quoting an earlier memo from Sir Thomas Munro to Lord Hastings). ↩
130. 'but in no sense' etc.: letter from the chairman and deputy chairma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ntrol, 17 Jan. 1823, in *1834 CJ Report*, appendix: 124–5. Like all the other presumptions surveyed here, this was a much-repeated notion. ↩
131. 'conquered people' etc.: *ibid.*, 132–3, memorandum by Sir John Malcom on liberty of the press in India, 12 Apr. 1822. ↩
132. 'black' Indians and 'half-castes' etc.: BL, MSS Eur F140/56: Sir Thomas Reid to Lord Amherst, 28 Nov. 1822. ↩
133. 'notions of their own importance': letter from the chairman and deputy chairma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ntrol, 17 Jan. 1823, *1834 CJ Report*, appendix: 126. ↩
134. 'the rights of man' etc.: BL, MSS Eur F140/56: Sir Thomas Reid to Lord Amherst, 28 Nov. 1822. ↩
135. 'lower the European character': letter from the chairman and deputy chairma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ntrol, 17 Jan. 1823, in *1834 CJ Report*, appendix: 125. ↩
136. 'the evils': [John Adam], *Statement of Facts Relative to the Removal from India of Mr. Buckingham* (Calcutta, 1823), 57; cf. BL, MSS IOR/P10/55: minute of William Bayley about press liberty and the native press, 10 Oct. 1822; Zastoupil, *Rammohun Roy*, 101, 140–41. ↩
137. 'that if full licence': *CW*, 30: 70. ↩
138. *offered him a seat*: on Mill and India, see *CW*, 1: 82–7, 247–9 ('I had given enough of my life to India' is how he revealingly described in his autobiography his decline of the offer of a seat on the Council of India: *CW*, 1: 249); *CW*, 30. ↩
139. 'enlightened' etc.: *ibid.*, 79–80, 93, 103; see also same sentiments at 164. ↩

140. *much illuminating recent work*: see esp. Lynn Zastoupil, *John Stuart Mill and India* (1994); Martin I. Moir et al. (eds), *J. S. 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1999); Pitts, *Turn to Empire*, ch. 5; Karuna Mantena, 'Mill and the Imperial Predicament', in Nadia Urbinati and Alex Zakaras, *J. S. Mill's Political Thought* (2007). ↵
141. *powerful imperial agent*: ODNB, s.v. 'Mill, James'; *CW*, 1: 6–7, 82–4; *CW*, 30. 'The happiness and misery of so many millions are affected by what I write,' he boasted to a friend in 1819 about his extraordinary new sway over the peoples of India: quoted in Pitts, *Turn to Empire*, 125. ↵
142. *'I am going'*: *Correspondence of Jeremy Bentham*, 12: 458 (Bentham to James Young, 28 Dec. 1827). For further testimony of Mill's great influence on Indian policy, see *ibid.*, 12: 447–51 (Bentham to Rammohun Roy, Dec. 1827? and 8 Feb. 1828); *ibid.*, 13: 14 (Bentham to Richard Clark, Aug. 1828); *CW*, 1: 28–9. ↵
143. *foundations of his own education*: on 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 see *CW*, 1: 6–9, 10 n., 16, 27–9, 562, 582. ↵
144. *'infancy'* etc.: quoted in Pitts, *Turn to Empire*, 123, 127–33, 139. ↵
145. *plenty of commentators criticized*: see e.g. *Asiatic Journal* 25 (1828), 596–602; 26 (1828), 317–20; 27 (1829), 525–38, 665–78; 28 (1829), 1–14, 257–67, 513–25; 29 (1830) 81–91, 191–8; J. V. Naik, 'Instant Indian Nationalist Reaction to James Mill's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63 (2002); Bayly, 'Empires and Indian Liberals', 78–9. ↵
146. *repudiated his father's views*: see e.g. Lynn Zastoupil, 'India, J. S. Mill, and "Western" Culture', in Moir et al. (eds), *J. S. Mill's Encounter*, 136–9. ↵
147. *'the eldest son'* etc.: *CW*, 1: 26–9, 212–13. ↵
148. *'independent negro commonwealth'*: *CW*, 1: 304–5 (1824); for Mill's later crusades against bigotry, see e.g. Pitts, *Turn to Empire*, 161–2. ↵
149. *'the passive and slavish'* etc.: *CW*, 30: 30, 93, 117, 165. For the general point, see esp. Pitts, *Turn to Empire*, 133–44; Catherine Hall, 'The Nation Within and Without', in *idem* et al. (eds), *Defining the Victorian Nation* (2000), 188–91; Mantena, 'Mill and the Imperial Predicament', 307–10. ↵
150. *'the more powerful race'* etc.: *CW*, 30: 13–15. ↵
151. *system of colonial rule*: only occasionally, after the rebellion of 1857, did Mill ever acknowledge that in some respects British policies in India 'have done, and are still doing, irreparable mischief'. But even such injustice he invariably exculpated as 'committed with the most generous intentions', or done 'for the most part innocently': *CW*, 30: 222, 93. ↵
152. *Mill's views*: cf. Christopher Barker, 'Unfree, Unequal, Unempirical', in Robert G. Ingram et al. (eds), *Freedom of Speech, 1500–1850* (2020), esp. 242–5 (though 246 wrongly ascribes to Mill statements by others, which Mill was only signing to certify them as being true copies of Company papers). ↵
153. *'intelligent natives'* etc.: *CW*, 30: 51, 64–5. ↵
154. *'a people most difficult'* etc.: *ibid.*, 155, 176; see also 201. ↵

155. *'I myself'*: *ibid.*, 12: 365. ↩
156. *'the public of India'*: *ibid.*, 30: 49. ↩
157. *'organ exclusively of individual interests'* etc.: *ibid.*, 70–71, 165; see also 201–2. ↩
158. *'some Indian malcontent'*: *ibid.*, 165. ↩
159. *'Indian malcontents'* etc.: *ibid.*, 198. ↩
160. *'a society in which'*: quoted in Kris Grin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James Mill's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ical Journal* 60 (2017), 363. ↩
161. *'Utterly out of the questio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ies, 19: 513;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quoted Mill thus in a Commons speech of 10 July 1833; the latter's original exchange of 21 Feb. 1832 is printed in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House of Commons Papers 1831–2, 735–I: 49. ↩
162. *his basic theory*: Grint, 'Freedom of the Press'; [James Mill], 'Liberty of the Press', *Edinburgh Review* 18 (1811); [James Mill], 'Liberty of the Continental Press', *Edinburgh Review* 25 (1815); James Mill, 'Liberty of the Press' (1821), *Supplement to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 Editions of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6 vols (Edinburgh, 1815–24), 5: 258–72; transcripts of vols 1–4 of his commonplace books, at intellectualhistory.net/mill. ↩
163. *'this best bulwark'*: [Mill], 'Liberty of the Press' (1811), 98. ↩
164. *'institutions and functionaries'*: Mill, 'Liberty of the Press' (1821), 270. ↩
165. *'it would be impossible'*: [Mill], 'Liberty of the Press' (1811), 121. ↩
166. *'direct exhortation'* etc.: Mill, 'Liberty of the Press' (1821), 263–4. ↩
167. *'false facts'*: *ibid.*, 269–70. ↩
168. *So did that of Bentham*: Jeremy Bentham, *On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Discussion* (1821), 9–15. ↩
169. *'private men'*: Mill, 'Liberty of the Press' (1821), 269. ↩
170. *'private rights'*: *ibid.*, 258. ↩
171.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ibid.*, 263. ↩
172. *'the people'*: e.g. [Mill], 'Liberty of the Press' (1811), 116, 121; [idem], 'Liberty of the Continental Press', 116, 125–6, 133. ↩
173. *'human improvement'*: *ibid.*, 113; cf. *ibid.*, 112, 127–8; [Mill], 'Liberty of the Press' (1811), 98. ↩
174. *'the real point of importance'*: Mill, 'Liberty of the Press' (1821), 268. ↩
175. *'correct opinions'* etc.: *ibid.*, 267–8. ↩
176. *'freedom of discussion'*: *ibid.*, 270. ↩
177. *'there is no possible means'* etc.: [Mill], 'Liberty of the Continental Press', 132. ↩
178. *Westminster Review*: [John Stuart Mill], 'Law of Libel and Liberty of the Press', *Westminster Review* 3 (1825), 285–321 (quoting 285: 'abominations'). James

Mill's 1821 article was reprinted unchanged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editions of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which appeared in 1842 and 1857 respectively. The ninth edition, completed in 1888, no longer included an article on 'Liberty of the Press', substituting instead brief entries on 'Press Laws' and 'Libel'. ↵

179. *further thought*: for one likely influence on John Stuart Mill's later thought, see Samuel Bailey,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pinions* (1821); and for this and other strands of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arguments about free speech, and Mill's relationship to them, see Gregory Conti, 'What's Not in *On Liberty*',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55 (2016); idem, 'Before – and Beyond – *On Liberty*', in Ingram et al. (eds), *Freedom of Speech*; K. C. O'Rourke, *John Stuart Mill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2001), pt 1. ↵
180. "*liberty of the press*" etc.: *CW*, 18: 228. In his footnote, Mill was referring to two cases in 1858 whe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d (though ultimately unsuccessfully) prosecuted London publications that seemed to justify a recent assassination attempt against Napoleon III in Paris. ↵
181. '*thought and discussion*' etc.: *ibid.* ↵
182. '*mental development*' etc.: *ibid.*, 219–20, 241–2. ↵
183. '*necessity to the mental well-being*': *ibid.*, 257. Cf. 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 John B. Thompson, trans.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1991), ch. 6. ↵
184. '*if it is not fully*' etc.: *CW*, 18: 243, 262. ↵
185. '*to enable average*' etc.: *ibid.*, 243. ↵
186. '*abstract right*': *ibid.*, 224. ↵
187. '*moral, social*': *ibid.*, 15: 581 (Mill to Theodor Gomperz, 4 Dec. 1858). ↵
188. '*the dictum that truth*': *ibid.*, 18: 238. ↵
189. '*as mankind improve*' etc.: *ibid.*, 250. ↵
190. '*the propagation of doctrines*' etc.: *ibid.*, 231. ↵
191. '*which concerns others*' etc.: *ibid.*, 223–4. ↵
192. '*self-regarding conduct*' etc.: for this principle, which Mill often refers to, though without fully addressing its implications for all manner of speech, see e.g. *ibid.*, 296. ↵
193. '*liberty of thought and discussion*' etc.: *ibid.*, 225–6; see also 227: 'the Liberty of Thought: from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separate the cognate liberty of speaking and writing'. ↵
194. '*even opinions lose their immunity*' etc.: *ibid.*, 260–61. ↵
195. '*not a place*': *ibid.*, 241. ↵
196. '*No one can be a great thinker*': *ibid.*, 242; cf. 268 on 'genius'. ↵
197. '*World history travels*' etc.: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trans. H. B. Nisbet (1975), 190, 197. ↵

198. *Auguste Comte*: Georgios Varouxakis, 'The Godfather of "Occidentality"',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6 (2019), and 'When did Britain Join the Occident?',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46 (2020). ↵
199. 'in modern Europe': *CW*, 18: 120–21 ('Civilization', 1836). ↵
200. 'magnificent palaces' etc.: *ibid.*, 243. ↵
201. 'well-developed human beings' etc.: *ibid.*, 267, 274. ↵
202. 'the absolute and essential': *ibid.*, 215. ↵
203. 'public opinion' etc.: *ibid.*, 268–9, 272–4. ↵
204. *pessimism of late middle age*: *ibid.*, lxxxi. ↵
205. *history*, 'progress', etc.: for Mill's frequent earlier rehearsal of these themes, see e.g. *ibid.*, 119ff., 'Civilization' (1836); 155ff., 'De Tocqueville on Democracy in America [II]' (1840). ↵
206. 'human beings in the maturity': *CW*, 18: 224. ↵
207. 'we may leave out': *ibid.* The Mughal emperor of India, Akbar (1542–1605), who ruled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was famous for his military conquests, successful government and intellectual open mindedness. The only other explicit reference to India in *On Liberty* came in a factually dubious footnote about the dietary customs of its different religions (18: 285 n.). ↵
208. 'the stage of progress' etc.: *CW*, 18: 217, 224. See also *ibid.*, 223: 'any member of a civilized community', and 19: 39–5, 567–8, 568–77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861). ↵
209. 'India (for example) is not fit': *ibid.*, 568. ↵
210. 'I am not aware': *ibid.*, 18: 291. ↵
211. 'with which an intelligent': 'Limitations of Indian Liberty', *Calcutta Review* 34 (1860), 101. ↵

9.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UNFREEDOMS

1.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ODNB*, s.v. 'Stephen, Sir James Fitzjames, first baronet (1829–1894)', 'Stephen, James (1758–1832)' (grandfather), 'Stephen, Sir James (1789–1859)' (father). ↵
2. *disciple of John Stuart Mill*: 'Mr Mill on Political Liberty', *Saturday Review*, 12 and 19 Feb. 1859; K. C. O'Rourke, *John Stuart Mill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2001), 94, 101–4. ↵
3. *rejection of Mill's influential theory*: *LEF*, xxi n. 10, 24–5; *ODNB*. Stephen's book also took aim at Mill's essays *Utilitarianism* (1862) and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 It originally appeared as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the *Pall Mall Gazette*, between November 1872 and January 1873, and then was published as a book in April 1873; Mill died on 7 May of that year. ↵
4. 'my Indian experience': *LEF*, 3. ↵

5. 'If Mr. Mill' etc.: *ibid.*, 40–41. ↪
6. 'To publish opinions' etc.: *ibid.*, 64, 92. ↪
7. 'irrational' etc.: *ibid.*, 47–50. ↪
8. 'the minority are wise': *ibid.*, 10. ↪
9. 'the wise minority': *ibid.*, 10; see also 39, 45–6. ↪
10. 'have become capable' etc.: *ibid.*, 34–9. ↪
11. 'very small minority' etc.: *ibid.*, 87–8. ↪
12. 'rough' and 'civilized': *ibid.*, 36. ↪
13. 'that force is used': *ibid.*, 37. ↪
14. 'were brought about': *ibid.*, 31–3. ↪
15. 'forced upon the people' etc.: *ibid.*, 49–53. ↪
16. 'the subjects' etc.: John Bruce Nort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Southern India* (Madras, 1853), 8. ↪
17. *After the rebellion*: John Bruce Norton, *Topics for Indian Statesmen*, ed. G. R. Norton (1858), ch. 11 (mainly, though not exclusively, concerned with the English, rather than the vernacular press; 346 for the critique of Mill); *ODNB*, s.v. 'Norton, John Bruce (1815–1883)'. ↪
18. *directly exposed to print*: C. 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2012), 79; Robert Darnton, *Censors at Work* (2014), 91–5, 119. ↪
19. 'townsmen of Bombay': J[ohn] Chapman, preface to Nowrozjee Furdoonjee, *On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Bombay Presidency* (1853), iv (and see 17); *ODNB*, s.v. 'Chapman, John (1801–1854)'. ↪
20. *indigenous eyes*: Furdoonjee, *Civil Administration*, viii, 1–2, 9, 25. ↪
21. *strategically choosing*: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12–13, 201; see also S. Ambirajan, 'John Stuart Mill and India', in Martin I. Moir et al. (eds), *J. S. 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1999), 245–57. ↪
22. 'John Stuart Mill is the greatest' etc.: Ashutosh Mookerjee,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Mookerjee's Magazine* 2 (1873), 372, 377, 381, 391–2; see also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202–3, 210–11, 346. ↪
23.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Press Law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and India',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5 vols (9th edn, 1875–89), 19: 722. ↪
24. *1820s regulations were repealed*: 'Printing-Presses', Act no. XI of 1835; cf. *A Penal Code Prepared by the Indian Law Commissioners* (Calcutta, 1837), clauses 291–3 and Note L; A. F. Salahuddin Ahmed, *Social Ideas and Social Change in Bengal, 1818–1835* (2nd edn, 1976), 85–9. ↪
25. *vast network of surveillance*: Darnton, *Censors at Work*, 101 ('censorship overlaid with protests denying its existence', as he beautifully epitomizes the resulting system). ↪

26. 'a modern war of propaganda': C. A.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1996), 319; see also 319–23, 329–31, 335–45, 350–51, 361, 366. ↪
27. 'to excite feelings': Act no. XXVIII of 1870, amending the penal code (the text of this provision was based on clause 113 of Macaulay's 1837 draft code, whose presumptions are analysed later in this chapter). ↪
28. 'read by and disseminated' etc.: quoted in Margarita Barns, *The Indian Press* (1940), 279–88. ↪
29. 'disaffection to the government' etc.: *ibid.*, 304–6. ↪
30. 'to split up': quoted in Sumit Sarkar, *The Swadeshi Movement in Bengal 1903–1908* (1973), 18. ↪
31. 'both by openly seditious': Darnton, *Censors at Work*, 127, quoting the explanatory text published with the 1910 Indian Press Act; see also Barns, *Indian Press*, chs 13–17, appendices 1–3. ↪
32. 'nothing can be further' etc.: quoted in Darnton, *Censors at Work*, 273 n. 35. ↪
33. 'We must take': quoted *ibid.*, 124. ↪
34. 'free expression of opinion': Shiva Rao, *The Framing of India's Constitution*, 5 vols (1966–8), 1: 44, 59 – in 1924–5,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a proposed constitution included 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of opinion and the right of assembly peaceably and without arms'; in a 1928 draft constitution, this was amended to: 'The right of free expression of opinion, as well as the right to assemble peaceably and without arms, and to form associations or unions, is hereby guaranteed for purposes not opposed to public order or morality.' ↪
35. *This pattern*: see e.g. Aurobindo Mazumdar, *Indian Press and Freedom Struggle* (1993). ↪
36. 'harm the reputation' etc.: *A Penal Code Prepared by the Indian Law Commissioners* (Calcutta, 1837), quoting clauses 282 and 469; see also clause 485 and Notes J and R. ↪
37. Mill, reviewing Macaulay's text: *CW*, 30: 29. ↪
38. 'monstrous superstition' etc.: *Penal Code*, Note J. ↪
39. 'the peculiar circumstances' etc.: *ibid.*, Note R. ↪
40. 'Religious discussion': *ibid.*, Note J. ↪
41. 'wounding' etc.: *ibid.*, Note M. ↪
42. 'there is probably no country' etc.: *ibid.*, Note J. ↪
43. 'discussions having a tendency': 1834 *CJ Report*, appendix: 41; Barns, *Indian Press*, 115–23. Macaulay described his own appointment to the Council as to be 'the guardian of the people of India against the European settlers': *The Letters of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ed. Thomas Pinney, 6 vols (1974–81), 2: 340 (to Hannah Macaulay, 22 Nov. 1833). ↪
44. *Mill's early dispatches*: Penelope Carson, 'Golden Casket or Pebbles and Trash?', in Moir et al. (eds), *J. S. Mill's Encounter*, 160–66. ↪

45. 'irritating and insulting remarks': *English Works of Raja Rammohun Roy*, ed. Jogendra Chunder Ghose, 3 vols (1901 edn), 2: 297. ↪
46. 'no alarm whatever prevails' etc.: *ibid.*, 300; see also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191. ↪
47. *far longer tradition*: Leicester Stanhope, *Sketch of the History and Influence of the Press in British India* (1823), 84–8, 153–4. ↪
48. *their own weekly publications*: see e.g. Ahmed, *Social Ideas*, 34–5. ↪
49. 'To assert' etc.: Stanhope, *Sketch*, 184. ↪
50. *the young Tom Macaulay*: Catherine Hall, *Macaulay and Son* (2012), 73–9, 204–14, 239–40;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ies, 19: 513 (speech by Macaulay, 10 July 1833). ↪
51. 'a very remarkable man': *Letters*, ed. Pinney, 2: 47. ↪
52. 'I am plagued' etc.: Macaulay to Hannah Macaulay, 21 May 1833: *Letters*, ed. Pinney, 2: 242; for similar sentiments, see also 2: 245–6, 283. ↪
53. 'a decomposed society' etc.: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ies, 19: 503–36 (speech by Macaulay, 10 July 1833). He thought it 'the best speech, by general agreement, and in my own opinion, that I ever made in my life': *Letters*, ed. Pinney, 2: 268; see also 283. Twenty years later, in one of his final interventions as an MP, he argued (as John Stuart Mill also had done, the previous year) that no natives had yet been admitted to the ranks of India's administration simply because not a single Indian was as yet intellectually qualified to serve in it: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ies, 128: col. 757 (24 June 1853). ↪
54. 'legislating for a conquered race': quoted in Hall, *Macaulay*, 215; see also 127;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ies, 19: 503–36 (speech of 10 July 1833); *Letters*, ed. Pinney, 2: 329, 365, 367 (for James Mill's support); 3: 193, 345, and *passim* for his taking the job to gain financial independence. ↪
55. 'absolutely immeasurable': Macaulay, minute on education, 2 Feb 1835, printed in G. O. Trevelyan, *The Competition Wallah* (1864), 414. ↪
56. 'sound and useful' etc.: Macaulay to James Mill, 24 Aug. 1835: *Letters*, ed. Pinney, 3: 150. ↪
57. 'a single shelf' etc.: Macaulay, minute on education, in Trevelyan, *Competition Wallah*, 413, 415. ↪
58. *he also pushed his colleagues*: George Otto Trevelyan, *Life and Letters of Lord Macaulay*, 2 vols (1876), 1: 344–8. ↪
59. 'the Bengalee' etc.: Hall, *Macaulay and Son*, 248; see also chs 5 and 6. ↪
60. *penal code*: for its long gestation and ignoring of Indian opinion, see Atul Chandra Patra,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Indian Penal Code', *Journal of the Indian Law Institute* 3 (1961); K. J. M. Smith, 'Macaulay's "Utilitarian" Indian Penal Code', in W. M. Gordon and T. D. Fergus, *Legal History in the Making* (1991). It came into operation on 1 Jan. 1862. ↪

61. *particular criticism*: T. B. Macaulay et al., *The Indian Penal Code, as Originally Framed in 1837* (Madras, 1888), 409–17. ↪
62. *in the end*: 1860 penal code, clauses 298 and 499 (though the truth defence was restricted to matters concerning ‘the public good’); the sedition clause, 124A, expanding Macaulay’s 1837 clause 113, was added in 1870. ↪
63. *‘gesture or sound’* etc.: Macaulay et al., *Indian Penal Code, as Originally Framed*, 409–10. ↪
64. *created more religious conflict*: Asad Ali Ahmed, ‘Specters of Macaulay’, in Raminder Kaur and William Mazzarella (eds), *Censorship in South Asia* (2009). ↪
65. *‘and which might lead’*: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A History of the Criminal Law of England*, 3 vols (1883), 3: 312–13; see also idem, ‘Codification in India and England’, *Fortnightly Review* 18 (1872), 654. In 1870, Stephen was responsible for adding Section 124A to the penal code. ↪
66. *‘to promote feelings of enmity’*: section 153A, added by the Indian Penal Code (Amendment) Act, 1898; cf. Abhinav Chandrachud, *Republic of Rhetoric* (2017), 227. ↪
67. *to punish ‘insult’*: Neeti Nair, ‘Beyond the Communal 1920s’,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50 (2013). ↪
68. *‘sectarian animosity’* etc.: for this and the following three paragraphs of this chapter, see *Abstrac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of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 Assembled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1898*, 37 (Calcutta, 1899), 31–51 (18 Feb. 1898); here quoting 31–6 (Mackenzie Dalzell Chalmers). ↪
69. *‘over 250 millions’* etc.: *ibid.*, 49 (Sir Griffith Evans); see also 48 (James La Touche), 65–7 (H. E. M. James). ↪
70. *‘the tendency’*: *ibid.*, 90–91 (Sir Alexander Mackenzie). ↪
71. *‘we want simply’*: *ibid.*, 36 (Chalmers); see also 69 (C. C. Stevens), 95 (Mackenzie), 152 (Viceroy Lord Elgin). ↪
72. *‘philosophic treatises’*: *ibid.*, 67 (James); see also 51 (Evans), 53–4 (La Touche). ↪
73. *‘semi-educated’* etc.: *ibid.*, 92–3 (Mackenzie). ↪
74. *‘disaffection’* etc.: *ibid.*, 37–42 (quoting 40). ↪
75. *‘over-zealous police-official’* etc.: *ibid.*, 147 (Chitnavis). See also Chandrachud, *Republic of Rhetoric*, 227. ↪
76. *‘who else are fit’*: *Abstrac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60. ↪
77. *‘faulty and unfounded’* etc.: *ibid.*, 60, 63; cf. e.g. Sailendra Nath Sircar, ‘Liberty of the Press’, *National Magazine* 12 (1898), 71–5; A. Stephen, ‘John [sic] Silk Buckingham and the Liberty of the Indian Press’, *National Magazine* 13 (1898), 106–13. ↪
78. *‘obnoxious’* etc.: *Abstrac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74, 75 (Bishambar Nath); see also 72–5, 145. ↪

79. 'the general native public': *ibid.*, 77 (Ramhimtulla Mohamed Sayani); see also 75–83. The Maharaja of Darbhanga, Lakshmeshwar Singh, a new member attending his first meeting of the Council, first voted in favour of the measure, but then introduced several unsuccessful opposition amendments to reduce the scope of section 124A: *ibid.*, 106–16, 116–30. ↵
80. 'religious beliefs' etc.: quoted in Nair, 'Beyond the Communal 1920s', 334; for the debates, see *Legislative Assembl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First Session of the Third Legislative Assembly, 1927* (Delhi, 1927–8). Once again, the proposed text was not circulated in vernacular languages; once again, it faced strong public opposition. ↵
81. 'Many of the greatest' etc.: *Legislative Assembly Debates ... 1927*, 4460. ↵
82. 'most dangerous' etc.: *ibid.*, 4469, 4474, 4478. ↵
83. 'alien' etc.: *ibid.*, 4478–80; see also 4467, 4469–74. ↵
84. 'to preach disaffection' etc.: quoted in Chandrachud, *Republic of Rhetoric*, 39–40. ↵
85. 'could safely trample' etc.: Nathuram Godse quoted in Neeti Nair, *Hurt Sentiments* (2023), 31; see generally *ibid.*, ch. 1. ↵
86. 'No law shall be made': quoted in Rao, *Framing*, 2: 87. ↵
87.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etc.: quoted *ibid.*, 5: 755; for the creation of India's new constitution, see generally *ibid.*, vols 2–5. ↵
88. *further laws*: e.g. section 153B, added in 1972, against speech 'prejudicial to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2017 the Law Commission of India recommended the addition of two further clauses (153C and 505A), prohibiting 'incitement to hatred' and 'causing fear, alarm, or provocation of violence'. ↵
89. *past two decades*: see e.g. Siddharth Narrain, 'Law, Language and Community Sentiment', in Janny H.C. Leung and Alan Durant, *Meaning and Power in the Language of Law* (2018); Amrita Basu, 'Changing Modalities of Violence', in Karen Barkey et al. (eds), *Negotiating Democracy and Religious Pluralism* (2021); Nair, *Hurt Sentiments*. ↵
90. *further afield*: on adoption of versions of the penal code beyond India, see Mirjam Maters, *Van zachte wenk tot harde hand* (1998), esp. chs 3 and 7; H. F. Morris, 'A History of the Adoption of Codes of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 1876–1935', *Journal of African Law* 6 (1974); M. L. Friedland, 'R. S. Wright's Model Code',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 (1981). The version of the Indian penal code adopted in Sudan in 1899 omitted its provisions against religiously hurtful words. ↵
91. *model criminal code*: R. S. Wright, *Drafts of a Criminal Code and a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Parliamentary Papers, 1877, C–1893; Friedland, 'R. S. Wright's Model Criminal Code'. It was eventually adopted only in British Honduras, Tobago, St Lucia, British Guiana and the Gold Coast. ↵

92. *penal code for England: Criminal Code (Indictable Offences) Bill* (Bill 178, 41 Vict.; 1878), sections 41, 55–6, 98, 176–85. ↪
93. *revised version of this code: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Appointed to Consider Indictable Offences: With ... A Draft Code*, Parliamentary Papers, 1879, C-2345, sections 102–3, 141 (adding ‘in decent language’ to the good faith exemption for blasphemy), 227–43. ↪
94. *fairly random*: Morris, ‘History of the Adoption of Codes of Criminal Law’; Friedland, ‘R. S. Wright’s Model Code’. ↪
95. *early European theorists*: Jeremy Waldron, *The Harm in Hate Speech* (2012), ch. 8; Teresa M. Bejan, *Mere Civility* (2017). ↪
96. *Southern US states*: see e.g. *The Code of Tennessee 1932* (1931), paras 2343–5 (in force until 1967); *Mississippi Code of 1930 of the Public Statut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paras 7315–16 (in force until 1968). Similar statutes were enacted in Oklahoma (1923–5), and Arkansas (1928–68). All such laws were ruled unconstitutional by the Supreme Court in *Epperson v. Arkansas*, 393 US 97 (1968). ↪
97. *Germany*: David Riesman, ‘Democracy and Defamation: Control of Group Libel’, *Columbia Law Review* 42 (1942), 729 n. 15, 741–2, 744. ↪
98. *France*: Waldron, *Harm in Hate Speech*, 40. ↪
99. *1930s onwards*: cf. Karl Loewenstein, ‘Militant Democracy and Fundamental Righ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1 (1937), 651–4; idem, ‘Legislative Control of Political Extremism in European Democracies’, *Columbia Law Review* 38 (1938), 746–9. ↪
100. *South West Africa*: David Fraser, *Nazi Antisemitism and Jewish Legal Self-Defence* (2024), ch. 5. ↪
101. *South America*: see e.g. the 1940 Brazilian penal code, Article 140, which penalized insulting someone’s dignity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ur, ethnicity, religion or origin. ↪
102. ‘*with intent to create ill-will*’: *The Times*, 19 Sept. 1936; see also *ibid.*, 15 Aug. 1936; TNA, KV 2/1365, 94a: Security Service memo by T. M. Shelford, ‘The Imperial Fascist League’ (1942). ↪
103. ‘*attack on free speech*’ etc.: Arnold S. Leese, *My Irrelevant Defence* (1938), introduction. ↪
104. ‘*public mischief*’ etc.: *The Times*, 22 Sept. 1936. ↪
105. ‘*would be biting*’ etc.: see Christopher Hilliard, ‘Words that Disturb the Stat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8 (2016), 786, 789, and generally, for this and the following two paragraphs of this chapter. ↪
106. ‘*Group Defamation*’ etc.: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Law of Defamation* (1948), 11. ↪
107. ‘*calculated to incite*’: quoted in Gisela C. Lebzelter,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England 1918–1939* (1978), 131. ↪

108. 'words calculated': quoted *ibid.*, 140. ↪
109. 'the fact that': quoted in Hilliard, 'Words', 770–71. ↪
110. 'In the light of' etc.: quoted *ibid.*, 786. ↪
111. 'on grounds of colour': Race Relations Act (1965), clause 6. ↪
112. 'to prevent arising': quoted in Hilliard, 'Words', 787. ↪
113. 'by which a group': Danish penal code, paragraph 266b. ↪
114. 'arguments or suggestions':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Passed at a Regular Session* (1920), 307 (ch. 214); *Mississippi Code of 1930 of the Public Statut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section 1103. ↪
115. *legal redress for personal libel*: see Riesman, 'Democracy and Defamation: Control', 747 n. 104; *idem*, 'Democracy and Defamation: Fair Game and Fair Comment' [in two parts], *Columbia Law Review* 42 (1942). ↪
116. *some new statutes*: on American group libel laws, see e.g. C. Cahill and Basil Jones, *Callaghan's Illinois Statutes Annotated, 1917–1920* (1920), 614, 657–8; Joseph Tanenhaus, 'Group Libel', *Cornell Law Quarterly* 35 (1949), 271–2, 286–7. ↪
117. *Anti-Defamation League*: on Jewish activism and group libel laws, most of which were soon challenged and struck down, see Morton Rosenstock, *Louis Marshall* (1965), 149–50, 167–8;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1992), 315–16; Evan P. Schultz, 'Group Rights, American Jews, and the Failure of Group Libel Laws, 1913–1952', *Brooklyn Law Review* 66 (2000), 104–6. ↪
118. 'a class of citizens' etc.: *Revised Statutes of the State of Illinois 1917* (1918), 999–1000 (i.e. criminal code, sections 224a and 224b); see also *Beauharnais v. Illinois*, 343 US 250 (1952), 258–61; Samantha Barbas, 'The Story of *Beauharnais v. Illinois*', *Journal of Free Speech Law* (2023), 426–7. ↪
119. 'deliberately to slander and vilify': Nickieann Fleener-Marzec, 'D. W. Griffith's *The Birth of a Nation* ...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PhD thesis, 1977), 8 and *passim*. ↪
120. *experimentation with group libel laws*: see e.g. Riesman, 'Democracy and Defamation: Control', 733; 'Statutory Prohibition of Group Defamation', *Columbia Law Review* 47 (1947); Tanenhaus, 'Group Libel'; *idem*, 'Group Libel and Free Speech', *Phylon: The Atlanta Review of Race and Culture* 13 (1952); 'Group Libel Laws', *Yale Law Journal* 61 (1952); Samuel Walker, *Hate Speech* (1994), 82–6; David Goodman, 'Before Hate Speech', *Patterns of Prejudice* 49 (2015), 208; Samantha Barbas, 'The Rise and Fall of Group Libel',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Law Journal* 54 (2022). ↪
121. *in force today*: Connecticut General Statutes section 53-37 (2022); Massachusetts General Laws, ch. 272, section 98c (2022); Minnesota Statute section 609.765 (2022); West Virginia Code section 61-10-16 (covering any public 'picture or theatrical act') (2022). ↪

122. *'This is a white man's country'*: quoted in *The Worker: Illinois Edition*, 14 May 1950, 10. ↵
123. *supported Beauharnais's argument*: on the Beauharnais case, se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ile no. 105-291: the White Circle League of Chicago (at [archive.org](https://www.archive.org)); *Beauharnais v. Illinois*, 343 US 250 (1952); Barbas, 'The Story of *Beauharnais v. Illinois*'; Erika J. Pribanic-Smith and Jared Schroeder, 'Breaking the White Circle', *American Journalism*, 38 (2021). ↵
124. *'the Founders'* etc.: quoting from *Beauharnais v. Illinois*, 267-75 (Black's dissent). ↵
125. *'unseemly language'* etc.: quoting from *ibid.*, 284-7 (Douglas's dissent); though it's notable that Douglas also, somewhat contradictorily, joined the dissent by Reed (see note below), which did explicitly acknowledge the power of states to pass group libel laws. ↵
126. *'reckless and vicious libel'* etc.: quoting from *ibid.*, 287-305 (Jackson's dissent). ↵
127. *'the constitutional power'*: quoting from *ibid.*, 277-84 (Reed's dissent – joined by Douglas). ↵
128. *'personal abuse'* etc.: quoting from *ibid.*, 251-67 (majority opinion written by Felix Frankfurter). The last phrase, 'the systemic avalanche of falsehoods' (from 261 n. 16), is Frankfurter quoting his former student David Riesman, who had clerked for Justice Brandeis in the later 1930s, and whose 1942 articles on group libel laws evidently influenced the court's decision. For Riesman, see Daniel Horowitz, 'David Riesman', *Buffalo Law Review* 58 (2010). ↵
129. [footnote] *'libelous' and 'insulting' words: 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 315 US 568 (1942). ↵
130. *the rights of the speaker*: for this argument, see Ronald Dworkin, 'Foreword', in Ivan Hare and James Weinstein (eds), *Extreme Speech and Democracy* (2009). ↵
131. *hard social and legal problem*: see e.g. Hare and Weinstein (eds), *Extreme Speech*, part 2; Michael Herz and Peter Molnar, *The Content and Context of Hate Speech* (2012); Timothy Garton Ash, *Free Speech* (2016), chs 2, 5. ↵

10.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1. *foundational documents*: see e.g.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USSR (1936), Article 125; Cuba (2019), Articles 54-5; China (1982), Article 35;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019), Article 67. The same guarantees are also included in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successor state of the Soviet Union. ↵
2. *printing presses, books and pamphlets*: see e.g. Michael Harris, *London Newspapers in the Age of Walpole* (1987); Charles E. Clark, *The Public Prints* (1994); Joad Raymond (ed.), *News, Newspaper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999); Hannah Barker, *Newspapers, Politics and English Society, 1695-1855* (2000); James Raven, *The Business of Books* (2007); Michael F. Suarez and

Michael L. Turn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vol. 5: 1695–1830 (2009). ↪

3. *suing each other for verbal insults*: see e.g. Martin Ingram, *Church Courts,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70–1640* (1987), 374; J. A. Sharpe, *Defamation and Sexual Slan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980), 9; Tim Meldrum, ‘A Woman’s Court in London’, *London Journal* 19 (1994), 2–4; Robert Shoemaker, *The London Mob* (2007), ch. 3; Jane Kamensky, *Governing the Tongue* (1997), 186–91, 201; Lyndsay Mills Campbell, ‘Truth and Consequences: The Legal and Extralegal Regulation of Expression in Massachusetts and Nova Scotia, 1820–184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D thesis, 2008), 50. ↪
4. *scandalum magnatum*: John Lassiter, ‘Defamation of Peer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ction for *Scandalum Magnatum*, 1497–1773’,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22 (1978). ↪
5. *prosecutions for seditious words*: Larry Eldridge, *A Distant Heritage* (1994); David Cressy, *Dangerous Talk* (2010), ch. 11; Peter Rushton and Gwenda Morgan, *Treason and Rebellion in the British Atlantic, 1685–1800* (2020), 81–8. ↪
6. *punished for spoken sedition*: Clive Emsley, ‘An Aspect of Pitt’s “Terror”’, *Social History* (1981), appendix B; idem, ‘Repression, “Terror”, and the Rule of Law in England During the Decad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85), 807, 822. ↪
7. *how language was produced*: Kamensky, *Governing the Tongue*, 191; Roy Porter, *Enlightenment* (2000), 235–9. ↪
8.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the best-selling tracts of William Perkins, *A Directi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According to Gods Word* (1593), and Richard Allestree,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Oxford, 1674), alone went through over thirty editions: English Short-Title Catalogue (estc.bl.uk). ↪
9. *art of conversation*: cf. Peter Burke,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1993), esp. 109ff.; Philip Carter, *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2001), 62ff. ↪
10. *‘enjoyment’ etc.*: Joseph Butler, ‘Up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in *Fifteen Sermons* (1726), 57, 59, 65; cf. also John Barnard, *A Present for an Apprentice* (1740). ↪
11. *distinguish speech from other kinds of action*: Shoemaker, *London Mob*, 68–73. ↪
12. *‘speaking falsely’ etc.*: *London Journal*, 10 June 1721 [Cato’s Letters, no. 32]. ↪
13. *‘from house to house’ etc.*: John Milton, *Areopagitica* (1644), 47. Cf. Kamensky, *Governing the Tongue*, 187–8. A lone late exception was David Hume’s 1741 assertion in his essay on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probably channelling Milton on this point, that ‘a whisper may fly as quick, and be as pernicious as a pamphlet’, or more so: *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 (Edinburgh, 1741), 15–16. ↪
14. *‘because such are public’*: *Rex v. Darby* (1687), 3 Mod. 139, and *English Reports Full Reprint* 87: 89–90. See also ‘The Pre-*Thorley v. Kerry* Case Law of the Libel-Slander Distinc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3 (1955), esp. 138–45. ↪

15. *Treason Acts*: C. H. Firth and R. S. Rait, *Acts and Ordinances of the Interregnum, 1642–1660* (1911), 120–21, 193–4, 831–5. The 1661 Treason Act also explicitly extended to ‘words alone’, and to ‘malicious or advised speaking’. ↪
16. *royal proclamation in Scotland: Proclamation Against Slanderers and Leasing-makers*, 16 June 1686. ↪
17. *criminalizing Loyalist speech*: see Chapter 6 of this book. ↪
18. *Virginia passed an Act: The Revised Code of the Laws of Virginia* (1819), 553; Julius S. Scott, *The Common Wind* (2018), 141–2. ↪
19. *Russia*: K. A. Papmehl,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1971), ch. 1 (quoting p. 2: ‘behind locked doors’). An exception to the criminalization of private writing was made for religious teachers. ↪
20. *eighteenth-century laws*: this is evident already in *By the Queen, a Proclamation for Restraining the Spreading False News* (1702), which starts by reciting medieval statutes against false tales, and includes a single mention of ‘writing, printing, or speaking’ sedition, but whose substance is essentially directed against writing and printing, rather than verbal utterances. ↪
21. *Henry Sacheverell*: Geoffrey Holmes, *The Trial of Doctor Sacheverell* (1973), ch. 3. ↪
22. *After 1800*: Cressy, *Dangerous Talk*, 251–4 (quoting 253: ‘the cutting off’). ↪
23. *Sedition Act of 1798: An Act in Addition to the Act, Entitled ‘An Act for the Punishment of Certain Crime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pproved 14 July 1798 (my italics). ↪
24. ‘words vanish in air’ etc.: [James Sullivan],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Constitutional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1801), 12. ↪
25. *Britain*: for the 1792 and 1795 laws, see *A Proclamation ... [Against] Wicked and Seditious Writings*, 21 May 1792; *Treasonable and Seditious Practices Act*, 36 Geo. III, c. 7 (1795). ↪
26. *oaths, promises*: see e.g. John Spurr, ‘Perjury, Profanity and Politics’,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8 (1993). ↪
27. *essentially harmless*: cf. Frederick Schauer, ‘Harm(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Supreme Court Review* (2012). ↪
28. ‘sticks and stones’: first recorded in the American abolitionist journals *Christian Recorder*, 22 Mar. 1862, and *Liberator*, 2 Jan. 1863. ↪
29. ‘the stroke of the tongue’: Ecclesiastes 28:17. See Chapter 1 of this book. ↪
30. ‘the press – and of late’ etc.: CW, 18: 162, 165. ↪
31. ‘public opinion’: *ibid.*, 228 (*On Liberty*). ↪
32. ‘The more I think’: *ibid.*, 14: 332. ↪
33. *pre-dated the printing press*: see Andrew Pettegree, *The Invention of News* (2014). ↪

34. *market for news*: for the facts in this and the next paragraph of this chapter, see Ivon Asquith, 'The Structure,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the Press, 1780–1855', in George Boyce et al. (eds), *Newspaper History* (1978); James Curran and Jean Seaton,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8th edn, 2018), chs 1–3. See also A. Aspinall, *Politics and the Press, c. 1780–1850* (1949); Victoria E. M. Gardner, *The Business of News in England, 1760–1820* (2016). ↵
35. 'The corruption and baseness': *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 11 Apr. 1807. ↵
36. 'mechanical age': Thomas Carlyle, 'Signs of the Times', in *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 II*, ed. Henry Duff Traill (2010), 59. ↵
37. *similar arguments*: on Carlyle and Balzac, see Lothar Müller, *White Magic: The Age of Paper*, trans. Jessica Spengler (2015), 140–63. See also [Edward Bulwer Lytton], *England and the English*, 2 vols (1833) 2: 7–36. ↵
38. 'to perpetuate the slavery': *Poor Man's Guardian*, 26 Dec. 1835. ↵
39. 'capitalists, idlers': *ibid.*, 21 Nov. 1835. ↵
40. 'either for good or evil' etc.: *ibid.*, 28 Nov. 1835. ↵
41. 'accelerating': *ibid.*, 26 Dec. 1835. ↵
42. *first major political essay*: 'Remarks on the Latest Prussian Censorship Instruction' (written 1842; published 1843), in Karl Marx,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Censorship*, trans. Saul K. Padover (1974), 89–108. ↵
43.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etc.: *ibid.*, 43, 181, 77. ↵
44. 'revolutionary terrorism' etc.: *ibid.*, 154. ↵
45. 'the first duty': *ibid.*, 144. From London, Marx briefly resurrected the paper as a monthly journal, which lasted until November 1850. ↵
46. 'The first freedom' etc.: *ibid.*, 41. ↵
47. 'not subject': *ibid.*, 33. For his disdain of profit as a motive, see *ibid.*, xxvii–xxviii, 181. ↵
48.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tc.: *Northern Star*, 4 Apr. 1846. ↵
49. 'the possibility of appealing' etc.: Ferdinand Lassalle, *The Working-Man's Programme*, trans. Edward Peters (1884), 41, 46. ↵
50. 'world-historical' etc.: Karl Knies, *Der Telegraph als Verkehrsmittel: Mit Erörterungen über den Nachrichtenverkehr überhaupt* (Tübingen, 1857), iii, 61; on Knies, see also Ronald A. Fullerton, 'A Prophet of Modern Advertising',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7 (1998); Hanno Hardt, *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2nd edn, 2001), ch. 4; Jean-Michel Johnston, *Networks of Modernity* (2021), ch. 4. ↵
51. *Schäffle*: Albert Schäffle, *Bau und Leben des sozialen Körpers*, 4 vols (Tübingen, 1881), esp. 1: 432–66 (quoting 452: 'the most powerful means'). ↵
52. 'newspapers only address': Karl Bücher, 'Zur Frage der Pressreform',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76 (1921), 307; see generally Hardt, *Social Theories*, chs 3, 5–7. ↵

53. 'the uninhibited pursuit' etc.: Knies, *Telegraph*, 248–51. ↩
54. *So important was the struggle*: Karl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1892), 216–19. ↩
55.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for recurrent disputes within the party about the limits of critical free speech, see Maria Löblich and Niklas Venema, 'Die SPD, die Meinungsfreiheit und die Konsequenzen der Massenpresse im Kaiserreich', *Publizistik* 65 (2020). ↩
56. *Lenin*: Lars T. Lih, *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2006), 11–12, 59, 149 (quoted: 'the revolutionary newspaper'), 403, 418–19, 422, 435, 455–6, 585, 604–7, 819–36; idem, *Lenin* (2011), chs 1–3. ↩
57. 'freedom for the rich': Albert Resis, 'Leni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Russian Review* 36 (1977), 282; see also 274–84. ↩
58.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press' etc.: 'Decree on the Press', 27 Oct. [Old Style] / 9 Nov. [New Style] 1917 (from Feb. 1918, when the calendar was reformed, all dates were New Style), 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Decree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1957–97), 1: 24–5 (at hist.msu.ru).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first decree is from soviethistory.msu.edu. ↩
59. 'will be granted' etc.: ibid. ↩
60. 'attempted counterrevolution' etc: *The Debate on Soviet Power: Minutes of the All-Russia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Soviets, Second Convocation, October 1917–January 1918*, ed. John L. H. Keep (1979), 70 (debates of 4 Nov. / 17 Nov.). ↩
61. 4 Nov. decree: 'All-Russia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Resolution on the Press', 4 Nov. / 17 Nov. 1917, ДЕКРЕТЫ, 1: 43–4. ↩
62. *Three days later*: 'Decree on the Introduction of a State Monopoly on Announcements', 7 Nov. / 20 Nov. 1917, ДЕКРЕТЫ, 1: 55–6. ↩
63. 'Revolutionary Press Tribunal' etc.: 'Decree on the Revolutionary Press Tribunal', 28 Jan. / 10 Feb. 1918, ДЕКРЕТЫ, 1: 432–4. See also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18: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ed. James Bunyan and H. H. Fisher (1934), 280, 297–8. ↩
64. 'popular editions' etc.: 'Decree on the State Publishing House', 29 Dec. 1917 / 11 Jan. 1918, in *Bolshevik Revolution*, ed. Bunyan and Fisher, 595–6. ↩
65. 'For the purpose': *The Russian Constitution* (1919), 7. ↩
66. *dissenting voices*: *Bolshevik Revolution*, ed. Bunyan and Fisher, 199–208, 219–24, 342, 345, 347, 351; *The Debate on Soviet Power*, ed. Keep, 68–79, 91–3, 140–41, 148, 167, 249, 272–3. ↩
67. 'tangle of venomous snakes': Maxim Gorky, *Untimely Thoughts*, trans. Herman Ermolaev (1995 edn), 50; see also 51–2. ↩
68. 'shameful attitude' etc.: ibid., 85, 183; see also 85–92, 182–4. ↩
69. *dictatorial power grab*: Karl Kautsk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rans. H. J. Stenning [1919?], esp. 3, 21, 27, 33–8, 45, 90, 124, 132–3, 144–8; idem,

-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trans. W. H. Kerridge (1920), 175–7, 188, 208, 211–12, 221. ↩
70. ‘we defend press freedom’ etc.: *The Debate on Soviet Power*, ed. Keep, 70–75; see also *Bolshevik Revolution*, ed. Bunyan and Fisher, 560, 564;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45 vols (1960–78), 28: 108, 248, 370, 460–61; Nikolai Bukharin, ‘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s (Bolsheviks)’ (1919), reprinted in *Revolutionary Radicalism: Its History, Purpose and Tactics*, 4 vols (1920), 2: 1701–7; L. Trotsky, *The Defence of Terrorism* (1921), 56–9. ↩
 71.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etc.: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2). ↩
 72. *heavily monitored and censored*: Li Yuan, ‘Censoring China’s Internet’, *New York Times*, 2 Jan. 2019; Yuyu Chen and David Y. Yang, ‘The Impact of Media Censo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 (2019); James Griffiths,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2019). Wikipedia has a notably full series of up-to-date articles on Chinese internet surveillance and censorship. ↩
 73. ‘anti-proletarian’ etc.: Letter to G. Myasnikov, 5 Aug. 1921, Lenin, *Collected Works*, 32: 504–9. ↩
 74. ‘Western anti-China forces’ etc.: ‘Communiqué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Ideological Sphere’ (aka ‘Document 9’), April 2013, translation at chinafile.com. ↩
 75. ‘to give freedom of speech’: Sarah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1997), 104. ↩
 76. *Gavril Myasnikov*: Paul Avrich, ‘Bolshevik Opposition to Lenin’, *Russian Review* 43 (1984). ↩
 77. ‘in conformity’: constitution of the USSR (1936), Article 125. ↩
 78. ‘bourgeois’ conception: J. Arch Gett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Stalin’, *Slavic Review* 50 (1991), 25–7; Davies, *Popular Opinion*, 105–8, 123. ↩
 79. *embedded in social systems*: *The 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85), 72–83. ↩
 80. ‘the deliberate opium’ etc.: Andrei Sakharov, ‘Thoughts on Progress,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1968), translation at sakharov.space; for more on communist dissenters, see Benjamin Nathans, ‘Soviet Rights-Talk in the Post-Stalin Era’, in Stefan-Ludwig Hoffmann (ed.), *Human Righ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11), 173–83; idem, *To the Success of Our Hopeless Cause* (2024). ↩
 81. ‘Literature in the GDR’ etc.: quoted in Darnton, *Censors at Work*, 199, 202; see generally *ibid.*, pt 3 and ‘Conclusion’. ↩
 82. ‘No form of censorship’ etc.: quoted in Richard Zipser (ed.), *Fragebogen: Zensur* (1995), 43–5, 120; see also e.g. 9–10, 31, 34–6, 70, 73–4, 78. ↩
 83. ‘real opposition’ etc.: quoted in Michael Lewis, ‘Has Anyone Seen the President?’, Bloomberg.com, 9 Feb. 2018. ↩

84. 'conscientiously opposed to war' etc.: flyer quoted from *Transcript of Record: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ctober Term, 1918*, cases 437 and 438 (1918); see also *Camden Daily Courier*, 18 Feb. 1914; *Philadelphia Inquirer*, 28 Feb., 7 and 24 Mar. 1914, 19 and 26 Apr. 1919; *Cincinnati Enquirer*, 5 July 1914; *Evening Public Ledger* (Philadelphia), 19 Sept. 1916; *Detroit Free Press*, 29 Oct. 1916; *Daily Herald* (Gulfport, Mississippi), 11 June 1917;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26 Apr. and 28 June 1919; *Daily Worker* (New York), 14 Mar. 1939; *Plainfield Courier-News*, 27 Jan. 1943. ↵
85. 'false reports' etc.: 1917 Espionage Act; 1918 Sedition Act. ↵
86. *protection of controversial speech*: on US free-speech campaigner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ee David M. Rabban, *Free Speech in Its Forgotten Years* (1997), ch. 1. ↵
87. 'free speech fights' etc.: Rabban, *Free Speech*, 83, 87; see generally *ibid.*, ch. 2; IWW History Project at depts.washington.edu/iww/. ↵
88. *took the same line*: see e.g. *Debs and the War* [1922], 7–8, 14, 19–20, 35, 37–40, 53. ↵
89. 'absolute and complete' etc.: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ctober Term, A.D. 1903: No. 561: United States ex rel. John Turner vs William Williams ... Argument of Appellant* [1903], 37, 49. ↵
90. 'the vital issue' etc.: quoted in Rabban, *Free Speech*, 272. ↵
91. 'denial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etc.: *Report of Harris Weinstock* (1912), 3, 9–11, 22. ↵
92. *same issues were raised*: Rabban, *Free Speech*, ch. 3. ↵
93. 'liberty of the press' etc.: *Patterson v. Colorado*, 205 US 454 (1907), 462, 465. ↵
94. *didn't only prohibit 'previous restraints'* etc.: *Schenck v. United States*, 249 US 47 (1919), 51–2. ↵
95. *duly locked up* etc.: Richard Polenberg, *Fighting Faiths* (1987). ↵
96. 'the Free Speech Century': see e.g. Anthony Lewis, *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 (2007); Vincent Blasi, *Ideas of the First Amendment* (2nd edn, 2012); Lee C. Bollinger and Geoffrey R. Stone (eds), *The Free Speech Century* (2019), xv (quoted: 'the Supreme Court's'). ↵
97. *studied his writings*: on Holmes and Mill, see *Holmes–Laski Letters*, ed. Mark DeWolfe Howe, 2 vols (1963), 2: 841, 1208; G. Edward White,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1993), 94, 96–7, 510 n. 36, 517 n. 23. ↵
98. 'safeguard of progress': Harold Laski, *Authority in the Modern State* (1919), 280. ↵
99. *evolved from his earlier views*: a useful compil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Holmes*, ed. Ronald K. L. Collins (2010). ↵
100. 'opinions and speech': Sheldon M. Novick, 'The Unrevised Holme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Supreme Court Review* (1991), 389. ↵

101. *Brandeis in another case: Sugarman v. United States*, 249 US 182 (1919). ↪
102. ‘Only the present danger’ etc.: *Abrams v. United States*, 250 US 616 (1919), dissent by Holmes, joined by Brandeis. ↪
103. ‘there was no evidence’ etc.: *Gitlow v. New York*, 268 US 652 (1925), quoting 652, 656 (see also 664), majority opinion; and 673, dissent of Holmes, joined by Brandeis. ↪
104. ‘No danger flowing’: *Whitney v. California*, 274 US 357 (1927), quoting 377, concurrence of Brandeis, joined by Holmes. ↪
105. ‘marketplace of ideas’: Sam Lebovic, *Free Speech and Unfree News* (2016), 258 n. 33. ↪
106. ‘the right of an ass’: *Holmes–Laski Letters*, ed. DeWolfe, 1: 752. For the sincere pacifist, see *United States v. Schwimmer*, 279 U.S. 644 (1929); in *Whitney v. California*, their now famous words about ‘more speech, not enforced silence’, previously quoted, emphatically did not apply to the defendant, the communist Anita Whitney: they upheld her conviction. ↪
107. *two intertwined stories*: brilliantly illuminated by Laura Weinrib, *The Taming of Free Speech* (2016), and Lebovic, *Free Speech*, to whose arguments my analysis is greatly indebted. ↪
108. ‘exaggerates private right’: Roscoe Pound, ‘Liberty of Contract’, *Yale Law Journal* 18 (1909), 461. ↪
109. ‘the individual interest in free belief’: Roscoe Pound, ‘Interests of Personality’, *Harvard Law Review* 28 (1915), 454. ↪
110. ‘to serve the cause’ etc.: ‘Suggestions for Reorga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Civil Liberties Bureau’ (1920), Princeton University Mudd Library, ACLU Papers, 120: 32–7. ↪
111. ‘a class government’ etc.: *The Fight for Free Speech* (1921), 4–6. ↪
112. ‘the expression of all opinions’: *ibid.*, 15. ↪
113. ‘the overthrow’: quoted in Weinrib, *Taming*, 181. ↪
114. *singled out the Ku Klux Klan* etc.: *Fight for Free Speech*, 4, 7, 13; Dwight Macdonald, ‘The Defense of Everybody – I’, *New Yorker* (11 July 1953), 35. ↪
115. *defending the rights of antisemites*: Samantha Barbas, *The Rise and Fall of Morris Ernst, Free Speech Renegade* (2021), 142–5. ↪
116. ‘Is it not clear’: *Shall We Defend Free Speech for Nazis in America?* (1934), 2–3. ↪
117. ‘If I aid’: quoted in Dwight Macdonald, ‘The Defense of Everybody – II’, *New Yorker* 18 Jul 1953, 44–5. ↪
118. ‘To defend the rights of Nazis’: John Palmer Gavit to Roger Baldwin, 8 Nov. 1934: Princeton University Mudd Library, ACLU Papers, 700 [unpaginated]. ↪
119. *ACLU’s shift in principles*: for this and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in this chapter, see Weinrib, *Taming*, chs 7, 8, epilogue (quoting 311: ‘to link free enterprise’);

- idem, 'Rethinking the Myth of the Modern First Amendment', in Bollinger and Stone (eds), *Free Speech Century*, 62, 67. ↵
120. 'the corporate takeover': John C. Coates IV, 'Corporate Speech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30 (2015), 275. ↵
121. 'a monopoly market': Weinrib, 'Rethinking the Myth', 67. ↵
122. *the American newspaper scene*: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 Henry Reeve (New York, 1838), ch. 11. ↵
123. 'most parts' etc.: George Campbell, *White and Black* (1879), 28. ↵
124. 'to expect a newspaper magnate': Edward Alsworth Ross, 'The Suppression of Important News', *Atlantic Monthly* (Mar. 1910), 310. ↵
125. 'the newspaper-owner': Edward Alsworth Ross, 'Social Decad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3 (1918), 630. ↵
126. [footnote] 'free trade in ideas' etc.: White,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515 n. 119. ↵
127. *non-profit newspapers*: Victor S. Yarros, 'A Neglected Opportunity and Duty in Journ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2 (1916); idem, *My 11 Years with Clarence Darrow* (1950); Ross, 'Suppression', 310–11; Upton Sinclair, *The Brass Check: A Stud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1920 edn), 438–43. ↵
128. 'misleading' etc.: Walter Lippmann, *Liberty and the News* (1920), 35, 63. ↵
129. 'the protection': ibid., 62–3; see also Lebovic, *Free Speech*, ch. 1. ↵
130. 'the problem': quoted in Lebovic, *Free Speech*, 3. ↵
131. 'interest in freedom of the news' etc.: *New York Times*, 13 Jan. 1939; *Time*, 23 Jan. and 6 Nov. 1939; Lebovic, *Free Speech*, ch. 2. ↵
132. *Most Americans agreed*: Stephen Bates, *An Aristocracy of Critics* (2020), 40. ↵
133. 'I can see nothing': quoted ibid., 24. ↵
134. *economic reforms*: Lebovic, *Free Speech*, ch. 3. ↵
135. *statute contravened*: *Near v. Minnesota*, 238 US 697 (1931); Lebovic, *Free Speech*, 42–9. ↵
136. 'lead to or approximate censorship': quoted in Lebovic, *Free Speech*, 67. ↵
137. 'government-controlled': quoted ibid., 66. ↵
138. 'a public service institution' etc.: quoted ibid., 59, 61, 68–9, 74–5; see also 56–63, 72–6, 85–7. ↵
139. 'the freedom, functions': William Ernest Hocking, *Freedom of the Press* (1947), iv. ↵
140. 'planning for' etc.: Alexander Meiklejohn, *Free Speech and Its Relation to Self-Government* (1948), 39, 104. For equivalent British views, see e.g. Hermon Ould (ed.), *Freedom of Expression* (1944), 27–8. ↵
141. *Associated Press ruling*: *United States v. Associated Press*, 52 F. Supp. 362 (SDNY 1943); *Associated Press et al. v. United States*, 326 US 1 (1945). ↵

142. 'too simple': quoted in Lebovic, *Free Speech*, 141. ↩
143. 'the right of the citizen' etc.: *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1947), 18. ↩
144. 'vigorous, continuous': quoted in Bates, *Aristocracy*, 106. ↩
145. 'totalitarianism' etc.: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5, 128–31; see also Hocking, *Freedom of the Press*; idem,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America* (1947); Lebovic, *Free Speech*, 140–45. ↩
146. power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last point, see Bates, *Aristocracy*, ch. 18. ↩
147.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attle': Earl L. Vance, 'Freedom of the Press for Whom?',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21 (1945), 342. ↩
148. left-wing American thinkers: see e.g. Herbert Marcuse, 'Repressive Tolerance', in Robert Paul Wolff et al. (eds), *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1969 edn);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1988). ↩
149. 'At the present moment' etc.: Truman speech to Congress, 12 Mar. 1947. ↩
150. 'freedom of enterprise': Weinrib, *Taming*, 223, quoting the industrialist Walter Kohler in 1937. ↩
151. 'Free people' etc.: address of Robert H. Jackson to the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 21 Jan. 1941, 11–14 (at [justice.gov](https://www.justice.gov)); see also Louis Menand, *The Free World* (2021), 352, 703. ↩
152. 'advocacy' etc.: Smith Act of 1940, 18 US Code section 2385 (2000). ↩
153. 'those abuses' etc.: *Dennis v. United States*, 341 US 494 (1951). ↩
154. majority had shifted: *Yates v. United States*, 354 US 298 (1957). ↩
155. occupied Germany: see e.g. TNA, FO 1049/115 and 116 (1945); FO 1060/1125 and 1126 (1945–9). ↩
156. drafting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Sarah H. Cleveland, 'Hate Speech at Home and Abroad', in Bollinger and Stone (eds), *Free Speech Century*, esp. 224;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eighth session, summary record of 321st meeting, 4 June 1952 (E/CN.4/SR.321). ↩
157. 'the rights of free speech' etc.: quoted in Samantha Barbas, *Actual Malice* (2023), 171. ↩
158. 'deliberately and maliciously false':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 (1964), 300. ↩
159. 'debate on public issues': *ibid.*, 270. ↩
160. 'dampens the vigor': *ibid.*, 279. ↩
161. 'public persons': see e.g. Frederick Schauer, 'Public Figures',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25 (1984); Samantha Barbas, *Newsworthy* (2017). ↩
162. 'revengeance' etc.: *Brandenburg v. Ohio*, 395 US 444 (1969). ↩
163. the right of American Nazis: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v. Village of Skokie*, 432 US 43 (1977). ↩

164. 'anger, alarm, or resentment': *R.A.V. v. St Paul*, 505 US 377 (1992). ↪
165. 'protecting the community': *ibid.* ↪
166. 'Expose through discussion': *Whitney v. California*, 377. ↪
167. *Is this faith justified*: cf. Frederick Schauer, 'Fact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UCLA Law Review* 57 (2010). ↪
168. *collateral damage*: cf. Schauer, 'Harm(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
169. *philosophical defenders*: see e.g. Ronald Dworkin, 'Foreword', in Ivan Hare and James Weinstein (eds), *Extreme Speech and Democracy* (2009). ↪
170. *American legal scholars*: Rabban, *Free Speech*, ch. 4. ↪
171. 'the First Amendment's unequivocal command': *Konigsberg v. State Bar*, 366 US 36 (1961), quoting dissent by Black, 61; cf. *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 554 US 570 (2008); *United States v. Stevens*, 559 US 460 (2010). ↪
172. 'governmental interest': *Buckley v. Valeo*, 424 US 1 (1976), 48–9. For the contingent historical roots of this trajectory, see also Mark A.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1991). ↪
173. 'The whole point': *McCutcheon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72 US 185 (2014), 187; see also *Citizens United v. FEC*, 558 US 310 (2010). ↪
174. *far from linear or consensual*: see e.g. the contrasting views on display in Geoffrey R. Stone et al. (eds), *The Bill of Rights in the Modern State* (1992), as well as in Bollinger and Stone (eds), *Free Speech Century*. ↪
175. 'striking chiefly': Robert Post, 'Recuperating First Amendment Doctrine', *Stanford Law Review* 47 (1995), 1250; see also *idem*, 'Reconciling Theory and Doctrine in First Amendment Jurisprudence', *California Law Review* 88 (2000); Frederick Schauer, 'Towards an Institutional First Amendment', *Minnesota Law Review* 89 (2005). ↪
176. *narrow and abstract conception*: see e.g. Genevieve Lakier, 'The First Amendment's Real *Lochner* Problem',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87 (2020). ↪
177. 'worthless' etc.: *R.A.V. v. St. Paul*, 400, 416. ↪
178. 'blinkered and aphoristic' etc.: *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 310 (2010), 475. ↪
179. 'not only the individual's right': *McCutcheon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237. ↪
180. 'goes wrong' etc.: *Janus v. American Federation*, 585 US __ (2018). ↪
181. *location and shape of those boundaries*: see e.g. *New York v. Ferber* 458 US 747 (1982); Frederick Schauer,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st Amendment', *Harvard Law Review* 17 (2004); *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419–25; Deborah Pearlstein, *Democracy Harm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 Essay (2022), 8–11. ↪

182. *disdained to consider*: this reluctance is not limited to its free-speech jurisprudence: Frank I. Michelman, 'Integrity-Anxiety?', in Michael Ignatieff (e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 (2005). ↪
183. *the rest of the world*: cf. Frederick Schauer, 'The Exceptional First Amendment', in Ignatieff (e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
184. *Historical approaches*: see e.g. Anthony Lewis, *Make No Law: 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2011); Barbas, *Actual Malice*; idem, *Newsworthy*. ↪
185. '*the First Amendment*': *Beauharnais v. Illinois*, 275 (dissent by Black). ↪
186. '*to withdraw from the Government*': Hugo L. Black, 'The Bill of Rights',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35 (1960), 874–5. ↪
187. *carried a copy of the constitution*: Tracy S. Uebelhor (ed.), *The Truman Years* (2006), 42; David L. Lange and H. Jefferson Powell, *No Law* (2009), ch. 10; Barbas, *Actual Malice*, 152–4. ↪
188. *in Black's view*: for Black's exceptions to the First Amendment, see *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 393 US 503 (1969), dissent by Black (armbands); *Cohen v. California*, 403 US 15 (1971), minority dissent (jacket); *Time Magazine*, 5 Apr. 1968 (marching, picketing, flag-burning). ↪
189. *a card that trumps*: see e.g. *303 Creative LLC v. Elenis*, 600 US __ (2023); *Defense Distributed v. United States*, No. 18-50811 (5th Cir. 2020); *Bernstein v. US Dept. of State*, 945 F. Supp. 1279 (ND Cal. 1996); Andrew Solomon, 'The Shape of Love', *New Yorker*, 22 Mar. 2021. Cf. Frederick Schauer, 'First Amendment Opportunism', in Lee C. Bollinger and Geoffrey R. Stone (eds), *Eternally Vigilant* (2002); idem, 'The Politics and Incentives of First Amendment Coverage',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56 (2015). ↪
190. '*ad hoc balancing*': in practice, despite this rhetoric, the court does tolerate a fair amount of such balancing: for this point, and the broader insufficiency of the court's approach to free speech and democracy, see Pearlstein, *Democracy Harms*; and see also Schauer, 'Towards an Institutional First Amendment'. ↪
191. '*the alternative to private control*': David Cole, 'Why We Must Still Defend Free Speec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8 Sept. 2017. ↪
192. '*the exhibition of moving pictures*': *Mutual Film Corporation v. Industrial Commission of Ohio*, 236 US 230 (1915), 230–31. In 1952, the court changed its mind on this point, ruling that films, even though 'a large-scale business conducted for private profit', fell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First Amendment: *Joseph Burstyn, Inc. v. Wilson*, 343 US 495 (1952). ↪
193. '*is not engaged*': Meiklejohn, *Free Speech*, 104. ↪
194.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1934 Communications Act. Section 326 of this act, deploring 'censorship', forbade the FCC to 'interfere with the right of free speech'; its final clause (repealed in 1948) prohibited 'obscene, indecent, or profane language' on the radio. ↪

195. *segregationist Mississippi television station*: se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LBT>. ↵
196. ‘First Amendment is relevant’: *Red Lion Broadcasting Co., Inc. v. FCC*, 395 US 367 (1969), 368. ↵
197. ‘a responsible press’: *Miami Herald Pub. Co. v. Tornillo*, 418 US 241 (1974), 256. A subsidiary argument during these decades was that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was justified because the number of usable transmission frequencies was not limitless, and the broadcast spectrum was therefore a scarce public resource. ↵
198. ‘the First Amendment was adopted’: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Record* 2 (1987), 5057; see generally Paul Matzko, *The Radio Right* (2020); Kathryn Cramer Brownell, *24/7 Politics: Cable Television and the Fragmenting of America from Watergate to Fox News* (2023). ↵
199.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the internet*: for this and the next three paragraphs in this chapter, see 1996 Telecommunications Act; Jeff Kosseff, *The Twenty-Six Words that Created the Internet* (2019); idem, ‘A User’s Guide to Section 230’,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37 (2022); Colin Crowell, ‘Reflections on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medium.com (2021). ↵
200. ‘end of history’: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1989). ↵
201. ‘We know how much’ etc.: speech by Bill Clinton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8 Mar. 2000. ↵
202. *potential issues of free speech and harm*: see Susan J. Brison and Katharine Gelber (eds), *Free Speech in the Digital Age* (2019). ↵
203. ‘the incentives of business’: Monika Bickert,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Free Speech on Social Media’, in Bollinger and Stone (eds), *Free Speech Century*, 271. ↵
204. [footnote] ‘American companies’: Senator Edward Markey, quoted in Bobby Allyn, ‘President Biden Signs Law to Ban TikTok’, *NPR*, 24 Apr. 2024. ↵
205. *dirty work*: see e.g. David Pilling, ‘The Young People Sifting Through the Internet’s Worst Horrors’, *Financial Times*, 11 Jan. 2024. ↵
206. *shibboleths of their own*: for related divergences between European and American attitudes, see James Q. Whitman, ‘The Two Western Cultures of Privacy’, *Yale Law Journal* 113 (2004). ↵
207. *Facebook entered Myanmar*: see e.g. Megan Specia and Paul Mozur, ‘A War of Words Puts Facebook at the Center of Myanmar’s Rohingya’, *New York Times*, 27 Oct. 2017; Paul Mozur, ‘A Genocide Incited on Facebook, With Posts from Myanmar’s Military’, *New York Times*, 15 Oct. 2018. Similar things happened in Cambodia: Megha Rajagopalan, ‘This Country’s Democracy Has Fallen Apart’, *BuzzFeed News*, 21 Jan. 2018. ↵

208. *'We had just promised'*: quoted in Joseph Menn and Gerry Shih, 'Under India's Pressure, Facebook Let Propaganda and Hate Speech Thrive', *Washington Post*, 26 Sept. 2023. ↵
209. *spreading deliberate lies online*: see e.g. Stuart A. Thompson, 'Fake News Still Has a Home on Facebook', *New York Times*, 13 June 2024. ↵
210. *backed itself into a corner*: for recent American judicial and legislative moves to address some of these issues, see Kosseff, 'User's Guide to Section 230'. ↵
21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etc.: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articles 19, 29, 30. ↵
212. *'the task of ensuring'*: Official Minutes of the 65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14 Dec. 1946: UN Digital Library, A/PV.65, 1379. ↵
213. *the European Convention's creators* etc.: Council of Europe, confidential memo DH (56) 15 on 'Preparatory Work on Article 10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17 Aug. 1956, at coe.int/en/web/human-rights-convention/preparatory-works. ↵

AFTERWORD: FROM THE PAST TO THE FUTURE

1. *a clear line*: a valiant attempt to write a global history of free speech in this vein is Jacob Mchangama, *Free Speech: A History from Socrates to Social Media* (2022). ↵
2. *The alternative answer*: an especially influential version of this argument is Tim Wu, 'Is the First Amendment Obsolete?', *Michigan Law Review* 117 (2018). ↵
3. *freedom for the wolves*: Isaiah Berlin, 'On the Pursuit of the Idea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7 Mar. 1988; idem, 'The First and the Las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4 May 1998; cf. Joseph E. Stiglitz, *The Road to Freedom* (2024), esp. ch. 9. ↵
4. *outrageous bullshit*: see Harry Frankfurt, *On Bullshit* (2005), on why 'bullshit is a greater enemy of the truth than lies are' (61). ↵
5. *'Much that he has said'* etc.: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Donald J. Trump*, US District Court, District of Columbia, case 23-cr-257-TSC: Amici Curiae brief by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5 Oct. 2023. ↵
6. *workplace harassment*: see Frederick Schauer, 'The Speech-ing of Sexual Harassment', Robert Post, 'Sexual Harassment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Jack M. Balkin, 'Free Speech and Hostile Environments', in Catharine A. MacKinnon and Reva B. Siegel (eds), *Directions in Sexual Harassment Law* (2004). ↵
7. *boycotting*: see e.g. Andrew Phemister, "'The Surging Tide of Pauper Democrac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134 (2019). ↵
8. *university campuses*: an incisive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s is Ulrich Baer, *What Snowflakes Get Right* (2019). ↵

9. *how best to regulate or incentivize*: cf. Jack Balkin, 'Free Speech versus the First Amendment', *UCLA Law Review* 70 (2023). ↩
10. '*we're for free speech*': Stanley Fish,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Speech* (1994), 16; see also idem, *The First* (2019), chs 1–2; Charlotte Lydia Riley (ed.), *The Free Speech Wars* (2021). ↩
11. *unwarranted 'censorship'*: see e.g. Steven Lee Myers, 'State Department's Fight Against Disinformation Comes Under Attack', *New York Times*, 14 Dec. 2023. ↩
12. *governmental censorship*: see e.g. Fabio Bertoni, 'Florida Takes Aim at the First Amendment', [newyorker.com](https://www.nytimes.com/2023/03/06/us/politics/florida-first-amendment.html), 6 Mar. 2023; idem, 'How Would This Supreme Court Rule on Book Banning?', [newyorker.com](https://www.nytimes.com/2023/12/07/us/politics/supreme-court-book-banning.html), 7 Dec. 2023. ↩
13. '*academic freedom*': for differing argument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of speech and academic freedom, see e.g. Frederick Schauer, 'Is there a Right to Academic Freedom?', *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Review* 77 (2006); Robert Post,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Akeel Bilgrami and Jonathan Cole (eds), *Who's Afraid of Academic Freedom?* (2015); Keith E. Whittington, *You Can't Teach That!* (2024); David Rabban, *Academic Freedom* (2024). ↩

致谢

我首要感谢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们，感谢他们邀请我横跨大西洋来到这里，并为我撰写本书提供了自由的环境与充足的资源。

尽管在美国之外，关于言论自由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我仍深刻地感激世界各地数百篇关于审查制度、言论规制、法律、新闻出版、广播、互联网及相关课题的地方性研究的作者。我心怀感激地汲取了他们的心血——同时也受益于数代第一修正案学者及其他言论自由理论家的研究。若非他们的工作，我不可能涉足许多此前未曾触及的领域。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我并未在正文叙述中加入过多的史学争鸣；但我相信，特定领域的专家们能够通过正文和注释，判断出我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们的观点相契合或存在分歧。

当我最初开始研究言论自由时，发现弗雷德里克·肖尔（Frederick Schauer）——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第一修正案学者——其清晰透明的理论著作对我而言无异于一种启示。在我完成本书撰写后，令我激动不已的是，我获悉他为出版社提交了一份对本书手稿极尽赞赏的审读报告（在评审程序结束且他慷慨地放弃匿名之后）。令我深感悲痛的是，他未能亲眼目睹本书的出版。

我还要感谢世界各地的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员，是他们为我查阅馆藏提供了便利；感谢许多为我提供文献参考和建议的人士，特别是那些允许我在研讨会和学术会议上试炼观点的期刊编辑与参会者。此外，我还要深切感谢那些慷慨的朋友、亲属、才华横溢的学生以及卓越的同事，他们在本项目执行的不同阶段审阅了章节初稿，或以其仁爱与榜样力量激励我前行——特别感谢：阿迪蒂·拉奥（Aditi Rao）、本·纳坦斯（Ben Nathans）、卡尔·温纳林德（Carl Wennerlind）、大卫·贝尔（David Bell）、大卫·坎纳迪恩（David Cannadine）、大卫·拉班（David Rabban）、大卫·伍顿（David Wootton）、德博拉·舒格（Debora Shuger）、德博拉·珀尔斯坦（Deborah Pearlstein）、雅各布·内斯（Jacob Neis）、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乔斯林·皮卡德（Jocelyn Pickard）、约翰·哈帕姆（John Harpham）、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尼克·欧文（Nick Irvin）、彼得·布朗（Peter Brown）、罗伯特·特拉弗斯（Robert Travers）、苏菲·罗森菲尔德（Sophie Rosenfeld）以及佐伊·皮卡德（Zoë Pickard）。

能与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无与伦比的编辑斯图尔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及其优秀的同事们再次合作是我的荣幸。我深切感激詹姆斯·普伦（James Pullen）和伊恩·马尔科姆（Ian Malcolm）对本项目的巨大支持，也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沙尔米拉·森（Sharmila Sen）及其优秀团队对本书的热情支持。丽莎·克雷格（Lisa Kraege）协助我整理了注释，凯特·帕克（Kate Parker）承担了出色的文字编辑工作，宝拉·克拉克·贝恩（Paula Clarke Bain）则亲切地编制了索引。

我的爱人，杰出的科学家乔·邓克利（Jo Dunkley），禁止我发布那份我在写书期间秘密编纂的、关于她种种卓越之处的详尽清单——尽管我曾试图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权”，并拉拢我们可爱的孩子们加入我的阵线。因此，我只能说，我活着便是为了与她探讨一切，并逗她发笑。我所做的一切，皆由她温暖的爱以及我们共同生活的每日喜悦所支撑。

Index

The page references in this index correspond to the print edition from which this ebook was created, and clicking on them will take you to the location in the ebook where the equivalent print page would begin. To find a specific word or phrase from the index, please use the search feature of your ebook reader.

- abolitionists [162](#), [163](#), [170–75](#), [236](#), [284](#), [293](#)
- Abrams, Jack [284](#), [288](#), [289](#)
- absolutist approach to free speech [119–22](#), [126](#), [128](#), [134](#), [138](#), [140](#), [142](#), [147–8](#), [313–14](#), [325](#), [335](#)
- abuse [18](#), [144](#), [145–6](#), [149](#), [153](#), [254](#), [255](#), [306](#)
- academic free speech [92–6](#), [341–2](#)
- ACLU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52](#), [253](#), [293–4](#), [295](#), [298](#), [315](#), [333](#)
- action, and speech [8–9](#), [11](#), [18](#), [220–21](#), [226](#), [228](#), [261](#), [264–5](#), [287–8](#), [291](#), [308](#), [315](#), [323](#), [329](#), [334](#), [335](#)
- ‘actual malice’ [306](#)
- Adam, John [201](#), [209](#)
- Adams, John [122](#), [132](#), [136](#), [160](#), [392n](#)
- Adams, John Quincy [175](#)
- Addison, Joseph [71](#), [157](#)
 - Cato, a Tragedy* [71](#)
- advertising [266](#), [271](#), [281](#), [296](#), [299](#), [309](#), [321](#), [322](#), [328](#), [337](#)
- Africa [8](#), [73](#), [74](#), [117](#), [174](#), [222](#), [245](#), [246](#)
- African-Americans [251](#), [307](#)
- African people [73](#), [74](#), [76](#), [78](#), [82](#), [83](#), [84](#), [85](#), [87–8](#), [168](#), [184](#), [193](#)
- Aikenhead, Thomas [93n](#)
- Akbar, Mughal emperor of India [224](#), [418n](#)
- Alabama [146](#), [305](#)
- Alaska [146](#), [147](#)
- Alexander, James [81–2](#), [86–7](#), [89–90](#), [381n](#)
- algorithms [321](#), [324](#), [325](#)
- Allen, Richard [161](#)
- Allestree, Richard,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429n](#)
- Alphabet (corporation) [321](#)
- Altona, Denmark [102](#), [103](#)
- Ambedkar, Dr B. R. [244](#)
- America
 - American colonies [81](#), [121](#), [123–5](#), [127](#), [135](#), [145](#), [181](#), [183](#), [391–2n](#)
 - First Amendment and American attitudes [144–8](#)
 - First Amendment and national rights [128–32](#)
 - First Amendment exceptionalism [119–23](#)

local declarations [123–8](#)
see also [United States](#)
 American and Foreign Anti-Slavery Society [175](#)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 [252, 253, 293–4, 295, 298, 315, 333](#)
 American Civil War [146, 149, 171](#)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27, 133, 140](#)
 Americ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 [299](#)
 American revolution [63, 118, 126, 132, 135, 153, 160, 262, 312](#)
American Weekly Mercury [80](#)
L'Ami de la Liberté et l'Ennemi de la Licence ('The Friend of Liberty and Enemy of
 Licentiousness') [167](#)
 Anandacharlu, Panapakkam [241](#)
 Anketell, Thomas [167](#)
 Anstruther, Sir John [197](#)
 Anti-Defamation League [251, 252](#)
 antisemitism [151, 180, 247, 248–50, 251, 253, 254, 293, 294, 304, 323, 328, 340, 405n](#)
 Anti-Slavery Association [175](#)
 Arckenholtz, Johann [113](#)
 Aristotle [74, 206](#)
 Arizona [146](#)
En Ärlig Swensk ('An Honest Swede') [107, 108](#)
 art [179](#)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37](#)
 Asia [73, 74, 117, 183, 222, 245](#)
Asiatic Journal [198, 201, 207](#)
 Associated Press [298, 299, 300](#)
 Astell, Mary [70](#)
 atheism [36, 37, 110, 361n](#)
 Athens [28](#)
 audience [77, 166, 170–71, 176, 179, 180, 329, 334, 335](#)
 Australia [196, 246, 391n](#)
 authority [9, 18–26, 178, 281](#)
 Avanesov, Varlam [275–6](#)
 Aztecs [19](#)

Bachmanson, Anders (later known as Anders Nordenkrantz) [106, 113, 114, 115](#)
Freedom in the Use of Reason, Pen and Print [108](#)
 Bacon, Francis [21, 22, 23, 57, 202, 206](#)
 bad words [3, 11, 12, 14, 17, 22, 261](#)
 Baer, Dr Elizabeth [283, 284, 287, 288, 289](#)
 Bahrdt, Karl Friedrich [100](#)
 balancing approach to free speech [64, 119–21, 122, 126, 136–7, 138, 140, 142, 144–6, 148, 149, 303, 309, 314, 326, 327, 334](#)
 Baldwin, Roger [294, 295](#)
 Balzac, Honoré de [267](#)

Bangladesh 227, 244
Bannon, Steve 282
Baptists 35
barrators 14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 29
Bayle, Pierre 93–4, 95, 110
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315
Beauharnais, Joseph 252–4, 256, 304, 305, 307, 313
Beecher, Catharine 174–5, 404n
Beijing 223
Bengal 182, 184, 186, 189, 190, 192, 193, 196, 198, 199, 204, 205, 231, 233
Bengali print 198, 410n
Bentham, Jeremy 158, 206, 212, 216, 228
Berlin 99
Bernstorff, Count 102, 103
Bible 12, 15, 19–20, 27, 353n, 411n
Bill of Rights (England) 42
Bill of Rights (US) 63, 121, 129, 131, 133, 134, 137, 139, 140, 142, 147, 149, 150, 309, 313, 368n
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 (2002) 309
The Birth of a Nation (film) 252
bishops 19, 107, 155
Black, Hugo 253, 313–14
Blackmun, Harry 310–11
Black people
 British Empire 185
 civil rights 168, 284, 304
 freedom and bondage 67, 73, 75–9, 79n, 82, 83–4, 86, 89, 160, 171
 hate speech 307
 Jamaica and Mill 212
 laws and liberties 149–50, 168, 169
 libel and politics 251, 252, 253
 oral communication 262
 publishing and power 82, 83, 85–6
 race and reason 167–70
 speech and slavery 75, 77–9, 82, 86, 89, 149–50, 160–62
 and women's rights 172, 174–6
Blackstone, William 98, 146, 287, 401n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125–6
blasphemy 12, 13, 17, 37, 43, 93n, 115, 157, 165, 200, 234, 248
Bolsheviks 272, 273, 275, 277, 278, 283
Bombay 189, 196, 198, 199, 209, 231, 407n
bondage 8, 72–9, 82, 83, 85, 160
 see also slavery
Boston 123, 145, 163, 171

Boston Gazette 79n
Boswell, James 35
boycotts 292, 293, 299, 335
Bradford, Andrew 80
Bradford, William 80
Brahmanical Magazine 202
Brahmins 18, 189, 237
Brandeis, Louis 285, 289, 290, 291, 297, 308, 427n
branks 14
Brazil 117, 153, 425n
breach of the peace 14, 23, 249–50, 254n, 263, 264
Brent, Margaret 20
Breyer, Stephen 311
British Empire 75, 78, 181–8, 194, 201, 205, 228
British Journal 59
broadcast media 6, 178, 256, 264, 281–2, 315, 317–18, 327, 336
Browallius, Johan 107
Brown (Francis Williams's pupil) 79, 89
Bücher, Karl 271
Buckingham, Duke of 24, 25
Buckingham, James Silk 200, 201, 202, 203, 206, 209, 413n, 414n
Bullock, Edward 371n
'bulwark(s) of liberty' 53, 63, 123, 125, 130, 131, 137, 152–3, 215, 367n
Burke, Edmund 164, 206
Burton, Robert,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15
Butler, Joseph, 'Up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260–61

cable television 317–18
Calcutta 190, 191, 193, 194, 198, 200, 201, 203, 204, 223, 227, 412n
Calcutta Gazette 198
Calcutta Journal 200, 201, 202, 203, 209, 414n
Calcutta Monthly Journal 207
Calvin, John 29
Campbell, George 186
Canada 246, 250, 391n
cancel culture 335, 340
capitalism 259, 271, 272, 274, 275, 276, 277, 296, 300, 302, 319, 325
Capitol building (US) 39, 332
'Caps' and 'Hats' (Sweden) 105–6, 107, 108, 112–13, 114
Caribbean 6, 74, 75, 82, 118, 167, 250
Carlile, Richard 200
Carlyle, Thomas 212, 267
 Sartor Resartus 267
Caroline Matilda, Queen of Denmark–Norway 101, 116
Carr, Henry 21

cartoons [22](#), [159](#)
Cary, John, *Essay on the State of England* [74](#)
Castellio, Sebastian [29](#), [30](#)
castes [18](#), [209](#)
Catherine the Great [99](#), [153](#)
Catholics [13](#), [14](#), [23](#), [27](#), [28](#), [29](#), [31](#), [35](#), [36](#), [44](#), [75](#), [94](#), [361n](#)
Cato
 as rebel captain's name [381n](#)
 as slave name [75](#), [85](#), [86](#), [89](#)
Cato the Younger [40](#)
'Cato's Letters'
 American local declarations [124](#), [125](#)
 and Dobrée [58–9](#), [85–7](#)
 Dutch Republic Patriots [153](#)
 freedom and bondage [72–3](#), [74–6](#)
 Gellius as translator [157](#)
 and Hicky [192](#), [193](#)
 liberty and speech [88](#), [89](#), [90](#)
 male and female speech [67](#), [68](#), [70](#), [71](#), [72](#)
 James Mill [215](#), [216](#)
 J. S. Mill [217](#), [219–20](#), [231](#)
 political free speech [7](#), [40–42](#), [46](#), [47–50](#), [51–63](#), [65](#)
 publishing and power [80–82](#), [85–7](#)
 and Roy [205](#)
 and Scandinavia [105](#), [107](#)
 shapes of freedom [66–7](#)
 see also 'bulwark(s) of liberty'
censorship
 overview [1–4](#)
 balancing and libertarian approaches [119–20](#)
 Baldwin on [294](#)
 broadcast media [317](#)
 China [1–2](#), [257](#), [276–8](#)
 Denmark–Norway and Struensee [102–4](#), [118](#)
 East Germany [280](#)
 English collapse of [259](#)
 and First Amendment [314](#)
 France [134](#)
 freedom of philosophizing [92](#), [95](#), [96](#)
 free speech from past to future [332](#), [338](#), [339](#), [340](#)
 India and imperialism [196](#), [198](#), [199](#), [206](#), [232](#)
 internet and online speech [150](#), [320](#), [325](#)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expressions [156](#), [157](#), [158](#), [165](#), [177](#)
 marketplace of ideas [257](#), [264](#), [267](#)
 Marx and Engels [268](#), [269](#)

'more speech' remedy 8–9, 323
Netherlands 118
origins of word 2–3
political free speech 44, 59, 61, 64
power of speech 9, 22, 26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98, 99, 100
religious free speech 28, 29, 30, 33, 34
Russia 273
shapes of freedom 66
Soviet Union 257, 278, 279
spreading enlightenment 96, 97
Sweden 105–8, 112, 113, 114–16
totalitarian truth 257, 276–80, 298
US newspapers 298–9
Centlivre, Susanna 70
Chafee, Zechariah 289
Champion, Alexander 13
Charles I, King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24, 25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83, 85, 89
Chicago 252, 253
children 19, 77, 224, 320, 328, 340
China 1–2, 116, 223, 229, 257, 258, 276–8, 319–20, 322n, 338, 428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 278, 320
Chitnavis, Gangadhar Rao 241
Chomsky, Noam 301
Christian VII, King of Denmark–Norway 101, 102, 103, 104, 112, 114
Christianity 12, 27–31, 33, 35, 36, 95, 102, 115, 202, 234–6, 248
Christine de Pizan,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 20
Chudleigh, Lady Mary 70
churches 16, 19
Churchill, Winston 187–8
Chydenius, Anders 113, 114, 115–16, 389n
citizenship 167, 168, 169, 171, 181, 213, 247–8, 287, 308
citizens' rights of free expression and information 64, 118, 129, 137, 142–6, 149, 155, 171, 172–3, 258, 277–9, 287, 297, 300–301, 309–10
civilization 8, 182, 185, 186, 211, 221–6, 230, 237
civil liberty 108–12
civil rights 45, 284, 304, 305, 306
civil society 36, 51, 135, 136
civil wars
 American Civil War 146, 149, 171
 England 25, 26, 30
 power of speech 22, 25, 26
class 251, 265–70, 278
'classes' of people 246, 248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288, 303
Clinton, Bill 2, 319
Clinton, Hillary 2, 3, 332
Cobbett, William 159–60, 200, 267
Cold War 302–3
collective rights 52, 282, 292
 see also citizens' rights of free expression and informatio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unfreedoms 227–56
 overview 8, 227
 colonial practices 238–44
 human nature and human progress 227–30
 imperial constraints 230–38
 libel and politics 251–6
 speech, identity and harm 245–51
colonialism
 American colonies 81, 121, 123–5, 127, 135, 145, 181, 183, 391–2n
 colon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221–6
 freedom and bondage 73–5, 77, 78
 imperial entanglements 181–2
 India 182–3, 188, 189, 195–6, 205–7, 210, 212–13
 J. S. Mill 182, 210, 212–13
 publishing and power in early America 80–85
colonial newspapers 63, 80–81
colonization 174, 186, 221–6
comedy 20, 179–80, 405n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299, 300
Committee to Defend Martin Luther King and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the South 305
common good 97, 308, 312, 316, 325, 337
common people 53, 55
communication 9, 80, 179, 198, 259, 270, 333–4, 343
Communications Act (1934, US) 317, 318, 319, 320, 322, 323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se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communism 1, 6, 250, 258, 276–80, 283, 290, 292, 302–3, 315, 319–20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CPUSA) 302, 303
community 16, 17, 45
computers 259, 318
Comstock Act (1873, US) 285
Comte, Auguste 222
Concanen, Matthew 372n
Condorcet, Marquis de 133, 137, 404n
Congress *se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Connecticut 127, 129, 252, 391n
conscience 7, 29–37, 45, 51, 110, 128–9, 163, 298, 355n
conspiracy theories 24, 25, 26, 221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63–4](#), [119](#), [122](#), [128–31](#), [133](#), [139–40](#), [147](#), [151–3](#), [160](#),
[169](#), [171](#), [283–9](#), [295](#), [313–14](#), [317](#)
First Amendment *see* [First Amendment](#)
Fourteenth Amendment [122](#), [171](#), [286](#), [289](#), [313](#)

constitutions

- American colonies [121](#), [123](#), [126](#), [391–2n](#)
- Australia [391n](#)
- Batavian Republic [153](#)
- Brazil [153](#)
- Britain [97](#), [140](#), [215](#), [237](#)
- Canada [391n](#)
- China [277](#)
- communist [258](#), [428n](#)
- France [133](#), [137](#), [148n](#), [152](#), [156](#), [172](#)
- Georgia (colony) [127](#)
- Germany [119](#)
- global [64](#), [121](#)
- India [233](#), [244](#), [421n](#)
- Japan [391n](#)
- Netherlands [153](#)
- Norway [153](#)
- Pennsylvania [139–44](#), [168](#)
- Soviet Union [274](#)
- Spain [153](#)
- and slavery [79n](#)
- US states [37](#), [123](#), [127–9](#), [134](#), [139–47](#), [149](#), [152](#), [392n](#), [398n](#)
- Venezuela [153](#)
- see also*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tent of speech

- content moderation [322–4](#), [328](#), [337](#)
- content neutrality [307](#), [325](#)
- free speech from past to future [334](#), [337](#)
-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expressions [164](#), [165](#), [167](#), [176](#), [177](#), [179](#), [180](#)
- marketplace of ideas [283](#), [291](#), [294](#), [307](#), [315](#), [322–5](#), [328](#), [329](#)

context of speech [23](#), [179](#), [180](#), [312](#), [314](#), [315](#), [329](#), [334](#), [335](#)

Continental Congress [124](#), [138](#)

conversation [260](#), [261](#)

conversos [23](#)

Coornhert, Dirck Volkertszoon [29–30](#), [36](#)

Cosby, William [80](#), [81](#), [87](#), [375n](#)

Covid-19 [321](#)

The Craftsman [63](#), [81](#)

Crawford, Affy [85](#)

Crawford, Hugh [85](#)

Cromwell, Oliver [16](#)

Cuba [258](#), [428n](#)
cucking-stools [14](#), [348n](#)
culture war [341n](#)
curses [11](#), [14](#)
cursing [14](#), [16](#)

Daily News [266](#)
d'Alembert, Jean le Rond [104](#)
Darrow, Clarence [286](#)
Davenant, Charles [40](#)
Dearborn Independent (newspaper) [251](#)
Debs, Eugene [284](#), [285](#), [286](#), [288](#), [289](#)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27](#), [133](#), [140](#)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 [64](#), [134–42](#), [144–7](#), [148n](#), [153](#), [155](#),
[164](#), [172–3](#)
declarations of rights
 American colonies [81](#), [123](#), [125](#)
 Pennsylvania [139–40](#), [144](#)
 US states [63](#), [128–30](#), [133](#), [135](#), [138–40](#), [144](#), [147](#), [392n](#)
 Virginia [138](#)
 see also [Bill of Rights \(US\)](#); [constitutions](#)
defamation [12](#), [14–16](#), [20](#), [24](#), [125](#), [146](#), [234](#), [244](#), [261](#), [305](#), [306](#), [319](#)
Defoe, Benjamin Norton [49](#), [58](#)
Defoe, Daniel [44](#), [45](#), [49](#), [57–8](#), [73](#), [157](#), [158](#)
Delaware [123](#), [126](#), [145](#), [163](#)
demagoguery [3](#), [154](#), [166](#), [179](#), [332–3](#)
democracy [297](#), [298](#), [308–15](#), [322](#), [326](#), [337](#), [338](#), [340](#)
 see also [citizenship](#)
denizens [168](#)
Denmark [251](#)
Denmark–Norway [91](#), [92](#), [101–4](#), [116](#), [117](#), [118](#)
Derbyshev, Nikolai Ivanovich [275](#)
deregulation [319](#)
despotism [206](#), [207](#), [213](#), [218](#), [222](#), [223](#), [224](#), [225](#), [237](#)
Devil [17](#)
Dietz, Heinrich Friedrich, *Apology for Toleration and Press Freedom* [101](#)
Digital Markets Act (2022, EU) [328](#)
digital revolution [259](#), [281](#), [328](#)
 see also [internet](#)
Digital Services Act (2022, EU) [328](#)
disabled people [177](#)
disaffection [13](#), [95](#), [163](#), [232–3](#), [238](#), [240](#), [241](#), [243](#), [246](#)
discrimination [18](#), [37](#), [247](#), [248](#), [304](#), [307](#), [308](#), [339](#)
disinformation [308](#), [331](#), [338](#), [339](#)
disloyalty [13](#), [17](#), [159–60](#), [227](#), [232–3](#), [240](#), [244](#), [262](#), [284](#), [303](#)

divine punishment [17](#)
Dix, John Adams [170–71](#), [403n](#)
Dobrée, Eliza (née Lowther) [82](#), [83](#), [84](#), [87](#), [364n](#), [379n](#)
Dobrée, Elizée/Elisha [58–9](#), [67](#), [80](#), [82–3](#), [84–5](#), [86–7](#), [88](#), [363n](#)
Dobrée, William [364n](#)
Dohm, Wilhelm von [384n](#)
domestic sphere [68](#), [174](#)
Dominica [167](#)
Donne, John [15](#)
Douglas, Justice William [253](#), [427n](#)
Douglass, Frederick [171](#)
Dowson, Sir Oscar [250](#)
Du Bois, W. E. B. [252](#)
duels [16](#)
Dundas, Henry [197](#)
Dunkley, Harriet [v](#)
Dunkley, Jo [v](#), [446](#)
Dunkley, Kate [v](#)
Dunstable, MA [145](#)
Dutch Batavian Republic [153](#)
Dutch East Indies [245](#)
Dutch Patriots [136](#)
Dutch Republic [29](#), [95](#), [123](#), [153–4](#), [155](#)
Dworkin, Andrea [177](#)
Dworkin, Ronald [8](#)

ears, cutting off [17](#)
East Asia [117](#)
East Germany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280](#)
East India Company [75](#), [182](#), [184–6](#), [189](#), [191](#), [193–4](#), [196–7](#), [200–201](#), [204](#), [207](#), [209–11](#),
[213](#), [223](#), [230](#), [235](#), [238](#), [265](#), [406–7n](#)
East Indies [74](#), [191](#)
Eden, Joshua [89](#)
education [77](#), [101](#), [166](#)
Effen, Justus van [157](#)
Egypt [11](#)
elections [120](#), [168](#), [309–10](#), [311](#), [314](#), [321](#), [332](#), [340](#)
electronic media [318](#)
Elizabeth I [13](#), [24](#)
Elphinstone, Mountstuart [199–200](#), [209](#)
emancipation [169](#), [174](#)
empires [181–8](#)
Encyclopédie [95](#)
‘end of history’ [319](#)
Engels, Friedrich [267](#), [269–70](#)

England
 anglophone attitudes 156–60
 penal code 245–6
 political free speech 47
 power of speech 12, 14, 19, 24, 26
 religious free speech 30, 33, 95
 spoken and written words 263

English civil wars 25, 26, 30

enlightened experiments 91–118
 overview 91–2
 Denmark–Norway and Struensee 101–4
 effect of Scandinavian laws 116–18
 freedom of philosophizing 92–6
 legislating for expression 112–16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97–101
 scientific and civil liberty 108–12
 spreading enlightenment 96–7
 Sweden 104–16

Enlightenment 35, 95, 97, 102, 110, 183, 222

enslaved people *see* slavery

equality 175, 177, 178, 179, 269, 272, 334

Equiano, Olaudah 77, 78–9, 83

Erpenbeck, John 280

Erskine, Thomas 164, 166, 402n

Espionage Act (1917, US) 284, 287, 288

ethnic minorities 247, 248, 324

Europe 6, 8, 36, 91, 117, 222–4, 262, 328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50, 326–7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326

European imperialism 181–2, 186

evangelism 235, 318

evolution 248

executions 13, 44, 93n, 116, 150, 155

expression, and thought 220–21, 226
 see also freedom of expression

Facebook 150, 256, 281, 322, 324

facts 281, 342

Faden, William 193

fairness doctrine 317, 318

fake news 25, 331, 339

false facts 136, 138, 216, 396n

false news 12, 16, 44, 48, 125, 155, 261–2

fascism 248, 250, 252, 303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317, 318, 440n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309
female authors 68–70
female speech 19–21, 35, 67–72, 172–6, 177
feminism 20, 173
Ferguson, Adam 212
Fichte, Johann Gottlieb 100
fiction 20, 110
Fielding, Sir John 77
films 316, 440n
Financial Times 281–2
Finland 104, 113
First Amendment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19–51
 overview 119–23
 accidental exceptionalism 119–51
 American attitudes 3, 144–8
 anti-capitalist challenge 258, 283–7, 290, 292–4, 296, 302
 collective rights and wrongs 292, 295, 296
 postcolonial influence 244
 democracy and speech 309–14
 First Amendment arguments 282–91
 free speech from past to future 331–4, 338, 339
 French influences 139–44
 group libel 252–4
 inventing political free speech 63–4
 laws and liberties 148–51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expressions 160, 163, 171, 177
 libertarian revolution 303–5, 307, 325
 local declarations of rights 81, 123–8
 national rights 128–32
 online marketplace 317–18, 320, 325
 problem of press freedom 298, 300, 301
 ratification and wording 131–2
 transatlantic developments 132–9
 United States Capitol 39
First Red Scare 284, 287, 292
First World War 122, 283, 284, 292
Fish, Stanley 8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Speech: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338
Florida 145
Ford, Henry 251
Foronda, Valentín de 157–8
Forsskål, Peter 108–9, 111–12, 113
 'Doubts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Modern Philosophy' 108–9
 'On Civil Liberty' (*De libertate civili*) 111–12, 115
'Founding Fathers' 40, 149, 253

Fourteenth Amendment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22](#), [171](#), [286](#), [289](#), [313](#)
fourth estate [98](#), [341](#)
Fox, Charles James [408n](#)
Fox News [318](#)
France [6](#), [43](#), [68](#), [100](#), [118](#), [132–45](#), [148n](#), [149](#), [152](#), [154–6](#), [196](#), [248](#), [262](#), [269](#), [296](#)
Francis, Philip [194](#)
Franck, Sebastian [29](#)
Frank, Leo [251](#)
Frankfurter, Felix [289](#), [427n](#)
Franklin, Benjamin [39–40](#), [80](#), [132](#), [140–41](#)
Franklin, James [80](#), [157](#)
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 [94](#), [99](#), [100](#), [110](#), [111](#), [354n](#)
Free African Society [161](#)
free Black people [75–7](#), [79](#), [86](#), [149](#), [160–62](#), [167–9](#), [262](#)
freedom [180](#), [332](#), [343](#)
freedom of conscience [7](#), [29–37](#), [45](#), [51](#), [110](#), [128–9](#), [163](#), [355n](#)
freedom of enquiry [341](#), [342](#)
freedom of expression [3–5](#), [8–9](#), [15](#), [22](#), [28](#), [30](#), [217–18](#), [220–21](#), [302](#), [331](#), [339](#)
freedom of information [297](#), [299](#), [326–7](#)
freedom of philosophizing [92–6](#), [100](#), [341](#)
freedom of religion [34](#), [121](#), [133](#), [258](#)
freedom of speech and debate [28](#), [42](#)
freedom of the news [298](#), [299](#)
freedom of the press *see* [press freedom](#)
freedom of thought [41](#), [51](#), [110](#), [220–21](#), [279](#), [289](#), [340](#)
freedom of writing [91](#), [115](#), [116](#), [121](#), [130](#), [262](#)
Freedom Rally [318](#)
free market [270](#), [319](#), [325](#)
free speech
 overview [1–9](#)
 accidental exceptionalism of First Amendment [119–51](#)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unfreedoms [227–56](#)
 enlightened experiments [91–118](#)
 free-speech futures [320–29](#)
 imperial entanglements [181–226](#)
 inventing political free speech [39–65](#)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expressions [152–80](#)
 marketplace of ideas [257–329](#)
 from past to future [331–43](#)
 power of speech [11–26](#)
 purpose of [178–9](#), [180](#), [256](#), [296](#), [339](#), [342–3](#)
 shapes of freedom [66–90](#)
 tolerating words and religious speech [27–38](#)
Free Speech Century [288](#)
Free Speech League [285](#), [286](#), [292](#)

free trade [2](#), [185](#), [204](#), [319](#)
free trade in ideas [289](#), [297n](#)
Frémont, John C. [171](#)
French Enlightenment [35](#), [95](#)
French Revolution [100](#), [118](#), [133](#), [139](#), [154](#), [155](#), [196](#)
Frohwerk, Jacob [284](#), [288](#), [289](#)
'fugitive slave' laws [160](#), [161](#), [162](#)
Fuller, Margaret [172](#)
Fyge, Sarah
 'The Emulation' [69](#)
 The Female Advocate [69](#)
 'The Liberty' [69–70](#)

'gag rule' [163](#), [170](#), [171](#), [175](#)
Gandhi, Mohandas K. [243–4](#)
 Young India [243](#)
gay people [37](#), [247](#), [314](#), [318](#), [335](#)
Gellius, Johann Gottfried [157](#)
gender [19–21](#), [66](#), [67–72](#), [172–4](#), [177](#), [339](#)
general will [96](#), [97](#), [135](#), [154](#), [316](#)
George II,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09](#)
George IV,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03](#)
Georgia [83](#), [84](#), [127–8](#), [252](#)
Germany [99–102](#), [108–9](#), [118](#), [119](#), [222](#), [248](#), [270](#), [272](#), [280](#), [303](#), [305](#), [384n](#), [431n](#)
Ghosh, Kasiprasad [198](#)
Gitlow, Benjamin [289–90](#), [291](#)
Glorious Revolution (1688) [33](#), [43](#), [47](#)
Goa [189](#)
God [7](#), [12](#), [16](#), [22](#), [23](#), [27](#), [28](#), [29](#), [34](#), [51](#)
Google [281](#), [321](#)
Gordon, Bill [75](#)
Gordon, Patty [75](#), [77](#), [371n](#)
Gordon, Thomas
 'Cato's Letters' [40–42](#), [46–9](#), [50–55](#), [58–64](#), [67](#), [68](#), [70–74](#), [76](#), [80–82](#), [88](#), [105](#), [261](#), [266](#)
 A Modest Apology for Parson Alberoni [75](#)
 'Of Freedom of Speech' [62](#)
 St James's Journal editorial [60–61](#)
Gordon, Tom [75](#), [76](#), [77](#), [372n](#)
Gorky, Maxim [275](#)
Göttingen (University) [108](#), [109](#), [111](#), [112](#)
Gouges, Olympe d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of the Female Citizen* [172–3](#)
government [1](#), [8–9](#), [14](#), [21–2](#), [30](#), [44](#), [52](#), [64–5](#), [74](#), [98](#), [100](#), [120](#), [257](#), [317](#)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260](#)
Grant, Charles [414n](#)
Greeks [28](#), [73](#)

Griffith, D. W., *The Birth of a Nation* 252
Grimké, Angelina 175
Grimké sisters 174
group libel 246–8, 249–51, 251–6, 426n, 427n
Guam 285
Guardian newspaper 281, 315
Guizot, Francois 155
gun crime 255
Gustav III, King of Sweden 116–17
Gyllenborg, Count Carl 104–6, 107

Haiti 167, 197, 212
 see also Saint-Domingue
Halhed, Nathaniel Brassey 189–90
 Grammar of the Bengal Language 189–90
Hamilton, Alexander 130, 132, 149
Hand, Learned 289
hands, cutting off 13, 17, 54
handwritten documents 79, 83, 189, 191, 356n
harassment 308, 321, 325, 334
Harlan, John Marshall 287
Harley, Robert 59, 74
harm 64, 144, 149, 178, 219, 220, 247, 255, 291, 303, 306, 307, 312, 314, 321, 323, 324, 329
Hastings, Lord 197, 201, 414n
Hastings, Warren 184, 189, 191, 192, 193, 194, 408n, 409n
hate speech 65, 151, 227, 244, 246–7, 250, 255, 256, 283, 304, 307, 310, 313, 321, 323–5
 see also group libel
'Hats' and 'Caps' (Sweden) 105–6, 107, 108, 112–13, 114
Hawaii 147
Hegel, G. W. F. 222
Helvetius, Claude Adrien 103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and Ireland 13
Henry, Patrick 125, 129
heresy 12, 27, 28–9, 30, 93n, 94
Hetherington, Henry 268
Hicky, James 190–95, 200, 201, 407n, 408n
Hicky's Bengal Gazette: or Calcutta General Advertiser 191–2, 193, 194, 195, 201
hierarchy and authority 18–26
The Hindu newspaper 242
Hindus 18, 185, 189, 198, 202, 212–13, 230, 234, 236, 239, 241, 243–4, 324, 412n
Hobbes, Thomas 15, 61
 Leviathan 21
Holberg, Ludvig 107
Holland 110, 111

see also [Dutch Republic](#)
Holmes, Oliver Wendell [287–9](#), [290](#), [291](#), [297](#), [297n](#)
Holocaust [180](#), [248](#), [250](#), [303](#), [307](#)
Holt, Sir John [45–6](#)
Homer, *Odyssey* [20](#)
homosexuality [37](#), [247](#), [314](#), [318](#), [335](#)
Hong Kong [223](#)
Hoover, Herbert [298](#)
humanity, and liberty [214–21](#)
human nature [17](#), [30](#), [227–30](#), [229](#), [261](#)
human rights [100](#), [135](#), [175](#), [197](#), [250](#), [279](#), [304](#), [326–7](#)
Humboldt, Wilhelm von [223](#)
Hume, David [76](#), [107](#), [164](#), [206](#), [373n](#), [429n](#)
humour [179–80](#), [405n](#)
Hunter, Robert [377n](#)

Iceland [12](#), [15–16](#)
Ickes, Harold [298](#)
Idaho [146](#)
identity [225](#), [247](#), [340](#)
identity politics [240](#), [243–4](#), [246–52](#), [335](#)
Ihre, Johan [107](#), [111](#), [112](#)
illegitimacy [173](#)
Illinois [251](#), [254](#), [304](#), [307](#)
immigrants [250](#), [284](#)
imperial entanglements [181–226](#)
 overview [8](#), [181–2](#)
 British principles and colonial subjects [206–9](#)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unfreedoms [230–38](#)
 colon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221–6](#)
 global arguments [193–9](#)
 Indians and print [199–206](#)
 justifying empire [182–8](#)
 liberty and humanity [214–21](#)
 native character [209–14](#)
 print comes to India [188–93](#)
impermissible speech [2](#), [13–16](#), [23](#), [37–8](#), [155](#), [159–64](#), [176](#), [180](#), [321](#)
 see also [bad words](#)
Impey, Sir Elijah [193](#), [194](#), [195](#)
Independent Gazetteer [397n](#)
Independent Whig [51](#)
India
 overview [8](#)
 British principles and colonial subjects [206–9](#)
 British rule [196–8](#), [204–9](#), [210](#), [213–14](#), [230](#), [232–3](#)

-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unfreedoms 227–8, 229, 230, 238–44
- colon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223–5
- constitution 244
- earliest law code 11
- global arguments 193–9
- Hicky 193–5
- imperial constraints 230–38
- imperial entanglements 181–2
- independence 233, 243, 244
- justifying empire 182, 183, 184–7
- liberty and humanity 214–15
- J. S. Mill 214–15, 223–5, 266n
- native character 209–14
- online speech 321, 324
- partition 188, 233, 243
- penal code 232, 234, 238–40, 244–5
- and print 75, 117, 188–93, 199–206
- speech, identity and harm 245, 246, 247
- India Gazette: or Calcutta Public Advertiser* 192, 193, 195
- Indiana 252
-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231, 241, 242
- Indians (Native Americans) 84, 174
- individual rights 52, 54, 118, 132, 135, 216–18, 225, 226, 282, 291–2, 311, 312, 316, 326, 334
-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 285, 286, 292, 294
- inequality 269, 310
- information 57, 127, 143, 153, 191, 281, 297, 299, 321, 326–7
- information overload 331
- Ingoldsby, Richard 381n
- injury 12, 149, 221, 254n
- insubordination 14, 260
- insults 14, 15, 35, 216, 234, 254n, 260, 261
- insurrection 21, 77, 146, 170, 208
- intellectuals 92, 98, 99, 101, 101, 166
- intentions of speaker/writer 166, 179, 180, 240, 334
- internet 1–2, 6, 64, 150–51, 256, 259, 277, 318–22, 324, 327–8, 331, 335–6, 341
- inventing political free speech 39–65
 - overview 39–40
 - ‘Cato’s Letters’ 40–42
 - impact of journalism 46–50
 - liberty of the press 42–6
 - money and manipulation 55–8
 - novel arguments 50–55
 - personal and political 58–62
 - truth and consequences 62–5

Iran 338
Ireland 14, 74, 188, 205, 212
Islamophobia 247, 323
Israel 340
Italy 95, 98
IWW *se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yengar, A. Rangaswami 242

Jackson, Robert H. 253–4
Jackson, Robert R. 251
Jacobites 44, 47, 48, 59, 61
Jamaica 74, 75, 76, 77, 78, 79, 212, 377n
James I and VI, King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22, 25, 262
James II, King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33, 44
Japan 282, 303, 391n
Jefferson, Thomas 132, 133, 134, 136, 137–8, 147, 150, 158, 216, 395n, 396n
Jemmy (rebel) 87
Jewish People's Council Against Fascism and Anti-Semitism 249–50
Jews 12, 31, 36, 75, 180, 230, 248–50, 251, 254, 307, 426n
Jocelin, Elizabeth 23
Johnson, Dr Samuel 35, 103
jokes 180, 335
Jones, Absalom 161
Joseph II, Holy Roman Emperor 99
journalism 46–50, 57, 80, 98, 158, 258, 267, 271, 281, 296, 301, 341
 see also newspapers; press freedom
judiciary 5, 143, 312, 313
Julius Caesar 40, 49
'Junius' letters 194–5
juries 124, 127, 143, 233, 263

Kagan, Justice Elena 311
Kant, Immanuel 94, 100, 385n
Kautsky, Karl 272, 275, 292
Kelley, Abby 174, 175
Kentucky 145
King, Martin Luther 305
kings 19, 48, 159
Kipling, Rudyard 186
Knies, Karl 270–72
Kohler, Walter 437n
König, Christian 107, 115
Kronstadt uprising 278
Ku Klux Klan 252, 253, 293, 294, 307

labour movement [284](#), [285](#), [286](#), [292](#), [293](#), [295](#)
Labour Party [250](#)
Lafayette, Marquis de [132–3](#), [134](#), [395n](#)
laissez-faire [271](#), [319](#)
Lamb, Dr John [25](#)
La Mettrie, Julien Offray de, *L'Homme machine* [110](#)
Langton, Rae [8](#)
languages [72](#), [95](#), [190](#), [196](#), [260](#), [261](#)
la Rochefoucauld, Duc de [137](#)
Laski, Harold [288–9](#), [291](#)
 Authority in the Modern State [288](#)
Lassalle, Ferdinand [270](#)
learned free speech [92–5](#), [341–2](#)
Leese, Arnold [248–9](#)
legislation [5](#), [12](#), [14–16](#), [18–19](#), [121](#), [148–51](#), [261–3](#), [312](#), [328](#), [336](#)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expressions [152–80](#)
 overview [152](#)
 anglophone attitudes [156–60](#)
 licence and liberty [152–6](#)
 means and ends [176–80](#)
 race and reason [167–71](#)
 sex and status [171–6](#)
 speakers and listeners [163–6](#)
 speech and slavery [160–63](#)
Leiden [109](#), [110](#)
Lenin (Vladimir Ilyich Ulyanov) [258](#), [272–3](#), [275](#), [276](#), [277–8](#)
 What Is to Be Done? [272](#)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99](#), [386n](#)
Leveller movement [45](#)
libel
 ‘Cato’s Letters’ [48](#), [49](#), [50](#), [52](#), [54](#), [56](#), [59](#), [68](#), [81](#)
 Gordon on [62](#)
 group libel [246–8](#), [249–51](#), [251–6](#), [426n](#), [427n](#)
 hierarchy and authority [21](#), [22](#)
 laws [159](#), [261](#), [305](#), [306](#), [327](#)
 licentiousness [125](#)
 Luzac’s treatise [110](#)
 James Mill [216](#)
 J. S. Mill [219](#), [220](#), [221](#)
 Milton [54](#)
 political free speech [44–6](#), [48–50](#), [52](#), [54](#), [59](#), [62](#)
 and politics [251–6](#)
 scholarly free speech [93](#)
 seditious libel [44](#), [45](#), [49](#), [81](#), [128](#), [159](#), [164](#), [249](#)
 and slander [261](#)

speech, identity and harm 245, 246, 247–8
US state constitutions 142–3, 146
Libel Act (1792, England) 159
libertarian approach to free speech
 American revolutionary press 81, 124, 126
 and balancing approach 119–22
 democracy and speech 313, 314
 First Amendment history 119–22, 132, 146, 148–51
 libertarian revolution 301–8
 online speech 316, 317, 318, 319, 325
libertas 28
libertas philosophandi ('the freedom of philosophizing') 93, 94, 100
liberty 55, 56, 63, 72–4, 78, 79, 79n, 81–3, 85, 87–90, 125, 214–21, 291
liberty of conscience 30, 33, 36, 37, 51, 128, 129, 163, 355n
liberty of expression 4–5, 22, 45, 47, 50, 54, 120, 134, 149, 176, 229, 257, 270, 272, 335, 341n, 342
liberty of speech 6, 8, 22, 31, 37, 41, 52, 64, 77–8, 83, 100, 109, 119, 134, 137, 146, 170, 178, 181, 303, 342
liberty of the press
 balancing approach 119
 Blackstone on 125–6, 287
 Engels on 269
 First Amendment 64, 128–30, 136–8, 145, 146, 149, 287
 France 136, 137, 141, 154–5, 156
 India 197, 206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expressions 154–5, 156, 159
 Luzac's treatise 110
 media distortion 272, 276
 media revolution 259
 Milton on 31–3, 259, 353n
 J. S. Mill 217
 political free speech 7, 8, 42–6, 50, 63, 64
 pre-modern societies 3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98–101
 problem of press freedom 299, 301
 radical press 268
 spreading enlightenment 96
 Tindal on 53
 Trenchard and Gordon 48, 51, 53–4
 US local declarations 63, 123, 125–6, 127
 see also press freedom
liberty of thought 110, 215, 220–21
licence and liberty 152–6, 291
licensing 31–3, 43, 44, 156–7, 200, 203, 259
licentia 28

licentiousness 52, 62, 68, 116, 119, 125–6, 141, 146, 156
lies 3, 12, 18, 23–5, 29–30, 124, 178, 221, 255, 281, 331–3, 339
Limus (slave) 89
Linnaeus, Carl 108, 111
Lippmann, Walter 297
Lipsius, Justus 23
literacy 77, 79n, 84, 101, 149, 188–9
literature 274, 280
litigation 20, 158, 260, 261
Llanelli 24
Locke, John 34, 36, 37, 40, 44, 51, 73, 74, 79n, 109, 164, 202, 206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34
Lollards 23
London 30, 157, 266
 London Journal 40, 46, 49, 50, 57–60, 73, 82, 87, 107
London Stationers' Company 33
 Los Angeles Times 282
Louis XVI, King of France 132, 133, 137, 172
Louisiana 149–50
love poems 12
Lowther, Elizabeth *see* Dobrée, Eliza
loyalty 13, 48, 94, 203, 206, 209, 233, 240, 303
Luce, Henry 298, 299
Lutherans 29, 354n
Luzac, Elie 109–11, 118, 154
 Essay on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110, 111, 154
 L'Homme plus que machine 110
lying *see* lies
lynchings 251, 252, 253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233–5, 236–8, 239, 421n, 422n
Macaulay, Zachary 236
Machiavelli, Niccolò 22, 23, 40, 61
MacKinnon, Catharine A. 8, 177
Madison, James 63, 125, 128, 130–31, 133, 134, 136, 137, 138, 147, 150, 169, 395n
Madras 189, 196, 406n
Magna Carta 19
Maine, Sir Henry 227
Makin, Bathusa 20–21
malediction 14
male speech 19, 20, 66, 67–72
malice 24, 58, 143, 306
Manhattan 85
Manley, Delarivier 70
mansplaining 69

manuscripts [95](#), [198](#), [202](#), [356n](#)
Maratha Empire [198](#)
Marcuse, Herbert [301](#)
Maritz, Manie [248](#)
marketplace of ideas [257–329](#)
 overview [257–9](#)
 addressing media distortion [270–76](#)
 collective rights and wrongs [291–6](#)
 democracy and speech [308–15](#)
 and equality [178](#)
 First Amendment arguments [282–91](#)
 free speech from past to future [332](#), [342](#)
 free-speech futures [320–29](#)
 impact of new media [259–65](#)
 libertarian revolution [301–8](#)
 as metaphor [290](#), [291](#), [296](#), [329](#)
 online marketplace [315–20](#)
 print, money and class [265–70](#)
 problem of press freedom [296–301](#)
 totalitarian truth [276–82](#)
 truth and consequences [64](#)
Maroons [78](#)
marriage [31](#), [67](#), [69](#), [70](#)
Marx, Karl [183](#), [187](#), [258](#), [268–9](#), [272](#), [431n](#)
Marxism [257](#), [272](#), [277](#), [278](#)
Maryland [128](#), [174](#)
Mason, George [125](#), [128–9](#), [130](#)
Massachusetts [37](#), [80](#), [124](#), [126](#), [145](#), [157](#), [162](#), [168](#), [252](#), [392n](#)
mass communication [80](#), [299](#), [315](#), [317](#)
mass media [6](#), [250](#), [271](#), [272](#), [281](#), [300–301](#), [315](#), [322](#)
McDougall, Alexander [127](#)
McFarland, Clifford [252](#)
meaning [178](#), [180](#), [323](#)
media
 addressing media distortion [270–76](#)
 broadcast media [6](#), [178](#), [256](#), [281](#), [315](#), [317–18](#), [327](#)
 collective rights and wrongs [292](#)
 democracy and speech [315](#)
 equality of voice [178](#), [269](#)
 First Amendment arguments [283](#), [289](#)
 free speech from past to future [331](#), [336–7](#), [338](#), [341](#)
 free-speech futures [321–2](#)
 hate speech [250](#), [255](#), [321–5](#)
 impact of new media [259–65](#)
 libertarian revolution [301](#), [302](#), [304](#)

- marketplace of ideas [258–9](#)
- mass media [6](#), [250](#), [271](#), [272](#), [281](#), [300–301](#), [315](#), [322](#)
- J. S. Mill [223](#), [265](#), [266](#)
- online marketplace [6](#), [315–18](#)
- power imbalances [5](#), [80](#)
- problem of press freedom [296](#), [297n](#), [298](#), [300–301](#)
- regulation [315–16](#), [328](#)
- totalitarian truth [277](#), [278](#), [280–82](#)
- truth and consequences [65](#)
- see also* [social media](#)
- media companies [6](#), [64–5](#), [150–51](#), [256](#), [298](#), [304](#), [321](#), [322](#), [328](#)
- media platforms [178](#), [259](#), [321](#), [323](#), [328](#)
- medical information [325](#), [328](#), [337](#), [340](#)
- medium, importance of [180](#), [259–66](#)
- Meiklejohn, Alexander [317](#)
 - Free Speech and Its Relation to Self-Government* [300](#)
- Memorial on False and Erroneous Ideas* [104](#)
- men and male speech [19](#), [20](#), [66](#), [67–72](#)
- Mendelssohn, Moses [384n](#)
- Mercier, Louis-Sébastien [96–7](#), [154–5](#)
- Meta [321](#)
- Mexico [19](#), [174](#)
- Michaelis, Johann David [108](#), [109](#), [111](#)
- Mill, James [185–7](#), [211](#), [212](#), [215–17](#), [219](#), [221](#), [237](#), [265](#), [416n](#), [417n](#)
 -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185–6](#), [198](#), [211](#), [212](#), [236](#)
- Mill, John Stuart
 - colon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221–6](#)
 - and Holmes [288](#)
 - imperialism and India [182](#), [209–14](#), [217–26](#), [228–32](#), [234](#), [235](#)
 - later thought [417n](#)
 - liberty and humanity [214–21](#)
 - marketplace of ideas [257](#), [259](#), [265](#), [290](#), [297](#), [316](#)
 - native character [209–14](#)
 - Stephen on [228–9](#)
 - and Tocqueville [406n](#)
 - On Liberty* [7](#), [41](#), [182](#), [210](#), [214–15](#), [217](#), [219](#), [222–3](#), [224](#), [225](#), [228–9](#), [231](#), [265](#), [288](#), [419n](#)
 -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419n](#)
 - Utilitarianism* [419n](#)
- Millar, James [212](#)
- Milton, John [31–2](#), [33](#), [36](#), [51](#), [52](#), [54](#), [110](#), [206](#), [216](#), [219](#), [259](#), [261](#), [290](#), [297](#), [353n](#)
 - Areopagitica* [31–2](#), [33](#), [34](#), [45](#), [231](#), [261](#), [402n](#), [429n](#)
- Minnesota [252](#), [298](#), [307](#)
- minority groups [247](#), [307](#), [324](#), [340](#)
- Mirabeau, Comte de [135](#), [136](#)

Mirat al-Akhbar 202, 203, 205, 411n
miscommunication 179
misinformation 25, 26, 50, 55, 57, 65, 150, 153, 281, 302, 320, 321, 324, 325, 328, 337, 340
misogyny 78, 177, 328
missionaries 235
Mississippi 146, 251, 304, 317
moderation of content 322–4, 328, 337
Molesworth, Robert 48, 61
monarchies 13, 14, 19, 21, 25, 28, 42, 48, 135
money 55–8, 65, 80, 151, 258, 265–70, 309–10, 311, 317, 324
Montaigne, Michel de 23
Mookerjea, Ashutosh 231
Moore, Francis 84
'Moral Majority' movement 318
More, Thomas 28
 Utopia 13
Morris, Lewis, Jr 81, 82
Morris, Lewis, Snr 81, 82, 87
motherhood 173
Mott, Lucretia 176
Mounier, Jean-Joseph 136, 137
Mughal Empire 184, 204, 205, 207
mulattoes 75, 167
Munro, Sir Thomas 208–9
Murdoch, Rupert 280
Musk, Elon 280, 321, 323
Muslims 31, 213, 234, 236, 239–41, 244, 247, 307, 321, 361n
mutilation 13, 17, 18, 37, 54
Myanmar 247, 321, 324
Myasnikov, Gavril 278

Nantes 377n
Napoleon I of France 117, 263
Napoleon III of France 417
Nariño, Antonio 164
Nath, Bishambar 242
National Assembly, France 134, 135, 137, 148, 155, 172
national character 212, 213
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 250
National Defense Association 285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1933, US) 299
National Public Radio (NPR) 315
national rights 286
Native Americans 84, 174

Naturalization Act (1790, US) 168
natural rights 45, 136
Nayler, James 37
Nazism 248, 251, 253, 293, 294, 303, 304, 305, 307
Nelles, Walter 293
Netherlands 110, 117–18, 153
 see also Dutch Republic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269
New Deal 294, 297, 298, 299
New-England Courant 80, 157
New Grenada 164
New Hampshire 126, 145, 392n
New Jersey 37, 87, 252, 253, 392n
New Life 275
New London 123
news 25, 43, 44, 57, 70, 266, 281, 282, 296, 321, 335
 see also newspapers
newspapers
 addressing media distortion 271, 272, 276
 anglophone attitudes 158–60
 Caribbean 73, 193
 ‘Cato’s Letters’ 46, 50–51, 56–7, 63, 73, 80–81
 and Dobrée 84–5
 equality of voice 178
 France 156
 impact of new media 259
 imperialism 181
 India 191, 196, 198, 200, 202–4, 207, 209, 214, 232, 236
 licence and liberty 152, 154, 156
 J. S. Mill 223
 political free speech 43, 44, 46, 50, 51, 56–7
 print money and class 265, 266, 267, 269
 problem of press freedom 296, 297, 298, 299, 301
 responsibilities 317
 Scandinavian innovations 118
 and slavery 67, 73, 88
 totalitarian truth 277, 280, 281, 282
New York 82, 85–7, 89, 90, 123, 170, 252, 392n
New-York Daily Tribune 183
New-York Gazette 80, 81
New York Times 305
New-York Weekly Journal 80, 81, 82, 85, 86, 369n
New Zealand 246, 251
Nicolai, Friedrich 384n
‘nigger’ as term 179, 230, 237, 307, 405n

Nordenkrantz, Anders *see* [Anders Bachmanson](#)
Nordic laws [91–2](#), [101](#), [116–18](#)
norms [9](#), [218](#), [246](#), [264](#), [336](#), [337](#), [342](#)
North America [6](#), [63](#), [74](#), [80](#), [117](#), [123](#)
North Carolina [128](#), [160](#), [161](#)
Northern Star [269](#)
North Korea [258](#), [428n](#)
Norton, Eardley [231](#)
Norton, John Bruce [230](#)
Norway [91](#), [92](#), [153](#)
 see also [Denmark–Norway](#)
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95](#)

oaths [13](#), [17](#), [75](#), [78](#), [264](#)
obscenity [150](#), [164](#), [165](#), [166](#), [177](#), [178](#), [285](#), [318](#)
Observer (newspaper) [43](#), [45](#)
Oelreich, Niclas von [107–8](#), [111](#), [112](#), [113](#), [114](#), [158](#)
Oglethorpe, James [86](#), [380n](#)
Ohio [145](#)
Online Safety Act (2023, UK) [328](#)
online speech [6](#), [281](#), [282](#), [315–25](#), [335–6](#)
opium [223](#)
oral communication [5](#), [11–21](#), [75](#), [189](#), [198](#), [259–64](#), [429n](#)
Oriental Herald and Colonial Review [201](#)
Orwell, George [257](#)
Otis, Harrison Gray [162–3](#), [169–70](#)

Paine, Thomas [133](#), [155–6](#)
 Age of Reason [164](#)
 Rights of Man [166](#), [198](#)
Pakistan [227](#), [244](#)
pamphlets [22](#), [43](#), [48](#), [105](#), [111](#), [116](#), [159](#), [181](#)
paper, Stamp Duty on [267](#)
Paris [13–4](#), [138](#), [155](#)
parliament [21](#), [28](#), [31–2](#), [33](#), [42](#), [45](#), [60](#), [114](#), [157](#), [159](#), [184](#), [196](#), [249](#)
parrhesia [28](#), [32](#)
party politics [42–3](#)
Pascal, Michael Henry [377n](#)
patriarchy [72](#), [173](#)
Patriots
 America [127](#), [135](#)
 Dutch Republic [153–4](#), [155](#), [399n](#)
Patterson, Thomas [287](#)
penal code
 British colonies [246](#)

England 245–6
Germany 248
India 232, 234, 238–40, 244–5
other colonial territories 245–6
Pennsylvania 16, 123, 130, 139–40, 141–4, 145, 149, 168, 392n, 397n
‘the people’ 22, 43, 52–3, 55, 61, 64, 96, 130–31, 165, 175, 216, 217, 268
people of colour 75, 79, 149–50, 167, 177
 see also Black peopl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e* China
periodicals 196, 214, 266, 267, 296, 317
 see also newspapers
Perkins, William 19
 A Directi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23, 429n
permissible speech 2, 180, 321
personal and political 58–62
personal data 322, 328
personal liberty 8, 40, 131, 157, 182, 210, 214, 221, 224, 228
personal reputation 15–16, 85, 247
Peter the Great 262
Peterloo Massacre 159
Peters, Richard 86
Petrograd 273
Philadelphia 80, 128, 130, 139, 140, 141, 145, 161, 168, 169, 283, 397n
Philippines 285
philosophizing, freedom of 92–6, 100, 341
physical mutilation 13, 17, 18, 37, 54
picketing 292, 294, 295
Pilati, Carlo Antonio, *On Reforming Italy* 98
Pinckney, Charles 128, 129, 129n
plays 44, 157, 264
Pliny 32
plurality and truth 27–32
poetry 12, 69–70
Poland–Lithuania 29, 99
politeness 47, 71
political free speech 39–65
 overview 39–40
 ‘Cato’s Letters’ 40–42
 democracy and speech 309–10, 311
 First Amendment history 150–51
 hierarchy and authority 20, 21, 22, 25–6
 impact of journalism 46–50
 inventing free speech 7, 39–65
 libel and politics 251–6
 liberty of the press 42–6, 121

- male and female speech 70, 72, 174
- money and manipulation 55–8
- novel arguments 50–55
- personal and political 58–62
- religious free speech 38
- speakers of 165
- truth and consequences 62–5
- political journalism 57, 80, 92
- political parties 42–3
- polling stations 311
- Pondicherry 189, 406n
- Poor Man's Guardian* 267
- pornography 8, 120, 164, 177, 340
- postcolonial speech models 8, 210, 244, 245–6, 303
- Post, Robert 8
- Powell, Mary 31
- power 5, 9, 57, 78, 79–87, 178, 312
- power of speech 11–26
 - overview 11–15
 - hierarchy and authority 18–26
 - words as weapons 15–18
- preaching 35, 39, 161, 235, 262, 263, 318
- pre-modern societies 3, 11, 12, 14, 18, 21, 22, 24, 25–6, 280
- pre-publication censorship 115, 134, 156, 158, 196, 198, 199
- pre-publication licensing 31, 32, 33, 43, 44, 47, 148n, 157
- 'present danger' 288, 289, 290, 303
- presidential elections 3, 321, 332
- press freedom
 - addressing media distortion 270, 272–4, 275, 276
 - American revolutionary press freedom 123–7
 - balancing and libertarian approaches 119
 - 'Cato's Letters' 50, 52–4, 63, 81
 -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258, 268–9, 292
 - Denmark–Norway and Struensee 101–4
 - First Amendment history 121, 122, 128–32, 134, 136–8, 140–49, 287, 313
 - Germany 384n
 - Hicky 194–5
 - impact of journalism 46–50
 - India and imperialism 181–2, 188–9, 194–8, 200–208, 230–33, 235–6, 238, 241
 - internet 318
 - invention of 3, 4, 6, 8
 -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expressions 152–9, 164
 - marketplace of ideas 257–9, 262, 265, 267–9, 287, 292, 313, 318
 - Marx 268–9
 - James Mill 211, 215–17

J. S. Mill [209–10](#), [211](#), [217](#), [265](#)
political free speech [52–7](#), [63](#), [64](#)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97–101](#)
problem of press freedom [296–301](#)
Scandinavia [91](#), [101–6](#), [112–17](#)
scientific and civil liberty [109–12](#)
spreading enlightenment [91](#), [96–7](#)
Sweden [104–6](#), [112–17](#), [262](#)
totalitarian truth [277–9](#), [280](#), [282](#)
see also [liberty of the press](#)

print

American colonies [124](#)
Brazil [117](#)
Caribbean and Jamaica [75](#)
constitutional rights [121](#), [134](#)
East Asia [117](#)
forms of free speech [5–6](#)
France [134](#)
freedom of philosophizing [95](#)
hierarchy and authority [24](#)
impact of new media [259](#), [261](#), [262](#)
India [188–93](#), [196](#), [197](#), [199–206](#), [208](#), [209](#), [231](#), [236](#)
male and female speech [68](#), [69](#)
James Mill [215](#)
Milton [31–2](#)
number of works published [259](#)
online marketplace [317](#), [318](#)
pre-publication licensing. [31](#), [32](#), [33](#), [43](#)
print, money and class [265–70](#)
publishing and power [5](#), [79](#), [80](#), [81](#), [152](#)
religious free speech [30–34](#)
Tindal on [56](#)

printed word, and spoken word [6](#), [79–80](#), [258–60](#), [261–4](#), [265](#)

printers [70](#), [80](#), [82](#), [136](#), [145](#)

printing press

First Amendment history [121](#), [138](#), [142](#)
freedom of philosophizing [95](#), [96](#)
free-speech growth [5](#)
impact of new media [259](#), [316](#)
India [189](#), [190](#), [193](#), [232](#), [233](#), [406–7n](#)
money and class [268](#)
Nordic laws [101](#), [103](#)
other countries [117](#)
pre-modern licences [22](#)
Russia [274](#), [276](#)

Seditious Societies Act 159
spreading enlightenment 97
US state constitutions 123, 127
prior censorship 44, 106, 118, 156, 157, 158, 268, 277
Proclamation against wicked and seditious writings (1792, Britain) 159, 263
profane language 16, 264, 284, 440n
profit 65, 256, 268, 269, 271, 281, 323, 325
progress 219, 222, 223, 224, 227–30
promiscuity 36, 37
propaganda 26, 57, 232, 248, 249, 250, 302, 304, 316, 324, 328, 338
protected speech 151, 255, 306, 308, 320
Protestants 13, 23, 27–30, 33, 34–6, 52, 94, 110, 361n
proverbs 11, 12, 22, 78, 348n
Prussia 99, 100, 110, 268
'the public' 52, 66, 70–72, 91, 96–101, 102, 106, 114, 152, 176, 177
 see also 'the people'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 315
public discourse 18, 68, 70, 161, 163, 165, 166, 169, 171, 250, 255, 256, 271, 316, 321, 329
public figures 306
public finance 42–3
public good 36, 102, 247, 257, 280, 282, 283, 292, 301, 310, 322, 329, 337
public interest 311, 314, 316, 318, 328, 337
Public Ledger: Or, Daily Register of Commerce and Intelligence 193
public liberty 41, 53, 67, 68, 85, 137
public opinion 22, 25–6, 42–3, 154–5, 209, 213–14, 218, 223, 265, 268, 270–71, 277, 297–8
public sphere 25–6, 68, 70–72, 178–9, 189, 271, 272, 279, 325, 342
publishers 70, 256, 277, 317, 318, 321
publishing 79–87, 259, 266
Puerto Rico 285
punishments 12, 13–14, 17, 155
puritans 13, 32, 36
purpose of free speech 178–9, 180, 256, 339, 342–3

Quakers 35, 36–7, 75, 161
quarrelling, in church or churchyard 16
Quebec 124
Queen's Council 22
Quran 244

race
 advertising 328
 'Cato's Letters' 66, 73–4, 82, 85
 democracy and speech 311

- and Dobrée 83–5
- freedom and bondage 73, 75–6, 77–8, 79
- India and imperialism 181, 186–8, 204–5, 212–3, 224, 237
- (in)equality of voice 66–7, 177
- libel and politics 251, 252, 254
- libertarian revolution 303–7
- liberty and speech 88
- J. S. Mill 212, 224
- New York uprising 85
- publishing and power 82, 84–6
- race and reason 167–71
- speech, identity and harm 247, 249–50
- women's rights 176
- Race Relations Act (1965, UK) 250
- racism
 - free speech from past to future 335, 339
 - India 187, 205, 212, 213
 - jokes 335
 - libel and politics 251, 253, 255
 - libertarian revolution in US 303–5
 - publishing and power 82
 - race and reason 168
 - social media 151
 - speech, identity and harm 248, 249–50
 - words as weapons 18
- radical press 266, 268
- radio 6, 293, 315, 317, 318, 440n
- Radishchev, Alexander,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 152–3
- rape 180
- 'Red Scare' 284, 287, 292, 303
- Reed, Justice Stanley 254, 427n
- refinement 71
- Reform Act (1832, Britain) 215
- Reformation 23, 27, 28, 35, 51, 222
- regulation of speech 3, 12–14, 16, 22, 24, 26, 155, 264, 304, 315–16, 319, 328, 336, 337, 342
 - see also* censorship
- religion
 - 'Cato's Letters' 50–51, 63
 - communism 258
 - discriminatory speech 339
 - female speech 19–20
 - France 134
 - freedom of philosophizing 93n, 94, 95
 - hierarchy and authority 19–20, 22, 23, 26

India [185](#), [231](#), [234–6](#), [238](#), [239–40](#), [242](#), [246](#)
Lessing on [99](#)
libertarian revolution [303](#)
liberty of the press [45](#)
Luzac on [110](#)
plurality and truth [27–32](#)
power of speech [12–13](#)
religious and secular speech [33–8](#)
religious free speech [26](#), [35](#), [37](#), [50–51](#), [63](#), [219](#)
religious plurality [27](#), [34](#)
speech, identity and harm [246](#), [247](#), [248](#), [249](#)
Sweden [115](#)
tolerating words [27–38](#)
words as weapons [16](#)
republic of letters [7](#), [93](#), [95](#), [109](#)
reputation [15–16](#), [85](#), [247](#)
responsibility [151](#), [301](#), [318](#), [327](#), [328](#), [334](#), [337](#)
Reyner, Edward [16–17](#)
Rheinische Zeitung [268](#)
rhetoric [28](#), [32](#), [47](#), [55](#), [63](#), [120](#), [153](#), [194](#), [338](#)
Rhode Island [391n](#)
Riesman, David [427n](#)
rights
 American colonies [81](#), [123](#), [125](#)
 ‘Cato’s Letters’ [52](#), [63](#), [64](#), [217](#)
 civil rights [45](#), [284](#), [304](#), [305](#), [306](#)
 collective rights [52](#), [282](#), [292](#)
 democracy and speech [313](#)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50](#), [326–7](#)
 First Amendment history [128](#), [129](#), [131–7](#), [139](#), [140](#), [142–3](#), [149](#), [151](#), [285–6](#)
 France [133–7](#)
 group libel [255](#)
 hierarchy and authority [22](#), [23](#)
 human rights [100](#), [135](#), [175](#), [197](#), [250](#), [279](#), [304](#), [326–7](#)
 James Mill [216](#)
 J. S. Mill [217–18](#), [225–6](#)
 national rights [286](#)
 natural rights [45](#), [136](#)
 religion [28](#), [32](#)
 and responsibilities [151](#), [327](#), [334](#)
 right to free speech [3](#), [119–21](#), [128](#), [136](#), [139](#), [140](#), [143](#), [149](#), [170](#), [173](#), [285](#), [293](#), [316](#),
 [340](#)
 Scandinavian laws [118](#)
 Soviet Union [279](#)
 Tindal on [45](#)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326–7
women's rights 35, 172–6, 284–5
see also Bill of Rights (US); citizens' rights of free expression and information;
constitutions;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 declarations of
rights; First Amendment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40
Robinson, Henry 31
Roe, Gilbert 285
Rohingya 247, 321
Romans 47, 73, 230, 237
Roosevelt, Eleanor 326
Roosevelt, Franklin D. 294, 298, 299, 326
Rosenadler, Johan 105, 106
Ross, Edward 297
Rous, Francis 30
Rousseau, Jean-Jacques 36, 96, 97, 383n
Roy, Rammohun 201–9, 235, 236, 237, 411n, 412n, 413n
Royal African Company 84
rumours 21, 24–5, 124
Rushdie, Salman 119, 120
Ruskin, John 212
Russia 152–3, 262, 272–6, 277–9, 283–4, 321, 326–7, 338
Russian Federation 428n
Rutledge, John 169
Rwanda 247

Sacheverell, Henry 263
Saint-Domingue 262
see also Haiti
St James's Journal 60
St Paul 311
St Petersburg 152, 273
Sakharov, Andrei 279
Salvius, Lars 111–12, 113
Sambad Kaumudi 202–3, 207
samizdat texts 279
Satia, Priya 183
satire 93, 159
Savannah, GA 83, 84
Saville-Trower, Elizabeth 371n
Sayani, Ramhimtulla Mohamed 242
scandalum magnatum 260
Scandinavia 6, 91–2, 98, 101–8, 116, 123
Schäffle, Albert 271
Schauer, Frederick 8, 445

Schenck, Charles [283](#), [284](#), [287](#), [288](#), [289](#)
scholarship [45](#), [92–6](#), [94](#), [107](#), [110](#), [341–2](#)
Schroeder, Theodore [285](#)
scientific liberty [108–12](#)
scolds [12](#), [14](#), [348n](#)
Scotland [13](#), [14](#), [28](#), [118](#), [262](#)
search engines [321](#)
Second Red Scare [303](#)
Second World War [302](#)
Section 230 (Communications Act, 1934, US) [318](#), [319](#), [320](#), [322](#), [323](#)
sedition
 1275 English Act [261](#)
 English penal code [245](#)
 freedom of philosophizing [94](#)
 India [205](#), [233](#), [241](#), [242](#), [243](#)
 invention of [13](#)
 legal definitions [165](#)
 licence and liberty [155](#)
 power of speech [13](#), [16](#), [23](#), [24](#)
 spoken and written word [260–63](#)
 Swedish laws [116](#)
Sedition Act (1798, US) [122](#), [128](#), [147](#), [160](#), [263](#), [392n](#)
seditious libel [44](#), [45](#), [49](#), [81](#), [128](#), [159](#), [164](#), [249](#)
Seditious Societies Act (1799, Britain) [159](#)
sepoys [184](#), [187](#)
servants [15](#), [19](#), [79](#), [89](#), [181](#)
Servetus, Michael [29](#)
sex [1](#), [37](#), [164](#)
sexes, and speech [19–21](#), [35](#), [67–72](#), [172–6](#), [177](#)
sexism [18](#), [19–20](#), [335](#), [339](#)
sexual materials [177](#), [318](#), [320](#), [323](#)
Shakespeare, William [11](#)
shapes of freedom [66–90](#)
 overview [66–7](#)
 freedom and bondage [72–9](#)
 liberty and speech [87–90](#)
 male and female speech [67–72](#)
 publishing and power [79–87](#)
Sherman, Roger [129](#), [394n](#)
Sidney, Algernon [40](#), [61](#), [74](#)
Singh, Lakshmeshwar [423–4n](#)
slander
 Bacon on [57](#)
 ‘Cato’s Letters’ [50](#), [52](#), [53](#), [55](#)
 freedom of philosophizing [94](#)

- group libel [248, 252, 255](#)
- impact of new media [331](#)
- Jefferson on [147](#)
- power of speech [13, 14, 15, 20, 22, 24, 25](#)
- purposes of free speech [178](#)
- Roy on [205](#)
- Statute of Gloucester [12](#)
- and written libel [261](#)
- slavery
 - Caribbean [236–7](#)
 - ‘Cato’s Letters’ [81–2, 88, 89](#)
 - and Dobrée [83–7](#)
 - earliest English law [19](#)
 - equality of voice [8, 66–7](#)
 - escapees [78, 79, 85, 87–8](#)
 - First Amendment history [125, 135, 149, 150, 285](#)
 - freedom and bondage [72–9, 79n](#)
 - and Hicky [191, 193](#)
 - imperialism [181, 183–5, 197](#)
 - and India [190, 205](#)
 - liberty and speech [87–90](#)
 - and Macaulay [236–7](#)
 - publishing and power [79, 81–7](#)
 - race and reason [167–71](#)
 - rebellions [85–6, 87–8, 262](#)
 - scales of enquiry [6](#)
 - speech and slavery [160–63](#)
 - women’s rights [172–5](#)
 - see also* [bondage](#)
- Slave Trade Act (1794, US) [161, 162](#)
- Smith, Adam [101, 183, 212](#)
- Smith, Sir Thomas [21](#)
- Sneedorff, Jens Schelderup [103](#)
- social contract [135](#)
- Social Darwinism [187](#)
- social disorder [11, 21, 36](#)
- socialism [6, 258, 271–3, 275–7, 283–5, 287, 290, 292, 302](#)
- social media [3, 64–5, 150–51, 178, 255, 256, 306, 321–3, 331, 335](#)
- social responsibility [301](#)
- South Africa [196](#)
- South America [248](#)
- South Carolina [37, 83, 84–5, 87–8, 128, 392n](#)
- South-Carolina Gazette* [84–5](#)
- South Dakota [284, 289](#)
- South Sea Company [47, 49, 59, 61, 74, 364n, 366n](#)

South West Africa (colony) 248
Soviet Russia Today 294
Soviet Union 257, 258, 274–6, 278, 279, 288, 304, 319, 428n
Spain 23, 153, 157
Spanish Florida 84
Spanish Town, Jamaica 76
speakers 165, 176, 177–8, 179, 180, 332, 333–4, 336
Spectator 54, 57, 71, 72
speech
 and action 8–9, 11, 18, 220–21, 226, 228, 261, 264–5, 287–8, 291, 308, 315, 323, 329, 334–5
 impact of new media 259–64
 male and female speech 19–21, 35, 67–72, 172–6, 177
 ‘more speech’ remedy 8–9, 65, 290, 308, 323, 325, 339, 435n
 power of speech 11–26
 speech, identity and harm 245–52
 spoken word and written/printed word 6, 79–80, 234, 258–60, 261–4, 265
 and truth 22–3
 see also free speech
spells 11, 14, 17
Spinoza, Baruch 94
Stalin, Joseph 278
Stamp Duty, on paper 267
Stanhope, Leicester 206–7, 236, 414n
Stanisław August, King of Poland–Lithuania 99
Stanton, Elizabeth Cady 176
Statute of Gloucester (1378) 12, 261
Steele, Richard 71, 157
Steimer, Mollie 284, 288, 289
Stephen, James Fitzjames 227–30, 231, 239, 245, 248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228–30
sterilization 187
Stevens, John Paul 311
‘sticks and stones’ adage 264
Stono rebellion 87, 89
strikes 285, 292, 293, 295
Struensee, Adam 102
Struensee, Johann Friedrich 101–4, 116, 117
Stubbs, John 13, 17
Suhm, P. F. 103
 Euphron 117
Sullivan, L. B. 305
Sunderland, Duke of 48, 49, 61, 363n, 366n
supernatural power 11, 17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lective rights and wrongs 292, 294, 295
democracy and speech 309, 310, 312, 313, 314
First Amendment history 120, 122, 148, 149, 150–51, 282–90, 331
libel and politics 252, 253, 254n
libertarian revolution 303, 304, 305, 306, 307
obscenity 177
online marketplace 150–51, 316, 317, 318, 320
problem of press freedom 297, 298, 299
race and reason 168, 171
religious free speech and discrimination 37
Swansea 24
swearing 14, 16, 17, 264, 284, 440n
Sweden 91, 92, 104–9, 111–16, 158, 164, 262
Swedenborg, Emanuel 105, 113
Swift, Jonathan 44, 44n, 105, 157

taboos 5, 165, 177
Tacky's Revolt 75, 77
Tagore, Dwarkanath 203, 204
talk radio 318
Tatler 71
Taylor Mill, Harriet 265
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6, US) 318, 320
televangelists 318
television 6, 315, 317–18, 327, 440n
Tennessee 145
terrorism 252
Texas 174
Thatcher, George 162, 167, 169
theatre 44, 264
Thistlewood, Thomas 77
Thomas, John Fryar 238–9
thought
 and expression 220–21, 226, 228
 freedom of thought 41, 51, 110, 220–21, 279, 289, 340
TikTok 322n
The Times 266
Tindal, Matthew 45, 51, 53, 55–6, 57, 360n, 362n, 363n
Tocqueville, Alexis de 168, 187, 296, 406n
tolerating words 27–38
 overview 27
 plurality and truth 27–32
 religious and secular speech 33–8
tone of speech 180
tongue 11, 12, 15, 16–17, 18, 19, 21, 37, 260–61

Tönnies, Ferdinand [271](#)
Tories [42](#), [44](#), [47](#), [48](#), [201](#)
totalitarianism [257](#), [276–82](#), [300](#)
trade unions [120](#), [285](#), [286](#), [292](#), [293](#), [295](#), [309–10](#), [311](#)
Tranquebar [189](#)
translations [1](#), [2](#), [95](#)
trans persons [177](#), [335](#), [338](#)
transubstantiation [12](#)
Transylvania [29](#)
treason [13](#), [159](#), [262](#), [263](#)
Treasonable and Seditious Practices Act (1795, Britain) [159](#), [263](#)
Trenchard, John
 ‘Cato’s Letters’ [40–42](#), [46–9](#), [50–55](#), [58–64](#), [67](#), [68](#), [70–74](#), [80–82](#), [88](#), [105](#), [261](#), [266](#)
 ‘A Woman’ letter [67](#)
Trent, William [381n](#)
Treutlen, John Adam [127–8](#)
trolling [331](#)
Trotsky, Leon [273](#), [275](#), [276](#)
Truman, Harry S. [302](#)
Trump, Donald J. [3](#), [282](#), [332–3](#)
truth
 ‘Cato’s Letters’ [51–2](#), [58](#), [81](#)
 First Amendment history [143](#), [149](#), [151](#)
 free speech from past to future [331](#), [332](#), [337](#), [340–41](#), [342](#)
 free-speech futures [322](#), [323](#), [325](#), [329](#)
 hierarchy and authority [22–4](#)
 India and imperialism [234](#)
 libertarian revolution [307](#), [308](#)
 liberty of the press [43–5](#)
 marketplace of ideas [291](#)
 James Mill [216–17](#)
 J. S. Mill [217–19](#)
 plurality and truth [27–32](#)
 purpose of free speech [8](#), [178](#), [179](#), [314](#)
 religious free speech [27–32](#), [34](#), [35](#)
 totalitarian truth [276–82](#)
 truth and consequences [62–5](#)
Tutchin, John [43–4](#), [45](#), [47](#)
Tutsis [247](#)
Twitter (now X) [150](#), [256](#), [321](#), [323](#), [324](#)
type-founders [159](#)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218](#)

Ukraine [327](#)
Ulyanov, Vladimir Ilyich (Lenin) [258](#), [272–3](#), [275](#), [276](#), [277–8](#)

What Is to Be Done? 272

United Nations 326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304

United States

- collective rights and wrongs 291–6
- Congress *se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 Constitution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 democracy and speech 308–15
- First Amendment arguments 282–91; *see also* [First Amendment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 free speech from past to future 331–4, 338, 341n
- free-speech futures 320–29
- impact of new media 262, 263
- libel and politics 251–6
- libertarian revolution 301–8
- marketplace of ideas 257, 258, 263
- online marketplace 315–20
- problem of press freedom 296–301
- religious free speech 37
- Supreme Court *se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 truth and consequences 63–5

United States Capitol 39, 332

United States Congress 64, 120, 121, 127, 131, 132, 137, 138, 147, 148, 161, 162, 174, 309, 320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326–7

universities 92–3, 93n, 100, 101, 107, 109, 120, 165, 248, 307, 336, 339, 341, 341–2n

unstamped English press 267

untruth 24, 25, 26, 179, 308

Uppsala (University) 107, 108, 109, 111, 113

vaccines 321

Vane, Sir Henry, the Younger 30–31, 32, 36

Venezuela 153

verbal insults 234, 260

Verelst, Harman 380n

Vermont 145

Vernacular Press Act (1878, India) 232

verse 12

victims of crime 306

Victoria,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45

video games 120

viewpoint neutrality 307, 325

violence 12, 15, 16, 18, 244, 246–7, 250, 308, 318, 321, 324

Virginia 63, 123, 125, 128, 129–30, 131, 134, 138, 168, 262, 395n, 396n

voice 171–2, 177, 179, 180

Voltaire [9](#), [99](#), [102](#), [103](#), [116](#), [117](#), [157](#)
voting rights [20](#), [43](#), [165](#), [168](#), [174](#), [175](#), [404n](#)
vox populi, vox Dei [22](#)

Waldron, Jeremy [8](#)
Wales [24](#)
Wallerius, Nils [107](#), [109](#)
Walpole, Robert [48](#), [49](#), [57](#), [59](#), [61](#), [62](#), [63](#), [360n](#), [363n](#)
Walwyn, William [31](#), [35–6](#)
Warsaw Confederation [29](#), [352n](#)
Washington, George [132](#), [133](#)
Washington Post [282](#)
Washington state [146](#)
wealth [269](#), [332](#)
Weber, Max [271](#)
websites [318–21](#), [337](#)
Wekhrlin, Wilhelm Ludwig [384n](#)
Wentworth, William and Thomas [19](#)
Wesley, John [86](#)
‘the west’ [222](#)
West Indies [74](#), [76](#), [77](#), [82](#), [84](#), [86](#), [193](#), [237](#)
Westminster Review [217](#)
West Virginia [146](#), [252](#)
Whigs [42](#), [44](#), [47](#), [48](#), [51](#), [109](#), [201](#)
whispers [78](#), [429n](#)
White, Justice Byron [310](#)
white supremacy [6](#), [67](#), [75](#), [76](#), [77](#), [79](#), [88](#), [149](#), [247](#), [251](#), [253](#), [254](#)
Whitney, Anita [435n](#)
Wihtræd, King of Kent [19](#)
Wilkes, John [117](#), [158](#), [194](#), [195](#)
Wilkins, Charles [189](#), [191](#), [193](#), [408n](#)
William of Orange [33](#)
William V, Prince of Orange [154](#)
Williams, Francis [76–7](#), [79](#), [89](#), [374n](#), [377n](#)
Williams, Roger [31](#)
Wilson, James [144](#)
wire services [298](#)
witchcraft [14](#)
Wolf, Christa [280](#)
Wolff, Christian [100](#), [102](#), [109](#), [110](#)
women
 agency of [89](#)
 ‘Cato’s Letters’ [66](#)
 colonial oral rituals [75](#)
 enslaved people [78](#), [87](#)

female speech [19–21](#), [35](#), [67–72](#), [172–6](#), [177](#)
hierarchy and authority [19–21](#)
imperialism [181](#), [185](#)
Mercier on [97](#)
J. S. Mill on [212](#)
religion [19](#), [35](#)
sex and status [172–6](#), [177](#)
voting rights [20](#), [174](#), [175](#), [404n](#)
women's rights [35](#), [172–6](#), [284–5](#)
women writers [68–70](#)
Woodfall, Henry Sampson [194](#)
words
 and actions [18](#), [264–5](#)
 power of speech [11](#), [12](#), [14](#), [15–18](#)
 'sticks and stones' adage [264](#)
 words as weapons [15–18](#)
working classes [266](#), [267](#), [272](#)
World Anti-Slavery Convention [175](#)
World Wide Web [2](#)
Wright, Robert [245](#), [246](#)
writing, freedom of [91](#), [115](#), [116](#), [121](#), [130](#), [262](#)
written word, and spoken word [6](#), [46](#), [79–80](#), [234](#), [261–4](#), [265](#)

X (was Twitter) [150](#), [256](#), [321](#), [323](#), [324](#)

Yaff (escaped slave) [89–90](#), [381n](#)
Young India (newspaper) [243](#)
YouTube [150](#), [180](#), [256](#), [321](#)

Zenger, Catherine [369n](#)
Zenger, John Peter [80–81](#), [82](#), [85](#), [124](#), [127](#), [143](#), [159](#), [369n](#), [375n](#)
Zoroastrians [11](#)
Zuckerberg, Mark [280](#)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Find us online and join the conversation

TWITTER / X

twitter.com/penguinukbooks

FACEBOOK

facebook.com/penguinbooks

INSTAGRAM

instagram.com/penguinukbooks

YOUTUBE

youtube.com/penguinbooks

PINTEREST

pinterest.com/penguinukbooks

LINKEDIN

linkedin.com/company/penguin-random-house-uk

TIKTOK

tiktok.com/@penguinukbooks

For the latest books, recommendations, author interviews and more

[Sign up to the Penguin Newsletter](#)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author and discover
your next read at [Penguin.co.uk](https://www.penguin.co.uk)

PENGUIN BOOKS

UK | USA | Canada | Ireland | Australia
New Zealand | India | South Africa

Penguin Books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whose addresses can be found at global.penguinrandomhouse.com.

www.penguin.co.uk



Penguin
Random House
UK

First published by Allen Lane in 2025

Copyright © Fara Dabhoiwala, 2025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Cover artwork: Detail from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colour engraving (1797)

Cover photo: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France/Bridgeman Images

ISBN: 978-0-241-34748-5

Penguin Random House values and supports copyright. Copyright fuels creativity, encourages diverse voices, promotes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supports a vibrant culture. Thank you for purchasing an authorized edition of this book and for resp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by not reproducing, scann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art of it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You are supporting authors and enabling Penguin Random House to continue to publish books for everyone.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for the purpose of trai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or system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3) of the DSM Directive 2019/790, Penguin Random House expressly reserves this work from the text and data mining exception.

Th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in the EEA is Penguin Random House Ireland, Morrison Chambers, 32 Nassau Street, Dublin D02 YH68

A CIP catalogue record for this book is available from the British Library

All correspondence to:

Penguin Books

Penguin Random House

One Embassy Gardens, 8 Viaduct Gardens, London SW11 7BW

Footnotes

1: The Power of Speech

[fn1](#) What changed then is explained in [Chapter 10](#).

3: Inventing Free Speech

[fn1](#) Swift's equally memorable analogy for why governments controlled the publication of dangerous ideas was that 'a Man may be allowed to keep Poisons in his Closet, but not to vend them about as Cordials'.

4: The Shapes of Freedom

[fn1](#) By 1773, as anti-slavery sentiments were increasing, it was possible for an enslaved Black man in Massachusetts to smuggle a written attack on slavery to the publishers of the *Boston Gazette*; for him to place the denial of literacy to enslaved people at the heart of their political predicament; for his argument to condemn white Americans for fearing 'Slavery' and demanding 'Liberty' and 'the Rights of Mankind' from Great Britain, yet blithely ignoring their own violent and illegitimate mass enslavement of others ('the slavery of black men is repugnant to the laws of a free constitution, [that] a set of men merely on account of their colour, may be bought and sold as chattels ... we have neither sold nor forfeited our liberty, and have as good a right to freedom as any of the Sons of Adam'); and for the paper's publishers actually to print this text in their columns – juxtaposing it on the page with an advertisement for a new edition of Locke's writings on liberty and slavery. This combination of events would have been scarcely conceivable in earlier decades.

5: Enlightened Experiments

[fn1](#) Though sometimes this technique backfired: many notorious cases of religious heresy – from the middle ages through to the radical scepticism of the Edinburgh student Thomas Aikenhead, who in 1697 became the last person to be executed for blasphemy in the British Isles – were also provoked by the culture of university disputation.

6: The Accidental Exceptionalism of the First Amendment

[fn1](#) Bills of Rights in general, he concluded on his return to South Carolina, were problematic, for they 'generally begin with declaring that all men are by nature born free. Now, we should make that declaration with a very bad grace, when a large part of our property consists in men who are actually born slaves.'

[fn2](#) A final irony is that, soon after the free-speech formul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was taken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became defunct in France itself. A new constitution adopted there in 1793 (but never implemented) would have replaced it with a clause modelled on the First Amendment ('The right to express one's thoughts and opinions by means of the press or in any other manner, the right to assemble peaceably, the free pursuit of religion, cannot be forbidden'). From 1795 until 1814, France's constitutions

did not define 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at all, and thereafter pre-publication press licensing was reintroduced. Only since 1946 has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been reintegrated into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9: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Unfreedoms

[fn1](#) A decade earlier, in a 1942 ruling which still stands, the Supreme Court also unanimously affirmed the basic doctrine that ‘libelous’ and ‘insulting’ words, ‘which by their very utterance inflict injury or tend to incite an immediate breach of the peace’ were not protected by the First Amendment – because ‘such utterances are no essential part of any exposition of ideas, and are of such slight social value as a step to truth that any benefit that may be derived from them is clearly outweighed by the social interest in order and morality’.

10: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fn1](#) Though it’s notable that, as we saw in [Chapter 8](#), Mill’s critiques of the native Indian press did precisely centre on its domination by rich individuals and ‘class interests’.

[fn2](#) This was a very different view of the modern media than Justice Holmes’s Olympian platitudes around this time about ‘free trade in ideas’ and ‘the competition of the market’ – but then Holmes was so lofty that he refused to read newspapers.

[fn3](#) It is striking that American policymakers have been quickest to raise the alarm and take bipartisan action (in a law passed in April 2024) against the Chinese media giant TikTok, the only large and influential social media company in the US that is in non-western ownership, over its unwarranted data-gathering and surveillance of users, and its potential for exercising malign soci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over them. This despite the fact that, as one US senator pointed out in the course of the debates, ‘American companies are doing the same thing, too.’

Afterword

[fn1](#) The exact defi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term remains contentiou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ere university campuses have in recent years been roiled by clashes over ‘free speech’. One reason for this ongoing controversy is that it is often presumed that, if universities are dedicated to free enquiry, they should permit a maximal liberty of expression for their members and on their grounds (including for outside speakers) – otherwise they are supposedly failing in their mission. Both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and their culture-war enemies (who are keen to foment or publicize clashes over controversial ‘free speech’ on campuses) tend to take this premise for granted. But it is not, in fact, a necessary corollary of the academic freedom of scholars pursuing knowledge. Speech in the classroom, speech by students, the speech of visitors to a campus, and any other form of expressive activity that may take place on a university’s grounds, are all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re business of scholarly freedom of enquiry and utterance as defined here. They should not all be lumped together as university ‘freedom of speech’.